

科学技术艺术

第7典

宗教与民俗

第9典

历代文化
沿革
地域文化
民族文化
制度文化
教化与礼仪
学术

第1典

第2典

第3典

第4典

第5典

第6典

中华文化
通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与西亚非洲 文化交流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沈福伟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10 典

【中外文化交流】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与西
亚非洲
文化交流志

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图书
馆藏书章

K203
Z669
:10(5)

中华文化通志·中外文化交流典 (10—095)

姜义华 主 编

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

沈福伟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70 毫米 32 开

字 数 388,000

印 张 15.875

插 页 1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8-02348-4/K·567

141633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FG83 141633

中国与西亚非洲 文化交流志

作者简介

沈福伟,1935年生。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有《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与非洲》、《中外文化因缘》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凡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志根据西亚、非洲文化和民族背景,按照不同的文化区系介绍中国和该地区的历史关系和交流状况。

伊朗是直到十七世纪为止,对中国文化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古国。本志以接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了伊朗和中国在文化上相互融和推进的过程。

阿拉伯、叙利亚、埃及是伊斯兰教兴起以后,西亚、非洲文明的代表,中国和它们有过广阔和影响深远的交往,特别是与埃及和叙利亚的交往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东方贸易盛期,即中国丝绸文化席卷亚、非和地中海地区之时。九世纪开始的中国外销瓷的历史,在长达一千年中,也以西亚、非洲为最大的市场,推动着当地社会的进步。书中无数事实说明,中国在长时期中都在通过这一地区追寻通往地中海的通道。书中还论述了中国在中世纪如何通过这一地区向西欧输送了包括造纸、印刷、罗盘、火药和制瓷、丝织在内的中华文明的精华。

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则从西亚、非洲接受了诸如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精神文明和医药、园艺、金工、天文、数学、建筑等多种学科的知识与技术。对于这方面内容,书中有充分的展示。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中华文化和西亚、非洲文化	7
第一节 西亚、非洲文化源流	7
一、前伊斯兰文化时期	7
二、伊斯兰文化时期	10
第二节 中国和西亚、非洲文化交流综述	19
一、八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和西亚、非洲	19
二、八世纪中叶后的中国和西亚、非洲	27
三、现代中国和西亚、非洲的经济文化合作	33
第二章 中国和伊朗文化交流(上)	35
第一节 巴比伦、古波斯与中华文明	36
一、彩陶文化和骑马文化	36
二、巴比伦城和悬圃传说	39
三、沃民国和求仙思想的东渐	42
四、蜻蜓眼玻璃珠的出土	51
第二节 汉代流行的安息文化	54

141633

一、安息国和中华文明	54
二、石雕艺术	56
三、魔术与杂技	61
四、安息乐器	62
五、家具与织物	68
六、安息纹饰	69
七、龙的变异	78
第三节 萨珊波斯和中国	85
一、使节和商旅	85
二、萨珊钱币的出土	92
三、伊朗玻璃器	95
四、工艺与艺术的交流	106
五、民俗和竞技	116
第四节 元代中伊文化交流	123
一、回回学	124
二、天文学	125
三、中医学	129
四、印刷术	133
五、艺术	135
第三章 中国和伊朗文化交流(下)	138
第一节 波斯宗教在中国的传播	138
一、祆教在中国的传播	138
二、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	157
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173
四、十叶派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175
第二节 在中国的伊朗人	178

一、华化的伊朗人·····	178
二、元代的波斯军团·····	186
第三节 科学技术交流 ·····	188
一、养蚕织丝·····	188
二、金属冶铸·····	196
三、陶瓷贸易与制造·····	199
四、深井技术的西传·····	212
五、甲骑具装·····	213
六、建筑技术·····	216
七、伊朗医学在中国的推广·····	220
八、波斯人的珠宝鉴别·····	222
九、罗盘导航·····	223
十、火药在伊朗的使用·····	225
第四节 饮食文化交流 ·····	226
第五节 语言与文学 ·····	230
一、波斯语在中国·····	230
二、吐鲁番摩尼教残经·····	234
三、敦煌摩尼教残经·····	236
第四章 中国和阿拉伯、叙利亚文化交流 ·····	239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香料王国 ·····	239
第二节 中国的阿拉伯人社区 ·····	253
第三节 地理知识的交流 ·····	259
一、中国地志中的阿拉伯·····	259
二、阿拉伯地志中的中国·····	264
第四节 阿拉伯马的引进 ·····	270
第五节 中阿陶瓷贸易 ·····	273

第六节 工艺与科学的交流·····	280
一、纺织·····	280
二、炼金术·····	284
三、化工·····	286
四、金工·····	292
五、珠宝·····	293
六、星历·····	295
七、医药·····	296
八、园艺·····	300
九、地图·····	301
十、眼镜·····	302
第七节 艺术与民俗文化交流·····	304
一、美术·····	304
二、建筑·····	307
三、回回乐舞·····	308
四、双陆·····	310
五、饮食·····	312
第八节 语言与文字·····	315
一、文字的借鉴·····	315
二、阿拉伯语在中国·····	316
第五章 中国和土耳其文化交流·····	324
第一节 中土两国的历史关系·····	324
第二节 物产和知识的交流·····	332
一、罗马时期·····	332
二、土耳其时期·····	337
第三节 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志》·····	341

第四节 中国穆斯林在伊斯坦布尔·····	343
第六章 中国和埃及、苏丹文化交流 ·····	345
第一节 域外地理与埃及知识·····	345
一、大秦与海西·····	345
二、《魏略》所记非洲地理·····	347
三、勿斯离与米昔儿·····	350
四、近代中国人访埃印象·····	352
第二节 埃及艺术和中国·····	354
一、美术·····	354
二、乐器·····	356
三、苏莫遮舞·····	358
四、影戏·····	360
第三节 工艺与科学知识交流·····	362
一、丝织、棉织、毛织·····	362
二、炼金·····	366
三、医药·····	368
四、玻璃·····	371
五、冶金·····	374
六、珠宝·····	375
七、建筑·····	379
八、陶瓷·····	382
九、造纸、印刷技术·····	387
第七章 中国和北非、西非诸国文化交流 ·····	391
第一节 中国和北非诸国的关系·····	392
第二节 中国和西非诸国的关系·····	395

第三节	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	396
第四节	文化信息与交流·····	398
一、	丝瓷文化·····	398
二、	园艺作物·····	399
三、	珊瑚·····	401
四、	珊瑚、玻璃·····	401
五、	织物·····	402
六、	蕃榧子·····	402
七、	木兰皮舟·····	403
八、	马头琴·····	403
第八章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文化交流 ·····	405
第一节	中国和非洲之角的历史关系·····	405
第二节	埃塞俄比亚的古国·····	408
一、	兜勒国、加陈国·····	408
二、	颇黎国、小人国·····	409
三、	没药国、摩邻国·····	410
四、	层檀、霞勿檀、伽力吉·····	410
五、	于马都国、雅济国·····	411
六、	乌沙·刺锡·····	412
第三节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文化交流·····	413
一、	织物·····	413
二、	陶瓷·····	414
三、	香药·····	414
四、	动物·····	415
五、	珠宝·····	416
第四节	索马里的古国·····	417

一、肉桂国、勃焚洲	417
二、唐代索马里	418
三、宋代三麻兰、麻啰抹	419
四、元代马答国	420
五、明代木骨都束	420
第五节 中国索马里文化交流	421
一、香药	421
二、矿物	423
三、动物、毛皮	423
四、木料	425
五、陶瓷	425
六、钱币	427
第九章 中国和东非、中非、南非诸国文化交流	428
第一节 中国与肯尼亚、坦桑尼亚	428
一、历史关系	428
二、东非的古国	431
第二节 东非文化与中华文化	434
一、檀木、龙涎	435
二、象牙、犀角	436
三、五金	437
四、丝棉织物	437
五、瓷器	438
六、钱币	442
第三节 中国与莫桑比克、马尔加什	444
第四节 中非、南非与中华陶瓷文化	446
一、津巴布韦	446

二、马拉维、赞比亚、扎伊尔·····	448
三、博茨瓦纳、南非、圣赫勒拿岛·····	448
第十章 二十世纪中国和西亚、非洲文化交流 ·····	450
第一节 中国伊斯兰教学者与伊斯兰各国·····	450
第二节 典籍翻译与交流·····	453
第三节 五十年代后文化、教育交流的新潮·····	459
第四节 西亚、非洲研究在中国的进展·····	461
参考文献 ·····	467
译名对照 ·····	478

导 言

西亚和非洲,是个有着广阔的山林、原野和沙漠的地区。这里曾是人类最早成长、活动的地方,几千年前已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最辉煌的尼罗河三角洲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辉煌的文明像奔流的河水,滔滔不绝,绵延至今。

西亚、非洲和中国是世界三大古文明的摇篮,两千多年前彼此已开始有过民族和文化的接触。西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离中国最近。从阿富汗、伊朗向西,有伊拉克、土耳其、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阿拉伯也门和也门,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体系,在文明演进的舞台上,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伊朗、阿拉伯、土耳其是播送西亚、北非文明的三大主要地区。

公元前六世纪,居住在伊朗高原的波斯人和米地亚人继承巴比伦、亚述文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波斯帝国,在大流士(前521—前485年)统治时,这位身兼巴比伦和埃及国王的波斯君主,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这使伊朗人的文明信息向东推进到了中国的西部边境。随后,希腊文化紧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东征,在亚洲中西部发扬光大;罗马帝国席卷地中海世界,势力伸向波斯湾和红海。立国伊朗东部的帕提亚王朝和萨珊波斯为发

扬伊朗文化在东方继续与西方相抗争。但希腊、罗马的文化边界却一直推进到了中亚细亚,进入了中国的新疆和印度河流域,在中国西部形成希腊文化、伊朗文化、印度文化与华夏文化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

公元七世纪,游牧的阿拉伯人,在走出沙漠,席卷西亚和地中海南岸以后,伊斯兰文明便替代以往各种文明,在这一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在阿拉伯哈里发统治下的帝国,再次以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宏伟版图展现新的伊斯兰教文明的威力。伊朗文化作为一种高度发展的城市文明,在提高阿拉伯文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哈里发帝国建立后的两个世纪,阿拉伯人已消化了伊朗的各种学问,吸纳了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和印度文化,甚至还有中国的工艺和科学知识,成为古典文明的一个无可争议的继承者,并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阿拉伯人建立的阿拔斯朝的新都巴格达,就是这个中心的中心。

在阿拉伯世界中,文明传递的趋势逐渐由早先的东西交汇转变成滚滚浪涛自东向西奔流的格局。到十世纪末,一个阿拉伯帝国,在文化体系上至少已呈现出三个群体的态势:伊朗、伊拉克为它的东支;北非、科尔多瓦为它的西支;叙利亚、埃及则构成介于东西支系中的又一支系。由此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并列的历史:东部的巴格达、居中的开罗和西部的科尔多瓦。这就使文化的信息、文明的脉搏在亚、非、欧三大洲通过三点联成了一线。科尔多瓦的穆斯林在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发动了将阿拉伯学术传送给欧洲基督教徒的文化运动,给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传递了知识的钥匙,开启了智慧的门户。其间虽有绵延达两个世纪之久(1097—1291年)的欧洲基督教十字军的八次东征,似乎一度使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与伊朗文明之间曾经有过的东西汇合的局面,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再现,然而此刻统治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人以文明世界中心的骑士风度与

全副戎装的基督教骑士团鏖战到底,使文明传递的洪波依然滚滚西去。那时的世界是东方文明主导着西方文明的成长与发展。

在蒙古人统治伊朗和占有美索不达米亚期间,经过与西方基督教国家军事较量磨练的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流砥柱。阿拉伯文化的中心由伊拉克转向埃及,开罗奠定了它作为穆斯林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

建立在拜占庭文明废墟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承阿拉伯人开创的事业,在十五世纪崛起于小亚细亚,再度为缔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帝国而征战了几近三个世纪。到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时期臻于极盛,昔日哈里发雄视一世的盛况重又出现在西亚、非洲,它的版图跨越克里米亚伸向尼罗河第一瀑布,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直抵达波斯湾的巴林。唯有伊朗却从此另立一方,脱离了阿拉伯世界,在兵连祸结中重获独立。土耳其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科学、宗教和社会经济的管理知识,连书写用的字母也借自阿拉伯文,并一直使用到192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十六世纪便接受了西方国家的挑战,先后与葡萄牙、威尼斯、热那亚、法国、英国,甚至美利坚合众国发生冲突。西方文化冲击土耳其开始于拿破仑对埃及的战争,此后法国、英国连同美国相继在叙利亚、埃及和北非兴办学校,为以后蚕食鲸吞这些地方撒下网罟。

1840年后,土耳其已被英、俄、奥、普四个欧洲列强所挟持,接着是整个非洲被列强瓜分完毕,西亚、非洲的政治地图大为改观。“近东”、“中东”问题渐成西方列强政界的常用名词。1907年英、俄瓜分伊朗,1920年土耳其被英、法宰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西亚、非洲地区,只有一个穷蹙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红海西岸的埃塞俄比亚,以及大西洋海滨的利比里亚算是独立的国家。二战结束后,西亚、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才使这片广大的土地挣脱殖民统治的锁链,获得了独立。

从亚洲东部向西部内陆伸展的中华文明,在地理上和占有 3500 万平方公里的西亚、非洲之间虽有千山之隔,却有一条狭窄的高原走廊相连,它便是位于中国新疆西南的塔什库尔干和帕米尔高原西部的阿富汗之间的瓦罕山谷。这条东西贯通兴都库什山脉的谷道,在二世纪时名叫休密,后来又称钵和、胡密(护密),将中国和西亚连到了一起,在三千年前已是居民和商旅东西出入的孔道了;二千年前更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分别从撒马尔罕和阿富汗通往西亚的必经之路。中国和西亚、非洲,从那时起,便有理由视作是有机联系的文化实体。西亚、非洲和中国,代表了亚非大陆最悠久的文明。

本志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去寻求文化的共识,探讨以往的踪迹,疏理彼此的异同,总结交流的历史。以下的几点认识,便是本书写作的缘起:

西亚、非洲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一部世界文明史,从公元前六七千年开始,首先由尼罗河、两河流域揭开序幕,直至十七世纪,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西亚、非洲文明组成了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洋文明的核心。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中近东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地区之一。

古老的中华文明曾从西亚长期吸纳优秀的文化,以丰富、活跃自身的文明内涵,拓展自己的文明进程。自战国时代起,西亚的文明古国伊朗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与南亚的印度相并列,是中华文明长期与之互通信息、互相借鉴的主要对象。在欧洲近代文明尚未从大西洋来到中国以前,西亚是中国和地中海世界取得联系的必由之路,中国通过这一地区可以调整自身的文明机制,校正文明进展的步伐。无论工艺制造、园艺栽培,还是原料、矿物、药材、马匹、皮毛等各类资源,甚至包括制度、法律在内的各种精神文明,中国都曾长期从这一地区获得自己的需求,有些已融化在中华文明之中,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西亚和北非是中华文明向世界发扬光大的中继站,是近代文明兴起以前,中国得以和欧洲基督教世界沟通的纽带。伊朗是中国以外,世界上最早使用并向西传导中国发明的丝绢、植物纤维纸和弩机的民族之一。阿拉伯人兴起以后,造纸术、印刷术、炼丹术,连同制瓷、罗盘、火药都是首先在当时拥有高度文明的西亚得到移植与传播,并推动着地中海世界也步入这一文明的圈子。中国的这些发明先后经过伊朗人、阿拉伯人之手跨越地中海,传入欧洲。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的改革家如杜尔哥等人还念念不忘想通过了解中国养蚕、造纸、制瓷等业的技巧,来改进欧洲大陆的制造业,改善欧洲的社会生活。

中世纪西亚、北非高度发展的文明,曾催发了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是欧洲现代文明的起点。阿拉伯世界的科学与文化改变了落后的欧洲,使欧洲学会了向东方学习,去迎接自己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最初从意大利半岛展开,最先从拉丁语和古文字的研究启动。意大利最接近阿拉伯世界,在商业上曾长期仰赖于埃及、利凡特和小亚细亚。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从文字学、文献学开始,是由于欧洲的科学、文化与伊斯兰文明世界相比,差距太大。欧洲文盲尤多,要学术昌明,科学发展,还得从文献、文字展开。在大亚尔卑尔特和罗哲尔·培根的时代,欧洲炼丹术开始从中国和阿拉伯的炼丹术获得技术秘密,经过好几个世纪的传承,才引发了近代化学的诞生。罗盘和火药在欧洲引起的革命,其意义比之法国大革命尤为深远。在伊斯兰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贡献中,不难看出,中华文明已成为伊斯兰文明极富生机的组成部分,以致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初,仍然认为襁褓纸、炼丹术、火药、火器都是阿拉伯人的伟大创造。

西亚、非洲文明在现代多元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欧洲殖民时代的告终、欧洲中心论的渐被多元文明论替代,使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其他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更显珍贵。有着宗

教特色的伊斯兰文明,以西亚、非洲为它的母国,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文化代谢机制,仍然是值得重视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文化交流,是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诚望通过本志,为想了解这方面知识的读者和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提供一个基本的线索和史料,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也算是遂愿了。

第一章 中华文化和西亚、 非洲文化

第一节 西亚、非洲文化源流

一、前伊斯兰文化时期

西亚、非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诞生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下游三角洲在公元前 7000 年已经萌发了文明的幼芽,逐步摆脱采集经济,开始了农业与畜牧。经过漫长的探索与追求,金属冶炼与城市生活随之展开,文明在这些地区首先开出灿烂的花朵。

西亚东部自伊朗高原开始,西部到地中海为止,有着一块号称新月形的沃土,由西奈半岛向东伸展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是西亚最适宜于农耕和定居的地方,从那里萌发了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当地居民仰赖两河在每年河泛期间供给充足的水量,如同埃及依靠尼罗河一样。

游牧民族络绎进入这一沃土,开启了文明社会的诞生。在公元前 3400 年的乌尔,首先出现了欧罗巴族的苏美尔王朝,后来又有赫梯

人、都兰人、卡西特人和波斯人的移入。最重要的是那些来自阿拉伯沙漠的闪族人群,巴比伦人、阿拉美人和亚述人,注定了最后成为这里的统治者。苏美尔人创造了刻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发明一种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并有闰月的太阴历,使用陶轮和车,采用六十进位的计数法。他们的创世神话、洪水和巴培尔塔的故事,后来被希伯来人写进了《旧约》。苏美尔的城市在公元前3000年被闪族的游牧民所征服,阿卡德、巴比伦相继占有这块人间乐土。法律的制订,运河、道路的建设,城市生活和神庙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都是这一时期文明发展的标志。公元前1700年,骑马民族卡西特人的入侵,毁坏了巴比伦人的文明,使美索不达米亚跨入另外一个时期。巴比伦人重视寺庙、学校,创作了伟大史诗《吉尔伽美什》,进一步改良太阴历,把一年按月亮盈亏分作日数不等的十二个月。公元前八世纪末,亚述人继承巴比伦文化,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领土从托罗斯山脉伸展到埃及边境。亚述人使军事机器极度扩张,装备有铁兵器、攻城机、战车的军队成了国家的命脉。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开启了世界上最早的邮传制度。精工制作的浮雕是亚述艺术的代表,动物或人兽搏斗的英雄图像,特别是作为权力和强敌代表的狮子,以引人注目的题材出现在各种古建筑中,在那里,亚述的雕匠已将力和情操完全融合为一了。

肥沃新月的西部,缺少发展农业的广大平原,海和沙漠促使那里的居民奋战于畜牧与海外经商,赫梯人、阿拉美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相继流徙在这一地区。赫梯人建国于小亚细亚的中部,在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叶已进入盛期,他们对文明世界的贡献,是使用比之铜、石器更为锋利的铁器。他们的建筑艺术,诸如宫墙、回廊和装饰艺术,都被亚述人所继承。公元前十世纪来临的时候,阿拉美人统驭了小亚细亚和西南亚洲的陆上贸易,在大马士革建立了强有力的城邦。他们创造的拼音文字,代替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成为通行文字。阿拉美语在公元前后曾是地中海东部地区通用的语言,长时期来给后人留

下了巨大的影响。

闪族的腓尼基人居住在黎巴嫩山以西的地中海沿岸,贫瘠的土地驱使他们仰赖天然良港,从事海外贸易。他们的足迹遍及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各地,甚至进入大西洋。他们一手建造了加迪斯、迦太基和马赛等沿海城市,并在地中海的马耳他、塞浦路斯、西西里驻扎卫士。腓尼基人最大的贡献是采用二十二个符号的拼音字母,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子音,按次序排列,构成了真正的拼音字母。后来希腊人又给它加上了母音,完成了拼音文字的创作。同样属于闪族的希伯来人,他们逐渐由早先居住的沙漠渗入巴勒斯坦,在北部建立以色列王国,在南部成立犹太王国。大卫(前 1010—前 970 年)统一了分散的部众。后来分裂的巴勒斯坦先后被亚述和迦勒底所征服,犹太人在公元前 586 年出奔埃及。在埃及,先知耶利米由犹太教确立的一神教,将耶和华演化成一个万能的上帝。希伯来的文学作品通过宗教形式结集成《旧约》和《新约》,成了千古不朽的宏篇巨著。

巴比伦、亚述文明的继承者是波斯帝国。欧罗巴民族的波斯人和米地亚人在公元前 680 年后击败了亚述,在公元前六世纪建立起一个从地中海东岸到伊朗高原的大帝国。大流士(前 521—前 485 年)统治时期,帝国东起印度,西至色雷斯和埃及。他身兼巴比伦和埃及国王,将其领土划成二十个行省,分派总督(satrap)治理。波斯原先信奉自然神灵,到公元前六世纪,琐罗阿斯德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宗教,他的一生被视作是对恶势力不断抗争和胜利的一生。火被当作善与光明的神马兹达的象征,受到崇拜,琐罗阿斯德教要求在善恶斗争中作出抉择,马兹达的旗帜是正义,他会援助站在他一边的人。在琐罗阿斯德的信念中,善与恶的斗争被认为直到人死之后仍然继续存在。波斯的宗教观以为人体只是精神所托附的机体,精神的要素生命可以超脱人体而行动和思想,因此琐罗阿斯德的信徒习惯于弃尸郊野。琐罗阿斯德教后来虽变为世俗的、以魔法和禁忌为宣传形式

的宗教,但它关于地狱和恶魔的观念却被犹太人所借用,犹太人又传给了基督教和崇拜太阳神的弥罗(Mithra)教。

公元前 334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发动了征服亚洲的战争,到公元前 322 年,马其顿大军已抵达印度河畔,亚历山大帝国代替波斯帝国崛起于欧、亚、非三洲。希腊文化跟随亚历山大的军事征服,在亚洲西部和地中海南岸发育、成长,这使埃及、小亚细亚、伊朗、美索不达米亚、阿富汗和费尔干纳,都留下了希腊文化以及希腊君主建立的国家,欧亚文明的洪波第一次激荡汇流在中国西部边境。

罗马帝国的崛起,使希腊文明有了新的依附。埃及、昔兰尼加、利凡特(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小亚细亚,都是罗马在地中海东部的重要辖区,染织、金工、玻璃、制陶、畜牧、园艺都各有所长。精湛的工艺和美术更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名声。在君士坦丁(306—337 年)时建都的拜占庭,直到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很久,始终是在东地中海滋育希腊文明的营垒。在古波斯的东部地区,帕提亚王朝以希腊文化和伊朗文化的传导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到了 226 年,强有力的萨珊王朝重新以恢复古波斯的光荣为己任,致力于民族文化的重建,确立琐罗阿斯德教(祆教)为国教,排斥摩尼教,将伊朗文化推向一个繁荣的高峰。这个王朝在最初的二百年中不断和罗马人争战,后期又与哒哒、突厥冲突,最后被新兴的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灭亡。

二、伊斯兰文化时期

阿拉伯人是天生的商业民族,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商人出身。他创立的伊斯兰教,将处于蒙昧时期的阿拉伯社会推上改革的道路。阿拉伯人信奉麦加城中供奉黑石的圣地克尔白(Ka'bah),俗称天房,每年有朝圣的活动,在朝圣的 4 个月中,一切争斗都不再存在。这种宗教信仰将处于松散的部落生活中的人群凝聚到一起,为推行一种世界

化的新文明去奋斗。伊斯兰教信徒则以穆罕默德为最伟大的先知。他的教训都结集在伊斯兰教的圣经《古兰经》中。伊斯兰教从622年起开始走出麦加,广泛传教,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他的新都。632年穆罕默德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他的事业,不断发动圣战,征服邻近地区,建立起由哈里发(Khalifah, Caliph, 继任者)统治的帝国。帝国的疆域从东起中亚细亚的乌浒河和信德,向西沿地中海南岸伸展到大西洋,又跨海占领了西西里岛,在西班牙南部建立了伊斯兰教的国家。中世纪的文明仰赖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拜占庭与欧洲架起了桥梁,使文明的接力棒在亚、欧、非三大洲之间顺利运转。

阿拉伯人征服西亚、北非之后,在伍麦叶朝(661—751年),迁都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开始接触发达的城市生活,进入阿拉伯文化的孕育时代。过惯沙漠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一旦进入城市,便有许多从被统治者那里必须学习的东西。他们从拜占庭和波斯人那里吸收工艺、技能,学习管理政府机构;从波斯语里吸收的辞汇特多。在征服者实施的政策下,波斯人、叙利亚人、希伯来人、柯柏特人、柏柏尔人和各种民族都有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和阿拉伯人通婚。此后,凡是信奉伊斯兰教,使用阿拉伯语,能写阿拉伯文的,不再寻问他原来的民族成分,都成了阿拉伯人。阿拉伯文化成了亚、非、欧三大洲许多使用阿拉伯语文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的共同财富。阿拉伯语在西亚、北非战胜了阿拉美语、波斯语、罗马语、柯伯特语,成为通用语言。阿拉伯人分别于638年和640年在伊拉克新建的孪生城市巴士拉和库发,在伍麦叶时期发展成伊斯兰世界文化活动最大的两个中心。阿拉伯语法的创始人阿布勒·艾斯瓦德·杜埃里(688年卒)就曾生活于巴士拉城。他的再传弟子,赫立理的学生西伯韦(793年卒)是个波斯人,他编写了第一部阿拉伯语法教科书,命之为《书》(*al-Kitāb*),直到现在仍是阿拉伯语法研究的基准。

在波斯,尽管许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但琐罗阿斯德教寺庙直到十世纪仍遍布全境。波斯语虽然还有很大势力,但在通都大邑却已通行阿拉伯语。波斯人在九至十二世纪中也有许多学者用阿拉伯语写作各种学术著作,从事各项文学创作。波斯人开始阿拉伯化。同时,波斯文化在提高阿拉伯文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波斯音乐曾是伍麦叶时代崛起的阿拉伯音乐十分重要的借鉴。当时最著名的歌姬加米拉(约720年卒),是个麦地那人,她常公开手持柳特(波斯长颈琵琶)演唱,她的歌婢弟子举不胜数。麦加著名男歌手伊本·麦斯吉哈(715年卒)对传译波斯歌曲、引进波斯器乐、根据希腊和波斯乐律改革阿拉伯音乐贡献殊多。据说是他从波斯工匠那里学到波斯歌词后,再用阿拉伯诗谱写了最初的歌曲。精究罗马音乐和波斯音乐的男歌手伊本·穆哈利兹(约715年卒)是波斯血统,被推崇为伍麦叶时代首屈一指的作曲家,列入伊斯兰教四大歌手之一。出身波斯贵族的摩苏尔人易卜拉欣(742—804年),首先用指挥棒打节拍,又是古典音乐的创始者。他的儿子伊司哈格(767—850年)是麦蒙和穆台瓦基勒的清客,被赞誉为伊斯兰教产生的最伟大的音乐家。阿拉伯医学因接受了波斯和希腊医学的成就,开始摆脱符咒和单方的窠臼。原籍塔伊夫的哈里斯·伊本·凯莱达(约634年卒)是阿拉伯半岛上首先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他在波斯学习医学,获得了“阿拉伯医生”的头衔。希腊医生和叙利亚医生成了伍麦叶的宫廷医生。阿拉伯人又从希腊文献中汲取炼金术、医学和占星术的知识。阿拉伯建筑艺术吸取了辖区中各地的传统式样,建筑风格各异,可以分成叙利亚埃及学派、伊拉克波斯学派、西班牙北非学派和印度学派。

阿拔斯朝(750—1258年)的出现,是阿拉伯帝国政治上日益分裂,文化上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时代。762年建成的新都巴格达,经过精心规划,不到半个世纪,当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时,已由当年的荒村,一跃而成繁华的国际都会,甚至被赞为举世无匹的

城市。阿拉伯人在这时大胆地移植希腊、波斯、印度和叙利亚文化,从750年起,在大约一百年中,将希腊语、波斯语、梵语、叙利亚语的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促成了阿拉伯文化的觉醒和繁荣。在几十年间,巴格达就将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希腊文化遗产变成了自己的学问。哈里发麦蒙(813—832年)于830年在巴格达创建了智慧馆(Bayt al-Hikmah),它拥有科学院、图书馆和翻译馆。希腊的医学、天文学、数学成了阿拉伯学问。希拉城的景教徒侯奈因·伊本·伊司哈格(809—873年)当上了图书馆馆长兼科学院院长,负责全部科学的翻译工作,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和受到敬仰的人物。他是一批景教翻译家的领袖。他的学生又是儿子的伊司哈格,精通阿拉伯语,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著作最成功的翻译家。侯奈因所译名著,麦蒙按译稿重量付给等量的黄金。撒比特·伊本·古莱(约836—901年)则是哈兰一批萨比教翻译家的领袖,他以哈兰哲学医学学院为基地,翻译与修订希腊著作。他的庇护者哈里发穆耳台德(892—902年)甚至把他当作至交相待。十世纪后期又出现了许多翻译家,最后完成了阿拉伯历史上的翻译时代。此时,阿拉伯语已经从穆罕默德以后的宗教的语言,变成了足以表达高深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概念的语言;同时它又以一种晓畅的政治和外交的语言,而风行于亚非各地。

当阿拔斯朝最初的一个世纪过去时,阿拉伯人消化了波斯的各种学问和希腊的古典遗产,使之成为适合于自己的需要,在天文学、数学、炼金术、地理学和医学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阿拉伯世界迎来了对科学具有独创精神的时代。侯奈因写的《眼科十论》是眼科学最早的教科书。景教徒伯赫帖舒曾因充任拉希德和麦蒙的御医而家财亿万。拉希德在九世纪初仿照波斯医院,在巴格达建立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医院(bimāristan,借自波斯语),由伯赫帖舒任院长。从塔巴里、拉齐到伊本·西纳,许多波斯医生都用阿拉伯语写作他们的医学著作。拉齐(865—925年)是伊斯兰最伟大的医学家,也是中

世纪最杰出的临床医生,一生写作了 156 种著作。他被认作是外科上串线法的发明者。他的炼金术著作《秘典》(*Kitab al-Asrar*),在 1187 年前被克利曼纳的贾拉尔译成拉丁文,成为欧洲化学知识的来源。伊本·西纳(980—1037 年)则因他在医学、哲学、语言上的造诣和诗人的声誉,被喻作阿拉伯科学的化身,他的著作多达 99 种。另一名安达卢西出生的医学家伊本·贝塔尔(1248 年卒)留下的两部不朽名著《医方汇编》和《药学集成》,使他对伊斯兰世界医药的贡献超过了他的前辈。

埃及法蒂玛朝哈里发阿齐兹(975—996 年)将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办成一所学院,到今天还是享誉世界的伊斯兰教最高学府。哈里发哈克姆(996—1021 年)创设了差可与巴格达智慧馆相比的科学馆(*Dār al-‘Ilm*),除伊斯兰教的课程外,还讲授天文学和医学。哈克姆在穆盖塔木山上建筑观象台,伊本·尤努斯为他编制的历表就叫哈克姆历表,曾是当时最先进的历表。伊本·海赛木(1039 年卒)的《光学书》,原本虽佚,但靠了贾拉尔的翻译,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光学的进程。罗杰·培根、达·文西、约翰那·凯卜勒的著作,都深受其益。

阿拉伯天文学由 771 年传入巴格达的印度天文书《西德罕塔》(*Siddhānta*)的翻译开始,阿拉伯语译本《信德印度》(*Sindhind*)还附有波斯的《天文表》。希腊托雷美的《天文大集》有多种阿拉伯语译本和校订本。麦蒙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分别建立天文台,观察天象。并仿照希腊制造星盘、象限仪、日晷和地球仪等天文仪器,测量子午线一度之长。哈兰的白塔尼于 877—918 年在赖盖研究天文,制成具有独创成就的《萨比天文表》。加兹尼人比鲁尼(973—1050 年)具有波斯血统,精通各种语言,用阿拉伯语写作天文、历法和占星术著作。他曾敏锐地讨论了地球自转和测定地球的经度、纬度。他在一部尚未公开的著作中,首先在伊斯兰世界提到中国的茶叶。阿拉伯天文学以波

斯为基地在中世纪有长足的进步。欧麦·卡雅(1048—1124年)在纳沙布尔天文台编制的哲拉里历,胜过了格雷历。旭烈兀在占领巴格达的翌年,即1259年,就在乌尔米雅湖附近的马拉格建立天文台,由波斯科学家纳速刺丁·杜西(1201—1274年)担任台长,编制了集古今历法大成的《伊儿汗天文表》。天文台的13种仪器和藏书40万册的图书馆,在科学事业上造就了一个自麦蒙时代建立智慧馆以来所未有的盛世。阿拉伯人的一些天文著作,后来译成拉丁语传入欧洲,催发了基督教欧洲天文学的发展。

印度算术和印度数字,通过大科学家花拉子密(780—850年)的著作和海伯什(874年卒)的天文表,在阿拉伯世界普遍使用,最后传入欧洲。花拉子密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的原本已佚,十二世纪贾拉尔将它译成拉丁语,直到十六世纪还在欧洲各大学中被用作主要的数学教科书。代数学的阿拉伯名称 algebra 也因此成了欧洲各族文字。

花拉子密以托雷美《地理学》的阿拉伯语译本为蓝本编纂的《地形》一书,奠定了后来阿拉伯地理学著作的基础,指导着伊斯兰地理学,直到十四世纪。九世纪末,从波斯人后裔伊本·郭大贝开始,各种记录道路和物产的地理志相继问世,到小亚细亚人雅古特(1179—1229年)在摩苏尔编成《地名辞典》(1224年)和阿布·菲达写出《地理志》而集其大成。巴勒莫人伊德里西(1100—1166年)为献给西西里国王罗吉尔二世所作《地理书》,是一部具有总结前人学说并在实测地图上有新的建树的著作。

阿拉伯文学是众多穆斯林的共同财富。十世纪上半叶,由死于942年的哲海什雅里根据古老的波斯语故事《一千个故事》和几个印度故事改编完成了一部巨著。在后来几百年中,从希伯来、印度、希腊、埃及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到马木鲁克王朝,正式定名《一千零一夜》。到1704—1717年间译成法文后,在西方世界已是家喻户晓的文

学范本了。

教育在阿拉伯世界受到重视。阿拔斯朝教育事业大有发展,受到朝野的提倡与推崇。小学教育使女孩受到初级的宗教教育。在麦蒙时代的智慧馆之后,伊斯兰世界第一所高等学校尼采米亚大学在1065年正式开办。创办人尼采木·木勒克是塞尔柱突厥王朝的波斯籍大臣,他在巴格达创建的大学是一所政府承认的宗教学院,一直存在到1395年。后来这种宗教学校(madrasah)曾在伊拉克、叙利亚续有增建。

阿拉伯美术以纤细多变的几何形与花卉图案为长,创造了被后世称为阿拉伯式(Arabesque)的装饰图像。波斯人尤其精于工艺美术,使伊斯兰教的手工艺,诸如地毯、靠垫、丝织品、宝石镶嵌,都显得富丽华贵。埃及和叙利亚的丝织品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十字军和西方富豪都以此作为圣骨的敛衣。印着常见花卉的瓷砖,从波斯传入大马士革,被用作建筑物的装饰,加釉玻璃和玻璃装金的技艺在叙利亚和利凡特的一些城市中达到十分完美的地步。

阿拉伯世界光荣地担起了东西方文明接触的桥梁作用。自1097年开始,几乎川流不息的欧洲基督教十字军运动绵延了两个世纪。战争增强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十字军在叙利亚平原上发展了他们的骑士制度,使用弩和骑士、战马都备铠甲,学会使用火器,除喇叭、号角外,军乐中增添了小鼓和铜鼓,并且效法当地马上比武的庆祝方式,采用穆斯林骑士的纹章。阿拉伯人的香水、胡椒、糖果、蔗糖都通过十字军进入了欧洲人的家庭和药方。欧洲在十二世纪出现慈惠院和麻风病医院,也受到穆斯林东方的推动。斜纹五色丝缎(atlas)、锦缎、天鹅绒、细洋布、毛毯、挂毡,都深受欧洲人青睐。同时,意大利和诺曼底的军事石工技术,造就了开罗城堡和其他阿拉伯要塞、基督教教堂的建筑式样。

西班牙安达卢西的穆斯林在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发动了把阿拉

伯学术介绍给欧洲人的运动,非洲人君士坦丁(1087年卒)、克利曼纳人贾拉尔(1187年卒)和西西里的犹太人法拉吉·本·沙林,通过翻译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最后融汇到一起。许多阿拉伯术语进入了欧洲的各种语言。托莱多在1135—1284年办起的翻译学校培养了成批精通阿拉伯语和拉丁语的人才,使该地跃居世界文化转折期中的一个翻译中心、欧洲向伊斯兰世界吸取先进文化信息的窗口。

地跨欧亚的拜占庭创造的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结晶。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拜占庭作为帝国首都,改名君士坦丁堡。强有力的小亚细亚文化和罗马文化使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独放异彩。拜占庭在宗教上以希腊教(东正教)为国教,承认君权高于教会,这就最终促成了东西罗马的完全分离。在长达十一个世纪中,拜占庭在亚洲抵挡着穆斯林的进攻,在巴尔干半岛则和斯拉夫人相周旋。十三世纪后,拜占庭西境遭到来自意大利半岛的侵袭,东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攻击。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最后灭亡。土耳其人在这里建都,改称伊斯坦布尔。伊斯兰教徒奥斯曼人成了拜占庭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致使它的东方色彩更加浓烈了。

奥斯曼帝国不但拥有拜占庭帝国的遗产,而且在火炮、滑膛枪的装备下,1517年占领了开罗,结束了马木鲁克朝。接着又统治了伊拉克、希贾兹、也门和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在十六世纪中叶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时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阿拉伯国家成了它的行省,一直维持到1922年。土耳其苏丹身兼哈里发,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多民族国家。有许多土耳其人开始用阿拉伯语写作。哈只·赫勒法(1658年卒)所著七册《书名释疑》,被认作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专著。

西方文化对地中海东部世界的冲击,在十八世纪展开了它的序

幕。法国人、英国人相继进入叙利亚,阿勒颇成为君士坦丁堡到印度陆上贸易的重镇。时刻得与欧洲社会打交道的奥斯曼土耳其,开始派遣学生到欧洲留学。拿破仑对埃及的侵略,使西方文化得以驻足于尼罗河畔。拿破仑带往尼罗河谷的第一部印刷机,后来扩充成著名的培拉格印刷局,至今仍是政府印刷机关。参加过反拿破仑战争的上土耳其军人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7年),在1805年当上了帕夏,开始了阿里王朝一个世纪的统治。他认识到西方文化对埃及现代化的重要,埃及军队的改组、埃及海军的建立,完全得益于法国军官的训练。工科学校、医科学校也由法国人任教、任医。从1813年起,埃及学生被派往意、法、英、奥等国留学。法语在埃及学校课程中占有优越地位。埃及现代化的进程是曲折的,阿里的继承者曾相继辞退外国顾问,关闭一切外国学校。伊司马仪(1863—1879年)虽曾聘请美国军官到军事学校任教,并在埃及首创女子学校,但这些学校未曾长期生存下去。只有1865年在阿西尤特创办的美国学院,得到了长期的生存。

在叙利亚贝鲁特,1835年美国传道会办起了印刷所,1853年又建立了耶稣会的天主教印刷厂,直到现在两处印刷所都是西亚有名的阿拉伯语印刷厂。美国教会在1866年开办叙利亚的新教学院,后来改名贝鲁特美国大学。1874年贝鲁特又建成耶稣会办的圣约翰大学。这两所大学,在西亚的高等教育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在阿拉伯各国中,黎巴嫩所以能成为文化最普及的国家,主要仰赖外国学校和私立学校,直至现在,高等教育还是由美国学校和法国学校承办。犹太教、基督教和希腊罗马文化遗产,是欧美文明和近东文明在新形势下促使双方相互接近的共同基础。

阿拉伯文化继承、发扬了东西方古典文明,在催发欧洲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上,又起到了传递接力棒的作用,带动了西欧的进步。但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还得要在席卷全球的西方文化

的洪波和民族危机的浪潮中,去作出新的抉择,以改造自身的社会。

第二节 中国和西亚、非洲文化交流综述

一、八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和西亚、非洲

西亚的古文明和肥沃乐土,是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民族最早与闻的一处文化源,它曾长期在华夏民族中激起追求、探索的火花,同时也引发了中国人最早去开拓远在葱岭东麓的农耕文化。

古代传说将中国移民进入帕米尔高原的时代置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族祖先古公亶父(周武王的曾祖父)将嬖臣长季綽封在春山(葱岭)东侧,在这里建立起周族移民国家。后来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成书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便有一个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姬姓、食谷,从事农耕的西周之国,还有一个轩辕之国。轩辕之国,据晚出的《山海经·海外西经》说,位于穷山(葱岭)之际,在女子国(克什米尔境内苏伐刺拏瞿坦罗)的北面,在那里筑有颇具亚述、巴比伦坛塔风格的方丘,称作轩辕之丘。在古波斯的开国传说中,波斯的早期君主都曾活动在地盘广及中亚阿姆河和新疆天山南麓的吐兰国境,和当地的吐火罗人通婚。十世纪的波斯诗人费尔杜西根据古史创作的史诗《帝王纪》(一称《王书》),叙述季夏(Jamshid)曾在中、印边境游牧,娶了马秦(Machin)国王马王(mahang)的女儿为妻,“马王”意思是“大王”,指古公亶父或他的后裔。在竭盘陀(塔什库尔干)的开国传说中,波斯国王因娶中国公主自于阗归国,途遇战争,将公主留在该地。中国公主因感怀日神而得子,就地立国。竭盘陀君主具有通神的本领,能飞行虚空、控驭风云,因父是日天之种,母是汉土之人,其后裔便自称汉日天种,构成了华人与波斯人共同建国的历史传说。就时间而论,比

之阿育王后裔和来自东国之民共同建国于阆,还要早上几百年,至少可以上推到公元前五至六世纪,而且当地居民业已信奉琐罗阿斯德教中对太阳神弥罗(mithra)的崇拜了。

自西周至战国,中国接受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草原的骑马文化。《诗·大雅·緜》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宋人程大昌解释走马是单骑,不同于以马曳车。春秋中叶,晋、秦相继组建骑兵,但骑兵尚未作为一支能在战争中单独发挥作用的兵种。到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首先发动大规模组建骑兵,改穿胡服习骑射,于是骑兵便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胜负的作用。对中国来说,骑马文化虽然间接传自草原民族,但源头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至于类似波斯骑兵所披铁质鱼鳞甲片的推广,在黄河中游,至少已在公元前二世纪了。当时为霍去病送葬时使用的玄甲军,是装备铁铠的骑士,仅用于十分隆重的仪式中。

最早传扬中国于四邻国家的,是中国独步世界的丝绢。西周时代,已有许多精通天文和纺织、矿冶的工匠流入四邻民族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提花的文绮、纨素、绛罗和锦绣已通行全国,进入新疆,甚至远销希腊、德国。波斯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至少已有中国的丝绢,米地亚式的上衣以宽大著称,都以中国的丝绢裁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年)和色诺芬(前430—前354年)都说波斯人喜爱这种式样的衣服,而这种衣料,据普罗科庇的解释,正是后来被希腊人叫做赛里(Serie)和赛里斯(Seres)的丝织物。大流士(前521—前485年)建立的波斯帝国,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年)统治的亚历山大帝国,地跨亚、欧、非三大洲,将交通和信息的传递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催发了丝绢西运和中国的声名远扬。

世界上最早提到中国这个国家的是伊朗。公元前五世纪出现在费尔瓦丁神颂辞中的支尼(C̄ini),这个名称和古波斯文对中国的称呼 C̄in, C̄inistan, C̄inastān 都是一致的,过去许多学者,都按照天主

教来华传教士卫匡国的解释,以为是“秦”国的对音,以秦人泛称华人。然而它的具体位置却在葱岭的东侧,是中国移民的定居地。换句话说,应该是西周初年季绰率领周民向西迁居的地方,同时又是和伊朗进行交易的一个枢纽或前哨。从费尔杜西《帝王纪》中吐兰国王将女儿下嫁波斯王子肖伍希的故事得知,支尼国与和阗曾作为吐兰王女的陪奩转赠波斯王子,肖伍希夫妇从此定居和阗东北宫城,时间在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王居鲁士登位之前。支尼处于和阗以西的莎车或塔什库尔干、叶城一带。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也用了同样的名称支尼来称呼这里的居民,这使波斯古文献中支尼国所在的具体位置更加确定无疑。

从葱岭东侧的西周之国、轩辕之国,到支尼国,经过了好几个世纪。黄河中下游在春秋、战国之际政治形势的动荡,像波澜一样,推动着中国西北草原民族为沟通里海和河套地区的文化交流起着传媒的作用。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将疆土拓展到燕山山脉和河套以东,对开拓北方交通线不遗余力,东方产丝国齐国的威名从此远扬西方。到大流士统一亚洲西部,对中国丝织品的需求有增无已,而在齐、晋和波斯之间贸迁有无的中枢,则是葱岭东麓的支尼国。齐以文绮之国而名闻天下,《管子》已载齐国丝绸运销禹氏(月氏),和欧亚草原的牧民频频交易,因而中国丝绸得以远销波斯。有关双方的国情知识得以交流,中国也就有了各种关于西方国家的传闻。《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沃民国,是最早留下的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信息。这对于在公元前四至五世纪在齐国的官学里讲授地理学,拓展人们的域外知识,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材料。有关地球观念的大九州学说的提出,所以最早在东方的齐国产生,也和产丝国齐国操纵与主导着越过河套与塔里木盆地周边国家进行的丝绸、玉石交易,传递了东方文明古国的信息难以分离。按照大九州观念,世界在黄河、长江地区的九个州之外,四周都由海洋围绕,其外,按几何级数展开的世界,还有九个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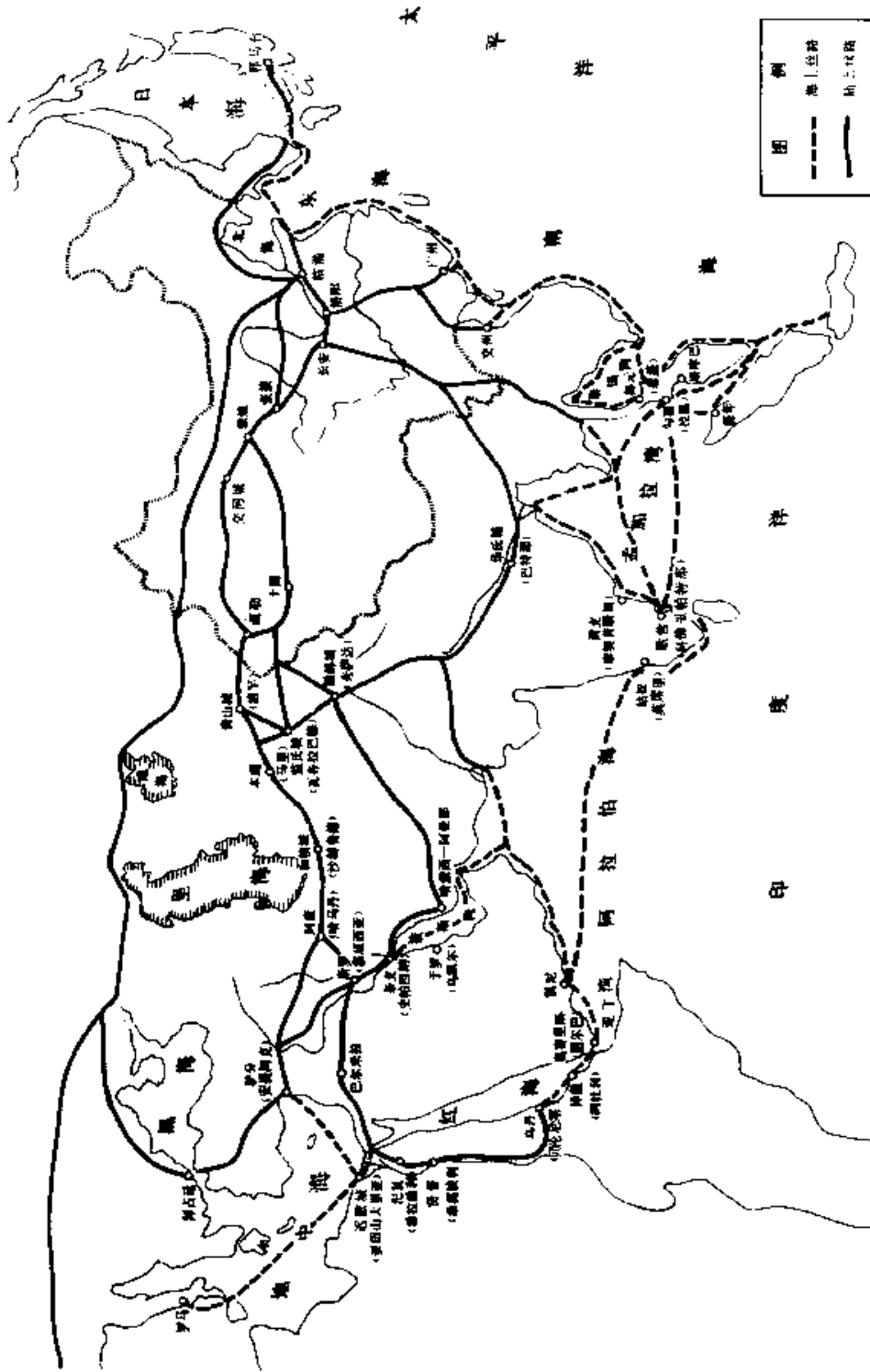


图1 公元三世纪中国和西亚、地中海世界丝路图

州那样的广阔境域。这种将中国与世界的地理关系按九的倍数展开的设想,在战国时期,是建立在亚洲东部与西部地区已经有了实际交往的事实上而设计、推测与假想出来的一种观念。在这种科学与虚构参半的世界观念中,东方的齐国与西方的沃民国组成了最早的地理概念,作为东西两极出现在人们的思想与脑海中,实非出于偶然。

在以后的三个世纪中,直到公元前 127 年,张骞实地考察西域,从大夏(阿富汗)归国,他所能与闻的西极之国,仍是那个《山海经》中的美索不达米亚,当时被称为安息国的帕提亚王国。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是西域最大国的安息(前 248—226 年),在汉代,向中国输送着从军事技术、砖拱建筑技术、日用器皿,乃至军乐、宫廷音乐、棉毛织物、室内陈设和日神崇拜的宗教信仰。继安息之后崛起的萨珊王朝(226—651 年),更以它的甲骑具装的骑兵战术、金属冶铸、玻璃与制陶、金银宝石镶嵌与美术,连同胡天信仰、丧葬习俗、文化娱乐和园艺,在长时期中维护着与中国的联系。在八世纪中叶以前,伊朗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汲取养分的外来文化之一。

古代自东至西贯通亚洲北部的大动脉,可以用“丝绸之路”这个现已被人们习用的概念来表述。最早的丝绸之路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五世纪波斯阿赫曼尼德朝大流士以首都苏萨为中心,广建驿路;东方的齐国自首都临淄起始,通过河北西部的中山国,跨越河套,与葱岭东侧的塔什库尔干取得联系,和美索不达米亚初通信息。到东汉时代(25—220 年),丝绸之路已向西延伸到埃及的海港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东汉首都洛阳作为丝路的起点,繁华昌盛,名声远扬罗马。在地中海东部,丝绸之路又通过伊斯肯德仑湾旁的安提阿克城,转向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在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330 年)以后,由于中国和拜占庭的互通使节,丝绸之路又在君士坦丁堡找到了它在亚欧大陆边境的另一个终点。

丝路起自东海之滨,西抵地中海东部,约略可以葱岭、美索不达米亚为界,分成东、中、西三段。

丝路东段,自东海至葱岭。公元前五世纪,齐国和晋国仅能控制黄河中、下流,河套以西全是戎、狄和塞人、月氏人、吐火罗人游牧的区域。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发动征伐中山国的战争,逐步向阴山山脉拓展国土,到公元前299年左右,击败林胡、楼烦,沿阴山修筑长城,直至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北狼山的石兰计山口),操纵了东海至葱岭的丝路东段。西段自河套以西至葱岭,由于匈奴的崛起,直到汉武帝(前140—前87年)征讨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才完成政治上控制与交通线的开辟。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成立,更加稳定了这一局面。此后,鲜卑、铁勒、柔然、突厥相继兴替,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东端成了中原王朝的最后边界,直到640年唐朝才重新占有天山南北的境域。

丝路中段,自葱岭西至美索不达米亚,在阿赫曼尼德朝时被波斯所垄断。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政治形势为之一变,塞人、大月氏人相继由天山南下,公元前140年大月氏人南迁阿姆河,到贵霜翎侯丘就却(15—65年)时,在北起锡尔河南至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建立大月氏贵霜王朝,直到五世纪亡于嚧哒。木鹿(今马里)和巴尔克(今瓦齐拉巴德)以东的丝路,被大月氏统治了六个世纪之久。木鹿以西,长期在波斯人掌握之中,先有安息(帕提亚)崛起于前,后有萨珊波斯代兴于后。这段丝路具有咽喉性质。自木鹿西通安息国都赫康托姆非勒斯,西南折向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塞琉西亚,向西北可通地中海东岸的安提阿克城。向西经过巴尔米拉进入叙利亚,越西奈半岛最后指向尼罗河下游的亚历山大里亚。自泰西封沿幼发拉底河南下,可通波斯湾头的条支(安提阿克城),它的阿拉伯名称叫史帕西纳——喀拉塞;由此沿巴林海岸到达卡塔尔西部乌凯尔附近,古代海萨海岸的朱尔哈,《后汉书》称其为于罗国,说是安息西界,从那里取海路,可以

绕越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亚历山大省(埃及)。波斯为垄断丝路东西方贸易,自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势力侵入叙利亚以后,与罗马争战三个多世纪,直到四世纪中叶才告平息。这时波斯又遇到崛起于东部的敌人哒哒和突厥。中国和罗马在一世纪时都曾打算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但因波斯的阻挠而失败。公元97年甘英出使罗马,由于走错了路,到了波斯湾头的朱尔哈,只好中止了他继续西行的计划,败兴而归。公元二世纪,罗马皇帝图拉真远征波斯湾头,也未达到长久占领并由此与中国相通的目的。波斯凭借它优势的地理位置,操纵中国丝绸贸易,乘机建立了本国的丝织工业。中国的丝漆和钢铁、白铜都在波斯享有盛誉。

丝路西段,自幼发拉底河渡口到地中海滨。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这里是塞琉古王国的属境,到罗马崛起,地中海沿海全为罗马所占,地中海成了罗马海。从幼发拉底河的尼斯福勒(今腊卡)或阿巴米亚渡口(今比雷季克),各有大道经过巴尔米拉和阿勒颇高原,分南北两支,将中国货物运到地中海东岸的安提阿克和利凡特沿岸的贝鲁特、西顿、提尔,从那里再转入小亚细亚或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史家佛罗勒斯在《史记》中,称颂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7年即位时,远到赛里斯国(中国)和印度都派使者来朝。印度使者当时取道安提阿克渡海,中国使者大约也取这条最近的路。这些中国使者都是些蓝眼睛红胡髯的民族,他们是从伊犁河南下的塞人,大约来自塔什库尔干及其附近地区。丝路西段路程也可以从公元二世纪喀拉塞人伊西陀的《帕提亚道程志》中见到。伊西陀自东而西加以记述,自巴克特里亚到安息国都后,西出里海关,经底格里斯河上游的爱克巴坦那、安蒂米达、塞琉西,前往安提阿克的,可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至尼斯福勒,或经柴格马渡口越河西行;从柴格马向南的道路则通往大马士革和腓尼基(利凡特)各城。罗马帝国长期仰赖中国缣素,取得织丝原料,为了摆脱波斯的阻挠,不得不取道红海,经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希米雅尔

人,从大月氏贵霜王朝和南印度海路转运中国丝货,于是罗马的希腊航海家又把“支尼”这个名称用之于南中国,称之为 Thin, Thinae。到这时,“赛里斯”或“支尼”这个名称才逐渐由最初局限于葱岭以东的山国,扩大到指称整个中国,那时至少已在公元一世纪了。^① (图 1)

支那(“支尼”)名称的由来,始终和丝货的运销、丝路的延伸息息相关;它的地域内涵也由当初局限于新疆西部的山国而引申为整个产丝国中国的国名。这一段历史概括了西亚、非洲与中国交往过程中极富启迪意义的丝绸文化对世界文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北魏(386—534年)建国,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五至六世纪中,使节所至国家,广及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各地,各国使团纷纷来华。到突厥称雄北方、拜占庭与突厥联手开展北方欧亚草原的丝绸贸易,丝路在黑海、地中海、红海三个方向和西亚、非洲取得了联系。隋代裴矩《西域图记》序言中,概括了以敦煌为起点的交通线,分别由北、中、南三道通往西海,西海是中国对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波斯湾等围绕亚洲大陆西部海域的总称。

北道:自伊吾(哈密)通过蒲类海(巴里坤)、吉木萨尔、石河子,到突厥可汗庭弓月城(伊宁东北大小金城遗址),再渡伊犁河越中亚细亚草原,经高加索抵达黑海、地中海之滨的拜占庭。568年拜占庭使者柴马克到白山可汗庭进谒突厥室点密可汗,正是走的这一条路。

中道:自高昌(吐鲁番)、龟兹(库车)出葱岭,经钹汗(费尔干纳)、康国(撒马尔罕)、安国(布哈拉),到波斯,最后通往西海(地中海)。

南道:自鄯善(若羌)、于阗(和阗)、羯盘陀(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取道护密(阿富汗瓦罕谷),经阿姆河以南的挹怛(昆都士)、帆延(巴

^① 一世纪初罗马史家波旁尼·梅拉《地方志》中说,赛里斯人居住在塔比斯山和托罗斯山之间。塔比斯山似指天山,托罗斯山则是兴都库什山和昆仑山的泛称。普林尼(VI,54)也说赛里斯人住在塔比斯山地区。这是对赛里斯具体方位的最早记录。见戈岱司:《希腊、拉丁文献中的远东》,巴黎,1910年版,第13—14页。

米安)到北婆罗门(北印度),抵达印度河口,越阿拉伯海,进入红海,和非洲各国相通。

自唐帝国兴建,疆域向西北、西南大为拓展,西亚则有哈里发帝国的崛起,与唐朝东西辉映,经四哈里发(632—661年)、伍麦叶朝(661—750年),中国和西亚、非洲的联系在新的形势下有增无已。但要到阿拔斯朝建立以后,中国和亚非大陆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八世纪中叶后的中国和西亚、非洲

750年兴起的阿拉伯阿拔斯朝,展开了伊斯兰历史上最驰名和最长久的朝代。尽管西班牙、北非、阿曼、信德和呼罗珊,都不愿完全承认新的哈里发,埃及也只是在名义上尊重哈里发,而在事实上并不俯首听命,哈里发作为宗教领袖的威望大为下降,但帝国的统治仍在艾卜勒·阿拔斯(750—754年)的子孙世袭之下继续下去,直到1258年为止。758年,曼苏尔(754—775年)从哈希米叶城为新都巴格达奠定基础。他当初作出这个决策时,首先想到的是这里是一个优良的驻地,“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可以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它周围的粮食,运来供应我们”。唐朝在751年发生在中亚的怛逻斯战役之后,决定放弃这块地方,752年(天宝十一载)十二月,阿拔斯朝的使者谢多诃密(Said Emir)到达长安,唐朝特授以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的勋位,开始展开频繁的使节往来。

历代哈里发在巴格达建立了萨珊朝库斯老式的集权政府,波斯影响不断增大,除了伊斯兰教仍是国教,阿拉伯语还是国语,其他的一切都己波斯化了。这正是阿拔斯人自夸新政权为“新纪元”的时代,也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友好交往的“新纪元”,是中国

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海上贸易空前发达和繁荣的时期。

自九世纪开始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进行了频繁的交流。特别是海上贸易,从九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叶,始终处于持续增长时期。中国帆船以大量运销瓷器和丝绸,输出金、银、铅、锡、铜钱和各种日用品,组织了印度洋地区的区间贸易,投入了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西部地区的远洋航业,使中国的海外贸易、帆船运输业十分兴旺和显得生气勃勃。在漫长的六个多世纪中,可以十二世纪为界,分成前后两期。

前期,阿拉伯帆船将它的营运范围从阿拉伯海向东拓展到南海和东海。阿拉伯商船出没于南起越南中部占城,北至长江三角洲扬州的中国东南沿海各港。中国帆船也开辟了从广州启航,经马六甲海峡和斯里兰卡直至波斯湾,并由东非坦桑尼亚的三兰国(桑给巴尔岛翁古贾·库乌)北上阿拉伯香岸席赫尔、卡勒哈特、苏哈尔,到波斯湾头乌波拉港的航线^①,经营象牙、香药、珠宝、玻璃和棉布贸易。这是唐代贞元(785—804年)年间宰相、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所录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的记下了华船通航印度洋的航路。在印度洋西部,沿东非北上阿拉伯半岛的环岛航路,习称三兰航线,三兰航线比阿拉伯的曼苏地在十世纪初所记阿曼——甘巴罗(奔巴岛)航线还早一个多世纪。后来航线虽因政治动乱有所收缩,但从十一世纪下半叶起,中国贸易商不但在苏门答腊建立了牢固的商站,而且也在马尔代夫群岛、东非沿海的曼达岛和桑给巴尔岛设立了新的贸易站,那时被阿拉伯人称为桑奈建群岛(黑人群岛)的许多岛屿,东起爪哇、苏门答腊,西至奔巴、桑给巴尔和马达加斯加,都成了中国贸易商努力扩展的市场。

后期,中国帆船于1140年左右的南宋时代,在阿拉伯世界开辟

^①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8—213页。

了航期可以缩短一年的麻离拔航线,致使印度洋航业进入了划时代的新的飞跃。麻离拔是阿拉伯南部香岸马赫拉的古港佐法尔。从广州启航的中国帆船,在东北季风的九、十月出发,经过40天的连续航行,到达苏门答腊西北的亚齐,越冬以后,又在西南季风的三、四月继续航行,经60天的不停顿航行,直赴佐法尔。这样,中国帆船便可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往返一次,因而使航业大有起色,在印度洋开辟了这条长达6000海里的航路,使货运量大大超过了阿拉伯同行。此后一个世纪中,由于埃及艾优卜朝(1171—1250年)向红海两岸和亚丁湾扩张势力,在对抗十字军骑士团的战役中屡建战功,埃及已逐渐替代阿拔斯哈里发成为阿拉伯国家的台柱。因此在1225年赵汝适写作《诸蕃志》时,麻离拔成了大食(阿拉伯)的主要港口,阿拉伯的国都已经不再是伊拉克的巴格达,而是译作蜜徐篱的开罗了。^①

中国帆船的激烈竞争,十三世纪阿拉伯和波斯湾掀起的东非移民热潮,在印度洋航业上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在到达南印度马拉巴海岸(西海岸)的船只中,中国帆船遥遥领先,中国帆船操纵了奎隆和广州(或泉州)之间的海上贸易;阿拉伯帆船至多只能抵达苏门答腊岛。元代,中国帆船已深入东非季风贸易极限的基尔瓦地区,它们能够以马拉巴或苏门答腊为基地,参与基尔瓦——亚丁——马拉巴的三角贸易。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针路、班达里、加里那条,就有通过马尔代夫群岛的摩加迪沙航线,这条经苏门答腊、马尔代夫至索马里南部摩加迪沙的航线,是中国帆船经营的印度洋航路中的北线;另有经过

^① 沈福伟:《十二世纪的中国帆船和印度洋航路》,《历史学》1979年2期;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8—250页。《诸蕃志》中的麻离拔,并非是夏德《诸蕃志译注》中考订的米尔巴特(Mirbat),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页)已将该书勿拔国认作米尔巴特,而以夏德考订为误。不能将米尔巴特一地既译作麻离拔,又认作勿拔。因此麻离拔只能是古港佐法尔。

苏门答腊和查戈斯群岛、塞舌耳群岛附近海域,以肯尼亚沿海位于南纬 $3^{\circ}20'$ 的格迪为终点港的印度洋航路中的南线,因此在中国文献上出现了称为南海回回的国家,南海回回就是格迪港的中国称呼。在中国帆船运销阿拉伯世界的丝绢、瓷器、铜锡以外,更多的是转口贸易物。^①

十四世纪上半叶,中国帆船所到的阿拉伯和非洲港口,北起波斯湾头的巴斯离(今布什尔)、马赫拉的麻阿斯离(佐法尔港)、甘埋里(亚丁),南至东非沿海的班达里(摩加迪沙)、加将门里(基尔瓦·基西瓦尼)。中国海外贸易商汪大渊在1328年到1339年间两次跟随中国商船出海,足迹遍及亚非两洲沿海和岛屿,最远到达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在1349年完稿的《岛夷志略》中,记述他的所见所闻,视野之广,知识之博,足以与同时代的欧洲游历家马可·波罗、非洲游历家伊本·白图泰相并列。他从佛教文化的中国来到伊斯兰世界,是继唐代杜环之后,又一名亲身考察伊斯兰文化的中国人,也是古代到达大西洋边的唯一有名可指的中国人。

蒙古的崛起,将中国文化最西的边界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以东的美索不达米亚。旭烈兀在1258年占领巴格达后,与忽必烈联合,受忽必烈册封统治阿姆河以西直至叙利亚的国土,旭烈兀对忽必烈称伊儿汗(藩属之汗),奠都大不里士。旭烈兀在1265年去世,继位者都继续受元朝册封,视大都(北京)的大汗为上国,使用汉文玉玺以示王权,在梵蒂冈档案中收藏的三件蒙古文书上,已见到使用汉文印玺有“辅国安民之宝”、“王府定国理民之宝”和“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伊儿汗的第七位继任者合赞汗(1295—1304年),虽然不再称伊儿汗,但他仍使用汉文国玺,仿效元朝,对各项政治制度,乃至驿政,进行有效的改革,并且注意吸取中国科学、医学、艺术的成就。在1294

^①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8—370页。

年9月,盖略图汗曾效法元朝发行过纸币,虽因准备不足而迅速失败,但却使伊朗成了世界上仅次于中国发行纸币的国家。合赞汗改奉十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加速了蒙古政权和穆斯林文化的结合。它和欧洲各国的交往,又为中国文化的西传充当了十分重要的传媒,在中世纪晚期世界文化转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添加助溶剂的作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罗经导航技术和印刷术,通过西亚,逐渐成为地中海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东南沿海和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在十三世纪以后的交往,于商业关系之外,由于民族混居、通婚,以及宗教信仰的变化,使文化交流向更深的层次渗透,以致在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泉州地区,出现了许多华化的阿拉伯或穆斯林后裔。元明时代,伊斯兰文化差不多是同时由西北向内地和自东南沿海推进。明初伟大航海家郑和(1371—1433年)自1405年至1433年间七次率领庞大的宝船队开赴印度洋,每次必到印度西海岸的西洋国,明代又称古里国(卡利库特),因此称七下西洋。郑和和他的同僚王景弘所创导的远洋航业,是在元代中国航海界业已取得的卓越成绩之上继续发展的结果。郑和船队又增辟了自苏门答腊西部的苏门答刺港不经斯里兰卡而直赴索马里南部摩加迪沙的航线,这条摩加迪沙航线堪与宋代麻离拔航线相媲美。中国宝船并且深入基尔瓦以南的南非海域,甚至闯过了南非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宝船队的这些航海活动,可称是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前最有创举的航海活动,它将中国文化的西部边界拓展到印度洋西部地区,在造船、航海和玻璃、医药、制瓷等技术领域继续维系着已有悠久传统的切磋和交流。

同一时期,中国通过北京——嘉峪关一线,和撒马尔罕以及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开展的陆上队商贸易,也有长足的进步。1413年,来自中亚哈烈和伊朗失刺思(设拉子)的使节还国,永乐帝朱棣派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伴送,最远抵达设拉子。设拉子是

哈烈王沙鲁赫第二子亦不刺金(1414—1435年)所任法尔斯总督的驻地。使者以玺书、文绮、纱罗、布帛等中国特产馈赠酋长。1416年陈诚两次出使,副使鲁安曾到达亦思弗罕(伊斯法罕),亦思弗罕和它的邻国失刺思亦派使者在1419年向中国进献狮、豹、西马,明朝回赠白金、钞币。1420年,陈诚第二次出使撒马尔罕,迎来了失刺思使者以贡马为名,在1423年抵达宣府行宫进见朱棣,用马匹支援朱棣北征蒙古。中国的彩币、瓷器同样深受对方的厚爱。

1524年(嘉靖三年),设拉子和它邻近三十二部最后一次向北京派使团进行瓷马贸易。同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鲁迷国(Rumi)使团奔赴河西走廊,直到1554年,前后共有五次。这时正当奥斯曼土耳其的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当政,对外扩张臻于顶峰。伊斯坦布尔迄今珍藏的许多名贵青花瓷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种直接贸易被输送到那里的。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之后,中国再一次通过地中海、爱琴海和欧洲有了来往。这一次是建都北京的明帝国,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亚陆梁,和那个地跨欧、亚、非,最后到来的土耳其帝国取得了联系。明朝和麦加的贸易,则一直维系着,直至万历(1573—1619年)年间,称得上是历史上与朝贡、赏赐贸易相始终的一种长途队商贸易。

此后的几个世纪,由于奥斯曼人和波斯人之间不断发生争战,奥斯曼人又面临着英、法和俄、奥的挑战,贯通中国和西亚的陆上贸易,被西方殖民国家所垄断的印度洋海上贸易所替代。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学术上的交流虽然由于经堂教育在内地的推广而有新的起色,但新的文化浪潮已经由西欧向世界各地冲击,中国和西亚、非洲都需要在新的挑战面前去重新作出自己的抉择。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西亚、非洲对逐渐陷入欧洲列强宰割和压迫的中国来说,一变往昔的光辉景象,成了从民族危机中探求新的自强之路的前车之鉴。

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帝国在欧洲列强的觊觎下,加速了它的没落。

非洲在十九世纪末已被列强分割完毕。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结束后,土耳其、埃及、叙利亚继续受到欧洲列强控制,刚从俄国军队的手中挣脱的伊朗又被英军占领。伊拉克成了第一个获得独立的阿拉伯国家。1922年英国被迫承认埃及独立。埃及获得自主权利的初步胜利,也鼓舞了中国人民为摆脱列强的控制继续奋进。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下进行的改革,赢得了中国爱国人士的声援。

三、现代中国和西亚、非洲的经济文化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一起卷入战争的漩涡,使这些地区陷入重重灾难之中,同时也加强了彼此的相互支援。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大举进攻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不顾英、法的绥靖政策和力量的悬殊,领导全国对入侵者进行英勇抗击。中国曾热情声援塞拉西向国际联盟呼吁制裁意大利的侵略行径。1936年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陷落,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已在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中国人民,不仅具有切肤之痛,而且也从国际联盟的袖手旁观中深感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最终击溃侵略者。中国和西亚、非洲所遭受的共同命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了考验,彼此的了解和同情有了更深层的发展。

战后,中国人民的获得解放,激励着西亚、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使该地的政治地图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向西亚、非洲人民伸出无私热情的手,支援了他们的民族解放战争,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构筑更加美好的前景。

从五十年代起,中国和西亚、非洲的许多国家广泛开展民间交往,逐步建立外交关系。1963年12月起,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十

国期间,不仅宣布了中国对非洲和阿拉伯各国关系的五项原则,而且在1964年1月15日加纳首都阿克拉回答加纳通讯社记者提问时,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非洲国家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日益增多。从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率先访问中国,到1991年9月,先后有48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对中国进行了170多次访问。

为了使中国和西亚、非洲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从单向援助进入互利合作,从单纯与官方合作发展到与官方和民间合作,更加有效地促进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政府首脑在1982年底、1983年初访问非洲11国期间,于1983年1月13日在坦桑尼亚宣布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从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对援建项目力求做到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以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根据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和中国同非洲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截止1991年9月底,中国向47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已建项目达到510个。并且采取管理合作、培养当地技术人员等行之有效的方式,以巩固已建成的各种项目,其中也包括早年建成的坦赞铁路在内。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有20%是赠款,80%是长期无息贷款。

中国援建的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花钱少、见效快、生命力强的特点,赢得了非洲国家很高的评价。塞拉利昂前总统史蒂文斯曾一再向前往执行援建项目的专家当面称赞:“中国政府不仅在物资设备上援助非洲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专家向非洲人民传授技术,让非洲人民长期受益。中国的援助是永世长存的援助。”

第二章 中国和伊朗文化交流 (上)

在很长时期中,横贯亚洲衔接欧亚草原的通路在鄂毕河上游和阿尔泰山地区折而向西,亚洲的西部和亚洲的东部被帕米尔高原切割成两个几乎不相连续的部分。

中国和伊朗,对彼此来说,都还是个未知之地。黄河中下游的古文明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的联系,经受了漫长蹉跎的岁月。

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山海经》中的沃民国、白民国,对这片肥沃的西方乐土展示了最初带有神秘色彩的图景。随后,伊朗移民和中国的移民便在葱岭东侧的古绮国(塔什库尔干)共同开拓新地。

中国丝绢、绫绮的西运,使古绮国的名声通过伊朗传扬四方。双方在二千多年中先后出现了文化交流的三次高潮:汉代的安息文化,北朝和隋唐的萨珊文化,以及元代中国和伊儿汗国之间的文化渗透和融洽。双方在这种交流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直到十七世纪为止,伊朗和印度,始终是中国的重要文化伙伴。

第一节 巴比伦、古波斯与中华文明

一、彩陶文化和骑马文化

近代欧洲考古学家在发掘了巴比伦的彩陶文化以后,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希腊北部乞洛尼亚、多瑙河下游的科科特尼、东欧的格拉齐亚、乌克兰的特里波利等遗址中见到了类似的彩陶。当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初次取得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量石器、骨器和粗陶、彩陶以后,发掘者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on)匆匆地将遗址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500年,认为:“巴比伦在公元前3500年已经有了彩陶,中国彩陶比它晚得多,因此一定是从西方传来,而不是由东方传。”^①

仰韶出土的许多红黑相间的彩绘陶器和螺旋纹、三角纹、几何纹等多种图案,在外观上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彩陶的相似,使得安特生的论点得到发掘波斯古都苏萨的法国特·摩根、发现中亚安诺遗址的美国庞拜莱的支持。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在伊朗东部锡斯坦取得的陶器,曾被认为与仰韶彩陶最为相似。但随后,安特生在甘肃、青海对彩陶文化的继续发现,却越来越显出他的彩陶文化通过新疆南北部山间谷道东传的理论,具有难以弥补的年代序列上的缺陷。1924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已坦率地指出了这一点。

此后,仰韶文化及其各个分支文化的研究,显示河南彩陶文化是一个向四方辐射的源头,它的年代在公元前4500年。陕西省西安半

^① [瑞典]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地质汇报》1923年第5号第1册。

坡村,是一处业经保护起来供人参观的良好的仰韶文化遗址,它的年代经碳-14测定,是公元前 4115 ± 110 年—公元前 3635 ± 105 年,比之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霍布生(Hobson)鉴定的伊朗东部锡斯坦的彩陶属公元前2500—前2000年,要早上一二千年。中国河南彩陶和伊朗彩陶在宏观上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仍被西方人士认为双方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英国的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认为:“中国中部仰韶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与公元前4000年后期伊朗中部达坂·锡亚尔克所使用的陶器非常相似,双方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仰韶彩陶正是从伊朗高原传播出来的陶器装饰传统所能达到的东部极限。”^①

伊朗北部也曾见到中国所独有的鼎、鬲类三足陶器,但相似之处十分微弱。这应是人类创造过程中,对思维中曾经闪耀过数理火花的一种记录。这种记录,显示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种族的人在思维活动中出现的共性。就像苏美尔人发明一年十二个月的太阴历,也未曾对远方的中国人制订同样的历法有过什么启示一样。

瑞典学者阿尔纳(Arne)赞同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以为仰韶村与秦王寨的彩陶,论胎质之薄,只有苏萨Ⅰ期彩陶约略可比,论陶器的成分,氧化铁含量高达20%,与安诺Ⅱ期陶器相似,论纹饰,与苏萨Ⅰ、Ⅱ期类同,尤其和塔克·缪辛酷肖^②。阿尔纳还特意提出了一种南方印度——日尔曼民族自西方迁入中国华北地区的理论。伴随着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由仰韶彩陶文化及以后陆续在中国北方所发现的彩陶文化引起的对中华远古文化的探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学术界曾引起很大的争论,使得十九世纪末英国的特林·德·拉科帕里的巴克族移民说和巴尔的苏美尔人东迁说,一时大有

^① 《剑桥伊朗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第3卷第4章《伊朗与中国》。

^② 阿尔纳:《河南石器时代之著色陶器》,《古生物志》丁种第1号第2册。

再度复活之势。拉科帕里在 1894 年发表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论》(The Western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系统地发挥了他关于中国古史是两河流域古史翻版的主张。他的立论根据是,中国古代所称的“百姓”(人民)就是巴比伦的巴克族。百姓即“巴克”(Bak)的音译。炎帝神农氏是巴比伦古史上的萨贡(Sargoön),黄帝有熊氏,有熊译自苏撒王纳恭达(Kudur-Nakhunte)。此说一出,在当时竟成了对中国古史茫无所知的西方学术界十分流行的时髦学说。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写作《中国文明发达史》(1899 年)也起而接踵,将中国文明的源头嫁接于巴比伦的移民。就在这 1899 年,商代的甲骨文开始再现于人世,说者又起而附会它起源于西亚的闪语,主张闪米特文字是巴比伦、埃及、雅利安、希伯来、阿拉伯等东方文字的源头,以为鸟、人、山、水等字,甲骨文与闪米特文相似,和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中定作辛店期彩陶花纹中的鸟、人相似。实则甲骨文中的鸟、兽,都呈侧式,两足鸟仅见其一,四足兽只有两足。炎黄后代的中原先民在自己世居的土地上创造与凝结而成的文明,在三四千年前,尚无可能将 6000 公里以外的发达文明加以吸收与仿效。

远古时代在黄渭平原和两河流域各自制作彩陶的民族,即使有过微弱的文化交往,但人种迁徙的事实,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古人类骨骼发现的证实。彩陶文化的发明权是中国的黄渭居民和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的先民各自在特定的环境中独立地进行的一种创造,那些微弱的联系,即使存在过,也一定是发生在它们早已出现许久以后的年代里的事了。

中国和伊朗最初的文化联系,是由那些分布在天山以北、西伯利亚南部和里海东部的部落,以接力赛的方式进行的。直到商文化进入西伯利亚远及伏尔加河上游的塞伊玛地区以后,里海南部的文明世界才逐渐通过中亚细亚的草原牧民,和中国天山地区有了信息往还。公元前 1000 年以后,中亚细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历史变化,推动

着这里的居民奔向大规模豢养马匹,进入骑马文化的新时期。这使中亚细亚逐渐成为沟通亚洲东、西部的桥梁,中国的周文化也跟着骑马文化的信息,将自己的势力伸向原先认为不可企及的遥远的西方。

骑马文化的最早信息来自巴比伦。公元前十七世纪开始不久,巴比伦人就被使用马匹的卡西特人所征服,巴比伦文明因此被毁。但豢养与使用马匹,却逐渐给那片被称为肥沃新月形的土地带来了新文化的曙光,这虽然并非出于当初比之巴比伦人要显得野蛮得多的卡西特人的本意,但它所给予后世的惠益却十分巨大。公元前十二世纪开始在泾渭平原上繁衍起来的姬姓周族,自称是夏禹的后代,以夏人自居,在建立强大的周王朝以前,便已开始使用马匹,向商君“走马来朝”。接着,古公亶父(周武王的曾祖父)又将他的亲信季绰封到了葱岭东侧的塔什库尔干,统治在那里的周族移民。这是中原地区对东进的骑马文化进行的第一次反响。

十世纪波斯诗人费尔杜西写作史诗《帝王纪》(或译《王书》),记述古代波斯传说,苏哈克曾派人追踪季夏,直到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季夏曾娶马秦(Machin)国王马王(Mahang)的女儿为妻。马王意思是“大王”,就是太王古公亶父。这和《穆天子传》中亶父封季绰,又“妻以元女”,正相吻合。此后,葱岭东西商货交易似乎已逐渐定时组织进行。公元前七世纪起,居住在河套以西的戎、狄不断向东移居,来自昆仑山以西的商货和文化信息,由这些游牧民传递着进入黄河中、下游。中亚地区的塞人和河套地区的戎、狄民族是中原地区和西亚进行玉石、毛皮贸易最早的中介商。

二、巴比伦城和悬圃传说

那些曾经到过新巴比伦王国伟大都城巴比伦城的远方来客,将这座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辉煌的景象传扬四方。后来这座城市被

公元前三世纪的战火所毁,化为山丘,十九世纪后半叶才被发掘,使人们重新见到修建在幼发拉底河东西两岸、四方形城周长达 11 英里的古城遗址。曾经建造了富丽的宫殿、悬空花园和巴培大塔的巴比伦文化,也曾传入中国。但在文献中却要晚到公元前二世纪初的《淮南子·墜形训》才留下踪迹。昆仑山在那时仍是跨越葱岭的东西方贸易必经的山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充满着令人神往的仙国的风韵。《淮南子》描述昆仑山的疏圃中有黄水,喝了能叫人不死。从昆仑之丘再向上一倍的路,就是凉风之山,登上之后便可不死。从那里再往上走一倍的路,就到了悬圃。一到那处,便可以使风唤雨,驾驭自然,随心所欲了。从悬圃再往上去一倍的路,便可登天。上天是太帝所居,一到那里,人便成了神仙。这些后来为道教所吸收的西方仙化之境的思想,其实最初是来自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地理知识。从疏圃到悬圃,虽然是以向上登山的方式表现出来,实则是对由此越过昆仑山向西直至伊朗高原展示的登高路程的一种诗意或充满巫术意味的复述。

悬圃传说所凝结的故事,传递了来自巴比伦城的信息。新巴比伦王国在那波帕拉萨尔(前 625—前 605 年)和尼布甲尼撒二世(前 602—前 562 年)时进行了工程浩大的建设。城墙是建有许多城楼的双层建筑,每座城门以巴比伦人崇奉的神祇命名。经过发掘的双层城堡有一座美奂美轮的伊什塔尔门,呈献给母神伊什塔尔。城内宫室邻接,庭院、长廊曲折迂回,有许多仿效亚述古都尼尼微的辛那赫里布的套房。城内高地上有三座供尼布甲尼撒居住的宫殿,其中一座有五个宫。宫殿东北角的悬空花园,因构筑巧妙,被列入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取悦他从米地亚娶来的新王妃阿米蒂斯,在卫城的东北隅修筑了一座别具一格的花园,好为这位来自山国的王妃消除怀恋家乡风光的愁闷。据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狄奥多拉斯和

史特拉波描述,整个花园的建筑呈方形,每边长 120 米,上面修筑了多层阳台式的建筑,每层阳台由砖柱支撑,最高的一层柱子竟达 23 米。各层柱子交叉建造,互不遮挡。上面覆盖巨大的石块,铺上芦草和沥青,再铺两层熟砖,覆以铅板,安上泥土,好种植大树,又不渗漏水分。巧妙的设计师更建造了一根空心柱子,从底层直通顶部,柱中安有唧筒,可以抽吸幼发拉底河的河水,灌溉花园。花园一经建成,便传扬四方。巴比伦城的宫室都用彩色琉璃砖瓦装饰,一派富丽堂皇的豪华气势。宫殿内壁和卫城大门(伊什塔尔大门)的墙面也都用彩色琉璃砖砌成,上有狮子、公牛和蛟龙等象征神灵的动物浮雕,狮子代表阿达德神,蛟龙是巴比伦城主神玛尔杜克神的象征。

巴比伦城中的五十座神庙蔚为壮观,使它具有通神的威力。城中心的玛尔杜克神庙,殿堂星罗棋布,天井中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巴培大塔,座落在 91 米见方的坛座上,这坛座被称作“恩蒂梅那基”,意思是“天堂和人类神庙的起点”。坛座通过三层石梯,建造了高达 90 米的六层大塔。塔顶用蓝色琉璃砖修筑了一座神坛,在阳光下显得光怪陆离,十分神奇,被巴比伦人视作通向天国的圣地。

巴比伦城宏伟神奇的建筑群,特别是悬空花园和巴培大塔,在黄河流域的居民中,衍生而为通往悬圃和帝座的传说。巴比伦文化的成就,在异方远国之人看来,早已超出了这座古城建筑物的实用价值,而赋予人们的精神世界以一种超越现世的神圣与精妙的感觉。因而建筑物虽在后世的战争中荡无所存,而由此升华的那种盼念永久享受美好生活的期望,却久久未能消失,以一种宗教的感染力,在几百年后的西汉时代还在传诵不已。流传在黄渭平原上的悬圃传说并非仿效巴比伦传说中的仙山^①,巴比伦的仙山是亚美尼亚高原的阿拉

^① 苏雪林:《昆仑之谜》。

拉特山,它和昆仑山相去何啻天壤。

三、沃民国和求仙思想的东渐

春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迁徙,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吐火罗人是昆仑山脉东西商货的传递者。中国内地和伊朗之间的各种信息,通过他们而搏动。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吐火罗人是散布在“大泽之长山”附近的白氏之国^①。大泽即罗布泊,长山是天山及其支脉库鲁克山,流布天山附近的白氏,正是由河套西迁的吐火罗人。季绰西封葱岭、季夏流亡中印边境,在中国和伊朗语系各族中留下了最古老的传说。中国和印度的边境正在塔什库尔干。

春秋西周之国是古公亶父所封由季绰统领的华夏国家,在疏勒附近。轩辕之国的所在,在比《山海经·大荒经》晚出的《海外西经》中说得很具体:“轩辕之国在穷山(葱岭)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苏伐刺拏瞿咀罗)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

《海外西经》没有西周之国,但对轩辕国的方位考察周详,说它位于穷山之侧,女子国之北。在它的北面还有一座足以抵御附近操持弓箭的游牧民的土堡——轩辕之丘。这就明确了帕米尔高原东侧的华夏族居地在塔什库尔干。塔什库尔干位于慕士塔格山岭西南,城北有叶尔羌河东流,作为一处聚居地,正当江、山之南,属一片可供农耕的平地。这里就是公元二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雷美《地理志》中,中西交通大道必经的石塔。现在塔什库尔干以北十多公里有石方堡,大约相

^① 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据宋本、藏经本、毛校本、吴任臣本、汪绂本改作“白民”。此白氏可能即龟兹白氏的祖先,当是吐火罗人。散居葱岭东西的吐火罗人,商周以来曾向东拓展,深入河套,但在春秋时代受到齐国的抵制而向西撤退。

当于古时的轩辕之丘。塔什库尔干以南,习称塞勒库勒(Sarikul)平原,向南延伸到明铁盖山口西南克什米尔边境的坎巨提。《海外西经》中轩辕之国所在的穷山,正是《穆天子传》中的春山。《穆天子传》中穆王到过的昆仑之丘,实是《山海经》中的轩辕之丘。轩辕国以南的女子国,十分明白,正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女国(Strirajya),《新唐书》中位于拉达克以东出产黄金的苏伐刺拏瞿坦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是轩辕国的族徽。新疆境内中古墓葬中出土许多伏羲、女娲以蛇身交尾图像,此风大约由来已久,是西迁的华夏族对祖先的崇拜和寻根意识。

中华文明在公元前六世纪植根轩辕之国,和伊朗语系各族杂处,为东海之滨的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古国间沟筑了通渠,开辟了坦途。由此西去,便登上帕米尔高原通往阿富汗的瓦罕山谷之路;由此而南,出明铁盖山口,便进入克什米尔的罕萨河谷,指向印度。然而轩辕国并非当初中国人所知的最西之处。《山海经·大荒西经》着意刻划的,是一个叫沃民国的地方:

有西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民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甘栝、白柳、视肉、三骊、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

西王母之山,在祁连山西。壑山在《大荒西经》另有叙述:“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门之山,有人名曰黄姬之尸。”和西王母之山连称的壑山,当非和巫山连称的系列山脉中同名的一山。而海山在《山海经》中,则仅此一见。

晚出的《海外西经》将沃民国称作诸沃之野,排在有四蛇相绕的轩辕之丘以北。经文说:

诸沃之野,沃民是处。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

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

沃民国在西王母山往西很远的地方。《大荒西经》中有西王母，而无西王母之山的描述。晚出的《海外西经》应看作是对《大荒西经》的阐释，但亦无西王母之山。倒是在《海内西经》中，在“海内昆仑之虚”以后，出现了西王母。郭璞注《山海经》，很自然的由这个“海内昆仑之虚”联想到一定还有“海外昆仑之虚”，因此《大荒西经》中的西王母山，实属广义的昆仑山脉。在昆仑山脉以西的壑山，当是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脉的别一译名。Kuh 是波斯语中的山，译成壑山。兴都库什山脉沿帕米尔西向蜿蜒 1200 多公里，贯穿阿富汗全境。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伊朗高原，在锡斯坦哈蒙湖上有科·伊·胡瓦贾(Kuh-i-Khwaja)神山。伊朗传说中光明山落入海中，升起一神，胡瓦贾即是此神，故有海山之说。在海山以西，诸沃之野的沃民国，只能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了。那里农牧俱兴，百货荟萃，是少有的沃野。当地居民食用的风鸟卵是鸵鸟蛋，很容易使人想起汉代大书特书的安息大鸟卵。沃民国人饮用的甘露，是各种含有甘露蜜醇可充饮料的植物，含有天赐饮食的意思。地中海东岸的甘露树(*Fraxinus ornus*)和波斯的骆驼刺，素负盛名，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人已有幸与闻。后代中国文献对伊朗甘露也有称述，明代称作达郎古宾(*tar-angubin*)，便从波斯语音译(图 2)。

沃民国所产甘华、甘祖，在帕拉维语古经《创世纪》中列举香花经人工栽培的有，玫瑰、水仙、茉莉、野蔷薇、郁金香、柯罗辛、露儿树、牛眼菊、番红花、毛茛、紫罗兰等；甘果(*mivak*)有枣、桃金娘、葡萄、榲桲、苹果、香橼、石榴、桃、无花果、胡桃、杏仁。畜牧产品有，视肉(肉类)、三骀(良种马)。奇石有璇瑰(红肉髓)、瑶碧(青金石、绿松石)、琅玕(绿柱石)，以及白柳、白木、白丹、青丹。

沃民国的一个特征是，“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鸟形人和大鸟的图像是乌拉尔图和亚述的民族标记，在公元前八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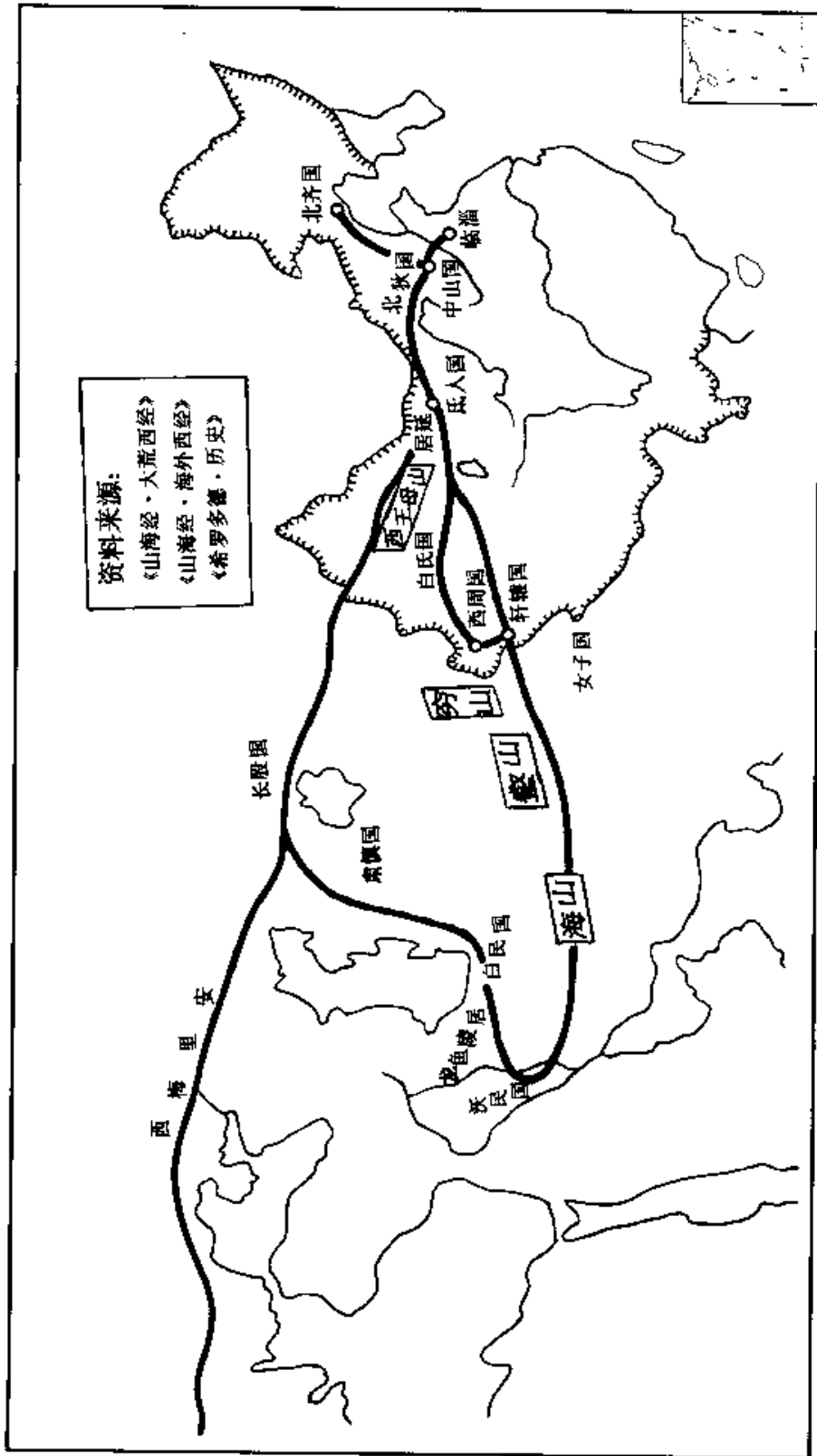


图2 公元前五世纪的丝路

即已出现。刻有乌拉尔图楔形文字的碑铭上早有这类图像。公元前650年的鸟形有翼人也见于尼姆罗特遗址。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见于古老的《山海经·海内经》,已有鸟民国,是个“有人焉鸟首”的地方,位于中国西部,是塞人的一支。塞人艺术在新疆的阿勒泰鹿石、巩乃斯河谷早有波斯式样的对兽铜环、承兽铜盘。天山阿拉沟出土承兽铜盘上的野兽,具有双翼,同样富有西亚色彩,早在阿赫曼尼德朝业已流行。鸟民国可能是中国内地对新疆西部以翼兽艺术为标志的塞人的一种早期称谓。这个氏族的徽记和亚述有共同之处。后来人首鸟身的图像又出现在汉代。西汉昭、宣之间(前86—前49年)的洛阳卜千秋墓,墓门内上额壁画就是人首鸟身像,象征着死者灵魂的超升^①。江苏沛县栖山墓中出土东汉初期画像石,在西王母旁更有鸟首人身、人首蛇身、人首马身的图像,明显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精灵崇拜图像艺术的启示,所传递的是一种来自西亚的新文化。

亚述艺术中的神灵,在新巴比伦雕刻中转成人和动物复合图像的侧面浮雕,后来经过波斯人的传递,进入中国北方。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联合米地人推翻了统治当地的亚述帝国,重建巴比伦,开创新巴比伦文化。亚述艺术中人首有翼兽的神秘精灵,也成了祈求仙化的迦勒底人的文化财富,接着又被新兴的波斯帝国所接受。波斯帝国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向东方的扩展,在欧亚大陆的草原民族中引起的振波,推动着这种艺术逐渐进入中国内地。

带翼人像最早出现在苏美尔艺术中,在尼姆鲁德的亚述王那西尔帕二世(前883—前859年)王宫门前便有伸展四翼(二翼向上,二翼向下)的神人浮雕,后来又在波斯阿赫曼尼德朝的居鲁士(前559—前530年)在帕萨加迪兴建的宫廷墙壁浮雕残垣上再度出现。生有上下伸展的四翼人像,头戴仙冠,四翼形象几乎与亚述王宫门前浮雕

^①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如出一辙。汉代重现在黄河中下游的这类翼兽和人兽复合图像,一定有一个较早的起源,可能早到公元前六世纪末的春秋晚期,便已在盛产丝绢的东方大国齐国落脚。作为这种艺术传导媒介的,则是介于齐、晋之间,在战国时期与齐、赵相邻的中山国。在河北省西部太行山区立国的鲜虞,公元前492年改名中山,是来自套内的白狄所立。座落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陵曾出土错银有翼铜神兽二,错金银神兽二,以及错金银背驮兽面单鬃犀等动物铸件^①,是这种由西而东传递的翼兽艺术在亚洲东部的余波。所谓神兽,就是西亚所产的狮。这种艺术所表露的神灵思想以及表现手法的信息中心,便是当时被黄河下游的中国人视作西极的美索不达米亚。

求仙思想不但表现在带翼神灵的崇拜上,而且更在于对长生不死和永葆青春的药物的追求。中国神话有善射英雄后羿向西王母请不死之药的故事,把追求长生的灵丹妙药的来源指向西方的神秘之国。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也有一个故事,叙述神奇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有一次遇到神牛,把它杀了,于是激怒了主管动、植物和人类繁殖的众神之母伊什塔尔,伊什塔尔要他将功赎罪。吉尔伽美什便出发去寻求不死之药。他渡过了死水,将得到的一种可以恢复青春的药草献给了伊什塔尔。另一部巴比伦传说《埃塔纳》,讲牧民埃塔纳因羊群怀不孕症,于是他跨上大鹰,藉鹰翼之力飞向上天,去摘取生育的药草,以便重返地面。柏林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2500—前2000年的阿卡德圆柱形石章,画面便是这一故事。这一传说和艺术图像可能流传东方。近年发掘的秦都一号宫殿遗址,出土兽身人骑大鸟画像砖,大鸟衔圆珠作奔跑之势,形状亦与鸵鸟相类。长生与不老,是自远古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永恒的主题。在巴比伦时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尚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图181。

不知东方有中国,中国人却早在向西方世界寻求财富和可以永远享受的幸福,以拓展自身的知识领域。不死之药的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和亚洲西部的关系,在精神生活领域占到如何重要的地位。

汉代编成的《神农本草经》,将许多药物说成具有“久服轻身不老”、“久服通神明”,甚至“神仙不死”的功效。炼丹术士从春秋、战国之际已在探索和天之四时、地之四极、人之四肢相应的药之四神,这药之四神就是“白金(银)、朱砂、黑铅、水银”(《道枢·参同契上篇》)。春秋时代以来,中国在炼铁、炼银技术上大有进展,也知道西方的沃民多银、铁。此时中国正步入铁器时代,由炼铜而获得的炼铅、炼银知识也在与日俱增。炼银与炼铅相关。铅的溶解温度仅 327°C ,而熔炼孔雀石、蓝铜矿和黄铜矿这三种常见的铜矿物,所需的温度是 1200°C 左右,因此有人认为人类炼铅早于炼铜。铅矿中常杂有含银矿物,由炼铅而得知炼银是很自然的事。《管子·地数》篇对找银矿的知识已有总结,说是“上有铅者,其下有银”。公元前六世纪的中国对炼银已有相当的经验,其知识来源虽很难直接求之于巴比伦或古波斯,但一定与西亚有关。

丹经中认为药之四神各有四像,铅居北方壬癸之水位,为玄武,属阴;铅中有银,是阴中见阳,银居西方庚辛金位,为白虎,属阳。《大丹记》因此说:“银从铅中出,离北方母胎,归西方庚辛金,兑卦,谓之白虎也。”铅的化学变化,从“一变而化胡粉”,透露出最早来自西亚的“胡粉”是一种含银铅粉。由此约略可知,早期铅银的冶炼,实与西亚古文明有过联系。

求仙思想不但表现在对来自西方的灵丹妙药的追求,而且也在图像上以一种仙鸟的纹饰作为装饰手法表现出来。春秋晚期在北方青铜纹饰中大量出现的鸟兽图像,有一种值得注意的鸵鸟纹,更为中国北方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往来提供了例证。1987年太原金胜村发现的车马坑春秋时代大墓,按所出器物推测,墓主为卿、上大夫级,

可能是死于公元前 475 年的赵鞅(简子)的墓葬,墓中出土的文物有鼎、豆、壶、盘、匜等礼器多件,造型优美,制作精巧。其中两件高柄小方壶,形制、纹饰尤其别致,上有盃顶形盖,壶身溜肩、瘦腹、平底,有上粗下细的长柄,下接喇叭形圈足。盖顶方块内有二虺龙,自颈至底遍饰菱形交接图纹。柄部图像,《发掘简报》以为自上而下饰有三层鸟、凤纹。说者以为是战国中、晚期才出现的鹤纹^①,与辉县琉璃阁、万荣庙前村出土器物纹饰相似。这三层图像其实是十分逼真的鸵鸟歌舞图,显示老、中、少三代鸵鸟欢欣之像。上层鸵鸟引颈高吭,项下有卷毛,尾部高扬,如马尾;中层鸵鸟,身体较瘦,项下无毛,尾部细尖而上扬,与上层图像作反向行走状;下层鸵鸟两两相对,伏地鸣叫,形体幼小。这一纹饰或者就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表示祥瑞的五采鸟,“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鸾鸟,实即鸵鸟最古的称谓(图 3)。

这类图像与北方早先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以鹰隼或锦鸡为写实特征的玄鸟图像毫无共同之处,与南方凤鸟亦无类似的地方。至于鹤纹,则以喙长、尾坠为特征,与高柄小方壶上的鸟纹大相径庭。高足方壶上的图形与埃及萨卡拉出土公元前 2000 年浮雕上的灰鹤也不相类,埃及古代灰鹤嘴部长而尖,尾部丰满而下坠,图像应属自成一系,别有来源。参照同墓出土传自域外的蜻蜓眼穿孔料球,和鸟盖匏壶、虎扼鹰带罍戈,鸟尊中大约出自北方狄(翟)族的十分细密的羽状纹饰,鸵鸟纹显示了比之中国北方动物纹更为确切的西亚因素。

鸵鸟在《史记》、《汉书》中称大鸟、马爵、大雀,其译名来自古波斯。马爵的“马”一词双关,在波斯语中是“大”。“马爵”一词在波斯语中是“大鸟”。早期译“雀”,是因形似。三世纪末,郭义恭《广志》已译作鸵鸟:“安息国贡大雀,雁身驼蹄,苍色,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

^① 渠川福:《太原金胜村大墓年代的推定》,《文物》1989 年第 9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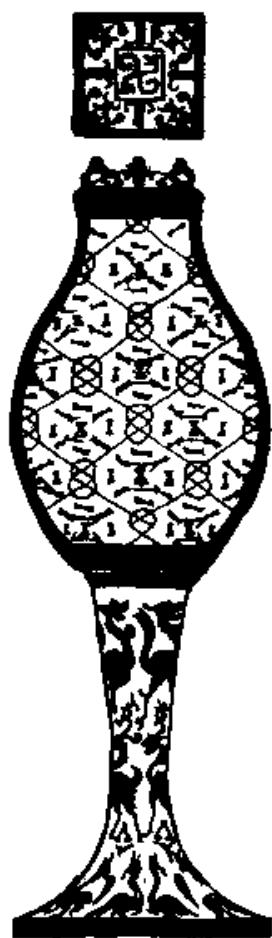


图3 春秋高柄小方壶
鸟纹

食大麦，其卵如瓮，其名驼鸟。”^①直到十二世纪，《岭外代答》才译作“骆驼鹤”，明代又称“驼鸡”。后世译名无论以鹤或鸡相称，都杂有“驼”字，概出自波斯语 ushturmurgh 中的 tur，或阿拉伯语 tier al-djamal 中的 tier，意思都是驼鸟。

在巴比伦流行的圆柱形石印章中，有许多狩猎题材的浮雕，其中新巴比伦王国时期“逃避猎人的鸵鸟”印，形象逼真，展翅耸尾快步奔跑的鸵鸟，正在回首窥视身后的猎人，前方约小一倍的图像，是另一只奔跑的鸵鸟，形象与正面图像相仿。太原金胜村墓高足小方壶上的鸟纹，是一种以粗线条简化的同类图像，其来源一定是巴比伦的浮雕鸵鸟。传播的工具则是易于传递的石质印章。

曾在亚洲东部和伊朗之间广阔草原上流行的鹰头兽动物纹饰和艺术图像，是斯基泰民族的传统艺术。进入长城一带以后，鹰头兽失去了原来的图腾意义，受到中原文化的挤压，未能发育成熟，在青铜器上一变而成鸟类图像与器身、器盖上的野兽图像分别铸造的复合体。太原金胜村春秋末期墓与平山战国中期中山王陵出土青铜器，可以算作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它们同样蕴含着来自伊朗的艺术因子。

^①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丛书》。

四、蜻蜓眼玻璃珠的出土

中国自制玻璃工业大约开始于公元前九世纪左右,玻璃成分含有大量硅酸盐和铅钡,属于铅钡玻璃,和西方埃及、腓尼基、伊朗玻璃的属于钠钙或钾玻璃不同。铅玻璃的制造也以西亚为最早,亚述古都尼尼微遗址中出土公元前七世纪的楔文板上,有铅玻璃的配方^①,但出土的铅玻璃极为零星。春秋、战国以来,西方玻璃陆续通过北方草原民族输入中原地区,属于春秋末期的少量钠钙玻璃和数量较多的蜻蜓眼玻璃珠,就是由伊朗高原和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制造中心运进的。

春秋、战国玻璃中最多的是玻璃珠,在八百多件玻璃器中占了七百多件。玻璃珠中多数是引人注目、风格别致的蜻蜓眼式圆珠。这类玻璃珠常见的可分大小两类,大的直径约2厘米,多数偏扁,中有穿孔。珠身外饰凸起的蜻蜓眼式的花纹,上有四、五道蓝白相间的圆圈纹组成,也有间以黄色圈纹的,有的还有小白点或蓝点相连接成的菱形纹饰穿插其间。小珠直径1厘米左右,纹饰与大珠相仿。

蜻蜓眼纹饰不见于商周玉石器纹饰,春秋时代中国自制铅钡玻璃珠中也没有这类花纹。这种蜻蜓眼(或称叠嵌眼圈)珠在埃及开始很早,公元前1400—前1350年间的埃及出土物中,已有蜻蜓眼式的玻璃珠项链。伊朗高原制造玻璃的历史也略早于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东京大学伊拉克伊朗遗址调查团先后两次在伊朗吉兰州东部的泰拉门地区进行发掘,在帕提亚和萨珊时代的墓葬群中找

^① 福布斯:《古代技术》(R. J. Forbes,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Leiden, 1957)第5卷,第131—135页。

到了许多珍贵的玻璃器,明确了伊朗高原玻璃制造的历史进程。公元前1000年,伊朗高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下,开始生产玻璃珠饰,出土物中有大小相间色泽美丽的蜻蜓眼式玻璃珠项链。这类蜻蜓眼式玻璃珠的生产,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阿赫曼尼德朝时代继续不衰,在公元前六世纪已经流入中国黄河中游和长江的中、上游。时代在春秋末期,出土于河南固始侯古堆 M1 的蜻蜓眼玻璃珠,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中出土春秋末战国初吴王夫差铜剑格上嵌玻璃3块,湖北江陵望山 M1 战国楚墓出土春秋末战国初越王勾践铜剑格上所嵌蓝玻璃,山西太原金胜村赵鞅(简子)墓出土春秋末战国初蜻蜓眼式透明玻璃球,是最早流入中国的这类伊朗或西亚玻璃。这些玻璃都是经由北方草原民族的媒介而流入中国。河南固始在春秋末曾是狄族南侵进入黄河下游的一处边界,在这里出土蜻蜓眼玻璃珠殊非偶然。这一发现揭开了西亚玻璃进入中国内地的序幕。

和黄河、长江中下游发现伊朗玻璃的时间相仿,云南江川李家山 M22 号春秋末、战国初的墓葬中,也出土了来自西亚的浅绿色透明六棱柱形玻璃珠,同一墓葬中还出土了西亚出产的蚀花肉红石髓珠。该墓经碳-14 测定的年代,是距今 2500 ± 105 年。发掘者认为,玻璃珠是由埃及和西亚输入阿富汗和印度,然后再由印度经缅甸输入云南^①。但也有可能,来自西亚的玻璃珠是经由新疆、甘肃、青海直至四川、云南西部的游牧民族传送。这些起自东北,沿长城而西,经青海东部转向川、藏地区分布的牧民,充当着中原文化区由北向西邻接地带的文化传播者,构成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②

① 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各地出土战国早期的蜻蜓眼玻璃珠有:

山东临淄郎家庄 M1 出土料珠 9 枚(《考古学报》1977 年第 1 期第 79 页,图版七,3 左,图一〇)。

山东曲阜鲁国故城 M52 出土蜻蜓眼料珠 19 枚,属战国早、中期(《曲阜鲁国故城》第 178、226、227 页,图版·一二)。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料珠 73 枚(《随县曾侯乙墓》图一〇七)。

山西长治分水岭 M270 出土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小蜻蜓眼料珠 1 枚(《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第 81 页)。

河南洛阳中州路 M2717 出土战国初期蜻蜓眼料珠 2 枚(《洛阳中州路》第 115 页)。

各地出土战国中、晚期的蜻蜓眼玻璃珠有:

湖南湘乡牛形山 M1 出土料管 1 件、玻璃珠 5 件,属战国中期(《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第 105 页、111 页图四一)。

湖南资兴旧市楚墓出土战国中、晚期的蜻蜓眼玻璃珠 1 件(《考古学报》1983 年第 1 期第 115、116 页)。

甘肃平凉庙庄 M6、7、1 出土战国晚期玻璃珠 16 枚(《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5 期第 23 页)。

广东肇庆北岭松山 M1 出土战国晚期玻璃珠 1 件(《文物》1974 年第 11 期第 76 页)。

四川青川 M13 出土战国晚期玻璃珠 1 枚(《文物》1982 年第 1 期第 12 页)。

四川巴县冬笋坝 M5、10、49 出土战国末蓝色玻璃管 2 枚、玻璃珠 2 枚(《考古通讯》1958 年第 1 期第 11 页,《考古学报》1958 年第 2 期第 93 页)。

湖南长沙市黑石头 M5 出土战国末玻璃剑首 1 件、玻璃珠 1 枚(《考古学报》1957 年第 4 期第 47 页)。

湖南长沙市近郊楚墓出土战国料珠 2 枚(《长沙发掘报告》第 66 页)。

色彩鲜丽的蜻蜓眼玻璃珠、管出现在春秋晚期,而以战国时代最多,地点见于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甘肃、四川、云南。它们从原产地西亚流入中国的路线大致有以下四条:一是自伊朗经中亚,通过新疆、甘肃,进入山西、河南、山东;二是经由甘肃、四川进入云南;三是由山西、河南,流入湖北、湖南、广东;四是自西亚经阿富汗、印度、缅甸,运抵云南。四条路线中,自伊朗、中亚、新疆、河套,而入山西、河南、湖北的一条是主要的传递路线。蜻蜓眼玻璃珠在山东的出土,标志着战国时代丝路起点的齐国,同时也是起自伊朗和东地中海的西方玻璃珠反向输出的终端。丝绢西运和玻璃东传,对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和伊朗之间逐渐形成的丝路,刻划了一幅十分生动的图像。

第二节 汉代流行的安息文化

一、安息国和中华文明

秦汉时代中国和伊朗的联系,是通过立国于里海东南的帕提亚(Parthia)实现的。帕提亚自公元前 248 年建国,到公元三世纪初灭亡,在西亚和中国之间充当了文化联系的马首。

帕提亚在汉代译称安息,是因它的建国者名叫阿尔萨克(Arsak)。比汉代更早,在秦代,还有一个迄未被译解的名字应引起注意。王子年《拾遗记》中,追述秦始皇元年(前 246 年),西域骞霄国贡一有才华的画家烈裔,他能口含丹青,漱地成画,作成魑魅、诡怪群

物的图像,这些图像大约即是西亚的人物和神灵。此人又善指画,画地长百丈,而可以笔直如绳墨。地图也是这位画家的拿手,在方寸之内,可以画出四渎、五岳、列国。在绘画之外,烈裔还是刻玉能手,善治印章、雕刻。这些技能几乎完全是伊朗古代文化中最基本的门类。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技术大约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已和伊朗有过交流。中国的石刻印章技艺,也在同时或更早的时候,和伊朗的同行有过切磋。烈裔所绘龙凤,据说骞翥若飞,非常富有写实的意味,画风和画题都和两河流域及伊朗高原的传统艺术有承袭关系。巴比伦城伊尔塔什门上著名的怪兽蛟龙,后来再见于山东的画像石上,只是添加了一对飞翼和头上飘向身后的绶带,加上鸵鸟等西亚的禽类动物画,这些绘画便成了中国古代画坛上最初盛传的外国画家创作的龙凤图画。

西域画家烈裔来华传艺,无疑是中国和西亚艺术交流中的盛举。但烈裔一名,显然并非画家真实的姓名。这个名字应是里海南部伊朗古城赖依(Rayy)的最早译名。画家通过骞霄国,被护送到咸阳,骞霄国太像波斯历史传说中的季夏所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位于葱岭以东的新疆西南境内。秦代画家本无留下姓名的,地位等于画工。只有这位伊朗画家,由于技能出众、题材和表现手法颇为新奇,引起了注意,在《拾遗记》中留下了他的籍贯。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到达乌孙的张骞向中亚、西亚、南亚分别派遣使节和骆驼商队。副使的队伍开赴安息,由于塞伽人正大批动迁,安息为确保汉使的顺利抵达,特派二万骑兵在东部边界木鹿(今马里)迎候,经数千里护送,将汉使送抵国都番兜城(Parthava)。番兜城在今沙赫鲁德附近,希腊人称赫康托姆菲勒斯(Hekatompylos),意思是“百门城”。汉使返国,安息也派使节随团东去,到达长安。安息使者的礼物最引起汉代宫廷注意的是大鸟(鸵鸟)卵和眩人(巫师、魔术师)。鸵鸟卵在汉代宫廷中被当作来自西方

仙国的一种象征；眩人，极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擅长巫术的祭司^①。安息眩人的到来，对于相信黄老之术、追求神仙生活的汉武帝刘彻，无疑是一件旷古未有的瑞祥之事。

二、石雕艺术

安息人由于经商，从水陆两路移居国外的极多，他们将阿胡拉·马兹达神的信仰带到中国境内是极为自然的。这对于推动中国人将祈求仙药、仙境的思想转向西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汉初，西王母传说已明显带有伊朗色彩，《史记·大宛列传》特意指出，安息国“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西王母与不死之药的联系，以及西王母地望从河西走廊的西端推向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亚，是战国和秦汉时代对于由太阳崇拜而转向丰收女神阿那希的波斯人与安息人的一种微妙的表述。阿那希(Anahit)为春与水源的女神，又是牛群和羊群的保护神，她保护少女，象征着永恒的生命与丰收的欢乐^②。东汉时代，特别在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内地，乃至东方海滨以后，在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山东沂南画像石墓、江苏沛县栖山画像石中，许多表现西王母形象的石刻，都是安息艺术的翻版。江苏沛县栖山的画像石出土于东汉初期墓中，佛教尚未进入中国内地，而这些画像石中已经有了西王母和四翼人、人首蛇身、马首人身、鸟首人身、人首马身的图像。西王母和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图像的联成一体，是伊朗古代最早崇奉善恶二神的宗教信仰在中国北方流传的佐证。其中鸟首人身的神像，在二千年中积淀于中国民间的习俗之中，成为人死十

① 参见唐人张鷟《朝野僉载》卷三关于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袄庙中，由胡人充任袄主所使用的巫术。这种巫术称作下袄神，由袄主以刀刺腹，不久，即告平复。

②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A. U.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第1卷，第203—205页。

多天后必须供奉兽神的图像。

伊朗石刻图像中的宗教意念也随着安息人的进入中国内地,在黄河流域找到了新的土壤。这些图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狮和麟。狮子产于西亚、非洲,在亚述和波斯,人狮相斗是英雄气概和神灵观念的表现。公元前三千年苏萨印章上的狮子与牛,象征着日与月,此后狮子便被当作太阳崇拜的一个符号而不断出现。苏美尔的石刻印章和木琴的贝壳镶嵌画中,狮子是一种流行的画题,常和神仙、帝王的形象糅合在一起。狮雕艺术在亚述已发展到十分完美的地步,同一时期的赫梯人和腓尼基人也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在尼姆鲁德遗址和尼尼微王宫浮雕中都有狮雕的杰作,作于公元前800年的胡尔西巴德青铜狮,刻划了一头匍伏在地、凶相毕露、准备扑向猎物的雄狮。同样的艺术形象在一个世纪之后,又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苏萨发现的波斯青铜伏狮像(今藏巴黎卢佛宫,图4)。到了东汉时代,竟成了中国石刻狮子图像的蓝本。中国石狮的雕刻,从它借鉴的艺术形象而论,比较容易传递的是波斯流行的装有兽座的角杯。这种角杯到公元前五世纪阿赫曼尼德朝时,在杯底折而向前伸展的部位用兽身加以装饰,角杯制作也都摹仿亚述的花边,底座兽形带有伏地的前肢,或作鹰头兽,或作羚羊,或作狮子,大多以金银制作,雍容华贵,非同凡俗,和原来的角杯已有很大不同,可以称之为樽。安息王朝的工艺师接受了在黑海北岸古希腊人建立的波斯波尔王国制作的角杯形象,将角杯的底部由平直作成圆弧形。1949年在土尔克曼的古城尼萨遗址的安息王宫库房中发现的一批公元前二世纪的象牙角杯,共约60多件,长度在50厘米左右,其中有格里芬(鹰头飞狮)等图像^①。这种安息式角杯上的狮子图像流传到汉代,是

^① 法卢金:《中亚考古》(G. Frumkin,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Leiden-Köln)1970年版,第1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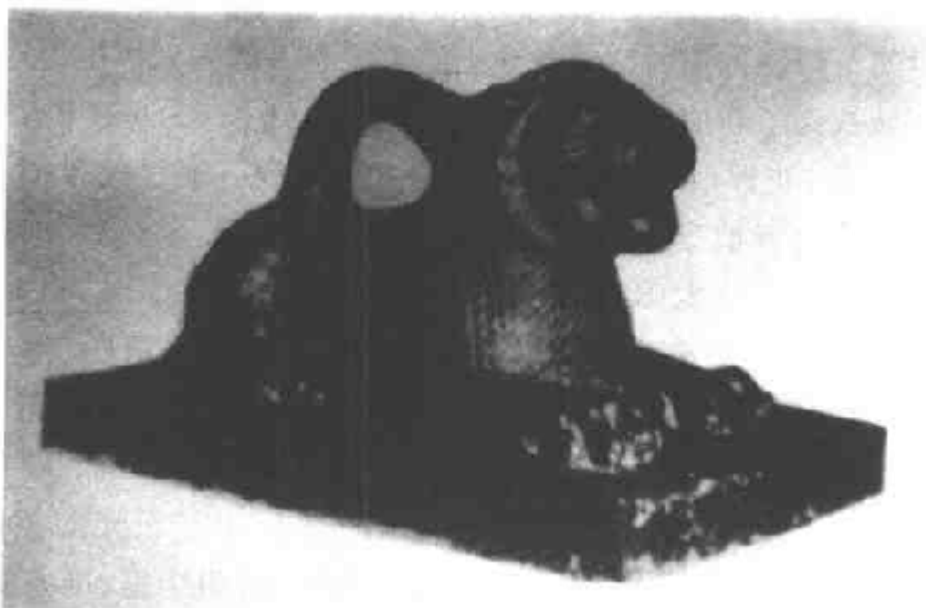


图4 苏萨青铜伏狮(前500—前400年)

中国工艺师可以仔细观摹、加以仿作的狮子图像的楷模。最早传递这类图像的是北方草原民族。河北平山县1977年中山王陵出土的错银双翼铜神兽、错金银神兽,正可视为伊朗狮雕艺术在东亚的初露头角。1968年在河北满城县陵山刘胜墓的出土物中,有被发掘者称为鎏金虎座形饰具^①,高5.2厘米,长7.9厘米,也是西亚狮形角杯座托的仿作(图5)。伏狮的前半部全与安纳托利亚雕刻和波斯、安息狮形角杯的形制相似(图6),狮背另有一山字形托架,或者是一件灯座。

狮子作为西亚的异兽,在公元一世纪确已作为贡礼进入洛阳宫苑。《后汉书》和《东观汉记》中,都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使者进献狮子、条支大鸟的记录。公元87年的一次,安息“遣使献狮子、符拔(豹, Gav-u-palang)。符拔形似麟而无

^① 《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图238。

角”。安息狮、豹都被洛阳皇家苑囿作为西域瑞兽珍禽加以驯养。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在这里,狮子和符拔、安息雀(鸵鸟)都是伊朗最富特色的礼品。



图5 西汉鎏金狮座形饰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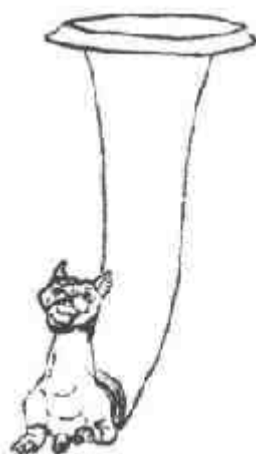


图6 安息银角杯
(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二世纪中叶在山东出现的石狮,是安息艺术东传和古代波斯用神兽看守宫室风习的一种变异。镌有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铭刻的山东嘉祥县东南武氏祠石阙,在晚清时期被发现。石阙前有一对左右相对的石狮,狮身长约150厘米,瞪眼舞爪,形态生动。与同时代石人相比,手法纯熟,原因恐怕还在这类石狮的圆雕早有借鉴之故。现存洛阳古代艺术馆的一对东汉石雕辟邪,1954年出土于洛水北岸,辟邪肩后有贴伏的双翼,雕刻技法圆熟,已成陵墓守护神。

四川雅安有益州太守高颐墓,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墓前石狮姿态雄壮,四足奔腾,尾部高耸,躯体刻镂细致,前胸两旁狮子的鬣毛,按安息式样分两层展开,每层有粗放而尖端呈弧

形上扬的四支卷毛,由于第二层卷毛的雕刻部位已在颈部后面腹部前端,所以常被认作带有飞翼。这种表现鬣毛的雕刻手法可以追溯到接受了亚述艺术的赫梯作品中,例如公元前 730 年的辛吉利带翼狮身人面像(存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和马腊什金制金牛座托银角杯(藏不列颠博物馆)的动物形象。三世纪初在东汉献帝时建造的铜雀台,也出土有伏地的石狮(藏日本大仓集古馆),头部形象与山东、四川的石狮类同,但鬣毛已一变而成遍布颈部的圆卷,成为后世石狮圆雕艺术中富有中国风味的式样了。圆雕石狮艺术自安息引进以后,在不足一个世纪的短时期中,便将伊朗式样加以吸收、改造,融合于中国的民族艺术之中,从而显示了中国艺术的强大生命力。

在汉代,麟进入艺术图像,也和安息文化的吸收难以分开。麟自春秋时代以来屡见史书记载,传说孔丘生前已有麟出现,公元前 481 年山东获麟,对这珍奇动物莫可名状,于是去请教孔丘。麟,这种动物,或者借自波斯语 palang,是豹子。西亚、非洲出产豹子,在艺术图像中很早便有了,但在中国北方却很少见。豹的出现,被认为是“王者至仁则出”,是百年一遇的事。但往后,人们逐渐对这种动物有了认识,于是获麟的记载也屡被史书所乐道,并作为盛世加以附会。汉武帝时有麟、凤数现,并非不切实际的想象与迷信,但麟这种动物的含义或有变化,在南方也被当作“四不像”的麋类动物。班固《西都赋》中描绘长安西郊上林苑中有“九真之麟”,出自越南半岛北部九真郡,后来又不断有送到长安去的。《京房易传》(《左传正义》引)以为麟是“麋身狼额,马蹄牛尾,有五采,腹下黄”。还是多半像豹子。东汉起,麟始有一角的说法,并且还有“麒麟”之称。这种有角的怪兽,也出自安息艺术。作为写实的动物形象,这时的麟已非春秋时代的麟,而是来自非洲的长颈鹿了。非洲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长颈鹿在罗马东方贸易盛期,经过波斯人的导引进入中国,于是才有“麒麟”这个复合名词的

使用。波斯语中对长颈鹿称作 Shotor gav-u-palang,意思是“如牛豹的骆驼”,“麒麟”二字正是波斯语中的牛豹(gāv-u-palang)。于是,麒麟之为有角的动物是千真万确的了。

江苏徐州贾旺的东汉画像石中,有被考古家称为麒麟的图像。清晰的画面上,刻绘了九头神态各异的长颈鹿,有的反首回顾,有的停止凝视,都是躯高颈长、似鹿非鹿、头上生有肉角的动物^①。徐州茅村汉墓在1952年发现的画像石中也有长颈鹿的画面^②。许慎《说文解字》中体会到的麟,便是“马身,肉角,牛尾”,但他并不了解由麟到麒麟,六、七个世纪中人们对异兽的认识中包含的复杂的内涵。此后,艺术图像中的麒麟,都成了有角之兽,或一角,或双角,已非最初的豹子,而与非洲长颈鹿结下不解之缘了。

三、魔术与杂技

来自安息的还有魔术与杂技。张骞归国,犁轩眩人也跟着在公元前118年以后,随同安息使者到了长安。眩人(幻人)以魔术著闻,《汉书》中的犁轩亦即《史记》中的犁轩(黎轩),《史记》介绍它的位置:“安息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汉书》则说,伊朗南部的乌弋山离,“西与犁轩、条支接”。这犁轩是位于两河流域以塞琉西(Seleucia)为都城的国家。犁轩魔术师便来自两河流域南部的塞琉西。唐代杜佑《通典·边防》九说:“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轩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须,长四尺五寸。”这些来自古巴比伦的魔术与杂技演员,擅长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的特技。张衡《西京赋》中

① 《文物》1980年第2期,图14。

② 《江苏徐州汉画像石》(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号),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图版8,原题《群兽率舞》。

描述都会之盛,有角力竞技、假面歌舞、化装表演、马戏驯兽,其中的“怪兽陆梁,大雀踔踔”,恐非驯狮与鸵鸟莫属;“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涓通泾”,“百马同辔,骋足并驰”,也都是安息或西亚魔术表演的节目。

四、安息乐器

安息乐器在汉代西域乐器中属于美索不达米亚系统,在胡空侯传入内地以前,中国已有一种仿制西亚式样的空侯。空侯后来又写作坎侯、箜篌,大约是从吐火罗语中借用的名词,是早期的竖琴(Harfe, Harp)。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是最早使用空侯(竖琴)的民族,公元前3000年已创制弓形竖琴,并有立式(直立)和卧式(平放)两种式样。巴比伦时期,在公元前1850年以后,又出现了各种式样的角形竖琴^①。卧式竖琴最先被中国接受。在汉代的词典《释名》中,解释空侯这种乐器是空国的贵族所使用的乐器,所以叫空侯。空国大约系柬埔寨(Cambodja)的异译,是位于印度西北的一个古国,中国得到这种乐器,可能是经由这个地方引入的。这种空侯是可以平放的卧式(横式)弓形箜篌。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竖琴,是在公元前2800年的乌鲁克(Uruk)四期的泥板中,那是一种三弦的竖箜篌。在乌尔(Ur)一期,发展成卧式而具有11—15弦的弓形箜篌。卧箜篌在公元前二世纪后的印度石刻中也可见到,并且传入了缅甸。早期的卧箜篌在公元前一世纪已和钟、磬等中国民族乐器相并列,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是经过乐师侯调改进的一种类似瑟的小型弦乐器。但到东汉时这

^① 锡比尔·马库斯:《乐器大全》(Sibyl Marcuse, *Musical Instruments, 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N. Y.), 1964年版,第229页。史坦莱·萨迪主编:《新编音乐与音乐家辞典》(Stanley Sadie, ed.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 1980年版,第8卷,第191页;第12卷,第196—198页。

种乐器仍只用于皇室郊庙,不为民间所知。桓谭《新论》中有这样的妙论:“鄙人谓狐为狸,以瑟为箜篌,此非徒不知狐与瑟,乃不知狸与箜篌。”

汉灵帝刘宏喜爱的胡空侯是一种大型立式角形竖琴,演奏时竖抱于怀中,通过双手用指弹拨,和卧箜篌的拨弹法不同。这种箜篌所以称擘箜篌,在于“擘”是个音义两佳的外来语。“擘”既译出了“指弹”之意,传述了竖箜篌的演奏姿式,又转递了伊兰语中这种上下抚弄的竖琴所用的名称 Van。在库尔·伊·菲勒(kul-i-Fir‘awn)的伊兰浮雕中,就见有演奏手鼓和竖琴的三名乐师,以后在公元前626年的阿苏尔巴尼帕浮雕(现藏不列颠博物馆)中,也有苏萨乐师与歌女的图像,11名乐师中就有8名竖琴手,其中一名就是竖箜篌的演奏者。竖箜篌的音箱置于下部,与音箱在上部的七弦竖琴(琼克 Chang)不一样。亚述和新巴比伦时期的竖琴,已出现了大型的角形竖琴,无论立式或卧式,都具有8至22弦,立式用指弹,卧式用拨弹^①。亚述角形竖琴由波斯阿赫曼尼德朝继承,东传安息,成为欧亚草原民族喜爱的乐器。公元前四、五世纪,东部阿尔泰保存最好的一处男女合葬墓中,女主人大约是部落首领的妻子,同时又是能歌善舞者,墓室中有一张竖琴型的多弦乐器和一具单面鼓。墓主经鉴定,是阿尔泰地区的塞人。阿尔泰古墓葬中的这一发现,提醒我们,竖箜篌最初是由北方草原民族塞人和匈奴传入中原的。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汉宣帝(前73—前49年)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乐器中有箜篌,这种箜篌是汉人制作的卧箜篌,和竽、瑟一同进入了天山以北的大草原。竖箜篌自伊朗传入天山以南,大约也在同

^① 法尔玛:《苏美尔和亚述的乐器》(H. G. Farmer,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Sumerians and Assyrians*),伦敦,1953年版。法尔玛以为琼克的音箱在上,擘(Van)的音箱在下,见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6卷第2784页注^④。

一时期。^①

现有考古图像中,也有这类竖箜篌。1972年在甘肃嘉峪关市以东20公里戈壁滩上发掘的东汉晚期砖墓,三号墓前室西壁画像砖中有奏乐图两幅,每砖有乐师二人,一弹琵琶、吹竖笛;一抚琴弹竖箜篌。图像出土时竖箜篌比较清晰,曾送往日本国展出。这是现存最早的竖箜篌图像。比之大同云岗石窟第七洞的箜篌要早得多。云岗第七洞开凿于后秦(384—417年),在西凉吕光(386—399年)征龟兹前后。日本音乐史家林谦三不相信汉灵帝的胡箜篌是竖箜篌,以为竖箜篌是传入中国的凤首箜篌,对“胡箜篌”竟无法解释^②。东汉画像砖的发现,完全推倒了竖箜篌是吕光将龟兹乐引入中原时传进的揣测。

角形的竖箜篌曾在中国长期流传。在伊朗,到十九世纪仍是当地的一种民族乐器。胡箜篌是东汉时代最早在内地赋予它的正式名称。

胡箜篌之外,另一种在汉代流行内地的伊朗乐器是四弦曲项琵琶。琵琶一词来源说法虽多,但比较明显的还是波斯语中的 Barbat。古波斯的 Barbat 是折曲的短颈琵琶,属于柳特(lute),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成为波斯的柏尔布德(琵琶),但三世纪中叶萨珊波斯沙普尔一世(241—272年)时的琵琶只有两根弦,琴身放长,音箱和音柄用整块木板制作,音域宽广,声调洪亮。汉代初入中国,仅译其音,《释名》写作“批把”,《风俗通》写成“枇把”,晋代以后才改成“琵琶”。是一种马上拨弹乐器。刘熙《释名》根据印度梵语中“拨弦”(Bharbhu)的读音,解释这种乐器演奏时,“推手却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琵琶而有四弦,恐怕是初传龟兹后加以改进而成,所以北朝时习称龟兹琵琶。这种四弦的曲项琵琶,在汉代

① 认为中国的箜篌是波斯琼克(Chang)的发展,以为在公元400年左右从土耳其斯坦(中亚细亚)传入中国的说法,无论在式样和时间上都缺少依据。说见史坦莱·萨迪主编:《新编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第8卷,第193页。

②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中译本,1962年版,第225页。

已遍布北方黄河流域。不但东汉灵帝时进入宫廷音乐,而且在山东滨海地区也都流行,嘉祥武氏祠和两城山石阙中都有弹琵琶的乐舞画像砖。

龟兹琵琶的历史十分复杂,是在采用四弦的长颈琵琶的影响下才出现的一种中伊合璧式弦乐器。它的前身是一种长颈琵琶坦布尔(Tanbūr)。在巴黎卢佛宫收藏的苏萨膏泥雕塑中,有公元前八世纪的长颈琵琶坦布尔^①。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经过欧亚草原民族的传递,坦布尔在中国北方边塞流行,习称秦琵琶,或秦汉子。唐代杜佑《通典》卷一四四介绍这种古乐器时,已觉困惑,怀疑是由北方一种带柄的名叫“弦鼗”的小鼓变化而成。其实这是一种音箱在下部,上部则由长柄构造的长颈琵琶。既然类似弦鼗,则是用皮面的共鸣箱的弦乐器,大约经过汉人的改进,便变成了四弦十二柱木面的秦琵琶。公元前二世纪末,乌孙公主嫁昆弥,带去的嫁妆中就有这一乐器,称为秦琵琶,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了。晋代傅玄《琵琶赋序》称述它命名的理由,“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易传于外国也”。由于西域各地早用琵琶一名称呼弦乐器,所以也用了琵琶一名。而琵琶正是波斯语对弦乐器柏尔布德的汉译名称。不过秦琵琶却是一种在西亚已经出现过的棒状直颈琵琶。因此,秦琵琶(秦汉子)也不能认作是中国的传统乐器,而是由中国人改进了的波斯长颈琵琶。

秦汉时代流行北方的三式琵琶,秦琵琶(秦汉子)和四弦曲项琵琶都源出波斯,是经中国人加以改进、增至四弦的波斯琵琶。前者类似坦布尔,后者则与柏尔布德有亲缘关系,连所用的“琵琶”这个词也是借自早在战国与秦汉之际就在新疆通用的波斯弦乐器的名称。

汉代传入中国内地的胡乐器,除箜篌、琵琶(四弦、秦汉子)外,还

^① 《波斯调查团专刊》(*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1900年,第1卷,图版8。

有大、小筚篥，全系传自伊朗，属于伊朗系吹奏乐器。

筚篥，在汉代称悲篥，《通典》说“本名悲篥，出于胡中，胡吹之，以惊中国马”。最初由伊朗经中亚传入龟兹，为龟兹国所用的一种簧管乐器，《乐府杂录》描绘它“有类于笛也”。形状似管，有九孔，竖吹可以发音。唐代干脆称作笛管，编入鹵部。内地仿制的筚篥，用竹管截制。这种乐器“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出于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声，五音咸备”（《太平御览》卷五八四）。悲篥一名在波斯语中借用号角 *burū*，因安息古乐中未见用笛，所以这类管笛习称 *nāy-i-siyāh*。东汉时内地已有悲篥，山东孝堂山石刻第十石第二层，有屈足跪吹悲篥图像，后有四人挽鼓车，一人坐车上击鼓，民间已有将东汉明帝所制军乐——短箫铙歌，改为悲篥和鼓曲的，也是一种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合奏。

秦末汉初，公元前三世纪末，以箫、笛为主的鼓吹乐，首先从河套地区传入内地，成为重要的军乐。鼓吹乐使用乐器有鼓、铙、箫、笛四种，笛是一种主乐器。刘歆定军礼说：“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笛以和箫声，非八音也。”^①班壹在西汉孝惠、高后时，在河套楼烦故地因经营畜牧而致富，在北方边疆成为首富，于是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威仪胜于帝王。鼓吹曲中使用的笛，就是北方游牧民族所用的胡笛。汉旧录有胡笛曲，“不记所出本末。笛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笛”（《太平御览》卷五八一）。胡笛又称吹鞭，是匈奴、楼烦牧马人的马鞭，以羊角为管，芦为头。有大笛（大篥）、小笛（小篥）两种，晋《先蚕仪注》称：“车驾住，吹小篥；发，大篥，即笛也。”自入内地，便是军乐和仪仗中的主乐器。笛在古波斯是一种号角类吹奏乐器，称 *Karnā*，起源于亚述的 *Qarnu*，亦称 *Karranāy*。东汉末蔡邕女文姬被匈奴掳往左贤王部伍，对马上乐的笛曲加以改编，有

^①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六《鼓吹曲辞》注引。

十八拍。东汉时《胡笳调》、《胡笳录》各一卷,专门编集胡笳曲。东汉时作为军乐的鼓吹乐,只有边将、万人将军才能配备。皇室仪仗和宴乐中采用的鼓吹,称黄门鼓吹,人数多至一百四十五人。成都出土东汉画像砖中有一队六骑的鼓吹图像。1952年成都东乡青杠坡3号东汉墓出土画像砖,有两排六骑的乐队,其中五人奏乐,前排居中一骑击鼓,右侧一骑吹排箫;后排中间一骑吹笳,左侧一骑击铙,右侧一骑吹排箫。画像砖表现的图像显示了胡笳列入军乐的场景。

胡角也是汉代源自伊朗的乐器。鼓和角组成了西汉时另一类军乐横吹乐的主乐器。晋代崔豹《古今注》称:“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到郑樵编纂《通志》,他在《乐略》中干脆说:“角之制始于胡,中国所用鼓角,盖习胡角而为也。”打破了古代黄帝时创制号角的传说。《摩诃兜勒》曲可能就是安息的军乐。这乐曲到了长安,使李延年的乐思大为奋进,配制了二十八套军乐,在边塞编入万人将军的乐队中。这种角,又称长鸣角。角长五尺,形如竹筒,本细末稍大。可以竹木或皮制成。《宋书·乐志》介绍西戎有长可二尺的铜角,形如牛角,“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以惊中国马”。曹操征乌桓,因军士思乡,将长鸣角减为中鸣,“其声尤悲,以应胡笳”。是与笳相近的伊朗乐器 būrū。在费尔杜西的史诗《帝王纪》中,曼纽契尔(Manūchīhr)被推举为角的创制者,这种角的历史已有三千年。西汉时,成为鼓吹乐以外的另一类军乐横吹的主题曲,《通志·乐略》中列鼓角横吹十五曲,另有胡角十曲,其中《黄鹄吟》、《陇头吟》、《折杨柳》、《望行人》曲名全同,可见鼓角横吹是李延年等人据胡角原曲改编的配乐。这种横吹乐由于经西北羌人的传递,再经宫廷作曲家的改编,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军乐,比之汉初来自北方鄂尔多斯草原的鼓吹乐,便更加具有伊朗古乐的风采了。

五、家具与织物

东汉时期的家具与衣饰,有许多来自安息。汉灵帝(168—189年)所爱好的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大多传自伊朗,或经由伊朗、中亚进入中国。

东汉时传入的榻,在波斯语中作 Takht,具有“王座”、“软椅”、“床”等字义。属于西亚的一种高级坐椅,也可供休憩之用。初入中原便受到上层集团的爱好,所以迅速进入宫廷。三国曹魏时期,这种罕见的坐椅也是帝王将相的用具。《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瞞传》,记述211年曹操率大军自潼关北渡黄河,突遭马超偷袭,“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胡床是榻的俗称。曹操在军中曾用胡床,以供休息。后来魏文帝曹丕也使用胡床出猎。《三国志·魏书·苏则传》记曹丕行猎,“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这种胡床由于轻巧舒适便于携带,在野外或行军时,也使用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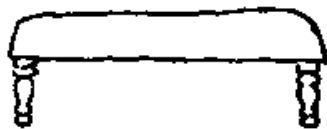


图7 阿赫曼尼德朝的榻

“榻”的名称保留了波斯原名。中国内地惯于席地而坐,或流行在床上双足双屈的坐法。使用波斯卧榻,可以下垂双腿、双足着地踞榻而坐。现藏巴黎卢佛博物馆的阿赫曼尼德朝的圆柱印章上,有这种波斯卧榻的图像(图7),图像从侧面显示四足,足部刻成上下各有两层的螺旋体,中间是上粗下细的圆柱体,后来这种木工家具图像成为中式家具的基本图形流传下来。榻上铺盖软垫,可以坐卧。

木制的榻在东汉时仍极少见,属于一种难得的雅座。东汉时陈蕃出任乐安太守,对高洁之士周璆特别敬重,“特为置一榻,去则悬之”

(《后汉书·陈蕃传》)。比较简陋的是板榻、木榻,上面不再铺席^①。到南北朝时,胡床使用越加普遍,而且一变而成一种折叠椅,从而有了交足椅的名称。

东汉时代,来自波斯的还有胡帐中必不可少的氍毹(Takht-dar)。氍毹是一种毛织的铺垫,用于马鞍、坐席、卧床。汉灵帝爱好的胡物中有胡帐,胡帐中使用氍毹。马融曾上奏告发马贤的侈糜,“马贤于军中帐内施氍毹,士卒飘于风雪”(《太平御览》卷七〇八)。波斯氍毹经月支(月氏)、匈奴流入中国,为数可观。东汉初年,光武帝也曾在马鞍上施氍毹,《东观汉记》说:“景丹率众至广阿,光武出城外下马,坐鞍毡氍毹上,设酒肉。”(《太平御览》卷七〇八)氍毹从名称到功用,都具有波斯风习。东汉服虔《通俗文》对这种毛织物的解释是:“名氍毹者,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服虔的这一说明,在译名语源方面固然有附会之处,但氍毹作为铺盖在榻上的毛织物,确已指明了它的实际用途。刘熙《释名》因此按服虔照本抄袭。三世纪张揖《释苍》对氍毹的注释是“毛席也”,也是毛织铺垫的意思。

六、安息纹饰

有图案的毛毯,最早见于库尔塞巴特的亚述石刻,现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阿里安曾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描述波斯王居鲁士的坟墓中使用巴比伦的挂毡。此后,在中亚细亚的月氏贵霜王朝和印度北部,也都学会了使用毛织的铺垫、挂毡。在进入中国内地的这些波斯织物中,安息时代流行的纹饰也逐渐渗入中国的工艺装饰。

在多变的几何纹以外,许多植物纹饰,以其富有异国情调而尤其

^① 《北堂书钞》卷一三三引谢承《后汉书》;《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高士传》。

引起中国工匠的注意,十二瓣的蔷薇纹、中间夹有葡萄叶的忍冬纹,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希腊式样的花纹,桂冠纹、爵床属纹(Acanthus)与卷草纹(Anthemion),也是安息常见的纹样。忍冬纹在萨珊朝发展成十分流行的纹饰,同样也在中国西部地区深入民间。在鲁利斯坦,忍冬纹实际由棕榈纹演变而来,莲花与忍冬常被当作太阳与月亮更迭交叉,象征着主管命运的天国的统治者^①。阿赫曼尼德的阿塔薛西斯在苏萨建造的宫殿,曾用三瓣莲花作为墙面釉砖的纹饰,并列的莲花呈直线展开,美观而又雄伟^②。莲花作为太阳的象征,在近东和中东由来已久。乌尔王陵金器中就以莲花为纹饰^③,后来又用于碗、杯之类的器皿。莲花被当作太阳,见于波斯帕利斯和苏萨宫殿的牛头柱,柱础即是莲花座^④。东汉时代,山东嘉祥武氏祠祥瑞图中,石刻“浪井”也以莲花作主题,图中七瓣莲花下部,左右两侧各有三瓣莲花,尤其和安息式样相仿。安息东部是忍冬、莲花与卷草纹饰的一大传导中心,这些纹饰通过中亚进入中国内地(图8),在石刻艺术、膏泥、木雕、毛织和丝织图案中组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对开创极其丰富多采的汉代工艺美术起到了添枝加叶的作用。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对鸟纹绮(图9),是一件十分完美的中伊合璧的艺术品。图案以极为自由的宽边菱形图样作为四方连续的构架组成,菱形边线内织以中国传统的回文图案。整个图像以对舞的双鸟和两两相对的两组卷草图像呈条形间隔展开。双鸟对舞,舞姿十分优美,采取了斯基泰和波斯艺术中常见的绕首回望式样,鸟首并有卷草组成的飘绶,与身子并行。图像所具备的飘绶、菱形方格和成对

①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A. U.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第6卷,2687页;第1卷,图87;第7卷,图114,117A。

②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2卷,第867页,图304。

③ 吴莱:《苏美尔艺术》(Woolley, *The Development of Sumerian Art*),图32。

④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7卷,图101,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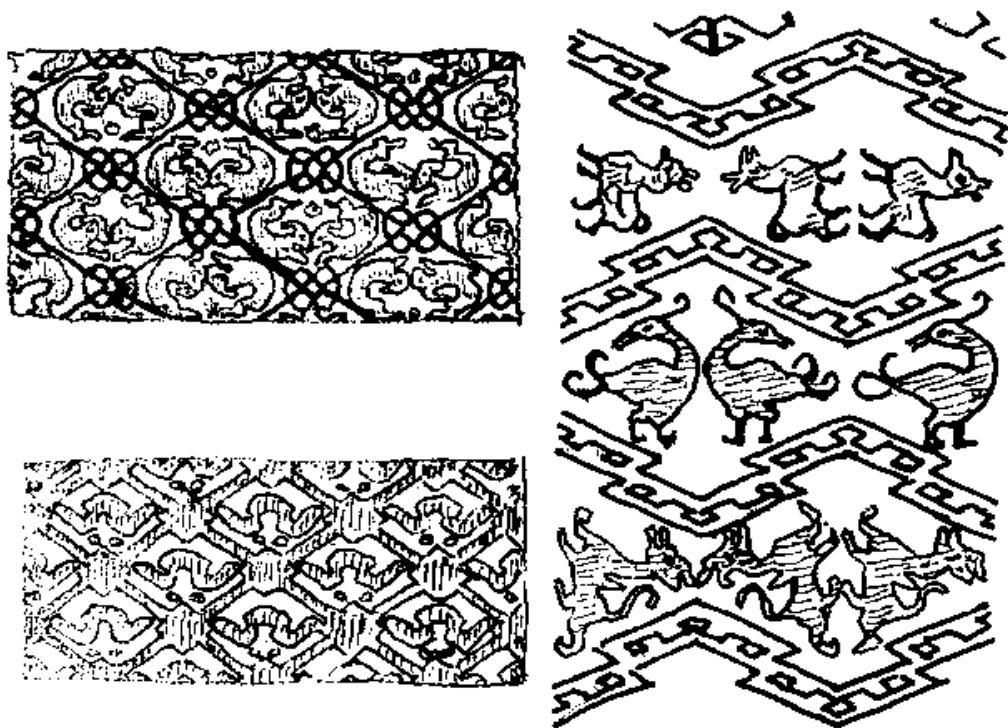


图8 楼兰出土汉代菱格忍冬纹绮(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

的飞翼,出现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汉墓,证实了这三种在萨珊波斯时代的流行图样,实际上早已通行于安息时代。^①

汉代丝织上的几何形纹,以双菱纹最为流行,在大菱形两旁角端通常另有两个小菱形。这类式样起源于波斯王室喜用的标记,以表示马匹或其他有角动物,借以显示身分与等级。一经进入中国,便纯粹成为一种装饰纹样而风靡一时。河南出土汉代用于墓室的空心砖上,也有这类图案。^②

马王堆汉绮中的对鸟,当系鸾鸟或舞鹤,作为写实的原本的,也可能是伊朗的鸵鸟(骆驼鹤)。图像所表现的,简直可以说就是《山海经》中“鸾

①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6卷,第2691页。

② 《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图45、图73。



图9 西汉对鸟卷草纹绮(长沙马王堆出土)

鸟自歌”的沃民国的景象。菱形方格条形展开的另一组卷草图像,有类似萨珊时代的忍冬纹绮的图样^①,更有盛开的莲花、石榴与葡萄叶,全自鲁利斯坦青铜器和波斯传统图样衍化而成。两两相对成四方形格子的卷草纹,起源于鲁利斯坦三叉式石榴纹,到萨珊时代而趋于成熟。汉代丝织物

^①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7卷,图201C,202C,199A。

中的这类图像,为安息纹样提供了实例。

除上述四种纹饰外,还有一种以波斯六瓣蔷薇纹为基本式样而加以变化的式样,即在四瓣对称花纹的下部两侧,再加上花瓣的图式,是汉代流行的纹饰。

塔松纹或松杉纹,是在汉代流行于河南墓葬空心砖上的一种纹饰。同样的纹饰早见于罗浮宫博物馆收藏的巴比伦萨贡王宫石刻森林浮雕,相当于公元前800年。波斯阿赫曼尼德朝的波斯帕利斯王宫浮雕,也使用了这种纹饰。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时间在成帝至王莽间(前32—6年),后壁山墙砖饰采用塔松作为上下两层装饰图案,中间以四排堆叠的菱形和立鸟为主体(图10),形成庄严肃穆的气氛,造意手法和精神境界完全受到伊朗模式的熏陶。同样的塔松以成双组合的方块,出现在山东济宁师专昭帝至王莽时期西汉墓群中^①。1984年出土于洛阳伊川县白元乡王庄村西汉墓中的空心砖(图11),也有成对塔松纹样。^②

汉代纹饰中的四蒂纹,以两两相对四向展开的鸡心联花为基本图式,富有匀称、恬淡的意趣,可以追溯到伊朗文化。马王堆汉绮在花样展示中,早就采用了这类花纹,后来又成为汉代铜镜常用的四蒂纹。1992年,安徽天长县三角圩西汉中期桓平墓出土双层银扣漆奩盖正中,也有鸡心形四蒂纹^③。这种纹饰脱胎于公元前1000年鲁利斯坦铜器的莲花、石榴相间纹,进入中国后,在西部地区开始流行。较铜镜为早,四蒂纹亦见于洛阳西汉墓和陕西绥德东汉墓石刻。1992年,洛阳南郊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出土蒂形铜饰一件,形制简朴^④。

①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师专西汉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9期。

② 《洛阳又发现一批西汉空心画像砖》,《文物》1993年第5期,第19页。

③ 《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9期,图版叁之3。

④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第9页。

1956年,绥德快华岭板佛寺内门楼和台阶上发现的汉墓石刻(现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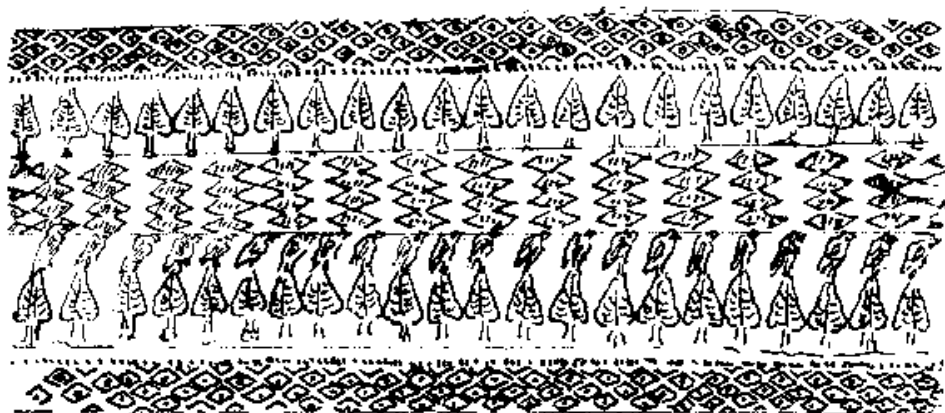


图10 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后壁山墙砖塔松纹

陕西省博物馆),有非常美观的四蒂纹(图12),尖叶下部左右内卷式的花纹和整个图像的排列,与鲁利斯坦纹饰如出一辙(图13)。石刻中并有波斯、希腊式样的卷草纹。卷草纹也见于绥德汉墓出土石刻门框上,门框刻有独角之马和具有细长双翼的瞪羚,上部边饰是希腊风格的卷草(图14)。瞪羚具有细长的双角,体形瘦削,翅翼亦细长,全系波斯式样,和乌克苏斯出土金银器中,一件波斯金质饮器柄饰上的瞪羚类同(现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不同的是,乌克苏斯的瞪羚翅翼丰满,雕刻更加细致。

葡萄在前汉时代引种于内地,成为酿酒的新原料,由此在社会上引起的振波,远远越出了饮食文化的领域,而在工艺美术上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纹饰,普及到丝织、毛织、铜镜和石刻图像中。葡萄原产伊朗,经由中亚细亚费尔干纳传入中国。葡萄在伊朗是丰收的象征,东伊朗流行收获葡萄举行盛宴庆祝,在印章和各种纹饰上广泛采用葡萄。同样在中国,首先在织锦中形成纹饰。汉初已有葡萄锦(蒲桃锦)。《西京杂记》说,尉佗将南越的鲛鱼、荔枝献给刘邦,刘邦回赠蒲桃锦四匹。汉武帝时,霍光的妻子也曾将蒲桃锦二十四匹赠给淳于衍。这种蒲桃锦是汉代极为华贵的织锦,且题材富有西域风味,更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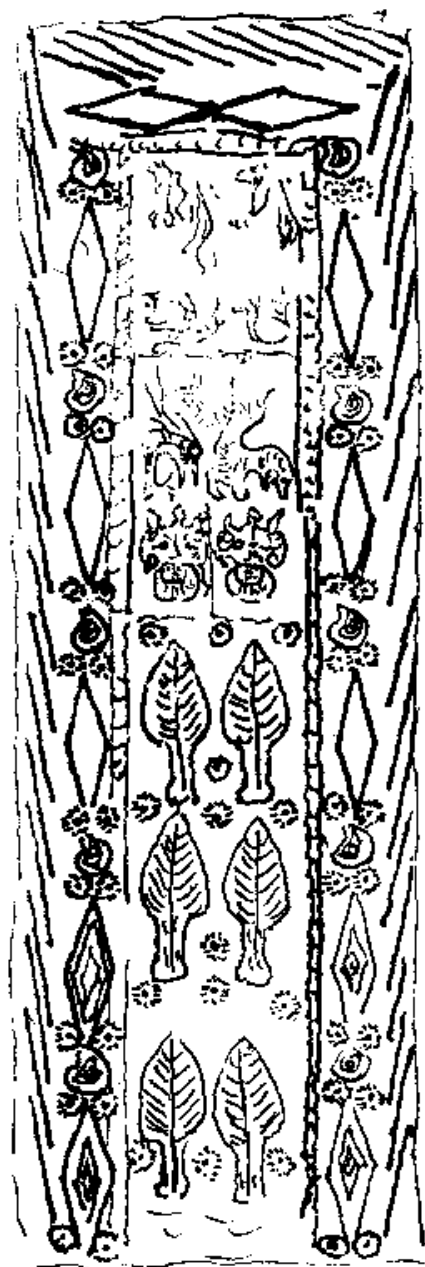


图 11 洛阳伊川县白元乡西汉墓空心砖塔松纹
(1984 年出土)

中国的锦绮外销通行无阻。新疆民丰、和阗先后出土各种葡萄纹饰的锦、绣、绮、罽。民丰出土东汉时期的菱纹绮、鸟兽葡萄纹绮，和阗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毛罽和纹绮，都有葡萄纹样。其中一件夫妻合葬棺中出土的黄色鸟兽葡萄纹绮女上衣，是内地织造；另一件绿地人兽葡萄纹罽，有卷发高鼻的塞人或吐火罗人采摘葡萄景象，是当地产品。

葡萄纹在汉代铜镜中造成一代新风。著名的海兽葡萄镜、海马葡萄镜，为数甚多，自宋代以来，历经金石家、考古家著录。海兽、卷草、四蒂与葡萄，是汉代铜镜中采自域外题材的四大纹样。自《宣和博古图》(铜镜 113 件)、《西清古鉴》(铜镜 93 件)、《西清续鉴》(铜镜 200 件)、《宁寿鉴古》(铜镜 101 件)、《金石索》(铜镜 174 件)以来，复经罗振玉、陈介祺、刘体智、梁上椿各家著录，多以千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河南洛阳、陕西、湖南、浙江、安徽又陆续出土许多汉镜。葡萄与海兽在两汉镜鉴中占有一定比例，这类铜镜制作精良、图案繁缛，是汉镜中的上乘之作。《西清古鉴》著录的汉海马葡萄鉴，径九寸六分，内层作有翼的飞马和海兽，外层更有飞禽，以

结枝葡萄和石榴点缀。《宁寿鉴古》中的汉海兽葡萄鉴(图 15)，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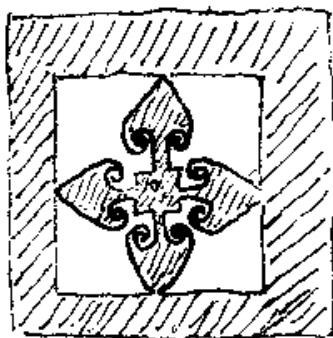


图 12 陕西绥德快华岭板佛寺汉墓出土石门四蒂纹(1956年出土)

寸四分，内圈列海兽四，外轮以鸟雀相配，环绕结枝葡萄和石榴，卷草为边。另一件海马葡萄镜，内圈铸有六头姿态不同的海兽，或立或伏或耸，中以三匹有翼飞马相隔，空间填满结枝葡萄；外轮铸有四头海兽、二匹飞马，中间杂以鸾凤、孔雀，再配以葡萄纹饰。这类铜镜都以兽首作镜纽，所以现在铜镜分类上称为兽首镜。兽首镜最突出的主题有四：海兽、翼马、葡萄、石榴，四者都由伊朗引入。所谓海兽，是因其来自海外，这类域外的野兽，实际

全系艺术化的狮豹。洛阳出土东汉铜镜，便有翼狮图像^①。翼马是翼兽中的一种，波斯古代以翼牛、翼狮、翼羊的图式最多，翼马是汉代工匠对西方骑马民族文化的一种加工与再创造，在波斯的成分外，当有中亚大宛、康居的因素在内。传递的媒介是居住于中国北方的匈奴部落各族，内蒙古扎赉诺尔出土的长方形圆角铜牌饰，就有展翅奔驰的飞马图像^②。值得注意的是，线条优美的飞马图像，在画像砖与铜镜之外，又见于汉代用于墓室的空心砖刻纹，河南洛阳等地出土的这类空心砖图像中，便有形象动人的飞马(图 16、17)。例如，1991年出土于宜阳县的西汉空心砖，图像是翼马左向守护牛角树，三马三树相间^③。

汉代，中国和安息装饰工艺的交流，其间关系之深，情分之切，实有一种使人认为在东自长江中游、西至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的广大地区上，属于同一工艺世界的感觉。

① 《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图五七。

②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12 期。

③ 《文物》1993 年第 5 期，第 23 页。又《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年版，图 30,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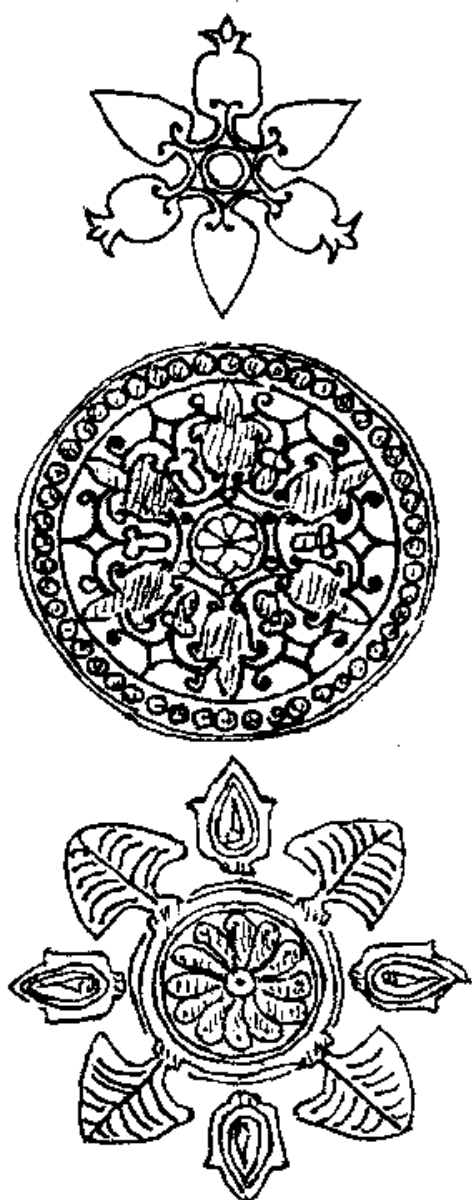


图 13 鲁利斯坦纹饰

(上)鲁利斯坦有嘴铜壶纹饰

(前 2000 - 前 1000 年)

(中)萨珊朝团花纹;泰西封宫墙纹饰

(下)萨珊朝团花纹;金属盘纹饰



图 14 陕西绥德东汉墓出土石刻门框

飞翼瞪羚卷草纹



图 15 汉代海兽葡萄镜

七、龙的变异

东汉中期开始出现的神兽镜,花纹以东王公、西王母神像和龙、虎、狮等兽形为主要题材,纹样属浮雕式。自 105 年四川广汉郡工官开铸环状乳神兽镜起,到建安年间(196—220 年)又出现了重列式神兽镜、同向式神兽镜、对置式神兽镜,三国孙吴更



图 16 河南宜阳县出土飞马空心砖(1991 年出土)

铸造了同心式神兽镜。神兽采取对置,也有伊朗与西亚艺术的影响在内。这类神兽镜的一个特点是,在中国北方,龙纹的狮形化,或者说龙、狮合一化。汉代纹绮已出现的狮纹,有叙利亚巴尔米拉出土的双菱四兽纹绮^①,四兽其实是形态相仿分成上下两组相向的四狮(图 18)。在这件一世纪的织物中,两两相对的狮子张牙舞爪,头上垂有鬃

^① 普菲斯特:《巴尔米拉出土织物》(R. Pfister, *Textiles de Palmyre*, Paris), 巴黎, 1934 年版, 第 43—44 页。



图 17 河南汉墓出土飞马空心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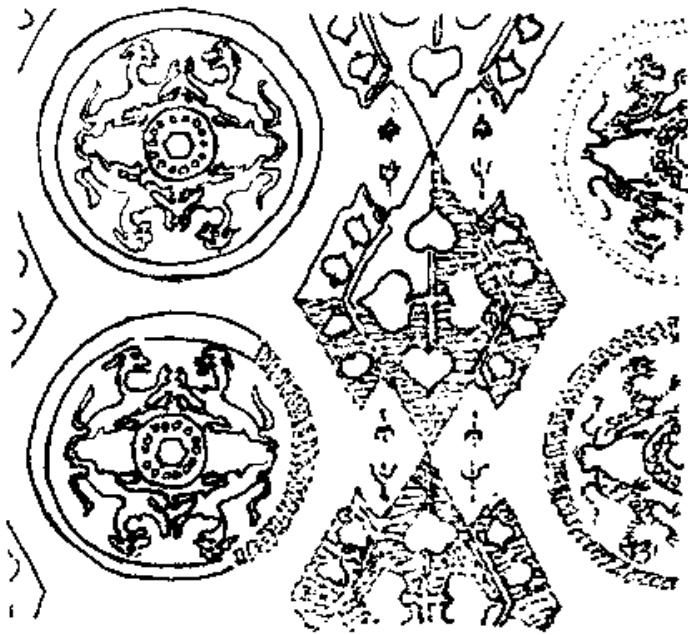


图 18 叙利亚巴尔米拉出土十一世纪双菱四兽纹绮

毛,尾巴上扬,四足奔腾。更值得注意的是,巴尔米拉的瑞兽纹绮,在菱格中成对的瑞兽,身呈狮形,头部则是生有双角的龙,是狮化的龙。这种龙与汉代西安瓦当、茂陵空心砖、长沙马王堆帛画上的龙虽然不



图 19 陕西绥德汉代王得元墓石刻门框翼龙

同,但差别中最重要的分野,在于龙体较之狮身更加细长而多折曲。龙首如鬣毛的双角上扬,而端部肥壮的尾,几乎和图像中的狮无甚差别。绥德王得元墓石刻门框(图 19)、榆林古城滩南梁村出土石刻门扇、绥德快华岭板佛寺汉墓石刻门扇^①、绥德义合镇 M1 石刻门扇上的翼龙,全是狮形走兽,头顶有绶带演变成的波状角,都属一世纪的遗物。龙的狮化开始于一世纪东汉与安息加速交往之际,首先出现在北方交通要道附近是不足为怪的,它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文化渗透的印迹。

龙在中国是四方之神中的水物,属于阴兽;狮在伊朗是太阳的化身,象征君权,它们各自在本民族的意识中起着崇高的指导作用。狮龙结合代表了东周以来阴阳交合观念,中国传统的龙与来自伊朗的异兽狮的结合,是一种文化上的融合与反馈。它们将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加以调和,在艺术上逐渐减少差别,增强共性。其成功的例子不在于汉镜上的表现,而在杂技与再现这种表演

^① 绥德快华岭板佛寺汉墓出土石刻门扇(1956年出土,《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图 57,58),与绥德后思家沟快华岭汉墓出土石刻门扇(1951年出土,《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图 34,35)的龙虎图像,因出土年代不同,原石有错配。原书图 34 的虎像门扇应与图 58 的龙像门扇相配,原书图 57 的虎像门扇应与图 35 的龙像门扇相配。

的画像砖雕艺术中。最突出的一例,见于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砖上的龙戏(图 20)。图像上龙表演的舞蹈组成杂技中的一个节目,龙自鼻以上有双角,身躯肥壮有四足,通体呈菱形方格,项下有贴身的短翼,细长的尾部有双头,是一头首上长角、尾端卷扬,具有飞翼的狮子。此龙的头部,仔细观察可以辨认出是山东、江苏出土东汉画像砖中最常见的鹿车中的鹿,其实是马的写真,只是在耸起的双耳之前又戏剧化地添上了两支牡鹿的长角。这一图像,足见在很少见到狮子的真实形象的山东,人们所能表现的狮、龙,也只能是马和传说中的神兽麒麟了。龙是中国传统的图腾文化的遗存,早在 6000 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葬中已经出现蚌壳堆积的龙虎图像,而狮子与多半是长颈鹿变异的麒麟,全是伊朗的成分。

中国传统纹样中的龙,由于波斯翼兽艺术所传导的上天成仙的灵魂升华思想,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龙文化故乡的黄河中下游添上了双翼。这种有翼龙可以在古代迦勒底文化中找到亲缘关系。迦勒底的龙,有四足,身上有鳞,且有双翼。^①

翼龙在古代称应龙,被认为始于秦,盛于汉。陕西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秦汉之际的瓦当,上有鸟翼、鳞躯、长颈、鸟喙、鳄或鲛足、鱼尾、



图 20 山东沂南汉画像砖龙戏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0 卷本)第 3 卷,第 652 页。



图 21 西安汉城遗址出土青龙瓦当(陕西省博物馆藏)

鳍脊的龙(图 21),具有黄河上游地区龙图腾的独特风格。所表示的翼,紧贴前胸,与躯体并行向背部施展,具有波斯阿赫曼尼德朝翼狮的表现手法。比秦瓦当时间更早一个多世纪,在北方太行山区,战国中期中山国的首都,现在河北平山县三汲乡,1977 年出土一件属于王室的刻铭铜方壶,在通长 62 厘米的壶身上,四边突出的柄饰作鱼尾形飞翼的龙,龙有二足,翼则耸于背部。以鱼尾分叉表示左右分列的双翼,是早期北方狄族统治下的华北平原对伊朗翼兽的一种图案化的勾勒。在同一时期的羌蜀文化中,有四川茂县南新乡牟托村在 1992 年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石器,在属于 I 式的铜纽钟图案中也有类似的有翼爬龙,但展开翼没有鱼尾分叉^①。河北定县三盘山在 1965 年出土的一件错金铜车伞铎(图 22),长 26.5 厘米,伞铎圆柱式

^① 茂县羌族博物馆:《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 年第 3 期,第 16 页,图二二;17 页,图二三。



图 22 河北定县汉墓出土错金铜车伞铤飞龙(1965 年出土)

展开的图像中有飞马、飞龙,属于西汉早期翼化的龙图像。这类翼龙以不同的式样在汉代各地展开,四川芦县王晖墓石棺画像石中的翼龙(图 23),图形单纯,体型瘦长,头上有自口部向后伸展的两条绶带^①。陕西绥德属于东汉永元十二年(100 年)的王得元墓画像石上的翼龙,则施展双翅,头有两羊角,一如常见于波斯的瞪羚,有四足、长尾。绥德快华岭板佛寺石刻门扇上浮雕的翼龙,则形象动人,刀法纯熟,就翼龙头上有伊朗式绶带,可以断作西汉时代。绥德后思家沟快



图 23 四川芦县王晖墓石棺画像石翼龙

^① 常任侠编:《汉代绘画选集》,朝花美术出版社 1955 年版,图三三。

华岭汉墓出土石刻门扇二,图像都是上部为相对的凤鸟,下部左虎右龙,龙首有绶带,而未见角,身有飞翼。进入东汉时代,在河南唐河、南



图 24 河南南阳县英庄出土东汉画像石应龙

阳英庄(图 24)、南阳东关、山东两城山出土画像石上出现的翼龙,头部绶带都已具有蜷曲的长角形象,一经进入内地,艺术风格便完全中国化了,只是龙身上的飞翼却凝固下来,明显的刻上了伊朗格调。

这种有翼的龙,到南北朝和唐朝又演变成胡天信仰中具有火焰形伸展的飞翼,江苏丹阳胡桥宝石南朝砖画墓东壁羽人戏龙砖画画



图 25 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墓盖龙纹

面的龙,有四撮火焰式飞翼^①。在北方,自五世纪起,壁画与石刻中的龙大都具有火焰式飞翼,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五号墓属高句丽洞沟墓群,壁画中多处显示的飞龙,都是这一类型的翅膀^②。在唐代,陕西三原县李寿墓石椁上的龙纹,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墓盖上的龙纹(图25),都有这种伊朗天神观念中的火翼,而龙身又明显地具有高足的狮形,集翼化的龙与狮化的龙于一身。

第三节 萨珊波斯和中国

一、使节和商旅

萨珊波斯的兴起,替代安息,统一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大力宣扬波斯文化,商旅络绎东来。但亚洲西部局势动荡,萨珊国王沙卜尔二世(310—379年)时西与东罗马征讨频繁,东又与贵霜帝国发生冲突。贵霜灭亡后,沙卜尔二世又卷入与哒的争战中。哒战败卑路斯(459—484年),取得赔款和土地。哒的势力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深入新疆西部于阗。此时中国西部的割据政权,也不断向西扩展。立国于甘肃的后凉(386—403年),势力及于龟兹(新疆库车)。北魏政权通过哒,和波斯建立了邦交。自455年到522年间,到达中国平城(大同)和洛阳的波斯使节共有十次。河北定县塔基发现的银

① 故宫博物院藏陶质龙虎纹井栏上,右龙左虎,龙身也有四撮火焰形飞翼,刻镂精细,定为汉代,可能略早。图见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图版29。

②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古墓清理略记》,《考古》1964年第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币中,有一枚伊斯提洋德二世(438—457年)的银币,边缘压印一行𐬀𐬀文字的铭文^①,显示了波斯银币曾经𐬀𐬀人之手流入中国北方内地。

435年(太延元年)粟特国使者来华后,北魏政权在翌年派出六个代表团前往西域,接着因于阗一道的畅通,波斯使者接连东来:

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冬十月,波斯、疏勒国并遣使朝贡。

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八月,波斯国遣使朝献。

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三月,高丽、波斯、于阗、阿裘诸国遣使朝献。

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年)四月,于阗、波斯国各遣使朝献。

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春二月,蠕蠕、高丽、库莫奚、波斯诸国并遣使朝贡。

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冬十月,𐬀𐬀、波斯、羯盘陀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春四月,高丽、波斯、疏勒、𐬀𐬀诸国并遣使朝献。

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闰七月,波斯、疏勒、乌菟、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

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闰五月,居密、波斯国并遣使朝贡。

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秋七月,波斯、不汗、龟兹诸国遣使朝贡。^②

波斯十次使团,前五次到达北魏首都平城,493年北魏迁都洛阳,后五次波斯使团便奔赴洛阳。

𐬀𐬀兴起以后,波斯的使者自宿利城(塞琉西—泰西封)启程,通

^① 《考古》1966年第5期,269—270页,图版陆3。

^② 以上见《魏书》卷五至卷九。

过于阗,东赴凉州(甘肃武威),进入河套后,过灵武、绥德,出河套,南线自离石,经太原,北上大同;北线经偏关或保德,渡黄河,抵达大同。第一次使团由波斯王伊斯提泽德二世(438—457年)派遣,其余四次都由卑路斯(459—484年)在位时派往中国。大同北魏遗址中出土有西亚风格的银碗和高足鎏金铜杯^①,大同西郊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萨珊银盘及高足银杯^②,大同南郊张女坟北魏墓葬中出土的波斯玻璃碗和鎏金刻花银碗^③,这些都是北魏前期建都平城(398—492年)时与波斯建立经济、文化关系的实物。

哒哒极盛时期,北魏迁都洛阳,波斯使团便由宿利城东赴洛阳。530年(梁中大通二年),波斯使团更与建都建康(南京)的梁武帝(502—549年)直接建交,使者所经大约通过临洮,经四川,沿长江东下。这是萨珊朝第十九位国王卡瓦德一世(Kavadh 488—531年)时,和中国北朝与南朝都有建交关系的一段历史。《北史》卷九十七将遣使洛阳的波斯国王的名字,译作居和多。《梁书》卷五十四则说“中大通二年,遣使献佛牙”。卡瓦德显然有意联络中国南方与北方政治势力,以与称霸中亚的哒哒人一决雄长。

西魏时代,波斯王库思老一世(531—579年)遣使长安,在废帝二年(553年)抵达。曼苏地在《黄金草原与宝石矿》一书中也说,此时有中国使者到达王庭。

隋代,好大喜功、穷极奢侈的炀帝(605—616年)盼望着一个万国来朝的盛世,派出了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李昱归国,迎来了波斯王库思老二世(590—628年)报聘的使者。610年(大业六年),炀帝在东都洛阳大会诸蕃酋长,正月十五,在端门街(皇城端门外大街)盛

① 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国宋元考古》(上)讲义,第107页。

② 《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③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参加演出的有一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通宵欢庆，所费万户。各国使团、侨民都允许到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受到免费款待。波斯使团一定也在其中。^①

唐初，萨珊波斯面临灭亡，波斯末王伊嗣俟（伊斯提泽德三世，632—651年）在贞观十三年（639年）派使者没似半到中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使者又献活褥蛇。这种动物像鼠，色正青，长九寸，能捕穴鼠。翌年，波斯使者频频抵达长安，旨在取得唐朝支援，以对抗阿拉伯人。不久，伊嗣俟在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死去。伊嗣俟的儿子卑路斯流亡吐火罗，654年曾向长安遣使告急。唐高宗以为鞭长莫及，没有给以军事援助。不久，吐火罗又遭到阿拉伯军队侵扰。龙朔元年（661年），唐朝派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到中亚各地分置州县，在662年正式册封卑路斯于锡斯坦的疾陵城（Zaranj），为波斯都督府的驻地。此后，波斯使者不断到达长安。《册府元龟》卷九七〇记：乾封二年（667年）十月，波斯国献方物。咸亨二年（671年）五月，吐火罗、波斯、康国、罽宾国的使者同时到达长安。

咸亨四年（673年），波斯王卑路斯兵败，流亡长安，授右武卫将军。他的儿子泥涅斯也随之入朝作质子。《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咸亨五年（674年）十二月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不久，卑路斯客死长安。

泥涅斯继承父亲遗志，希望能召集旧部，恢复故土，唐朝支持泥涅斯的行动，在调露元年（679年）派裴行俭率军护送泥涅斯归国为王，裴行俭只到了中亚细亚的碎叶镇，另行派人送泥涅斯到锡斯坦。泥涅斯于是客居吐火罗二十年，复国的计划终因大势已去，部落离散，难以成事。《册府元龟》卷九七〇，有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三月，波斯遣使来朝。七月，波斯国、林邑国并遣使贡献。大致可以推测是

^① 《隋书·炀帝上》，《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泥涅斯所遣使节,或来自波斯故土的商旅。这时泥涅斯虽聚集了部众数千人,然而难以抵敌阿拉伯人的势力。于是在景龙二年(708年)三月,泥涅斯又回到长安,唐朝授以左威卫将军。不久,泥涅斯也像卑路斯一样,客死长安。萨珊王族至此才告绝嗣。

开元、天宝以来,波斯的地方豪绅,特别是萨珊王室支系的陀拔斯单,仍在里海南岸保持独立,以 Iṣbahbadhs (Spādhapati) 的名义和中国继续往来^①,于是中国史籍中仍有波斯国的使团来华。开元五年习阿萨般国王使团的出现,便是波斯王族的使节。这些来华使团,常以波斯国名义,或以波斯王子的身份,或以波斯首领的头衔率领商业代表团来华朝献、贸易,因此,波斯虽早已并入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但它的使团却不绝于档册。下列使团,都以《册府元龟》记载为据:(下记卷数即《册府元龟》卷数)

开元五年(717年)六月,习阿萨般国王安杀遣使朝贡(卷九七一)。

开元七年(719年)正月,波斯国遣使贡石。

二月,波斯国遣使献方物。

七月,波斯国遣使朝贡(卷九七一)。

开元十年(722年)三月庚戌,波斯国王勃善活(Farrukh, c. 712—722年)遣使献表,乞授一员汉官,许之(卷九九九)。

十月,波斯国遣使献狮子(卷九七一)。

开元十三年(725年)七月戊申,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授折冲,留宿卫(卷九七五)。

开元十五年(727年)二月,罗和异国(Rishahr)大城主郎将波斯阿拔来朝^②。赐帛百匹,放还蕃。因遣阿拔赉诏宣慰于佛誓

^① 参见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6卷,第2673页。

^② 罗和异位于波斯南部布希尔半岛南端,据古代摩西(Moses of Chorene)记述,波斯湾最佳的珍珠贸易集散于此。

国王(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国王)。仍赐锦袍钿带,及薄寒马一匹(卷九七五)。

开元十八年(730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犀牛等。波斯国王(Farrukhān,724—731年)遣使来朝贺正(卷九七一)。

十一月甲子,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献方物。授折冲,留宿卫(卷九七五)。

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波斯王(Datburjmihir,731—740年)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僧及烈朝贡(卷九七一)。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744年)闰二月,封陀拔萨憐(陀拔斯单,Tabaristan)国王阿鲁施多(Khurshid,741—762年)为恭化王。唐朝因陀拔斯单保持独立,不受大食制约,以封王加强邦交(卷九六五)。

天宝四载(745年)三月,波斯遣使献方物(卷九七一)。

天宝五载(746年)三月,陀拔斯单国王遣使来朝,献马四十四匹(卷九七一)。

七月,波斯遣呼慈国(Keis)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卷九七一)。

闰十月,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遣使献千年枣(卷九七一)。

天宝六载(747年),封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为归信王。罗利支国王伊思俱习为义宁王。歧兰国王庐薛为义宾王。涅蒲国王谢没为奉顺王。渤达国王摩俱泔思为守义王。都盘国王谋思健摩河延为顺德王。阿没国王俱般胡没为恭信王。沙兰国卑略斯威为顺礼王(卷九六五)。

四月,波斯遣使献玛瑙床。

五月,波斯国王遣使献豹四(卷九七一)。

天宝九载(750年)四月,波斯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卷九七一)。

天宝十载(751年)九月,波斯苏利悉单国(Shulistan)遣使朝贡(卷九七一)。

天宝十四载(755年)三月丁卯,陀拔国遣其王子自会罗来朝。授右武卫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留宿卫(卷九七五)。

乾元二年(759年)八月,波斯进物使李摩日夜等来朝(卷九七一、卷九七六)。

宝应元年(762年)六月,波斯遣使朝贡。九月,波斯遣使朝贡(卷九七二)。

大历六年(771年)九月,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卷九七二)。

长庆四年(824年)九月丙午朔,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旧唐书·敬宗本纪》)。

萨珊波斯虽在651年被阿拉伯灭亡,波斯王族以卑路斯为首投奔长安,然各地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的波斯首领,直到771年为止,仍以波斯的名义率领使团奔波于伊朗与长安之间。这些使团多数属于贸易代表团,在中国声誉卓著,深受各界欢迎。波斯商人足迹遍及各地,长安、洛阳之外,西北的武威、张掖,东南的扬州、广州、豫章(南昌),也都时见波斯胡人。长安西市有波斯邸,为客商聚集的邸店,兼有交易与货栈的功能。扬州有波斯店,广州有波斯村。波斯人以他们的识见、财富,统驭了香药、珠宝贸易。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波斯人是以智慧(识宝)和阔绰(富裕)见长的国际商人。唐人李商隐《杂纂》卷上“不相称”条中,列有“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肥大新妇,先生不识字,居家念经,社长乘凉轿,老翁入娼家”,以为波斯无一人贫穷。长安城中的胡店、胡姬,其中就有波斯店、波斯姬,是首都最吸引各方人士的场所。

二、萨珊钱币的出土

萨珊钱币曾被广泛使用于常年熙来攘往的丝路各地,二十世纪以来,西起新疆库车,东至河北定县的中国北方,以及南方与波斯建立海上贸易的广东,陆续出土了三十六批萨珊银币,总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五枚以上。191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和高昌古城首先发现七世纪时的萨珊银币4枚,除2枚未能确定,其余2枚系荷马斯德四世和库思老二世时铸币^①。五十年代以后,在丝路沿线的十二个县中,续有发现,吐鲁番、陕县、太原、西宁、定县、西安、洛阳、耀县、固原等地都曾出上年代不同的萨珊银币。广东英德、曲江、遂溪自1960年后,也先后出上三批萨珊银币,共32枚。各地发现的萨珊银币,以1956年西宁城内城隍庙街出土卑路斯铸币76枚(原来过百,后有散失)、新疆乌恰山中在1959年发现的库思老一世和库思老二世式样阿拉伯币947枚、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在1964年出土的伊斯提泽德二世和卑路斯银币41枚为最可观。

萨珊朝的银币单位,均为德拉克麦(drachma),华尔克根据2000枚萨珊银币所得平均重量是3.906克^②。在中国吐鲁番高昌古城中发现的银币,属于沙卜尔二世(310—379年)的,有重4.2克的,固原隋墓发现的卑路斯(459—484)银币,仅重3.3克。

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其中786枚铸于沙卜尔二世至伊斯提泽德三世的三百年中,分属十二个国王铸造,据夏鼐的研究^③,数量

① 斯坦因:《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伦敦,1928年,第993—994页。

② 华尔克:《阿拉伯、萨珊钱币目录》(J. Walker, Catalogue of the Arab Sassanian Coins),伦敦,1941年版,XIVii页。

③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如下:

- 沙卜尔二世(Shapur II, 310—379年) 14枚
- 阿尔达希二世(Ardashir II, 379—383年) 14枚
- 沙卜尔三世(Shapur III, 383—388年) 7枚
- 伊斯提泽德二世(Yazdegerd II, 438—457年) 9枚
- 卑路斯(Peroz, 459—484年) 136枚
- 卡瓦德一世(Kavadh I, 488—531年) 1枚
- 詹马斯波(Jamasp, 496—498/499年) 1枚
- 库思老一世(Chosroes I, 531—579年) 5枚
- 荷米斯德四世(Hormizd IV, 579—590年) 1枚
- 库思老二世(Chosroes II, 590—628年) 593枚
- 布伦女王(Boran, 630—631年) 2枚
- 伊斯提泽德三世(Yazdegerd III, 632—651年) 3枚

另有“库思老二世样式”阿拉伯银币 282 枚(其中 281 枚发现于新疆乌恰山中),是阿拉伯乌玛叶朝时期波斯各地所仿制库思老二世样式银币,直径 2.3 厘米,较之 1955 年西安唐墓出土的库思老二世银币(重 4.1 克,直径 3.25 厘米)小,重量仅 1.8 克。乌玛叶朝时陀拔斯单仍保持独立,在 711—761 年间铸造“半德拉克麦”,花纹仿库思老二世,重量仅当半数,直径也大为缩小。阿拔斯朝兴起后,陀拔斯单虽被消灭,但当地仍继续铸造这种轻币,直至 812 年才告停止。也有将旧时德拉克麦加以剪边,在当地流通的。1928 年在库车苏巴什发现的,便是这种剪边银币。此外,在中国各地出土的,还有仿萨珊朝式的 1 枚(西安),未鉴定的 120 枚(其中第 16 批内的有 97 枚),锈损未能鉴定的 6 枚。总数 1196 枚。

萨珊王朝历代铸币,以库思老一世(531—579年)、库思老二世(590—628年)最多。库思老一世铸币地点多达 82 处,该王曾联合西突厥,破灭哒哒(白匈奴),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姆河。库思老一世的银

币已发现于西至地中海沿岸,东南至印度河流域,南抵阿拉伯半岛腹地,北达高加索山区的广大地区;他的银币还在西安附近的耀县和洛阳附近的陕县出土,就是两国使者和商旅往来的见证。库思老一世的孙子库思老二世(590—628年),也曾西侵叙利亚和利凡特,直抵埃及,贸易兴旺,铸造的货币数量极多,铸币地点达120处之多。阿拉伯乌玛叶朝在波斯境内所铸银币,都流行“库思老二世样式”银币。这种钱币曾在新疆乌恰山、吐鲁番各地发现,在西安附近亦多次出土,它的出土对于描述隋唐时代由新疆北道经河西走廊进入长安的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作用。

萨珊银币铸造地点,自巴赫兰五世(421—428年)开始,在背面加上铸造地点,以后所铸银币也都遵行此式。摩根统计的铸币地点,共有255处^①。中国出土的萨珊银币,凡在伊斯提泽德二世(438—457年)以后的,都有铸币地点的简写字母可寻,铸币地点都在波斯冬都泰西封以东的各省,分属米地亚、呼罗珊、法尔斯、库息斯坦、锡斯坦和克尔曼省区,都是中国与波斯商旅往来十分频繁的地区,它们铸造的货币沿着丝绸之路流入中国,是十分自然的。

在中国出土的萨珊银币,有作为贮藏物暂时贮藏起来的大宗货币,如新疆乌恰山的一批和西宁发现的窖藏货币;也有作为墓葬的随葬物埋入地下的,吐鲁番发现的高昌古墓中,死者口内常放置一枚货币,有的是“开元通宝”,有的是拜占庭金币或仿制品,而以萨珊银币为最多。这种风俗在中国自古已有,从死者口中含贝到秦汉时代改为铜钱。吐鲁番因地处与波斯贸易的前沿,较多使用萨珊银币,因而死者口中也常改用萨珊银币。在中国内地,萨珊银币还有用作金银珠宝装饰品的,有的出土银币钻有一、二个小孔或多个小孔,就是用来缀在衣料或帽子上作为饰品的。此外,佛教寺庙的舍利塔中,出土的萨

^① [德]摩根(J. de Morgan):《东方钱币学千册》,巴黎,1936年版,第297—299页。

珊银币,是被信徒们用来作为施舍物,以修“功德”而被埋入地下的。长安唐塔出土的7枚银币,被装在一个大银盒中,和骨灰同置于一瓷钵中。耀县隋塔出土的3枚银币和舍利3枚、隋五铢钱27枚,以及金、银、玉环等一起放在涂金铜盒内,被封入石函。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的41枚银币,和249枚铜币、金银饰物、琉璃瓶、钵,以及珍珠、珊瑚珠、玛瑙、料珠等同置于一石函中。这种作为珍宝奉献于佛的习俗,来自印度。今日印度贾拉拉巴德和巴基斯坦旁遮普的佛教舍利塔基中发现的舍利函中,也有珠宝与货币、舍利子同埋的,其中也有萨珊银币。

三、伊朗玻璃器

三、四世纪以后,萨珊玻璃器,特别是一些富有实用价值的食具开始输入中国。萨珊玻璃器以它特有的圆形突出球面装饰和球面磨饰,在东方别树一帜,中国也成为它的销售市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东京大学伊拉克、伊朗遗迹调查团先后两次在伊朗吉兰州东部的泰拉门遗址进行发掘,从帕提亚——萨珊时期的墓葬中获得了一批珍贵的玻璃器。

伊朗高原是古代世界中很早拥有自己的玻璃制造业的地区。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下,伊朗从事玻璃珠饰的制造。公元一世纪开始,伊朗在罗马玻璃的影响下,开始生产吹制玻璃器皿。萨珊时期,伊朗玻璃制造业欣欣向荣,公元三至七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业极为兴旺的时期,产品有玻璃珠饰和纺轮,并能制作精美的高级玻璃器皿,产品行销世界各地。玻璃碗、玻璃瓶是这个时期大量生产的主要器皿。与萨珊朝流行的联珠纹一致,玻璃制作也在浑朴的造型中,采用连续的圆圈作为纹饰。萨珊玻璃在器形和纹饰上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它精湛的磨琢工艺,继承了罗马玻璃工艺的长处,

发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艺,在玻璃碗上磨琢凹形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自然地形成许多个凹透镜,从这些凹球面,可以看到后壁数十个细微的圆圈纹,从而在视觉上出现一幅光怪陆离的图像。萨珊玻璃在罗马玻璃衰落之后,崛起于伊朗高原,为伊斯兰早期玻璃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的产品风靡世界,西至地中海,东抵朝鲜、日本,都曾是它的市场。

萨珊玻璃碗在西晋墓葬中已有出土,历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都有不同的发现,它们都可以在伊朗高原吉兰州的出土物中找到相似的器物。

伊朗吉兰州的出土物中,包括玻璃碗、瓶、盘和数量可观的玻璃珠饰和纺轮。玻璃碗都有圆圈形纹饰,可分为四型:^①

一型,为凹球面磨饰玻璃碗。在伊朗高原出土最多,流行时间最长,始行于公元一世纪的帕提亚王朝晚期,极盛于萨珊王朝,衰落于伊斯兰早期,即公元八世纪。据日本学者深井晋司统计,出土有一百多件。碗的器形可以在同期陶器中见到,是圜底球腹,碗腹用砂轮磨出成排的圆形纹饰,饰面呈凹球面,底部常磨成一个较大的凹球面,近底部一排的圆形饰多在七个左右。碗的大小不一,但以口径10—11厘米的中型碗数量最多。根据碗口的不同,又可细分为三式。Ⅰ式,口微敛,又可分为薄壁和厚壁两种,薄壁通常不超过0.25厘米。Ⅱ式,侈口,斜直壁,多是厚壁。Ⅲ式,口外侈,颈部明显,壁薄易碎。

二型,为突起的圆形凹球面装饰碗。器形为圜底球腹,敛口,圈足表现为一个直径较大的突起圆形凹球面,腹部有一排或两排突出的圆形凹球面装饰,每排约七个左右。玻璃色泽多为淡绿色和淡褐色,口径在10厘米上下,碗壁厚实,腹部圆饰系成形冷却后磨琢。二型碗数量少于一型碗,约始于三世纪,流行于四、五世纪。

^① 深井晋司、高桥敏:《ペルシアのガラス》(波斯玻璃),《淡交社刊》,1973年。

三型,为同心圆装饰碗。是二型碗的变体,在圆形凹球面装饰周围刻出一圈凹槽,形成同心圆。腹部在同心圆纹饰外,常磨出一些辅助条纹。这一类型的碗壁都很厚实。流行于四、五世纪。

四型,为乳突装饰碗。通常是无模吹制成形的薄壁碗。侈口,颈微收,腹部和底部有乳状突起装饰,圜底。哈桑尼·马哈拉(Hassani Mahale)7号墓出土一件完整的乳突装饰玻璃碗,最大腹径处有九个类矩形乳钉,下腹部有十个细长的龙骨突起,底部有十个小乳突围成一圈,代替圈足。四型碗的制作工艺与前三型碗不同,前三型装饰纹样都是由砂轮磨琢而成,四型碗装饰纹样是在玻璃炉前趁热粘贴或钳夹成型。四型碗流行时间较早,公元一至五世纪的墓葬都有出土,而以帕提亚王朝晚期最盛。

在中国出土的伊朗玻璃碗,时间不早于萨珊朝,自西晋至北周的墓葬中见有以下几件:

(1)北京西晋华芳墓玻璃碗。1965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发掘时,将残片误认为料盘。1985年9月,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室复原成功。这件玻璃碗圜底、球腹,颈部微收,侈口。高7.2厘米,口径10.7厘米。腹部有十个椭圆形乳钉列成一排,一般高出碗壁5毫米,长径10—15毫米,短径5—11毫米。底部有七对突起的乳钉,排列成椭圆形,形成圈足。华芳碗通体呈淡绿色透明,含有大小不一的气泡和条纹,透明度较差。碗壁较薄,为1—2毫米,最薄处在口沿部分。腹部乳钉有明显的水平条纹,与器身玻璃条纹呈明显的复合现象。制作工艺采用无模自由吹制成型,腹部乳钉是趁热粘贴,底部对刺是在炉边趁热用小钳子挑夹而成。这件玻璃碗,属于吉兰州玻璃碗中的四型。

(2)大同南郊张女坟北魏墓磨花玻璃碗。1988年在大同张女坟M107出土完整玻璃碗一件,淡绿色透明,有小气泡。口微侈,圆唇,肩部有两道阴沿纹形成的宽沿,球腹,圜底。腹部外壁用冷加工法磨

出四排内凹的竖式椭圆形纹饰,底部由六个相切的凹圆纹饰组成。口径 10.3 厘米、腹径 11.4 厘米、高 7.5 厘米^①。这件玻璃碗由无模自由吹制成型,纹饰在成形冷却后经砂轮打磨而成。

类似大同南郊北魏玻璃碗的制造物,曾大量发现于伊朗吉兰州三至七世纪的墓葬中,大同玻璃碗出土墓葬群,形成于 398 年拓跋珪由盛乐迁都平城以后,下限在迁都洛阳以后的六世纪初^②。出土玻璃碗是五世纪吉兰州产品。

镇江句容六朝墓出土的一件完整玻璃碗,也属同样的纹饰与工艺。这件玻璃碗在 1985 年出土,侈口、球腹、圆底,颈微敛,碗腹有六排凹球面圆饰相互错列,形成龟甲形纹饰,采用冷加工磨琢工艺。句容玻璃碗纹饰与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四至五世纪的白琉璃碗相似,同样是萨珊制品,时代亦应在四至五世纪。

1978 年在湖北鄂城五里墩 M121 西晋墓出土玻璃碗残片,残片为淡黄绿色,透明度好,有小气泡。推测是球腹、圆底玻璃碗。碗颈部微收,侈口,口径 10.5 厘米,壁厚 2 毫米左右,腹部有两条阴弦纹和三排椭圆形稍内凹的纹饰,靠近底部的一排有八个椭圆磨花,上两排磨花数目不清。底部也有一个直径较大的圆形内凹纹饰,可以见出磨痕。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残片,属钠钙玻璃。^③

这类萨珊磨花玻璃碗,通过北魏流入日本。日本橿原千冢 126 号墓(四世纪末)也出土了器形、纹饰、工艺相同的磨花玻璃碗。千冢 126 号墓碗的口沿,和大同南郊北魏墓玻璃碗一样,由火烧成圆唇。和这不同的是,鄂城碗的碗口沿业经磨平。大同碗和千冢 126 号碗都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 年第 8 期。

② 大同南郊墓葬以永平元年(508 年)元淑墓为最迟,见大同市博物馆,《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 年第 8 期。

③ 建筑材料研究院等:《中国早期玻璃检验报告》,《考古学报》1984 年第 4 期。

属伊朗一型Ⅲ式薄壁碗。

萨珊磨花玻璃碗是玻璃器皿中的杰作,也是富有实用价值的珍贵的食具,因而不仅在中国北方,深受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喜爱,而且沿着长江行销中国南方,时间之早,还在萨珊波斯使者抵达北魏都城以前。

(3)新疆楼兰出土玻璃碗及同类玻璃残片。二十世纪初,英人斯坦因在楼兰L·K遗址的五、六世纪墓葬中,发掘了一件浅绿色透明玻璃碗,平底侈口,腹部有三排凹球面的圆饰,靠近底部的圆饰为七个。碗高5.6厘米、口径6.7厘米、底径2.4厘米。斯坦因又采集了一批圆形磨花玻璃残片^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新疆博物馆和新疆考古研究所也收集了不少萨珊玻璃残片,其中有和阆买利朵瓦堤遗址的菱形磨饰玻璃残片。

楼兰碗的纹饰与制作工艺,和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被定为四至七世纪的淡褐色透明玻璃碗相同,和朝鲜庆州皇南洞98号新罗墓葬出土的五至六世纪的玻璃碗类似。庆州碗腹部有六排椭圆形凹球面磨饰^②,与楼兰碗同属一型Ⅰ式。

(4)北周李贤墓出土玻璃碗及巴楚突纹玻璃残片。1983年秋,宁夏博物馆在固原发掘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完整的萨珊风格玻璃碗。玻璃为淡黄绿色,含有很小的气泡,但分布均匀,透明度良好。碗内壁光洁无锈,外壁主要在下腹部和底部有金黄色的风化层。口沿有水平磨痕。碗壁厚约4毫米,口径9.5厘米,高8厘米,腹深6.8厘米,下腹最大径9.8厘米。外壁突起的圆形纹饰有两排,上圈6个,下圈8个,有的呈长椭圆,有的呈扁椭圆。圆饰呈凹球面突起,上

^① 斯坦因:《亚洲腹地》(A. Stein,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年版,第190,199, 212, 220, 224, 756, 760页。

^②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新罗双坟庆州98号古坟》,汉城,1975年。

下错落不齐。底部圈足由突起凹球面构成。玻璃碗重 245.6 克,比重 2.46 克/厘米³,X 荧光法无损检测,显示不含铅钡,属钠钙玻璃。^①

李贤墓玻璃碗气泡小,透明度好,显示玻璃原料较纯,含铁低,熔制温度较高。碗腹突起的圆形纹饰与碗壁浑然一体,是由于一次成型,采用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艺。碗壁厚薄不匀,外壁磨痕明显。磨琢后的碗通体经过抛光,但有些部位不易被抛光,仍见有磨痕。李贤墓出土玻璃碗与吉兰州出土物相比,属于二型,是件厚壁、经过精工制作的有模吹制成型的玻璃碗。这种类型的伊朗玻璃碗,在中国有完整出土,尚属首次。

和李贤墓玻璃碗的色泽、工艺和装饰手法相同的玻璃,有新疆博物馆在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佛寺中采集的两块淡黄色稍泛绿色的突纹玻璃残片,根据遗址年代定作四至五世纪。较大的一块残片,长约 6 厘米,宽约 4 厘米,厚约 3—4 毫米,是玻璃器腹残片,上有两个突起的圆形饰,其一直径约 3.5 厘米,呈凹球面,其二直径约 0.7 厘米,饰面平坦,圆饰高出器壁约 3 毫米。较小的一块残片,长约 4 厘米,宽约 3 厘米,与较大的残片同属一器腹部,上面有两个突起的小圆纹饰,直径 6—7 毫米。两块玻璃残片透明度良好,外壁基本光洁,但可看出曲率不一,有高有低,外壁经过打磨和抛光。^②

在日本,与李贤墓玻璃碗同样来源于萨珊波斯的,有冲之岛的突纹玻璃残片,在福冈县宗像神社冲之岛 8 号祭祀遗址出土^③,残片为同属一件的玻璃容器腹部的淡绿色透明玻璃两块,内含气泡,壁厚 3 毫米,外壁一个突起的凹球面圆饰,高出外壁 3—5 毫米,与李贤墓玻

①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1 期;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②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③ 《宗像冲の島》,宗像大社复兴期成会,1978 年。由水常雄:《东洋のガラス》,三彩社 1977 年版,第 101 页。

璃碗纹饰相同,时间定为五至六世纪。同属伊朗吉兰州二型玻璃碗。

中国、朝鲜和日本出土的五至七世纪的玻璃碗及残片,经检测,都属钠钙玻璃,并非本地制造。这类玻璃器的形制、纹饰又都见于同时期伊朗的陶器和石器。圆形或椭圆形凹球面纹饰早在帕提亚时期的陶器上便常见,突起的凹球面装饰也流行于帕提亚和萨珊时期的玛瑙、水晶制作的印章和指环,因此这类玻璃碗的主产地便是伊朗高原。

中国出土的萨珊玻璃器,在上述几种类型的玻璃碗以外,还有伊朗吉兰州三至七世纪中生产的细颈香水瓶,在河南洛阳关林 M118 唐墓出土。这种玻璃瓶翠绿透明,外附很厚的金黄色风化层,细颈,球腹,微凹底。在二十世纪初洛阳墓葬中已有出土,现存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古物馆。洛阳细颈瓶可以在吉兰州出土的细颈瓶中找到它的原型^①。洛阳关林细颈瓶的残片,经化学分析,属于钠钙玻璃,镁和钾的含量较高,与萨珊玻璃接近,当属吉兰州产品。

西安何家村八世纪前后窖藏中发现的凸圈纹玻璃杯^②,也是一件萨珊玻璃器。玻璃杯平底侈口,无色透明,稍泛黄绿色。口沿下有一条阳弦纹,腹部有八组纵三环纹,属吹制成形,圆形纹饰是用热玻璃条缠成。玻璃杯与日本正仓院保存的七世纪蓝色圆形纹饰高柄杯相似^③,当是萨珊朝制品。

输入中国的早期伊斯兰玻璃器,大部分也是伊朗产品。伊斯兰玻璃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的工艺,在器形和纹饰上广泛吸收了波斯的传统产品,到九世纪逐步形成别具一格的新颖风格。它生产的刻花玻璃瓶、直桶杯、侈口把杯和玻璃盘,都曾行销中国北方,在长城附近和关中地区出土。主要出土物有:

① 深井晋司、高桥敏:《波斯玻璃》,淡交社刊 1973 年版,图 34。

② 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 年第 1 期。

③ 正仓院事务所编:《正仓院の宝物》,朝日新闻社 1965 年版,第 84 页。

(1)石榴纹黄玻璃盘。1987年在陕西扶风县城以北十公里法门镇发掘法门寺唐塔地宫时发现大批珍贵文物,地宫封闭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遗物是唐代皇室遗留的奉献物。出土玻璃器20件,其中玻璃盘13件,多属早期伊斯兰时期玻璃器,为九世纪上半叶制品。据地宫石刻献物账,玻璃器大多是僖宗李僮所供奉。这批玻璃器大致都不出九世纪,或者是阿拔斯朝定都萨马拉时期(838—883年)的产品。石榴纹黄玻璃盘,敞口,折沿,圆唇,浅腹,直壁,平底,内壁黄色,花纹涂黑,口沿外缘饰有一周联弧纹,腹壁饰两周弦纹,底部绘有石榴纹饰。底外壁有铁棒痕。盘高2.7厘米、外径14.1厘米、腹深2.4厘米。盘的纹饰在黄底上采用平涂笔法的黑色石榴花苞,形成强烈对比,风格接近在萨马拉出土的具有中国风采的九世纪白地青绿花叶纹碗^①。同样作风的装饰手法在九、十世纪曾流行于两河流域和伊朗。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黄玻璃盘就是双方在玻璃制造业中交流技艺的实物。这批玻璃器对早期伊斯兰美术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发现。

(2)十字团花纹蓝玻璃盘。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这件珍贵文物,敞口,折沿,双唇,腹壁斜收,平底,内底心如同黄玻璃盘凸起,底外壁亦有铁棒痕。内底图案正中花心为方格纹,方格内刻虚实相间的小斜方格纹,从中心方格向四方展现出半圆带尖花瓣,以缠枝和葡萄叶纹,烘托出居中的十字形花。盘高2.3厘米,口径20.2厘米,底径17厘米。这种十字形团花,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早期埃里陀(Eridu)彩陶平盘图案,后期的演变则可在瓦伦几亚的十五世纪早期西班牙—摩尔式金色闪光釉盘的纹样中见到类似的痕迹。^②

(3)刻花蓝玻璃盘。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刻花蓝玻璃碗有四瓣花纹、

① 莱斯:《伊斯兰艺术》(David Talbot Rice, *Islamic Art*, Rev. ed.), 1975年版,图32。

② 莱斯:《伊斯兰艺术》(David Talbot Rice, *Islamic Art*, Rev. ed.), 1975年版,图154。

八瓣花纹和刻花描金盘各一件,镌刻的技艺成熟,线条流畅自然,是传世的早期伊斯兰玻璃器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这些花纹均为大约四世纪中叶沙卜尔二世时期凯希(Kish) I 号宫殿所采用的装饰款式,虽然凯希宫殿所用的是灰泥泥漫,但也常见于各种流行的纹饰中。

(4)刻花玻璃瓶。刻花和磨花相仿,同样用冷加工方法,差别在于刻花用的砂轮直径较小,形成的图案线条较细较深,不如磨花,常呈平面或凹面。河北定县北宋五号塔基曾出土 20 件玻璃器皿,经 X 荧光分析,其中 8 件系进口的伊斯兰玻璃^①。一件刻花玻璃瓶,泛淡蓝色透明玻璃,甚光洁,颈粗短,折肩,桶形腹,平底。颈部、腹部和底部刻有几何形花纹,属十世纪伊斯兰世界流行款式。同类花瓶还出土于安徽无为舍利塔基,建造年代是公元 1036 年^②。另有两件出土的玻璃瓶,形制与刻花玻璃瓶相同,透明度较高,一件壁较厚,约 0.3~0.5 厘米,一件壁薄,约 0.1 厘米。与定县五号塔基刻花玻璃瓶纹饰相仿的玻璃瓶,瓶颈较长,呈扁平侈口,出土于浙江瑞安慧光塔,兴建年代为 1034 年^③。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收藏的纳沙布尔出土的十世纪水瓶,形制与瑞安玻璃瓶一致,刻花与定县玻璃瓶完全同一风格。定县玻璃瓶年代早,器形大,经 X 荧光分析,是钠钙玻璃,属伊朗产品。

(5)深蓝细颈玻璃瓶。定县五号塔基出土深蓝色透明玻璃瓶,呈长球形腹,圜底,不能竖放,颈部有旋转的纹路,爆口,系无模自由吹制成型。在伊朗东部纳沙布尔遗址,曾多次发现九至十世纪的同类产品,细颈,折肩,腹部细长,圜底^④。定县细颈瓶,经 X 荧光分析,是钠

① 河北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 年第 8 期。

② 《无为宋塔出土的文物》,《文物》1972 年第 1 期。

③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 年第 1 期。

④ 乌斯:《纽瓦克博物馆藏古玻璃》(Susan H. Auth, *Ancient Glass at the Newark Museum*, New Jersey),新泽西,1976 年版,第 166 页,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 年第 4 期。

钙玻璃,含一定量的钾。这种瓶子是装香水或香药用的,平时置于囊中。伊斯兰世界所用的灌注大食蔷薇水的玻璃瓶,就是这种细颈玻璃瓶,在宋代曾屡见记载。

(6)直桶杯。定县五号塔基出土两件直桶杯。一件蓝色透明,上腹部有白色风光层,桶形直壁,平底,口沿部烧口成圆唇。另一件无色透明,器形、工艺均与前一件相同,但杯较小。同样的直桶杯在伊朗科尔干九至十世纪的遗址中有发现,但定县直桶杯没有刻花,玻璃成分经X荧光分析,确定是钠钙玻璃,含有一定量的钾。

(7)绿色把杯。辽宁朝阳姑营子辽代耿延毅墓出土一件深绿色透明把杯^①,器型属伊斯兰世界所独有。口部粗直,微鼓,肩部突出,腹部扁形下收,圈足。口与肩部之间有一扁圆把手,把的上端有一上翘的短柱。这种把端上翘的柱形器,见于九至十一世纪西亚伊斯兰世界的玻璃器、金属器和陶瓷器。同类玻璃杯曾出土于伊朗科尔干遗址。日本正仓院藏白琉璃瓶,把的上端也有短柱,因此被确定为伊斯兰玻璃。

(8)金盖鸟形玻璃瓶。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在1988年出土鸟形金盖玻璃瓶一件^②,器形完整,圈足,卵形腹,细颈,口似鸟首,上安子母口式金盖,柄上的短柱似鸟尾。瓶通高16厘米,腹径8.5厘米。瓶内立一长颈弧腹小瓶。该瓶形制奇特,通体呈淡绿色,轻薄透明,是伊朗玻璃珍品。北塔地宫题记有辽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年)重修字样,玻璃器是十一世纪初期制品。

(9)乳钉纹黄色玻璃盘。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出土物中的黄色玻璃盘,器形普通,叠沿外卷,腹壁陡直,但腹壁有凹凸的乳钉纹,发掘

①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集刊》1983年第4期。

②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

报告称这种纹饰是凹凸均匀的编织纹,酷似柳条筐篾纹样,是国产玻璃中所未见,应是伊斯兰时期伊朗产品。

伊朗玻璃器自三至十一世纪行销中国,在北方尤其常见。伊朗玻璃对中国西晋至北宋年间玻璃工业的兴起具有重大的催化作用,在生产技术、工艺水平和地域分布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影响。

中国早期玻璃制造吸收了罗马玻璃工艺的特点。从北魏起,玻璃器皿的制造,普遍采用无模吹制法,其中也有伊朗玻璃制造系统的技术因素。隋代从铅钡玻璃转向含氧化铅 60%的高铅玻璃,正是为更好地适应无模吹制。隋代利用何国(Koshania)移民后裔何稠的广博知识,制造成功名为绿瓷、“与真不异”的绿玻璃器皿。何稠在开皇初年官居都督,升任御府监、太府丞,是个精通波斯工艺的能工巧匠,在仿制波斯锦和重建玻璃业成功后,官封员外散骑侍郎。出土的五批十三件国产玻璃器皿,其中十二件就是绿玻璃,只有一件是蓝色小杯。它的样本就是真品的伊朗玻璃器。何稠的伯父何妥,任国子祭酒,是个中亚人士。何稠的祖父自国外移居成都,在武陵王纪门下管理财务致富,号称西州大贾。通过何稠,伊朗工艺与中国传统玻璃技术合成一体,开始了北方玻璃业的新纪元。

萨珊玻璃技术和原料配制法,在中国北方推动了钠钙玻璃的生产,使用了铁棒技术,在中国玻璃制造史上步入一个效法西亚玻璃制造工艺的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器皿,见于西安郊区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八件完整的玻璃器^①,其中四件(蓝色小杯、绿色小杯、无颈瓶、绿扁瓶)底部有采用铁棒技术留下的疤痕,两件玻璃小杯(高 2.4 厘米、口径 2.8 厘米)与无颈瓶,经 X 荧光分析,为钠钙玻璃。相似器形的玻璃小杯,已见于隋代姬威墓,也常见于隋代瓷杯,器形之小,与伊朗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2—23 页。

玻璃杯口径在 10 厘米以上差别很大,是中国自制的钠钙玻璃。无颈瓶多气泡和杂质,原料中含铁量偏高,比进口的钠钙玻璃要差,底部铁棒疤痕深凹,反映技术不熟练。玻璃质量不稳定,是熔制钠钙玻璃的技术不纯熟,铁棒技术也属初次应用^①。这两项技术在唐宋时代的玻璃制造中,已较多地被使用。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茶托,铁棒遗痕明显,工艺技术已渐臻成熟。

伊朗玻璃制造技术通过中亚,在新疆立足,使十至十四世纪新疆有了当地生产的钠钙玻璃。这种钠钙玻璃熔制质量粗糙,没有纹饰,氧化硅和氧化钠的含量较低,氧化钾、氧化镁和氧化铝的含量高于钠钙玻璃,推测是利用新疆普遍易得的土硝作助熔剂而生产的玻璃制品^②。新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收集的玻璃残片,有若羌瓦石峡遗址的发掘品^③,和阆叶城锡提牙遗址出土的淡绿色玻璃残片属于宋元时期,伊犁元代阿力麻里古城遗址的绿色玻璃残片,喀什木尔吞木遗址的暗黄色半透明玻璃残片,都是钠钙玻璃,外貌和成分也都相似。新疆宋元时期的玻璃制造,比较明显地受到中亚和伊朗同行的影响。

四、工艺与艺术的交流

萨珊波斯的工艺继承了安息时代以来的某些希腊、罗马风格,而更以发扬波斯民族工艺为特长,在金银器、玻璃器、陶器、石膏、石雕、铜器、珠宝首饰、织物等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在萨珊波斯统治的东部地区,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希腊技艺继续在新的背景下求取生存,这使萨珊波斯的工艺和艺术,长期接受了希腊、罗马格调的表现方式。

^{①②}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③ 张志刚:《中国古玻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1卷第1期。

而在五世纪三十年代末,与南下吐火罗的哒人展开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中,萨珊波斯在它的东部边境的工艺制造上,留下了许多哒的烙印,随之向中国扩散。

1. 金银器

最早的萨珊金银器,是作为珍贵的礼品送往北魏都城平城(山西大同)的。398—493年间,北魏在这里建都,波斯的使者也活跃在北方的这一通都大邑。1970年,大同南郊墓葬出土了一件海兽纹八曲银洗(长杯),口径23.8厘米,高4.5厘米。银洗呈八曲椭圆形,底部镂刻海兽纹,是萨珊产品^①。同一处窖藏出土三件鎏金高足铜杯和一件鎏金银碗,萨珊波斯与希腊、哒风貌互相掺合,可能是在阿富汗或萨珊东部制作。银碗形制是安息时代便有的圜底碗^②,侈口,颈微束,碗腹有四组忍冬纹与爵床植物纹饰组成的图案,将器壁等分为四,中间各有一两道圆弧组成的圆环,环内捶雕的人物头像是男子的侧面,鼻高额宽,波状发,前后修剪匀称,戴圆形瓜皮小帽,头发外露。这种碗也曾由哒统治时期的撒马尔罕制作,被收藏在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只是哒人物所戴帽子足以覆盖整个头部,与大同银碗上人物的帽子仅压在头顶中央略有不同。因此还不足以论定此碗是哒制品。^③

1988年冬,大同南郊张女坟北魏墓群又出土了一件形制相仿的鎏金刻花银碗^④。银碗同样侈口,口沿以下微敛,圆腹,圜底,口沿下及上腹边缘均饰有细小的联珠纹,碗腹以爵床属叶纹将全碗等分为四,当中有一双弦圆环,内有一形态相仿的男子侧面像,男子深目高

① 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②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7卷,图137。

③ 说见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鼻,长发垂肩。此碗口径 10.2 厘米,高 4.6 厘米。同墓出土的刻凹圆纹的玻璃碗,是萨珊制品。银碗所用爵床纹在萨珊时期被广泛采作银器、料器和石刻的纹饰。著名的塔克·伊·波斯坦岩窟石雕,也曾将这类花纹作为主要纹饰,是富有王家气度的装饰手法。银碗中的免冠男像,或者就是塔克·伊·波斯坦所奉献的萨珊王卑路斯。

年代稍晚于大同银碗的萨珊银器,有 1981 年大同所出北魏景明二年(501 年)封和突墓的银盘^①、1983 年宁夏固原南郊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银壶^②,风格相仿,都有希腊罗马风,同时又具有明显的萨珊艺术特征。广东遂溪窖藏银碗,为花口圈足碗,相当于南朝时物^③。封和突墓银盘属于四世纪下半叶至五世纪末的制品,鎏金银壶约为五、六世纪之交的产品。李贤墓银壶通高 37.5 厘米,是具有鸭嘴状流的长颈瓶,上腹细长,下腹圆鼓,最大腹径 12.8 厘米,单把高圈足座,座高 8 厘米。这种采用喇叭形圈足的鸭嘴单把长颈壶,兴起于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四、五世纪时再度复兴,出现了带节的并以联珠纹装饰的高圈足银器,五至七世纪曾流行于中亚,见于乌兹别克的巴拉雷克节别壁画。六、七世纪以后,中国也出现了这种形式的银杯。李贤墓银壶腹部三组图画,都像萨珊同类银壶所表现的内容,属于奉献给丰收女神阿那希的图像(图 26、27)。这类银壶的一个突出标记是:壶颈腹相接处、壶腹与高圈足座相接处,以及足座下部,分别焊铸数目不等的高浮雕联珠纹。李贤墓银壶的这些联珠,上部是十三个,下部是十一个,底部是二十个。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这类银壶共五件,其中三件被定为萨珊制品,两件属于“萨珊后”制品。李贤墓银壶形制与其中的两件相仿。因李贤墓银壶壶柄上部

① 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文物》1983 年第 8 期。

② 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考》,《文物》1987 年第 5 期。

③ 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 年第 3 期。



图 26 萨珊朝阿那希女神银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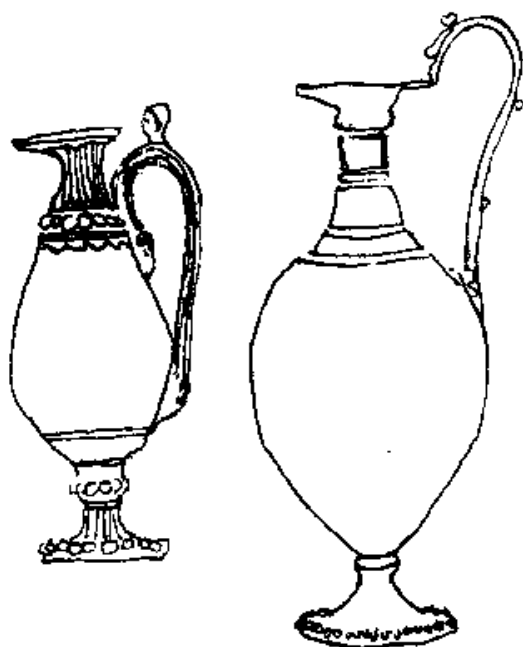


图 27 北周银壶与罗马银壶

(左)李贤墓银壶 (右)罗马银壶

饰有一高鼻戴啾哒式小帽的人物头像,因而有认为该壶为啾哒统治区制作的。但李贤墓银壶的萨珊特征明显,人物像类似中亚式样,有可能是萨珊东部制作,以适应外销的需要而采用的一种款式。

2. 角杯

波斯式样的角杯原名来通(Rayton),在六、七世纪时流行在北齐、隋、唐统治下的中国北方。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安阳出土北齐画像石上,一群人在葡萄荫下聚集饮酒,为首者高举牛首角杯,此杯或为银质,或为瓷制,形制与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白瓷牛首杯相仿,杯上并有波斯风格的忍冬纹。北齐画像石上的

饮酒者,均戴鲜卑式毡帽,举杯的方式是以牛首对饮者,杯口向上。这类角杯为后期角杯的演化。与白瓷牛首杯相同的白瓷狮首杯(不列颠博物馆藏,图 28),特点是杯口呈八曲侈口,与波斯原型已大不一样。但这类牛首角杯,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牛首银角杯形



图 28 唐代白瓷狮首杯
(不列颠博物馆藏)



图 29 银角杯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 30 唐代玛瑙兽首杯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省
博物馆藏)

制极为相似(图 29),银角杯长 14.2 厘米,与 1970 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玛瑙兽首角杯尺寸相近。何家村玛瑙兽首杯(图 30),长 15.5 厘米,高 6.5 厘米,以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琢成。上口近圆形,下部兽首如牛,而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兽首口鼻部装有笼嘴状的金帽,卸下后可见内部有流,酒可自流中泄出。通体光亮晶莹,为中国的孤品。角杯上部呈扁长形施展,杯口与兽首的牛角端处于同一平面。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银角杯,还有形制与上述相仿,只是银角杯口缘更有一圈萨珊式联珠纹饰,牛首并有翼形鬃毛,鬃毛上部则有奔驰的瘤牛、羚羊等神兽。西安何家村玛瑙兽首杯应是一件窖藏主收藏已久的艺术珍品,制作年代当在六世纪左右。

七世纪末,波斯角杯在中国已渐被三彩把杯所替代。代表作有西安南郊唐墓出土的三彩象首杯,象首利用上卷的鼻制作把柄,杯形仍

有角杯体制,但下端已无泄水孔,把杯也自西方移植,但图像雕镂全系中国唐风^①。洛阳苗湾和湖北郢县李徽墓出土的三彩龙首杯,更具有中国式把杯的形貌。李徽葬于嗣圣元年(684年)。这类兽首把杯的出现,显示了波斯式样的角杯最后已在中国内地社会中消失。

3. 绘画

萨珊艺术在六朝、隋唐时期,是除罗马、印度之外,对中国艺术风格具有重大影响的外来艺术。来自伊朗东部的一些画师首先进入新疆,在三四世纪的米兰壁画中留下了他们创作的色彩鲜明、具有线形白描手法的波斯画风。后来在六至八世纪的新疆石窟壁画中,又再显身手,构成了龟兹艺术的基本格调。拜城克孜尔千佛洞中的画师洞、海马洞都是六、七世纪的作品,库木吐拉骑士洞壁画是七、八世纪之作,克孜尔千佛洞中的摩耶洞骑士壁画则已晚到八世纪上半叶,画题虽是印度佛教故事,而画风与骑士服式则全属伊朗色彩。克孜尔千佛洞的穹窿天井(藻井)采用菱形鳞状交叠图案,画出人物、动物、树木,在新疆风行于六、七世纪的石窟艺术中。

吐鲁番哈拉和卓高昌故址的摩尼教寺院壁画,都用萨珊式白描线画,色调也以白色为主,自然有当地画家的参与,在七、八世纪时主宰着天山南麓东部地区的绘画艺术。其中有二十世纪初发现的最有价值的表现摩尼和其随从高僧的壁画(今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编号IB6918),同一时期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现的表现摩尼教施主的壁画(今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编号IB8381),以及在柏孜克里克第17窟发现的三千树摩尼教壁画,在高昌故址出土的表现摩尼教男女选民(僧侣)的丝画,绘有摩尼教徒进行忏悔、末日审判的摩尼教经书残叶的细画和在摩尼教寺院旗幡上的各种绘画,都有浓重的伊朗画风。二十世纪初出土于此地的摩尼教经书扉页上有摩尼

^① 陕西省博物馆编:《陕西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图87。

教乐师和忍冬、卷草花饰,乐师服装全为萨珊束腰袍裤。在一页摩尼教抄本上,左边绘有二帧神像,其一穿着伊朗式大翻领服,右边的中古波斯语,据翻译是:“这些高贵的施主,还有那些我没有提到名字的施主,愿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共生,愿他们从本经中得获应得的功德。阿们!”

4. 联珠纹饰

萨珊波斯流行的联珠式鸟兽图样或联珠纹,自五世纪末进入中国内地,六至七世纪风行一时,直至九世纪中叶尚有其余绪。联珠纹作为装饰图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 800 年胡尔西巴德的萨贡王宫小厅堂的壁画,壁画有上下两行长翅膀的人物组成,底边用联珠纹作边饰,在图形的上部有两道圆拱门,最外边的一圈也用同样的联珠作装饰^①。但联珠纹作为太阳崇拜的象征而普遍流行,是在萨珊时期。在中国新疆和甘肃,联珠纹见于壁画、雕塑、陶瓷、丝织品中,同时也在六、七世纪内地的金银器、玻璃器中作为新颖的纹饰而被采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有联珠纹图像,以联珠绶带立鸟最典型。同样在雕塑艺术中,例如克孜尔麒麟窟佛像的座身是石雕的联珠纹麒麟。在甘肃和陕西,联珠纹也用于敦煌 420 窟西壁菩萨塑像裙上的纹饰和敦煌 220 窟东壁维摩变中帷屏装饰。公元 582 年,陕西三原县双盛村李和墓石棺盖上的浅雕,也使用了这种波斯纹饰。在石雕和装饰艺术上,萨珊式样的忍冬、卷草纹饰,经过中国工匠的巧妙演化,已融合成中国民族式样(图 31、32)。

金银器制作中,联珠纹与卷草纹都被赋予外来的新颖风格而进入艺术意象。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就采用联珠唇,喇叭形八棱圈足,足沿也饰以一周联珠。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掐丝团花金杯(图 33),则将联珠变为腹部四朵蔷薇团花边缘的小金珠^②,可说是

① 埃及尼阿玛特·伊斯梅尔·阿拉姆:《中东艺术史·古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7 页,图 196。

② 韩伟:《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文物》1988 年第 10 期,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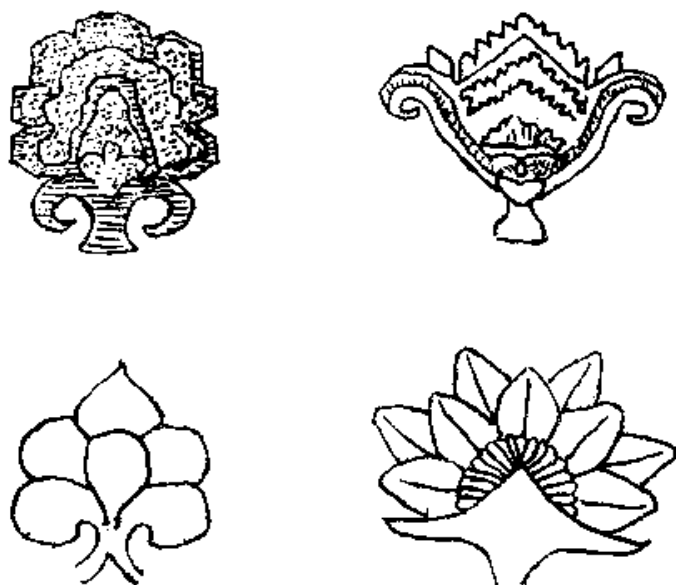


图 31 萨珊朝忍冬纹
 (上)丝织品 (下左)银壶盖
 (下右)塔克·伊·布斯坦石刻

中国工匠吸收联珠纹后的一种新创造。

九世纪中国工匠制作的银器,小到银箸,也用联珠为饰。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鎏金四出花纹银箸一双,箸上段鍤饰四出团花,鱼子纹地,以弦纹和联珠纹为栏界,纹饰鎏金。同一地点出土的两件玻璃杯(FD5:039),腹壁外鼓,壁面装饰以菱纹为中心的五组花纹,各组之间以两竖行联珠纹相隔,是国产玻璃杯采用联珠纹的实例。

联珠纹金银饰物,长期为中国上层社会人士所爱好,因而不断输入内地。1987年宁夏固原隋代骠骑将军史射勿(544—609年)墓中出土鎏金桃形饰(图34),外沿便以联珠纹为饰,中央镶嵌贝饰、宝石、绿玻璃,正是这类输入物。同墓出土条形镶嵌珍珠与玻璃珠铜饰(图35),残长9厘米,条饰一边亦是流行的联珠纹,中心嵌有圆形白色珍珠,另一边为菱形与椭圆形相间,嵌有玻璃珠。1981年,洛阳伊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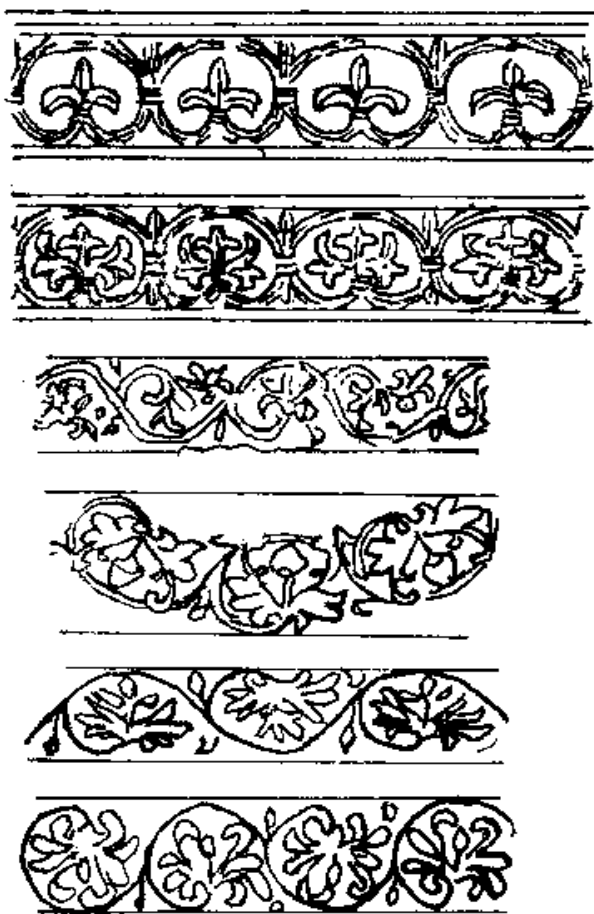


图 32 南北朝忍冬花纹

自上而下：云冈石窟第 9 窟前室北壁浮雕（484—489 年）

云冈石窟第 10 窟前室北壁浮雕（484—488 年）

云冈石窟第 12 窟前室北壁浮雕（5 世纪末）

东魏天平二年（535 年）石灰岩三尊佛立像（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河南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忍冬花纹砖（萧梁）

河南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忍冬花纹砖（萧梁）

寨唐墓出土高足银杯一件，腹部卷草纹，底部锻印联珠纹一圈，亦是萨珊式器。埋入年代较晚的萨珊式银执壶，有 1975 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北部早期辽墓中出土的一件带柄银扁执壶，底部外缘有联珠一周。

与以上这些伊朗式金银器饰同时输入中国的，还有镶宝金戒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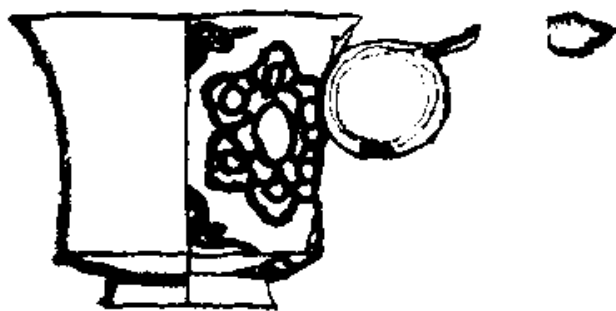


图 33 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掐丝团花金杯



图 34 鎏金联珠桃形饰

(陕西固原隋代史射勿墓出土)



图 35 联珠莲花条形铜饰

(陕西固原隋代史射勿墓出土)

这类环状镶宝戒指，在固原隋代史射勿墓中有出土，最大径 2.9 厘米，镶嵌物已不存，重 30.2 克。同类戒指早见于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为中国北方民间时兴的一种装饰品。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制造的金银器，开始摆脱过去仿照萨珊式八棱带柄杯、高足杯、带柄扁执壶和多瓣椭圆盘的式样，而改用传统的碗、盘、盒、壶，同时在花纹中大量运用引进的卷草、忍冬、爵床属纹饰^①；在器形的型式上，将喇叭式圈足、带柄饰件等来自伊朗和西亚的艺术特征融合在唐风的器物之中。

① 平山县西生沟 1964 年出土唐代菱花式宝相花铜镜，用四面不同的团花装饰，纹饰为葡萄、莲花、爵床纹，设计精巧，为唐式铜镜中的精品。《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图 331。

五、民俗和竞技

伊朗和中亚商人、移民成群结队进入中国北方内地,对当地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的渗透,在五世纪末以北魏拓跋政权的迁都洛阳开始,步入新的堂奥。表现在对人世和来世的观念上,在佛教、道教以外,更有胡天信仰对善恶、光明与黑暗所渗现的无穷魅力。墓葬制度的变化,反映出文化面貌的变革。西北地区,在北魏早期便已流行斜坡墓道,并有过洞、天井的土洞墓。宁夏固原彭阳新集北魏墓是较早的一座^①,后为北朝沿袭,如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②、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如墓。隋、唐时期,以西安为中心的地区普遍流行长墓道、多天井的土洞墓是由来已久的。

六世纪开始出现在北方墓葬中的镇墓兽,是伊朗和西亚地区翼兽艺术与文化传统的流传。这类镇墓兽陶俑与其他陶俑一起合葬,往往出现在一些出身陇西,或有中亚血缘、胡天信仰和深染胡风的高层人士的墓葬中,以洛阳为中心向北方各地辐射,流风所及东被冀、鲁。镇墓兽在六、七世纪中常见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八世纪二十年代,即唐玄宗开元年间退出社会,这一段时间也正是萨珊波斯通使洛阳,及其王室后裔流亡长安的时期,因此这一风气的出现,也与波斯文化的东进关系至深。

早期陶镇墓兽表现为形制简朴的人面兽身蹲坐式俑。河北曲阳嘉峪村在1964年发现北魏营州刺史韩赧的妻子高氏墓。这座在孝文帝正光五年(524年)安葬的墓,属于皇亲国戚,墓主的妹妹是孝文帝的文昭皇后,死者侄女即宣武帝的皇后,因此颇具规模,墓中有随葬

① 宁夏固原博物馆:《彭阳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第9期。

② 《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陶武士俑、陶胡俑、陶女俑和陶镇墓兽两件。两件镇墓兽制作朴素而圆纯,均作蹲坐式样,背部呈一斜线,背上均有三簇火焰式卷毛。一件兽形,张口欲噬,高 28 厘米;一件人面,头戴尖顶胡帽,须发成簇,前肢作五指状,高 27.5 厘米^①。这种镇墓兽的源头,实出自洛阳的胡风。

同一作风的镇墓兽,以更为圆纯的表现手法出现在山西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中(图 36)。该处在 1987 年出土镇墓兽两件,形制质朴,一件人面,头戴尖顶兜鍪,络腮胡须卷曲;一件狮首蹄足,两件通高 33.5 厘米^②。表现出浓厚的伊朗文化气息。



图 36 山西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镇墓兽

镇墓兽在山东出现的历史同样悠久。据 1973 年山东寿光李二村贾思伯墓出土的墓志及《魏书》、《北史》本传,贾思伯(468—525 年)历任兖州刺史、凉州刺史、太常兼度支尚书、殿中尚书等职,并任侍读,讲杜氏春秋于显阳前殿,孝昌元年死于洛阳,同年归葬青州。贾思伯墓出土陶镇墓兽一件(图 37),兽面高鼻瞪眼,头长独角,一如瘤

①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 年第 5 期,图版拾壹,1、2。

② 《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 年第 12 期。

牛,背上火焰形竖毛,既高又尖,蹲坐在底板上,高23.6厘米。墓志说



贾氏“齐郡益都县钓台里人也。其先乃武威之冠族。”贾思伯出身陇西,卒于洛阳,归葬山东,因此山东墓葬中出现镇墓兽,其源乃始于魏都洛阳。

与贾思伯相仿,出身陇西、归葬山东的,有临淄(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南黄山北麓的崔氏墓葬群,是北魏官僚崔鸿及其族人的墓地。崔鸿曾修北魏高祖、世

宗起居注,撰作《十六国春秋》。他的长子崔混,字元子(三号墓),墓中出土有陶镇墓兽

一件,人首兽身蹲坐,背有三撮火焰形短鬣毛上竖,尾上翘,高仅21.2厘米^①。崔混(505—538年)天平年间反对北魏政权,被他叔父崔鸱所杀。

镇墓兽的安置,不仅是一种传扬京都文化的标志,也显示墓主位居北魏或其后北朝京官、贵戚的一种礼俗。在河北河间县南冬村1972年发现的东魏墓和山西太原西南郊沙沟村1980年发现的隋代斛律彻墓的镇墓兽,都是卒于洛阳的高官后来归葬他处墓中所出。墓志载斛律金、斛律明月、斛律武都、斛律彻四代历仕北齐、北周与隋朝,世袭王公。所出镇墓兽,一件人面,高40.9厘米;一件兽面,高39厘米。人面镇墓兽戴尖顶胡帽。引人注意的是,两件镇墓兽身上的鬣毛以具有更显明的双支火舌的装饰手法,表现为火焰的状貌。这和原本朔州狄那人的斛律氏的宗教信仰应有关系。突厥事火、信奉胡天,而斛律氏历代显贵,曾祖斛律金,官齐相国假黄钺、咸阳忠武王。祖斛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图版贰壹,2。

律明月,齐左丞相、咸阳嗣王,周赠使持节、上柱国、恒朔赵安燕云六州刺史、崇国公。父斛律武都,尚义宁公主,除驸马都尉、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西兖、梁、东兖三州刺史,太子太保,周赠使持节上开府、怀平郡三州刺史。斛律彻本人在隋代蒙除使持节仪同大将军,袭祖崇国公^①。不难见出,此类火焰形背光的镇墓兽,实出于胡天信仰,是一种波斯文化背景的表露。

入唐以来,京师长安、洛阳仍然在墓葬中有镇墓兽。河南偃师和西安曾多次出土镇墓兽,形制也由初唐(高祖至高宗)时期的沿袭隋代,发展到中唐(武后至中宗或玄宗开元初期)时期的讲求修饰、体积加倍构制。

河南偃师在1988年发掘唐代光州定城县令柳凯夫妇墓,出土镇墓兽大小各两件,大的两件通高51厘米,一件人面,一件兽面;小的两件,人面的通高31.5厘米,兽面的通高32厘米。大小形制相仿。大型兽面镇墓兽,头顶有叉形双角,肩侧有半月形双翼,背有锯齿状鬣,蹄足,作蹲坐式。前胸以红、绿色绘卷曲胸毛,双翼绘红色卷草纹,眉及胸部涂金。大型人面镇墓兽,二目圆睁,隆鼻阔口,招风大耳,头顶生一螺形黑色尖角,肩两侧有半月形翼,背有锯齿状鬣,蹲踞。墨描眉毛、眼睛,耳、鼻、口涂红,胸毛以红绿两色彩绘^②。柳凯墓志称,柳凯在武德九年(626年)死于县邸,贞观廿三年(649年)夫人裴氏亡故,在麟德元年(664年)合葬于偃师县亳邑乡邙山之南。墓葬中镇墓兽和其他陶俑大致可以分出两套,可见随葬品都是初葬时物,属于洛阳地区初唐墓葬^③。镇墓兽形制的翼化与凶兽形象,都是唐代的特征。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管会:《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

② 《文物》1992年第12期,图版捌,4。

③ 徐殿魁:《洛阳地区隋唐墓分期》,《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与柳凯墓陶镇墓兽同一类型的,有偃师杏园纪年唐墓中李嗣本墓和李延祜墓出土的两套镇墓兽各两件。李嗣本,陇西成纪人,上元二年(675年)终于宁州录事参军任上,景龙三年(709年)与夫人范阳卢氏合葬。李延祜是李嗣本之子,终于垂拱二年(685年),景龙三年(709年)与夫人合葬^①。镇墓兽代表了武后至中宗时期的規制,但形体已大为增高,李嗣本墓的人面兽身镇墓兽(图38),



图38 河南偃师杏园唐代李嗣本墓镇墓兽

通高75厘米,兽面镇墓兽通高75.4厘米。李嗣本官职不高,而镇墓兽及随葬文官俑、武士俑,形体高大,文官俑通高87.2厘米以上,武士俑通高93厘米。唐代镇墓兽規制远较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代

^①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

为盛。

西安地区唐墓镇墓兽形制也和洛阳偃师相仿,到玄宗开元(713—741年)年间,尺寸更大。西安东郊红旗电机厂唐墓出土镇墓兽两件,造型与开元十一年(723年)鲜于庭海墓出土镇墓兽类似^①,通高95厘米。

在山西太原金胜村唐代壁画墓中也曾出土唐高宗时期的镇墓兽^②。

墓葬中出土镇墓兽,源出汉代墓葬中以方相氏镇墓的习俗^③,使用具有伊朗格调的守卫宫殿神庙的神兽形象,随葬以保护死者坟墓的安宁,是六世纪以来,北方信仰祆教的两京官员所倡导的一种象征权力与富豪的信物。所以,此风之起,传自陇西,陕西唐高宗乾陵墓道中列有鸵鸟,也是波斯风余韵。镇墓兽陶俑的制作则是异域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以长安、洛阳为主,波及山西太原、山东淄博、寿光,以及河北河间等地。开元后因禁止民间岁祀胡天,波斯王室后裔在长安没落,于是此风便不见于天宝年间了。

北方墓葬中出现的镇墓兽陶俑,不同于帝王陵墓前大型的石雕镇墓神道。在长江流域的南方,伊朗式样或希腊式风格的石雕艺术,则以一种更为宏壮的气势和传递形式凝聚在南朝各代帝王陵寝之前。现存南朝陵墓石刻,以圆雕的石麒麟、天禄、石狮环列王陵墓道,分布在南京和丹阳周围。南京附近的有二十五处,丹阳周围亦有十处左右。南京宋武帝刘裕(420—422年)陵前石麒麟,梁萧秀墓前石狮,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管会:《太原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③ 参见1991年发掘洛阳偃师县辛村新莽壁画墓前室勾栏门壁画,《文物》1992年第12期。

景安陵前神兽,陈文帝陈蒨(560—566年)陵前麒麟、天禄,丹阳梁武帝萧衍(502—549年)陵前石麒麟,均属一时杰作。石兽肋下都有贴伏胸后的飞翼,式样已非伊朗或亚述石雕翼兽中的多层鳞状飞翼,而是中国传统式样的波形、浮云纹和鱼鳞钩形。石兽雕刻技法,已较东汉雅安高颐墓前飞翼石兽远为纯熟,而飞翼尚有东汉余韵。长江下游现在江苏南部的石兽艺术,大约由西亚经四川顺江传递,同时在五世纪和六世纪初,又受到来自海上的印度佛教艺术的激励,成为长江流域一种新颖的圆雕艺术。

唐代流行的马球,名为打毬(球),又称击鞠,是一种源自古代伊朗的竞技“波罗毬”。“波罗”一名在中古波斯语中是棍棒,波罗毬戏,就是棒毬,“毬”字也来自波斯语中的 *gui*。参与这种毬戏的人,以棒击毬,习称打毬,和汉魏以来步打足踢的蹴鞠(足球)不同,所以又称击鞠。打毬的人都骑马,以鞠杖争击波罗毬,以先击中网囊的获胜,称作头筹,得筹则以龟兹部鼓乐唱好,以示庆贺。

伊朗的波罗毬曾西传君士坦丁堡,东则经中亚传入吐蕃、中国、印度、高丽、日本,是昔日亚洲体育界人士所共同爱好的一种毬类运动。封演《封氏闻见记》说,唐太宗时,因西蕃(河西)人善于打毬,皇帝亲自提倡,叫宫人传习。在升仙楼街坊上也有西蕃人打毬,献媚于太宗。中宗、玄宗都深好波罗毬戏,于是波罗毬不但在宫廷中成为流行的娱乐项目,而且权贵们也都在长安府邸修筑毬场。景云年间,吐蕃派使者到长安迎金城公主,中宗在梨园亭子安排打毬,当时玄宗李隆基是临淄王,已在毬场上大显身手,使吐蕃的毬将无能为力。玄宗即位,斗鸡击毬是诸王常事,上好击毬,由此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都修筑毬场,甚至洒油以求平滑。玄宗以后,文武百官都以击毬为时尚,穆宗(821—824年)、敬宗(825年)都沉溺毬戏,宣宗(847—858年)、僖宗(873—888年)都是打毬能手。长安宫城中有毬场,宫城北的毬场亭,就是中宗时安排球赛的梨园亭子。大明宫东内院龙首池



图 39 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墓砖雕马毬像。

里村金墓砖雕马毬图

马毬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融马术与竞技、娱乐于一身;唐代宫人也有打马毬的,已成一项男女均宜的体育运动。宋、金时代,北方马毬不衰,以至元明。1983年在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末元初的墓葬中,发现有表现马毬的砖雕(图 39)。该墓砖雕共七十八块,在东壁须弥座上嵌有六块马毬、马戏砖雕,马毬砖雕共四块,宽 21.5 厘米、高 25 厘米。打毬者头扎软巾,身穿长袍,足蹬马靴,左手执缰,右手持偃月形毬杖,骑马腾跃,并有打背身毬的精采场景。明人则有四骑争毬的打马毬图,都是马毬运动的生动场景。

第四节 元代中伊文化交流

1253 年秋,旭烈兀奉蒙哥汗的命令西征,进军伊朗,随军率有一批占星术士、医生和大批熟谙火炮、火器的军事技术人员。1256 年旭烈兀平定了伊朗境内的木剌夷人;1258 年攻陷巴格达,使国祚已逾

六百年的哈里发帝国就此灭亡。忽必烈继位后,旭烈兀在伊儿汗的名义下和大都北京保持着宗藩关系,使用汉文的印玺。蒙古境内的驿政制度、分封制度和军事制度以及法律条款,都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得到移植。伊儿汗统治集团维护了蒙古百户、千户、万户制的军事统治方式,实行贵族子弟宿卫的“怯薛”制。并将蒙古军事统领的分配制度沙余儿合勒(Soyurqal)建立在波斯流行的赋税制度伊克塔(iqtā')之上,以保障军队的给养;照样定期举行各地宗王和贵族共商国是的庆典忽里尔台,颁赐名为“质孙”的袍服等蒙古国俗,使伊朗社会的蒙古风大为流行。与此同时,中国和伊儿汗国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在忽必烈统治的中国和蒙古本部推行波斯语和波斯生活方式,使双方的交流进入又一个高峰。

一、回回学

元代为加强国际联系,特别是和亚洲西部大国伊儿汗国的往来,将波斯文的学习列入国家高等学府的课程,正式开设回回学,以培养国际商务和外事活动的合格人才。忽必烈决定仿照蒙古国子学的先例,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八月设置回回国子学。《元史·选举志·学校》称:“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上之职,凡公卿大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回回国子学中讲授的亦思替非文字,原是波斯国家文书中专门用于财务税收的诏书、清算单据、税务文书的文字,具有特定的写法和规则。亦思替非文字出现在公元前六七世纪萨珊时期,因政府专设称为阿玛尔(amār)的财政税务部,管理全国财务,亦思替非文字便全面

推广^①。这种文字类似缩写符号或象形文字,只表意不标音。当时称作阿玛尔文字(amār dabire)。伊斯兰时期继续被新组建的贡赋部使用。“阿玛尔”这个词被阿拉伯语译作“亦思替非”,意为“财产税务的核算与管理”。掌握亦思替非文字,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它是帕拉维语的一种简化了的特殊文字。在中国新疆出土的摩尼教徒用于纪年的文字,已见使用这种文字。^②

元代回回学曾由国子学扩充成国子监,学生人数既有增加,官员也由原设五名添员,其目的在为各部门和各地关卡培养“译史”人员。“译史”即波斯文翻译人员。回回国子学可说是中国在大都北京创设的第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所传习的课程、学识,离不了伊斯兰教义、法律,以及商务知识、波斯语法。回回国子学也是培养从事国际事务的专门人才的机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际关系学院,训练的人才首先是面向伊朗(伊儿汗国)和通用波斯语的亚洲西部和地中海世界的。1330年以后,由于涉外事务的紧缩,裁去回回学士,由待制兼管。^③

二、天文学

元代,中国天文学面临第四次大改革。天文历法要迈出新的路子,必须借鉴阿拉伯、波斯天文学。旭烈兀西征,已注意到将关押在牢中的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刺丁·杜西(1201—1274年)解救出来。阿拔斯朝灭亡后,旭烈兀在1259年正式授命在首都大不里士以西、乌尔

① 穆扎法尔·巴赫蒂亚尔:《亦思替非考》,《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9页。

② 格希曼:《帕提亚和萨珊朝的波斯艺术》(R. Ghirshman, *Persian Art, the Parthian and Sussanian Dynasties*, N. Y.)1962年版,第317—336页。

③ 黄潜:《金华文集》卷八《翰林国史院题名记》。

米雅湖附近筹建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完善的马拉格天文台。忽必烈在登汗位以前,也很重视天文、星相,网罗回教天文学家。波斯人札马刺丁因此应聘来华。札马刺丁大约就是在1258年不愿参与修建马拉格天文台的Jamāl al-Dīn。忽必烈即汗位以后,召札马刺丁编制万年历,同时为新建的回回天文台添置天文仪器。万年历按照波斯、希腊系统,在1267年编成,曾在一定范围内颁布试用。札马刺丁为上都开平创设的观象台制造了七种仪器,其中六种是天文仪器,一种是当时罕见的地球仪。这些仪器都是纳速刺丁·杜西在马拉格天文台中配制的仪器,札马刺丁制作这些仪器,是在精通波斯天文学的基础上,继续交流科学信息而取得的巨大成就。

七种仪器,元代记录的都是波斯语名:

(1)咱秃哈刺吉(Dhātu al-ḥalaqi,多环仪),浑天仪。并非托雷美式,而是赤道系统,但有两个回归圈附在带照准仪的活动赤纬环上。

(2)咱秃朔八台(Dhātu al-shu'batai,双股仪),经纬仪。

(3)鲁哈麻亦渺凹只(Rukhāmah-i-mu'-wajja,春秋分晷影堂),斜纬仪。

(4)鲁哈麻亦木思塔余(Rukhāmah-i-mustawiya,冬夏至晷影堂),平纬仪。

(5)苦来亦撒麻(Kura-i-Samā'),天球仪。

(6)兀速都儿刺不(uṣṭurlāb),观象仪。

(7)苦来亦阿儿子(Kura-i-ard),地球仪。

六种天文仪器都为黄道系统的观测制作,使用360°制。^①

① 哈特纳:《札马刺丁的天文仪器:考释及其和马拉格天文台仪器的关系》(W. Hartner, *The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of Cha-ma-Lu-Ting,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 to the Instruments of the Observatory of Maragha*),《伊西思》(ISIS),1951年版,第41、184页。

地球仪在当时仅见于马拉格和上都。据说公元前二世纪马罗的克拉特斯制作了最古老的地球仪,但此器早已失传,详情不明。在欧洲最早记录的地球仪是马丁·皮赫姆(Martin Behaim)在1492年制成的一架,现存德国纽伦堡国立博物馆。

札马刺丁带到中国的两种鲁哈麻日晷,也是阿拉伯世界中的先进仪器,当时伊斯兰学者阿布尔·哈桑·阿里(马拉喀什)完成日晷学的巨著《始终归元论》(1229年)还不过四十年,精密的日晷便在中国北方出现。札马刺丁和回回司天台在1271年正式成立实有难分难解的关系。由于札马刺丁引进伊朗天文历法,于是忽必烈决定将早先分设二处的汉儿和回回司天台合并成回回司天台,1274年在大都选择新址加速建成。这项工程显然受到来自伊朗的激励,伊朗的马拉格天文台建成后,纳速刺丁·杜西和他的助手协作,按旭烈兀的规定,在1272年完成了可称集希腊、波斯、阿拉伯、中国四大体系于一身的《天文表》(al-Zij),于是元政府在1273年决定成立秘书监,由焦友直、札马刺丁二人管领汉儿和回回两个司天台,不久合并,并在1275年采取措施进行历法改革。

出身西亚的爱薛,既曾充当元朝派往大不里士使团的通事(翻译官)、副使,而且也积极参与了历法改革,奔波于马拉格和大都北京天文台之间。他曾为完成《伊儿汗天文表》出力,在马拉格作过题为《中国和维吾尔的历法》的科学报告^①,《天文表》中有关中国历法的知识是由他和另一名在纳速刺丁·杜西手下工作的中国学者傅岩卿提供的,《天文表》中录有中国的干支纪年。据拉施特丁的《史集》记载,旭烈兀西征时曾从中国带去一批占星术士和学者;后来忽必烈也派过科学家到马拉格协助工作,其中有个叫傅蛮子(或译傅穆斋,Fuo-

^① 沈福伟:《元代爱薛事迹新论》,《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辑,1987年版,第90—109页。

mun-ji)的,纳速刺丁·杜西正是通过他了解中国的历法,向他请教推步之术^①。傅蛮子是个汉人,后来归国,供职秘书监,名字叫傅岩卿,1294年8月升任秘书少监。^②

在北京和马拉格之间,双方派遣高级官员和学者进行科学协作,北京按照马拉格的先例筹建新型的天文台。马拉格天文台位于城西山岗上,占地137×347米,装备有精良的仪器,有些是从巴格达和阿拉木图(伊朗北部)移去。并有一个藏书四十万卷的图书馆。元代秘书监也收藏了许多波斯、阿拉伯文图书,据1273年统计,共有242部,是中国最早的外文图书馆。秘书监的图书中便有马拉格的《天文表》,译名《积尺诸家历》。

1276年忽必烈下令设局修历,天文学家王恂(1235—1281年)、郭守敬(1231—1316年)负责编制,1281年正月一日起正式颁行,这就是著名的《授时历》。《授时历》是汲取回回历,参考伊朗天文新成就而编制出的新历,元、明两代基本上都仰赖于此历。

马拉格的天文学权威、旭烈兀的首相纳速刺丁·杜西精通三角、几何,首先将三角学脱离几何而成为专门的科学,他在天文计算中,广泛运用古希腊以来精熟的球面分割术,使天文计算进一步精确化。郭守敬在爱薛、札马刺丁的媒导下,在宋代会圆术的基础上,试图用算弧三角法切割浑圆,从而首次将球面三角法引入中国历法计算之中。但郭守敬在这一新的科学尝试中,忽视黄道系统,不像马拉格的

① 《多桑蒙古史》,1834—1852,海牙、阿姆斯特丹,第3卷,第265页。乔治·萨尔顿,《科学史导论》,1931年版,第2卷,第1005页。英国波伊勒在《伊儿汗积尺序言》(J. A. Boyle,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伦敦,1977)中已指出,多桑注文中原文出处有误,应出自巴纳卡特(Bana Kati)通史中的一段。波斯文原名 FWM-NJY,被称作 Sing Sing(先生),是位道士。

② 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一〇,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卷九,至元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同行那样使用 360° 制, 而仍用 $365\frac{1}{4}^\circ$ 的古制, 因此他运用的会圆术弧矢公式误差既大, 计算的圆周率也以 3 的整数入算, 使周天直径的计算不够精确。尽管如此, 他已在球面三角法的应用上超越了他的中国先辈, 迈开了新的一步。

郭守敬为北京天文台设计制造了十三件仪器, 这使北京天文台拥有的仪器总数和马拉格天文台不相上下。郭守敬在 1276 年后陆续制成的玲珑仪、浑仪、浑天象、立运仪、候极仪和简仪, 令人惊叹不止。但也可从马拉格天文台具有同类的天文仪器, 推测郭守敬当年定从马拉格的同行那里获知最新的技术信息, 以为借鉴。郭守敬制造的简仪, 从名称上可以知道, 是对黄赤道转换仪的简化^①。黄赤道转换仪由纳速刺丁·杜西仿照十二世纪上半叶贾比尔·伊本·阿夫刺的圈仪(Regiomontanus), 用两个分度环交接。郭守敬根据中国传统应用的赤道坐标系, 去掉黄道部件, 制成这件简仪。郭守敬的这一成就, 是吸收伊朗天文仪器的专长, 坚持使用更为简便的天方观测方法而达到的创造性的范例。后来赤道坐标系通行世界, 它的起点, 便是北京郭守敬创造的简仪, 而它在国外的名声, 一定是由马拉格的那些杰出的曾经长期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的同行介绍到欧洲去的。

三、中 医 学

伊朗很早就接受和使用中国药材, 中国医学的整理和研究, 是在元代伊儿汗国首相、科学家拉施特丁督促下完成的。

中国药物如肉桂、生姜、大黄、黄连、茯苓、无患子、麝香, 久已为伊朗医学界所使用。肉桂(Cinnamon)和桂(Cassia), 在公元前古老的

^①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3 卷。

中国文献中没有细分,通称作桂,因此古代希伯来语、希腊语文献中对这两种植物也难以分辨。居延汉简中的桂,用于治伤寒^①,是温肾补火、祛寒止痛的良药,又是名贵香料。出现在萨珊波斯时期的波斯语,将肉桂称作“中国木”(dār-čīni, dar tchini)或“树皮”(dār-čīn, dar tchin)。君迪沙普尔的皇家医学院在治疗眼镜蛇咬伤的片剂中,使用24梅提卡勒的中国肉桂配伍使用,信仰祆教的卡瓦德一世(488—531年)配制糖衣药片时,也开有8梅提卡勒的中国肉桂。阿拉伯作家伊本·郭大贝在九世纪列举中国南方海港出口货中有“中国木”。阿拉伯人知道肉桂出在中国,应晚于波斯海商^②。在十世纪波斯药物学家阿布·曼苏尔用新波斯文写成的《药学纲要》(约970年完成)中,有肉桂的正式记录。

生姜。姜、桂入药,都作表汗药,用于调味、和香。生姜产于华中、华南,早就畅销西北,古代写作薑。《居延汉简》中有“薑八百五十”(262号)^③、“薑二升直卅”(1962号)^④,可见数量、价值在西北均甚可观。新疆出土法卢文书中有“现奉上一薑,以表思念”^⑤的话,在那里是一种很实用的礼物。新疆的姜,计算单位也是波斯的德拉克麦,有一张胡椒、糖的清单中列举“1德拉克麦薑”^⑥。姜作为药物,从新疆运到伊朗,历时已久,阿布·曼苏尔已知姜有三种:中国姜、桑给巴尔姜和麦利阿威姜,而以中国姜最好^⑦。姜在中古波斯语中称 šangavīr,新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页。

②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9—120页。

③ 《居延汉简》,第13页。

④ 同上书,第81页。

⑤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中国土耳其斯坦出土法卢文残卷译文集》,第89页。

⑥ 同上书,第181页。

⑦ 阿肯道夫译:《阿布·曼苏尔》(Abdul Chalig Achundow, Abu Mansur),1873年版,第76页。

波斯语 *šankalil*, 译自汉语“生姜”, 表明这味药材至少在南北朝时已被伊朗医学界所采用。《宋会要·职官》中有海运的高良姜、干姜、生姜, 《诸蕃志》“三佛齐”条有中国出口的干良姜, 名享西亚, 波斯字 *anqala*, 就是“高良”或“干良”的译音, 斯坦格斯《波斯语辞典》说是“一种中国姜”^①, 大致没有问题。

大黄。自古有两种, 一种产在伊朗北部和黑海附近, 叫 *Rheum ribes*, 中古波斯语 *rēwās* 大约是指这种伊朗土产的大黄。但中国生产大黄且西运, 年代也很久远, 斯坦因在新疆发现的汉简中, 有“大黄”字样^②。自从十世纪阿布·曼苏尔记述中国大黄后, 大黄在西亚便成了中国著名土产。大黄产在甘肃、青海、四川, 阿布·曼苏尔说, 大黄有中国产的和呼罗珊(伊朗东部)产的两种, 中国产的使用最广。新波斯语称“中国大黄”为 *riwand-i-sinī*, 后来传到阿拉伯语、突厥语中, 都用这个词。

黄连。是最佳的眼药。阿布·曼苏尔已知黄连(*māmīrān*)的药性。这种被中国医生看作解热消肿药的毛茛属植物, 是出产在中国西部的药材。但西方也有黄连, 伊本·阿尔·贝塔尔引阿尔·哲菲基的话, 认为黄连来自中国, 但在西班牙、柏柏尔(北非)和希腊也有出产。元代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注意到中国向西方出口黄连。里海南岸伊朗吉兰人哈吉·马茂德曾游历中国, 他是波斯的大法官和学者, 曾和《马可·波罗游记》的刊行者威尼斯人雷慕沙讲起他的经历, 雷慕沙在 1550 年刊行《马可·波罗游记》时, 在导言中转述了他的观感, 谈到“出产大黄的肃州(甘肃酒泉)山上, 又出一种小根的植物, 叫 *Mambroni Cini*(中国黄连), 十分珍贵, 可用来治疗各种疾病, 尤其用来治眼疾。当地人将它浸在玫瑰水中, 用石头捣碎研磨, 再把它搽在

^① 《波斯语辞典》(*Persian Dictionary*), 第 113 页。

^② 沙畹:《东土耳其斯坦出土中文文书考释》(法文), 第 115 页, 编号 527。

眼上,效果十分良好”。这位波斯大法官是深知这种中国眼药,并善加运用的人士。

顺便一提的是,输石(氧化锌)也是优良的眼睛消毒剂,伊朗家庭常备药物中总有这种小瓶的药剂。

茯苓。波斯语称“中国根”(Cūbi Ćim, Choobi-Cheenee, Reeshe-i-Cheenee)。十六世纪时传到伊朗。晋人陶弘景已留意研究茯苓。茯苓在十六世纪时被世界上广泛注意,是由于中国用来专治梅毒(Morbus americanus)。梅毒俗称美洲病,起源于美洲,哥伦布的水手传染以后,将病菌带回欧洲。后来瓦斯加·达·伽马航行印度,又将此病菌传入印度,印度梵语称为佛朗机病。明代中叶,梅毒菌传入岭表(广东、广西)波及全国,中国人用茯苓治疗此病,疗效甚好。葡萄牙人、印度人、波斯人都以此治疗梅毒。嘉靖(1522—1566年)时名医汪机著《本草会编》,有专论用茯苓治梅毒的药方。

无患子。阿布·曼苏尔指出产自中国。大小与李相同,内有黑核,坚硬如石。用来炒食,可治各种慢性病。也可用作解毒剂。

麝香。是甘肃、陕西、四川等地特产,用于治疗恶疮肿毒、跌打损伤、神志昏迷,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十世纪末波斯文著作《世界境域志》在“阿富汗巴达克山”目下,有麝香从吐蕃(图伯特)输入的记载,图伯特包括甘肃,麝香即从甘肃西运。元代阿拉伯地理家阿布·宰德曾听说,撒马尔罕商人贩运麝香,不嫌路程之远,不但跋山涉水远去中国,而且还将此物运往西亚各地。在中国以外,波斯也是使用这种药物的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外科医生都用麝香来消毒创口和止血。麝香也被用来治疗伤寒、痉挛、百日咳等病症,并医治休克病人。^①

元代中国和伊朗之间在医药方面有过广泛的交流,不但中国药物用于伊朗药剂,而且中国传统的脉学和病理学也是伊朗医学在吸

^① 马扎海里:《中世纪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巴黎1951年版,第89页。

取希腊、叙利亚、希伯来的科学遗产之外,极为注目的新的来源。《史集》的作者、合赞汗的御医拉施德丁特别注重中国的医学成就,1313年主编了《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在这部中华医典中,对晋代名医王叔和(265—317年)的《脉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介绍了中国医学的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理学等多种科目。书中的三幅插图完全采自中国的医书,第一幅图画出八卦,划成二十四等分,和昼夜相配,表示患者体温的升降;第二幅图是内脏解剖图,画有心脏、横膈膜、肝脏和肾脏;第三幅图画出手掌和腕部,图示脉经。解剖图和杨介《玄门脉诀内照图》(1113年)相仿。拉施德丁编纂中华医典时,一定有中国医生或精通中医的伊朗医生辅助,才使这部巨典得以完成,并且流传至今。他还翻译了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被中国民间尊为药王的孙思邈,不但在远东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在元代第一次成为当时西方医学界所熟悉的名字,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拉施德丁及其同好了。

四、印刷术

雕板印刷在七世纪由中国发明后,首先传入通用中国汉语的朝鲜、日本。在非汉文化圈中,首先使用这种发明成果的,是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伊斯兰国家。

到十三世纪,伊斯兰国家虽已使用过印刷技术,但还未印制过整本的书籍。十三世纪的伊儿汗国,在蒙古旭烈兀后王统治下,与北京的大汗关系密切,承认大汗为宗主国,因此出现财政危机,便仿照中国印制纸钞,以替代金银铸币的流通。

旭烈兀的第五位继承者盖喀图汗(1292—1295年)登位时,充盈的国库已被挥霍殆尽,内乱外祸相继而至,财政赤字扶摇直上。管理财政的伊赛丁·莫扎法尔便考虑仿照元朝,发行纸币(交钞)。盖喀图

汗听信宠臣沙特鲁丁的话,向定居在大不里士的中国使者枢密副使朵耳边·孛罗咨询纸币的发兑,孛罗认为可行,盖喀图便在1294年7月23日下令制钞,颁行各地。纸币仿照至元通行钞,上首印有汉文“钞”字^①,四周纹饰都照式刊印。同时印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经文和“伊斯兰历693年,世界的君主发行吉祥的钞币,凡涂改或损坏纸钞,满门抄斩”的字样^②。“钞”字后来成了波斯文中的Č au。

大不里士在该年9月12日将印就的纸钞正式发行,币额从半个迪尔汉到十个第纳尔不等,与原先通用的阿拉伯银币、金币额相等。各重要省城也设立宝钞局,发行和兑换宝钞。纸币发行后,金银即被宣布禁止流通。如拒绝使用纸钞,立即处死。但纸钞初次发行,国库并无相应的基金准备,商人害怕货物被抢购一空,对纸币折价使用。不久,农民进城运货,都遭拦路抢劫,商货短缺,大不里士商店在一个星期后纷纷关闭歇业。城中居民对莫扎法尔群起而攻之,市上到处都是游民,生产无法继续,供应时告断绝。三个星期后,国内流通几乎陷于全面停滞状态,客观上宣告了纸币的彻底破产。于是当局只得重新恢复金属钱币的使用。纸币的使用前后不足两个月。

伊儿汗应用印刷术发行纸钞,虽然昙花一现,但雕板印刷技术却给伊斯兰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桂冠诗人巴那卡特在《智慧园·中国人》(1317年)中,对印刷在中国已成一种风习十分赞扬,说中国人为保存有价值的书籍,就叫人写在木板上,校勘后刻板存放。要书的人,可以付款开印,就像铸币厂用印模铸钱。“因此,他们的书不会有任何增删,完全可以凭信。他们的史籍便靠了

① 现存实物有至元通行钞铜版两种(伍佰文、贰贯),长25.3厘米、宽12.6厘米,河北平山县王坡村1963年出土。首列横排“至元通行钞”,下部有尚书省命令“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及“伪造者处死”的大字(《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图414)。

② 布朗:《波斯文学史》第3卷,1920年版,第37—38页。

这个得以流传”^①。大不里士的印钞是对印刷术的一种试验,此后,印刷术便被用来印制纸牌和符咒,并加速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技术发明越过地中海进入欧洲,推动了一场空前伟大的文化革命。

五、艺术

中国艺术,堪称龙的艺术,在工艺美术上,龙凤花鸟图案,变幻奇丽。伊朗美术,自九世纪以来仿造中国瓷器和三彩釉陶,已知吸收中国画风。见于936年的波斯古画,有甲骑具装的战士鏖战张牙舞爪的恶龙的场景,一改过去以勇士与狮战斗的传统画题。巴格达的驱邪门,是建于阿拔斯朝第三十四位哈里发纳赛尔(1180—1225年)时代的城门,在拱形的门首有浮雕的龙。1322年不赛因汗所筑法拉明大清真寺,寺门也雕着象征王权的龙。

伊斯兰教教义认为,表现人类和动物,是真主独享的特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伊斯兰教初期没有人物画。先知穆罕默德的画像是九世纪中叶旅行长安的阿拉伯人伊本·瓦哈卜从唐僖宗的皇室收藏物中看到的。穆斯林的宗教画,直到十四世纪初才由基督教教会艺术指引下正式出现。而且,这种美术首先见于书籍的插画,于是在众多的细笔画中,也可以见到东方摩尼教的书籍插图艺术的影响。波斯在早期培养伊斯兰教独立的艺术家中所起的先锋作用,和它在合赞汗(1295—1304年)以后改奉十叶派伊斯兰教不无关系。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拉施特丁《史集》抄本,在1310—1315年间由大不里士的书法家和画家完成,插图中《窝阔台接见大使》、《大汗蒙哥及其妇人》、《拖雷的九个儿子》等插画中,采用中国画法,表现蒙古型人物。大不里士在细笔画的源流上,可说早和中国吐鲁番的摩尼教插图画

^① 布朗:《波斯文学史》第3卷,1920年版,第102—103页,引《智慧园》。

家有着不解之缘。从十四世纪起,许多伊朗画家都喜欢以蒙古人的形象为题材,同时动物画也不再是画家的禁律。在花卉、翎毛的领域里,伊朗画家多半向中国画家借鉴。水墨画也成为伊朗画家的模仿对象,中国式样的荷、萍、芦苇、牡丹、飞雁也都进入伊朗画中,风俗画中的苹果显示平安、仙桃预示长寿,延绵不绝的曲线由太极图衍化而成,画家的灵感都来自中国的同行。

毛织物中的毡垫、地毯,狩猎图及禽兽,有许多显示中国化的倾向。龙、凤、麒麟等中国吉祥图样也进入了蒙古人统治下的伊儿汗和以后君临此地的黑羊、白羊王朝。这些图像成了十五世纪书籍的封面画。出土于布达佩斯附近的波斯头盔,是十四世纪的战具,上面刻有展翅的对凤,现藏匈牙利国立博物馆^①。麒麟在十五世纪上半叶变成了有火肩的龙马,在1438年的一个抄本封面上就有这样的图像^②。

十五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云纹,也是中国的传统式样。在大不里士毛毡中可以见到一种通用的图像是,奔驰的骐驎、回首奔走的狐狸、坐着的瞪羚,猛狮扑杀大角山羊,再有云纹、飞跃的野鸭,盛开的莲花和忍冬。图样是伊朗的设计师充分引用传统题材和中国图样的结晶,它们都见于德国莱比锡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果园》(Būstān, 1552年)细笔画中^③。

十六世纪以后,萨法维王朝的细笔画中,无论人物、花鸟,在色彩的运用和轮廓的勾勒中,中国化的倾向更加有增无已。伊朗绘画在十五、十六世纪深受明代画风熏染,特别是伊朗西南的伊斯法罕,在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年间都有使者派往北京,档册中写作亦思把罕、亦

①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6卷,图853。

② 阿伽·奥格鲁:《十五世纪波斯书籍装帧》(Aga-Oglu, *Persian Bookbinding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n Arbor), 1935年, Pl. VIII。

③ 施尔兹:《波斯、伊斯兰细画》(W. P. Schulz, *Die Persisch-Islamische Miniaturmalerei*, Leipzig)莱比锡, 1914年版,图版70。

思弗罕。宣德(1426—1435年)、成化(1465—1487年)画风特盛,中国与伊斯法罕使节、商旅往来尤多,且有华人移居,新兴的伊斯法罕画派的兴起于是便极富明代画院的风格。一幅十五世纪的伊朗绘画以缠绵悱恻的民间爱情故事“霍斯罗与希玲”为题材,在中国绢上,模仿明画手法,上部绘上一树一鸟,下部绘有一男一女,身穿伊朗服饰,脸似华人,是一对正在谈情说爱的恋人,画面构思及设色都极富中国色彩,使人难以辨认是伊朗画家所作中国画,抑或是中国画师描绘的伊朗图景。同样在十六世纪的阿塞拜疆,中国式的山石、云彩与衣着、人物也是米尔札·阿里、苏丹·穆罕默德·大不里士等彩笔画家常用的题材。

元代的音乐深受回回乐的影响。旭烈兀西征巴格达,却爱上了当地的音乐家苏菲丁·埃尔玛威创作的伊朗曲子,这位音乐家用波斯语编纂了《歌曲集》,撰写了乐理著作《神圣的使命》、《论音乐节奏》。元、明时代的回回乐舞中,有些是伊朗古曲。伊朗乐器箜篌在元代发展到二十四弦,在明代继续使用的大乐中也有二十弦箜篌。伊朗的唢呐、洋琴,在中国逐渐成为民族乐器序列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第三章 中国和伊朗文化交流

(下)

第一节 波斯宗教在中国的传播

一、祆教在中国的传播

(一) 祆教初传中华

波斯古代崇奉自然现象,对无涯的天际、紫紫烈火、狂风暴雨,都认为有神祇操纵;对光明、对火焰具有狂热,称太阳为“神眼”,以光亮为“神子”,逐渐形成了以光明为善神,而以黑暗为恶神的宇宙观。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的琐罗阿斯德根据民间拜火的习俗,起而创立了琐罗阿斯德教。琐罗阿斯德教宣扬善恶二元论,认火、光明、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恶浊、灾祸、死亡是恶端。它确认宇宙万物都有永恒不变的自然现象,而且将善与恶之间相互对立的两种本原的斗争,看作是宇宙世界的基本原则。但琐罗阿斯德认为恶从善派生而出,善恶本是兄弟,后来却成了仇敌。光明与黑暗、丰裕与灾害、创造与破坏、洁净与恶浊之间的冲突,都可以归结为宇宙间善与恶这两种力量的

斗争。

琐罗阿斯德将宇宙现象总括为两个原素或两个神。善的原素是光明,创造一切善良、有益于人类的事物,主宰它的最高神是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恶的原素是黑暗,制造一切丑恶、有害于人类的事物,主宰它的最高神是阿赫里曼(Ahriman)。琐罗阿斯德提倡善、恶两种原素的斗争时有胜负,但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善神,善良终将制服邪恶,这使琐罗阿斯德教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在这场斗争中,人类由于创造他的阿胡拉·玛兹达,赋予意志的自由,于是人类也随时有跟从邪恶的,人的一生,同样受到善与恶的牵引。勤于劳动、富于进取的人,是崇奉正道、身心廉洁者,他将压制邪恶,受到阿胡拉·玛兹达的赞赏,反之,他与恶势力相随,必受阿胡拉·玛兹达的惩罚。人在今世与来世都有生命。来世的苦乐,取决于今生的善恶。人死后,灵魂脱离肉身,受到神的审问,必经过一条横在地狱上的长桥。善良信士过桥时,展现在面前的是平坦、宽敞的大道,经过之后,便得阿胡拉·玛兹达的宠爱,被接纳安居乐园之中。对恶徒和有邪念的人,桥便细如丝毫,因而坠落火狱,被迫充当阿赫里曼的奴隶。功过相等的人,死后灵魂便进入天堂与地狱之间。这座考验人的善恶、功过的桥,便是后来中国佛教轮回故事中奈何桥的原型。

琐罗阿斯德教导信徒爱护水、火、土和空气的洁净,教人膜拜火光,以火为光明的表征,因此俗称拜火教、火教,又名祆教。它鼓励人们辛勤耕作,繁育后代,兴建家宅。宣称“有房子的胜于没有房子的,有儿女的胜于没有儿女的,有财富的胜于没有财富的”^①。琐罗阿斯

^① 达曼斯蒂特:《圣—阿维斯塔》第1卷。(J. Darmesteter, *The Zend-Avesta*, pt. 1, *The Vendidad*), 缪勒编:《东方圣书》第4种(F. M. Müller ed.,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IV, Oxford, 1880), 第46页。

德创教的目的是要“使世界繁荣”，使世界“既无寒风，亦无热风；既无疾病，亦无死亡”。^①

初传中国，琐罗阿斯德教以“摩诃”相称。摩诃在波斯文中，过去被解作“大”的意思，在佛教流行内地之后，更被讹作梵文的转译。但最初在汉代，摩诃所代表的是琐罗阿斯德教的天神 Mäh。这个字与 Maha(“大”)很易混淆。晋人崔豹作《古今注》，解释西汉时代张骞出使中亚细亚，从那里传入胡乐，称为横吹乐，但只得到《摩诃兜勒》一曲。此曲长期被当作印度乐曲，而原名始终未能拟读。《摩诃兜勒》在汉代中译名词中容有不同的语源。这里的摩诃(Mäh)为阿利安民族的月神，兜勒(Tishtrya)为雨神，汉语译名只译首尾两音。在琐罗阿斯德教的古经《阿维斯塔》(Avesta)中，摩诃常驾瘤牛所曳月车。瘤牛在安息时代被说成生有两翼，代表摩诃神与原生牛^②。月亮在古代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被当作生命的源泉，丰收女神最初也与月亮相关联^③，公牛(bull)更是作为月神驾馭的动物，或守护月亮树的动物出现在古老的创世神话中。摩诃和他的公牛组成三位一体之神，其他二神，一是女性的檀伐斯帕(Drvāspā)，为早于阿那希(Anāhit)的雅利安民族丰收女神的原型；另一是提希勒(Tishtrya)，为送雨的神祇，专司天狗星座。在常年干旱的伊朗高原祈求丰年，唯有仰赖一年一度降雨季节的蓄水，雨季前夕“天狗日”的降临，对当年丰收关系重大。象征丰收和雨水的檀伐斯帕和提希勒，与生命之神摩诃相辅相成。直

① 达曼斯蒂特：《圣一阿维斯塔》第1卷。(J. Darmesteter, *The Zend-Avesta*, pt. 1, *The Vendidad*), 缪勒编：《东方圣书》第4种(F. M. Müller ed.,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IV, Oxford, 1880), 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2卷(J. Darmesteter, *The Zend-Avesta*, pt. 11.8, 16页; *Sirôzah*, I, 12; *Sirôzah*, II, 12); 魏斯特编：《帕拉维古籍》第1卷，《创世记》(E. W. West, *Pahtavi Textes*, pt. I, 32; *Bundahis*, X, 2, 179页)。

③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1卷，第297页。

至二十世纪,伊朗农民仍常年供奉摩诃与提希勒。^①

西汉时代名为《摩诃兜勒》的伊朗横吹乐,是以胡角、板鼓为主的乐曲,这种乐曲显然早先是信奉琐罗阿斯德教的伊朗农民用以祈求雨水和丰收的节庆乐舞,一经传入中国,因其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经过改编,列入汉代军乐。它的祖型却是伊朗的琐罗阿斯德宗教音乐。

琐罗阿斯德教在公元前 331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受到希腊统治者的压制,渐告衰败,教徒东迁。待安息兴起,琐罗阿斯德教始有复兴的机遇。中国西疆,久已浸礼波斯文化,琐罗阿斯德拜火习俗可能流传也早。

1976—1978 年在天山东部乌鲁木齐阿拉沟发掘的竖穴木椁墓七座,曾出土拜火祭坛。墓室上部用石封堆,墓室为长方形东西向竖穴,规模较大。沙石下为木椁,入葬者一至二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均朝向日出的东方,系崇拜太阳的民族习俗。随葬物有陶器、金银器、铜器、漆器、丝织物、货贝、珍珠、小铁刀、三棱铁镞、羊骨等。各墓出土金器,有螺旋状金串饰物、狮形金箔饰、虎纹圆金牌(实系狮纹圆金牌)^②等兽纹图案,还有一种见于波斯阿赫曼尼德时代的六角花形饰物。铜器中有一件双兽方座,器底呈喇叭形方座,座上承方盘,盘中伫立二翼兽^③,翼兽之间似乎原有火盆可以搁置,现已不见。同类器物在中亚细亚出土多件,被认作塞克文化中拜火教的祭坛^④。这批墓葬

① 阿克曼:《萨珊艺术中的印度-伊朗化题材》,载《印度艺术与文书》(P. Ackerman, Some Indo-Iranian Motifs in Sāsānian Art, *Indian Art and Letters*), XI, 1937, 36-9。

② 《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1983 年版,第 5 页,图 40。

③ 同上书,图 43。

④ A. H. 伯恩施坦:《谢米列契和天山历史文化的基本阶段》,《苏联考古学》1949 年第 11 期。

曾经碳-14测定,约为公元前三世纪。据此,似可认为天山附近的游牧民族塞人,是早期传导琐罗阿斯德教的桥梁。

琐罗阿斯德教之立足于中国内地,大约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公元一、二世纪时,原已消沉的琐罗阿斯德教再度复兴,中国便是它传教的一块新地。1956年在陕西北部绥德快华岭板佛寺内发现的汉墓石刻,极有可能是一座内地最早的琐罗阿斯德教徒的坟墓。石刻共有十石。门框石刻有类似博山炉的尖卵形树,树身座落在半月形坛座上,象征琐罗阿斯德教中代表光明与善良的生命树^①。生命树又称宇宙树,最早是由月亮树来表述的,月亮树的脂液是不死的生命液,亦即神圣的哈摩(Haoma)。中国关于生命树的知识,得自天汉二年(前99年)里海西南伊朗境内的吉兰,在晋代王子年《拾遗记》中称祈沦国。该书卷五记:“天汉二年,渠搜国之西有祈沦之国。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有寿木之林,一树千寻,日月为之隐蔽。若经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归怀其叶者,则终身不老。其国人缀草茅为绳,结网为衣。似今之罗纨也。”吉兰有参天大树,可以蔽日月,而庇护人至于不死不病,隐喻伊朗传说中的生命之树。到这吉兰国去采摘生命树叶的,可以长寿、永葆青春,吐露了对伊朗古文明的一种仰慕与崇敬。那里用草茅编绳,该是当地出产的亚麻,至于结网而成的衣服,则是羊毛编织而成,因为那里有着丰富的羊毛资源。

绥德快华岭墓主,由于宗教信仰与物质往来,得与伊朗有过联系。墓主并非伊朗人或胡人,似乎是一个汉人,或当地的居民。这可以从同墓出土石刻门扇上的图像加以推断,图像上部为相对的凤鸟,下部则刻有传统的龙虎形象,左面为形态生动的虎,右面是生有飞翼的龙。龙虎、凤鸟都是中国内地传统纹饰与图腾崇拜的物象,但龙而

^① 《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图55,56。

生翼,又显示了西方的色彩。

另一座绥德汉墓出土石刻门框,与上述墓门雕刻不同,图像正中为气宇轩昂的独角马^①,上部边饰有忍冬、卷草,具有波斯风格。更有引人注目的瞪羚,躯体细长,并有瘦劲的双翼,形态生动,与乌克苏斯出土阿赫曼尼德时期使用的金银饮具柄饰上的带翼羚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现藏巴黎卢佛宫博物馆的金杯,与现藏柏林博物馆的银杯,都采用了与月亮相伴的瞪羚图像,以颂扬生命与活力。羚羊也见于伊兰(Elam)的图像中,在拜火的祭坛旁就有羚羊^②。绥德汉墓雕刻中的羚羊也必然与火的崇拜相关。至于汉墓门框上的独角马,更是琐罗阿斯德教中的太阳神化身。在阿利安民族的信仰中,出类拔萃的太阳动物是马。马可以有多种姿态,长有飞翼的马也是常见的图像,有时代表十二星座中的天马星座。河南出土的汉代空心砖(墓砖)中,也可以见到线刻的大型飞马,伴随的图像有形体缩小的朱雀与鹤^③,或作三马三树图像。姿态的优美,线条的舒卷,均非汉代传统图像中的马匹可媲,极富波斯风采。独角动物见于安息时代,绥德汉墓石刻门框上的独角马与有翼羚羊,象征琐罗阿斯德信仰中的日与月,上部左端并有枝叶繁茂的多子树,树顶有牛头的鹰,这和伊朗创世神话中鹰筑巢于多子树顶相符,而与中国传统信仰迥异,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琐罗阿斯德信徒。

上述出土地点不详的绥德汉墓石刻,与快华岭板佛寺发现的汉墓石刻,都是早期琐罗阿斯德教在中国本部的遗存,在琐罗阿斯德教传播中国的历史上是弥足珍贵的遗物。河南出土汉代空心砖中的图像,也显示有胡天信仰。在一块矩形砖的上方,刻有形体粗壮手执尖

① 《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图89。

②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808页,引霍恩·斯坦陀夫(Horn-Steindorff)图版I.1078,1079,1080。

③ 《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图3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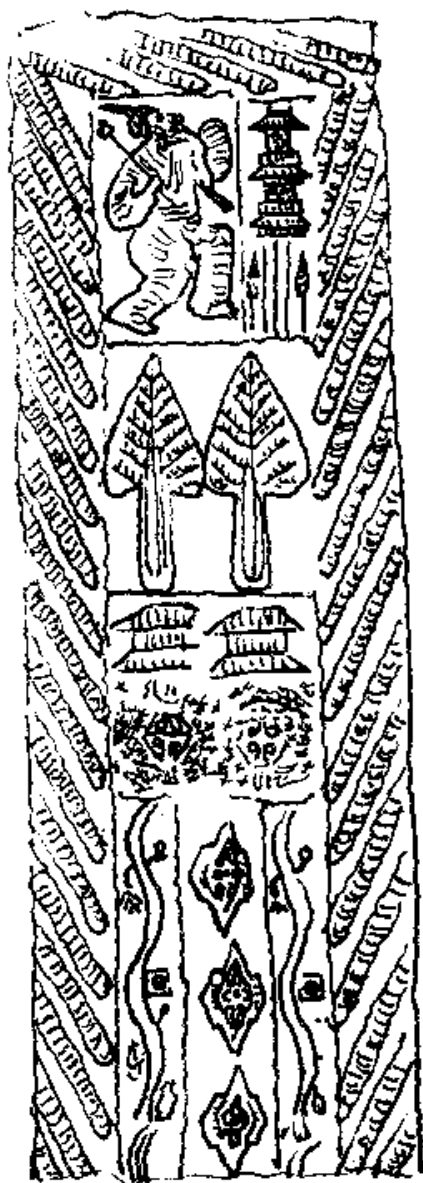


图 40 河南出土汉代空心砖
巫祝塔松纹

刃的巫师,形象和唐代记录的“下扶神”的巫术十分相像,左旁有立于柱上的高阙,拱顶落于柱上是琐罗阿斯德庙宇的特征,其下波斯风格的塔松纹双树,或许代表的就是琐罗阿斯德教神话中的多子树与牛角树(图 40)。

山东嘉祥县东南的武梁石室,建成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8年)。在分成三座的石室画像石中^①,有姿态各异、为数众多的有翼神人,形成一个波斯式样的天国图景。最值得注意的是,前石室第十三石上层的图像(图 41)。图像自右至左,首列一棵有十五个枝干的多子树,旁有有翼人在摘叶。多子树的左旁有一棵略低于多子树、形如弯曲牛角的牛角树。牛角树的左旁,即在画面正中,有紫紫大火在燃烧,旁有有翼人以手触火。图像左端,在四方形坛座中树立的一块方尖碑左右,各有有翼人在扶持,上空有人首灵鸟飞翔,加以协助,并有有翼神横升天空,以手扶持方尖碑,此有翼神的双足与画面上其他有翼人的双足不同,作上扬的鸟羽状^②。画面上的方尖碑显然是一根天柱,扶持者正是天

① 蒋英炬、吴文祺:《武氏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② 冯云鹏编:《金石索·石索四》。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二编,1950年,北京。



图 41 山东嘉祥武梁石室前室第 13 石胡天图像

神。在公元前二千年末的伊兰图像中,天神信仰已具有天体观念,天神的足一变成天鸟的双翼,手中的蛇(代表大气)也蜕化成双系罐上的绳索^①。武梁石室中手扶天柱、双足呈鸟羽状的有翼神,可以断作是琐罗阿斯德教信奉的天神,亦即胡天。胡天神手扶天柱在四方坛座上运转,表示天帝管治日(夏季)月(冬季),保持四季的交接。类似的图像亦见于占波斯^②。古老的伊朗神话中,对浩瀚无际的太空的崇拜是以山来表述的。此山在《阿维斯塔》中称作悠曦浩山(Ushidhāo),亦称光明山、晨曦山^③。山下是一深渊,后来文献中称作伐罗卡桑(Vourukasha)海^④。此山落入海中后,天地巨变,重新升起一个天神,将遭受毁灭的世界加以改造。象征生命的多子树就在这海

① 《艺术照片大全》(*Encyclopédie photographique de l'Art*, IV, 1936, 269—270; Stela of Untash Huban, King of Elam C. 1265—1245 B. C.)。

②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 7 卷,图版 27A, 28, 29, 30A, 38G, 40, 41A, D, 44B, 45A-C。

③ 杰克逊:《琐罗阿斯特教研究》(A. V. W. Jackson, *Zoroastrian Studies*), 1928, N. Y. 第 284 页。

④ 魏斯特编:《帕拉维古籍》第 1 卷《创世记》(E. W. West [Trans.], *Pahlavi Texts*, pt. 1, The Bundahis), 缪勒编:《东方圣书》第 5 种(F. M. Müller ed.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 Oxford) 1880 年第 31 页(Bundahis, IX, 5); 43-44 (Bundahis, XI, 7-4)。

的正中,牛角树生在它的近旁^①。多子树由天鸟向世界撒子,象征金哈摩(日)。牛角树又称谷卡尔树,象征白哈摩(月)。武梁石室画像石中的这些图像,十分完整地表述了琐罗阿斯德教义崇奉太空、日月与圣火的观念。

武梁石室前室第十三石中的天神造物图像,将琐罗阿斯德教经典中多子树、牛角树、生命树的崇拜,十分形象地加以陈列,在中国是空前绝后之作。天柱在伊朗神话中,是由宇宙树(亦称生命树)所呈柱状展现出来,其原型就是由一株棕榈树托符的月亮树^②。在武梁石室画像石中的天柱,将棕榈树与方尖碑式的石柱结合起来,左右扶持的两名有翼神,当是日神弥罗(Mithra)和他最佳的伙伴维里斯莱纳(Verethraghna)。弥罗神手执法术无边的金铃,这金铃又称宇宙铃,武梁石室中天柱右方有翼神手中亦执有一类似之物。同类图像早见于鲁利斯坦文化印章^③和安息印鉴^④。武梁石室前室第十三石正中烈火旁的有翼天神,或即伊朗印章中在火焰中升空的阿胡拉·马兹达,安息时代伊朗南部钱币的背面也曾见过这类图像。^⑤

武梁石室中各种有翼神人,通常以天神供奉之状展开。正中的有翼神,显系胡天神阿胡拉·马兹达,左右的有翼神,则是日月星辰的化身。阿胡拉·马兹达神像,早见于鲁利斯坦器物中,千年之后再现于丝路起点的山东。石室第二石画像的顶端三角形画面,正中有端坐的有翼神,左右则有许多兽身人首的有翼人物,完全符合伊朗神话中

① 魏斯特编:《帕拉维古籍》第1卷《创世记》(E. W. West [Trans], *Pahlavi Texts*, pt. 1, The Bundahis), 缪勒编:《东方圣书》第5种(F. M. Müller ed.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 Oxford)1880年第31, 65, 100页(Bundahis, IX, 6; XV 1, 1; XXV I, 4)。

②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7卷,图版19A;第2卷,第859,880页。

③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1卷,第270页。

④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1卷,图126bb。

⑤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7卷,图版126J, K。

日神维里斯莱纳有多种化身的传说,有金角的牛,有金耳的白马,有尖角的公羚羊,有卷角的野公羊,以及骆驼,是此神十种化身中最常见的五种形象^①。过去被认作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神的武梁石室画像石上的有翼神,连同石室广泛展开的各种具有伊朗宗教画面的石雕,使我们完全可以将武氏祠前石室确定为中国内地最古老的一座天祠或祆庙。这座天祠像其他祆庙一样,也构筑在山顶之上,以便燃起圣火,使远处也能得见。

同样的天祠或祆庙,至少在战国时代业已出现在新疆。《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羯盘陀国(塔什库尔干)的开国传说,有波利斯国王(波斯)娶妇汉土,迎回这里,因战争而交通阻塞,于是将中国王女安顿在危峻的孤峰上,下设守卫,昼夜巡逻。三个月后,战争平息,波斯王派使臣将王女迎归,忽然得知王女已怀身孕。王女的侍儿据实以告,说是“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会此”。使臣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听从了大臣的议论,决定“待罪境外,且推旦夕”。于是在石峰上建筑宫城,立王女为国主。后来产下一男,由母摄政,长大后,“子称尊号,飞行虚空,控驭风云”,于是威震远方。玄奘评论此事:“以其先祖之出,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这是暗示羯盘陀立国时,即已信奉波斯传说中的日神弥罗了。其时间可能上推到公元前五世纪。

《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库车),也明确记有天祠,“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这里的天祠创建的年代,恐亦不下于东汉。因为当地传说,还在龟兹王金塔立国以前。

胡天崇拜自安息东进,经新疆库车,东传陕北绥德,而又河南、山东,至于148年立庙于山东嘉祥。其间详情,虽多湮没无闻,但在遗物

^① 达曼斯蒂特:《阿维斯塔》(J. Darmesteter, *Avesta*, 11, 232-238页);《巴赫兰颂》(Bāhrām Yast, 1. 2-X. 27)。

的整理与研究之后,早期琐罗阿斯德教在中国的传导,仍不无形迹可觅。

(二) 胡天崇拜与祆庙

青海道在汉代也是接连西域的通道。那里早有中亚胡人定居蜀之西界。《华阳国志·大同志》卷八记晋泰始十年(274年)汶山白马胡恣纵,起而骚动,刺史皇甫晏发兵征讨,时值盛夏,部下劝阻暂缓出兵,皇甫晏不以为然,率军西行。有鹿入营中,军占以为不祥,皇甫晏仍无反悔。“胡康水子烧香,言军出必败,晏以为沮众,斩之”。汶山在蜀汉西界,已有康居胡人康水子定居。康居人多信佛教或祆教,康水子烧香,意在占卜,这“烧香”极可能是琐罗阿斯德教徒焚烧香木,以通神灵,行使巫术,向皇甫晏传告天神的意志,旨在阻止皇甫晏杀戮汶山白马胡等羌民,反而引起皇甫晏的盛怒,以斩首论处。如若康水子是个佛徒,恐不至引起皇甫晏如此反感,正因他是崇拜胡天的“邪教”,在琐罗阿斯德教尚未流行的地域,就会遭到更大的阻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青海平安窑房墓葬,曾出土二、三世纪之际的画像砖,可以为早期青海境内的胡天崇拜提供一点信息。刊载在《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上的该墓葬所出“月亮神”画像砖^①(图42),神像头戴高帽,身穿折襟上衣,腰系长裙,双足外撇,右手向上托举半轮新月,左手下垂提一细颈瓶。左上侧与月亮对称,有一太阳,中有一鸟。神像双肩披有折曲飞扬的帛带,下端左右均有分叉。这一图像是在佛教东传的初期,根据佛教图像所构思的胡天神,只有胡天神才与日月崇拜紧密相联,身系长裙,使神像富有女性特征,属于一种由中国西部居民创作的伊朗月神摩诃或胡天图像。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传揭盘陀国的波斯祖先,和琐罗阿斯德信仰向青海的传递,提供了一个十分切近的源泉。平安窑房出土的画像砖,并有骑马武

^① 《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1976—1984)》,文物出版社,图351,原题《神仙画像砖》。



图 42 青海平安窑房东汉墓月神画像砖

士,右手上举莲花的形象,这莲花也在显示武士是日天之种。

琐罗阿斯德教崇拜天空、日、月,祭坛上常年奉祀用各种香木焚烧的圣火,以不灭的神火使祭祀者与神相通。该教的《帕拉维语经文》指示,一个虔诚的信徒,“每日应三次到火庙礼拜圣火,这是因为常赴火庙的人,定会获得世间更多的荣华富贵”。由于崇拜圣火,故有拜火教之称。226年,波斯萨珊朝兴起,以琐罗阿斯德教为国教,奉祀天神,却又不同于中国的天帝、上帝,于是中国以胡天相称。

“胡天”是琐罗阿斯德教在中国最初立教的名称。

四世纪初,在十六国时期的羯国境内,文献上已见琐罗阿斯德教的正式传扬。《晋书》卷一〇七记石继时,“龙骧孙伏都、刘铄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是孙伏都、刘铄皈依了羯士所信奉的胡天,胡天也是初次见于文献的琐罗阿斯德教。羯士三千,似乎是羯人,习惯上将他们当作匈奴的别支,但也可能就是唐代中亚细亚的“赭羯”、“柘羯”,为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地粟特人壮士的称谓,此名出自波斯语 *tchakar*。若果如此,那末最先来中国河西传扬胡天的,便是这些中亚细亚的胡人了。孙伏都、刘铄可算是第一批列名的汉人信徒。

河西凉州一带兴起胡天崇拜,在习俗上似乎有与波斯本土琐罗阿斯德教用香木燃起圣火不同之处,而是采取了中国人较易接受的燃灯习俗。《晋书》卷八十六张寔传,记前凉张轨之子张寔部下,有信奉刘弘宣扬的光明道的:

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沙、仰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

刘弘宣称:“天与我神玺”,即是胡天的天神。晋代民间以光明道称奉琐罗阿斯德教的已大有其人^①。而“袄庙燃灯”已见于敦煌文献。敦煌卷子 S2241 有“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袄庙燃灯,尚切不坚”; S2474 亦称“城东袄灯”。袄灯在中国当与伊朗袄庙中的圣火具有同一内涵。

五六世纪以来,波斯使者和移民络绎东来,于是焉耆国(焉耆)、高昌国(吐鲁番)多信奉琐罗阿斯德教,《北史》卷九七记述新疆境内这些地区业已“俗事天神”。《唐书》所述新疆西部疏勒、于阗都俗信天神,大约也在六、七世纪之际。于阗(今和田)也有和伊朗一样,代表日神的三面神的壁画,这三面神代表青年、中年和老年,亦即科·伊·胡瓦贾(kūh-i-Khvāja)^②,胡瓦贾亦即《阿维斯塔》中,光明山落入海中后,重新升起的大神,他着手缔建了新的世界。信奉天神在新疆东部地区已成民间的习俗。突厥民族信奉拜火教,出身突厥血统的北魏宣武灵后(516—527年)对提倡胡天不遗余力。灵太后与肃宗在华林

① 饶宗颐:《穆护歌考》,刊香港《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卷,第733-771页。

② 斯坦因:《亚洲腹地》,1928年,第916页。

园设宴招待群臣,王公以下都赋诗相贺。灵太后诗只一句:“化光造物含气贞。”含意已和胡天崇拜中光明清净造化万物的旨意相合。神龟二年(519年),灵太后曾率领夫人、九嫔、公主以下从者数百人,登临嵩高山,直至山顶。“废诸淫祠,而胡天神不在其列”^①。灵太后既崇信佛教,于是进而排斥异教,禁止民间立庙设祭,但胡天神却仍得以传扬,且被国家所认可。其用意十分明显,因波斯和中亚康国、安国、何国、米国等商旅、使节和移民大多信奉胡天,为开展对外关系,对于他们的宗教习俗自然只有加以提倡、鼓励,而不能予以禁绝。

北魏洛阳城曾出土两件双翼童子圆雕造像,一件是采集品,据说出于内城南,双翼残损;一件是发掘品,出自城南太学遗址北朝遗存,保存完好。两件造像都系铜铸,大小相同,为男性裸体,身高不足5厘米,圆颅,头顶蓄发如留海,面部稍平,双臂前屈,双掌合什,上臂外侧有伸展的双翼,双腿浑圆,跣足。全身无纹饰,仅颈部系一串项链,神态虔诚。背部有两篆书汉字“仙子”。形象为内地佛教造像所无。^②

这种双翼童子造像,正是北魏迁都洛阳后,流行胡天崇拜的遗物。有翼神即代表日、月神。萨珊王冠(见于钱币)上的双翼就是太阳的象征,同样的图像也见于印章中。^③

在中国,类似的图像只发现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米兰遗址的佛寺残基中。1907年初,英人斯坦因在米兰古寺距地面约

① 《魏书·皇后列传》卷一三。即此一例,已足说明“唐以前中国有拜胡天制,唯未见有袄祠”(《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318页)一说之难以成立,更不论山东嘉祥武氏石室了。

② 段鹏琦:《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③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2卷,第808页,878-879页。

四英尺的墙面上,发现彩绘天使壁画七幅。画面上共有七个半身有翼青年天使。天使头呈长圆形,顶蓄留海式发型,细眉大眼,直鼻薄唇。身穿圆领衫,背有硕大的双翼,展翅欲飞。发现壁画的古建筑是一种外方内圆的建筑,被发现者称为宰堵婆(塔),其实是一种波斯式样的方形建筑。斯坦因将这些壁画的构图和色调说成是近似埃及托雷美和罗马时期墓葬中具有希腊风的少女和青年画像,归之于基督教中的爱神埃罗斯(Eros),以为在犍陀罗派希腊式佛像中有这种借自埃罗斯的画像,是用来表示乐神犍达婆的一班飞天。这种有翼神像在塔克西拉的古遗址中也有发现,塔克西拉的发掘者英人约翰·马歇尔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在图 21-25 列出这种图像,认为是佛教中的提婆(deva)天神。应该说是佛教所受的波斯影响,或袄教在塔克西拉的流传。若说是日本流传的唐代迦陵频舞的舞童^①,就有点南辕北辙了。拜城克孜尔、库车库木土拉、森木塞姆等四至六世纪石窟的窟顶正中壁画中,也有有翼的神像。而在内地则尚无此例,只有洛阳的双翼童子像是例外。

米兰出土的有翼天使早已被斯坦因携往伦敦,归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现在米兰的同一遗址,即古伊循城遗址的佛寺残壁,又发现同样内容的壁画一幅,画幅长 1.2 米,高 0.52 米,保存完整,色泽鲜艳。画面上有南北并列的两个半身双翼天使。北侧的天使,刚勇威猛,属男性;南侧的天使,端庄秀美,属女性。天使的头顶有一大朵莲花^②。这幅壁画的年代,应和斯坦因发现的壁画的年代相同。男性的翼神应是胡天崇拜中的日神,女性的翼神则是代表丰收女神的月神。莲花早在古波斯已是太阳的代表,象征着光明和善良。

① 阎文儒:《就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遗址所发见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现代佛学》1962年第5期。又见《新疆考古三十年》,第617-620页。磨朗即米兰的异译。

② 舒英:《新疆出土双翼天使壁画》,《中国文物报》1990年1月18日。

古伊循城(米兰)位于东西交通大道上,在若羌县城东北约75公里,也是当今青海新疆公路从中通过之处。这里发现的袄教遗物,是中亚粟特人或波斯人胡天信仰的遗存。伊循——洛阳双翼童子画像或雕像的发现,将五、六世纪波斯袄教东传的路线,十分生动地展示了出来。

北魏以后,继东、西魏,北周、北齐君主都亲自出马,信奉胡天,参与国家祀典。“后周欲招徕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遂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隋书·礼仪志》卷七)北齐后主高纬(565—576年)更亲自击鼓跳舞,奉祀胡天,以至邺中盛行胡天,至七世纪中叶仍未见衰。“后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隋书·礼仪志》卷七)。由于胡天崇拜,于是波斯宗教礼仪与歌舞也随之扎根中土^①,中国史籍(《魏书》、《北史》、《梁书》)都称波斯国、滑国(阿富汗昆都士)信奉火神、天神,《周书》卷五十以“波斯国俗事火袄神”相称,是按照七世纪起的习惯,以新创的“袄”字来称呼波斯琐罗阿斯德教的天神,以简化“胡天”之名。从此火袄教一名才替代胡天、天祠而通行全国。

“袄”字,在674年以后孙强新增顾野王《玉篇》中,作“阿怜切,胡神也”。但在方言中,更流通的是早先使用的“摩诃”。洛阳邙山出土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翟突娑墓志,有“君讳突娑,字簿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洛阳出土咸亨四年(673年)唐故处士康君墓志,也有摩诃与大萨宝连称:“君讳元敬,字留师,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

^① 七世纪初长安盛行的灯轮、灯树、火树,也是袄教燃灯习俗的节日化活动。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在长安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张鷟:《朝野僉载》卷三)。勒·柯克《火州》(Chotscho)中有吐鲁番木尔土克3号窟入口处壁画灯树图,作七重天式宝塔形灯树,背景为撒落的种子,其含意当即袄教的多子树。

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忸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九州摩诃大萨宝”,在这里等于“全国祆教大萨宝”。“摩诃”这个波斯天神名字被用于称呼祆教,“摩诃大萨宝”,意即“祆教大萨宝”。洛阳出土何摩诃墓志铭,墓主是姑臧何氏之后,调露二年(680年)卒于洛阳,是以摩诃为名的祆教徒。

萨宝,本是唐代管理祆教的官职,《通典》卷四十记武德四年(621年)在长安布政坊首置祆祠,并设官管理,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祆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都是直至开元初,专为优待来华祆教徒而保留的官职。《隋书·百官志》追述北齐官制,在管理外国人士的鸿胪寺下有典客署,“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从唐故处士康君墓志可以证实,北齐萨甫亦即唐代通用的萨宝的另一译名。隋代则在雍州(长安)设雍州萨保,视从七品。在诸州胡二百户以上的萨保,为视正九品。

萨甫、萨保、萨宝都是突厥语队商首领 Sartpau,或波斯语首领 Spādhapati 的音译。突厥事火神,所到之处,均有祆庙。波斯人、康国人等崇奉火天神的民族,一经在中国境内定居、经商,便随处有祆庙的设立,政府也设官保护。宋敏求《长安志》“布政坊胡祆祠”注说:“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信徒大抵都是胡人,萨宝府官也以胡人庙祝充任。但初级的神职人员穆护,似也有华人充任。颜真卿素来结交胡人,他的次子颜硕,甚至以穆护为小名,该是一名祆教信徒(《唐语林》卷六)。

自北魏以来,河西沙州、凉州以东,祆庙大多集中在京都地区,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长安、洛阳,以及河北定州(正定)都有萨宝或大萨宝驻蹕,主持祆庙,召集胡人。地处邺中的安阳,曾出土北齐石阙一对,每侧各有带口罩者手执香炉献祭^①,正是祆教遗物。唐代西京长

^① 史卡里亚:《北齐石阙上的中亚人士》,刊《亚洲剪影》(Artibus Asiae),XXI,1,第6图。

安(西安)有袄祠五所,布政坊设置最早,成立于621年;其次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及崇化坊袄祠。洛阳会节坊、立德坊和南市西坊也有袄祠。

信奉袄教的人士以外籍侨民为主,但随着波斯文化的扩散与商贾的活动,社会上各界人士信奉该教的也不乏其人。袄教每岁祈福必有庆典,吸引不少当地居民参与,施钱相助。唐人张鷟《朝野僉载》卷三记: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胡为袄主。其袄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顷,平复如故。盖西域之幻法也。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提到贞观初伊州袄庙袄主翟槃陀来到长安,表现请袄神的巫术:

袄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袄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入朝至京,即下袄神。因以利刃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

下袄神的巫术,后世在各种迷信活动中相沿不衰,为中国民间巫术的一大来源。唐代政府对这种使用巫术的胡天信仰,仅在一定范围内加以保护,而禁止民间祈祭。曾规定:“两京及碛西诸州火袄,岁再祀,而禁民祈祭。”(《新唐书·百官志》卷四六)由于政府的限制,袄教活动自以来华胡人侨民为限,既不提倡译经,又不广泛开展传教,在居民中难以流布。

(三)会昌以后的袄教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听从道士赵归真的建议,罢黜佛教,连及袄教、景教和摩尼教。《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称:“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二十录,贺

废毁诸寺德音表,提到:“其僧尼令隶主客户,大秦、穆护、祆(袄)二千余人,并令还俗”(《新唐书·食货志》卷五二同)。三千多名异教徒中,就有祆教信徒在内。

1955年西安西郊土门村出土一方唐代苏谅妻马氏汉文、帕拉维文墓志,墓主马氏,是故波斯王族唐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的妻子,卒于咸通十五年(874年)二月。帕拉维文祷词中有“愿其安居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所在之美满天国”之语^①。马氏为祆教徒苏谅之妻,本人当亦虔信该教。墓志为会昌之祸以后,祆教信仰仍在各地流行的证物。此后祆教亦和其他外来宗教一样,不得不自长安、洛阳等黄河中游繁华地区加以转移。北宋时代在汴梁(开封)、苏州、镇江尚有祆庙。

汴梁(开封)祆庙有二。一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

一见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

东京(开封)城北有祆庙(原注:呼烟切)。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862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纁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956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亦朴也。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迨二百年,斯亦异矣。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开封祆庙庙祝史世爽,自唐代以来世居庙祝,而他的姓亦似史国胡人。

^①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苏州自唐代以来,即有袄庙建于城南,与镇江朱方门里袄庙关系至切,都是晚唐后期袄教南移所留。至顺《镇江志》卷八:

火袄庙旧在朱方门里,山冈之上。宋嘉定(1208—1224)中迁于山下,端平(1234—1236年)间毁。注:前志引宋祥符图经,润帅周宝婚杨茂实为苏州刺史,立庙于城南隅,盖因润有此庙而立之也。

元代袄教在中国已告湮灭。中国的火神崇拜却或多或少地受到波斯火神崇拜的感染,像波斯一样,火神又是战神。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七折有“赤腾腾点着袄庙火”。元曲《争报恩》第一折出现“我今夜着他个火烧袄庙”的词句,都是袄庙转为火神庙的例子。明代万历年间臧晋叔编《元曲选》,列目有李直夫《火烧袄庙》一出,仙吕宫与双调各有《袄神急》一出。今存朱庭玉《仙吕袄神急》(《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六),只存后人改编的歌词,波斯风格的曲调早已无存,可说是袄教礼乐在中国的残迹。袄教的火神庙却成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历明清而到二十世纪,仍在许多城市(府、县)中香火不绝。

二、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

(一) 摩尼和中国北方的摩尼教

在萨珊波斯时代,由摩尼(216—277年)创立的摩尼教,曾对世界各地产生广泛的影响。摩尼出生在帝国政治中心泰西封——塞琉西亚附近的玛第诺(mardinu),属于帝国西部地区,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12岁时摩尼已萌发创造新宗教的意愿,到24岁时正式开始传教,并航海去印度杜兰(信德)传教,取得成功。萨珊国王沙卜尔一世(242—273年)登位后,他回国宣教,用中古波斯文(帕拉维文)写了《沙卜拉干》(*Sābuhragān*)的教义概要,意即“献给沙卜尔之书”,见到了国王,并得到信赖。243年4月9日,在沙卜尔加冕典礼

上,摩尼公开宣讲他创立的二宗三际论,开始了不受地区和国界限制的宣教活动。

摩尼教将明暗二宗当作世界的本原。将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看作是自始即已存在的两个相邻的王国。光明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古波斯语中称为查文(Zawān,永恒),汉译明父或大明尊。摩尼自称是继琐罗阿斯德、佛陀、耶稣等圣贤,被大明尊派到世间,以二宗三际说指导人类解脱善恶之争的最后一名使者。二宗指光明和黑暗,善和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和后际,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在244年后的十五年中,派传教团分头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和巴勒斯坦、帕提亚等地传教。东方传教团由精通帕提亚语的阿摩(Ammō)率领人数众多的教士前往帕提亚。摩尼生前,他的门徒大约已进入费尔干纳传教,到十世纪时,阿拉伯作家纳迪姆编写《百科书录》,便说摩尼曾亲自到中国传教。^①

摩尼要毁灭人的肉身而修炼灵魂的教旨,受到穷兵黩武的波斯统治者的忌视,沙卜尔死后,继位的巴赫兰(274—277年)确立祆教为国教,排斥摩尼教,拘捕摩尼,迫害教徒。277年摩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开始对摩尼教徒大规模的驱杀,摩尼的信徒只得纷纷逃离已无立足之地的波斯,涌向东方。罗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西方于296年敕令将摩尼选民(僧侣)烧死,听众斩首并没收财产。摩尼教的中心原在巴比伦,由于波斯的摩尼教徒成批东迁,中亚河中地区粟特人信徒的增加,摩尼教中亚教团才成最强大的一个教团。六世纪末,中亚教团在来自巴比伦的领袖撒特—奥尔米兹领导下以正统(Dēnāwars)自居,宣告与巴比伦总教会决裂。汉文摩尼教残经中将此宗译作“电那(那)勿”。直到八世纪初,巴比伦法王米尔(约710—

^① 达奇译:《百科书录》(B. Dodge, *The Fihrist of al-Nadim*, N. Y.) 1970年版,第77页。

740年)时,两处教团才重新统一起来。

唐代以前,摩尼教已由中亚教团传入中国内地。唐人常沂《灵鬼志》追叙:“太元十二年(前凉 335 年,或东晋 387 年),道人从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术即白衣,非沙门也。”^①“白衣”可能是摩尼教在中国内地最早的称谓。从各地发生的农民起义看,有许多是摩尼教信徒与弥勒佛的信徒。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十起^②:

450 年左右,宋彭城(今徐州)通往外地的水路被“白贼所断”(《宋书》卷四六)。

490 年,沙门司马惠御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魏书》卷七)。

499 年,幽州王惠定自称明法皇帝(《魏书》卷八)。

506 年,秦州屠各王法智反,推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号建明元年(《北史》卷一七)。

506 年,涇州人陈瞻也反,建年号圣明(《魏书》卷五八)。

514 年,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魏书》卷八)。

524 年,五城郡(山西蒲县)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反。其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魏书》卷六九)。

610 年,春正月,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杖,将为乱(《隋书》卷三)。

613 年,唐县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可见佛形,宋称弥勒出世。入伙者日数百千人,遂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欲举兵袭击乘輿(《隋书》卷二三)。

^① 《法苑珠林·咒术篇》卷七引《灵鬼志》。

^② 柳存仁:《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第 3 期,第 36-61 页。

614年,扶风桑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潜谋逆乱。举兵数万,自称皇帝,建元白乌(《隋书》卷四)。

这些起义队伍或多或少受到摩尼教或袄教的影响。他们所用的年号和法号“圣王”、“明法皇帝”、“建明”、“圣明”、“净居国明法王”,都为汉文摩尼教经籍所常见。起义者崇尚白色,戴素冠,穿素衣,持白伞、白幡,和摩尼教雷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指出摩尼“串以素帔”、“其居白座”,都以白为光明、洁净的象征。《仪略·五级仪》规定前面四个等级的信徒(慕阇、萨波塞、默奚悉德、阿罗缓),都得按例穿戴素色冠服,只有第五级的耨沙嘜,即一般信徒,可以“听仍旧服”。勒·柯克在新疆哈拉和卓故址摩尼教寺院中发现壁画残件,图中老翁摩尼及左右侍从全是白衣白冠^①。吐鲁番出土摩尼教经书的扉页和残页上的教徒,都戴白色高冠,穿白衣。弥勒转世,也是摩尼教入华以后,借助西晋、后秦所译佛教弥勒佛经籍的宣道手法,摩尼教残片 M801 就是将摩尼比作弥勒佛,说他“打开了乐园的大门”。^②

摩尼教义在唐代以前,无疑已在中国北方,特别是陕西、河北、甘肃等地得到传扬。为使传教顺利进行,吸收、依托早先便在中亚细亚和中国流行的佛教,使摩尼教蒙上一层佛学的色彩,是六世纪以来中国北方摩尼教的一个历史特点。吐鲁番发现的粟特文摩尼教残片 T. M. 389,已提到阿摩在帕提亚便已宣扬“明使的佛性”^③。摩尼作为佛教中的一个天神,越来越富有佛的气息,在 731 年,外籍摩尼教徒向

① 勒·柯克:《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地下宝藏》(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28 年版,第 58 页,中译本《新疆地下宝藏》。克林凯特:《摩尼教美术与书法》,莱顿版,(Hans Joachim Klimkeit,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Leiden), 1962 年,第 44 页,图版 41a, 41b, 42。

② 艾斯曼逊:《摩尼教文献》(J. P. Astmussen, *Manichaean Literature*, Delmer, N. Y.) 1975 年版,第 63 页。

③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 43 页。

唐玄宗介绍摩尼教时,便公然将教祖称作“摩尼光佛”了。

694年,波斯人摩尼师拂多诞向武后献《二宗经》,于是摩尼教正式获准在内地传教。《佛祖统纪》卷三十九:

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

《二宗经》宣扬摩尼教的基本教义二宗三际。摩尼生前除用他家乡的东阿拉美语(古叙利亚语)所写的七部经书外,还有一部用中古波斯语写作、献给波斯王沙卜尔的《沙卜拉干》,献给中国皇帝的《二宗经》就是根据《沙卜拉干》译写的。在二十世纪初勒·柯克在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残片中,也有《沙卜拉干》的残片,有几片上还标有中古波斯文“二宗/沙卜拉干”字样^①,意思是“献给沙卜拉干的二宗经”,也就是被称作拂多诞的摩尼师献给武后的《二宗经》^②。

《二宗经》被献给中国君主,此举犹如当年摩尼在波斯王宫中当众开讲《沙卜拉干》一样,是实现摩尼在罗马、埃塞俄比亚(非洲)和中国传教的重要的一步。摩尼教由于献经而取得了在中国合法布道的权利。

二十多年后,阿富汗的吐火罗国支汗那国,又派精通天文的摩尼高僧大慕闍来长安,期望在长安建立摩尼寺。《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这事于开元七年(719年):

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国帝除,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闍,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如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

据明人何乔远的《闽书》载,大慕闍在高宗(650—683年)时已行

①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195页引麦肯西:《摩尼的沙卜拉干》(D. N. Mackenzie, *Mani's Šābuhragān*), BSOAS Vol. XLII, pt. 3, 1979; Vol. XLIII, pt. 2, 1980。

② 刘南强:《宋代反摩尼教的指控》,载《约翰·里兹大学丛刊》(Samuel N. C. Lieu, *Polemics against Manichaeism as a Subversive Cult in Sung China*,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No. 2, 1979, 157页。

教中国。《闽书》卷七：

慕闾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闾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

摩尼教行教内地，曾传译经典，因此还有一些残经传世。《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奉诏编写的一部教法提要，卷首署有“开元十九年六月八日(731年7月16日)大德拂多诞奉诏集贤院译”。这是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三部汉文摩尼教残经中的一部，由Stein3969和Pelliot3884合成。另有今藏北京图书馆的《摩尼教残经一》(1911年罗振玉定名为《波斯教残经》^①)，和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约成于八世纪下半叶，佛化程度极深的《下部赞》。摩尼生前用东阿拉美语所著七部经典和中古波斯文的《沙卜拉干》，曾先后译成拉丁文、希腊文、柯柏特文、亚美尼亚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突厥文、粟特文、汉文、大夏文、回鹘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下部赞》是由粟特文译成汉文的经典。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编者为了迎合唐朝统治集团，引证佛典，公然以佛教一宗自居。《仪略》引萧齐沙门释昙景译《摩訶摩耶经》：“佛灭度后一千三百年，袈裟变白，不受染色。”暗示摩尼教为佛陀后裔所传。又引证东晋天竺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施光明，以作佛事。”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编者出于同一目的，依附道教，公然宣扬老子化胡，声称释迦、老子与摩尼三圣同一。它引证道经《老子化胡经》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Sūristan)中，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曰摩尼。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这里，将老子化身入苏邻国(巴比伦)，作为道教与摩尼教合流的依据。《仪略》又说：“虚应灵圣，觉观究竟，故号摩尼光佛。光

^① 《国学丛刊》第2册。

明所以彻内外,大慧所以极人天,无上所以位高尊,翬王所以布法药。则老君托孕,大阳流其晶;释迦受胎,日轮叶其鸟。资灵本本,三圣亦何殊?成性存存,一贯皆悟道。”《仪略》的这些新渗入的教义,为前此所未有,是摩尼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典籍。

但摩尼教虽想依托佛、道,涉足于中国社会,却受到佛教的卫道士的攻击,翌年即遭禁断。《通典》卷四十有一条禁令:

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

禁令明白规定,中亚粟特人和波斯人中信奉摩尼教的,仍可保持原来习俗,但中国人却不准奉行摩尼。731年《仪略》写成之后,或有摩尼寺立于长安,但不一年而禁止华人参拜,仅供外商、外侨祭祀,以外事活动场所看待,其例概同于袄教。禁令袄教之先,唐代统治者即视蓄意附会佛、道的摩尼教为邪教。

在武后与玄宗时期,前来中国传教的拂多诞和慕闾都是摩尼僧。《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有《五级仪》,介绍摩尼僧有五个等级:

第一,十二慕闾(中古波斯语 *mozak*),译云,承法教道者。

第二,七十二萨波塞(中古波斯语 *ispasag*),译云,侍法者,亦号拂多诞(中古波斯语 *aftadan*)。

第三,三百六十默奚悉德(中古波斯语 *mahistag*),译云,法堂主(中古波斯语 *mānsārār*,帕提亚语 *mānsargar*)。

第四,阿罗缓(中古波斯语 *ardawan*),译云,一切纯善人。

第五,耨沙唠(帕提亚语 *niyōšagān*),译云,一切净信听者。^①

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是东方摩尼教徒的基本用语,属中亚教

① 摩尼僧五个等级的中古波斯文名称,依吐鲁番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残经 M36,分别是 *hmwe'g*(或 *hmueg*), *'spsg*, *mhystg*, *xrwhxw'n*, *nyws'g*。见鲍伊思:《中古波斯语与帕提亚语摩尼教字汇》(*Mary Boyce, A Word-List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Leiden),1977年版,第45,22,57,99,65页。

会通用语言,因此也是经籍中所用术语的原始语言。慕阁十二人,是中亚摩尼教团所拥有的最高神职人员人数。据《闽书》,唐高宗时,位居高位的摩尼教慕阁便已到中国行教,但中国当局当时所注意的恐怕也只是慕阁的天文、星象知识,而不是他的教义。于是在719年时又有支汗那国所派的天文学家大慕阁。这位“大慕阁”,可能是位于十二人慕阁之上的最高者。这次慕阁以献技来博取玄宗准许其传教,看来这一目的曾经获准,在长安建立“法堂”。法堂规模小于寺宇,《仪略》规定的摩尼寺,必有五堂:经图堂一,斋讲堂一,礼忏堂一,教授堂一,病僧堂一。“右置五堂,法众共居,精修善业。不得别立私室厨库。”所以757年去世的韦述撰《两京新记》,而长安不见摩尼寺。但这法堂到了732年却被禁止对中国人开放,只限原来信奉摩尼教的外籍人士出入。说“当时既未许其布教,自不许其建置法堂。摩尼之有法堂,自大历三年始”^①,未见妥善。

从唐高宗时慕阁来华,到732年摩尼法堂被禁止华人出入参拜,不过半个世纪,摩尼教在内地似乎长期处于京师一寺。

八世纪下半叶,摩尼教由于得到北方新兴的回鹘民族统治集团的支持,在内地取得了新的宣教阵地而大有进展。为与唐军夹击史朝义而引兵洛阳的登里可汗,在763年3月班师回国时从洛阳请去了睿息等四名摩尼高僧,开教于回鹘。到大历三年(768年)才有专为回鹘而修建的摩尼寺,赐额大云光明之寺,是为信奉摩尼的回鹘所建的寺。三年后,因回鹘商人遍布长江流域,又在沿江各地修建摩尼寺。807年摩尼教又在洛阳、太原建寺宣教。元和(806—820年)年间,摩尼寺在内地至少已有八所。遍布长安、洛阳、太原、江陵、扬州、绍兴、南昌等地。到841年回鹘失国,便有会昌三年(843年)二月下令解除

^①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0页。

回鹘冠带、废除摩尼寺、放逐摩尼教徒之举。两年以后更有会昌灭佛，连同穆护(摩尼)被迫还俗，禁令规定这些宗教“不杂中华之风”，不准改头换面继续传教。

然而在民间颇有基础的摩尼教，却以改称“明教”为号，仍在流传。河南、山西摩尼教徒不久又在活动，后梁贞明六年(920年)，陈州摩尼且推母乙当天子，起而作乱，后唐石晋继续秘密活动，堂中供奉踞坐的魔王，以佛为其洗足。此后佛教便以摩尼为“魔王”。十世纪起，西迁回鹘虽仍信奉摩尼教，而内地的摩尼教却只得由河南向长江流域秘密传教，到宋代流行于闽浙民间，即以明教相称。

(二) 摩尼教和闽浙文化

福建的福州、泉州是北方摩尼教失势后，转入南方得以建立基业的早期据点。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山川”条记述晋江县华表山，山背之麓有元代的草庵，奉祀摩尼佛。指出“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追述摩尼教流布于福建的过程是：“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中古波斯语 Xrwhxw'n)者，来入福唐(今福清)，授侣三山(今福州)，游方泉郡，卒葬北山下。”文中的呼禄法师是中古波斯语的“传教师”^①，来自中亚细亚或巴比伦。

南方的摩尼教，起初以福州为大本营。《佛祖统纪》卷四十八引《夷坚志》：“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衫，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尸以葬，以七时作礼，盖黄巾之遗习也。”福州有摩尼教经典，天禧三年(1019年)以“明使摩尼经”的名义，被采进收入道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中。^②

① 刘南强：《宋代反摩尼教的指控》，载《约翰·里兹大学丛刊》(Samuel N. C. Lieu, *Polemics against Manichaeism as a Subversive Cult in Sung China*,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1979年第2期,第138页。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24页。

② 张君房：《云笈七签序》，《陈垣学术论文集》(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8页。

泉州有摩尼师传教,早见于南唐,时为清源郡。南唐徐铉《稽神录》卷三:“清源人杨某,有大第在西郭,鬼出没四隅,杖莫能中,乃召巫立坛治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盛于巫,巫惧而去。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遂绝。”明教法师以善作魔法闻名,可能是宋代明教又被目为魔教的一大原因,而非完全出自佛教诋毁摩尼教,故意以魔易“摩”之作。

泉州北门外北山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现摩尼教墓碑两块,显示北山下有摩尼教徒墓地。宋代朱熹有“明灵自安宅,牲酒告恭虔”的诗句(《与诸同僚谒北山》)，“明灵”即指明教法师之灵。泉州涂门外也曾发现“管领江南秦教明教”的墓碑石刻。^①

泉州南门外华表山背的草庵,又名青草庵,初建于十一世纪初。天圣二年(1024年)考取进士的曾公亮曾与草庵僧侣交游。《曾氏族谱》中载有曾公亮在浙江宁波当官时与草庵摩尼僧定诸的往来信件,赠诗一绝:“四明山去刺桐城,往还都无一月程;日日焚香遥顶礼,岁时其待出郊迎。”注:“草堂僧定诸,晋江人,博通内外经典,归隐于青草庵。”^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吴文良在泉州南门外二十公里的晋江县罗山乡苏内村(宋代仁教里)的华表山麓,找到了草庵遗址^③。中厅有摩尼浮雕像一座,无冠,发披肩上,下巴有两缕长须,背有弧光十多条。上角有铭刻,左上刻:“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院,祈荐先君正卿、妣三十三娘,妣郭氏五六大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妣月□世生界者。”右上刻:“谢店市信士陈其泽,善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戒月□日记。”现存草庵是元代泉兴信徒陈、姚两人修建。前此遗迹已荡无所存。草庵之南只有废寺一处,前有古桧二

① 庄为玠:《泉州摩尼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第77—82页。

② 庄为玠:《泉州摩尼教初探》,引《武城曾氏族谱·曾公亮传》(抄本)。

③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5页,图107。

株,两人可以合围,《泉州宗教石刻》说,相传是唐时所植。草庵寺前二十米处,曾在1979年掘出外壁刻有“明教会”的黑釉瓷碗一件。同一类型的瓷碗残件,又见于晋江磁灶大树威宋代窑址出土的“明”字碗上,对草庵建于宋代又多了一件物证^①。草庵附近的前港,原是通海的古港,现已成为陆地。草庵位于唐代自泉州至南港(今安海港)的大道附近,为集市之所。泉州摩尼教寺院草庵是现存最早的摩尼教遗迹,大约由福州自海路传入,所以草庵建于古港附近。草庵是北宋早期佛教寺院化的南方摩尼寺的代表。附近有元代摩崖石刻:“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四者代表摩尼教对光明、智慧、威力和永恒的信仰,以摩尼光佛为光明王国的统治者,相当于汉文摩尼教经中的明父或大明尊,为《仪略》所宣扬的“四寂法身”。^②

摩尼教从福建向浙江扩散,是通过民间传教团体设立的明教斋堂。温州继福州成为南方摩尼教的传教中心。北宋徽宗(1101—1125年)尊奉道教,京城(开封)佛寺被废弃的不少,摩尼教亦依附道教而得发扬。十三世纪的思想家黄震曾从四明崇寿宫住持张希声手中得到《衡鉴集》,明确福州、温州都有摩尼经典流传:

希声复緘示所谓《衡鉴集》,载我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天禧三年(1019年)两尝赦福州,政和七年(1117年)及宣和二年(1120年)两尝自礼部牒温州,皆宣取摩尼经颁入《道藏》,其文尤悉。^③

摩尼教在民间秘密团体中颇有号召力,白莲、白云等佛教宗派亦常与之合流而难以辨别。《佛祖统纪》卷五十四引有宗鉴《释门正统》

① 黄世春:《福建晋江草庵发现明教会黑釉碗》,《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② 1989、1990年连续在福建莆田县涵江区找到摩尼教残碑,经辨认,全碑刻的是“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与草庵摩崖石刻内容相同。

③ 黄震:《黄氏日钞分类》卷八六《崇寿宫记》。

(1237年)对摩尼教的评论：“今摩尼尚扇于三山，而白莲、白云处处有习之者。大抵不事荤酒，故易于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近于为善。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自盛。”三山(福州)的摩尼如此，温州的明教更遍于各村，政和四年(1114年)明教在温州所设斋堂已有四十余处，并且私建无名额堂。宣和二年(1120年)十一月四日臣僚的奏章中更明白提到：

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星期日——引者)，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煽愚民，夜聚晓散(《宋会要辑稿·刑法》)。

政府虽明令禁止，但摩尼教俭朴、互助、友爱的结社思想，像野火春风一样迅速传开。十二世纪初庄季裕《鸡肋编》卷上以事魔食菜教相称，记述他们的结社互济：

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

这些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事魔，具有平分财产、贫富平等的思想，在教理上已带有六世纪以来在伊朗、伊拉克流行的马兹德教的色彩。马兹德教的创立者是波斯人马兹德，约在487年生于纳沙布尔，提倡新二元论。他的学说也认为宇宙间存在光明与黑暗之争，但与琐罗阿斯德教、摩尼教不同，主张人类生而平等，金钱应该共享。马兹德断定金钱多半是人类争战与离异的原因，因此金钱也应如水、火、草、

木,人人得而共享。马兹德教徒虽在533年遭到屠杀,但马兹德的主张却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后,继续得到人们的拥护。伊本·海克尔说,直到八世纪中叶伍麦叶朝终止时,克尔曼各地的村民都是马兹德教的信徒。

塔巴里对马兹德教有这样的评论:“马兹德和他的信徒,宣称他们是抑富助贫,取多济寡,人们不应占有多余的金钱、妇女、商货。于是市井流氓乘机而起,与马兹德的信徒并肩作战,参加马兹德教徒的活动。人民遭浩劫,而马兹德教却日益扩展,甚至强入私宅,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不久,闹得父子反目,财产受到劫夺。”又说:“马兹德以金钱、妇女的平等,作为该教的主张,以为必须如此,才算做到了安拉所倡导的善行,才会得到安拉的酬报。马兹德认为,他的教派虽不是禀承安拉的使命,却是一种善良的行为,因为安拉旨在使人类平等”^①。奥斯曼哈里发(644—656年)时,阿布·宰理从伊拉克和也门的马兹德教派吸收了贫富均等的思想,他认为有钱而不用于主持公道,死后头、额和全身必受火烧。于是引得穷人起而攻击富者。而阿布·宰理廉洁而侠义,在民间深受爱戴,对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很有影响。福建的摩尼教早期寺院曾依附佛教,而民间极为炽盛的结社,显然是由于那种均贫富、和衷共济的教规深得人心。流入浙江温州的明教行者,在各地建立斋堂,甚至私建无名额堂,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②的“事魔”,当有许多马兹德教的成分和阿布·宰理的苏菲派教义在内。

十世纪以来,福州、泉州各地外商出入,伊斯兰教徒驻足其地,也是福建沿海流行摩尼教、并进一步杂有马兹德教派思想的重要原因。

^① 塔巴里:《先知与帝王史记》第2卷,第88页,见《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中译本,111页。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上。

伊本·纳迪姆《百科全书》就曾说过：“摩尼教中的许多领袖，表面上虽改宗伊斯兰教，实际仍然崇奉摩尼，伍麦叶朝最后的哈里发穆尔旺的老师便是其中之一。”福州、泉州，乃至温州流行摩尼教或事魔的斋堂，正是宋代与阿拉伯世界发展海上贸易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摩尼师呼禄法师最先赴闽，传扬北方正宗摩尼教。但此后，在东南沿海，许多乡村中出现了以明教自称的斋堂和无名佛堂，直到1120年，即方腊在浙西发动起义的一年，这些民间的信徒仍恪守摩尼教以密日（星期日）建设道场、夜聚晓散的活动方式。该年冬季，方腊聚众在浙西淳安起义，影响达于三路十八州军，温州永嘉的“大翁”俞道安、台州仙居的吕师囊亦都在摩尼教的旗号下起而响应。于是统治者便以“诸路事魔聚众烧香等人”相呼（《宋会要辑稿·刑法》），下令焚毁《二宗经》以外一切传习经文。此后数十年间，“事魔食菜”便成了官府对摩尼教及其支派的专称。摩尼教因早先传习的经文禁毁，活动方式也更灵活多变，民间秘密结社的白衣宗教已逐渐脱离早先摩尼教的教规，以白衣善友为名，聚集结社。渐有均贫富、结帮集资的会社组织，与西亚马兹德教派聚众起事、共同对付豪绅富室的做法极相类似。活动方式也比较自由，由密日结聚变成平居暇日、公为结集。

政府对这种民间结社，以左道、邪教相视加以禁断，而信者依然日众，到十二世纪末，干脆以道民的面目出现，假借佛道，托附生存。庆元四年（1198年）九月十三日，臣僚上言道民便是吃菜事魔的流变：

浙右有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托于佛老，以掩物议。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辄于编户之外，别为一族。奸淫污秽甚于常人，而以屏妻子断葷酒为戒法。贪冒货贿甚于常人，而以建祠修桥梁为功行。一乡一聚，各有魁宿。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撰造事端，兴动工役，夤缘名色，敛率民财，凌驾善良，横行村疃。间有

斗讼,则合谋并力,共出金钱,厚赂胥吏,必胜而已。每遇营造,阴相部勒,啸呼所及,跨县连州,工匠役徒,悉出其党,什器资粮,随即备具。人徒见其一切办事之可喜,而不知张皇声势之可虑也。及今不图,后将若何!乞行下浙西诸郡,今后百姓不得妄立名色,自称道民,结集徒党(《宋会要辑稿·刑法》)。

道民的兴起于浙江各地,是摩尼教在民间普遍流传的表现,此时浙江的摩尼教流派甚多,实已远胜福建。

浙江的寺院式摩尼教受到官府保护,大多依托道教,所以民间摩尼教在南宋后期多以道民自称。四明(宁波)的崇寿宫,曾由宋代思想家黄震写作《崇寿宫记》,其历史大约可上溯到北宋初期。建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的泉州石刀山麓的摩尼寺,由僧人吉祥募资供奉摩尼像,号曰摩尼寺。温州的摩尼寺潜光院,可能早在南宋末便已出现。另一座选真寺,则大约略晚于泉州石刀山的摩尼寺。

温州潜光院,据元代文人陈高(1314—1367年)《繫舟渔集》卷十二《竹西楼记》载,温州平阳炎亭,三面负山,东临大海,有潜光院,“潜光院者,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林国流入中土,瓯越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每一食,昼夜七时,咸瞑拜焉”。陈高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七月望日作记时,潜光院主持是石心上人,而创建此院的是石心之师德山,据此,推测大约在十三世纪末已有潜光院了。

温州苍南县括下乡下汤村,在1989年出土了孔克表所作《选真寺记》的碑刻。碑文较之民国十四年(1925年)刊行的《平阳县志·神教志》所录更为翔实。碑文说,平阳郭南行百十里,有鹏山,是彭氏世居之处,立寺“曰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盖彭氏之先所建也”。碑文原有“彭君如山奋谓其侄德玉曰:“寺,吾祖创也”,为《平阳县志》录文所脱^①。碑文作者孔克表(约1301—1373年)与陈高一样,都是

^① 周梦江:《从苍南摩尼寺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

平阳人。《选真寺记》虽不明写作年月,但从碑文内容可知为彭如山先祖所立,年代当比潜光院为早。

在温州建立选真寺、潜光院等依托佛道的摩尼寺的,是来自漳州、泉州的移民。瓯海县川沙《周氏族谱》说:“乾道(1165—1173年)间,吾温遭洪水患,所余黎民靡有孑遗。奉旨徙福民实其都。”于是这些来自福建的摩尼教徒,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创建了选真寺、潜光院等摩尼寺院。

元代自至元到皇庆(1271—1312年),摩尼教寺院和景教一样,受到政府保护,并明令放任传教。泉州石刀山、华表山的摩尼寺、草庵寺,在大德(1298—1307年)年间均经修复。1954年泉州通淮门外津头浦发现汉字石碑一块,两行五十三字:

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八古、马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首句系古叙利亚语的汉译,意思是“献给江南诸路明教(摩尼教)、秦教(景教)的管领者,最尊敬的基督教主教马里失里门”^①,碑文立于1313年。元政府对两浙、江东西盛行的“吃菜事魔,传习妖教”的民间结社,概以乱众左道相视,严加禁断。元代对“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元史·刑法志》),是对两浙、江南民间有组织的摩尼教社团而言。

明代一开始,就因明教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②。明律规定:“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③清律遵此以

① 刘南强:《华南沿海的景教和摩尼教徒》,《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② 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

③ 《明律集解附例》卷一一。

行。福建、浙江摩尼教寺院因而衰废,泉州华表山草庵在明英宗正统(1436—1449年)后受佛教排斥而荒芜。1552年安海明教徒起而反抗,晋江知县钱鞭将草庵作为镇压起义的指挥所,事后并刻石吹嘘其功绩。嘉靖后草庵才成荒址。据《闽书》载,明末摩尼教因遭不断打击而不能生存,“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名师氏法,不甚显云”。清代摩尼教在民间已与各种以符咒、坛主为特征的迷信活动相糅合,而难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了。

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东汉首都洛阳,是佛教进入内地以后弘扬该教的重镇。各国僧侣在二世纪以后陆续来华传教,大月氏、天竺、康居、安息高僧占有重要地位。安息高僧以安清、安玄、昙无谶、安法贤、安法钦为最著。

桓帝(147—167年)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佛教虽有经典,但传译无几,语多托附黄老道学。安清、支谶来华,对佛教经典的翻译不遗余力,佛教才在洛阳等地得到广泛的流传。

安清,字世高,安息高僧。在西域各国来华传教的僧侣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安清原是安息国王库思老(Chosroes C. 106—C. 130)之子,嗣位不久,厌倦政事,让国于叔父沃拉加色斯二世(Vologases II, 131—147年),誓志考察各国,研究佛教经藏。148年,安清抵达洛阳,从此终老中国。佛教有较多的信徒,多半仰赖安清与支谶的翻译。安清对教理有精深的领会,又能加以讲解。他本人精通梵典,来华不久,又通解汉语,善于译经传教,严浮调《十慧章句序》说汉代对之尊称为安息菩萨:“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后世又称竺朔佛为天竺菩萨,支娄迦谶为月支菩萨,法护为天竺菩萨,安清则是首先赢得时人公认的佛学大师。

自148年到171年,安清共译经39部,而道安《经录》只列出35

部四十卷。安清善于对法,称阿毗昙师,简称毗昙师。毗昙常按法数分列,纲目明晰,文传之外又加以口头讲解,逐条论说,按经典中的事数,举七法、五法、十报法、十二因缘、四谛、十四意、九十八结,一一加以疏理。《阿含口解四谛经》、《十四意经》、《九十八结经》,都是安清的讲稿,不只是译经了。在阿毗昙中,特说禅定法数,所译经也以禅数最为完备,对后世禅法的流行影响尤大。汉魏之际,学佛的都风尚安清所传大乘禅法,他所译大小《十二门经》、《明度五十计较》、《修行道地经》都是禅经。安清译作中的大小《安般守意经》,尤其是中华最初流行的教法。念安般,即是持息念中十念之一。安般,即出息、入息,与中国道家以呼为出故、吸为纳新相似。道家以导气养性度世而不死,或以食气者寿。东汉末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的吐故纳新之术,似与安清所传禅法类同,成为汉代佛道相互依附的根据。汉魏时代,安般禅法因此而得以盛行。安清在洛阳宣讲佛理,听者云集。《道行经后记》说洛阳城西有菩萨寺,或者就是安清止息的地方。安清的足迹遍及长江的庐山、会稽,又到过岭南的广州。最后死在豫章(南昌)的郑亭庙。佛教在南方的传扬,安清是首开风气的人物。

安清的入门弟子有临淮严浮调(严佛调)、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集大成的则是康居僧侣康僧会。传说安清生前曾封函地下,预言“尊吾道者居士陈惠,传禅经者比丘僧会”。陈惠是华人,僧会是中亚僧侣,当时传布佛教,大致仍难脱离外籍佛僧。

继安清来华传教的有安息优婆塞(居士)安玄。安玄在灵帝末年(189年)到洛阳经商,因功封骑都尉。后来信奉佛教,参与法事,学习汉语也大有进展,以宣讲佛典为己任,人称都尉玄。他与临淮严浮调合作,由他口译梵典,严浮调加以笔录,译成《法镜经》。严浮调在安玄启发下出家修道,是早期华僧之一。严浮调受安清与安玄的教诲,专心修佛,世称安侯(安清)、都尉(安玄)、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在当时佛典传译与宣教事业上,安息僧侣的重要,于此可见。

魏晋之际,安息佛教渐衰,祆教作为萨珊波斯的国教,大为兴盛。安息佛教僧侣来华传教的,有魏正元(254—255年)年间到洛阳的县谛,265年来华的安法贤,281年来到中国的安法钦。隋唐之际的佛学大师吉藏,则是安息移民之后,以弘扬佛学著称的大师。

在汉晋间传译佛教的,大多来自伊朗世界的佛教徒,他们带来了宣扬光明及西方乐土的伊朗思想,以及借助于中古波斯语和东伊朗语的词语,对中国佛教的形成与成长产生了极为有利的长远效应。法国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就曾作过如此的评论:“在二、三世纪,以安世高为首的佛教的第一批大翻译家,乃是康居人、大月氏人、波斯人,印度人只是少数几个。所以有些教义,如与无量光明阿弥陀佛及其西方极乐世界相关的佛教理论,都浸透了伊朗思想。大家都知道,一大批佛经是由住在中国新疆的伊朗人精心创作而成。这就不难使人理解,有些词汇尽管是借自佛教的术语和专名,却是仰赖伊朗语的格调传入的。”伊朗传统思想中代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际(或三界)以及对乐土的追求,都以特殊的方式与中国的佛教相糅合,而成为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四、十叶派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十叶派在穆罕默德逝世后,作为承认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为唯一合法继承人的穆斯林派别,最初由赛尔曼·法里西、阿布·达尔和米格达德·本·阿斯瓦德·辛迪三人组成。只有他们三人在先知去世时拥护阿里当继承人。“十叶”是阿拉伯语 Shi‘ah 的音译,意即“阿里的同党”。先知的其他战友则因效忠阿布·伯克尔,被大多数十叶派人视为对先知的变节。从此,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便出现了主张伊玛目职位属于麦加的古来氏族的逊尼派和只承认伊玛目应当由先知家族成员阿里的后裔来担任的十叶派的分歧和斗争。但十叶派在

政治领域里长期遭受挫折,只得将主要精力放在宗教教义的思考 and 活动上。十叶派按照对伊玛目地位的解释,又分裂成宰德派、伊玛目派和极端派三个派别,并有许多支派。

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波斯人,从一开始便参与了十叶派,以对抗逊尼派的统治。860年以后,由十叶派建立的国家相继在里海、也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和北非出现。伊玛目派(称十二伊玛目派)成为十叶派中人数最多的教派。伊朗人口的大多数,伊拉克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该派的信徒。在阿拔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统治时期,十叶派曾经在宫廷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哈里发麦蒙(813—833年)一度采用十叶派的绿色服装作为国家服色。945年布韦德人进入巴格达后,十叶派在首都站住脚跟;直到1055年塞尔柱人进驻巴格达,十叶派在帝国的心脏地区才盛极一时,规范的圣训集《四圣书》便诞生在这一时期。系统的十叶派神学,则开始于旭烈兀的宰相、波斯学者纳速刺丁·杜西(1201—1274年)的《信仰分析》一书的发表。由于元朝和伊儿汗国的特殊关系,十叶派教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扬。

1502年兴起的萨法维王朝(1502—1736年),公然承认十叶派的教义,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各地建立了十叶派的神学院。十六、十七世纪也是十叶派神学家多产的时期。这使元、明时代的中国穆斯林,通过元代创办的回回国子学和以后采用波斯文的经堂教育,受到了十叶派教义的熏陶。其中居住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是十叶派中伊斯马仪教派的信徒,他们崇奉穆罕默德、阿里、法蒂玛、哈桑和侯赛因这五位圣人。

中国穆斯林之有别于其他国家伊斯兰教的是,他们不像逊尼派教徒那样注重《古兰经》经文,而更致力于引用名为《塔夫西尔》的古兰经注释。他们常以十叶派信徒通用的名字,如阿里、法蒂玛、哈桑、侯赛因为自己的名字。中国阿訇在讲经时,对阿里(第四位哈里发)的

骁勇善战尤其孜孜乐道。《古兰经》原文虽是阿拉伯文,但中国的伊斯兰经堂用语,习惯沿用波斯语词汇。如中国穆斯林以胡达(Khudan)称真主,以诵经礼拜为纳马兹(Namaz);一日五次祈祷,分别称晨礼为榜不达(Bambad),称午礼为擗申(Pashin),称晡礼为底格儿(Digur),称昏礼为沙姆(Sham),称夕礼为虎甫滩(Khuftan);以阿訇(Akhund)称教师,对穆斯林呼作木速儿蛮,以别庵伯尔谓先知。用词都是波斯语。

波斯十叶派教徒在宋元之际充斥于中国沿海各地,扬州、杭州、宁波、福州、泉州都有他们的踪迹。现存最早的十叶派寺院,即是1310年在泉州通淮街重修的圣友寺(通称泉州清净寺)。根据阿拉伯文的修寺碑刻,修寺者自称阿里派教徒:

本地人士的第一座礼拜寺,便是这座公认最古老、悠久、吉祥的礼拜寺,建于伊斯兰历四〇〇年(1009—1010年)的艾苏哈卜大寺(圣友寺)。三百年后,艾哈曼德·伊本·穆罕默德·贾德斯,即设拉子著名的鲁克伯哈只重修此寺,扩建了高悬的穹顶、宽裕的甬道、崇高的寺门和崭新的窗牖,在伊斯兰历七一一年(1310—1311年)竣工。此举为博取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喜悦。愿真主宽恕他,宽恕阿里派教徒,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

元末泉州各清净寺相继毁废,而通淮街清净寺却得以留存,也是由于十叶派在泉州的得势。起于1357年(至正十七年),终于1366年(至正廿六年)的泉州亦思巴奚事件,是由于十叶派的波斯戍军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首先率领部下占据泉州,夺取了原为逊尼派蒲氏家族所控制的泉州外贸大权所致。经过十年反复,最后陈友定在兴化郡穆斯林千户、十叶派信徒金吉的里应外合下,平定了蒲氏家族那兀纳的亦思巴奚军队叛乱。泉州法石乡郭氏的始祖就是元代的波斯人,二十世纪惠安白奇乡和泉州法石郭姓子孙祭祖时,所行的投石仪式,是朝觐过程中仿效伊斯马仪投石斥退魔鬼的行动。这种仪式可以

追溯到神秘主义的苏菲派教义对于创始人尊为圣徒的崇拜。

十叶派教义通过苏菲派神秘主义的修道方法,在中国的穆斯林中也得到传扬,集中反映在中国穆斯林的门宦制度中。在经堂教育和十六世纪以来汉文伊斯兰教著述中,同样受到广泛的注意和介绍。马复初(1794—1874年)的《道行究竟》、马卿伯的《教款捷要》,也都反映了十叶派教义。马卿伯将马赫迪(救世主)与“至贤”联系在一起,并按十二伊玛目派的观点,认为阿里传至十一位子孙。《教款捷要》阐释伊斯兰教的八大根据时,提出:“知圣人之后,阿布·伯克尔为正道上之伊玛目,为哈里发,其意掌理贵圣之教条,施行法律之轻重,代圣传道,继往开来。伊之后,传至奥玛尔。伊之后,传至奥斯曼。全备于阿里。伊之后,又传至他十一位子孙。凭至圣之言,俱是在正道上为伊玛目。”又说:“此八事乃教门之根原,若知之即为认主独一无二之人。复生之日立于圣人绿旗之下,得其脱离。”并表示:“世尽之期,其道大如圣,权大如王,仍代理至圣之位也。”

十叶派的教义、教法,自元明以来已在中国穆斯林中随着门宦制度、经堂教育和波斯侨民、外籍信徒的宣扬而得到流传;在近代伊斯兰教汉文著作中,更有比较全面的反映。

第二节 在中国的伊朗人

一、华化的伊朗人

公元二世纪以来,移居中国内地的伊朗人逐渐增长。早期佛教高僧中出身安息人的安清、安玄,由于译经传教而名垂青史。

汉代安息侍子到洛阳,随从者也有定居中国的。安同,据说是安清的后裔,出身王族,先祖是移居洛阳的安息王子,经三国、两晋,避

乱移居辽东。安同之父安屈,任慕容暉(360—370年)政权的殿中郎将,370年前秦苻坚灭前燕,安同因经商辗转跟随拓跋珪,成为北魏开国功臣。在北魏太宗明元帝(409—423年)时任右光禄大夫,是个佛教提倡者,在冀州大兴寺塔。死于神䴥二年(429年)。安同子侄都身任要职。

北魏时入居甘肃酒泉的,有安吐根的曾祖。魏末,安吐根充使柔然,被留在塞北。此后,安吐根暗通北齐高祖高欢,在534年柔然使团到晋阳时,向高欢告密,阻止了柔然的入侵。后来屡使中原,被柔然识破,只得公开投奔高欢,历事北齐各帝,皇建中(560年)加开府,577年北齐灭亡的那年去世。

甘肃姑臧(武威)也是安息移民聚居的地方。唐代安令节的先祖是武威姑臧人,西安出土安令节墓志铭称:“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幽州宜禄人也。”安令节在长安四年(701年)因病终于长安醴泉里的私第,春秋六十。其子如岳、国臣、武臣在神龙元年(705年)将父葬在长安县的龙首原。

南方的广州也有安息移民。唐初高僧吉藏的先祖就是来自南海的交广移民。《唐高僧传》二集卷十一释吉藏传记:“释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广之间。后迁金陵,而生藏焉。”幼时见来华传教的印度高僧真谛,取名吉藏(549—623年)。唐军占领长安后,吉藏受到高祖李渊的接见,是唐初佛学界重要人物。

唐初波斯王伊斯提泽德三世(632—651年)被新兴的大食军队战败身亡,其子卑路斯率领部众流亡长安,意在争取唐朝援助,恢复萨珊王朝。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斯都客死长安,他的随从也都成了华化的伊朗人。出身望族的阿罗憾和由唐朝宦官骆奉先抚养成人的李元谅,极有可能是卑路斯等波斯王族及其随从留居中国的成员,因

事迹突出,列入正史人物。

洛阳出土《波斯君丘之铭》,清末为端方所藏,《陶斋藏石记》卷二十一录有全文^①。林宝《元和姓纂》卷五列举波斯姓,波斯君丘墓志铭可称是一个实证,铭文前段记:

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
波斯君丘之铭

君讳阿罗噉,族望,波斯国人也。显庆(656—660年)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有称,名闻[遐迩],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北门[]领使,侍卫驱驰。又差充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林西界立碑,岷岷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诸国肃清,于今无事。岂不由将军善导者,为功之大矣。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立功,非其一也。此则永题麟阁,其于识终。方画云台,没而须录。以景云元年(710年)四月一日,暴憎过隙。春秋九十有五,终于东都之私第也。

阿罗噉既奉使拜占庭,又传扬景教,是七世纪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风云人物。

另一位波斯人李元谅(724—785年),原名骆元光,本姓安,也是安息人后裔。少年时被宦官骆奉先收养,冒姓骆氏。长大后,李元谅体魄魁梧,勇敢多谋,从军充当宿卫,后来升任镇国军节度使。784年奉命与副元帅李晟克复长安。继而讨平李怀光,随副元帅浑瑊与吐蕃会盟平凉,击退了吐蕃的伏兵,得到德宗的嘉奖,加官右金吾卫上将军,又赐姓李氏,改名元谅。

波斯人投奔突厥而后又移居中原的也不乏其人。隋末有名彻、字姑旺的突厥人,在大业十二年(616年)三月十日死于洛阳。出土墓志铭失去铭盖,不见其姓,志文中说墓主是“塞北突厥人”。又说是“侠侄

① 后归日本东京博物馆。

之苗胄,波斯之别族”^①。另一名具有伊朗血统的突厥将领,是安附国(598—680年)。李致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说,“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姓”(《全唐文》卷四三五)。附国祖父乌唤,投奔突厥,位居二品的颉利吐发。父亲朮汗在贞观初率领部众五千人移居内地,唐朝设维州(四川茂县),任朮汗为刺史。后升任左卫右监门卫二大将军,封定襄郡公。长子思祗任右玉铃卫将军、北平县公;次子思恭任鲁州刺史,族裔已由西南入东北。

凉州姑臧(甘肃武威)是安国移民聚居的地方,而安国(布哈拉)人士又多属安息胡人的后裔,因此《隋书·西域传》卷八十三竟认“安国,汉时安息国也”。有许多安姓移民具有伊朗血统,是在情理之中,随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的安如实,恐怕也是移居中亚的伊朗人的后裔^②。但汉代布哈拉在康居西境,不属安息,该地居民颇多粟特人、塞人,并非伊朗人。

供职唐朝的萨珊王族,直到九世纪还大有其人。1955年西安市上门村出土的唐苏谅妻马氏墓志,上半是帕拉维文(中古波斯文),下半是直书的汉文。志文简括地将死于咸通十五年(874年)二月廿八日(公元874年3月19日)的苏谅妻马氏墓葬经过予以说明^③。马氏的丈夫苏谅(Sūrēn)出身名门,是安息、萨珊两个王朝伊朗南部的显赫家族,汉代乌弋山离国即是苏谅(或译苏邻)家族所统治,苏谅的萨珊(Sāsān-i-Sūrēn)也是萨珊王族所出氏族,见于萨珊沙卜尔一世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5页。

② 笼统地认为安姓是安息胡人之后,出于安国(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2期),欠妥,认肃宗时名将李抱玉、李抱真为帕提亚人(安息人),亦同。唐昭陵陪葬陵安元寿墓,在1972年出土墓志,已证实安元寿是安兴贵之子,始于北周时曾祖安弼,《元和姓纂》卷四将北魏安难陀的曾孙当作安兴贵,又以李抱玉为其玄孙,是将安难陀、安兴贵、李抱玉三家合而为一,殊属错误。

③ 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壁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1—116页。

Ka'ba 祆教铭文第二九和三一行。马氏是这位任唐朝左神策军散兵马使的苏谅的妻子(帕拉维文作女儿),这就交待了终唐一代,在保卫京师的神策军中,一直有许多波斯军人服役,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出身王族的武弁,亦即当年卑路斯在长安组织流亡政府的人马。

五代时华化波斯人,享有美名的是李珣兄妹。唐代波斯人久居中国,大多经商或供职军队。唐末李珣兄妹,出生梓州,自幼受中国教育,汉文汉语根基深邃,善文能诗,又精通医药。李珣,字德润,五代何光远《鉴戒录·斥乱常》卷四说他本是蜀中土生波斯,先祖波斯人,在中和元年(881年)随僖宗入蜀。僖宗出奔西蜀,仅有四王及妃嫔数人相从,李珣的先祖当是担任禁卫军的随从人员。李珣自幼苦学,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所著《琼瑶集》,不久佚失。今《全唐诗》卷七六〇辑其诗三首。《全唐诗》卷八九六据《花间集》、《尊前集》录其词五十四首(其中《渔父歌》又见卷七六〇)。李珣又善医药,与弟李玘有同样的专长。

李玘,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四称其四郎,在李氏三兄妹中年纪最小。李玘华化最深,因此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贩卖香药为业,是从事进出口药物、香料的行家。又善弈棋,好摄养。迷于炼制金丹,在致青城南六郎的书信中,讨论淮南王炼秋石之法,是个炼丹术士。晚年因耗资炉鼎而贫困,唯道书药囊而已。

李舜弦,有文才,能诗善画,前蜀后主王衍纳为昭仪,《全唐诗》卷七九七存有她作的《随驾游青城》(925年)、《蜀宫应制》、《钓鱼不得》诗三首。杨慎《词品》考出《花蕊夫人集》中的《鸳鸯瓦上》是舜弦所作。

供职前蜀、后蜀的石处温,出生万州(四川万县),路振《九国志》卷七称他“本波斯之种”,似乎也是唐末入蜀的波斯人后裔。在前蜀,任利州司马,后蜀孟知祥将他升到万州刺史,又移简州刺史,以八十高龄死于蜀中。

宋元时代,波斯人取道海上来华的日益增多,有经商,有传教,也

有在广州、泉州外国人聚居区(蕃坊)充任教长(蕃长)的。自十世纪起,波斯、阿拉伯城市流行的伊斯兰长老(Shaykh al-Islam)制度,是管理教民的最高权威,领取政府薪俸,属于伊斯兰教的官方代表,唐宋时代称作蕃长,元代正式音译成偈思廉夏^①。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谈》说广州蕃长“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在服饰上也已中国化,已符合中国官员的身份。

绍兴元年(1131年),撒邨威人(西拉夫人)纳只卜·穆兹喜鲁丁从波斯湾航海,定居泉州,建造清真寺,并买田土房屋予众,势力之大,一时无二。岳珂《程史》卷十一径称此人为“尸罗围”,以之比于广州蒲姓阿拉伯富豪。在泉州,从事农副生产、就地居住的波斯穆斯林不在少数^②。元代波斯人充当泉州蕃长的,有伊斯法罕人凯马勒丁·阿卜杜拉。1345年伊本·白图泰到达泉州,当地谢赫就是这位伊斯法罕的学者。白图泰还提到卡泽伦人不鲁罕丁,在城郊管理一座清真寺,他是海外贸易商对卡泽伦海神阿布·伊斯哈格缴纳祭品的代理人。不鲁罕丁在皇庆(1312—1313年)中到泉州,至正九年(1349年)出任谢赫,重修清真寺,主持教务近六十年,享有一百二十四岁的高寿。当时清净寺设有宣讲师哈梯卜,大不里士人舍刺甫丁曾在十四世纪中叶任寺中哈梯卜,善于默诵全本《古兰经》。泉州清净寺在1983年修葺时,在明善堂发现的墓碑中,有两方是大不里士人的,一是罗占丁·本·萨姆森丁·穆罕默德,一是哈申族艾哈默德的儿子鲍汉温丁·奥玛尔。奥玛尔是第十八代教师哈申的后裔,早于第二十一代的穆罕默德。墓碑表明,奥玛尔死于回历764

① 吴鉴:《重修清净寺记》,见何乔远《闽书》卷七。《清净寺记》石刻,撰于至正十年(1350年),见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图21。

②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中有二块南宋碑石,波斯人曼苏尔·本·葛斯姆的墓碑是其中之一,墓主卒于景炎二年(1277年)。

年7月8日。两名大不里士人恐都是寺中神职人员。不鲁罕丁的儿子夏敕继任父业,活到一百十岁。他的后裔夏彦高在明代正德(1506—1521年)年间、夏东升在隆庆元年(1567年)、夏日禹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相继主持清净寺,开伊斯兰教掌教世袭之风。由此可以窥见不鲁罕丁家族华化之深,与当地华人及波斯侨民相处之善。

元代伊朗人居官的,据史籍可以明确的,有赛夷(锡斯坦)人札八儿火者。赛夷是西域部族长,札八儿因以为氏,火者(哈只)是头衔。札八儿跟从成吉思汗,遭汪罕袭击时,成吉思汗率十九人逃出重围,札八儿是其中之一。破金国时,札八儿设计夺居庸关。后留守中都(北京),授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每战常披重甲冲锋陷阵,曾乘橐驼奋战,众莫能当。死年一百十六岁。他的儿子阿里罕、明里察都身居高位。阿里罕随蒙哥征蜀,任天下质子兵马都元帅,阿里罕子哈只任湖南宣慰使,哈只子养安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明里察子亦不刺金,任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元史》卷一二〇)。

彻里帖木儿,《元史》卷一四二称阿鲁温氏(Hulwan)。阿鲁温在巴格达与克尔曼沙赫(Kirman Shahhan)之间。彻里帖木儿的祖父随蒙古军屡立战功,成为名门望族。至顺(1330—1331年)时任知行枢密院事,平定云南伯忽的叛乱,升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御史中丞。

阿鲁温又作阿鲁浑,一名阿鲁浑人哈只哈心,本镇守底格里斯河西岸渡口,后屈从蒙古军,从征立功,与蒙古联姻。长子早亡,次子阿散,有子暗都刺、凯霖,兄弟读书学礼,受华化教育,研习儒学,取字平叔、和叔。后来平叔死于北京。哈只哈心老家在伊朗,居官后仍时派使者往还,至元五年(1268年),哈只哈心以一百十七岁的高龄死于北京。

元代扬州颇多波斯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扬州南门外挡军楼出土穆斯林墓碑多方,其中有死于伊斯兰历702年3月23日(1302

年11月5日,元大德六年,壬寅)的哈基(Khaji)·阿莱丁;有亡于伊斯兰历708年(1308年6月21日-1309年6月10日,元至大元年至二年)的胡瓦贾·谢希德丁·拉赫曼;有卒于伊斯兰历709年12月2日(1310年5月3日,元至大三年,庚戌)的胡瓦贾·巴拉德·布里万利·占斯;以胡瓦贾(Khwāja)的波斯字为人名,表示学者、教长、富豪身份。有在伊斯兰历724年6月初(1324年5月26日至6月4日,元泰定元年,甲子)去世的贍思丁·拉希夫拉·巴拉吉,巴拉吉(bālagh)是伊朗北部的一个县,表示死者的祖籍。以及在伊斯兰历724年11月(1324年10月20日至11月19日,元泰定元年,甲子)去世的阿伊莎·哈通,都是波斯穆斯林。^①

明代仍有伊朗人移居中国。

伊斯法罕,明代译作亦思弗罕,永乐十七年(1419年)遣使向明朝贡豹、狮、西马,“有马哈木者,愿留京师,从其请”(《明史·西域传》)。

脱辛,或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中的塔八辛,在克尔曼东北有Tabasin。正统十一年(1446年)七月,脱辛地面镇抚回回恪来投奔明朝,命于南京锦衣卫带俸,赐房屋、器皿、衣食、牛羊、钞币等物(《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三)。

札答哈儿,是法尔斯省的古城伊斯塔哈儿,那儿是萨珊王的行宫,留有许多古建筑和雕塑。景泰五年(1454年)三月,“札答哈儿地面回回刺马丹来归,俱命为头目,隶南京锦衣卫,赐衣服、钞币、房屋、器具”(《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还有章迭儿迷失,是改姓章的波斯人。迭儿迷失为波斯语Darwish。此人在宪宗成化(1465—1487年)年间任北京锦衣卫指挥

^① 努尔:《扬州伊斯兰教碑文新证》,《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5期,阿莱丁的墓碑背面阴刻二十行文字,第一行和末尾二行为阿拉伯文,中间为波斯文诗歌。

使(《明英宗实录》一一九)。

自二世纪至十五世纪,伊朗人和伊朗化的中亚人士成批移居中国内地及西北边区,以他们的社会活动和生活方式,乃至审美和价值观念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他们甚至参与政治生活,对中国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事务起过一定的作用。

二、元代的波斯军团

元代的特种部队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主持这支部队的回回人出生伊朗木发里,名阿老瓦丁(阿老丁),还有旭烈人亦思马因。木发里(Moaferin)在迪埃贝克尔城东北,1260年被蒙古军攻克。旭烈即波斯的设拉子。两人在至元八年(1271年)来到北京,按抛石机原理制作大炮,称回回炮。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式设立炮手总管府。1281年升格为都元帅府,1285年改为万户府,定编置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另有令史四人、译史一人、镇抚二员。副万户由阿老瓦丁充任。大德四年(1300年),阿老瓦丁告老后,由儿子富谋只袭万户,后来又由其子马哈马沙继承。亦思马因担任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1274年死后由儿子布伯袭职。布伯在1281年出任镇国上将军回回炮手都元帅。1282年又晋升刑部尚书,以弟亦不刺金为军匠万户府万户,佩元帅虎符。致和元年(1328年)八月,亦不刺金部下军匠被调到北京,和马哈马沙一起造炮。1329年亦不刺金死后由儿子亚古袭职。

回回炮又称巨石炮,在元朝征服南宋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受到元朝统治集团的奖励,而主持这支军队和制造巨石炮的,是两名伊朗军人及其家族。

元代,东南沿海驻有波斯军团。在元末的泉州,构成1357—1366年间蔓延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战乱。亦思巴奚的波斯文是 Isbah,通

用于阿拉伯文、突厥文中,意思是“特种部队”、“民兵”、“骑兵”^①。《元史·本纪》译称义兵,专指招募的外籍雇佣军。泉州是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政府已调扬州合必军三千人镇守泉州,是当时设有兵戍列城的鄂、扬州、隆兴、泉州等四处中的一处。元末,更有湖州戍军调泉驻防。扬、湖戍军大都是波斯人,合必军便是一支波斯部队^②,在穆斯林中多属十叶派,与泉州的地方势力蒲寿庚、那兀纳一系属于阿拉伯人的逊尼派形成对立,在元末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拼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亦思巴奚的动乱由省宪构兵所引发。福州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和行省的廉访金事般若帖木儿不合,普化帖木儿派人勾结兴化的三旦八、安童和泉州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所部亦思巴奚兵,首先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由赛甫丁、阿迷里丁在泉州公开夺取政权,接着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普化帖木儿和般若帖木儿两派之间正式发动战争。普化调动赛甫丁、阿迷里丁的亦思巴奚兵进省。不久,赛甫丁、阿迷里丁和三旦八在兴化发生矛盾,三旦八被抓到泉州。至正二十年(1360年),兴化路林德隆、柳伯祥各有背景,互相厮杀,柳伯祥虽被逐走,柳的亲戚陈从仁却将林德隆杀死,陈从仁得到行省长官苦思丁的支持,扩大内战,林、陈两军成为仇敌。事态扩大后,兴化分省右丞苦思丁又在林军与赛、阿两人支持下,密谋斩杀陈从仁,赛、阿进军兴化。1361年,陈从仁被苦思丁捕杀,赛、阿亦思巴奚兵又在兴化平息了柳伯顺的势力。亦思巴奚的势力从泉州、福州扩大到兴化,引起继任福州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的不满,决意剪除普化帖木儿的党羽,支持泉州蒲寿庚的后裔那兀纳在1362年2月起而杀阿迷里丁一派,阿迷里丁的部下林珙、扶信只得逃回福州。该年五

① 前岛信次:《元末泉州的回教徒》(英文),《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卷32,1974年。

② 乾隆《泉州府志·军制》卷二四。

月,燕只不花下令各路军队围攻赛甫丁,结束了前五年(1357—1362年)的赛、阿戍军之乱。

那兀纳是掌握外贸、财政的逊尼派穆斯林,在泉州起兵逐走阿迷里丁党羽后据地自立,在至正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364—1365年),三次将分省兴化(或兴泉)的元朝官员赶走。那兀纳组织的亦思巴奚战乱,暗中得到燕只不花的支持,与非燕只不花的势力进行多年争战,在兴化、泉州、仙游等地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逼得民不聊生,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此时福建陈友定势力大振,击败入闽明军,乘机以平定那兀纳、剪除亦思巴奚为己任,元政府只得对他委以福建行省参知政事,怂恿他平息战乱,于1366年奉命讨伐亦思巴奚。五月,攻下泉州,生擒那兀纳,平定兴、泉二郡,结束了十年战乱。

第三节 科学技术交流

一、养蚕织丝

波斯人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因接触中国丝织品而知道有中国。绮,这种有花纹的暗花绸可能是最早风靡伊朗地区的织物。阿里安的《远征记》(Ⅲ,25)上说,亚历山大进军巴克特里亚时,有波斯人向他报告,柏萨斯以国王自居,身穿波斯皇家锦袍,自称阿太薛西斯,手中有一大批跟他到达巴克特里亚的波斯军队。皇室锦袍大约也是用从中国运去的丝锦裁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年)和色诺芬(前430—前354年)都提到“米地亚衣料”,拜占庭史家普罗科庇斯解释这种衣料是绢,当时已改称赛里(Serie)了。古代伊朗人仅知亚麻、棉毛,不能养蚕织丝。西汉以来,大宛既通,中国丝织物便得成批西运伊朗。丝路在西汉时代以安息为最大的转运站。安息王米特拉达二

世(前 124—前 87 年)对中伊两国的建交十分热诚,他在中国使团到达东部边界木鹿(今马里)时,派大军二万骑出迎,经数千里导引,使中国使团和所携丝绢等货物安抵国都。中国丝绢、漆器、铁器在伊朗赢得绝佳的声音,并成为安息从中获利的复出口货。

安息向中国订购的丝货中有大量的旗帜,用于军队和宫廷礼仪。公元前 54 年,罗马军团在克拉苏斯指挥下与安息军队在卡尔雷接战失利,他们被安息军队使用的色彩缤纷、威武异常的丝质军旗所惑,这些丝旗有许多是来自中国。公元一、二世纪时,安息军队已拥有大批丝旗。罗马作家佛罗勒斯(Florus,《史记》Ⅲ,2)、塔西陀(Tacitus,《编年》,XV,29)提到的安息军旗,常常是和龙的纹章一起出现的金光闪闪的旗。安息龙旗,据说是仿自罗马军队使用的龙旗^①,但这种罗马的龙旗竟又类似清代的龙旗!因此不妨推测:安息军队大量使用中国丝旗,连旗帜的式样也多少夹杂了汉代格调;后来这种安息军旗连同宫廷所用幡盖又被萨珊王朝沿袭,在中世纪被东方的突厥人和回鹘人所传承;同时这种三角龙旗向西又传到了北欧诸国^②。传导这种黄龙旗的源头,恐怕还在中国,也许当初就是由中国制造后直接运往安息的。安息的旗帜也常带有流苏,这是阿赫曼尼德朝已经使用过的。中国旗帜中使用这种流苏,虽然形制不完全相同,但一定在双方之间有过交流。军旗,连同军乐、骑兵与武器的相互影响,反映出中伊两国在军队的建制与战术上曾有过广泛的切磋。

尽管安息人久已经销中国丝织品,盛传希腊世界的“米地亚织物”极有可能就是中国丝织物,但古代伊朗要就地养蚕织丝,尚有许多在技术条件以外的经济因素。传递的过程也必须由东而西,经过新疆的鄯善、于阗、疏勒才能在伊朗高原立足。于阗大约在公元一世纪

①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 6 卷,第 2772 页。

② 阿克曼:《花毡,文明的镜子》,纽约—伦敦—多伦多,1933 年,第 52—53 页。

初,已由一位下嫁于阗王尉迟舍耶的东国公主传去蚕种,发展了栽桑养蚕业。东国公主是鄯善国的公主,她带去蚕籽,哺育成蚕,开始漂渍绵纩。缣丝织帛,最初在新疆全由内地迁入的汉人带去,斯坦因在楼兰故址获得的东汉初的丝织物中,有用汉式织法经线起花,图案系安息风格的菱格忍冬纹^①,有可能是河西人所织。到五世纪时,汉人移民增多,新疆境内的高昌(吐鲁番)、龟兹(库车)、疏勒都能纺织丝绸,并织造高级的丝织品锦,才使中伊丝织技术的交流成为可能。吐鲁番出土北凉永平五年(448年)的文书中,已提及“丘慈(龟兹)锦”。第一次波斯使者来华时,天山南路的文化城龟兹已是中国丝织业最西的基地,它自应成为技术西传的一个前哨。

伊朗民间传说,萨珊波斯的两位使者沿着丝路来到中国,学会了养蚕缣丝。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蚕种安放在竹筒中,把它们带回了伊朗,并以当地生长的墨桑,取以养蚕,获得成功。不久,又能纺织罗缎和后来名闻世界的波斯锦。波斯语中的 *valā*, 汉译为“越”,其实源出于“幡”,汉语中的幡由精细的罗纱制作,在于阗、龟兹等地佛庙中随处可见。四世纪末法显到于阗,519年比丘惠生经过这里,见到的悬彩幡盖成千上万。波斯使者东来大同、洛阳,于阗是必经之地,有些幡盖在当地加工制作,成为技术西传的一个窗口。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十六国时期(四世纪)禽兽纹锦袍残片,也可能是当地产品。与外国商人或使团人员交流纺织技术,在当时新疆境内普遍销售西亚和中亚羊毛、亚麻织物,并且建设毛毯工业的同时,彼此交流丝织技术,自有许多方便的有利条件。

波斯语中的 *nax*, 汉译为“诺”,是一种双面绒,也指锦缎,源出汉语的“缎”。《隋书·西域传》卷八十三列举波斯出产越诺布,亦即罗缎、绒布。同书所说的波斯织物锦叠(*dib*, 锦)、细布(亚麻布),毳毼(毛

^① 斯坦因:《亚洲腹地》(A. Stein,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年, 1, 256—257。

布、毡毯)、氍毹(花毡)、护那(guna,麻袋)、檀(古波斯语 Tanva,中古波斯语 Tanand,地毯)、金缕织成(zar-bāf,金线织绣毛呢),都是行销中国的名牌产品。锦叠,是波斯锦,“叠”是个汉译波斯词。梁朝普通元年(520年),嚩哒人首先将波斯锦作为贡礼送到南京,从此波斯锦便成为中国锦缎的一个竞争对手出现在西亚了。

六、七世纪,中伊双方丝织技术和图样纹饰的交流进入了高峰。

西亚古代纺织在平纹组织以外,尤多纬线起花的斜纹组织。伊朗大约在三世纪已从中国引进简单的提花机,纺织斜纹组织的暗花绮,对于伊朗并非是十分困难的。接着在仿制中国锦缎时,也保留了他们的纬线起花的传统织法,但最初



图 43 北朝联珠套环团花绮

(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08号墓出土)是仿照中国的平纹组织,后来参照平纹组织加以变化,发展成斜纹组织的织锦^①。这种富有伊朗技法的织丝工艺,在北朝后期至初唐年间,直接影响了新疆各地的丝织技术,使他们和伊朗的丝织工艺十分一致。1959年至1960年,先后在民丰县尼雅遗址和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北古墓葬区出土的汉唐丝织物中,有阿斯塔那高昌章和十八年(548年)至唐显庆六年(661年)出土的绮八件(图43),在织纹和提

^① 阿克曼:《波斯纺织技术》,见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702—714页;2182—2184页。

花方法上,都是素地起二至三枚经斜纹提花的织物,和汉绮的经畦纹起花大不相同。质地也较汉绮稀薄,不如汉绮致密。平均每平方厘米经 50 枚、纬 30 枚,最密的经 56 枚,纬 55 枚,最稀的经 42 枚,纬 26 枚^①。图案纹饰除传统的龟背纹、回纹、棋局团花鸟兽纹外,盛行遍地菱形回纹和联珠套环团花纹,在双线中夹联珠式圆环,环内充实动植物图案。这种图案具有明显的伊朗风格。另有一种中伊混合图样的织物,有 1966 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 48 号墓出土的六世纪的套环贵字纹绮。这件贵字纹绮,采用了伊朗东部风格的套环,同时又间以汉文“贵”字,织法也仍是底地平织、经线显花的“汉绮”组织。同类织物还有套环对鸟纹绮。

新疆出土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织锦,无论在图案与工艺上都与当地早先已经兴起的棉、毛纺织技艺休戚相关。1959 年,在巴楚西南脱库孜萨来古城遗址中出土一件北朝时期(六世纪)的织花毛毯,毛毯使用通经断纬的织法,是后来宋代缂丝工艺所用的技术^②,在织造技术与伊朗东部的织毯工艺有类似的地方。六至八世纪,自北朝后期至盛唐时期,新疆各地在出土的许多平纹经锦以外,更出现了纬线起花的斜纹重组织的织锦,这种织法仿自波斯锦的技艺。在纹样上,新疆同样盛行中亚、西亚所习见的方格兽纹锦、化生纹锦、联珠对鸟、对兽和联珠兽头锦、联珠骑士锦。相邻的珠圈常以散点组成同心圆的团花相连接。每四个珠圈中的空间,用花叶四向伸展的图案作装饰,这种图案早见于公元前 3000 年的推罗(Telloh)的金铃,后来又用于各种伊朗陶纹。斯坦因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曾获得许多波斯式样的织锦,有联珠熊头纹锦、猪头纹锦。1912 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也曾在同地发掘花树对鹿锦等异国情调的彩锦。斯坦因和大谷光瑞获得的这

①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 年第 7、8 期。

② 新疆博物馆:《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 年第 3 期。

些仿效萨珊波斯的花锦,都是纬线起花的新织法的实物。斯坦因发掘的织锦有绶带立鸟锦,1960年在332号墓(665年)的出土文物中,也有同样的发现。1969年,138号墓又有联珠鸾鸟纹锦。1960年,在325号墓(651年)的出土物中也有猪头纹锦。1969年,138号墓又出土了盛唐时期的联珠猪头纹锦覆面。

联珠圆饰在唐宋时代称球路纹,六世纪中叶至八世纪中叶在中国西北地区曾是流行的纺织图样。这类联珠骑士纹锦、联珠猪头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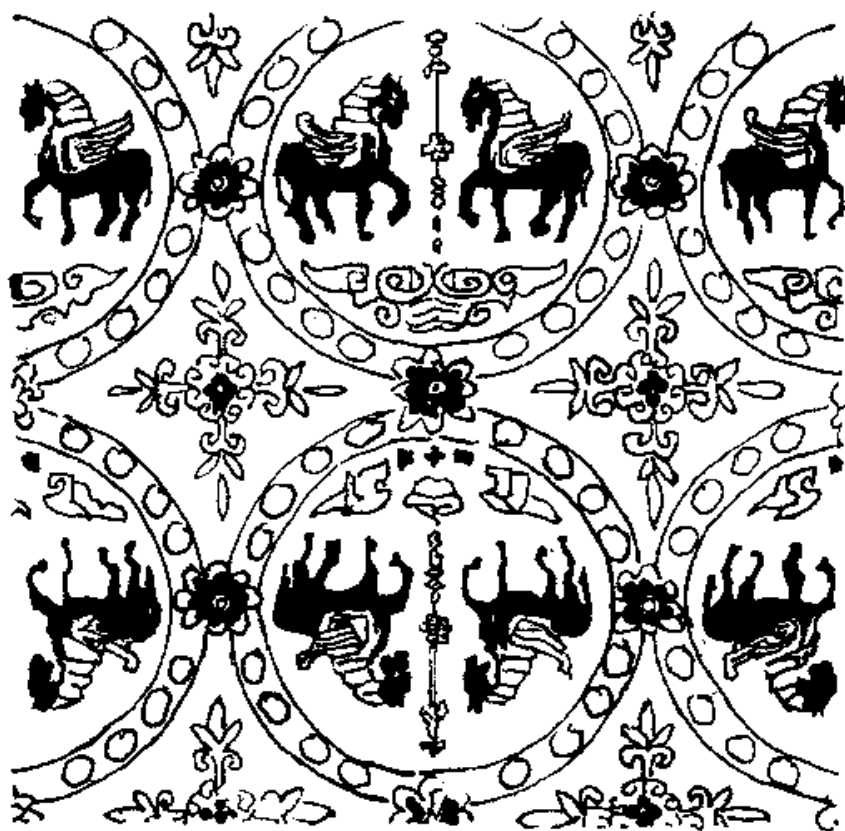


图 44 唐代联珠对马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锦、联珠鸾鸟纹锦和联珠对马纹锦(图 44),都是斜纹纬锦。中国丝织技术西传,伊朗和中亚最初仍保留传统的纬线显花法,采取了与汉锦经纬关系相反的平纹纬锦织法,后来又有了斜纹的纬锦。斯坦因在罗布淖尔楼兰故址中获得平纹纬锦两件,在阿斯塔那六世纪墓中发掘

一件平纹纬锦^①，这种织法大致在六世纪的新疆已经出现，到了七、八世纪风行斜纹纬锦^②。隋代，在长安的宫廷作坊中，也曾由何稠监督仿制波斯锦。夹有“胡王”和“贵”字等汉字的这类联珠纹锦，可以证实这类纬锦出自新疆和河西地区的中国织工之手，吐鲁番出土高昌延昌三十六年(596年)和义和四年(617年)两衣物疏同墓的隋代“贵”字联珠孔雀纹锦，便是其中之一(图45)。



图 45 隋代联珠孔雀贵字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① 西尔凡：《额济纳河和罗布淖尔出土的丝织物研究》，斯德哥尔摩 1949 年版，150 页。

② 竺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 年第 2 期。

汉锦中祥禽瑞兽的装饰风格一直流传到北朝,但在同时,由于中亚的媒导,西亚所有的散点遍地连续纹样和复杂多变的植物花纹也在中国工艺中得到了新的发展,促使织锦图案风格为之一变。联珠式珠圈纹的成对成双的动物图案更具有明显的萨珊朝工艺特征,进一步丰富了织锦图样。南宋成都锦院的产品中,仍有这种联珠纹的球路锦。同样,在辽代,联珠纹也有新的发展。1988—1992年,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日嘎苏木的辽代庆州白塔出土的刺绣6件,其中4件均在左右周边及下方作马鞍形(圆角)联珠纹边饰。最大的一件橙色罗地联珠云龙纹绣,以四窠联珠团龙为中心图案,幅宽59厘米,长80厘米,是又一幅富有游牧气息的中伊合璧的织绣精品。另一件红罗地联珠人物绣夹层经袱,以铠马骑士为联珠圈图案,上下各有双层直条联珠带作边,绣以蓝地白珠,已融为辽式装饰风格。^①

中国的缣丝工艺起于北宋,以河北定州最负盛名,其织法虽与古代的织成有类同之处,但并非一物。缣丝用通经断纬方法织造,在技艺上与伊朗织法亦有近似的地方。南宋时缣丝艺术向书画化发展,松江的朱克柔成为一时名家。西北的回鹘,在宋代散居甘肃、陕西,也善结金线,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又以五色线织成袍,称克丝(缣丝)。于此可知,缣丝在工艺上自有许多源出伊朗的成分在内。

北宋时代已有回鹘民族所擅长的捻金线技术,制作成批的金锦。《大金吊伐录》记靖康时开封被围,宋被迫向金馈赠礼金,其中有金锦一百五十匹。到元代,加金织物大为盛行,从波斯引入称为纳石失的金锦,译称“纳石失”或“纳失失”、“纳失思”、“纳克实”。波斯织金技艺起源甚早,金锦技术是蒙古西征后,从撒马尔罕和波斯各地迁入三千多户回回工匠,在弘州(原阳)和荨麻林(内蒙古万全以北)设立纳失

^① 德新、张汉君、韩仁信:《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图42、43、44,封底彩图。

失局开始。元朝统治者大量服用金锦,规定每年重大庆典十三次,都要给一万二千名大臣颁赐金袍(这种庆典举行的宴会称质孙宴),即颁行质孙服(质孙,波斯语御制之意),是规定的法服。《元典章》卷五十八中有关于纳石失的专门记载,并颁布了织造纳石失的条例,是一份难得的中伊金织技术文献。

十五、十六世纪的伊朗丝织、毛织业中,凤凰、龙、麒麟等中国吉祥如意的图案都一再出现。凤凰图像的豪放已足与中国同行媲美。在克尔曼等地的织物中,云纹已发展成设计巧妙的纹饰。同一时期,中国的牡丹、芍药等植物也成为伊朗莲花、忍冬纹和团花纹饰吸收的图案。

二、金属冶铸

中国进入铁器时代虽不算早,但中国一开始便是生铁、熟铁并用。西汉时代已出现低硅灰口铁和球墨铸铁,并由块炼铁渗碳钢进而发明了由铸铁(生铁)脱碳的百炼钢,采用生铁炒钢的新工艺。所铸铁兵器以锋利著称,骑兵所用长矛和剑都具有远近作战的优势。铸铁脱碳钢具有当时独一无二的先进技术,因而由汉朝逃亡的士卒将铸铁技术教给了大宛、安息的铁工。塔吉克语中铸铁就用“铸”字。安息王朝从中国输入钢铁,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XXXV 41,145)以“中国铁”(ferrum Sericum)相称。安息东境的木鹿(今马里)是中国钢铁的集散地,安息骑兵所用武器从木鹿运入,就地加工。由于所用刀剑用中国钢铁锻铸,十分犀利,在安息和罗马作战的年代里,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公元前53年,奥罗息斯将中国铁称作“马尔吉”,表示来自安息东境^①。差不多同时,罗马史家普鲁塔克将安息骑兵使用的坚实锋

^① 奥罗息斯(Orosius), W, 13.

利的武器,称作“木鹿武器”,而来源地实是中国,其中一部分是经由南印度的鸡罗运去的^①。波斯语称中国铁有两个字,fulad-i Khitayi, ahen-i tchinik,在古代,tchinik 或 tchêni(中国货),就是指的中国特产的铸铁,后来才用这个词称瓷器。直到1516年,契达伊还称炼钢的铸铁是“中国钢”(Thuvun-i Khitayi)。

伊朗冶铸优质钢,在中国南北朝已经闻名,《周书》卷五十、《隋书》卷八三都说波斯产镔铁,这“镔”字译自波斯语 spaina。

中国人很早冶炼一种铜镍合金,俗称白铜,三世纪下半叶的《广雅》卷八五说,白铜又称鍮。鍮是一种含40.4%铜,25.4%锌,31.6%镍,2.6%铁,并有少量银和砷的合金^②。公元前一世纪,大夏已根据中国传入的配方制作镍币。安息时代,白铜已进入伊朗。波斯人采用白铜,名为“中国铜”(khār êni),阿拉伯语名称也由此借用。波斯人大约在萨珊波斯时已经知道,中国人用这种白铜制作镜子和箭簇,制成的铜镜被认为可以避邪;由于箭头涂有毒药,谁中了这种箭,就会送命。哲理诗人麦阿里(973—1057年)在哲理诗集《鲁祖米亚特》中写道:“背弃友人的人,必须以白铜刺胸。”意思是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十三世纪波斯科学家卡兹维尼也兴致勃勃地谈到,用白铜制的矛和鱼杈,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波斯人又有一个 isfidruj 的词,意思是“白铜”,这个词显然比“中国铜”晚出现。迪曼斯基在1325年介绍的“中国铜”,是中国出产的一种黄铜与“黑白色铜”混合冶炼而成,从中国输入的一种变形镜“轩辕镜”就是用这种合金制造的。铜镍合金在波斯长期是个谜,它是古代中国的一种特殊合金。

被称作输石的铜锌合金黄铜,是伊朗和中国共有的一种合金。中

① 威明顿:《罗马帝国和印度的商业》,1928年版,第157页以下(又1974年德里增订本)。

② 劳费尔:《中国伊朗篇》。1868年弗莱特从大夏镍币鉴定的成分是,77%铜,20%镍,1%铁,并有钴、锡、锌、硫等成分。

国炼制黄铜甚早,天然的辉铜矿(Cu_2S)或黄铜矿(CuFeS_2)含有硫酸铜,炼制纯铜是汉代冶金的一项成就。1956年西安汉城遗址出土铜锭十枚,含铜量达到99%。《汉书·地理志》记丹阳郡(郡治安徽当涂)出善铜,是含铜极高的矿藏。汉唐之间,黄铜都以输石相称。三国时鍾会(225—264年)《乌菟论》曾论及输石色泽:“夫莠生似禾,输石像金。”(《太平御览》卷八三)输石色泽如金,因此有伪金之说。四世纪的《拾遗记》提到:“石虎为四时浴室,用输石珣玞为堤岸,或以琥珀为瓶杓。”输石是含有铅锌锡等元素的黄铜矿,汉代铜钱已含有4.11%以下的锌^①。这种矿石在萨珊朝波斯也已开采,《魏书》、《周书》、《隋书》都说波斯产输石。含铜量高的输石到唐代已很难得,于是有从炉甘石(碳酸锌)炼制黄铜的方法。波斯语中的 tutia,据波斯炼丹家拉齐(860—925年)说,出自中国。《唐书·食货志》明确指出,玄宗时全国有炼铜炉九十九处,每炉岁铸三千三百缗,黄铜二万一千二百斤。宋代崔昉《外丹本草》所录用炉甘石(菱锌矿 ZnCO_3)炼输石,是含锌的铜合金,“用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输石一斤半”。至少在唐代,中国已知提炼锌,元明时代又改用纯度更高的倭铅(锌)与红铜相配,“以炉甘石或倭铅参和,转色为黄铜”^②。但成色不如波斯,因此称波斯输石为真输。波斯用锌制造新的铜合金(黄铜),大约在八、九世纪,伊本·阿尔·法基在902年初次记述克尔曼地方特马温德山的锌矿。此后,中伊双方在输石的炼制上有过交流,但阿拉伯人的输石大多来源于印度的西北部,初见于托名亚里士多德的阿拉伯石谱,时间不比拉齐早多少。印度、阿富汗出产输石,在《大唐西域记》中早有记述,说明中国人至少在七世纪已熟知亚洲各地出产输石,并已知晓输石的化学性能。劳费尔反而将波斯语、阿拉伯语认作中国“输”字的

① 章鸿钊:《石雅》,1927年版,第340—344页。

② 宋应星:《天工开物》下册《五金·铜》,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崇祯十年本。

语源,这是对两者关系的一种颠倒,使过去一些中国学者也偏向于这一误解。

三、陶瓷贸易与制造

自安息时代以来,中国和伊朗在陶业技术和陶瓷贸易中有过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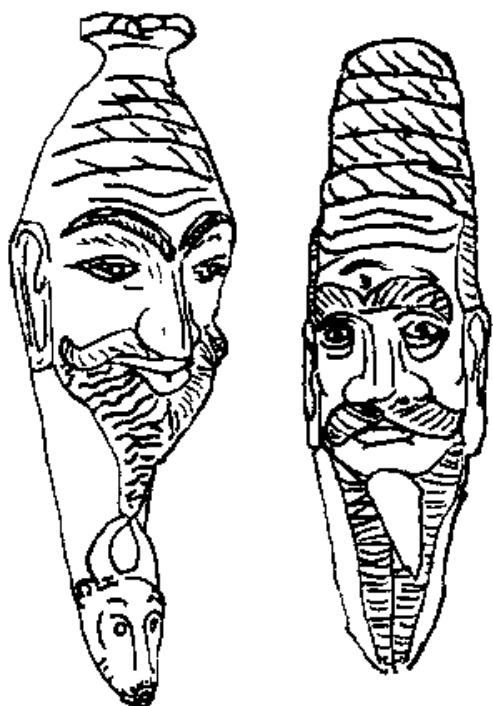


图 46 和田出土陶角杯(三至四世纪)

(左)新疆博物馆藏

(右)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藏

泛的交流。安息式样的陶灯、陶壶曾在中国新疆流行,和阗曾有就地制造的萨珊初期式样的陶角杯(图 46)。这种式样的角杯,与安息式样有所不同,下部弯曲处仍塑有牛羊等动物,上部器身则以模塑人像为特征,这种角杯有 1896 年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入藏的一件,新疆博物馆收藏 1976 年在约特干遗址出土的两件。和阗角杯和萨珊式陶角杯器身模塑国王和美索不达米亚女神娜娜(波斯女神阿尔美蒂的化身)不同,仅塑男性国王头像,是一种和阗化的波斯角

杯,属于三、四世纪器物。

中国汉代开始烧制低温铅釉陶器,色分黄、绿、黑、褐,而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铅绿釉陶器为最多,由西汉时代的关中推广到东汉时代的河南。西亚、波斯也烧造绿釉陶器。到北魏时期,釉陶复兴,有新

的改进,从汉代的单色釉过渡到黄地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并用。黄釉扁壶与器身细长的龙柄鸡头壶是深受西亚风格影响的新器皿。堆贴莲瓣、卷草、联珠纹也是在波斯影响下的新的装饰手法。有柄的鸡头壶出现在东晋,北方的铅釉鸡头壶在造型和纹饰上都更接近波斯的装饰手法和实用器皿,器形上具有中东的风格,装饰花纹与堆贴模塑的技艺也都与萨珊波斯有着亲缘关系。莲瓣虽因佛教流行而时兴,但却源出于伊朗,常见于同一时期的伊朗浮雕、图样、金银器中。洛阳北魏大市遗址在1989年出土一件釉陶碗,系当地制作^①,但碗腹以白色粉彩绘成联珠纹带,带间饰有突起的乳钉,通体涂以酱色釉。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575年)出土的几件黄釉瓷扁壶,颈肩之间饰有联珠纹;两面模印浮雕胡人乐舞。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两件四系莲瓣缸,山西寿阳北齐庠狄回洛墓出土的大小多件黄釉龙柄鸡头壶,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出土的深绿色铅釉的龙柄鸡头壶,都属北朝釉陶精品,这类釉陶曾成批制作,在北方骑马民族中曾经是流行的式样。

五、六世纪北方流行的瓷扁壶,具有双耳,到隋代仍在用,李静训墓(608年)中也出土过一件白瓷双耳扁壶^②,它们的原型是一至三世纪伊朗高原使用的釉陶双耳扁壶。这种伊朗陶瓷物移的过程,显然是十分缓慢的。玻璃制造,在隋初濒于绝境,御府监、太府丞何稠从西方获得新的契机,毅然在玻璃制造中引进绿釉,获得成功,制造的玻璃居然“与真不异”,这真不真的标准便是波斯的制造水准。隋代的绿瓷,现在称为青瓷,已发现的隋窑都是烧制青瓷,而釉色呈青色玻璃质(如河南安阳窑),借鉴于伊朗绿玻璃。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12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隋瓷中初见的贴花,有五片叶组成的莲瓣和单片莲瓣,用来装饰壶、罐的肩部和颈部,装饰手法和伊朗凯希宫殿中的泥墁雕饰相似



图 47 隋瓷纹饰

(左)莲瓣纹 (右)卷叶纹

(图 47、48),受到萨珊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到唐代有新的发展,在陶瓷制作中大量使用这种堆贴花装饰技法。故宫博物馆收藏的青瓷凤头龙柄壶(河南汲县出土,图 49),是其中的佼佼者。壶的器形与萨珊银壶相似,只是多了一只凤头的盖,腹部有联珠圈组成的力士,上下堆贴联珠、莲瓣、卷叶。双龙耳瓶的器形是在李静训墓出土鸡头壶的基础上吸收伊朗胡瓶特点,不用鸡头,用一对龙形双耳作为装饰,形制与西亚早先在公元初盛行的双耳罐近似,是初唐时兴的一种器物,唐高祖的儿子李凤墓中也出土有这种类型的白瓷双龙耳瓶。

八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瓷器畅销亚洲,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釉下彩瓷与褐釉青瓷常同时出现在许多亚洲国家和埃及的古遗址中。伊朗出上华瓷的地点遍布全国,其中以东北部的马什哈德、纳沙布尔,中西部的赖伊、大不里士、阿德比尔、塔克·伊·苏莱曼、伊斯法罕,南部的苏萨、设拉子、西拉夫、菲鲁札巴德、达姆巴格最为可观。伊朗东部重镇纳沙布尔出土有唐代越窑、长沙窑青瓷,赖伊也发现越窑晚唐青瓷,位于布什尔以北的比比·卡顿(Babi Khatun)毁于 977 年地震,出土了九、十世纪白瓷、青瓷和绿釉陶壶,波斯湾古港西拉夫也出土九、十世纪青瓷,伊朗东南的撒里·达奎纳也有九、十世纪越窑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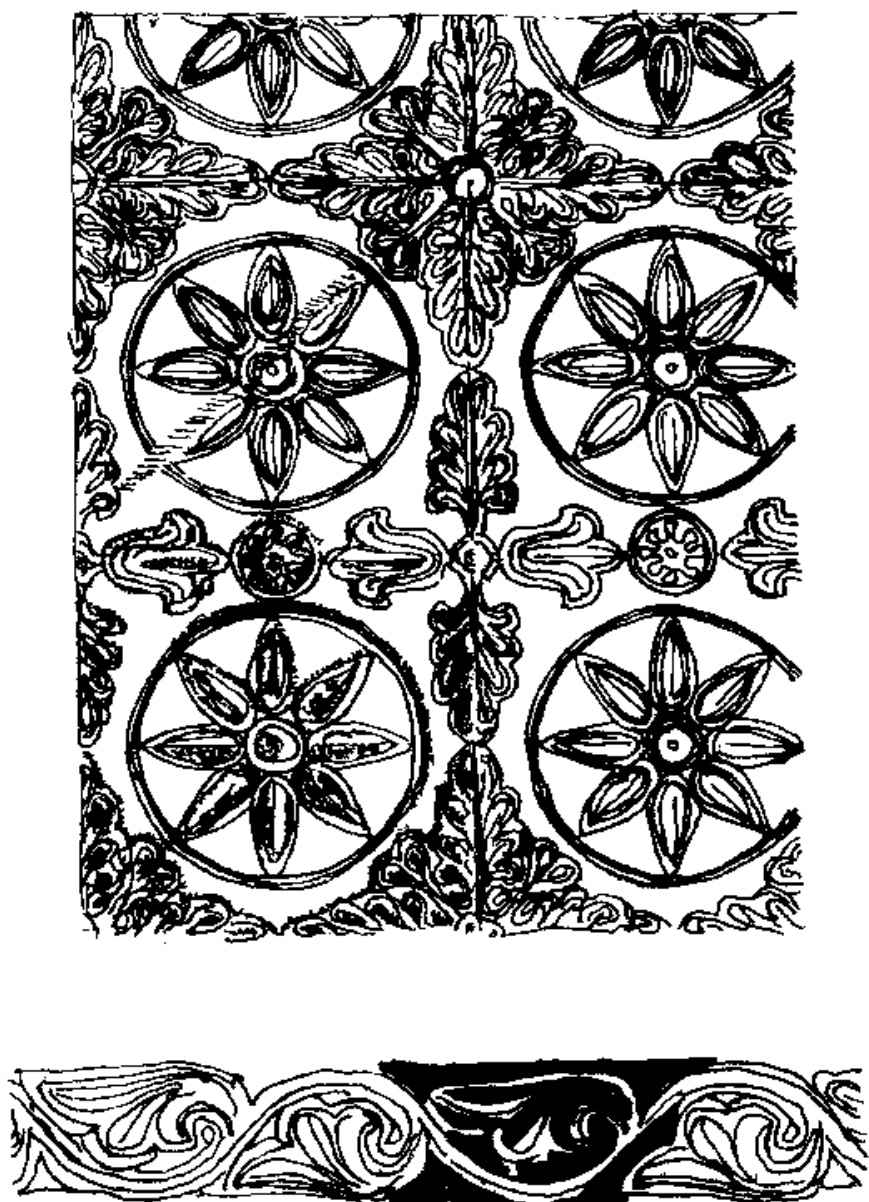


图 48 萨珊泥境雕饰(凯希宫 1 号遗址出土)

(上)八瓣菊 (下)爵床属左右对称



图 49 唐代青瓷凤头龙柄壶(河南汲县出土)

青瓷,并有始烧于十世纪的青白瓷。西拉夫古港经 1966 至 1971 年间的发掘^①,出土了八世纪古堡底层地板下的四系绿釉陶坛、五系黑釉陶坛残片、棕绿两色纹饰陶碗残片、青瓷碗、白瓷碗残片和凸纹(刻花)棕色坛、罐残片,虽无完整器皿,但所属时代在八、九世纪之际,当是中国运往西亚最早的陶瓷。

波斯湾东部古港蒂士(Tiz),其北的达姆巴格附近卡拉特·伊·哲姆希特,内地哲拉夫特(Jiruft)附近撒里—达奎纳都有华瓷出土^②。在蒂士西北沿海的卡拉顿出土优美的宋瓷片,同出的有宋钱政和通宝(1111—1117)一枚^③。卡拉特·伊·哲姆希特出土许多宋代哥窑冰裂纹瓷片^④。伊朗考

古研究所和不列颠博物馆在西拉夫采集的瓷片有越窑青瓷、邢窑系白瓷。波斯湾各港,巴斯拉、乌波拉、希拉和

① 怀特豪斯:《西拉夫的中国石器》(David Whitehouse, 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The Earliest Finds),刊 1973 年《南亚考古》(South Asia Archeology, London)。

② 霍布生:《波斯南部和旁遮普北部的陶器残件》(R. L. Hobson, Pottery Fragments from Southern Persia and the Northern Punjab—A. Stei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the South-Eastern Iran, London),1937 年。

③ 霍布生:《波斯南部和旁遮普北部的陶器残件》(R. L. Hobson, Pottery Fragments from Southern Persia and the Northern Punjab—A. Stei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the South-Eastern Iran, London),1937 年,第 183 页。

④ 霍布生:《波斯南部和旁遮普北部的陶器残件》,1937 年,第 86 页。

凯希古都都出土龙泉窑系瓷片。

波斯湾各地自北而南,出土棕绿色陶碗残片的地方有塔尔·莫拉格(Tel Moragh)、沙·阿卜杜拉(Sab' Abduluh)、塔尔·伊·沙布兹(Tal-i-Sabz)、波斯塔纳(Bostanah)、米纳布(Minab)。霍尔木兹则有大批明代青花瓷出土,并有“万福攸同”、“大明年造”等款识。

毁于1267年、1268年两次大地震的纳沙布尔,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1936年、1937年、1939年三次发掘,在九至十三世纪的遗址中,出土了唐代越窑青瓷盘一件、邢窑白瓷壶一件、长沙窑壶上部,以及广东窑白瓷盘、德化窑白瓷盘和青白瓷、青瓷器多件^①。这里曾是最早由陆路向阿拔斯朝哈里发运送华瓷的伊朗东部重镇,阿布尔·法德尔·贝哈杰在1059年写道:在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806年)时,呼罗珊的总督阿里·伊本·伊萨曾献给过去巴格达宫廷中从未见过的二十件中国御用瓷器,随之送去的并有二千件日用瓷器。^②

在伊朗中部的赖依,波士顿美术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组织了考古队,在1934年、1935年两次发掘,出土物中有晚唐越窑青瓷钵残片、青白瓷盘、元代龙泉窑残片。有些出土物分藏巴黎吉美博物馆(唐代菱花形白磁盆、邢窑白瓷盒)、不列颠博物馆(南宋龙泉窑瓷片)。

伊朗各地博物馆都藏有华瓷,如马什哈德在1943年成立的博物馆,大不里士阿塞尔拜疆博物馆,伊斯法罕博物馆。德黑兰国立考古博物馆收藏尤富,藏品中有呼罗珊出土南宋、元、明时代龙泉青瓷精品十件。最有名的是萨法维朝祖先谢赫·伊萨克的家乡阿德比尔神庙曾珍藏中国陶瓷一千六百多件,后来部分移到德黑兰考古博物馆。

① 韦金生:《纳沙布尔怀古》,刊《大都会博物馆通讯》(C. K. Wilkinson, Life in Early Nishapur, *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ol. LX, no. 2, 1950年;《纳沙布尔:早期伊斯兰时期陶器》,纽约。

② 《贝哈杰史》(Tārikh-i Bayhaqi), 德黑兰, 回历1307年, 第425页。

一部分转存伊斯法罕。现存 805 件华瓷中,青花 618 件,白瓷 80 件,青瓷 58 件,五彩 23 件,黄釉 16 件,酱釉 3 件,蓝釉 7 件。青花瓷属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白瓷、彩瓷和青花瓷中有年款的 71 件,以成化款一件白瓷最早,多数是弘治、正德、嘉靖、万历款识。在古波斯宫廷档案中发现的萨法维王室致明朝皇帝的 17 件书信中,有 4 件明白要求中国运送瓷器。瓷器已成中国与撒马尔罕、伊斯法罕、设拉子贸易线的主要运输货物。

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瓷已广泛采用伊朗和中东式样的器型和纹饰,以广开国外销路。海棠式杯系西拉夫宫殿遗址在 1971 年初次出土,在粗白胎上施有绿斑浅黄釉,长沙窑址也出土有这种伊朗式的花棠杯^①。这种海棠杯源出西亚,由长沙窑制造后海运西拉夫。长沙窑常见的粗颈筒腹执壶,腹部有八角形短流,少数尚有两耳,造型和西亚通行的水壶相似,只是多了一个短流和双耳,其型式可追溯到安息



图 50 长沙窑粗颈筒腹执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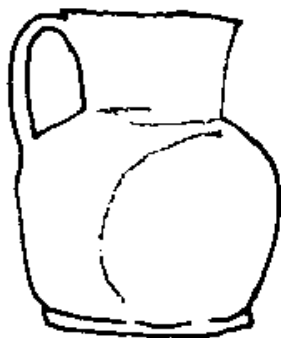


图 51 纳沙布尔出土陶水壶

时代(图 50、51)。1974 年,浙江宁波出土长沙窑瓷壶,壶腹有长腹、

^① 周世荣,《石渚长沙窑出土的瓷器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14 页,图 6。

圆腹、瓜棱形腹、扁圆形腹、扁腹、椭圆形腹,大多以伊朗和西亚玻璃器、陶器为蓝本加以创作,其中圆腹执壶就和伊朗喀尔干出土九世纪玻璃把杯相似。石渚长沙窑出土带流瓷灯,完全仿效伊朗陶灯式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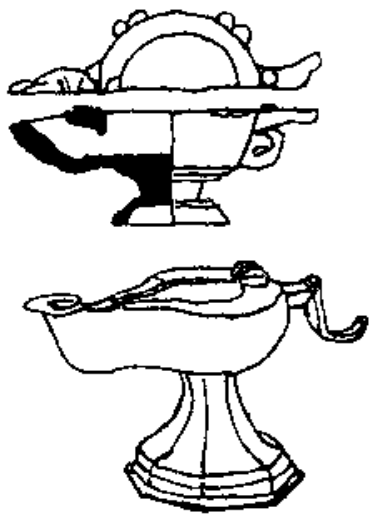


图 52 巴楚出土仿伊朗立式铜灯
(上)安息陶灯 (下)巴楚出土唐代铜灯



图 53 长沙窑出土带流瓷灯



图 54 纳沙布尔出土带流陶壶 而以可系吊的三耳相代。这种灯和新疆巴楚出土唐代仿安息式陶灯的铜灯不一样,巴楚铜灯虽然带流,而平面作敞口盒形,下部有柱础式高足,形制和安息式样相仿,属于立式带流灯。另一类型的安息带流陶灯系座式^①。相当于中国的碗式

^①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2卷,第664页,图225,b。

灯盏,是纳沙布尔带流陶灯的祖型(图 54)。自长沙窑带流瓷灯流行以后,立柱式灯才逐渐被淘汰,搭柱式软灯柱才推广至各地,并流传后世。长沙窑陶灯实首开风气。

长沙窑陶瓷上奔放自由的纹饰,有许多得自西亚伊斯兰陶器装饰艺术的启示。长沙窑出土一件葵口碗,系黄釉褐绿彩,内底图案采用了与纳沙布尔出土彩陶碗相仿的、以圈点显示的四方菱格纹(图



图 55 长沙窑出土葵口碗



图 56 纳沙布尔出土菱格彩陶碗

55、56)。伊朗蓝绿彩白陶碗上以釉彩显示的成块状分布的粗线纹饰,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白釉蓝彩盘上也可见到。纳沙布尔出土的白釉彩陶盘,在口弦上施以半圆形釉彩,这种粗放的装饰手法也被长沙窑工所采用,见于日本出土的长沙窑碗腹^①。长沙窑瓷与伊斯兰陶器,特别是伊朗陶业关系的密切,使人猜想有少数来自西亚的陶工参与了该窑的烧造^②。扬州出土长沙窑黄釉绿彩背水壶,一面绘花,一面写有阿拉伯文“真主伟大”字样^③,在长沙窑址中也曾见到类似瓷片,当属事出有因。

宋代瓷业繁荣发达,瓷器大量外销。北方定窑、磁州窑白瓷,南方龙泉窑系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均外销伊朗。河北磁州在漳河两岸的

① 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东京,1978年,单色版 22-1。

② 马文宽:《长沙窑瓷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伊斯兰风格》,《文物》1993年第5期。

③ 朱江:《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文物》1983年第2期。

观台镇、彭城镇窑址中出土的白瓷,见有伊斯兰风格的纹饰。彭城镇出土瓷器的圆圈纹(球路纹)中有中心呈波浪形的莲瓣,四周绕以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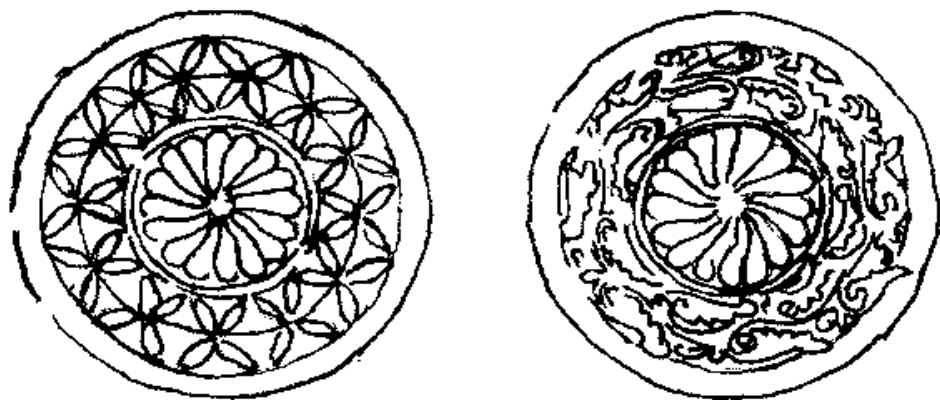


图 57 宋代磁州窑白瓷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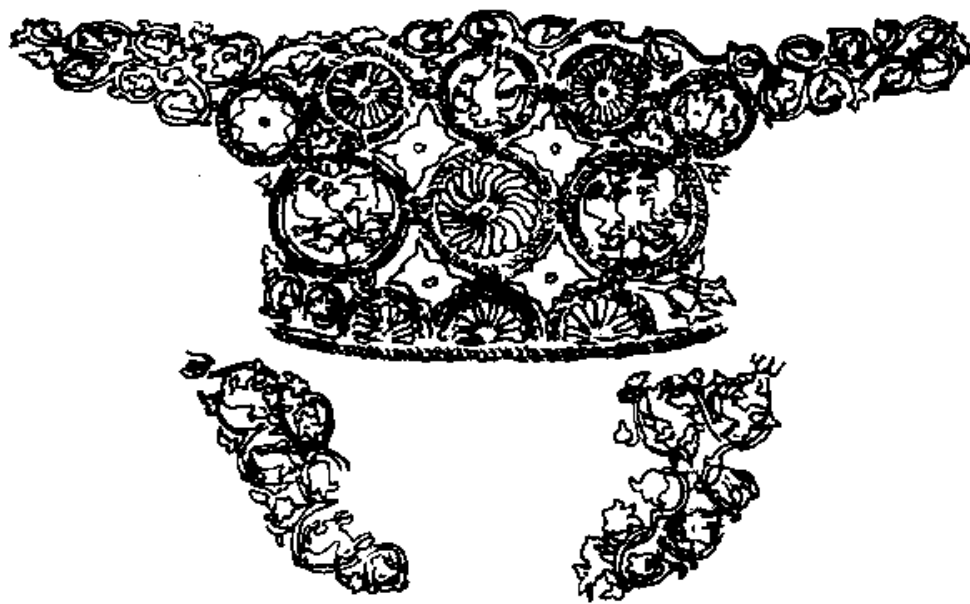


图 58 萨珊后圆纽莲瓣纹

床属卷草或连交成圆的四叶纹(图 57),波形或多瓣莲瓣是八、九世纪萨珊后圆纽纹饰的图案(图 58),连交四叶纹则始见于坦尔·哈拉

夫陶器,都是伊朗纹饰。始烧于宋初,历元、明、清不衰的山西介休窑,不见记载,所烧黑釉、白釉釉下褐彩,以缠枝牡丹等花卉和被称作“婴戏荡船纹”的纹饰;婴戏荡船纹就是以波形展开的莲瓣为饰,黑褐釉印花器的器内都有一圈无釉,实际是代替萨珊圆圈纹的一种色彩分层。这种纹饰被认为仅见于介休窑,属于新颖的题材^①,其来源亦与伊朗有关。元、明青花瓷、青白瓷大量运销西亚,元代高足杯、执壶、四系扁壶,明代高足杯、高足碗、鸡心碗、菱口盘、瓶式执壶、有柱执壶、双耳扁瓶、长方笔盒,都是仿效伊朗陶瓷造型制造的,纹饰和釉彩也都有伊斯兰格调。

伊朗陶瓷在华瓷推动下,在九、十世纪以后突飞猛进。唐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首先成为伊朗陶工仿效的蓝本。伊朗东部纳沙布尔,中部阿莫勒、赖伊都出土有当地仿唐三彩的陶片,西北部距大不里士东南二百公里的阿格罕镇(Aghkand)曾出土二十件类似唐三彩的当地烧造的陶碗。里海南岸的马赞德兰省的陶工,直到十七世纪仍在用唐三彩釉彩纹饰。到九世纪,中部的赖伊和卡善最早起而在陶器上施以不透明的白釉,后来烧制白胎成功,又改施透明釉,但这种仿制的白瓷质软易碎。十二、十三世纪的伊朗釉陶,不仅在釉色上仿效中国北方定窑、南方龙泉窑的影青,而且在纹饰上也流行中国式莲瓣、波浪云纹,以及器沿少釉而露出的“紫口”等烧造工艺。波斯绿釉陶烧造年代虽早到萨珊晚期,但流传到中国的,仅有江苏扬州1965年出土的一件双耳翠绿釉陶壶;1982年至1986年间又在三元路、汶河路出土数百块波斯釉陶片,与波斯陶片一齐出土的有唐长沙窑釉下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白瓷、青花瓷和绿瓷,属唐代中晚期,和伊拉克萨马拉发现波斯釉陶与唐代青花瓷共出类似,显示双方在陶瓷器皿方面交流的盛况。1965年,福建福州北郊莲花峰属五代时期的刘华墓也出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页。

土了波斯孔雀蓝釉瓶三件,器形最高的是78.2厘米,口径14厘米。这三件波斯釉瓶都属死于930年的刘华以前的用品^①。釉瓶用于存油,以供墓中长明灯之用,故在石板墓室中特筑石雕覆莲座以固定位置,器形都与今藏柏林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藏伊拉克出土孔雀蓝釉瓶相同。陶瓷是中国和伊朗在长达一二千年中,双方广泛交流的器物。这种孔雀蓝釉瓶是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从九世纪开始仿效华瓷釉下刻纹工艺的产品,直到十一世纪仍很时兴。美索不达米亚的萨马拉,伊朗中部阿莫勒、西部阿加罕镇、加鲁斯(Garrus)、耶斯特罕(Yastkand)都曾出土这类陶片和陶器。

萨法维王朝成立,恰当明代正德(1506—1521年)年间,明代青花瓷中出现阿拉伯文铭文,据说中国瓷商曾到伊朗的阿德比尔设店经销华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正德时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铭文的瓷器二十多件,其中一件青花鸡心式碗,外壁饰有六个双圈圆形开光,开光内分书波斯文单词“政权”、“君王”、“永恒”、“每日”、“益增”、“兴盛”,有“君王长存”、“万世昌盛”之意,是萨法维朝订制的青花瓷。阿拔斯(1588—1629)统治时期,华瓷尤受欢迎,他曾招聘数百名中国瓷工,连同家属移居伊斯法罕,建窑烧瓷。《咸宾录》卷六亦思把罕(伊斯法罕)特地提到当地“亦有中国人寄寓者”。《咸宾录》成书于1591年,伊斯法罕的中国瓷工在阿拔斯即位之初即已移居当地。在阿拔斯的编年史抄本(今藏不列颠博物馆和牛津大学)上记有1611年8月28日阿拔斯向神庙献上的礼物,有华瓷一千一百六十二件。这些瓷器是皇室珍品,也是伊斯法罕烧制青花瓷和彩瓷的蓝本。1671年法兰西公司代表抵达伊斯法罕,见到在当地的招待会上使用的是整桌的中国瓷器。当时伊朗的民间都已普遍使用瓷器,每顿饭都离不开

^① 陈存洗:《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的来源问题》,《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封3图片。

它,早餐喝牛奶也用瓷杯^①。当时伊朗上流社会中,在葬仪和宗教节日(1月和9月)普遍盛行铺陈瓷制器皿举行献祭仪式,其中有明瓷,也有本地仿明瓷器,都属体积巨大的装饰瓷,由承包者租赁使用。直至近代,殡葬仪式中陈列明瓷和四十节《古兰经》,仍是不可或缺的项目。

十七世纪荷兰、法国、英国相继以运输华瓷为大宗货物,波斯是这种贸易中极为兴旺发达的中转站和销货市场。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档案记载,1629年运往波斯瓷器四千件。1634年波斯皇帝订购大批茶杯和盘子,发货单上该年运往波斯的瓷器有四千件。1635年波斯湾头的海港伽木朗(Gamron)订货八万至十万件,多数是直口鼓腹的咖啡杯。1639年两艘大船运到波斯的瓷器是137,788件。1641年5月9日记有,波斯在1642年需精瓷十二万件。1644年7月22日记有,波斯需瓷器二十万件。1645年3月伽木朗来函:普通咖啡杯247100件售罄。1647年,波斯订购各式瓷器55200件,有大盘、精制碗、大杯、小碗、咖啡杯、茶杯等。向经纪人提供的货样,要求内外施釉,器壁或底部有红色或蓝色徽记,器外饰细线蓝圈。1648年,波斯全年订瓷196500件。^②

英国在1640年后在伽木朗(英文Gombroom)设立贸易站,经销华瓷。华瓷运往英国,也多经过伽木朗,因此英国人曾以“伽木朗货”称华瓷,意思和“中国货”(Chinaware)相仿。

法兰西公司也以运输华瓷为业,公司驻波斯代表为讨好波斯国王,赠送的礼物中就有三百零六件各式华瓷,送御前大臣的有三十四

① 《渣甸波斯游记》(Sir John Chardin's Travels in Persia, London), 1927年,第230、233页。

② 沃尔克:《巴达维亚城堡档册所见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u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1602-1682, Leiden), 1954年。

件华瓷。^①

十七世纪的波斯不但进口大批华瓷,成为华瓷在亚洲的主要销售国,而且仿制华瓷也到了可以假乱真的地步。据说,1666年,荷兰公司的代表赫伯特·德·拉莱斯在送给波斯皇帝的礼物中,称有中国瓷器五六十件,皇帝见后讥嘲地问:“这算什么?”原来荷兰人把波斯瓷器混进了中国瓷器。^②

四、深井技术的西传

深井技术最初出于开矿的需要。新疆尼勒克县奴拉赛在1983年发现春秋中叶至战国早期(公元前七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古铜矿遗址,是天山以北塞人开采的古铜矿。在矿坑内外发现的用于抽水的提升工具,是由许多卵石制器构成的平衡石锤,石锤和春秋、战国时期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所见相同,一定是由内地矿工传入新疆。汉武帝时陕西大荔出现了一种利用地下水的深井,井深四十多丈,井下可以通水,以控制地下水源、防止沿岸崩塌,这种多处开凿加以贯通的深井渠,被命名为龙首渠。

这些精通凿井穿渠技术的汉人,在公元前102年李广利第二次率领大军攻打费尔干纳盆地大宛国都贵山城时充当了工程兵。当时大军围困贵山城,随军水工切断从郊外引入城中的水渠,封闭城中水源。大宛从联通匈奴的康居那里也得到了中国水工,准备打井穿渠,后迫于形势,还是开城投降。这种打井穿渠,在不同距离的地面上将地下水吸引到地表的技术,是中国陕西渭水流域等地从事采矿、水利的技师首先发明并又向西传导的。大夏(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对此

^① 《瀛旬波斯游记》,第94、98页。

^② 同上书,第267页。

也早有所闻,可能就是从费尔干纳的希腊人那儿学来的。在公元前146年的伊朗,也早成为事实。波斯人对这种深井渠称作卡纳特,为解决伊朗高原的干旱气候,给农业生产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后来又经波斯人之手传入受波斯控制的阿曼,改名叫法拉吉。公元二世纪,也门的艾兹提人移居阿曼时,那里的地下水渠竟有万条之多,是西亚少见的水利工程。最大的法拉吉在占都尼兹瓦的郊区,主渠长达几十公里,支渠纵横交错。主渠从绿山区下坡,经暗渠流向尼兹瓦,渠宽3米,平时水深1米,下雨时水深可达2米多。

五、甲骑具装

使用铠马和全身披铠骑马作战,通称甲骑具装。据希罗多德(1, 61)和色诺芬(*Anabasis* 1, 8, 6),死于公元前401年的居鲁士的骑士已配有鱼鳞甲、头盔和护胫。公元前二世纪,在幼发拉底河畔和罗马帝国邻接的杜拉·欧罗波斯的图像中,已有头戴尖顶兜鍪、身披锁子甲的正在作战的波斯骑士(图59),他的战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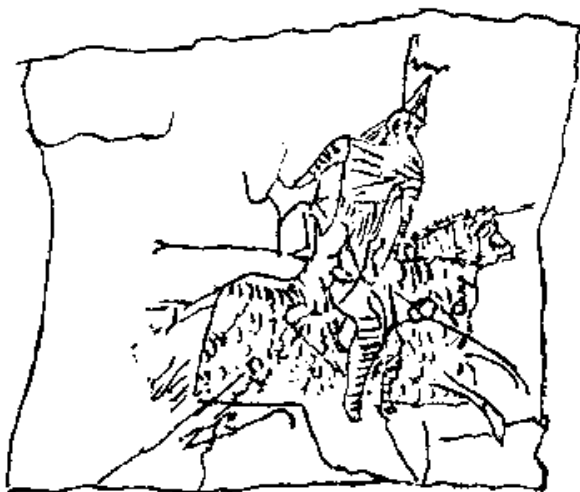


图59 杜拉·欧罗波斯的波斯铠马骑士铜像

头戴当卢,从颈部直到尻部,在马膝以上全身披挂鱼鳞纹的马铠^①。

① 鲍尔、罗斯托夫采夫、贝林格:《杜拉·欧罗波斯发掘报告》(P. V. C. Baur-M. I. Rostovtzeff - A. R. Bellinger, *The Excavations at Dura-Europos. Preliminary Report of Fourth Season of Work*), 1930-1931, New Haven, 1933年。

这种重装作战的骑兵是波斯帝国所使用的新兵种,对决定战争的胜负具有重大的作用。西汉时期,鱼鳞形编制的铁甲锁子甲已见使用,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1号墓(刘胜墓)出土的铁铠一领,用两种小型甲片编缀成鱼鳞甲,全铠共用甲片2859片,重16.85公斤。^①

西汉初期,鱼鳞甲极为罕见,仅有咸阳杨家湾陶俑中的一例,同一地点出土的陶俑,所披多是大型札甲。汉武帝时开始由大型札甲过渡到精锻细密的鱼鳞甲,实物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二十家子汉城遗址出土的一领完整铁铠甲,在札甲之外,已结合鱼鳞甲使用。1958年洛阳西郊3023号西汉晚期墓出土残铁铠也是鱼鳞甲。东汉时期,百炼钢也用作炼制铠甲。三世纪初,曹植在《先帝赐臣铠表》中列举有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环锁铠、马铠各一领。这些铠甲都是当时罕见精品,环锁铠、马铠是伊朗具装铠的仿制品。用重叠的鱼鳞甲片缝制的环锁铠和重装的马铠,在萨珊朝普遍应用,推动了在中国十六国时期甲骑具装的大量用于实战,使战争的规模和耗费大大胜过以往。

早先中国对战马的防护装备仅限于皮革的当胸,足以保护马匹全身的铁制马铠,只是在东汉末才出现在军队中。官渡之战(200年)前夕,曹操在《军策令》中承认袁绍部下有一支重装骑兵,其中有三百匹战马已装备马铠,骑士更是全身披甲;而在曹操军队中,这样的战马还不足十匹。在实战中,袁绍的三百骑虽仅占骑兵总数的3%,可是已因它的锐不可当而引起战略家的重视。十六国时期(304—439年),由于广泛使用骑兵,装备齐全的具装马迅速得到发展,构成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后赵的羯族石勒打败姬澹时,俘获的铠马达到了万匹。羌族的后秦在姚兴(394—416年)统治期间,击败乞伏乾归,竟取得了收编铠马六万匹的辉煌战果。这和萨珊波斯大量采取重装骑兵,可说是东西辉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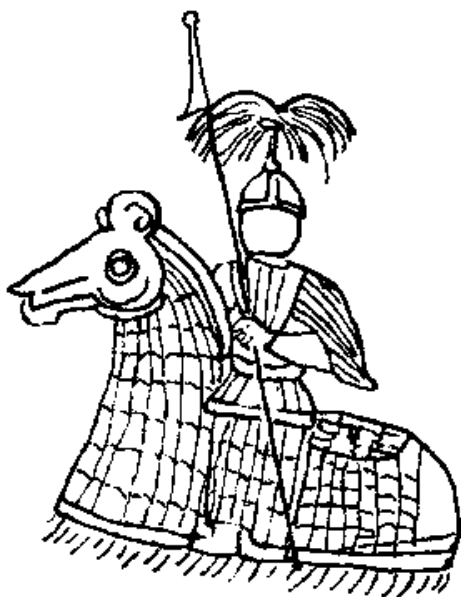


图 60 冬寿墓壁画甲骑具装(357 年)

从西晋起,这种由北方游牧民族竞相采用的新兵种,由于装备了全副武装的铠马,被称作具装。披甲骑士驾驭铠马奔驰战场,使四、五世纪以来北方的作战规模和军事指挥上的战术、战略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早的重装骑兵可以在云南昭通东晋太元(376—396 年)年间的壁画和永和十二年(357 年)冬寿墓壁画中见到。冬寿墓壁画中的具装马(图 60),头戴三花面簾(帘),身披长方形

锁子甲。西安草厂坡一号墓,出土有一组五世纪初骑兵俑,马具齐全,战马全身披铠,骑兵都头戴兜鍪、身披铠甲。敦煌 285 窟西魏大统(535—551 年)年间壁画中的战士和铠马,全是重叠编制的鱼鳞甲,连马头面簾(帘)也不例外,全身甲片浑然一体。这种甲骑具装在六世纪已普遍到大江南北大量使用,连吉林集安高句丽石墓壁画也有甲骑具装的生动场景。从高句丽开始,骑马文化越过朝鲜半岛,推向日本列岛,使日本由古坟文化迅速过渡到飞鸟文化。

中国军事技术家对骑兵的装备作过重大改革,公元前一世纪鞍桥逐渐增高,西汉后期高桥鞍的出现,使骑兵可以更加灵活地发挥战术动作。中国人在四世纪发明的金属马镫,更使披长铠、骑具装马的战士可以自由控制马匹,飞快上马下马。古代波斯、希腊、罗马,根本不用脚扣,习于一跃上马。古代印度桑奇大塔浮雕和德聂伯河下游斯基泰银瓶图像中的脚扣,和长沙永宁二年(302 年)墓出土的陶马使用的三角形脚扣相仿,只在马鞍左侧安置,上马后脚扣便无用处。四世纪初,河南安阳孝民屯 154 号墓出土木芯外包鍍金铜皮的镫,和长

沙永宁陶马一样,都是单镫。在法国卢佛宫博物馆所藏安息时代狩猎骑手图中,可见到在马右腹下有一大约是皮革制的单镫^①。中国早期脚扣一定受到同样的信息传递。但从四世纪中叶起,中国北方便发明了双镫,实物有:辽宁朝阳袁台子墓出土两件、吉林集安万宝汀78号墓出土四件、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两件、吉林集安七星山93号墓出土两件,都是双镫,用藤条之类木质材料为芯,外包铜、铁、皮革。六世纪时,马镫已普遍使用于南至广东、北抵吉林的广大地区。五、六世纪之际,马镫又从中国反馈到伊朗,六世纪已传到了匈牙利。波斯人先称以“中国鞋”的别名,后又叫作“脚套”。

环锁铠于三、四世纪在新疆境内通用^②,到隋、唐时期而遍及全国。另一类型的明光铠,在胸前和后背各有二块圆形金属防护的铠甲,自南北朝开始制备以后,盛行于唐宋,而在元代由蒙古人传入伊朗,不列颠博物馆的手稿 Khwājū Kirmānī(1397年)提到士兵胸前都有一金属圆牌防卫,后来发展成明光铠的形制。到1403年西班牙大使克拉维约出访亚洲时,这种胸甲已见诸事实。十六世纪起直到十九世纪末,伊朗使用一种有两大两小四块圆护组成的铁甲,其中两块大型圆护,专护胸、背,称作却雷伊纳(Chārā'ina),虽与印度有关,但发源地却在中国。

六、建筑技术

砖石筒拱建筑是来自伊朗的一项建筑技术(图61),它在中国的广泛采用,将建筑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在西汉中叶以前,中国内地不知道用条砖砌筑筒拱,只有梁板式简支,砖券拱顶结构来自伊朗文

① 相马隆:《流沙海西古文化论考·轮镫源流考》,株式会社山川出版社1962年版。

②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化体系。自两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发券或叠涩砖砌拱顶建筑构成了黄河和长江流域地下墓室的主要建筑方式。关中、洛阳地区首先在公元前二世纪大量采用砖券拱顶,木椁室墓和梁板式结构的空心砖、石板椁室到东汉末已在黄河中游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安息式样的砖石拱顶构筑的墓室,在两



图 61 秦西封,塔克·伊·吉斯拉发券拱

汉时代表现为两种形式的构筑,一种是先挖竖穴,砌成拱顶后,再填土封墓,拱顶有承载封土的能力;另一种是在已挖成的洞室墓中起券,拱顶与封土间有空隙,是一种西周以来洞室墓与砖券建筑技术的结合。甘肃境内,自汉至晋都盛行后一种在洞室墓中发券的做法。武威县城南祁连山下杂木河西岸密布汉代墓葬,形成一个东西长 700 米,南北宽 600 米的墓葬区,属于西汉末年的 48 号墓就是一座有墓道、墓门、墓室的长方形单室土洞墓,墓顶圆拱形。嘉峪关市东郊戈壁滩在 1972 年发现的四座东汉晚期画像砖墓,也是上洞式发券建筑。敦煌东南辛店台、佛爷庙等魏晋墓葬群,都是在土洞室墓基础上发展的砖券拱顶墓。

嘉峪关东汉 1 号墓和 3 号墓是早期砖券拱顶建筑中有代表性的实例。1 号墓有前室、后室,前室有左右耳室。前室长 2.8 米,高 3.5 米;后室长 4 米,高 2.6 米。墙面以三平一横面砌法起基,共八层,以上横平错缝叠砌起顶。每块横面砖(36×17 厘米)组成一个画面。3 号墓由前室(附左右耳室)、中室、后室组成(图 62)。墓门六重券,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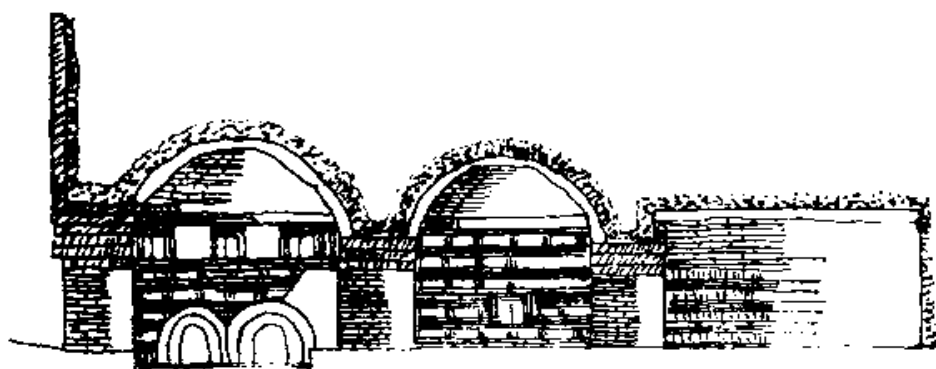


图 62 东汉嘉峪关画像砖三号墓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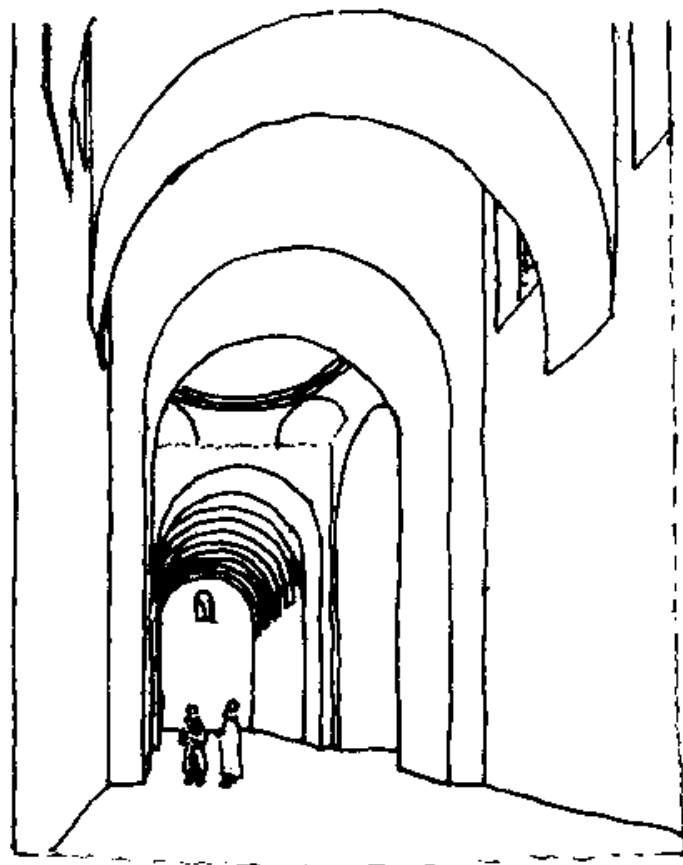


图 63 埃旺·伊·卡尔伽跨拱屋顶

伊朗穹顶建筑中筒拱门殿的埃旺(Ivan)筒拱(图 63),建筑形式略同 1 号墓,但前室墓顶砌砖采用旋斜缝,在技法上与其他各墓不同,从四边结顶拱壳逐步向叠涩穹顶过渡。东汉中期出现的叠涩穹顶,采用上圆下方的砌法,在公元 130 年左右河南襄城茨沟汉墓可见这种呈椭圆形抛物线的穹顶实例。

值得注意的是,大致不早于三世纪的马蹄形券洞,出现在扎格罗斯山口的塔克·伊·吉莱(Taq-i-Girra)的同时,辽宁营城子汉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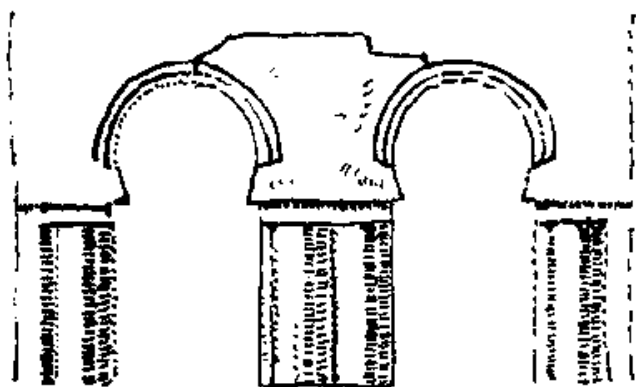


图 64 泰西封,阿尔·迈阿里特六世纪马蹄券拱门

也出现了类似的券洞(图 64)。塔克·伊·吉莱的建筑规模,表现出它是萨珊朝或安息末期建筑中的出色作品。拱券建筑在中国北方不胫而走,或者出于游牧民对穹庐的癖好。

盛行于伊朗和中亚的穹顶建筑,突厥兴起后在新疆有了新发展。伊朗伊斯法罕的加米大寺中,在东南隅有一座砖穹顶殿堂,专为塞尔柱朝马立克·沙的王后、哈拉汗朝维吾尔公主帖尔罕可敦(TerKan Khatun)建造,供她礼拜和沐浴。整座建筑技艺超群,在穹顶殿中以图案刻纹代替砖饰,一时无出其右。这座建筑是中伊艺术的结晶。

砖石拱顶结构在内地的地面建筑发展迟缓,叠涩拱顶唐宋时大量用于墓室和砖石塔。元明之际券拱顶比前使用广泛,出现在城门、宫门和庙宇建筑,并且可以完全不作楔形处理,使用大砖贴砌拱

顶。元代大都和义门的瓮城城门,是以四层券砌成,而不用伏,与伊朗埃旺筒拱法相同。建于元代的杭州凤凰寺后窑殿的中殿,由传教士阿老丁设计,为方底穹顶建筑,采用砖叠涩出挑和菱角牙子的技术,这种技术为十一世纪前后波斯所常用。元明砖拱无梁殿在南京、苏州等地的出现,是筒拱和拱顶建筑的一个新发展。这种建筑可以防火,建筑平面又胜过一般庙宇面积,是砖砌建筑技术的新运用。

七、伊朗医学在中国的推广

六世纪以来,伊朗药物在中国内地逐渐推广,苏恭《唐本草》(五十四卷)、段成式《酉阳杂俎》(三十卷)等唐人著作,对伊朗药物开始有系统著录。八世纪更有收集海外进口药物的专著出现,郑虔《胡本草》七卷先开端倪;十世纪初,李珣《海药本草》六卷尤其详备。波斯人来华经商,以贩运药物、香料为大宗,因此许多植物都冠以波斯之名。这些药物中有密陀僧(黄丹、黄色氧化铝, Murdasang, Mirdasang)、硃砂(氯化铵 NH_4Cl , nušādir, nasādir)、珊瑚、矾石、白矾、琥珀、胡黄连、缩砂蔻、苜蓿(zira, 小茴香)、阿月浑子(pista, 必思答)、石蜜、翻齐(birzai)、阿魏(Anguze),食用的扁桃(巴旦杏)、波斯枣、没食子(无食子)、齐墩果(zeitun, 油橄榄)、无花果(anjir),也都自伊朗运来。用耶悉茗油治疗岭南流行的麻风,也在六世纪时经海船上的胡人传入广州。伊朗所产金线矾、紫矾则专供炼丹家烧炼。

《海药本草》的作者李珣,是华化的波斯人,他一生到过杭州、广州、成都。《海药本草》所录波斯药物中的盐绿(Zingār),《隋书》已知它是萨珊波斯所产,又叫石绿,不褪色,虽经阴雨也不受潮,是醋酸铜化石,可以用来治疗眼病。李珣诗词有《南乡子》十七首,写岭南风光,第一首《思乡处》,从海上追念他祖先故乡。李珣大约曾从广州搭船到过波斯。阿拉伯文《百科全书》提到,著名医师、炼丹家拉齐(850—925

年)在巴格达遇到一个中国学者向他求教罗马名医盖伦的著作。盖伦著作多达十五卷,而中国学者归期逼近,他用速记法记下一切,奇迹般地在一个月內学完了盖伦的著作,带着大卷稿本搭船返国。李珣是前蜀政权的权贵,有资财出国,极可能是他曾师承拉齐,归国后才有《海药本草》之作。

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编成的《回回药方》中著录了许多西方医学家,其中卷三十目录“杂证门”有“忽儿木思马准”、“马竹尼虎而谟西方,即虎儿谟西地面加白薇、菖蒲、薄荷的膏子药”。“马准”、“马竹尼”都是阿拉伯语“膏子药”(Ma 'jūn)音译。小字将虎儿谟西当作地名,此方原出阿维森纳《医典》第三册两个“忽儿木思马准”(Ma 'jūn Hurmus),这忽儿木思是个大洪水以后出现的传说人物,他曾研究剧毒的动物和植物,制作玻璃和绿色陶器,以通晓医学和化学而著闻,在西亚奉为神明,波斯语中以之称木星或希腊传递信息的神。《回回药方》卷三十目录又记有沙卜而撒哈里(Sābur bin Sahli),他是伊朗的医学中心君迪沙卜尔(Jundysābūr)培养出来的医生,曾任该医院院长,著作甚丰,有《药物的配伍》、《食物的功能》、《药理学》等,死于回历255年(869年)12月21日。

明初朱橚等人所编《普济方》也曾提到许多波斯名称的胡药,有朵梯牙(tootiyā',氧化锌,皓矾)、安咱芦(anzaroot,波斯树胶)、可铁刺(Kateera'黄耆胶,西黄耆)、阿飞勇(Afyoon,阿芙蓉或鸦片)、李子树胶(şamgh,阿拉伯树胶,音译“三亦”)^①。它们和阿拉伯名称的药方同样流传在中国各地。

① 以上见宋岷:《对〈回回药方〉中的古医人姓氏的考证》,《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对〈普济方〉和〈本草纲目〉中的回回医方的考证》,《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

八、波斯人的珠宝鉴别

古代波斯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出产宝石的国家,绿松石、红肉髓、玛瑙、珊瑚、真珠、绿宝石,都和波斯有关系。战国时代盛传宋国的国宝结绿,是波斯语中的绿宝石 Zumurud 最早的中译名称。波斯不产绿宝石,却是古老的宝石贸易中精明的鉴别者与经销商。先秦时代,以璆琳概括来自西亚的青碧色玉石。璆,或作球,是美玉;琳,是美石(珠)。最早的珠,既是真珠(蚌珠)的代称,又是石珠的兼名。《魏书》列举波斯多大真珠、颇梨(宝石)、琉璃(玻璃)、水精、瑟瑟(绿松石等碧珠)、金刚(钻石)、火齐(薄玻璃、料珠),真珠、颇梨、瑟瑟、金刚都从波斯转运中国。汉代以来绿松石镶嵌工艺精益求精,推动了珠宝首饰业的进步。南京象山晋墓、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刚指环、玛瑙、琥珀等物,大约来自伊朗。伊德里西在十二世纪记录波斯湾中采珠场有三百处,采珠者大多居住巴林,卡伊施岛即以出口真珠闻名。

唐宋以来,波斯商人多以贩运珠宝称富,也以鉴别珠宝为长。《太平广记》卷三十四叙述崔炜受托返归广州向波斯邸中的老胡出售宝珠,对方以为是神物,出价十万缗,购后归国。在《太平广记》中有许多波斯商人鉴别珠宝的故事,在豫章(南昌)有未见人已知有宝石,在扶风有剖腋藏珠的,在睢阳有藏珠于股的,在广州有藏珠腰肉的,在扬州兜售紫辣羯可防水火,在洪州(南昌)因紫辣羯而纳税百万,在豫章以三万缗买二石珠。广陵(扬州)胡人有礼拜玉清三宝,终以千万相易;在同一地点,更有以数千万买骊龙珠的。长安的西国胡客有以五十万买珠的,还有以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的胡人。这些不具国名的胡人,大多也是波斯人。波斯崇拜财富,这一风气也逐渐渗入素重名分的中国内地社会。唐代长安的胡客规定每年一度开同乡会,称为宝会,届时各人展示财富,以宝物最多的论列上下,最富有的戴帽居于

上座。安史乱平后,有个发了财的魏生也去参加胡人的宝会^①,当时上座的,出示明珠四颗,大逾径寸,与会者起而礼拜。到座末,轮到魏生,也出示他的宝物。三十多名胡人见宝后都将魏生推举于座首,一一礼拜。受宠若惊的魏生最初以为是故意取闹,不胜惶恐,后知出于诚意,大为惊异。

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条根据波斯语列举的宝石有:刺(lal,淡红色,娇)、避者达(bidjade,深红色,石薄方,娇)、助把避(上等暗深绿色)、助木刺(中等明绿色)、撒卜泥(sabuni,下等带石,浅绿色)、鸦鹛(yakut,刚玉),还有译自波斯语的甸子(绿松石),共分你捨卜的(回回甸子,纳沙布尔甸子,纹理细)、乞里马泥(河西甸子,小亚细亚甸子,纹理粗)、荆州石(襄阳甸子,色变)三种,连中国湖北出的襄阳绿松石(或绿长石)也按波斯语称甸子了。

九、罗盘导航

中国在十世纪时制成了人造磁体指南针,沈括(1031—1095年)《梦溪笔谈》正式指出了磁偏角的存在。他所作四种实验中的水浮法,用指南针横穿在灯草芯上,浮在水上指示方向。这样的指南针,早在沈括以前便已在航运中使用,但缺点是多荡摇,因而又试验了缕悬法,用新蚕丝以蜡珠结针,悬挂磁针,测定磁偏角。

世界上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最早记录,是宣和年间(1119—1125年)朱彧的《萍洲可谈》,追述他父亲朱服在1098—1102年在广州当官时,舟师辨认航向,“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种指南针采用浮针,并由古代堪舆家使用的方形杖占地盘改装成圆形罗经盘,称为地螺。地螺以八干、十二支、四卦(乾坤巽艮)组成正针,二

^① 《太平广记》卷四〇三引《原化记·魏生》。

十四向,另有两位间的缝针,合共四十八向。

十三世纪时远洋航船普遍以指南针为准则,昼夜守视,按指定的针路航行,天文导航已逐步淘汰。《梦粱录》(1265—1274年)正式称为针盘。1195年以后,英国人、法国人相继论述了使用磁化铁针的浮针导航技术。波斯人穆罕默德·奥菲在1228年左右编辑的《故事大全》,讲到磁性的指南鱼。这部故事集中的一则故事,记述著者在航行中凭藉一尾用磁石制作的鱼找到了航路。这种磁鱼是在波斯湾与阿拉伯海中使用的指南针,头尾可以指向南北,辨别方向。稍后,在阿拉伯人的记载里,说是在地中海东部的航行中使用木片或苇箔浮出水面的磁针辨别航向。这是1282年阿拉伯博物学家贝伊拉克·卡巴杰在《珠宝商鉴别手册》中,描述他从利凡特沿海的特里波利向亚历山大里亚航行途中的见闻时提到的,他还说在印度洋上航行的船长不用这种水浮针,而用磁鱼。不论那一种磁针,都是中国海员早已在航海中使用过的。波斯湾的伊朗人称罗盘叫“吉卜拉·纳玛”(qiblanama),意思是“指针”,完全根据中国传统名称。波斯语、阿拉伯语中表示罗经方位的khann,就是闽南话中的“针”字。中国航海家出没波斯湾、阿拉伯海,因此这种先进的地文导航技术由于它具备的巨大经济意义,首先得到了波斯同行的认可。

十二世纪以来出现的针路,引导了针路图(航海图)的问世,至元明时代而更加周详。牵星过洋是波斯、阿拉伯商船在印度洋航行中习用的技术,也成了郑和下西洋时往返牵星为记的导航工具。《郑和航海图》可能也参照过波斯和阿拉伯的海图,在绘制技术上采取了海岸地图对应式测绘的办法,并记上六十四处各地所见北辰(北极星、小熊座 α 星)和华盖星(小熊座 β 星 γ 星七座)高度。

十、火药在伊朗的使用

火药的主要成分硝和硫黄是中国很早便已掌握的药料,火药的发明取决于硝、硫、木炭按比例混合。中国在八、九世纪时完成了这一发明,并迅速以“飞火”的发射方式用于战争。盐类的朴消与硝石,虽有区别,但色味均同。真消(火消)与盐类水消不同在于可燃而“拙之如握盐雪,不冰”^①。硝(火消)既如盐雪,所以波斯人在八、九世纪得知此物时以“中国盐”(namak-i cīni)相呼。巴格达炼丹家查比尔·伊本·海扬在八世纪中叶已知用蒸馏明矾取得硫酸,用硫酸和消石制备硝酸,发明王水,足证当地已知用硝。664年山西泽州继益州、武都、陇西发现硝石矿,可与北印度乌长国的相比,俗称盐消。九世纪中叶巴斯拉开采的硝矿,称作“Shūraj,这个词正是“硝”(消)的音译,山西盐消是波斯名词以盐相称的来源。

十三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以“巴鲁得”(bārud)称呼火药,这和蒙古西征催发阿拉伯人研制火药有着直接的关系。1258年旭烈兀占领巴格达,建立伊儿汗国,他的远征军中就有来自中国内地的火炮手 naft-andāz。中国的火枪称箭,后来写作銃,用金属作銃身,这个词首先被伊朗借用,称 tufek,现在读作 tufeng(枪)。在帖木儿时代,火炮在波斯称作 tkhsh-tèkhsh,火炮手叫作 tèkhsh-afghenan, tèkhsh-èndazan; tèkhsh 这个词似乎也来自中文的銃。十三、十四世纪之际,火药、火器在抗拒伊斯兰教马木鲁克王朝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使火器在伊朗成为军队的重要武器。推测1283年以丞相职衔出使大不里士的朵儿边氏孛罗,后来定居伊朗,担任宫廷侍卫统帅的要职,也一定

^① 《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引《陶隐居语》。又见唐写本《集注序录》第1卷,收入罗振玉《吉石斋丛书》。

在他的从属部队中使用了先进的手铳。

第四节 饮食文化交流

中国和伊朗在饮食文化方面有过广泛的交流。中国的茶,大约在十世纪就有小批量进入伊朗,它们是通过海路运入的,波斯人根据云南音译作 tchay,阿尔·比鲁尼是最早提到茶的一位穆斯林作家。在十三世纪拉施特丁的《农艺书》中,指出 tchay 是一种草药,“我们的医生称为人民的国王”。“人民的国王”(Shah al-Khalq)的原文是 thah al-Qala'i(克拉茶),由马来半岛的航运中心克拉(中国古称箇罗)运去。在伊儿汗时代,茶被当作药物使用。茶作为饮料,被伊朗和伊斯兰世界所接受,是在 1830 年以后。

来自中国的各种米酒(大米和小米酿造的酒),也在十世纪开始出现在伊朗各地,其名称都借用回鹘语(畏吾儿语)或汉语。伊儿汗国的蒙古人特别喜饮啤酒和各种大米酒、小米酒,因此米酒也流行于伊朗。

波斯饮食流传中国,时间更早。汉代波斯饮食已进入内地。汉灵帝(168—189 年)时,由于皇室喜爱胡食,长安便已流行波斯风味的饮食。至于西北各地,是波斯人及粟特人出入的必经之地,胡食的流行更可想见,长安、洛阳不过是此风东进所及。但汉代胡食内容已多湮没不详,南北朝以来,特别是唐代开元以后,上流社会宴聚,亦时兴胡食,甚至有“尽供胡食”,纯粹进行西餐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七“陀罗尼集”介绍唐代流行的胡食,有𩚑𩚑(饅饅)、烧饼、胡饼、搭纳等数种。𩚑𩚑是波斯语 bardāna 的音译,原为黄油煎饼。烧饼,六世纪《齐民要术》卷九“饼法”记用“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是一种羊肉葱花饼。胡饼,汉代已有,

前赵石虎讳胡,改为麻饼,元代称蒸饼^①,并且有馅。九、十世纪以后,这些波斯饮食已逐渐在通都大邑推广,普遍到民间都能享食。

波斯酒、波斯果浆、波斯糖果、波斯枣、扁桃、齐墩、无花果、安石榴、苜蓿、甜菜、波斯菜,都是源出波斯,且久已流传中国民间的饮料、食品和蔬果。果子露(舍里必、舍里卜),也在元代进入中国上层社会。

波斯葡萄酒,汉代已能依法酿造。唐初占领高昌,又得到马乳葡萄酒法,由唐太宗(627—649年)亲自监督仿制成功,共有八种,“芳辛酷烈,味兼缇盎”(《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八种葡萄酒中应有烈性的烧酒,开中国内地制造烧酒的风气。但当时器械简陋,提取酒露的纯度有限,且方法极为秘密,限于禁中,难知其详。元代葡萄烧酒普遍推广,许有壬(1287—1364年)《至正集》十六有《咏酒露次解庶斋韵》:“世以水火鼎,炼酒取露,气烈而清。秋空沆瀣不过也,虽败酒亦可为。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译曰阿刺吉云。”蒙古文《格撒尔王传》中列举了八种用阿刺吉(烧酒、白葡萄酒)蒸馏而成的酒。阿刺吉('araq)是波斯语、阿拉伯语,专指以蒸馏法提炼酒精。元代此法大盛,可以用葡萄酒、枣酒、好酒等设计专门的蒸馏器加以提取,也称酒露、重酿酒。忽思慧在1330年为元代朝廷编纂《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提到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刺吉。朱德润在1334年家居江苏昆山时,从推官冯时可得到轧赖机酒(阿刺吉酒),说译意是重酿酒^②。尤以葡萄酒所制阿刺吉酒最名贵,称法酒。

波斯果浆,亦即果子酒,唐代已列入天下名酒,名叫三勒浆,这种酒由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波斯果子制成。“类酒,法出波斯”^③。制造地点是首都长安。还有顺宗时来自伊朗南部乌弋山离国

① 《资治通鉴·唐玄宗纪》,胡三省注。据唐代《大和上东征传》,鉴真东渡时备有干胡饼、干蒸饼、干薄饼、番捻头,胡饼与蒸饼原非一物,但后来制作或有变化。

② 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三,《轧赖机酒赋》。

③ 李肇:《国史补》卷下。

(锡斯坦)的龙膏酒,苏鹗《杜阳杂编》卷中记:“顺宗(805年)时处士伊祈玄召入宫,饮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蔷薇露,宋代已列入名酒,元代萨都刺以蔷薇露比作紫髓琼浆。陶宗仪《元氏掖庭侈政》列举元代宫廷有酒,名蔷薇露^①,波斯语名‘araq-i-gul。

波斯食品中的波斯枣,是生长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波斯湾的枣椰树的果实椰枣,现有伊拉克蜜枣之称。三世纪从南方海上传入中国,称海枣,不久又有经中亚运进的,起名千年枣。七世纪后由波斯商人作为珍贵礼品献赠宫廷,并供应广州外侨食用,于是有波斯枣之称。唐代已知椰枣的波斯名称窟莽(Khurmā),元代别译苦鲁麻、忽鹿麻。椰枣的俗称千年枣则在长时期中被使用。宋代又叫万岁枣、大食枣、番枣,明代改译万年枣,并通用万岁枣的名目。

扁桃,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有它的波斯名称婆淡树(badam)。扁桃肉苦涩不可吃,核中仁甘甜,元代称作巴旦杏,原意是杏仁。古代米地亚人,用杏仁做面包,当粮食。元代中国北方也像亚洲中、西部地区一样,爱上了这种食品。

齐墩,波斯语 Zeitun,橄榄。波斯橄榄中国所无,唐代已记载这种橄榄在西亚被榨油,以煮饼果,就是后来称呼的油橄榄,属于木犀科,与橄榄之属橄榄科不同。这种植物久已在中国南方引种,清代《西域同文志》称齐墩。

无花果、安石榴,都是在伊朗高原各地普遍生长的果木。无花果,唐代段成式已记下它的波斯语名阿驛、阿駟(anjir),说它的“叶有五出,似稗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稗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无花果的名称,在西方,从阿里士多德起就已使用,原因是它的花藏在果实中,果未成熟时剖开可以看到盛开的花。《梁书》记下的是无花果的

^① 万历戊午年刻,《稗乘》本。

个印度名称:优昙钵花,直到明代,广东都习称此名,中国南方早从印度将此果移植。851年到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就说中国有无花果。到七、八世纪时北方又进口这种果子,并且知道了它的老家在西亚。元代扬州城西有无花果园,每年由西域人(伊朗人)酿醋供奉元廷。

蒟萝,是中古波斯语 Zira 的译音,又称小茴香,晋代《广州记》已知蒟萝生波斯国。它的别名桔茗,也是来自波斯语 kamūn。伊本·西纳说蒟萝有四种,波斯蒟萝,黄色,性烈;克尔曼蒟萝,黑色;叙利亚蒟萝;那巴提蒟萝。可以增加滋味,多食无害处。

甜菜,中国古称菘苳菜,译自中古波斯语 Gundar。苏恭《唐本草》称作菘菜,近代又名根大菜。

名为波斯菜的菠菜,中国是在明代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才录下来的。它最早称作波棱菜,《唐会要》卷二〇〇说:“尼波罗国献波棱菜,类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即此也。”中国最早传入这种蔬菜是经尼波罗(尼泊尔)国使者之手,印度斯坦语称菠菜用了一个 palak,可以追溯到梵语里的 pālaṅka,因此被误传成菠菜出于波棱国,由于梵语中有一个印度国名 Pālaka^①,但更有可能是由著名的华氏城(Pataliputra,巴特那)输往尼泊尔,再经西藏进入长安的,波棱或即华氏城的一种译法。元代已知菠菜出在波斯,波斯语名 aspanah, asfināj。明代干脆称作波斯菜。

元代回回饮食文化时兴,一般日用百科全书中也有这类西亚食品。如《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中有“回回食品”十二种^②,每种有用料和做法,有的沿用民间惯用的中国化的名称,有的则是根据波斯语音译的称呼。十二种食品是:设克儿匹刺(sukar-pira,蛋白杏

①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中译本,第222页。

② 北京图书馆藏明司礼监刻本,参见黄时鉴:《元代的对外政策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仁糖),卷煎饼,糕糜(冻羊肉糕),酸汤,秃秃麻失(tutmāj,粉丝、面条),八耳塔(bardana,古译赭麩,黄油煎饼),哈耳尾(halva,芝麻甜点心),古刺赤(golānj,果仁蜜饼),海螺厮(hareese,肉麦包),即你疋牙(Chalpak 奶油面包),哈里撒(harīsat,harīsa,羊肉麦片粥),河西肺。它们是十四世纪中国北方回民和汉族居民的日常食品,给中国的饮食文化增添了新的风采。

第五节 语言与文学

一、波斯语在中国

波斯语在二千多年中一直是中国人较多地接触到的一种外国语。《史记·大宛列传》已评述伊朗语系通行在大宛以西,“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不同俗,相知言”。《汉书·西域传》更注意到安息国的文字,“书革,旁行为书记”。是一种横写在皮革上的文字。早期的波斯语随着波斯物产的来华凝聚在中国语言中,成为汉语词汇,如狮(Sheer)、苜蓿(Musu)、葡萄(Budawa)、胡荽(Koswi),甚至麒麟、符拔,叱拔也都写入中国文献。《续博物志》将大宛汗血马六匹分别取名红叱拔、紫叱拔、青叱拔、黄叱拔、丁香叱拔、桃花叱拔,叱拔即是波斯语中的马(Asp)。至于苏胡(珊瑚)、琥珀(兽珀)、密陀僧、颇梨、瑟瑟、氍毹、诃黎勒、无食子(没食、墨石、摩贼、没石、没食子)、菘苾菜、菠菜、苜蓿、巴旦杏、窟莽(苦鲁麻、波斯枣)、没药、阿末香(龙涎香)、阿虞截(阿魏脂),这些为数众多而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波斯物产、香药,长期以来已是中文词语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了。

《北史》卷九十七列举波斯制度文化,有国王称翳曷,妃称防步率,诸王子称杀野;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关禁;

地卑勃,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河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马。祆教、摩尼教传入中国,将许多宗教术语和神职人员的等级名称转写成汉语。在前伊斯兰时期,祆教徒、摩尼教徒和景教徒进入中国以后,仍多用波斯语。祆教祭司使用波斯语宣教,摩尼教徒则使用安息语或粟特语。伊斯兰初期,波斯语不但是国际商业上通用语言,而且也是伊斯兰教中十分有力的一种传教语言。十世纪后,波斯语逐步成为亚洲东部伊斯兰世界的文学语言,伊朗人又通过海外交通活跃于中国东南沿海,波斯语继续成为中国人熟悉的一种外国语。十二世纪的摩尼教就曾使用波斯语传教,《宋会要》记宣和二年(1120年)睦州青溪县方腊聚众起事,宣传的是明尊之事,“至于字音,又难以辨认”,这难以辨识的文字,想是波斯语了。

元代由于推行歧视汉人的政策,重用色目人,其中也有一些是伊朗人。元朝和西北三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和伊儿汗国关系至深,波斯文化在三大汗国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因此给波斯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1289年元朝政府专门创建回回国子学,使用亦思替非文字,传授波斯语。亦思替非文字作为一种财务和计数文字,早在中国境内通用。广东遂溪窖藏葵口银碗,口沿外周的文字应是亦思替非文字。中国西部出土摩尼教文书中已见使用亦思替非文字书写纪年^①。波斯语在元帝国是仅次于蒙古语和维吾尔语的通用语言。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在他的游记中追忆他在1345年10月北上大都时经过杭州,在那里受到热诚的接待。当他被邀乘船游览时,听到了中国歌手唱起了波斯歌曲,他记下了其中的两句:“我对你一见钟情,心潮如波涛汹涌;祈祷时,壁龛中也出现你

^① 格希曼:《帕提亚与萨珊朝的波斯艺术》(R. Ghirshman, *Persian Art, the Partian and Sussanian Dynasties*, [Eng. trans. edition], N. Y.), 1962年版,第317—336页。

的面影。”这首歌词的作者就是伊朗著名诗人萨迪(1209—1292年),原诗共有二十二句:

你走过我身旁,总该看我一眼,
难道由于矜持才对我如此冷淡?
纵使到和闐也决找不到这妩媚容颜,
亭亭玉立的翠柏哪片草坪也难得寻见;
请中国画家端详这姣好的面容,
画一幅肖像,否则何必描绘水墨丹青?
若撩起面纱露出你弓样的蛾眉,
天边皎月也得收敛她迷人的清辉;
翠柏躯干挺拔,但缺少美丽的脸庞,
太阳面庞美丽,但略欠秀发的芳香;
自从开天辟地,未见有人如此妩媚娇艳,
你是皎月,是安琪儿?是凡人,还是天仙?
我对你一见钟情,心潮如波涛汹涌,
祈祷时,壁龛中也出现你的面影;
我愁锁心头,如同失足陷入激流之中,
你的玉唇莫非沾上我的血才如此殷红?
你若在我坟旁走过,我将轻曳你的衣襟,
纵然死去,我也会立即复活还魂;
你匆匆从我身旁走过,我的心备受折磨,
萨迪,别人不堪忍受,对你岂不是欢乐;
如若有人夸口说对你痴情倾心,
那准是花言巧语,蓄意骗人。^①

① 张玉书主编:《外国抒情诗赏析辞典》,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7页。

萨迪足迹很广,曾到达中国新疆边陲城市喀什噶尔,杭州在元代有维吾尔人居住,萨迪的歌曲便这样流传在杭州歌坛,受到当地人士的赞赏。

元明时代,波斯文仍是通用的国际语言。1409年郑和在斯里兰卡所立碑文,有中文、波斯文、泰米尔文三种文字。北京中央民族文化宫藏有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朱棣下令保护伊斯兰教传教的《谕米里哈只》敕谕,长100.5厘米,宽72厘米,自左至右,分别以中文、波斯文、蒙古文三种文字书写。

十六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创立经堂教育,十七世纪常志美在陕西派之外始立山东派,注重博览,在阿拉伯文经典外,更倡学习波斯文典籍,使教者与学者不必专精一经。他一生在山东济宁讲学,著有《哈控衣米诺哈志》(《波斯文法》),书用波斯文写成,通用于各伊斯兰教寺院学校。现在北京、南京等地都已发现该书的多种抄本。伊朗曾据北京东四清真寺保存的抄本,影印出版。此书大约是在伊朗境外由外国学者写出的波斯语语法书中最早的一部。在此以前,中国在明末吴人慎懋赏编辑的《海国广记·天方国》中,就天文门和地理门一共收录了八十四例中文与波斯文词汇的对照表,并用贴切的中文注明波斯语语音(《玄览堂丛书续集》97册)。

清代沿海地区的伊斯兰教经院,大多采用山东派的讲授办法,课本既有阿拉伯文的,也有波斯文的,大诗人萨迪的《蔷薇园》也曾作为教本,为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所熟谙。清初江宁伍遵契在1676年将波斯人二卜顿捞吸·额补白克尔在1223年写成的《米尔萨德》(Mirşad)译成中文,作者系德黑兰人,用波斯文写作。汉译本取名《归真要道译义》,但此书译者不准刊印,直到1912年才有南京蒋春华补注的铅印本问世。清末云南经师马联元(1841—1903年),多次赴麦加朝觐,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一生著译甚富,最后在印度康波尔(Gangpur)讲学期间去世。他的著作中有波斯文文法的《取命腰

雨》(或译《古文仙法》, *Kimiyya'i*), 还有用波斯文写的教义概论《四篇要道》(*Faşl*)、教条入门的《教款捷要》(*Muhimmat*), 都在云南木刻刊印。波斯语由于经堂教育的提倡, 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仍是一种足以与阿拉伯语相颉颃的语言。

二、吐鲁番摩尼教残经

二十世纪初, 在新疆东部吐鲁番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摩尼教文献残片。由十七种不同文字写成的这些古文献, 有佛教、景教和摩尼教的经文抄本, 对于亚洲古代各民族语言和资料的研究,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吐鲁番古文献的发现, 分别由德国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率领的中亚考察团在发掘中获得。1902年德国追踪英国斯坦因在新疆的考古和地理发现, 派遣柏林人种博物馆格伦威德尔教授组团赴新疆考察, 考察团在该年8月11日离开柏林, 经过中亚由伊犁入境, 前往吐鲁番进行考古发掘, 将所得文献、抄本、画像及各种文物装成46个大箱子, 在1903年7月运回柏林。运回的抄本有二十四种, 涉及的文字有十七种。其中就有在中国初次发现的用西域文字书写的摩尼教经典抄本残片。

接着德国又派出以勒·柯克教授和巴托斯率领的考察团前往新疆。考察团在1904年11月到达古城高昌(哈拉和卓), 发现了摩尼教寺院遗址, 发掘了石窟和佛塔。在吐鲁番东南40公里的木头沟, 又发现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直到1907年德国考察团离开新疆, 摩尼教文献残片已发现数千块之多。高昌古城曾有摩尼教寺院的地下书库, 可惜发现时所藏已多被泥水浸泡, 难以复原。

在吐鲁番已找到的摩尼教文献抄本, 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古突厥语和三种常用的中古伊朗语, 即中古波斯文(帕拉维语)、帕提亚文

(安息语)和粟特文。还有一块残片用大夏文写成,两块用乙种吐火罗文(龟兹文)书写。学者因此可以根据这些重大的发现,对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进行十分细致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柏林普鲁士科学院已将这些文献的主要部分加以发表,引起俄国、比利时、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学者详加探讨。战前德国发表的吐鲁番摩尼教文献,已由毕克汇成专集刊印^①。英国的鲍伊思编成了《德国收藏吐鲁番伊朗文摩尼教抄本目录》^②,足以使人了解德国对吐鲁番伊朗文手抄文献收藏的概况。

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文献,有摩尼用中古波斯文写成的重要著作《沙卜拉干》的手抄残片,近年已经释读英译^③。还有两首最古老的帕提亚文摩尼教赞美诗《胡威达曼》(Huwi dagman)和《安格罗斯南》(Angad Rōšnān),是三世纪的作品,或者就是开教帕提亚的阿摩所作,鲍伊思有专著加以研究和释读^④。吐鲁番摩尼教文献的残片,被鲍伊思辑入《摩尼教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读物》^⑤,并有详尽的注释。

对于吐鲁番发现的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文献的研究,使这两种早已湮没的古代语言获得新生。曾经主持德国收藏的吐鲁番文献发表工作的海宁,对于中古波斯语的研究贡献殊多,他在1933年就发表了《吐鲁番的中古波斯语动词》一文,后又编成《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

① 毕克编:《德国藏吐鲁番文书》(W. Peek ed.,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Forschung*)第2卷,Leipzig,1972年。

② 鲍伊思:《德国收藏吐鲁番伊朗文摩尼教抄本目录》(Mary Boyce, *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1960年。

③ 麦肯西:《摩尼的沙卜拉干》(D. N. MacKenzie, *Mani's Šābuhragān I, I*), BSOAS, Vol. XLII, pt. 3, 1979; Vol. XLIII, pt. 2, 1980.

④ 鲍伊思:《摩尼教帕提亚文赞颂诗》(Mary Boyce, *The Manichaean Hymn Cycles in Parthian*, London),1954.

⑤ 鲍伊思:《摩尼教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读物》(Mary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Leiden), 1975.

词目》^①。吉伦用法文写出了《帕提亚语》的专论^②。鲍伊思在各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摩尼教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词目》的辞书^③。海宁的研究,后来被汇编成两卷本的论文集^④。他们的成果,大大推动了吐鲁番出土的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粟特语文献的研究。

三、敦煌摩尼教残经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二十世纪发现的古文书中,有经学者检出的三部汉文摩尼教残卷,以《波斯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下部赞》的名称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四卷,内中涉及古代波斯语。

《波斯教残经》最初在1911年出版的《国学丛刊》第二册上刊布。经法国学者沙畹、伯希和和日本学者羽田亨研究,定为摩尼教残经(《国学季刊》1卷3号,定名为《摩尼教残经一》)。残经是一篇专题论文,论述人类自身并存明暗二性的教义,可能是《仪略》所提摩尼写作的七部经中的第五“钵迦摩帝夜”部的汉译,译名《证明过去教经》。“钵迦摩帝夜”在希腊语中便是“专题论文”。^⑤

① 海宁:《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词目》(W. B. HENNING, A List of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Words), BSOAS, IX, 1937, pp. 79-92.

② 吉伦:《论帕提亚语》(A. Ghilain, Essai Sur la langue parthe, Son système verbal d'après les textes manichéens du Turkestan Oriental),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Vol. 9, Louvan, 1939.

③ 鲍伊思:《摩尼教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词目》(Mary Boyce, A Word-List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1977, Leiden.

④ 鲍伊思编:《海宁论文集》(二卷本)(Mary Boyce ed. The Selected Papers of W. B. Henning), Vols. 2, Leiden-Teheran-Liege, 1978.

⑤ 哈仑、海宁:《摩尼光佛宣示的教义与教规》(G. Haloun, W. B. Henning. The Compendium of the Doctrines and Styles of the Teaching of Mani, the Buddha of Light), Asia Major, N. S., 3, 1952, pp. 204-209 页。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91-205页。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分别由斯坦因和伯希和发现后携回本国。上半部在1907年5月由斯坦因取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编号S3969；后半部在1908年为伯希和携去，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3884。1925年，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公布《敦煌发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的若干词语》一文，伯希和也发表《敦煌发见的两篇摩尼教手稿》的短文，认定分藏伦敦和巴黎的这两个卷子原是一件文书中的前后两截。发表后，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

《下部赞》，计有七言诗1254句，并有少量四言和五言诗，以及三段音译文字。文卷在1907年被斯坦因取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1916年由日本学者矢吹庆辉鉴定为摩尼教经，1926年和1943年相继被译成德文和英文。《下部赞》的结语中，有译者道明的后记，声称“梵本三千之条，所译二十余道；又缘经、赞、呗、愿，皆依四处制焉。但道明所翻译者，一依梵本”。译者在译出全文外，留有三段音译文字，第一段列于经文之首，为中古波斯文；第二段见“次偈宜从依梵”，为帕提亚文；第三段为初声赞文，也是帕提亚文。三段文字是八、九世纪时汉译摩尼教经典中保留的古波斯文字。^①

《下部赞》有叹明界文，凡七十八颂，分四句，未冒慕闍撰^②。德国学者海宁认为《叹明界文》是三世纪帕提亚文赞美诗《胡威达曼》第一首的汉译^③，不妨以为中世纪经过改编的汉译摩尼教原本经文的代表作。《下部赞》将摩尼译作忙你具智法王。《仪略》第一章开首便称：“佛夷瑟德乌卢洗者（本国梵音也），译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无上医王应化法身之异号也。”佛夷瑟德

① 音译文字的研究，见布莱德：《摩尼教典的汉译》（Peter Bryder,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Sweden），1985。

② 据林悟殊就德国施塞微（Helwig Schmidt Glintzer）提供的原件复印本校正。

③ 海宁：《评〈下部赞〉译文》（W. B. Henning, *Annotation to Mr. Tsui's Translation*），BSOAS, 11, 1943, 217。

乌卢洗,是东方摩尼教徒对教主摩尼所用中古波斯语尊称 *freštag rōšan* 的音译,意思是“光明使者”。

敦煌摩尼教经中保存的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的字音及译文,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波斯语文书,它为世界文明的宝库增添了藏品,也为中国和伊朗的文化交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

第四章 中国和阿拉伯、叙利亚 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香料王国

阿拉伯是个盛产香料的国家，西海岸又以出产金质极纯几乎无需冶炼的金矿著称。希罗多德曾经盛赞“整个阿拉伯，都散发着极其美妙的芳香”(XVI, 4, 23)。围绕着半岛南部，北上阿喀巴湾的香料之路，早在大流士帝国建立以前就已是阿拉伯世界与外界沟通的命脉。自公元前四世纪末起，一直到罗马帝国侵占叙利亚为止，北方阿拉伯人的那巴特王国的首都彼特拉，长期以来，是往来于南阿拉伯的沙比和地中海之间队商的必经之路。阿拉伯国家也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与东方其他古国互通音讯。

中国到汉武帝(前 140—前 87 年)时代才知道西亚有个条支国。在罗马兴起以前，最初统治西亚的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出来的塞琉西王朝。不久，塞琉西帝国一分为三，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相继独立，亚洲西部归安提阿克，建都地中海滨奥朗特河畔的安提阿克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利凡特和阿拉伯北部都归入它的版图，中国便以

统治此地的安提阿克(Antioch)王朝译作条支,省去开唇音的第一音节。张骞在公元前126年从巴克特里亚归国后,向汉武帝刘彻报告,帕提亚(安息)是西域最大的国家,条支在它以西。公元前30年罗马并吞叙利亚,替代安提阿克统辖地中海东部领土。张骞已知条支有大鸟,卵如瓮,又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有弱水之称的死海和阿拉伯游牧部落,尚未与中国人有过接触。

后汉时代条支的地理观念与前汉时代大不相同,是由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政治形势的变动。当地的那巴特王国(公元前169—前106年)曾长期置于罗马的保护之下,到公元105年罗马皇帝图拉真征服那巴特国,直接统治了阿拉伯北部地区。条支在中国人看来,只是一个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滨的国家了。公元94年,班超征服焉耆,葱岭交通畅通,“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八)。班超派甘英在97年取伊朗北道前往大秦(埃及),亲历了直通波斯湾西岸阿拉伯半岛于罗国(Gerrha,今乌凯尔)的陆程,“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Ecbatana,今哈马丹),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Spasinu)。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甘英所到的斯宾国,译自波斯湾头的阿拉伯城市史帕西纳——喀拉塞(Spasinu-Charax),为《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条支国城^①。

条枝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

^① 白鸟库古:《条支国考》,《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1926,东京;中译文见《塞外史地译丛》(第1辑),第75—102页。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25页。

息。后役属条枝，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

条支国城建筑在面临大海的山上，故址在现在波斯湾头沙洲以北的内地。塞琉西朝的安提阿克四世（前 175—前 164 年）曾将古老的喀拉塞集镇加以改建，取名安提阿克。公元前 140 年左右，阿拉伯酋长史帕西纳占领此地独立，当地人便习称史帕西纳——喀拉塞，以后役属安息约有两个世纪。

前汉时代，汉使到条支，无论是去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抑或到波斯湾头，都通过伊朗北道，经过安息都城番兜城。那时，汉使通行伊朗南道的，仅到乌弋山离的国都亚历山大普洛夫达西亚（锡斯坦）。后汉时代，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海上通商大为兴旺，伊朗南道也因此被亚洲中部商人所重视。中国使团于是也有取伊朗南道到波斯湾头条支的，并且知道由此北行，再转向东北，马行六十多日，同样也可到达安息国都。这条伊朗南道，是出葱岭经巴克特里亚，穿越锡斯坦，再经伊朗南部卡尔玛尼亚、波西斯、苏西安那，到波斯湾头两河交汇处的条支。

阿拉伯半岛南部素有香岸（Shiḥr lūbān）之称，最早运到中国的香料、香脂，都有一个能体现它奇特的性能和国名的专名。东汉郭宪《别国洞冥记》列举汉武帝元封年间（前 110—前 105 年）焚烧天下异香，有沉光香（乳香）、涂魂香（返魂香，苏合香）。沉光香据说出在涂魂国，烧之有光。涂魂国的对音是南阿拉伯著名的香料运输港佐法尔（Zafār, Dhufar），它是海达拉毛的乳香贸易中心^①。涂魂香则因苏合香被传为起死回生的灵药而得名，后来又知道它的产地在席赫尔（al-Shiḥr），古译苏合。三世纪的《广志》已知苏合香“出大秦国，或云苏合国。”^②

①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08、122 页。

② 同上书，第 106、107、122 页。

和涂魂国同样古老的名称还有香国。香国(Lubān)之名早在前汉就已使用,译作勒毕国^①。《别国洞冥记》卷二以传说为据,记下了公元前110年勒毕国贡物:

元封元年,勒毕国贡细鸟。以方尺之玉笼盛数百头,形如大蝇,状似鸚鵡,声闻数里之间,如黄鵠之音也。国人常以此鸟候时,亦名曰候日虫。帝置之于宫内,旬日而飞尽,帝惜求之不复得。明年,见细鸟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蝉。

来自乳香之国的勒毕国所献细鸟,是一种形体细小的蜂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也出现过成群的蜂鸟。

香国(勒毕国)、涂魂国(佐法尔)都是甘英出使前早已通行中国的阿拉伯香岸的国家。到甘英出使到达于罗(朱尔哈,今乌凯尔)后,由于他所到的地方“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八)在波斯湾通往红海的航路沿线国家,在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冬十一月,有西域蒙奇、兜勒两国联袂遣使来华。蒙奇是红海南部商业中心的莫札(Muza, Mocha, 今木哈),兜勒是它对岸埃塞俄比亚的要港阿杜利(Adulis)^②。和帝对两国使者“赐其王金印紫绶”。由于中国和莫札、阿杜利的建交,于是120年有条支国贡异瑞的使节,形高七尺又解人语的鸚鵡(鸵鸟)被运到了洛阳。东汉时代,从波斯湾头的条支到南阿拉伯的香国都和洛阳缔结了盟约,对罗马帝国通过阿拉

① 勒毕国不能倒置成毕勒国(说见《秘鲁—勒毕—弥罗》,《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7日第7版),将它视作秘鲁。又见沙丁等编:《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②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70页。张星烺最早将蒙奇考作马其顿,兜勒订为吐火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77年校订本,1册,第24页);林梅村以为是马其顿和推罗(提尔),见《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第71—84页。

伯南部开展对中国的贸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94年后,由平城(大同)迁都洛阳的北魏与南亚、西亚各国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早先已和印度、波斯建立牢固商务关系的希米雅尔和艾兹提也分派代表和中国联络。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十月,希米雅尔和艾兹提的使团随同吠哒、波斯、巴里格柴(印度坎贝湾)和渴槃陀(塔什库尔干)的政治代表抵达洛阳。

《魏书》卷八将希米雅尔译作渴文提(Himyarite),将阿曼的艾兹提译作忸杖提(al-Azdite)^①。他们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的商业竞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希米雅尔王国在三世纪并吞了沙比人的国土,控制了香料之路,一跃而成南阿拉伯的强国。四世纪初阿克苏姆势力伸向希米雅尔,波斯则通过在波斯湾立国的莱赫米人对希米雅尔王族威胁利诱,以和阿克苏姆展开角逐。作为希米雅尔王国和莱赫米朝中间人的是艾兹提部落。二世纪时,早先定居在也门的艾兹提阿拉伯人开始成群北迁,进入由波斯总督控制的阿曼,不久,不断增长的艾兹提人成了阿曼境内人数最多的居民。三世纪末在两河入海处希拉(Hira)建国的莱赫米朝,就是艾兹提部落首领马立克的外孙阿慕尔所创建。378年阿克苏姆退出也门以后,重新恢复统治的希米雅尔王国仰仗莱赫米王朝,在南阿拉伯继续和以拜占庭为后盾的阿克苏姆展开商战。正当莱赫米王朝孟迪尔三世(505—554年)极盛时期,阿曼和希米雅尔向北魏派出了使团。这是继条支和勒毕国以后,统治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阿拉伯国家和中国正式建交的又一次国事访问。

从前汉时代勒毕国、涂魂国开始的南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商业联系,后来又转成后汉时代蒙奇国、苏合国这些希米雅尔和阿曼的古老城邦遣使来华;唐宋时代,希米雅尔船只航行广州时有所闻,在长

^① 沈福伟:《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

时期中维系着和中国的联系。

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和他的继任者建立的哈里发帝国,领土遍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连同埃及、北非,成了一个大一统的阿拉伯世界。穆罕默德曾告诫他的弟子:“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①中国的财富与智慧,都为阿拉伯人所倾羨。当651年波斯末王伊嗣俟三世战败被杀后,阿拉伯外交使团立即奔赴唐朝都城长安,651年正统派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的使节被唐高宗正式接见,从此双方展开了漫长的外交往来。当时中国有关西方的知识大都得自伊朗,阿拉伯译名大食也是如此。阿拉伯大部落泰伊(ṭayyi')从迁入萨珊波斯统辖的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后,就被称作Tāzi,中古波斯语写作Tačik,粟特人也将阿拉伯人称作Tazik,后来成了穆斯林的通称^②,中国于是也以大食的译名相称,异写有大石、大寔、多氏等。

唐代和阿拉伯的关系,在文化经济联系上具有秉承以往中国和伊朗、叙利亚、埃及关系的传统特色,尤其在八世纪中叶,唐朝退出中亚,唐和阿拔斯朝的关系,在政治上由于彼此和平共处而显得十分融洽,在经济上更因双方加强了海上联系,展开了以中国外销陶瓷和阿拉伯香药成批东运为标志,在文化交流上崭新的时代。海上陶瓷之路的拓展,象征着中国与阿拉伯自唐、五代历宋、元、明、清不衰的文化联系。

① 《穆罕默德圣训》(Abdullah al Mamun al-Suhrawardy ed., *The Sayings of Muhammad* [Hadith], London, 1941), 第273条。

② 弗莱:《波斯黄金时代》(Richard N. Frye, *The Golden age of Persia, The Arabs in the East*, London), 1975, 96页;桑德曼《西安出土中古波斯语汉语碑铭》(W. Sundermann & T.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Berlin, 1966, XIII, 440。

大食使节自 651 年初次来华,到 798 年最后一次使团归国,一百四十八年中,出入长安多达四十一次^①。按年代序次列出于后:

1. 永徽二年(651 年)八月,大食国始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2. 永徽六年(655 年)六月,大石闾盐莫念(amir-al-mu'mmin,信士们的长官,别译瞰密莫末臧,或简称茂门——引者)并遣使朝贡(同上)。

3. 龙朔元年(661 年),多福王(Zafar, Dhufar)难婆修强宜说遣使者来朝(《新唐书·西域传》卷二二一下)。

4. 永隆二年(681 年)五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各遣使献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5. 永淳元年(682 年)五月,大食国遣使献方物(同上)。

6.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三月,大食请献师子。姚璉上疏劝阻,乃却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五)。

7. 长安三年(703 年)三月,大食国遣使献良马(《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8. 景云二年(711 年)十二月,大食遣使献方物(同上)。

9. 开元初(713 年),大食遣使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旧唐书·大食传》卷一九八)^②。

10. 开元四年(716 年)七月,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amir-al-mu'mmin Sulayman 715—717 年)遣使上表,献金线袍、宝装

① 据《册府元龟》卷九六五、九七〇、九七一、九七二、九七五、九七六,《旧唐书·大食传》卷一九八,《新唐书·西域传》卷二二一下,《资治通鉴》卷二〇五排比。白寿彝:《从担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1936 年,第 5 卷第 11 期;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3—97 页)列出的大食使节为三十六次。

② 据《太平广记》卷八二,此次使节来自突尼斯的凯鲁万。

玉洒池瓶,各一。授其使员外中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卷九七一)。

11. 开元七年(719年)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12. 开元十二年(724年)三月,大食遣使献马及龙脑香(同上)。

13. 开元十三年(725年)正月丙午,大食遣其将苏黎等十二人来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带,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14. 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大食遣使苏黎满(Sulaymān)等十三人献马及毛锦(《册府元龟》卷九七一)。^①

15. 开元十六年(728年)三月辛亥,大食首领提卑多等八人来朝。并授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16. 开元十七年(729年)九月,大食国遣使来朝,且献方物。赐帛百匹,放还蕃(同上)。

17.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十二月癸丑,大食王遣首领摩思览达干等七人来朝。并授果毅,各赐绢二十匹,放还蕃(同上)。

18.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丙申,大食首领和萨(Hassan)来朝。授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钿带,放还蕃(同上)。

19. 天宝三载(744年)七月,大食国遣使献马及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20. 天宝四载(745年)五月,大食合么国(Hamāh)遣使来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21. 天宝六载(747年)五月,大食国王遣使献豹六(《册府元

^① 《新唐书》记作开元十四年。

龟》卷九七一)。

22. 天宝六载(747年),都盘等六国皆遣使入朝(《新唐书·西域传》卷二二一下)。封都盘王为顺德王,勃达王为守义王,阿没王为恭信王,沙兰王为顺礼王,罗利支王为义宁王,涅蒲王为奉顺王(《册府元龟》卷九六五)。^①

23. 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二月己卯,黑衣大食谢多诃密(Said al-amir)遣使来朝。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24. 天宝十二载(753年)三月,黑衣大食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25. 天宝十二载(753年)四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26. 天宝十二载(753年)七月辛亥,黑衣大食遣大酋望(Wahb)二十五人来朝。并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27. 天宝十二载(753年)十二月,黑衣遣使献马三十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28. 天宝十三载(754年)四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29. 天宝十四载(755年)七月,黑衣遣使贡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30. 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黑衣大食遣大酋望(Wahb)二十五人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① 都盘(Ādharbayjān, 主城阿德比尔、大不里士)、勃达、阿没、沙兰、涅蒲(纳沙布尔)都在伊朗境内;罗利支,依《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贾耽道程,是罗刹支(al-Jazirah, 上美索不达米亚),都城摩苏尔,位于今伊拉克境内。

31. 至德初(757年),大食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32. 乾元元年(758年)五月壬申朔,回纥使多乙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闾文(Nawfal)等六人,并朝见。至闾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左右,从东西门并入。文涉施(Waqqāṣ)黑衣大食使来朝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33. 乾元元年(758年)十二月,黑衣跋陀国(Baghdād,巴格达)使伏谢多(Abu Said)还蕃,宴赐有差(《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34. 上元元年(760年)十二月,宴白衣婆揭使等十八人于延英殿会(《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35. 宝应元年(762年)五月戊申,黑衣大食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36. 宝应元年(76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37. 大历四年(769年)正月,黑衣大食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38. 大历七年(772年)十二月,大食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39. 大历九年(774年)七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40. 贞元七年(791年)正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41. 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丁卯,以黑衣大食使舍嵯(Hassan)、乌鸡(al Waqidi)、莎比(al-Ṣābi)三人并为中郎将,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最初两次使团都由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派出,从麦加万

里迢迢奔赴长安,开创了中阿建交的历史。接着在661年,多福王(佐法尔王)难婆修强宜说派使者来华,是香料贸易中心在汉代古译涂魂国之后,第一次以它的本名出现在中国档册上。

伍麦叶朝的建立者穆阿威叶(661—680年)统治时期,长期与拜占庭为敌。在他死后,他的继任者叶齐德一世(680—683年)派出的使者才初抵长安,使者来自伍麦叶朝的首都大马士革。在中国史书上称白衣大食。直到752年,新兴的阿拔斯朝向唐朝派出使者,双方于是又频频交聘。阿拔斯朝崇奉黑旗,以黑为贵,唐朝才以黑衣大食相称。758年的跋陀国使,是由阿拔斯朝第二位哈里发,声名喧赫有“常胜者”称号的曼苏尔(al-manṣūr, 754—775年在位)所遣。这位给新王朝开创大业的哈里发,不但为新王朝奠定了基础,亲自制订了和中国友善相处、积极发展海上联系的政策,而且还是阿拔斯新都巴格达的奠基者。曼苏尔执政后,选定巴格达村营建他的新都,经过四年,到762年正式迁都,定名和平城(Dār al-Salām)。曼苏尔在当年踏勘城址时就曾宣称,“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他的使者当年就到了中国,向唐肃宗报告这一消息。762年,黑衣大食的使者便来自新都巴格达了。这一年之中有两次使节赴中国,至少762年12月的那次是向中国报道新都的竣工、曼苏尔迁都的盛典。在哈仑·拉希德(786—809年)时代,这位曾接待过欧洲查理曼大帝使者的哈里发,也向唐德宗(780—804年)派遣过两次使节,798年的那一次算是最后一次,此后因吐蕃占领河西走廊,中国和阿拉伯使者所走的陆路不通,双方使节才告中断。

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海上贸易,在九世纪成为双方主要的贸易途径,它的重要性随着印度洋贸易网的调整而与日俱增。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就是经久不衰的中国外销瓷世纪的到来,它以华瓷的世界性输出,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信誉。宋朝建立以后,这种商业关系又进一步以海上朝贡贸易的方式着力进行,广州成为阿拉伯、波斯商人常

来常往的口岸。使者北上汴梁(今开封),以开宝元年(968年)二月二十二日大食国遣使为最早。《山堂考索》称:“是年大食国遣使贡方物,自是贡奉商船往来不已。”(《宋会要·蕃夷》七)自开宝元年(968年)至乾道四年(1168年),来自波斯湾和阿拉伯的大食使节,约有四十次之多^①。976—995年间,来自希米雅尔的蒲希密(Abu Himyarite)父子(子名蒲押陀黎)、1088—1089年连续来华的麻罗拔国(Zafār,佐法尔港)使者,都是宋代中阿海上使节往还的著名事例。

建国漠北的契丹,后来改称辽(916—1121年),和大食国(巴格达)建立了三年一次的队商贸易,1021年(太平元年)大食国王的请婚特使再次到来,辽圣宗耶律隆绪(982—1030年)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为公主下嫁巴格达,与阿拔斯哈里发卡迪尔(991—1031年)建立了和亲关系。于是双方人员往来更密。西辽时代,大批华人跟着突厥人西迁,于是伊拉克出现了许多华人的后裔。当1259年常德奉蒙哥汗之命自和林西行谒见旭烈兀时,竟惊奇地发现巴格达哈里发宫廷中有许多后妃是北中国的汉人,“其后妃皆汉人”(刘郁:《常德西使记》)。受到波斯、阿拉伯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在美索不达米亚撒播着中国文化,同时也逐渐阿拉伯化了。

元朝和 中东局势的变迁息息相关,来自利凡特城市提尔的发郎使者,是占领当地的法兰克人基督教骑士团派遣的。1259年使团出发时,大约正当大马士革从马木鲁克人手中落入蒙古大军铁蹄之下,蒙古大军正所向披靡向巴勒斯坦挺进之际。使者在中统二年(1262年)5月7日到达上都开平,“是日,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逾三年。说其国在回纥极西徼,常昼不夜”(王恽:《中

^① 白寿彝:《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禹贡》第7卷4期;《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122—129页),统计开宝元年至乾道四年共49次。但其中有属非洲各伊斯兰国家的,参见本志六、七、八、九各章。

堂事记》)。使者来自常昼不夜的地方,但不见得是远到北极圈附近,王恽介绍其地“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发。”有欧罗巴种族特征的西方国家,又和常昼不夜语原有直接联系的是利凡特。拉丁语以地中海东部滨海之地为 Levare,意即“日出之地”,于是国名便有与日同义的称号了^①。此地在《魏略》中称作驴分,也是同一个意思,在中国流传,应该是历有年数了。

1281年伊儿汗大军在希姆斯被马木鲁克击败,伊儿汗阿八哈随即去世。元朝在1282年10月派阿耽出使的法里郎国,亦即利凡特的提尔。使者又顺道去开罗,大有调停伊儿汗和马木鲁克苏丹盖拉温(1279—1290年)的争战、重兴红海、地中海贸易之意。这时中国人从海上被输送到忻都(印度)、回回(阿拉伯)的日益增多,去后常年侨居不归。华船操纵了印度西海岸(马拉巴)至广州、泉州的区间贸易,元朝为推行官本贸易,禁止私商经营海外贸易。到1322年马木鲁克在红海东岸的属境希贾兹也派使者来华,《元史》卷二八译作押挤思国。这次阿拉伯使节促成了元朝在1323年重新开放海外贸易。同一年,马木鲁克苏丹纳赛尔和伊儿汗不赛因缔结了和平条约,直到1335年,双方相安无事。

明朝建立以后,从十五世纪开始,中国和西亚开展海陆贸易,一直保持到万历(1573—1620年)年间。

海上贸易自1403年郑和初率宝船队开赴印度古里(卡利库特),分遣船队便远赴波斯湾的忽鲁谟斯(霍尔木兹)、阿拉伯的阿丹(亚丁)、祖法儿(佐法尔)、天方(麦加)。

陆容《菽园杂记》、谈迁《国榷》都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1409年12月—1411年6月)船队到了天方^②,也访问了亚丁、佐法尔和伊

^①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4页。

^② 《守山阁丛书》卷三。又《殊域周咨录》卷一,天方条:“本朝永乐七年,遣正使太监郑和等往赉赐其国。”

萨角。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1413年12月—1415年),船队到了刺撒(伊萨角 Ras Isa)^①、阿丹(亚丁),因此1416年11月19日国使团赴华,其中便有刺撒、阿丹。第五次下西洋(1417年12月—1419年),船队又到佐法尔、亚丁。1419年十七国使团来华,亚丁进献麒麟(长颈鹿),被认作祥和吉利。1421年初,霍尔木兹、亚丁、佐法尔、伊萨角等十六国使者来华,郑和奉命伴送归国,第六次下西洋(1421—1422年),8月返国时,“诸番国皆随入贡”。其中应有亚丁、佐法尔、伊萨角的使团。1423年9月,上述阿拉伯三国使团协同霍尔木兹等十六国使团再度来华,在总人数达1200人的庞大使团中占有重要地位。亚丁等阿拉伯国家已连续三年派使团参加中国经办的印度洋官方贸易。

第七次下西洋(1431年12月—1433年)是郑和所率宝船队最后一次前往古里,使船到了亚丁、佐法尔、伊萨角。1433年闰八月,佐法尔国王阿里(Ali)、亚丁国王抹立克·那思儿(Malik Naşir)、天方国以及古里国等所派十国使团抵达北京。天方国进麒麟,宣德帝在奉天门接见使者,在宣德年间形成外国来使的高潮。阿拉伯使臣直到1436年夏才搭爪哇船离境。

1490年,麦加又参与了中亚和北京的队商贸易,赓续进行到万历年间,成为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北方和伊斯兰圣地麦加在经济上合作的一种有效联系。

① 旧考 El-Hasā, Ras Sharwein, 均误。《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考作伊萨角,在红海南端,也门境内,15°11'N, 42°39'E。

第二节 中国的阿拉伯人社区

阿拉伯人在唐代因经商或传播伊斯兰教而进入中国,或由中亚细亚抵达新疆和河西,或从海上来到华南沿海。安史之乱,两京失陷,757年唐朝调集安西、北庭和拔汗那、大食援军在凤翔整编,夺回长安、洛阳。这些大食军队大约从吐火罗东调,人数不过几百,多属骑兵,原籍也门。十世纪中叶,波斯人阿卜杜勒·米撒尔游历中国,去过新疆、河西。他到过一個名叫喀力伯(Kalib)的国家,国境长达一月之程,有也门人居住,都是当年也门王陀拔(Tobba)大军出征中国时的遗民,使用希米雅尔文字。差不多同时,曼苏地也说吐蕃占领下的图伯特(河西走廊)人口中希米雅尔人占了半数,间或也有陀拔的后裔。九世纪以后,西州至甘州之间回鹘统治区确有大食军队的后裔侨居。八世纪末有一个名叫塔明·伊本·巴希尔·摩塔维克(Tamin ibn Bahr al-Muṭṭawwic)的阿拉伯人,记录了他从中亚到回鹘(Toghuzguz)首都的行程,他的名字摩塔维克,原意是志愿兵,意思是职业军人,他应该属于那批在中亚与新疆充当职业军人的阿拉伯人。

黑衣大食的雇佣军也曾服役于吐蕃,在云南四川边境与唐军作战。贞元(785—804年)时吐蕃在泸水边筑悉摄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命令部将杜毗罗联合南诏狙击,801年大获全胜,“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新唐书·南诏传》卷二二二上),他们的后人也就成为定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的先祖。

唐代侨居在通商口岸广州和扬州的阿拉伯人特别多。广州在伊斯兰教徒心目中,是最早传播该教的一个中心。中国教徒传说,“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ṣahābah 圣门弟子)撒阿的·斡葛思(Sa'd Waqqas)始传其教入中国”(《明史·西域传》卷三三二“默德那”条),开皇

(581—600年)传教是明代流行的说法,因不知回历与公历的误差而造成。这位圣门弟子撒阿的·斡葛思就是奥麦尔哈里发派去征服萨珊波斯的统帅赛伊德·伊本·艾比·斡葛思,传说他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出使中国,死后葬在广州^①。明代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卷七也说穆罕默德有门徒大贤四人,唐武德(618—626年)中来华传教,一贤传教广州,二贤布道扬州,三贤、四贤开教泉州,泉州东南灵山有三贤、四贤圣墓。广州则有一贤旺各师(即斡葛思)墓,《天方正学》卷七旺各师大人墓志说是贞观六年(632年)到长安,受太宗准许开教江宁、广州。这些传说已成伊斯兰传教史上的积淀,留传于后世。

唐代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为数众多。最早在八世纪到中国经商而留有姓名的,是阿曼人伊巴迪派教长艾卜·乌拜达(Abu 'ubayda 'Abdallāh bin al-Qāsim)^②。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居然发生了大食、波斯人在广州掠仓库、焚庐舍,最后浮海而去的事。广州的外商既多,起先还是蕃汉杂居,后来便出现了专门供外商居住的蕃坊。太和(827—835年)初中进士、在832年出任广东高州刺史的房千里写有《投荒杂录》,记述他在岭南的见闻,最早提到广州蕃坊:“顷年在广州蕃坊时,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③ 851年来到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在游记中也说,广府(广州)是阿拉伯商人聚居的地方,有伊斯兰教阿訇一人和清真寺,中国皇帝因伊斯兰商贾多集中广府,才任命伊斯兰判官一人,按伊斯兰风俗加以管理。“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允,一切均按《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规行事,因此伊拉克商人来此地的,都善加称颂”。外商乘季风

① 清·蓝煦:《天方正学》卷七。

② 莱维奇契:《早期赴华的阿拉伯商人》(T. Lewicki, Les Premiers Commerçants arabes en Chine),刊波兰《东方学报》(Rocznik Orientalistyczny)X1,1935年,第179—180页。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

搭船赴广,到时“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李肇:《唐国史补》)。蕃坊之立约在820年以前,既有蕃坊,才有蕃长,蕃长都由外商充任。836年到广州出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的卢钧,为了改变当地居民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特立法规定,“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可见阿拉伯人与华人通婚的当不在少数。

879年黄巢农民军攻陷广州时,阿拉伯人来华经商、定居的已为数众多。

在广州住唐的蕃客,也有进蕃学受特殊教育的。大食国人李彦昇是大中元年(847年)经曾任岭南节度使卢钧的推荐,在848年以进士及第深受华化教育的一员。唐代进士须通五经,又明时务,素以难考著称,阿拉伯人李彦昇可称是才学高深的人士了。^①

宋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有增无已。北宋时代,广州蕃坊繁荣胜过唐代,蕃市兴旺,舶来品充斥市场。熙宁(1068—1077年)时,广州城外已有蕃汉万家,“每年多有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当时的蕃长,都由宋廷委派,可以取得从九品保顺郎将的官职,“巾袍履笏如华人”^②。阿拉伯在各国中是最“富盛多宝货”的国家,来华商人在广州上岸后,常往各州和东京(开封)买卖。巨商如蒲希密、辛押陀罗、蒲沙乙、蒲亚里常出入广州。

蒲希密,是希米雅尔的一位老船长,多次来华。淳化四年(993年)蒲希密到了广州,因老病不能北上,派副酋长李亚勿到开封朝献,有象牙五十株、乳香八百斤、宾铁七千斤、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色蕃锦四段、白越诺二段、都爹一琉璃瓶、无名异一块、蔷薇水百瓶。至道元年(995年),蒲希密又派他的儿子蒲押陀黎到开封致谢,进贡方物。献物有白龙脑一百两、膈脐五十对、龙盐一银盒、眼药二十六瓯

① 陈黯:《华心》,《全唐文》卷七六七,又见《文苑英华》卷三六四。

②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六琉璃瓶、舶上五味子六琉璃瓶、舶上扁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座、蕃锦二段、驼毛褥面三段、白越诺三段。每次献物，手面阔绰。

蒲沙乙，阿拉伯首领，至和二年（1055年）、嘉祐元年（1056年）、嘉祐五年（1060年）都曾贡献方物。最后一次被授予武宁司阶，应是广州的蕃长一类人物。

辛押陀罗，勿巡人，出身阿曼首府苏哈尔。他长期从事对华贸易，致成巨富，在广州定居数十年，往返海上。苏辙《龙川志略》卷五有“蕃商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1072年，辛押陀罗作为大食勿巡国进奉使到开封朝献，返国时，宋廷以白马一匹、鞍辔一副相赠。他主动提出“统察蕃长司公事”的请求，宋廷以广州方面相度再作处置。由于他热心地方公益，在广州“开导种落，岁致梯航”（《东坡全集》卷一〇七），挟雄厚的财力，甚至提出助修广州城钱银，虽未被宋廷允准，然势力之大，一时无二，宋朝因此封他为归德将军。

蒲亚里，其名亚里对音为 Ali 或 Himyarite，大约是也门商人。绍兴元年（1131年），蒲亚里以商人一次进奉大象牙二百零九株、大犀三十五株。象牙每件在五十七斤以上，要用五万多贯才能支付，市舶司一时难以支付。蒲亚里因财力雄厚，“有右武大夫曾讷，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宋会要·职官》）以致宋高宗赵构在1137年亲自委广州知州连南夫劝他归国接洽商货，以利市舶之利。

蒲海达，是占城贵族的后裔，先祖阿拉伯人，在十二世纪时已成广州的豪族，号称白番人。甘蕉《蒲氏家谱》载，海达是二世祖，居广州玳瑁巷（今玛瑙巷），南宋孝宗（1163—1189年）、光宗（1190—1194年）年间因经商而出任要职，由太中大夫、中奉大夫擢广东常平茶盐司提举，管军千户侯。他身任此职后，针对流弊，悉心整顿，“赋税骤增，贡舶商帆，鹅湖云集。”在广州捐得官职的阿拉伯商人，还有蒲晋、

蒲延秀。《宋会要·蕃夷》七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诏，昨知广州折彦质奏：蒲晋久在广州居住，已依汉官保奏承信郎，今来进奉，可特与转五官，补授忠训郎。其蒲延秀，可依作引接占城入贡陈惟安例，与补承信郎”。

扬州，唐代也有阿拉伯人，尤以波斯人为多。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刘展在扬州发动兵变，平卢副大使田神功率兵马进讨。“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旧唐书·邓景山传》)。宋、元、明三代，有名可考的阿拉伯人，宋代有普哈丁、撒敢达；元代有撒穆逊丁、撒穆逊邦乃基、伊朗妇女阿伊莎·哈通的父亲埃米尔·勒尊丁等；明代有马哈谟德、展马陆丁、法纳等人，在扬州，或传教，或经商。

明州(浙江宁波)，宋代已有高丽使馆、波斯馆。波斯馆专门接待阿拉伯人和西方人士，乾隆《鄞县志·街巷志》说：“有波斯巷，该地驻有波斯团。”波斯团等于波斯馆，在今车轿街南巷左边，直到元代仍然使用。

泉州，在宋代一跃而成重要海港城市，地位仅次于广州。泉州也有专住外国人的蕃人巷。福建兴化人祝穆记述泉州，“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玢、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①。宋元时代，外国商人都居住在郡城之南。当时罗城在镇南桥内，外国商船都聚集在笋江、巽水汇流处的活浦海潮庵，在泉州旧南门外濒江一带^②。1345年访问泉州的伊本·白图泰注意到，“泉州有一条街全属穆斯林居住，那里有他们的寺院、济贫所和市场”。西拉夫巨商在1162年出资在泉州东坂修筑蕃商公墓^③，侨民人数之多，不难想见。

① 祝穆：《方輿胜览》卷一。

② 万历《泉州府志》卷一六。

③ 林之奇：《泉州东坂葬蕃商记》，《拙斋文集》卷一五。

南宋初,当地的豪富是西拉夫的波斯人,资财仅次于广州蒲氏。到宋末元初,蒲寿庚之父开宗迁居泉州,才成泉州豪族。蒲寿庚和他的哥哥寿成助宋平海寇立功,景炎(1276—1277年)时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寿成官至梅州知府,有《心泉学诗稿》六卷,后退隐泉州法石山中,与寿庚密谋叛宋附元。1277年蒲寿庚及子师文尽杀泉州南外宗子和淮兵,拒纳张世杰,归附元军唆都。元封蒲寿庚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1279年进职福建行省左丞,分省泉州,继续管辖对外贸易。长子师文为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海外诸蕃宣慰使,父子专擅市舶大权三十年。蒲氏家族在元代享尽荣华富贵,子孙多至显达,成为地方一霸。^①

蒲罗辛,是出入泉州的阿拉伯大商人。绍兴六年(1136年)从出产乳香的家乡到泉州进奉抽解。“乞比附纲首推恩。诏,蒲罗辛特补承信郎。”(《宋会要·蕃夷》七)所贩乳香值三十万缗,按宋朝规定,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的,都有官职。纲首蔡景芳因从中撮合,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同时授承信郎官职。蒲罗辛所贩乳香仅比熙宁十年明、杭、广三市舶司出卖乳香总额少一万多缗。蒲罗辛大约也是泉州的蕃长。

在埃及和西亚经商的犹太家族卡里米内,不乏经营中国绸布和瓷业者,伊祖丁·奎隆米·卡里米(‘Izz al-Dīn ‘Abd al-‘Azīz bin Maṣṣūr al-Kūlamī al-Kārimī)是最著名的一个,他从阿勒颇移居巴格达后,先后五次到过中国,因贩运丝、瓷而成巨富,泉州是他熟悉的港口。

泉州出土的伊斯兰教徒墓碑共有56块,其中多数属于元代^②。

① 《清源金氏族谱·丽史》,何乔远《闽书》卷一五二。桑原隲藏《蒲寿庚考》,陈裕普译,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②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元代泉州为世界著名海港,地位不亚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因此阿拉伯商人甚多,后裔散居福建晋江各地,陈埭丁氏尤为著称。

第三节 地理知识的交流

一、中国地志中的阿拉伯

在甘英抵达阿拉伯的于罗前后,中国人一直在探索前往阿拉伯和叙利亚的商路,有许多从新疆出发的队商到过那里,但没有留下像伊西陀那样的道程志和旅行者的名姓。

唐代确实到过阿拉伯又留下记录的是杜环^①。京兆人(西安)杜环在751年随高仙芝西征,参与中亚怛逻斯城战役,因唐军覆灭被俘。不久,阿拔斯朝崛起,中阿关系改善,于是像杜环这样出身名门、身为《通典》作者杜佑族子的人物也获得优待,得以起用,周历阿拉伯世界。在伊拉克库法城、叙利亚大马士革、埃及等地度过十个年华,最后在宝应元年(762年)自波斯湾搭上商船回国。他将所见所闻写成《经行记》,后经《通典·边防》卷一九三摘录一千五百多字,是现在仅

^① 唐初达奚弘通(或称达奚通)有《海南诸蕃行记》一卷,记述他在印度洋航行中的见闻。原书早已亡佚,《玉海》卷一六曾引《中兴书目》,知道他在上元中(674—675年)曾从赤土西航,经三十六国到达虔那。他启程的赤土在马来半岛的吉打附近,中间所经各国,都不知国名。虔那,苏继庠考作凯尼,定在阿拉伯南部的 Bandar Hisn Ghorah,以为即是三国时康泰《吴时外国传》中的加那调洲(《岛夷志略校释》,1981,叙论,6页)。但《吴时外国传》中的加那调,确在印度东海岸的古黄支国(康契普腊姆)。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页;《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2—83页。若虔那必须同时是孙吴时的加那调,则不能远至阿拉伯半岛。凯尼为埃里佐王国的海港,杰佛斯·马修考订今地在哈达拉毛哈季尔河口以西的皮尔·阿里村(Bir Ali)。

所能见的《经行记》文字。杜环的《经行记》留下了中国有关阿拉伯哈里发国家最早又最真实的见闻录。

《经行记》描述大食首都库法的繁华：“大食一名亚俱罗(Akula, 库法)。其大食王号暮门(Amir al-Mu'minin),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郭廓之内,里闾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卢舍,有似中国宝辇。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输石瓶钵,盖不可数算。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又介绍大食国势:“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

杜环《经行记》比最早东来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游记早了九十年。八世纪下半叶,中国对西亚的地理知识大有增进,与当时中阿两国人员交往难以分开,而杜环正是首开此举之人。

唐代遍及亚洲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促使域外地理学突飞猛进。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在贞元年间(785—804年)完成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对海陆交通都有记述,《新唐书·地理志》录有他记录的中国帆船的航行路线和运行区域,不妨称为贾耽航程。航程分前后两段,前段起自广州,经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而止于波斯湾头的巴士拉;后段起于坦桑尼亚北部的三兰,沿岸北上巴士拉,所经阿拉伯沿海的地名有设国(席赫尔)、萨伊瞿和竭国(卡勒哈特)、没巽国(苏哈尔)、拔离河磨难国(麦纳麦洲),最后至于乌刺(乌波拉)古港^①。该书还录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境内各封国的地里,也应是贾耽所录

^① 见藤田丰八,《宋代的层檀国》(《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1932,东京),家岛彦一在《东方学》(日文)第31辑(1965年)中的论文,以及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8—210页。

的西亚道程,其价值亦可与《伊西陀道程志》相比。

十二世纪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建立了直通航路,于是阿拉伯世界在中国学者所著海外地理著作中有了周详的记录。1174年后任桂林通判、熟知岭南和海外事务的周去非,1178年写成《岭外代答》,在卷三中介绍:“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列举的区域性大国有阿拉伯的麻离拔国、麻嘉国,伊拉克的白达国等六国。

麻离拔国,原名或是“阿拉伯的马赫拉”(Mahrah al-‘Arabi)^①。马赫拉海港有三,以香料贸易港佐法尔为最。麻离拔,又可写作麻罗拔、麻啰拔,应是佐法尔的别称,因此宋代不见有佐法尔一名。这里不仅是阿拉伯香岸的商业中心,也是阿拉伯各国的都会与贸易中心。产乳香、龙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没药、血竭、阿魏、苏合油、没石子、蔷薇水等货,“皆大食诸国至此博易”。

麻嘉国,今伊斯兰的圣地麦加(Makkah),又可写作摩迦,从麻离拔向西陆行八十余程可到,《岭外代答》特意指出,“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处”。

白达国,又作缚达、报达,今译巴格达(Baghdād)。《岭外代答》描述这里是阿拉伯各国最大的都会,“有白达国,系大食诸国之京师也。其国王,则佛麻霞勿之子孙也。大食诸国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国富盛。王出张皂盖,金柄,其顶有玉狮子,背负一大金月,耀人目如星,远可见也。城市衢陌,居民奢侈,多宝物珍段。皆食饼肉酥酪,少鱼菜米。产金、银、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诺布、苏合油。国人皆相尚以好雪布缠头。所谓软琉璃者,国所产也”。软琉璃应是仿制华瓷所成的料器,碾花透明玻璃器则是当地的名产。巴格达处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之间,为中世纪东方(马什里克)最大的都会。

① 沈福伟:《十二世纪的中国帆船和印度洋航路》,《历史学》1979年第2期。

比周去非稍后的赵汝适,为宋太宗八世孙,曾身任提举福建路市舶,主管泉州对外贸易,所著《诸蕃志》(1225年)为中世纪关于外国最详赡的地理志。它列举大食属国有24处,其中阿拉伯境内有7处:麻嘉(麦加)、奴发(Dhufar,佐法尔)、勿拔(Mirbat,米尔巴特)、施曷(al-Shih̄r,席赫尔)、罗施美(al-Himyarite,希米雅尔)、瓮篱[蛮]('Umān, Ṣuhār,阿曼)^①、白莲(al-Baḥrayn,巴林)。另有思莲(Syria),为叙利亚。《诸蕃志》所记阿拉伯各国,不但于南阿拉伯沿海各地特详,而且对非洲各穆斯林商业重镇记述尤其翔实,这些都反映了中阿海上交通的繁荣,因此地理知识大有进步。

元代出使巴格达等地的中国人将见闻留下记录的,有1259—1263年随常德出使的刘郁《西使记》,对哈里发失国、巴格达的繁华和麦加的天房国均有笔述。维吾尔人巴·苏玛在1278年从北京出发前往耶路撒冷,1287年被伊儿汗阿鲁浑派往拜占庭、罗马、巴黎,1294年1月10日在巴格达去世。他的事迹均随游记流传于世。

在元代周游印度洋的汪大渊,以一名国际贸易商的睿智,写下了他在1328—1332年、1334—1339年两次航海生涯中所历亚、非两大洲的见闻,在1349年附刻于《清源续志》(泉州出版)和1350年江西南昌单独刊印的《岛夷志略》中,记述了天堂(麦加):“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

明初跟随郑和宝船队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各有专书记述见闻,对阿拉伯留下十分周详的观察。他们都曾访问伊斯兰国家最重要的港口亚丁,甚至亲去麦加朝圣。四下西洋的会稽人马欢,充当通事,谙熟伊斯兰风俗礼仪,所作《瀛涯胜览》,是下西洋最宝贵的记录。记天方国圣堂尤其栩栩如生:

其堂番名恺阿白(Ka 'bah),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

^①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9页。

门,门之两傍,皆用白玉石为柱,其柱共有四百六十七个。前九十九个,后一百一个,左边一百三十二个,右边一百三十五个。其堂以五色石叠砌,四方平顶样。内用沉香大木五条为梁,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上用皂纛红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其门。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带回人,甚至一二年远路的,也到堂内礼拜,皆将所罩红丝割取一块为记验而去。剃割既尽,其王则又预织一罩,复罩于上,仍复年年不绝。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阿拉伯已不如中世纪那样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对象和穆斯林世界的商业中心,然在魏源五十卷本《海国图志》、徐继畲十卷本《瀛环志略》这些近代中国最早系统编写的国际知识手册中,亦曾留意介绍巴格达、大马士革等都会,后者更叙述阿拉伯地分六部,与李光廷《亚刺伯沿革考》^①相同。

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比前更加踊跃。云南经师马德新(1794—1874年)奔波七年,两次参与麦加朝觐,多次往返于麦加、开罗之间,并游历了上土耳其,用阿拉伯文写出了《朝觐途记》,后由他的弟子马安礼译成汉文,出版于1861年。这是一本继马欢的《瀛涯胜览》以后,内地穆斯林最早的朝觐见闻。这位太和(今大理)人为求伊斯兰学问,在1841年正当48岁时,自云南出发,取道景东、思茅,经缅甸仰光走海路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再历马尔代夫、索科特拉、亚丁,在1843年5月抵达吉达,前往麦加,11月参加朝觐。作者将麦加译作满克。1844年2月,马德新去麦地那进谒圣陵,再往麦加,由吉达渡海北上开罗、亚历山大里亚;1845年2月抵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归途又经开罗,参加1846年的朝觐,一直住到1847年5月;然后自吉达乘船东返,1848年9月抵达广州,翌

^①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续编》第10帙。

年4月到家。他以一个中国人,继唐代杜环之后,从海路遍历伊斯兰文化的精萃之地,亲历各地的风俗,谒见了穆斯林的王公、学者,寻访、研究并购置了许多典籍。

此后不久,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红海一道成为欧亚交通的畅途。不久扼红海南口的亚丁遭英国覬覦,沦为军事要塞。当学贯中西、亨名海外的文士王韬前往英伦时,在1867年途经亚丁,曾泊舟上岸,与西人宴于酒楼,座间有日尔曼乐工弹琴唱歌,王韬为之吟诵高青丘七律一首。他著《漫游随录》中有亚丁夜宴一篇,记述亚丁“本隶阿拉伯,后为英人所踞,驻兵泊舟,为欧洲西来之要道”。又说:“昔时英人东来之海道,皆绕好望角而至中华。自咸丰年间,始由亚丁直抵红海,陆行百七十里而至地中海,计程可近数万里,诚捷径也。于是好望角形势之雄,遂成虚设。逮至苏彝士运河一开,东西轮船均可直达,局面又一变矣。地势无常,可胜慨哉!”王韬已从亚丁地位的变迁,感悟到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将由海洋霸权国家主宰世界局势的前景。

二、阿拉伯地志中的中国

阿拉伯地志中出现中国,比中国记述阿拉伯要晚。阿拉伯旅行家首先在851年写成东方见闻的是商人苏莱曼(Sulayman al-Tajir),他的游记在916年由西拉夫移居巴士拉的波斯人阿布·宰德·哈桑编写《中国印度见闻录》时,被当作第一卷传抄于世。苏莱曼到过广府(广州),他的见闻大多是关于岭南和沿海地区的,譬如,他说:“中国人的粮食是大米,有时也把菜肴放进米饭再吃。”^①“中国很少有枣椰树,除了某些家庭偶尔种植一两棵,通常很少见到。他们喝的是自己

^① 引文据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用稻米发酵制成的饮料,因为中国没有葡萄酒,中国人既不知道这种酒,也不喝这种酒,所以也没有人把葡萄酒带到中国来。”^①其实,葡萄美酒在北方早已脍炙人口。

苏莱曼观察周到,记下了许多阿拉伯人闻所未闻的中国事物,其意义犹如《马可·波罗游记》对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苏莱曼既到过印度、中国,观感所及,常用中印对比的手法加以叙述:

印度的每个国王都有许多军队,但并不发军饷。……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对自己的军队另给犒赏,和阿拉伯人的军队一样(按:这是指中国实行的募兵制)。

中国更美丽,更令人神往。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城市,而在中国人那里则到处是城墙围绕的城市。

中国人比印度人更为健康。在中国,疾病较少,看上去中国人更健壮,很少见到盲人或独眼失明的人,也很少见到残疾人,而在印度,这一类人屡见不鲜。

中印两国的河流是很可观的:很多河流都比我们的大,两国的雨量都很充足。

在印度,很多地区荒无人烟,在中国,所有土地都已开垦,全国各地人口众多。

中国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在衣着和使用牲畜上更像阿拉伯人。中国人的礼服很像阿拉伯人的衣着,他们穿长袍(qaba),系腰带,而印度人不分男女,全都披两块布当衣服,另戴金手镯和首饰作装饰。

苏莱曼对九世纪的国际形势,有一种客观的分析,这表现在他根据印度人、中国人的看法而提出的四天子说:

印度人、中国人都一致认为,世界上有四个国王。四个之中,

^① 引文据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一个是阿拉伯国王,他们异口同声认为阿拉伯国王是最伟大的国王,最富有的国王,最豪华的国王,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宗教的主。中国国王仅次于阿拉伯人的主,位居第二。再次是罗马国王。最后是穿耳孔民族的国王巴拉哈国王。

在苏莱曼前后到过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有八世纪的塔明·伊本·巴希尔·摩塔维克,在公元800年以前曾去过回鹘(Toghuzghuz)的首都。他的行纪被九世纪的伊本·郭大贝、十世纪的艾尔·法基、十三世纪的雅库特所摘引。还有一个译人萨列姆(Sallam at-Tarjuman),被哈里发瓦西克(842—847年)从巴格达派往中国。他经过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可萨到了峨格人(Gog)和马峨格人(Magog)边境的城墙,因为萨列姆能操三十种语言,他所见到的边城,应该是中国的长城。峨格是回鹘人,马峨格可能就是沙州的汉人。

979年去世的阿布·宰德·哈桑,在《中国印度见闻录》第二卷中,编写了黄巢起义前后阿拉伯人的中国见闻。最引人注意的是巴士拉的古莱希族人伊本·瓦哈卜(Ibn Wahab),他在回历257年(870—871年)巴士拉动乱的年代来到西拉夫,搭上了去广州的船,并且北上到了长安(胡姆丹),受到僖宗的接见。僖宗赐给他许多财物,他荣幸地回到了伊拉克。在回历303年(915年7月17日至916年7月4日),曼苏地还从当时居住在巴士拉的伊本·瓦哈卜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东方和海外世界的报道。^①

阿布·宰德·哈桑称赞中国人奉公守法,因此往昔行政上成效卓著,令人感佩。他列举一个呼罗珊商人从伊拉克贩货到广州出售,受到市舶司宦官的勒索,商人到长安向皇帝告状,受到公正体面的处理。那个宦官被贬职充当皇陵的看守。阿布·宰德列举当时世界上

^① 曼苏地:《黄金草原》,梅纳、科蒂埃法译本,第1卷,第321页。

的大国有五：哈里发、中国、突厥、印度、拜占庭。据说，这是瓦哈卜从中国皇帝那里听到的。这比苏莱曼的说法又多一个突厥，证实了苏莱曼只知道在印度洋和地中海世界存在四个大国，对亚洲北方的突厥一无所知。

阿拉伯最伟大的地理与历史学家曼苏地(al-Mas‘ūdi, ? — 956年)，出生巴格达，912年后游历信德、东非、印度、斯里兰卡、占城，并到过中国沿海。他的巨著《黄金草原和宝石矿》也和苏莱曼一样，记述中国帆船和阿曼、波斯湾各港通航的情况。他特别提到黄巢起义后中阿航业萎缩。据曼苏地说，在黄巢占领广州时，广州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纷纷出走致死，数达二十万人之多。这一数字比阿布·辛德·哈桑的记录又高出许多。这些外来宗教的信徒一定不完全是移居的外侨，而有中国人在内。

亲历中国的阿拉伯人的见闻，大多出现在唐代。唐代以后，虽然来华的阿拉伯客商有增无已，但留下的记载大多仰赖地志才流传于世。八至十三世纪的阿拉伯地志中，有许多中国的事情。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对阿拉伯民族来说，是东方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是智慧与财富的表征。

约在675年去世的阿卜杜勒(ʿAbdallāh ibn Amir ibn al-ʿAs)，可能是哈里发初期统帅奥玛尔的儿子。伊本·艾尔·法基《列国志》曾引述阿卜杜勒的话：

阿卜杜勒说：世界像鸟一样，可以分成鸟头、两翼、胸部和尾部五个部分。世界之首是中国(Ṣīn)，背后是韦韦(Waq Waq)，韦韦之后的民族，便只有真主知道了。右翼是印度，印度背靠大海，大海中并无生物。左翼是可萨，可萨后面有两民族，其中之一是孟沙和玛沙，在他们之后是雅朱(Yajuj)和马朱(Majuj)。胸部是麦加、希贾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尾部从扎特——胡玛姆

(尼罗河三角洲)到马格里布(北非)。^①

伊本·艾尔·法基(Ibn al-Faqih)的《列国志》写成于903年,书中转述了查希兹(779-869年)的著作,同时也摘引了阿布·宰德书中所不见的苏莱曼游记。

伊本·郭大贝(Ibn Khurdādhbih 820-912年)出身伊朗望族,在巴格达学习,任贾贝勒省邮务长官。约848年写成《省道志》,记述巴士拉到中国沿海的航路,称自南而北的中国港口有龙编(越南北部 al-wakin,一说北景)、广府(广州)、越府(明州)、江都(扬州)。并称中国有三百座人口稠密的城市,较著名的也有九十座。^②

阿布尔·法拉吉·伊本·阿布·雅卡布·纳迪姆(Abul-Faradj, Ibn al-Nadīm)生于巴格达,是个藏书家与书商,988年编成《百科书录》(Kitāb al-Fihrist al-'ulūm)。全书十章,第九章论摩尼教和中国,其中说,撒马尔罕的五百名摩尼教徒,因教义被暴露,呼罗珊总督将按例加以处斩。中国国王(回鹘汗)派人去呼罗珊,宣称境内的穆斯林比你那里的摩尼教徒多一倍以上,如对方杀死一个摩尼教徒,国王便将以杀尽穆斯林并毁灭清真寺作为报复,并将搜索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加以处决。于是呼罗珊总督便改变了旨意,只向摩尼教徒征收人丁税,听凭他们活动^③。这段记载比哈拉汗朝布格拉汗(卒于998年)开始皈依伊斯兰教要早几十年,至少在十世纪初哈桑·纳赛

① 伊本·艾尔·法基:《列国志》,莱顿版《阿拉伯地学丛书》(Ibn al-Faqih, mukhtaṣ ar Kitāb al-Buldan), M. J. de Goeje ed. *Bibliotheca Geographica Arabica*, V, Leiden), 1886。

② 伊本·郭大贝:《省道志》(Ibn Khurdādhbih, al-Masālik wa'l-mamālik), BGA, VI, 1889。参见宋岷译:《唐代大食国通中国之海道》、《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宋岷将中国第三港口译作“汉久”,释作杭州,又说,“行程从广府到汉久八日有误”。

③ 见布朗:《波斯文学史》第1卷(Brown: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 1), 第164页。

尔任呼罗珊总督时便已如此。这些穆斯林也可能是唐代就已来华定居的阿拉伯人。

纳迪姆以后,1050年写作《珍异记》的格尔德齐(Gardezi),1154年完成《旅游证闻》的科尔多瓦人伊德里西(Edrisi, 1100—1165年),1321年著有《统一的国家》的大马士革百科全书学者阿布·菲达(1273—1331年),他们的地理著作,都录有关于中国的各项知识,但大多搜集前人著作,再加上较新的传闻,写入书中。这一段时间,由于阿拉伯学者较少接触游历中国的阿拉伯人上,同时更因阿拉伯商业衰退,直接经营中阿贸易的大多是中国人、波斯人或其他中间商人,因此地理著作中反映的中国知识反而缺少现实意义。阿布·菲达的著作,习称《阿布·菲达地理书》,法国莱诺(N. Reinaud)和古耶(S. Guyard)分别于1848年和1883年完成该书第一、第二卷的法译本。他列举中国的大城有广州、泉州、杭州、扬州,但材料大都采用阿尔·比鲁尼(973—1048年)的著作。

十三和十四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Yāqūt, 1179—1229年)的《地理辞典》(1224年)^①,大马士革人乌玛里的《眼历诸国记》^②,都有许多涉及中国的地方。乌玛里(al-‘Umarā, 1301—1349年)出生大马士革,但长期居住埃及,是埃及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所著《眼历诸国记》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交通和地理;第二部分,自东而西,从印度、信德、成吉思汗国家,经西亚、地中海至西班牙,分述各国历史、地理、宗教。书中还运用了档册和当代的见闻。对中国北方

① 雅库特:《地理辞典》,胡斯登菲尔特编,莱比锡版(Yāqūt, Mu‘djam al-Buldan, F. Wüstenfeld, ed. Leipzig),1866—1873,1924年再版;又,贝鲁特刊印5卷本,1955—1957。

② 乌玛里:《眼历诸国记》(al-‘Umarā, masalik al-abṣār fi mamālik al-amṣār),德译本,莱希:《蒙古帝国》,威斯巴登。(Klaus Lech, *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 Al-‘Umarī’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Wiesbaden),1968。

的论述,多采用了访问过中国的伊拉克、波斯和中亚人士的报道,有商人,也有学者。这些报道一致认为,蒙古大汗欢迎各国人士来华。阿拉伯商人贩往中国的货物有马匹、猎鹰、宝石和珉琅盘等器皿。充分反映了直到元代为止,中国和阿拉伯、叙利亚等地繁忙的商业往来。

第四节 阿拉伯马的引进

阿拉伯纯种马是世界上久享盛誉的良马,中国在前汉自中亚引进乌孙马、大宛马以后,曾从月氏统治下的中亚、阿富汗等地不断输入马匹,到唐代更引进了阿拉伯马。

在到达长安的阿拉伯使者所进献的方物中,据档册记载,明确提到献马的有七次:

永隆二年(681年)五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各遣使献马及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长安三年(703年)三月,大食国遣使献良马(《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开元初(713年),大食遣使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旧唐书·大食传》卷一九八)。

开元十二年(724年)三月,大食遣使献马及龙脑香(《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大食遣使苏黎满等十三人献马及毛锦(《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三载(744年)七月,大食国遣使献马及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天宝十二载(753年)十二月,黑衣遣使献马三十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安史之乱爆发后,应唐朝之请,大食派骑兵与拔汗那等国军队自中亚开赴陇右,参与收复长安、洛阳之举,此后档册中虽不见有大食献马之事,但阿拉伯马匹一定有更多的输入,因此名声渐大。751—762年周游阿拉伯世界的杜环,有专记大食马的文字:“其马,俗云西海滨龙与马交所产也。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大食“有千里马,传为龙种”(《新唐书·大食国传》),从此名闻中华。

阿拉伯良种马在元代被目为天马、龙种马,优加输入。到过巴格达等地的《西使记》作者常德,以龙种马称呼阿拉伯马,记述此种纯种马颇有神秘色彩,“龙种马出西海中,有鳞角,牝马有驹不敢同牧,被引入海,不复出”。所谓鳞角,是传说“余吾天马生水中,毛如泼墨耳插筒”^①。双耳挺拔的天马,因产在西海,一如汉代有水羊之说,产生了生水中的传喻,于是在文人笔下出现了“鳞角”。天马,亦即西马。1327年察合台朮思班、伊儿汗不赛因派出的使团,向北京大汗赠送的礼物中有文豹、西马等物。1358年金帐汗扎尼别的使者,也有青、白西马各二匹进献北京。

西马为希贾兹名马。元代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到过麦加的汪大渊,在《岛夷志略·天堂》中说:“地产西马,高八尺许。”阿拉伯半岛在元代被目为西极,产于西极的阿拉伯马自十二世纪以来成批输往印度马拉巴海岸,《岛夷志略》记马拉巴的古里佛:“蓄好马,自西极来,故以舶载至此国。每匹互易,动金钱千百,或至四十千为率。”马拉巴每年从阿拉伯进口大批马匹,亚丁有著名的马船贸易,以乳香和小种马输往小唎喃(南印度马拉巴的奎隆)。《岛夷志略·甘埋里》说:

其国迤西南冯(西南海——阿拉伯海)之地^②,与佛朗(利凡特、地中海)相近。乘风张帆二月可至小唎喃(奎隆)。其地船名

① 马臻《霞外集》有《题画海南入贡天马图》,见《元诗选》。

② “西南冯”中的“冯”,是阿拉伯语 Bahr(海)的音译。

为马船,大于商船,不使钉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层,用板横栈,渗漏不脏,梢人日夜轮戽水不使竭。下以乳香压重,上载马数百匹,头小尾轻,鹿身吊肚,四蹄削铁,高七尺许,日夜可行千里。

甘埋里是阿拉伯地理书中的巴巴拉湾(al-Khalīdj al-Berberī),亦即亚丁湾,阿拉伯地理学家,包括雅库特的《地理辞典》,都这样称呼^①。亚丁湾的重要港口是亚丁,汪大渊因此以甘埋里相称。“甘”译出了Khalīdj(湾)，“埋里”则对译Berberī。在十二世纪十字军东侵,利凡特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路阻滞,苏哈尔因此衰落之后,远航信德、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船也都改从亚丁启碇^②。亚丁马船到南印度接运中国、印度货物,返程以输送胡椒为主,十四世纪尤以埃及卡里米商人最为活跃,红海一道因此重又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亚丁马船向印度运送的阿拉伯马中,也有索马里北部巴巴拉海岸出产的小种马在内。这些马匹最远经海路运到了中国,成为那时一项颇具特色的交易。

十五世纪初,郑和率领大鲸宝船下西洋,阿拉伯半岛的香料港佐法尔和马船贸易中心亚丁、伊萨角是多次访问的海港城市,阿拉伯马一定也有输入。麦加的使者在永乐、宣德年间也多次来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天方国》卷十一特意指出,当地产物中“马有八尺高者,名为天马”。阿拉伯马也通过孟加拉、基尔瓦等使者,献给永乐皇帝,如1414年榜葛刺(孟加拉)国王赛弗丁贡麒麟、名马,名马即是阿拉伯马;1415年11月,麻林(基尔瓦)和其他国家向中国进献麒麟、天马,

① 《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1960年版,伦敦,第1卷931页。藤田丰八曾将甘埋里考作克尔曼,以甘埋里马船为霍尔木兹马船(《岛夷志略校注》,1914)。苏继顺则以为是“甘里埋”的倒置,以对霍尔木兹(《校释》,366页)。对音与货流、地理都有不合。

② 《伊德里西地理志》,若贝尔法译本,1836—1840年,巴黎,第1卷,第51页。

天马就是阿拉伯马。1419年9月,霍尔木兹使团送来西马,也是阿拉伯马。十五世纪末,麦加和中国开展队商贸易,弘治三年(1490年),麦加王速檀阿黑麻(艾哈曼德苏丹)派使者随同撒马尔罕、土鲁番使团到北京进贡马、驼、玉石。因麦加出善马,正德初年急需输入骡马、骗马的明政府采用兵部尚书刘宇希的建议,派人到中亚、西亚接洽玉石、马匹贸易。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月,麦加贡使正式抵京。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麦加王写亦把刺克(Sherif Barakut 1497—1524年)派使者来华,献物有马、驼、梭幅(羽绒)等。嘉靖四年(1525年)麦加王亦麻都儿又派使团贡马、驼等方物。1543年,麦加又同撒马尔罕、鲁迷等国派使者到中国贡马匹、玉石,此后每五、六年一次,直至万历年间。从麦加经撒马尔罕到陕西的队商贸易,构成了当时世界上路程最长的骆驼队商路线中的一条。

第五节 中阿陶瓷贸易

中国最早一批名贵瓷器,在八世纪末由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送往巴格达,献给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806年)。据说其中有“二十件中国皇室瓷器,为过去哈里发宫廷所未见过”。所制器皿为日用的碗、杯、盏。伊萨的礼品,还有二千件各色瓷器的碗、杯,这件事,是一位名叫阿布·法德尔·贝哈杰(Abu'l-Fadl Bayhaqi 995—1077年)的学者在1059年他的著作中披露的。

在九世纪中叶兴起的中国外销瓷的热浪连绵不断,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主要销售的地区便是阿拉伯世界。伊本·郭大贝在《郡国道程志》(846年)中,列举中国输出物中有陶瓷。当时中国最南的港口龙编(越南北部红河口),也以出口优质陶瓷著称于世,声誉远播阿拉伯半岛。博学的查希兹(al-Jahiz 约779—869年),在《生财之道》(Kit

ab al-Tabaṣṣur bil-tijara)中,开列巴格达市场上的外国货,其中有从中国运去的丝绸、瓷器、纸、墨、马鞍、宝剑、香料、麝香、肉桂、孔雀等许多富有特色的产品^①。中阿贸易换货协议中,已将瓷器列入专项,从此瓷器便在印度洋、阿拉伯世界走红了。瓷器在查希兹的书中,也是一种案桌上的陈设。尤因当时瓷器价格昂贵,因此运到阿拉伯的华瓷都被当作珍品收藏。九世纪时坦纳基非常赞赏三十多件中国瓷罐,用来储存香料,可以使香气经久不衰。最佳的一件是哈里发瓦蒂克(842—847年)时代的遗物,而最大的一件竟要好几个人才能移动。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年)时代,华瓷仍是十分稀见的珍物,阿拉伯文学大师阿布尔·法拉吉·伊斯法哈尼(Abū'l Faraj al-Isfahāni,约897—967年)在《乐府诗集》中追述穆台瓦基勒时一位诗人收藏的多件瓷器,竟被他为了欢度宰牲节(古尔邦节)而喂养的公羊撞坏,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其中的一件灯盏(Sirāj),上面画有凝结着非凡才智的纹饰,被作者称为“中国瓷盏”(Ṣiniyat al-Ṣin),尤为诗人所钟爱^②。这种瓷盏应属长沙窑仿阿拉伯式的彩釉瓷灯。在伊本·法基的《地理志》(903年)中,中国瓷器、中国灯和中国丝绸,被列为三大名产,中国灯不但有铜制的,而且也有最新出品的仿照西亚式样的瓷灯。它的出现,使中国使用的油灯走向了一次革新。

851年前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游记的三十四节中提到中国陶瓷特别精美,“瓷盅(qadah)晶莹透明如同玻璃,在外面隔着器壁竟能看清里面存放的水”^③。伯希和称赞这一段话是“西方关于

① 查理·佩拉:《查希兹的〈生财之道〉》,《阿拉伯》1954年第2期。

② 雷恩和赛尔金特:《亚丁沿海的陶瓷和玻璃残件》(Arthur Lane, R. B. Serjeant: Pottery and Glass Fragment from the Aden Littoral, with Historical Notes), JRAS, 1948, 3—4期合刊,第111页。

③ 据佩拉的译本。雷纳都译本称:“中国有一种优质土壤,用来制作杯、碗,透明晶莹可比玻璃。”雷纳都译《九世纪两名回教旅行家印度、中国见闻录》(E. Renaudot, 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vellers, Who Went to the Parts in the 9th Century, 1733, 21)。

瓷器的第一次描述”^①。伊斯兰作家塔利比(961—1038年)在他的《逸闻录》(Latāif al-Ma‘arif)中,对中国瓷器的评述,在伊斯兰世界中颇具代表性,他说:“有名的中国瓷器是些透明的器皿,能制煮食物的罐、煎食物的锅,也能做盛食物的碗。以杏黄色的为上品,胎薄、色净、音脆;奶白色的次之。”^②杏黄色瓷器(al-mushmushiya),即是唐至五代(九至十世纪)风行海外穆斯林世界的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瓷,这种瓷器色泽洁净、鲜艳,为阿拉伯民族所喜爱。奶白色瓷器(al-Zabadiya),指中国的白瓷。阿拉伯人认为,中国北方的白瓷、南方的青瓷尚在其次。宋代白瓷采用阿拉伯人喜爱的旋波式菊纹,也是为适应外销的需要。直到十三世纪,元代大量烧造青花瓷、青白瓷,产品纹饰与色泽兼采西亚风格,于是青花瓷、青白瓷在运销阿拉伯世界的瓷业中才独占鳌头。此风直至十六世纪上半叶正德年间持续不衰。宣德(1426—1435年)年间以缠枝菊花为辅纹的三彩人物盘,内圈仍然使用阿拉伯风格的小点联珠纹^③。中东式样的青花执壶更是外销瓷中十分走红的产品。

阿拉伯商人因贩运瓷器、丝绸和麝香等中国产品致富的不乏其人。布索格·本·沙赫里耶的《印度珍异记》中,记述一个犹太商人,只带着很少的资金到远东经商,当他在913年回到阿曼苏哈尔时,已是一位拥有一百万迪纳尔和无数丝绸、瓷器的巨富。他献给阿曼统治者一件顶端镶金的深色瓷壶,可能属于五代越窑所造名贵的“金钁瓷器”,专为帝王享用。统治了亚丁、席赫尔、阿伯阳、米尔巴特、红海哈

① 《通报》(T'oung Pao)第25期,1927—1928年,第106页。

② 德·荣格(P. de Jong)刊本,莱顿与哥达,1867,125页,鲍斯华兹英译本(C. E. Bosworth, *The Book of Curious and Entertaining Information*), 1968年,第141页。

③ 久志卓真:《支那明初陶瓷图鉴》,日东宝云舍株式会社,1943年,114、116页。原书以二件瓷器底款“大明年造”为正德年造,而以115页的三彩人物盘底款“宣德年造”为后人伪造,未妥。

利的伊本·齐亚德,有一本 976—977 年的财政报告,记有上百万迪纳尔的钱币和大量的中国瓷器、麝香及龙涎香。中国瓷器代表着中国,像丝织品在古代曾是中国的象征一样,阿拉伯文就以 *Ṣīnī* 一词来称呼瓷器,意思是“中国货”。

宋、元、明三代,中国瓷器销往阿拉伯地区的数量十分可观。1001 年哈里发卡迪尔(991—1031 年)一次将 300 件中国瓷器赐给了巴格达的一个大臣。那时瓷器从海上运到伊位克的,已越来越多了。亚丁是华瓷外销阿拉伯的一个重要港口。亚丁统治者酷好华瓷,在一份 1151 至 1153 年的统治者财产清单中,有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也门作家阿布·马克拉玛记述一个在阿勒颇和巴格达经营棉布的商人,后来到印度、中国经商,成为富豪。他从印度归国后,定居亚丁,在他的财宝中,最受人称羨的便是中国瓷器。明初,南京和麦加贸易,白花青瓷器是重要出口货(《星槎胜览》卷四)。颈部书有阿拉美文字的青花玉壶春瓶,有六件被收藏在国外,腹部多作莲池水禽或人物图案,瓶上字母有被解释作正反罗马字的^①,当是元末明初的外销瓷。1511 年从里斯本前往印度、中国的葡萄牙使节汤姆·皮莱士,在亚丁时见到有从泰国首府大城转运的中国货;在印度康拜,又见到亚丁商人从马六甲运去丝绸、瓷器、麝香、珍珠等中国货物。

考古发现的华瓷,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伊拉克各地都有出土。

亚丁附近出土的瓷器十分丰富。亚丁和它附近的考德·安·赛拉(Kawd am-Saila,意为“洪水冲成的沙碛”),位于亚丁—萨那公路旁的大沙丘,有许多东方陶瓷,其中华瓷有九世纪的白瓷,十二至十三世纪的龙泉瓷和定窑瓷,十四世纪的青花瓷。哈比尔(al-Habil),位于拉赫季东北,有九世纪的白瓷和十二至十三世纪的龙泉瓷,有大

^① 哈里·加纳:《东方的青花瓷》,图 56,将一件 1552 年收藏的玉壶春瓶(瓶口残损,另镶银口)当作嘉靖年造,在时间上推得过晚。

碟和深腹碗残片；还有耀瓷碗和瓷坛，以及十四世纪的青花瓷残片，绘有池藻游鸭。在十二至十五世纪曾是海港和行政中心的阿比延(Abyan)，位于亚丁东北56公里处，遗存的华瓷散布在广达几公里的地面上，有九世纪以后的越窑，还有龙泉窑。在北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交界处的扎哈兰(Zahlan)，发现了龙泉窑青瓷和元青花瓷残片。席赫尔镇的炮垒废墟中，也出土了中世纪末与远东陶片混在一起的青花瓷片。席赫尔以东的哈米(al-Hami)老镇地表上，也见到了和阿拉伯玻璃混在一起的中国青花瓷。南阿拉伯出土的华瓷，除阿比延以外，最多的是十三至十五世纪的青瓷和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青花瓷。

阿曼的苏哈尔，在旧市街的地下发现了青瓷和明代青花瓷^①。1980—1982年，驻巴林和阿曼的法国考古队对建于十三世纪的苏哈尔城堡进行发掘，获得中国瓷片八百件，其中属于九至十二世纪的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最早的华瓷属于十世纪初的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带足盘、碗，饰有褐色和黄绿色斑点纹，并有一件十一至十二世纪初广州西村窑的瓷碟残片^②。巴林的卡拉托巴林以南400米处的清真寺遗址和海滨，一共收集到28块青瓷片和58块青花瓷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藏品中也有巴林出土的华瓷。这里出土的青瓷多半是明初的龙泉窑青瓷。青花瓷则多以蔓草花纹和莲花纹为主。巴林对岸沙特阿拉伯的达兰附近的卡提夫也是个通商口岸，曾出土了宋代咸平通宝(998—1003年)、绍圣元宝(1094—1097年)和绍定元宝(1228—1233年)^③，为宋钱通行阿拉伯半岛作出了见证。

① 菲立普斯：《阿曼之谜》(Wendall Phillips: *Unknown Oman*, N. Y.) 1966, 161.

② (法)米歇尔·皮拉左里：《阿曼苏丹国苏哈尔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译文载《海交史研究》1992年2期；同一作者，《巴林与阿曼出土的中华陶瓷》(Chinese Ceramics Excavated in Bahrain and Oman),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 Dr. Tsugio Mikami on his 77th Birthday》Kokogaku hen, 315-335, Tokyo, 1985.

③ 三上次男：《陶瓷之道》，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版，第77—78页。

伊拉克境内的古都萨马拉(Samarra),位于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在838—883年曾作为哈里发帝国的首都而繁荣喧哗于世。1911—1913年萨莱和赫兹福尔在这里作了首次发掘,开启了大规模发掘华瓷的先例^①。1936—1939年,伊拉克古物部作了第二次发掘^②。1963—1964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在第一次发掘的扎乌萨克宫(Djausaq)仓库中,发现了唐三彩碗、盘,绿釉和黄釉瓷壶碎片,白瓷和青瓷残片。在穆泰瓦基勒大清真寺的水井旁出土了青瓷片。在阿息克宫地下室找到了白瓷片。1936—1939年出土的陶瓷大多收藏在巴格达的阿拔斯宫博物馆中,有唐三彩和辽三彩的陶器,还有仿唐三彩的伊斯兰多彩陶器的绿釉系、三彩系、黄褐釉系软陶。从萨马拉遗址出土物可知,唐三彩输出实际不在少数。该地出土九至十世纪越窑瓷曾被巴格达的阿拉伯博物馆(The Arab museum at Khan Marjan)和巴黎达朗博物馆收藏。达朗博物馆并收藏了九至十世纪的白瓷碗残片和十二至十三世纪萨马拉出土的龙泉瓷片。萨马拉出土物的下限为十三世纪的龙泉青瓷、青白瓷,以及白瓷,为仅次于福斯塔特与纳沙布尔出土华瓷的一大中心。

邻近巴格达的泰西封,在田地里散见的伊斯兰陶瓷碎片中发现了十二至十三世纪龙泉青瓷片,被不列颠博物馆收藏。1964年又出土青瓷片一件。

位于库特东南70公里的瓦西特(Wasit),有伊斯兰时代的都市遗址。出土华瓷有基本完整、外侧有棱纹装饰的龙泉窑青瓷钵,属于十二、十三世纪;并有内侧中间附贴菊花的元代龙泉青瓷钵残片。出

① 萨雷、汉尔兹菲尔特,《萨马拉考古》(F. Sarre, E. Herzfelt, *Die Ausgrabungen von Samarra*), 5 vols. 萨雷,《萨马拉出土陶瓷》(F. Sarre,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Berlin), 1925.

② 伊拉克考古部,《萨马拉发掘报告》1936—1939, (Iraq Government, Dept. of Antiquities, *Excavation at Samarra 1936—1939*, Baghdad), 1940.

土物存放在巴格达的阿拔斯宫博物馆或阿拉伯博物馆。

巴格达东南约 60 公里的阿比达(Abirta),初建于乌玛叶朝希沙木(724—743 年)时代,到阿拔斯朝阿尔·拉迪(934—940 年)废弃。1957—1958 年芝加哥大学调查了周围 600 平方米的土城^①,其中有九至十世纪越窑褐色瓷片和华南白瓷残片,陈列在东京出光美术馆的陶片室。

伊本·法基在 902 年曾说过,在伊拉克,“来自中国的货物中,最受欢迎的是精巧的青瓷和白瓷”。伊拉克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点。

黎巴嫩的巴勒贝克有罗马时代的遗址,发现了两片华瓷,一片是宋代龙泉窑莲花瓣青瓷碗,一片是元代花草纹饰的青花瓷碗,现保存在柏林贝尔雅门博物馆东方部。

叙利亚的古城哈马,1931 年至 1938 年经丹麦国家博物馆调查发掘,在 950—1400 年的地层中找到了青瓷、白瓷和青花瓷片^②。其中有些被认为是宋代德化窑白瓷片,有南宋官窑浮牡丹纹青瓷钵残片,内侧贴花的元代青瓷钵碎片,并有元代青花瓷片。在大马士革博物馆的藏品中,可以见到十五世纪仿制青花的白地蓝釉彩画陶器。

① 雅可布逊:《迪耶拉平原考古发掘简报》(Thorkild Jacobsen: Summary of Report by the Diyala Basin Archaeological Project), Sumer: Vol. XIV, nos. 1, 2, Baghdad, 1958.

② 里西、普尔逊:《中世纪哈马的玻璃制造业和陶业调查研究》(P. J. Riis et Vagn Poulsen: Les Verreries et Poteries médiévales, HAMA Fouilles et Recherches 1931—1938, IV, 2), Copenhagen, 1957.

第六节 工艺与科学的交流

一、纺织

公元一、二世纪,中国缣帛从幼发拉底河渡口或红海涌向利凡特与亚历山大里亚。利凡特的罗马城市贝鲁特、西顿、提尔将中国缣素重新拆解,按罗马式样织成“胡绌”。同时,中国丝织品也以适应西亚式样的纹饰制作美观大方的面料,运销阿拉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叙利亚作为罗马帝国的安提阿克省,富庶繁荣不下于埃及的亚历山大省和小亚细亚的埃弗苏斯^①。巴尔米拉是中国丝货运销地中海的必经之地,这个位于叙利亚东部沙漠中的绿洲国家,便因中国丝绸而闻名于世。1933年和1937年在当地出土的织有汉字的绫锦与缙练,是公元一二世纪的遗物,图样与二十世纪初楼兰的出土丝绸相仿^②。这些出土的丝绸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先进的纺织技艺由法国的普菲斯特定名为“汉式组织”(armure Han),是一种平纹组织与斜纹组织的混合,或者说是在平纹组织上提起一部分经线使之成为花纹的织法。这种暗花绮汉代畅销叙利亚。中国和叙利亚由于这种丝绸贸易,获得了研究者赋予“丝路”的美名。^③

①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2nd ed, 1957,牛津,第1卷第67,139,263-273。

② 普菲斯特:《巴尔米拉织物》(R. Pfister, *Textiles de Palmyre*, Paris),1940,图版XV。普菲斯特《巴尔米拉的汉代丝织品》,《亚洲美术杂志》(*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 t. 13, 1939-42, 67-77。

③ 赫尔曼:《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丝路》(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ā and Syrien*, Leipzig), 1910。

唐代更有中国工匠侨居阿拉伯,就地传授技艺的。762年归国的杜环,曾旅居阿拉伯各地十多年,他在哈里发首都库法亲见当地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瓌、吕礼”(《通典》卷一九三引《经行记》)。从事美术工艺图样设计的樊淑、刘泚和纺织能手乐瓌、吕礼,是第一批称名伊拉克的中国能工巧匠。阿拉伯丝织、陶瓷、金银器和中国关系之深,于此可见。九世纪的博物学家查希兹在《生财之道》中列举巴格达市场上有许多中国货,丝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双方在丝织技艺上的交流,促使阿拉伯丝业有了新的进展。库法制造的金丝或半金丝头巾,直到二十世纪还是阿拉伯人喜爱的头巾,称作库菲叶(Kūfiyah)。缎子因产在大马士革,被名为“大马士革”缎(damask),用金线在这种缎子上刺绣美丽的图样,是库泽斯坦纺织工场的特产。

唐代高祖、太宗时,窰师纶奉派到成都督造瑞锦、宫绫,所创图案系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多用对称的鸟兽,师承波斯、阿拉伯风格,因他晚年被封为陵阳公,人称“陵阳公样”。金锦是盛唐以后流行的技法,为阿拉伯丝织工艺所效法。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湾沿岸的塔瓦吉、法萨等地都有专为制作王室和高级袍服的丝织工场,织造花团锦簇、色泽鲜艳的锦缎、挂毡、毛毯。设计的花纹与唐代图式相互交流,因此盛唐以后,小簇团花与散搭花大为流行;中晚唐时期,雄健豪迈的缠枝花、联珠团窠宝相花成为一时风气,小朵散搭花仍层出不穷。团花连环纹绮、回纹绮等图式,都具有伊朗、伊拉克风格,或至少蕴含着来自西亚的艺术联想。

伊拉克、叙利亚的丝织业曾从中国同行那里获得借鉴,但到878年黄巢起义军占领广州后,这种海上联系便因战事而陷于停顿,于是最好的中国丝绸便难以直接运到阿拉伯而价格更昂贵。阿布·宰德·哈桑在编纂《中国印度见闻录》时曾特意指出,中国的高官显爵身穿豪华的丝服,因为不准直接出口,所以阿拉伯各国很难得到,而

且价格昂贵,了无止境。他记述一位富商曾谈到在广州面见管理市舶务的宦官,当时他透过宦官的丝服居然看到胸口长的一颗黑痣,他推测至少穿着两件丝衣。宦官见情十分诧异,便问这位阿拉伯富商:“你好像老盯住我的胸口,为的是什么?”这位外商回答道:“透过这件衣服,看到了一颗黑痣,使我十分惊奇!”宦官听说后,不觉哈哈大笑,伸手撩起衣袖,说道:“请数一数,看我穿了几件衣服?”商人一数,才知他穿了五件丝衣,然而黑痣仍很清晰。阿布·宰德·哈桑评述这件事说:“这种最好的丝绸,是未经漂白的生丝。都督穿的丝绸,比这更加精美、更加出色。”^①

宋、元以来织金技术精益求精。金锦、毛缎都用金线加织,并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广泛交流加金技术。宋代织锦有直接采用西亚狮子图式的,在宋代每年按等级赏赐百官的袄子锦中,第四等狮子锦即有西亚余风。宋代丝绢也通过辽、金和海运流向西亚。十二世纪巴格达生产的条纹绢,因在该地阿塔卜区制造,被称作阿塔比(attābi),花色品种却借鉴中国。《诸蕃志》记述巴格达生产白越诺布(白绫)十分著名,很可能就是白色的阿塔比。同书又称大食生产织金软锦^②、异缎,都系伊朗和艾优卜朝统治下叙利亚与下埃及产品,异缎正是享名欧洲的“大马士革”缎。元代金襴输出西亚,巴格达等地至今尚有遗物可查,藏品中有元代织出阿拉伯文字的鸚鵡金襴。元政府在将作院下专设异样局总管府,下辖异样纹绣提举司、绫锦织染提举司、纱罗提举司,负责设计、采集各种外来图式,尤其是中亚、西亚风格的纺织纹饰。

据汪大渊《岛夷志略》,十四世纪上半叶从中国输往西亚的纺织

^①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译本,第101页。

^② 雍熙元年(984年)大食商人花茶向宋朝的献物中,首先是花锦、越诺,花锦即是织金软锦的一种。

品,在波斯湾头的波斯离(法尔斯沿海)有毡毯、五色缎;在甘埋里(亚丁)有青缎、苏杭色缎;在天堂(麦加)有五色缎。在明代,对阿拉伯的贸易中,缎匹、色绢仍是主要的货物,甚至是一种代表双方结成友善关系的法物(《星槎胜览》卷四、《殊域周咨录》卷一一)。正德年间,中国派使者到麦加通好,正德十三年,(1518年)麦加王写亦把刺克遣使贡马、驼,明政府大为满意,以蟒龙金织衣和麝香、金银器回赠。从此麦加和中国建立了一种以法衣为基础的友善关系。其他阿拉伯口岸,也都欢迎中国出产的色绢、缎匹、纁丝。亚丁甚至有专售丝帛的商店,经销各国丝织品,中国丝绢当然也有陈列。直到葡萄牙人东来,阿拉伯半岛仍是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

叙利亚、利凡特的毛织工艺十分精湛,罗马时代以“大秦氍毹”著称于东方。氍毹又作氍毹,译自阿拉伯语中的毛褥 *ghàshiyat*。“大秦氍毹”以色泽鲜艳、图案繁富胜于海东诸国,纺织技艺高于伊朗、月氏同类产物。著名的“和闐毯子”,已见于汉代尼雅遗址出土木简。这种名闻世界的栽绒毯,以起绒短、富于装饰风格而经久不衰,是不断吸收西亚毛织工艺成就之后加以改进的优良产品。叙利亚的亚麻或野茧丝与羊毛混纺的氍毹罽帐,在三世纪早已为中国所推崇。在唐代阿拉伯使者的礼物中,仍有这种传统的名牌货,开元十三年(725年)大食使者苏黎满献物中,就有与马并列的毛锦(《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毛锦之为阿拉伯特产,不难想见。宋代这种毛织物仍有高档货作为贡礼进入中国宫廷,熙宁三年(1070年)12月24日,大食国使献物中有锦罽(《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是色彩绚丽的毛毯。此外,《诸蕃志》列举的大食名产还有驼毛布,这种驼绒只产在阿拉伯,深受中国人喜爱,历数世纪不衰。

亚麻与棉布,是更为中国瞩目的阿拉伯产品。《魏略》列举三世纪畅销中国的叙利亚亚麻织物有三种:一种叫绯持布,是希腊、罗马时代亚麻业中心贝鲁特织造的麻布,“绯持”为“腓尼基”的音译;一种叫

度代布,因巴尔米拉的阿拉伯名称塔德莫尔(Tadmor)得名;一种叫阿罗得布,由安提阿克的奥朗特河命名,产在安提阿克。古希腊盛传印度、阿拉伯出产生在树上的羊毛,齐奥夫拉斯托士提到波斯湾的泰罗斯岛(Tylos)上有羊毛树,这种树在印度、阿拉伯各地都有。^①阿拉伯棉布大量运入中国是在宋元时代。宋代进口棉布,凡属东南亚所产,多称吉贝花布、吉贝纱、白叠布。印度棉布和阿拉伯棉布则统称蕃布,或细分为蕃头布、蕃显布、蕃青斑布、青花蕃布、青蕃棋盘小布。也有以花色命名的,如花蕊布、白叠布(牒布),或径称兜罗绵。蕃布大多从海上运入,花蕊布、白叠布多从西北陆上进口,于阗是花蕊布贸易的主要集散中心,许多阿拉伯花布便从于阗东运中国内地。1072年人食勿巡国(苏哈尔)使者辛毗陀罗的贡物中,属于纺织品的便有越诺布、花蕊布、兜罗绵毯、锦襖蕃花簪(《宋会要辑稿·蕃夷》七)。这种棉布交易,直到明代仍在进行。永乐年间到过亚丁的马欢,记述当地民间男子缠头,衣撒哈刺、锦绣、纁丝、细布等服。“市肆熟食及绮帛书籍,俱如中国”。在纺织文化上,中国和南阿拉伯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二、炼金术

炼金术在汉代已取得重大进展,公元二世纪魏伯阳掌握了汞齐炼金法,他在《周易·参同契》中用“黄牙”制服“河上姤女”,即通过硫磺克服水银的挥发性,得到人造的丹砂(HgS)还丹。同时道家在金液中引入硝石,溶解杂质中的铜,用来制海绵状的伪金。葛洪在《抱朴子·黄白》篇中记录了他在丹砂水中加入硝石,取得纯净的丹砂,并提高了醋酸对许多金属单质和化合物的溶解力。这些中国炼金术取得的成就,到了八世纪,成了阿拉伯炼金术的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中

^① 《植物考》(*Enquiry into Plants*), IV, 7, 7, 8.

不可分离的重要因素。

被尊为阿拉伯炼金术祖师的查比尔(Abu ‘Abdallāh Jābir bin Ḥayyan bin ‘Abdullah al-Kufi),曾是太子哈立德的老师,生活在八、九世纪之际。987年巴格达书商纳迪姆在《百科全书》中已感到炼金术著作浩繁,无法一一登录,尤以埃及学者所作的最多,但大多是重复前辈之言。同时纳迪姆又说,除了埃及以外,当时颇有人以为炼金术出于波斯,或传自希腊,也有说来自印度和中国的^①。纳迪姆所能确定的查比尔著作只有一种,而托称查比尔所作的著作在当时已多达五百种,后世所增,更若悬河。从查比尔开始,葛洪的神丹(al-iksīr)便成为阿拉伯炼金术上终生追求的目标,“以丹作金”的思想指导着长期居住库法的查比尔及其后继者为开创近代化学而不倦地进行实验。他所制作的“哲人石”又称“点金石”(al-Kibrīt al-aḥmar),是一种具有点铁成金的神效的介质,转述了中国炼丹家制作还丹的方法和理论,成为他所炼取赤硫磺的秘诀。他的硫磺——水银的炼丹法,正是魏伯阳黄牙——河上姹女法的翻版。

查比尔原来接受的炼金理论,是古希腊的元素说和罗马时代希腊名医盖伦的药效说,现在又从中国吸收了道家阴阳中和的理论,从而使阿拉伯炼金术在学理上有了新的突破。盖伦的药效理论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及其化合物,如金属、矿物、动物、植物都具有自然界存在的冷、热、干、湿四大属性,组合结构,比例合理,取得平衡,便可使物质保持永恒;药效的大小就在使物质或生命取得这种平衡,以纠正因不平衡而造成的衰败和病变。阿拉伯炼丹家从查比尔、拉齐以来就将中国道家学说引进伊拉克,他们制作哲人石,最终目的在于使黄金中的硫汞比量维持平衡,达到金、银、铜、铅、铁、锡六种金属中硫

^① 伊本·纳迪姆:《百科全书》(al-Nadīm, Kitāb al-Fihrist al-‘Ulūm, Eng. trs. by B. Dodge)达奇英译本,纽约1970年版,第2卷,868页。

汞比例配制的合理。这种理论和《淮南子·墜形训》所述中国炼丹术并无两样,来自中国,当无疑问^①。查比尔并从中国同行那里学会了制取硝酸,加上三分或四分盐酸,炼成可以溶金的“王水”。“王水”等于中国古籍的“金液”,后来成了阿拉伯文中炼金术(al-Kīmiyā')这门学问的专称。传入欧洲,引发了化学的起源。

炼丹家兼医生的拉齐(Rhazes, 865—925年)曾受学于巴格达译学馆,接触到中国炼丹理论。他在中国引进铊石和硃砂(氯化铵),制作药剂,在学术渊源上和查比尔一脉相承。十世纪初,他曾帮助中国学者,在三个月内将阿拉伯文译本的盖伦著作传授给一位出访伊拉克的中国同行,他的炼丹知识和这种国际交往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化 工

伊斯兰学者塔利比(961—1038年)曾像当年许多阿拉伯人一样,赞扬中国工匠卓绝的手艺,他在《逸闻录》中说:“阿拉伯人通常对精美的或制作巧妙的器皿,不管它真正出产在哪里,都以‘中国货’(siniya)相称。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盘碟,仍然以‘中国’这个词来称呼。在制作奇伎异物方面,今天和以往一样,中国仍以心灵手巧、技艺卓绝著称于世。”^②阿拉伯人曾努力吸取中国在化工方面的各项技艺,在蜡染、制革、造瓷、制墨、马具、矾绢、漆器、磨镜等许多举世瞩目的工艺领域中,都曾借鉴于中国同行;在造纸、制造火药等中国遥遥领先的项目上,紧步中国之后,急起直追。

十世纪中叶托名炼丹家查比尔的《物性汇览》(Kitāb al-Khawāṣṣ

①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5卷,第4分册,1980,剑桥大学,455—459页;黄子卿:《中国炼丹术的起源和发展》,清华大学生理研究所讲稿,1944年。

② 《逸闻录》英译本,第141页。

al-Kabir),有好几章涉及中国配制和加工的化学工艺,共有十项之多:

(1) 用于衣物、武器、防水、防污的涂蜡技术。唐代印染技术发达,蜡缬、夹缬、绞缬衣料十分流行。蜡缬,当时称藕缬,有单色染和复色染两种,复色染有四色、五色套色,办法是用蜡在布上绘画印染,然后去蜡,花纹一如绘画。脱蜡法在各种制器工艺上大量使用,也为阿拉伯世界所效法。

(2) 皮革所制马具、皮带、鞘、箠等表面所需防护性清漆或涂料。这些工艺都属武器、武装方面有关皮革制品的化学处理和漆加工技术。髹饰工艺,对于黑色和深色主要用漆,对于浅色、淡色、艳色必须用油。涂料,被称作 *duhn šini*,是中国所特有。唐代以前,已使用调色的油有大麻子油、荏子油、乌柏子油和密陀僧(一氧化铅)制作的密陀油,以及胡桃油,*duhn šini* 至少包括大麻子油、荏子油这两种油料。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曾说:“江东以荏子为油,北土以大麻为油。”油帛、和漆,尤以荏子为强^①。髹饰中的镶嵌、戗金、堆漆,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都是唐代流行的漆加工工艺。

(3) 烧制玻璃和瓷器的高纯度耐火土。有关瓷器的高岭土知识,大约在九世纪已进入西亚、埃及,瓷器被称作 *ghaḍar sinī*, *ghaḍār* 一词可能是造瓷原料“高岭”的音转。

(4) 中国式马鞍制造法。中国马具在东汉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代有很大发展;五世纪中叶,马具已东传日本列岛;六、七世纪以来,中唐国马具又因制作精良而为骑马民族发祥地的西亚各国所瞩目。代成套的马具(髻头、鞍具、镫、胸带和鞅带)曾向阿拉伯世界出口,制作技艺为对方所借鉴。马鞍的制作,包括鞍具(鞍座、鞣、障泥)及其相关的镫,以及将鞍具前后加以固定的胸带和鞅带^②,涉及制革、金工、

①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卷十二,中华书局排印本,第676页。

② 孙机:《唐代的马具和马饰》,《文物》1981年第10期。

木工、镶嵌等多种手艺,对军事、仪仗、运输、交通至关重大。

(5) 中国与印度的制墨配方。阿拉伯世界引进印度墨水和中国油墨的制造配方,油墨用于印刷。

(6) 浆洗丝帛的方法。

(7) 浆洗麻布的方法。

(8) 涂敷刀剑、木器等的金工、油漆技术。

(9) 仿制吐蕃木(怪柳或白杨)的技艺;制造马鞭的各种手艺。

(10) 打磨铜镜的中国涂料膏。古代使用铜镜需经常抛光,以保持镜面光亮。《淮南子》已有使用玄锡涂镜的文字。由于涂沫“黑漆古”这种优良的抗腐蚀剂,使出土铜镜久埋地下一二千年,表面漆黑发亮、光滑晶莹。古玩家对这种出上铜镜有“黑漆古”的俗称。黑漆古铜镜镜面在玻璃质表面膜下有明显磨痕,表面膜系抛磨以后形成。汉代玄锡,是种含铅的锡石^①,黑漆古在长江流域水分较多的“水坑”中出现,与气候、土壤有关,和北方的“干坑”不同,大致由锡的氧化物组成^②。唐代使用的磨镜药可能已有宋代以来明确提到的锡汞齐,为阿拉伯所借鉴。

造纸术从中国输入西亚,使植物纤维纸的引用自中国开始,向西走出了绕行全球的重要步伐。九世纪初,阿拉伯人塔明·本·巴赫的《回鹘行纪》中,引述阿拉伯作家艾卜·法德尔·瓦斯盖尔迪(Abul-Fadl al-Vāsīrdī)的话,提到穆斯林在战争中,曾让一些中国俘虏从事造纸,“现在在撒马尔罕制造上等纸张、各式武器和各种工具的人,正是这些俘虏的后裔”^③。博学的加兹尼学者比鲁尼(973—1050年)

① 梁上椿:《古代铸镜技术之研讨》,《大陆杂志》1951年第2卷,第11期。

② 盖登士:《古代青铜器上的绿锈》(R. J. Gettens, Tin-oxide patina of ancient high-tin bronze),刊《福格艺术馆通讯》(Bulletin of the Fogg Museum of Art), Vol. II, No. 1, 1949, 19—23。

③ 米诺尔斯基译:《塔明·本·巴赫回鹘行纪》(V. Minorsky, Tamim 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II, 2, 1948, 伦敦大学, 285页。

也认为：“中国战俘把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从此以后，许多地方都建立了造纸的作坊，来满足当时的需要。”^①此后，纸坊便在阿拉伯世界各地相继出现，植物纤维纸以它轻便，简洁和字迹不易涂改，逐渐代替苇纸、皮革和羊皮纸，成为最受欢迎的书写用纸，在文化革命中贡献了无可计量的效益。

794年，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统治下的巴勒马克家族呼罗珊总督法德尔·伊本·叶海亚(al-Barāmika al-Faḍl ibn Yahya)，在巴格达开办了撒马尔罕式样的造纸工场，在伊拉克首次开始生产植物纤维纸。这件事被伊本·卡勒敦写进了他的巨著《历史导论》(al-Muqaddimah)。它的出现，标志着西亚正式进入了纸的世纪。经法德尔的弟弟宰相贾法尔·本·叶海亚建议，哈伦正式下令，为防涂改，政府公文一律以这种新式的纸张代替早先使用的皮纸。这种纸就是后来习称的贾法尔纸。此后，在阿拉伯半岛也门的蒂哈玛、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特里波利、哈马和梯比里斯，在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拥有了自己的造纸厂。大马士革以制造的纸张长期供应欧洲而名闻遐迩，拉丁文中称为大马士革纸(Chara damascena)。叙利亚的另一城镇班毕(Bambycina)，因为造纸，被欧洲人讹传成 Charta Bombycina，成了“棉纸”。直到1885年维也纳的威斯纳对早期阿拉伯古纸作出显微分析为止，欧洲一直讹传阿拉伯是襁褓纸的发明者，他们的纸是由棉质纤维所造。这个历史性的误会，竟一时剥夺了早先阿拉伯著名学者早已公认的属于中国人的发明权。

火药的制造是中国的发明，在十三世纪已为阿拉伯世界所重视。组成黑色火药三要素的硝、硫磺和木炭，关键在硝的配方。中国硝(火

^① 萨伽编译：《比鲁尼印度志》(G. Sachau ed. *Al-Beruni's India*)，1914，伦敦，171页。

硝)传入伊朗,被称为“中国盐”或 Shūra。阿拉伯语则以“中国雪”(talga-s-Sin,thalj al-Şin)和硝(Shawraj, Shūraj)相称。硝石进入伊斯兰国家,大约在八、九世纪之际,阿拉伯炼丹术之父查比尔·伊本·海扬用硝酸取得王水。九世纪中叶巴斯拉开采的 Shūraj,也就是硝矿,这个字本身就是“硝”的音译。但从九世纪到十二世纪,阿拉伯人始终不能用硝制取火药,而只能充作炼丹和医药中的药剂。当十三世纪阿拉伯人从战场上得知火药时,他们最初使用的便是这个来自中国的“药”字,在阿拉伯语中称达瓦(dawā'),是个意译的字。还有“巴鲁得”(barūd)和“焰硝花”(或译“阿索丝石之花”,zahrat ḥajar assiyūs)两个词,早在埃及和北非已被使用。

硝作为一种药料,在炼丹和仿造华瓷、烧制玻璃中都发挥着它特异的功能。最初是从南宋首都临安(杭州)和泉州、广州等地传入埃及的“焰硝”、“花火”得名,焰硝花和希腊医学著作中的“阿索斯石头”似无关系^①。阿拉伯最博学的药物学家伊本·贝塔尔(Ibn Baiṭar, 1197—1248年)在他的巨著《医方汇编》(Kitāb al-jami fi al-Adwiyah al-Mufradah)的“巴鲁得”条目下说道:“这是埃及老医生所称的中国雪,西方(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普通人和医生都叫‘巴鲁得’,称作‘焰硝花’。”^② 这是在1248年前,非洲阿拉伯世界开始使用含有火药意义的“巴鲁得”和“焰硝花”来代替早先使用的“中国雪”这个含义不清的名词。“巴鲁得”一名的出现,正是硝在阿拉伯世界开始用来制造花火的结果。

埃及在推广中国烟火和火药方面,走在阿拉伯世界的前列。1249年的一种阿拉伯文抄本 Shebah bin Fadhl,叙述艾优卜朝国务大臣

①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34页。

② 萨尔顿:《科学史导论》(G.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巴尔的摩尔,1931(1975年重印),第2卷,第1036页;柯林(G. S. Colin):《巴鲁得》,见《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第1卷,第1055—1056页。

奥姆莱(al-Amraes)亲自主持了在伊斯兰国家初次试制火药的实验,取得了成功。当时使用的火药方子,可能就是半个世纪后哈桑·拉曼(al-Hasan al-Rammāh)在《马术和军械》中列举的“契丹花”处方。哈桑·拉曼在1285年后不久记述的这张火药方子,用了硝、硫黄、木炭和“中国铁”。他使用的硝称“巴鲁得”。1249年以后,“巴鲁得”这个词就因用于军事上的试验获得成功,而具有“火药”的含意了。

蒙古人使用中国火器在中东战场大显威风,促使阿拉伯人逐渐弃置早先使用的火油机。在幼发拉底河抗拒蒙古入侵的马木鲁克人首先起而仿造这种使用火药的新武器,到十三世纪末,马木鲁克使用的火炮有通称“火器”的马达发(midfa' an-naft 简称 midfa'),还有“火炮”马卡拉(mukḥulat an-naft, 简称 mukḥula 或 naft)。乌玛里还在1340年时提到,马木鲁克人使用了类似宋代突火枪发射子窠的一种焰硝炮(makāhil al-bārūd),它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管形火器了。由于阿拉伯人的传递,差不多同时,火药、火器都在欧洲战场上得到了应用,军事上步入射远火器的时代由此正式揭开了帷幕。纳夫达(naft)至少在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已不再是石油机(naphtha),而是地地道道的火炮(makāhil an-naft)了。

阿拉伯玻璃制造技术优于中国,宋元以来对中国玻璃业有所推动。新疆出土宋元时期的一些玻璃残片,经鉴定系钠钙玻璃,按照器型、纹饰,曾被推测是当地制作的仿伊斯兰玻璃器。《宋会要辑稿》曾多次记述阿拉伯使者从海上进献玻璃器,阿拉伯特产的香水、千年枣、白沙糖也常装在琉璃瓶(玻璃瓶)中一起进献。如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蒲押提黎的献物中有千年枣、白沙糖、葡萄各一琉璃瓶,另有蔷薇水四十瓶,当然也是装在玻璃瓶内。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阗婆离进献物中有碧白琉璃酒器(《玉海》称琉璃钟)。1070年12月大食使者贡物中的水晶琉璃器,和1072年2月勿巡国(苏哈尔)辛毗陀罗进奉的琉璃水精器,当是同一类型的、最精巧的透明玻璃器。

《诸蕃志》卷下琉璃条评述大食玻璃“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中国玻璃不耐高温，虚脆不贞，因此玻璃器皿的制作长期停滞不进。这种情况到十五世纪初仍未见改善。永乐年间，郑和、王景弘出使西洋，引进烧制玻璃人才来华，实际解决钠盐的合理配方，烧出有气眼而质轻的玻璃，减少玻璃的进口量，才使中国玻璃价格下降（《事物原会》卷二八引《正字通》）。

四、金 工

托名查比尔的《物性汇览》中列举借鉴的中国技艺，有炼铁为钢（*fulādh*）的各种方法，炒钢、灌钢等先进技术已为阿拉伯所传扬。灌钢技术在五世纪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中有确切的记录，办法是将生铁和糅熟铁渗杂，炼制的钢坚韧耐用。生铁炼钢是中国人的独创，久已引起阿拉伯人的注意。在查比尔为数众多的著作中，有一本名为《论中国铁》（*Kitab al-Kharṣini*），专门论述中国人发明的铜镍合金，亦即中国人所称的鍮（白铜），*Khār* 这个字好像就是“鍮”的音译。阿拉伯人认为用这种金属制作箭簇，可以致人于死地；制作鱼钩可以使海中的鱼难以挣脱；做铜镜可以避邪；做铜铃，声音铿锵，久久回荡。

中国对阿拉伯制作的腰刀，由于它锋利而形如新月，用于骑兵作战时能发挥歼敌的效力，给以很高的评价。唐代荆南兵马使赵公有大食刀，诗人杜甫为之作《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全唐诗》卷二二二）：“太常楼船声嗷嘈，问兵刮寇趋下牢。牧出令奔飞百艘，猛蛟突兽纷腾逃。白帝寒城驻锦袍，玄冬示我胡国刀。……荆岭弹丸心未已，贼臣恶子休干纪。魑魅魍魉徒为耳，妖腰乱领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庠，不似长剑须天倚。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丹青宛转麒麟里，光芒六合无泥滓。”

大食宝刀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历宋、元不衰，到明代因日本

刀大量进口,才让位于日本刀。1327年,伊儿汗不赛因向北京馈赠的礼物中有西马、佩刀和珠宝,这种佩刀,也就是著名的叙利亚钢刀。正德十三年(1518年)麦加王写亦把刺克向明廷赠送的礼物中,有一种名为鱼牙刀的宝刀。

阿拉伯各国制造的掐丝珐琅,以工细闻名。制作时在铜胎上粘焊细铜丝织成的图案,再填满珐琅,经烘烧、磨光、镀金而成。元初传入中国后,称作“大食窑”。明代以景泰(1450—1456年)年间制作的最精,并有年款,清代才以景泰蓝相称,流传至今。

五、珠 宝

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一样,在唐代已以贩运珠宝著称。《太平广记》中有许多胡人、胡僧挟宝以返的故事,明确讲是大食国人的,有卷三十四“崔炜”条。崔炜在外地返回广州,将所得巨珠出售,有老胡一人,见到这稀世之珍,便匍匐膜拜,出价十万缗购进,然后搭船回到大食。同书卷四〇二引《纪闻·水珠》,有大食国胡人,见珠行顶戴礼,大食国人出价四千万贯买珠。还有大食国人埋珠于地,引发泉水等记事。这些故事说明阿拉伯商人善于识别珠宝,并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操纵珠宝市场。

十二世纪初,在广州以阿拉伯穆斯林为主体的蕃人,都有带宝石戒指的风气,“其人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交趾人尤重之,一环直百金。最上者号猫儿眼睛,乃玉石也,光焰动灼,正如活者”。(《萍洲可谈》卷二)这种风气也因追求财富的心理,传给了中国商民。

《诸蕃志》卷下“真珠”条:“真珠出大食国之海岛上。”又说广西、湖北虽亦产珠,但不及大食、监篔(苏门答腊西北岸)所出的明净。赵汝适记录了伊德里西《旅游证闻》(1,375页)中巴林产珠场的实际操

作情况,指出这种采珠业属于官办性质,取得的珍珠和采珠者均分。“珠大率以圆洁明净者为上,圆者置诸盘中,终日不停。番商多置夹襦内及伞柄中,规免抽解”。由于珠宝大多由入境者偷运,所以实况难明。《诸蕃志》列举阿曼沿海出真珠,出口货“惟买马与真珠及千年枣”;卡伊施岛是重要口岸,“土产真珠、好马”和白铜、水银、生银等阿拉伯产品,同时运销世界各地。

《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一以默德那(麦地那)为回回祖国,评论:“其人善鉴识,每于贾胡海市中,廉得奇琛,故称识宝曰回回。”将阿拉伯人当作鉴识珠宝的民族。

元代阿拉伯商人常以珠宝玉石和官府交易。至元三十年(1293年),“回回李可(Bakr)、马合谋沙(Muhmud Shah)等献大珠,邀价钞数万锭”(《元史》卷一七)。至大元年(1308年),“泉州大商马合马丹的(Muhammad al-Tāmm)进珍异及宝带、西域马”(《元史》卷二二)^①。皇庆二年(1313年)又有“回回以宝、玉鬻于官”(《元史》卷二四)的记事。回回进宝与回回识宝,是元、明时代社会上的常事。

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录有各种阿拉伯宝石,总称回回石头,称价格因种类而异。“大德间(1297—1307年),本土巨商中卖红刺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一十四万,定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呼曰刺(lal),亦方言也”。刺译自阿拉伯语,在红石头四种中名列榜首,明代以红玉相称。十四、十五世纪,亚丁是印度洋最大的玉石市场,出产猫睛、珊瑚、金珀、大珠和五色雅姑。1421年中国从亚丁进口重二钱许的猫睛,高二尺的珊瑚。嘉靖年间,制方丘、朝日坛玉爵,所需红黄玉,也在

^① 这位泉州客商“马合马丹的”名字和十叶派中伊司马仪派所拥护的伊司马仪的儿子穆罕默德·塔木相同。但“的”这个字也可能译出的是伊司马仪派中的传道师(da'i)。总之,这位客商是十叶派信徒。

亚丁购进。

六、星 历

中国传统星历知识根基雄厚。1220年5月,蒙古军进驻撒马尔罕,精通汉学的契丹人耶律楚材,首次获得与穆斯林天文学家合作观察天象的机会。回回天文学在元初已深受重视。1271年在原有的汉儿司天台之外,正式在大都(北京)设立回回司天台。1276年任用可马刺丁为司天少监,隶属于秘书监之下,由可马刺丁襄助波斯人扎马刺丁编制回回历书。回回司天监终元一代得与中国传统的历法机构同时存在。

可马刺丁在1273年汉儿、回回两个司天台合并时,曾随侍驻守陕甘的安西王忙哥刺。忙哥刺在京兆府(今西安)设立的天象台实际是北京司天台的分部,在六名台官中有三名归属忙哥刺。忙哥刺的儿子阿难答是个虔诚的穆斯林,精通阿拉伯文字,从事阿拉伯历法的推算。1957年在西安东北三公里的安西王府遗址进行发掘,出上了藏在石函内铸在正方形铁板上的五块阿拉伯数字的幻方,数字分六面浇铸,大约是出于王府的工匠之手^①。据《元秘书监志》,可马刺丁在1278年曾为安西王推算历法,奉旨写进回回历。阿拉伯幻方当属运算工具,同时又是穆斯林压胜和避邪的灵符。1980年上海浦东陆家嘴也出土过一枚玉质佩挂幻方,所铸阿拉伯数字与西安出土物类同。

精通星历、医术的爱薛,与在马拉格天文台历史上称作阿布·舍克尔的天文学家似乎是同一人。他和叙利亚的博物学家阿布尔·法拉杰相处甚为得体,阿布尔·法拉杰常去马拉格从事研究,1272—1273

^① 夏鼐:《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和幻方》,《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3—68页。

年在那里讲解托雷美,阿布·舍克尔为他选编了托雷美的《行星体系萃编》(Khulaṣat al-mijistī),希腊—阿拉伯天文学因此得以东传。

回回历推测天象极精,五星纬度尤为中国所无,明代仍极重视。洪武元年(1368年)在设置司天监时,同时又设回回司天监,命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刺等十四人修历。1369年,特将元代回回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召到京师(南京),负责回回司天监的工作^①。1370年司天监改为钦天监,回回司天监改称回回钦天监,并在钦天监下专设回回历一科。洪武十五年(1382年)秋,朱元璋命令翰林李翀、吴伯宗会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将元代使用的回回历译成中文,后来传世的《明译天文书》、《七政推步》便是他们的成果。《明史》卷三七、三八、三九曾详加著录。1398年回回钦天监虽被撤销,但钦天监下仍设有回回历科,负责编写星历,与大统历参用了二百七十多年。清初仍采用大统历和回回历,直到1669年决定采用西洋新历,回回历才被废去。

七、医 药

香药是亚丁湾两岸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对中国的医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阿拉伯香药以乳香、苏合香、龙涎香、阿拉伯胶、诃黎勒、石硫黄、无石子、阿魏、金线矾、押不芦、阿芙蓉、梔子花、蔷薇水等享名中国,在中国医方中广泛应用。

乳香,一名薰陆(Boswellia Carteri),阿拉伯名 mastaki,薰陆取名于阿拉伯香岸(Shihr Lūban)^②,香岸以产乳香蜚声世界,因此初入中国即以产地相称。《别国洞冥记》称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年)外国进赠沉光香,出在涂魂国(佐法尔),烧之有光,是最好的照明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明神宗实录》卷五三六。

② 夏德:《诸蕃志译注》,以为出于Kundur。

材料,便是乳香。唐、宋时代,以薰陆的别名大量输送中国。八世纪中叶,海南岛万安州冯若芳用海上截取的乳香做灯烛,一烧一百多斤。宋代大量从广州进口,并制成各种丸、散、丹药,供吞服或外敷。《政和证类本草》所收乳香丸有八种,乳香散三种,乳香丹一种,为使用进口药物中最为常见的。

苏合香(*Styrax Officinalis*),系金缕梅科野茉莉属落叶乔木脂液炼成的香脂,汉代元封年间已进入长安宫廷,译称涂魂香。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别称返魂香。苏合因产在阿拉伯南部的苏合国(al-Shihr)而得名,今地名席赫尔,宋代《诸蕃志》译作施曷。三世纪的《广志》已知苏合有香膏、香油之别,由于能救治昏厥,传为起死回生的妙药。唐代进口的苏合,以“紫赤色与紫真檀相似,坚实极芳香,性重如石,烧之灰白者好”(《唐本草》)。唐、宋时以叙利亚所产为上,运到中国常有以阿丁枫香树膏制品相代的。刘孟德《传信方》有苏合香;《广济方》、《外台秘要》、《千金翼方》、《苏沈良方》有苏合香丸。宋真宗(998—1022年)曾以苏合香酒、苏合香丸赐近臣,当作养生与急救的特效药。

阿拉伯胶(*Acacia Senegal*),系豆科金合欢属常绿乔木阿拉伯胶树的脂液。阿拉伯半岛西岸的阿西尔是主要产地,故称阿拉伯胶(Şamgh 'Arabee)。《魏略》以黑胶相称。在十五世纪初朱肱、滕硕等的《普济方》中译作李子树胶,更早的《回回药方》音译成“三亦”、“三额”、“三额阿刺必”,以阿拉伯语“树胶”(Şamgh)相称,在阿拉伯已成“阿拉伯树胶”的专名。配伍使用可治眼睛的炎症。

诃黎勒,本产在伊朗、伊拉克,但巴格达的基督徒艾卜·阿里(卒于1080年)的《方剂》(*Kitāb minhaj al-bayān*)已有四种诃子,在喀布尔诃子、黑诃子、黄诃子之外并有中国诃子。《广异记》说高仙芝在大食国得到长三寸的诃黎勒,抹于肚腹,大痢十余次,恶物俱出,一切病消,因以为宝。

押不芦(Yabruh, abruh),宋人《志雅堂杂钞》卷上记,回回国之西数千里,产一种极毒而似人形的植物,叫押不芦,制成药后,以少许磨酒饮人,就会通身麻痹而死,虽加以刀斧,而毫无知觉。但经三日,别以少药投之即活。宋代御药院中有二枚,被称作神药。后世称作曼陀罗华,是理想的麻醉药。宋元以后,使用这种药剂的渐多,阿拉伯是它的原产地。

阿芙蓉,元代写作阿肥菜,阿夫菜,译自阿拉伯语 Afyoon、波斯语 Apyoon。明代以阿片、阿芙蓉称呼,《普剂方》译作阿飞勇,俗名鸦片。是罂粟(khashkhash)果内乳汁经干燥而成。《医林集要》说出在天方国,“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李时珍评述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明、清时以之入药。

阿勃参,阿拉伯文 Afursama,叙利亚文 Apursama,亚美尼亚文 Aprsam,本产麦加、麦地那,后来移植巴勒斯坦。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八以为“出拂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如蔓青,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者。其油极贵,价重于金”。西方传教士从希腊名称译作拔尔撒摩,巴尔酥麻香(balsam, balsamo)。

梔子花、蔷薇水是阿拉伯著名的香花、香水。梔子花出在大食哑巴闲(伊斯法罕)、罗施美(希米雅尔)国,晒干后使用。十二世纪时广州人用这种蕃梔子和香,能使龙涎香获得清越的香味。蔷薇水出在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中世纪向世界各地出口,从中国到欧洲都使用这种香水。宋代大食使者常将蔷薇水装在琉璃瓶中进献朝廷。洒过蔷薇水的衣服,郁烈的香气经久不消。

阿拉伯医学自九世纪后名家辈出,制取药物也别创新法,可以久贮。宋代以来,中国药学界仿效阿拉伯医药,大量推广丸、散、膏、丹。阿维森纳(980—1037年)被推崇是用金银箔包裹药丸的创始者。《和剂局方》也有金银箔作丸衣的,并且采用朱砂、青黛等制备丸衣。龚昱

《中吴纪闻》卷五记苏州有郭姓药商以出售朱砂丸致富，他的朱砂丸包治百病，后来真方被人窃出，方知朱砂不过是外加的丸衣而已。这是十三世纪中成药学习阿拉伯方法后的新成就。

中国医生与阿拉伯医师之间在元代结有深情厚谊。叙利亚的景教徒爱薛(1227—1308年)，精通多种语言，长于星历、医药，1246年来华，忽必烈登位后，他在1270年设立京师医药院，在开平负责配制宫廷使用的回回药物，治疗患病的卫士和色目人。这所医院的建制可能就是仿照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医院，韦立德和努尔丁(1147—1174年)曾相继在大马士革创建了第一所和第二所医院，努尔丁建立的那所努尔医院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医院了。爱薛主持的这所医院，比盖拉温在1284年落成的开罗曼苏尔医院还要早些，在1273年被改称广惠司，主要职官有二十多人。1292年又分别在大都北京和上都开平建立回回药物院，到1322年将两处归并到广惠司机构之下。在元代已经编成的《回回药方》，虽用中文写成，但引用了许多阿拉伯和伊朗的医书。该书刊于明初，共三十六卷。现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仅有四册，第一册目录卷之下列有卷十九至卷三十六的目录，第二册卷之十二为中风门，第三册卷之三十为杂证门之下，第四册卷之三十四为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残本共243页。从残本已见到，药方采用的阿拉伯医书有：阿维森纳《医典》，伊本·贝塔尔《医方汇编》，穆罕默德·本·宰凯里雅·拉齐的《医学集成》(简称 al-Hawī)，阿里·本·阿拔斯·麦朱西的名著《医学全书》。在这些阿拉伯医学的里程碑式的经典中，中国的伊斯兰医师将各种药方加以汇编，并临床应用，最后汇总成《回回药方》这部巨著，这是对世界药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和阿拉伯医学交流的结晶。从此，中国医学的伊斯兰学派正式宣告诞生。

八、园 艺

阿拉伯出产的瓜果、蔬菜、花木、香药、香油,品类繁多,久为中国所欣慕。其中的一些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生长的园艺作物移植到中土,对丰富中国的饮食文化和栽培技术具有深远的意义。

乳香,和近代药用的薰陆香(*pistacia lentiscus*)不同,据《广志》,三世纪左右已在当时属于吴晋的交州(越南北部)移植。到十一世纪,海南岛也有栽种(《梦溪笔谈》卷二二),称乳头香。清代又称水乳香,出在云南怒江东南的镇康,是梅迪树的衍生种。

亚麻,原产地中海东部,是地中海居民制作衣服的主要纺织原料。在里海以西和伊朗高原间,亚麻长期是野生的。汉代经中亚细亚的大宛传入中国,和脂麻合用一个名称:胡麻。亚麻籽和脂麻的种籽都可榨油入药。山西汾水流域是最初适合性喜凉爽的亚麻栽培地,《淮南子》已有记载。陶弘景《别录》称亚麻初生上党川泽,有山西胡麻之称。《广雅》以藤苽为亚麻别称。内蒙古、山西、湖北、四川都有栽培,在湖北,四川又叫山脂。现在东北各地栽培尤多。

芝麻,野生热带非洲。希罗多德说巴比伦的食油全靠芝麻籽榨出的油。伊朗高原那时已种植芝麻。此后不久,阿拉伯人也以芝麻为油料作物。《本草经》以为芝麻由张骞从大宛传入,因称胡麻。三、四世纪后有方茎、巨胜等别名,巨胜一名译自波斯语 *Kunjut*。《广志》已知“服之不老”。唐代《唐本草》以为八棱的叫巨胜,芝麻籽只有黑、白二色,而以乌黑的为良。黄河以南普遍栽种,到明代,种籽已有黑、白、红三种颜色,可供食用、榨油、入药。

椰枣(*phoenix dactylifera*),分布在大西洋东部和印度河流域间。阿拉伯的海得拉毛是三大主产区之一。希罗多德(I,193)已知巴比伦的椰枣可供食用,也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进口的伊拉克蜜枣。希伯

来语称作 tamar, 来源很古。三世纪时,《南方草木状》首先称扬海枣味极甘美,胜过安邑御枣,284 年由越南中部的林邑使者向洛阳进献百枚,当时这种树已生长在林邑海边了。四世纪左右徐衷的《南方记》又称海枣是夫漏树,子称夫漏子,后来写作无漏,译出了埃及柯柏特语 bunnu(枣)这个字。八世纪以后,又称波斯枣、千年枣,宋代又称万岁枣、千年枣,有时称大食枣、番枣。如 1157 年初(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佛齐使者带来大食枣十六琉璃瓶(《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咖啡,原产地在埃塞俄比亚高原,近代咖啡经阿拉伯人推广,享名世界,十九世纪以来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与茶、可可相并列。阿拉伯品种的繁衍,使小果咖啡(*Coffea arabica*)获得了阿拉伯咖啡的美名。十七世纪起,红海东岸的阿西尔和也门的高原以盛产咖啡吸引西方国家的船队前去贩运。中国到十九世纪末才在云南、广东等地种植咖啡。

九、地 图

元代来华制作地球仪的扎马鲁丁曾参与编纂《大元一统志》。编纂这部包括亚洲境内蒙古王公统辖区的巨型地志,需要收集海外各种图书。1285 年此议刚刚提出,扎马鲁丁就提出一个地理奏文,声称阿拉伯文字的地理书已收藏四五十册,并有回回图子,然而要重新搜集资料,才能另绘一幅总图,总图要包括西亚各地在内。两年之后的 1287 年,秘书监又下令福建省通知来华海船上的阿拉伯穆斯林,“有知海道回回文字刺那麻者,具呈中书省行下合取索者”(《元秘书监志》卷四)。“刺那麻”是阿拉伯语的航海地图,当初曾由元政府广为搜求,入藏内府。《大元一统志》虽已佚失,但后来编纂的《经世大典》尚有地图一幅,地域广及西亚各地,或者就是据《大元一统志》中世界地图改绘的。原图录入《永乐大典》元字韵,清代魏源《海国图志》又加以

转载,得以流传至今。^①

阿拉伯航海地图和各种地志的流入中国,催发了中国的航海地图和域外地图向更加精密的方向发展。台僧清濬在1360年所作《广轮疆理》,内容广及夷夏,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有严节重募《混一疆里图》题记^②。差不多同时,李泽民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绘成《声教广被图》。李泽民的图和清濬的图在1399年被高丽使团的金士衡带回朝鲜,在1402年由李荃和权近据以编制《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现约有1500本复印本保存在日本京都^③。图中绘出了非洲、欧洲和亚洲,除了朝鲜国境经过放大,显得不合比例外,其余各部都绘制合理,欧洲标出的地名近100处,非洲列出的地名有35处,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绘上一个灯塔,以示它的独特的世界声誉。尤其突出的是,非洲的总体图像绘成倒三角形,尖端指向南方,纠正了十三、十四世纪伊朗科学家穆罕默德·卡兹维尼、纳速刺丁·杜西和欧洲地理学家马黎诺·塞纳托所作的地图将非洲呈东南向伸向苏门答腊。这是参与印度洋航业的中国航海家和地理学家,对阿拉伯地图学的一项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十、眼 镜

用来遮阴和保护眼睛的保护眼镜,据说在孔子时代便已诞生。唐代确已有了保护眼镜,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曾出土有铝片制作

① 朱杰勤:《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载《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明人叶盛:《水东日记摘抄》卷四。

③ 《朝鲜藏中国古旧世界地图》,刊《古地图年鉴》(Wakamura, H. old Chinese world-maps preserved by the Koreans, *Imago Mundi, Yearbook of Early Cartography*), 1947, 4, 3页以下, Fig. 1.

的眼罩,大约用来防御风沙。元代中亚、西亚各地普遍使用薄玻璃制作窗户,以透光亮。中国内地与沿海也有用鱼脑骨制作透明或半透明的灯罩和眼罩的,这种鱼脑骨称枕,或作鱿。元代北京少数显宦便有使用这种鱿嵌在眼睛上,作成“鬼眼睛”,用青皂帛系在头上,当防护眼镜用(熊梦祥:《析津志》)。

阿拉伯素以眼科医治和玻璃制造为长技,光学玻璃制造的眼镜便由阿拉伯传到中国,初称“暖碓”,译自阿拉伯文 al-unwainat,异译有“优逮”、“优逮”、“暖碓”、“矮纳”等多种。这种光学眼镜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初传中国。清初学者赵翼《瓠北诗钞》中录有《初用眼镜》一诗说:“相传宣德年,来自番舶驾”。是宣德(1426—1435年)年间从那些出海贸易的船上带到中国的。到嘉靖(1522—1566年)、万历(1573—1620年)时仍然是罕见之物。

明代眼镜已有实物出土。万历以前,明代典籍中有五处提及眼镜。最早的眼镜都是老花眼镜,适用于中老年人读书写字。明人张靖之《方洲杂言》说,胡宗伯得到的一副老花眼镜是“宣庙赐物”,系宣宗朱瞻基所赐。如果以郑和最后一次统率的宝船归来时为此物从阿拉伯进口之年,那末第一副眼镜当在1433年夏天正式传到中国。这种眼镜片像铜钱大小,色泽像云母石,有金属镶边,系折叠式。《方洲杂言》又记孙景章通过马匹交易,“以良马易于西域贾胡”,弄到一副老花眼镜。是从西北陆路,以一匹良马的代价购进。由于价格昂贵,运输不便,全凭境外运进,所以眼镜在明代始终是一种珍贵的异国奇物。

郎瑛《七修类稿》提到的老花眼镜,是“甘肃番人贡至而得者”,也是通过来自撒马尔罕或天方的队商,辗转相传入境。据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万历初,林大春也拥有一副眼镜,是从“南海贾胡”那里获得。吴宽所获眼镜是明代文献中唯一明确提到的近视眼镜。他在《匏翁家藏集》卷二十三中有一首诗,表白他因屠瀟(1441—1512年)相赠眼镜,使他这个有读书癖而苦于无法读书的人(“予生抱书

淫,视短苦目疾”),“一朝忽得此,旧疾顿觉失”。屠濬是成化(1465—1487年)进士,官至南直隶御史、吏部尚书、太子太傅,1486年为调停占城国和安南国的纷争曾亲往广东。所获眼镜似乎得自南海穆斯林商人。大致到十六世纪,阿拉伯眼镜已分别从海上和陆上通过穆斯林商人,作为珍货向中国人出售。

即使在十六世纪末,眼镜仍价昂,与马价相等,十分稀见。田艺蘅以亲身经历评论眼镜之为珍异,以致“人皆不识,举以问余,余曰此璅璅也”(《留青日札摘抄》)。明末光学仪器从西欧传入,眼镜似乎也渐被上层官绅所了解,但国内正式制作眼镜,已到清初,北京、广州、苏州这些最早制造玻璃、钟表的地方,在光学制品的生产上居于全国的前列。国产制品上市,眼镜一名便通行起来,不再称作璅璅。康熙时,一副眼镜一般“三五分可得”(孙承泽:《研山斋杂记·眼镜》),只有墨色水晶镜,每副仍贵到七八两银子。乾隆(1736—1795年)时眼镜在北京已有专门的商号,读书人以戴眼镜为时尚,当时杨米人在《都门竹枝词》中有句“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嘉庆年间(1819年)张子秋《续都门竹枝词》明指:“近视人人戴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此时广州太平门外眼镜街的产品已风行国内,眼镜已因国产而逐渐普及,成为都市商业中的一个新行当了。

第七节 艺术与民俗文化交流

一、美 术

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保存着众多的犍陀罗式美术,其中画师洞中有一幅画师临壁绘图的自画像,画着一位垂发披肩、上衣敞口、翻领右袒、腰佩短剑、右手挟中国式画笔、左手持颜料杯的画师。铭文

中题名米特拉旦达(Mitradatta),是个希腊名字,表明画家从姓氏到装束均系拜占庭人。画家大约在六世纪初因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战争,被迫流落他乡。但按杜环的说法,这些在异国生活的拜占庭人,仍“死守不改乡风”,一直保持着固有的民族传统,米特拉旦达成了第一个来华留下姓氏的叙利亚画家。中国西部地区因此早就有叙利亚或小亚细亚画家带来的拜占庭艺术了。

伊斯兰教兴起后,由于教规严禁绘画人物,教义学家一致主张表现人类和动物是真主独享的特权,因此在清真寺中绝无人像,只有在少数宫殿和书籍插图中见到。因此,当自称穆罕默德圣门后裔的伊本·瓦哈卜在871年后来到广州并被僖宗引见时,竟在宫廷藏画中见到诺亚、耶稣和骑在骆驼上由教友簇拥着的先知穆罕默德像时,是如何的惊讶和感动了!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两个半世纪内,第一幅关于他的画像就是中国宫廷画家所作的,或者说是热心的中国皇帝所收藏的世界名画中,穆罕默德已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了。

伊斯兰艺术中的装饰风格,以变幻无穷的花卉和几何图案形成的“阿拉伯式”(arabesque)著称于世。这些式样,在元明时代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清真寺建筑的窗櫺和厅堂、壁龛上也有大量的移植。同时,在华瓷的图样上,特别是元明时代大量生产的青花瓷的纹饰上,阿拉伯文字和三角形、回纹、旋涡纹边饰的经常出现,是阿拉伯式装饰风格在中国流行的另一种表现。如1980年河北邢台地区征集的一件明初青花无挡尊^①,器身书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等两组阿拉伯文,器高17厘米,外径17厘米;广西容县博物馆在1989年征集的一件宋代白瓷碗印模,模柄有两组“元祐七年三月□日莫”款阴刻文字,顶心月华式菊花纹,即是阿拉伯式样(图65)。

^① 同一器形的青花瓷又称盖罐,见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02页图5。



图 65 宋代白瓷碗印模顶部旋波式菊纹(广西容县博物馆藏)

以赞颂“阿拉”(Allah,真主)的图案式样,作为外销中东的陶瓷,起始于长沙铜官窑的彩釉器物。1980年扬州城北蜀冈出土的一件青釉绿彩背水扁瓷壶,正面以曲线对称展开的阿拉伯文 Allah^①,同样又见于泰国南部素叻府猜耶县莱福(Laem Pho)。还有1989年出土的长沙铜官窑瓷碗正面底部,都是华瓷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图案构成外销产品的物证。到了明代,这种文字装饰手法已和繁缛的花卉图案交叠成一体,邢台地区征集的青花无挡尊上,腹部三层图纹上均有釉色浓重而整体展开的阿拉伯文字笔划,使文字与图案融合无间。这种装饰手法,正是当时中文“福禄”、“富贵”等字样与缠枝花相交织的一种异域情调的衍变而已。

① 朱江:《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文物》1983年第2期,第95页,图1,2。

二、建 筑

阿拉伯建筑式样在中国最早的遗存,是广州怀圣寺的光塔。这尖塔(Mi'dhanah,米宰纳)是当初这座古寺唯一留存的阿拉伯式建筑。叙利亚是米宰纳的故乡,在伍麦叶时代逐步推广于各地兴建的清真寺,最初由基督教大教堂中的望楼所改建。广州光塔是前来经商的伊斯兰教徒集资兴建,唐代称怀圣塔,外表作圆柱形,高36.3米,顶上标有金鸡,随风南北,每年五六月,西南季风到来,伊斯兰教徒便在黎明前登塔祈风,以利航海,因此米宰纳在中国的诞生,一开始便与航海经商连结在一起。古代在晚间于塔顶燃灯,指示珠江船只。此塔历经修建,现仍耸立在广州光塔路。

泉州圣友寺(清净寺)是伊斯兰建筑中现存最古的寺院门楼,属叙利亚、埃及建筑学派。

十三世纪以来,阿拉伯式样的伊斯兰建筑,以清真寺和陵墓的形式在中国西北边区的新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建筑风格上,大多属于波斯混合式或突厥斯坦混合式,以普遍使用尖券和轴线对称的四合院式布局为通常的式样。另外,在1363年新疆伊犁地区的霍城建成的察合台后王秃忽鲁克·帖木尔汗(1330—1364年)的玛札,是新疆最早的砖砌方底穹顶无量殿。

更重要的是,从十三世纪起,在伊斯兰建筑中出现了中国混合式的建筑,这种建筑以汉式清真寺或回族汉式清真寺为基本式样,混合了其他地区的阿拉伯式样。元、明以来,清真寺建筑中不可或缺的砖砌穹顶无量殿,在内地汉式建筑和儒家文化模式影响下,逐渐向木构的窑殿(穹顶后殿)转化,成为列柱前殿和穹顶后殿组成的礼拜殿。西安鼓楼西北化觉巷清真寺便是一例。

元初阿拉伯人也黑迭儿和他的儿子马合马沙,都相继推行阿拉

伯帐幕建筑,并注意和汉式建筑交相融合。忽必烈登位后,也黑迭儿董理茶迭儿(庐帐)局,官正三品。1266年后,也黑迭儿便同张公柔、段天祐同时分管工部,负责扩建新都,在辽、金故城东北规划宏伟壮丽的大都。也黑迭儿以阿拉伯的工程技术,根据中华文化的格式,对宫城的布局、建筑、苑囿作了具体的规划,为今天北京北海附近的景观作了实地的建置。他的儿子马哈马沙继承父业,掌管工部,为北京城的建设作了无微不至的规划^①。1271年宫城建成,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元。1272年又将金代中都改为大都,正式以今北京作为首都。元代大都城自1267年4月兴建宫城开始,到1285年2月建筑竣工,历时十八年。城的设计按《周礼·考工记》的模式,方九里,旁三门。大都北面二门,其余三面都是三门。殿内布置仍具蒙古毡帐色彩,“内寝屏障重复帷幄,而裹以银鼠,席地皆编细簟,上加红黄厚毡,重复茸单”(《故宫遗录》)。并有多座畏吾儿殿、盍顶殿和棕毛殿,殿内雕刻和装饰纹样也吸收了伊斯兰建筑艺术的手法,这些布置便是当初主管茶迭儿局的也黑迭儿的专长了。

三、回回乐舞

元代和明代从波斯、中亚和伊拉克引进阿拉伯乐舞,泛称回回乐舞。阿拉伯流行的乐器不但在民间穆斯林社会中出现,而且也逐渐为内地汉民族所使用。火不思、胡琴、扬琴、冬不拉等阿拉伯乐器在元代中国边区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乐器,为宴饮、喜庆节日所不可或缺。

火不思(qubuz),在唐代已见于回鹘语佛典中,形状像波斯的巴尔布德和阿拉伯的乌德(‘ud),乌德是巴尔布德和阿拉伯自古已有的米兹哈尔(二弦)融合后,在伍麦叶朝时诞生的阿拉伯四弦木制乐

^① 欧阳玄:《马合马沙碑》,载《圭斋集》卷九。



图 66 元 乐器,通常作二弦。占奈韦《突厥文——阿拉伯文辞典》

代火不思 (1245 年)指出,维吾尔语 Yiqil,在阿拉伯语中译作 al-rabāb,源出阿拉伯拉弓乐器,亦即提琴。这种乐器在伊朗并不通行,在土耳其流行的是卡曼恰(Kamanja, kēmantcheh)。拉巴卜在中世纪传入欧洲,叫列比克(rebec),为小提琴的前身,而在中国则以胡琴的名目在乐界、戏剧界大显身手。

元代宫廷宴乐二十二种乐器中,有火不思和胡琴,并有琵琶、箜篌等波斯乐器,同时还使用了由阿拉伯引进的两种管风琴:兴隆笙和殿庭笙。兴隆笙是中统时(1260—1263 年)回回国进献,形如夹屏,用楠木制成,两侧音柜上一端立有闭式紫竹管九十只,柜外另有十五只小管。柜前有二皮风口,奏乐时一人鼓风囊,一人按小管,各管竹簧随

① 拉巴卜和古代波斯人弦乐器鲁巴卜(rubāb,阿拉伯语 rābab)的名字很近似,但鲁巴卜是用木或骨制弹片弹拨琴弦发音,类似中国的三弦。土耳其人普遍使用这种鲁巴卜。

之奏鸣。由郑秀考正音律后,加以改造,列入宴乐大器。殿庭笙,据兴隆笙仿制,列在大明殿上。列管九十,排成十五行,每行纵列六管,中有簧管,用乐工三人演奏。延祐(1314—1320年)时增设十具。在宴会时,殿庭笙先鸣,于是众乐随合,笙止则曲终。演奏者一定是那些擅长管风琴的阿拉伯琴师。

扬琴,起源于阿拉伯的一种似瑟的乐器卡龙(qānun),在波斯和伊拉克称桑图尔。在类似梯形的共鸣箱上并张着金属弦,以三弦调一音,二十四个音,共有七十二根弦。1259年郭侃从巴格达带回的七十二弦琵琶,大约就是这种卡龙^①。新疆现在使用三十六弦的卡龙。中国的洋琴是正梯形,立有弦马,用它两侧调成两个音,以细竹棍敲击,近似桑图尔。粤琴用柔软而有弹性的钢丝敲击,原理也相仿佛。

元代宫廷中有回回乐队,专演阿拉伯风格的音乐,自以伊拉克风格为准。1316年改隶常和署,署令、署丞之下还有管勾、教师、提控。专门培养有关人员。到明代,回回乐舞仍是一种时兴而又十分可贵的艺术享受。清代回部音乐中也有喇巴卜、达卜等乐器,就是新疆维吾尔族常用的热瓦甫、达甫(手鼓)等乐器。

四、双 陆

双陆这种投掷两枚骰子开彩的博戏,据说发源于印度的波罗塞戏(prasaka)。在曼苏地的《黄金草原》中有这样的记载。曹魏黄初(220—226年)时传入中国,民间说是曹植的发明。中世纪时双陆(nard)因使用棋盘,在阿拉伯世界大为流行,唐代已在宫廷中作为娱

^① 现代埃及也有七十二弦卡龙,见法尔玛:《阿拉伯音乐与乐器》(H. G. Farmer, *The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Arab*), 1914, 222页。另有七十五弦,合二十五音的,见萨尔瓦多-但尼尔:《阿拉伯音乐》(F. Salvador-Daniel: *Le Musique Arabe*)。

乐方式普遍采用。

双陆布阵以六为限,左右各十二路,号曰梁,白黑各十五马,白马从右归左,黑马从左归右。走法,每次可行一马或二马,或移或叠。双陆在中国南北各地流行,布局各有千秋,于是有北双陆,广州双陆和南番、东夷双陆之别^①。北双陆有五种布局,在唐初通行的便是。广州双陆用板,不用盘。南番、东夷双陆有四架八双陆、南皮(南印度)双陆、大食双陆,另有日本双陆,是一种由中国作媒传遍及亚洲一千多年的阿拉伯博戏。



图 67 北宋人摹唐代双陆仕女图

武则天也是一名双陆的爱好者,她曾叫宰相狄仁杰和她的男宠张昌宗打双陆,以张昌宗拥有的南海郡进奉的进口货集翠裘为赌注,

^① 洪遵:《谱双》(115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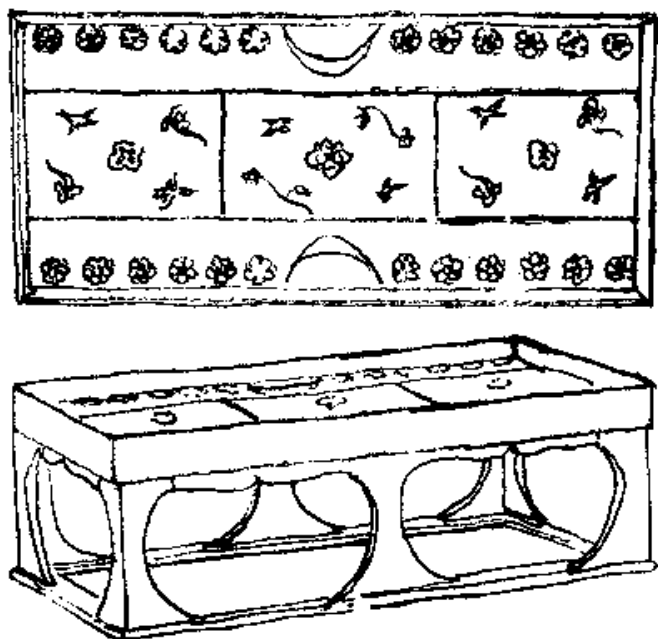


图 68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唐代嵌螺钿木双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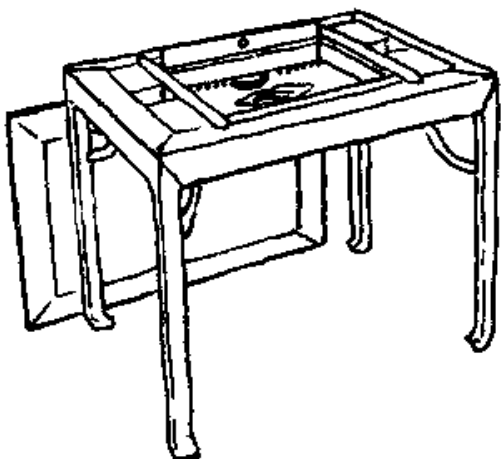


图 69 明代黄花梨木双陆桌

结果狄仁杰赢得了这件裘衣，但一出门便赐给了家奴，以示轻蔑（《集异记》）。唐中宗也是双陆迷，他让韦皇后向武三思下双陆，自己在旁点筹码（图 67）。双陆以北双陆盘最精巧，刻出两门二十四路，用象牙实之，或以花石砌饰。现存日本奈良正仓院的紫檀木画双陆

局两件，尚可见到唐代实物。其中一件长 543 毫米、宽 310 毫米、高 167 毫米，另一件长 546 毫米、宽 306 毫米、高 180 毫米^①。新疆吐鲁

^① 正仓院事务所编：《正仓院の宝物》，日本朝日新闻社 1965。陈增弼：《双陆》，《文物》1982 年 4 期，第 78—79 页。

番阿斯塔那唐墓在 1973 年出土的一件嵌螺钿木双陆局,长 280 毫米、高 78 毫米,为国内现存最早的双陆盘实物(图 68)。南方的双陆比较简易,番禺人以板为局,或以纸或画地为之,随时都可进行。“大食国以毯织成局”。日本则以白木为盘,方式与中国北双陆类似,而简陋得多。

1974 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曾出土双陆盘残板,长 528 毫米、宽 254 毫米,尺寸与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近似。元代宫廷和民间也多好双陆,奸相哈麻是个能歌善舞、会吟诗、会双陆的人。《事林广记》刊有双陆木刻图。明代小说《金瓶梅》、《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也都提到双陆,下棋与打双陆是最常见的娱乐。现存明代黄花梨木双陆桌,形制精美,是件高 845 毫米、宽 699 毫米、长 978 毫米的大型双陆桌,现为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所藏(图 69)。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明末紫檀双陆局,但高仅 130 毫米,残存双陆子二十二枚,黑马十枚为紫檀木,白马十二枚为黄杨木,制作十分精细。双陆虽历久不衰,但到清代终成高歌尾声了。

五、饮 食

西亚和中亚流行的胡饼,是一种用脂麻焙制的面饼,在二世纪时已成长安上层集团的主食。《续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饼,京师贵戚竟食胡饼。”北方面食以饼为主,相沿成习。油煎饼,称𩚑𩚑,译名来自波斯语,《齐民要术》中有详细制法,也是一种西亚食谱中不可或缺的面食。煎熟的饼,一面白,一面赤,周边也呈赤色,软而可爱,放久了也不变硬,道理在于和面时添加了油脂。原系西亚民食的烧饼、𩚑𩚑(毕罗,馅饼),到唐代已流行在长安和黄河流域各大城市。

胡饼在八九世纪的长安是僧俗共享的主食。连皇帝也免不了爱吃,杨国忠曾在长安买了胡饼去讨好玄宗。长安城里的辅兴坊是专门制作胡麻饼的场所。白居易也是胡饼的爱好者,当他由江州司马升任

忠州刺史(四川忠县)时,亲自作了胡饼赠给万州(四川万县)刺史杨敬之,随附绝句一首:“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这些久享长安胡食的官员,虽身处长江峡地,仍不忘京师生活,因此总得有面脆油香可以久贮的胡饼相伴。这种胡饼在十六国时期因石勒避讳而改称麻饼,又可叫炉饼,中间还可有不同的馅料,和现在的麻饼相仿佛。长安的东市和长兴里,还有专做另一种胡饼的毕罗店,饼中置蒜,是一种带馅的蒸饼。

广州城外蕃坊(今广州光塔街以南珠江以北),是引进阿拉伯、伊朗饮食文化的另一处基地。最早记录这种异域风味饮食的,是太和(827—835年)中任高州刺史的房千里。他在《投荒杂录》中追忆,“顷年在广州蕃坊时,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干鱼、糖蜜,再加上香料,是颇有南阿拉伯风格的进食方式。

宋元时代,随着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流传,东南沿海阿拉伯、波斯移民的习俗在广州、泉州、宁波等地的扩散,促进了清真菜系在中国边区和内地的形成。中国东南沿海首先将阿拉伯风味的烹调引入食谱的,见于《南方记》著录的椰枣猪肉鸡鸭羹:“夫漏树,野生,三月华,五、六月成子,如术有煮,着猪肉鸡鸭羹中好,可食,亦中监藏”(《太平御览》卷九六〇)。夫漏树,即柯柏特语的枣树,指椰枣,是南阿拉伯人民的重要食品,晒干后可作干粮。刘恂《岭表录异》记昭宗(889—904年)时,刘恂在广州蕃坊阿拉伯番长家中亲食皮肉软烂的椰枣,“疑是蒸熟也”,所以认为其核种而不活。

岳珂《程史》记番禺蒲姓宴饮,刻划出一幅1192年广州阿拉伯豪商日常生活的图景:

他日,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粪土,與皂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惟人曰:“此其常也。”后三日以合荐酒,饌烧羊,以谢大僚,曰:“如例。”龙麝扑鼻,奇味不可名,皆可食,迥无同槽故态。羊亦珍,皮色如黄

金。酒醇而甘，几与崖蜜无辨。独好作河鱼族，以脑多而性寒也。

东南沿海的阿拉伯移民和商人，给当地带来了富有西亚风采的饮食文化和薰香习俗，推动着当地的香药消费和崇尚奢侈的风气。到元代，由于阿拉伯移民的增多，西北沿线、东南濒海盛行此风的更不鲜见。喜食冰果子露、蜜糕和各种甜食，烧烤、清燉食物，渐成民间风习。1331年忽思慧编纂的元代皇室食谱《饮膳政要》，列有许多回回食物，最终为清真菜系进入中华饮食文化的殿堂奠定了基础。到明清时代，由于回族的形成和东南沿海阿拉伯移民风俗习惯的扩散，促进了以牛羊菜为主的清真菜系的成长。更因回族人数的增加和回族军人的散居黄河流域及云南等地，各大城镇逐渐出现清真馆、清真糕点铺，伊斯兰饮食摊，阿拉伯式饮食逐渐成为大众文化。

第八节 语言与文字

一、文字的借鉴

阿拉美文在中亚和新疆曾被借用为佉卢字母，在公元前后通行于新疆南部，于阗、婼羌等地出土的大量佉卢文书简牍，为了解汉代该地民族文化、语言、历史与宗教信仰、经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亚粟特文也是根据阿拉美文改制而成，回鹘文又据粟特文字母而形成。十三世纪蒙古族兴起后，又仿照回鹘文创制了回鹘式蒙古文，成为最早在蒙古草原上通行的蒙文，后来又在这一基础上不断改进，成为现在的蒙古文和托忒蒙文。1981年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旗阿伦苏木曾陆续发现汪古部旧地墓群中的景教徒墓碑，是用古叙利亚文(阿拉美文)字母拼写的突厥语言。古突厥语也是使用阿拉美字母制作文字，媒介者大约正是那些来自西亚的景教徒。

阿拉伯文字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在新疆一带逐渐成为通行的文字。蒙古兴起以后,在察合台汗国使用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察合台文。此后又演化成现在通用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孜文。

二、阿拉伯语在中国

阿拉伯语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始于唐代大食使者频频出入长安宫廷。汉地推行阿拉伯语教育,以培养有关人才的,以十一世纪下半叶的广州为最早。当时伊拉克、阿曼和也门商人纷纷来华,阿拉伯语成了仅次于波斯语、粟特语的重要语种。《中吴纪闻》卷三说,程师孟在北宋熙宁间(1068—1077年)出任广州知府时,“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籍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在蕃坊中也修学校,于是各国侨民子弟也都有入学就读的,这种学校势必涉及蕃语。但蕃学的兴起,还在大观(1107—1110年)、政和(1111—1117年)之间,当时“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铁围山丛谈》卷二)。在蕃学中,阿拉伯语是必修的语种,《古兰经》是学子崇奉的经典。《程史》卷十一描述“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立碑诵经礼拜,是蕃学的校规。

在元代色目人中,阿拉伯语是通行的外国语。当时官方的国际通用语是亦思替非文字,亦即波斯语。阿拉伯语只在侨民和伊斯兰教徒中使用。各地清真寺的兴建与回回饮食的推广,促使阿拉伯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散。例如,十二世纪初,朱彧在广州见以菩萨蛮(Muslimānt)称蕃妇为奇,以为是乐府中的名词,不知是伊斯兰教信徒的通称。元代已普遍使用“没速鲁蛮”、“谋速鲁蛮”、“木速儿蛮”、“木速蛮”、“铺速满”称呼穆斯林。又称伊斯兰学者为“大石马”、“答失蛮”、“达失蛮”、“达识蛮”。用“回回”称呼阿拉伯人,或阿拉伯化的穆斯林。

在福建泉州先后征集的五十六方伊斯兰教徒墓碑石刻中,有年代可考的,只有两方是南宋碑石,且都非阿拉伯人,其余五十四方都是元代的碑刻(其中一方是卒于明洪武四年的艾密尔·吐葛逊墓碑);这些碑刻中刻有名字的三十七方,佚名的十九方;刻有名字的只有两方是波斯人和祖籍亚美尼亚人,其余三十五方都是阿拉伯人。碑文所用文字,全用阿拉伯文的四十八方,阿拉伯文、波斯文并用的三方,阿拉伯文、汉文并用的四方,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杂用的一方^①。在阿拉伯文之外杂有其他文字的碑刻中,也总以阿拉伯文为主体,这是按照阿拉伯国家的传统习俗,即在不同民族,使用不同文字的地区中,阿拉伯文始终是居于第一位的国文,伊斯兰教也总是高于其他宗教的国教。

元代阿拉伯语不但是种商业语言和宗教语言,而且也是一种学术语言,为研究星历、医药、数学、炼丹、鉴定珠宝所必备的参考书籍。1273年10月北司天台(回回司天台)申报本台合用经书195部,加上提点官札马鲁丁家内诸般合使用文书47部,总共收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为242部。这些典籍是政府保存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些是1270—1273年第二次出访马拉格的爱薛回国时带回,交给了当年成立的秘书监^②。王士点、商企翁《元秘书监志》列出的有关书目如下:

(1) 兀忽列的四壁算法段数十五部

兀忽列的(Uqlidi)是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田坂兴道考证是伊朗天文学家纳速刺丁·杜西校订本的欧几里得(Tahrīru Kitāb i Uqlidisi fi al-Handasati)^③。此外,一定还有麦海丁·马格里布编订的欧几里得。

①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② 沈福伟:《元代爱薛事迹新论》,《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0—109页。

③ 田坂兴道:《中国に於ける回教の传来ヒきの弘通》(下),东京,1964年。

(2) 罕里连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

原名误作罕里速窟。该书是哈桑·马拉喀什的《始终归元论》(Jāmi‘ al-mabadi wa-l-ghāyat)。

(3) 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

罕答昔牙为几何学,此书定为几何或三角的名著。具体书名待考。

(4) 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

埃及的希腊天文学家托雷美的《行星体系》,是麦海丁·马格里布编选的《行星体系萃编》(Khulaṣat al-Mijisti)。

(5) 阿堪诀断诸般灾福(部数不明)

麦海丁·马格里布的《天体积年指断》(Kaifiyat al-ḥukm ‘alā taḥwil sini-l-‘alam)。阿堪(al-ḥukm)意为指断。

(6) 蓝木立占卜法度(部数不明)

蓝木立(Rammāli)是沙卜,开罗至今有以贝壳投沙占卜的习俗。^①

(7) 麻塔合立灾福正义(部数不明)

麦海丁·马格里布的《实用阴鹭入门》(Kitāb al-madkhal al-mufid fi ḥukm al-mawālid)。

(8) 海牙剔穷历法段数七部

比鲁尼的《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al-Birūni: al-Qānūn al-Mas‘ūdi fi al-Hay’ah wa’l-Nujūm)。

(9) 阿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

Hisābiya 本指算学,此处当系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刺子密(780—C. 850)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Hisāb al-Jabr wa’l-muqabalah),为中古最伟大的代数著作。原本已佚,十二世纪有贾拉尔的

^① 马坚:《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光明日报》1955年7月7日。

拉丁译本。

(10) 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

积尺(al-Zij)是天文表。诸家历中首先是1272年由马拉格天文台的纳速拉丁·杜西主编完成的《伊儿汗天文表》(al-Zij al-ilkāni),书分四卷,合编希腊、阿拉伯、波斯、中国历法。

(11) 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四部

麦海丁·马格里布的《十二宫行星会合考》(Kitāb al-ḥukm 'alā qirānat al-Kawakib fi-l-buruj al-ithnā 'ashar),简称《十二宫行星》(Kitāb 'ashar al-Kawakib),音译“速瓦里可瓦乞必”。

(12) 撒那的阿刺忒造浑仪香漏八部

撒那的阿刺忒即“浑仪”(San 'at 'alāt)。

(13) 撒非那设(诸)般法度纂要十二部

待考。

提点官家内诸般合用文书四十七部。

(14) 亦乞昔儿烧丹炉火八部

亦乞昔儿(al-iksir)即是“金丹”,烧丹炉火著作中,首应有查比尔或托名查比尔的书。还有十三世纪下半叶伊拉克人阿布尔·卡西木的著名论文:《种金术知识》(Kitāb al-'Ilm al-Muktasab fi Zirā 'at al-Dhahab)。

(15) 忒毕医经十三部

医经(Ṭibb),首推伊本·西纳《医典》(al-Qānūn fi al-Ṭibb)。此外,也应有伊本·贝塔尔:《医方汇编》,埃及犹太药学家库钦·阿塔耳(al-Kuhīn al-'Aṭṭar)编订,在穆斯林东方流行的《官药手册和贵人宝鉴》(Minhāj al-Dukkān wa-Dustūr al-A'yān)等。

(16) 艾竭马答论说有无源流十二部

伊朗卡兹维尼(Kazwīnī)的《动物奇观》('Adjāib al-makhluqāt wa-Gharā'ib al-Mawjūdāt)等。

(17) 帖里黑总年号国名三部

塔巴里的《历代先知和帝王史》(Ta'rikh al-Rusul wa'l-Mulūk),阿布尔·法拉吉《各国史纲》(Ta'rikh Mukhtaṣar al-Duwal)等。

(18) 密阿辨认风水二部

《幽玄宝鉴》(Mir'āt al-ghaib)等。^①

(19) 福刺散相书一部

Firasat 是相术,中译福刺散。

(20) 者瓦希刺别认宝具五部

以埃及人希哈卜丁·帖法希的《宝石审美》(Azhār al-Afkār fi Jawāhir al-'Aḥjar)为最流行。

(21) 黑牙里造香漏并诸般机巧二部

叙利亚天文学家乌尔迪('Urdī al-Dimishqī)有《天文观察的艺术和理论与实践知识》(Risāla fi Kaifiya al-aṣṣād),列举马拉格天文台各项仪器的制作。

(22) 她艾立诗一部

她艾立(shā'iri)是诗。可能是波斯最大的苏菲诗人贾拉丁(Jalāl al-dīn Muḥammad al-Rūmī)的诗。他在1273年完成了数达二万六千多行的哲理诗。

明代为适应频繁的外事活动,培养翻译人才,在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设立四夷馆。明人王宗载《四夷馆考》共列十馆,上卷收鞑靼馆、回回馆、西番馆。回回馆规模最大,附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占城、日本、真腊、爪哇、满刺加。回回文字,当以波斯语为主,但既附有“天方”,可知阿拉伯语也是重要语种。馆中译字生负责翻译诂谕、来文和杂字,课本叫《华夷译语》,1382年由火原洁等编译,以德国柏林

^① 马坚:《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光明日报》1955年7月7日。

图书馆收藏的一种本子内容最多,共分二十四编。到1566年,回回馆虽仍有教师一二人,但已无子弟入学。清初,四夷馆改名四译馆,隶属翰林院;1748年改称会同四译馆,直到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才撤销。

明代一些阿拉伯的术语已逐渐通用,并流传至今。如虎儿班节,明人许进《平番始末》卷下已见录用,今译库尔班、古尔邦,原文是Kurban(宰牲)。速檀,或译速鲁檀、素勒坦(《献征录》)、锁鲁檀(《明英宗实录》)、算端,原文Sultan,是君主,今译苏丹。哈只,今译哈吉,通用哈只,是参加过麦加朝圣的朝觐者(Hājj)。舍黑,原文Shaikh,是“长老”,又写作舍赫、筛海、夏依赫。火者,hōja,又译霍加,是对教师的尊称,意为师长。满刺,manla,是对穆斯林学者的尊称,又称满拉,今新疆通称毛喇、毛拉。麻札,mazar,是圣地、圣坟墓;拱北,Kubba,是圆屋顶建筑,今陕、甘、宁、青苏非派穆斯林广泛使用,专指门宦教主墓地或教主修道处,是门宦活动中心。

明末穆斯林宗教学识贫乏,有胡登洲(1522—1597年)在陕西咸阳倡导经堂教育,于是有学者、经师大批涌现。经堂授课所用课本,到清末才逐渐完备,总计各地所用有十四门课程,阿拉伯文课程有八门:《连五本》、《遭五》、《满俩》,都是文法书;《自亚尼》是波斯赛尔顿丁所作修辞学;《伟戛业》是教法书;《者俩来尼》是埃及学者者俩丁的经注学;《戛尊》也是经注学;《客俩目》是认主学。另有《虎托布》等六门波斯文课程。

清初一些伊斯兰经师在授课并用汉文著书之外,还开始翻译阿拉伯文经籍,撰写阿拉伯文语法著作。苏州人张中(约1584—1662年)1653年在扬州将《率苏里》(Faṣl)由阿拉伯文译成中文,改名《四篇要道补注便蒙浅说》,回到苏州后便刊印成书。继张中之后,上元(今南京)人刘智(约1664—1730年)编译了传世的三部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他另有许多译著印本流传,

《天方字母解义》、《天方三字经》等可以列入最早的阿拉伯文典之中。刘智又曾用阿拉伯文翻译清朝典礼,但稿已失传。十八世纪下半叶,经堂教学使用的阿拉伯文课本为便于学子研读,出现了用汉文拼读阿拉伯文经文的《汉字赫听》、《赫听真经》,并有汉阿对音的译注本,如《经汉注解赫听》。使初学者得以逐步深入阿拉伯文字的堂奥。

中国穆斯林著述最富的马德新(1794—1874年),是赛典赤·赡思丁的二十一世孙^①。他一生用汉文、阿拉伯文写作的著作有三十五种,其中有些是同时用两种文本刊印^②。他曾校补刘智《天方字母释义》一卷,同治二年(1863年)刊印;并有阿拉伯文本《算来夫》(al-ṣarf al-Muṭṭasiq)一卷,汉文与阿拉伯文本《天方历源》一卷,都属研究阿拉伯文法、天文学的专著。云南新兴(今玉溪)人马联元(1841—1903年)是继马德新之后周游各国,并且主张学经可以中阿两种语言并授,在新兴大营开始用汉文从事经堂教育的第一人。一生译著二十多种,有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写作的。讲阿拉伯文法、修辞的有《米府他哈》(Miftah),《哈哇遂来》(Hawaşil),《摆天乃》(Bayān al-Muṭṭasiq),多在云南木刻刊印。成为一套讲授阿拉伯词法、语法、修辞学基础的教材,后来为各地清真寺教学所采用。

在今天维吾尔语中,许多词语直接来自阿拉伯语。伊斯兰历十二个月份的阿拉伯语原名,仍是维吾尔语的通用语。在通用汉语的回族中,夹杂了许多阿拉伯语汇、波斯语汇。伊斯兰教每天的五次礼拜,虽各有汉名,但回族仍喜使用阿、波语称呼。用阿拉伯语称呼伊斯兰历十二个月,是回族的习惯,以便按宗教信仰的习俗核算斋月、朝觐月、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的确切日期。在日常生活用语中,阿拉伯语汇也是

① 马安礼:《马公复初墓志》。

② 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1992年版,第426—428页。

回族经常借用的,例如,称“孤儿”为“雅梯目”(Ytim),“贫民”为“法格勒”(Fagir),“长者”为“晒衣赫”(Sayih),“疾病”为“比吗勒”(Bimar),“朋友”为“朵斯梯”(Dasti),“食品”为“塔阿目”(Ta‘am),“笔”叫“盖来目”(Galam),“书”叫“克塔布”(Kitab),汉文书籍称“汉克塔布”。^①

^① 林松等:《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03页。

第五章 中国和土耳其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中土两国的历史关系

现今的土耳其国位于亚洲最西北的小亚细亚。自 1453 年土耳其人占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建立起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起，土耳其民族便散居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各地。

土耳其民族，中国古译突厥民族，自六世纪上半叶崛起于柔然汗国之后，先后在北亚和中亚建立了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和中国的隋唐两朝关系极为密切。突厥移民在唐、宋时代曾成批进入河套和河西地区，突厥名马如骨利干马、葛逻禄马等也曾在内地繁殖。西突厥汗国在统治区内铸造货币，十九世纪在热海（伊塞克湖）北岸凡诺依出土的这种西突厥货币，上面铸有突厥文，有的是汉文和突厥文同时刻铸，在政治上表示西突厥汗国是唐朝的一部分。十世纪后，塞尔柱土耳其人曾在中亚、伊朗和伊拉克建立政权。十二世纪初，塞尔柱苏丹马斯欧德占领了小亚细亚的科尼亚。科尼亚和开塞利之间的肥沃

平原和希腊居民,使土耳其人在这里获得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根据地。他们的国家,仍然被穆斯林当作拜占庭帝国人民而称作罗姆(Rum,Rumi)。但在基利杰·艾尔斯兰二世去世后,这个塞尔柱国家又告瓦解。

和拜占庭斗争最终取得成功的土耳其人,不是塞尔柱人,而是奥斯曼人。奥斯曼王朝的创始人奥斯曼(1258—1326年),在1288年时将塞尔柱苏丹赐给他父亲的封地,从小亚细亚卡拉苏流域的索古德向南扩展。他的儿子奥尔汗,从科尼亚的毛拉维教派的领袖那里获得苏丹的称号。1326年奥尔汗征服了奥林匹斯山脚下的布鲁萨,作为奥斯曼王朝的都城。但此时的奥斯曼仍是科尼亚的藩臣。在穆罕默德(1451—1481年)时,他结束了对卡拉曼的战争,在1453年5月29日攻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就此倾覆。1517年埃及被并入奥斯曼帝国。苏丹赛里木正式接管了流亡在开罗的阿拔斯哈里发的职权。赛里木的儿子苏莱曼(1520—1566年)时代,帝国进入了极盛时期。

中国和小亚细亚有接触是在罗马时代。罗马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执政时,从罗马迁都拜占庭,号为新罗马,取名君士坦丁堡。城堡这个希腊字Polis(Polin)单独使用时,便当作“首都”使用,中国最初音译成“拂菻”。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张轨统治的前凉,占据河西走廊,当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原注:力禁切)作,奇状,并人高,二枚”(《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引《前凉录》)。接着,双方便有使节往还。晋穆帝(345—361年)时,罗马使者确已到达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将拂菻译作“蒲林”,更加附合希腊名称,不如北方那样得从波斯语、阿拉美语中转译。363年东晋哀帝司马丕表示答礼,派出使者假道河西走廊前往君士坦丁堡。《晋起居注》说:“兴宁元年闰月,蒲林王国新开通,前所奉表诣先帝,今遭到其国慰谕”(《太平御览》卷七八七)。这是在罗马皇帝朱里安(361—363年)秉政时,中、罗双方通过西亚陆路,经小亚细亚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

中国和土耳其东部亚美尼亚的关系,在二、三世纪时颇为密切。埃德塞人巴尔塔用希腊文写成的《中国史》中,已提到亚美尼亚王圣格里哥莱的弟弟索伦曾逃亡到中国。中国移民在亚美尼亚王梯格雷六世(142—178年)时,已定居库尔德斯坦与亚美尼亚边疆。亚美尼亚著名的马米公族(Mamigonians),先祖即在三世纪中叶流徙入境,或即高贵乡公曹髦(254—259年)的后裔。

五世纪初,柔然兴起于欧亚草原,拜占庭通过这些草原民族取得中国的丝货。北魏时代,北魏和拜占庭同样建立了外交往来,史称普岚(Purum, Porom),是经喉哒人之口从突厥语中译出。在397年,东、西罗马分裂,罗马和东方的海上贸易停滞以后,和中国加强陆上贸易便有了新的意义。456年,喉哒、普岚国同时派使者到平城(今大同),465年又有普岚国献宝剑。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出现了从波斯语转译的伏卢尼(Fromi),伏卢尼是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城,当时小亚细亚和中国的交通命脉便以此地为枢纽。它是丝绸之路在西亚通过的中道的终点,可以和北方黑海沿岸通往拜占庭的北道、南方经利凡特通往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南道并称。罗马玻璃器也通过这条交通线,由此东运中国北方。在中国已发现的东罗马三枚金币中,最早的是利奥一世(457—474年)时所铸,出土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毕克镇东北水磨沟口水库工地,属币制改革后金币“索里特”。另有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查士丁尼二世金币^①。它们是双方商业往来的佐证。安提阿克在三世纪的《魏略》中,早就称作驴分城,由于它和中国北方有过贸易往来,《魏书·西域传》(今本据《北史》补)也就只知有这个普岚(伏卢尼),而不知有君士坦丁堡了。

隋代中西交通三道,北道经突厥可汗庭到拂菻国,走的是黑海。

^① 另一枚出土于西安北门的一座高宗或武则天时的墓中,为七世纪中叶中亚仿铸的希拉克略(610—641年)型的铸币。

拂菻这一波斯语译名再度起用于中国北方,而且为后世所传习。唐代来华的拜占庭使者,自643年至742年共有七次之多。其中三次通过基督教会与唐朝进行官方的磋商。拜占庭一代雄主希拉克略(610—641年)死后,所属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相继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拜占庭于是以教皇狄奥多罗斯(642—649年)名义派出使者,越过阿拉伯人的封锁,抵达长安,当时正是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Papas Theodorus)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旧唐书·拂菻传》)。这次由教会出面充当国使的外交活动,旨在求得解除阿拉伯入侵的危机。667年拂菻王又遣使赠底也伽。701年和711年,拜占庭有使者到长安^①。719年正月,拜占庭又通过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该年又派大德僧(景教僧正)来华。到742年5月,大德僧再次抵达中国。拜占庭所受阿拉伯人的威胁仍未解除。直到782年,哈里发麦海迪的儿子哈仑对君士坦丁堡发起最后一次围攻,拜占庭摄政爱利尼皇后被迫乞和,答应每年向哈里发纳贡,从此边境无事。《旧唐书》将此事放在拜占庭第一次使节来华之后,“自大食强盛,渐凌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然后又叙述其余各次使节,易于产生年代上的误会。阿拉伯军队四次对拜占庭远征,有两次包围了这座希腊文明的中心,其中一次是716年麦斯莱麦统率的大军所为。《旧唐书》中的大将军摩拽是麦斯莱麦。^②

《旧唐书·拂菻传》卷一九八记述的拜占庭,全是当时实情。它介绍:“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

① 这711年的一次,《册府元龟》卷九七〇云:“景云二年十二月,拂菻国献方物”。按阳历计算,已在712年1月3日。

② 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研究《旧唐书》有关文献甚详,他将摩拽释作乌玛叶朝建立者穆阿威叶(摩亚美亚),因此以为和事实颇有出入。

四百,邑居联属。其宫宇柱栝,多以水精瑠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描述都城宏庄富丽,石砌城墙,尤绝高峻。“自外至王宰,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第二门之楼中,悬以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在唐人心目中,希腊文明的光华仍照耀在拜占庭的土地上,它是一种仅次于昔日波斯文明的文化体系。

拜占庭使者来华,大约要经过在伍玛叶朝时仍保持独立的陀拔斯单。到八世纪中叶,陀拔斯单丧失独立,拜占庭只好与唐朝停止官方接触。

在拜占庭与中国隔绝三个世纪之后,重又出现的拂菻使节,在元丰四年(1081年)10月通过西大食(叙利亚)、于阗、回纥、青唐抵达宋都汴梁(今开封)。《宋史》卷四九〇称这个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Malik Shah)、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又说:“历代未尝朝贡。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Malik-i-Rum Kaisar)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元祐六年(1091年),使者又两次来华,宋朝回赠其玉帛二百匹、白金瓶、裘衣、金束带。此后双方未见再有使节往还。

在小亚细亚历史上,当塞尔柱土耳其在西亚建立起庞杂的帝国时,艾勒卜·艾尔斯兰向安纳托利亚发动了进攻,在托罗斯山区和西里西亚出现了许多独立的亚美尼亚小国,和希腊政权之间不断争战。艾勒卜·艾尔斯兰的儿子马立克沙(1072—1092年)继位后,为了惩罚同族的背叛者库特卢米什,将他的儿子苏莱曼和许多土耳其盗匪一起放逐到小亚细亚。苏莱曼对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发动进攻,并在

1081年一度在尼加亚这个与拜占庭邻近的地方,建立了占领区。来自小亚细亚的拂菻使者正是苏莱曼所派,使者你厮都令厮孟判是个聂思托利派的僧正。苏莱曼的根据地在库尔德斯坦西部的马拉提亚。1084年时,苏莱曼夺取了安提阿克,希望在地中海东部建立政权。与他东南邻接的便是马立克沙的领地。1086年苏莱曼死后,他的儿子基利杰·艾尔斯兰(1086—1107年)连年与土耳其人的领袖达尼什曼德作战,1106年达尼什曼德在与拜占庭人和十字军的作战中死去,基利杰·艾尔斯兰才获得马拉提亚,定都马亚发里根^①。接着他的儿子麦斯欧德占领了科尼亚,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塞尔柱政权。1091年来华的使团就是基利杰·艾尔斯兰所派。使团显然企图从中国那里获得共同对付塞尔柱的马里克沙政权的某种支持,并开展长途的队商贸易。宋代拂菻使者三次来华,是中国和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政权首先建立的外交接触,所以史称“历代未尝朝贡。”

蒙古西征,土耳其东南部小亚美尼亚王海敦一世(Hayton I, 1224—1269年)归降蒙古军。贵由汗登位时,海敦派胞弟辛柏德前往哈拉和林朝贺,从1248年出发,到1250年与鲁姆国苏丹吉亚斯丁的儿子一同归国。建都科尼亚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的鲁姆国,当1243年卡伊豪斯劳二世被蒙古人击败后,依靠巨额贡金仍在蒙古势力下保持着独立。但到了他的儿子手里,为了争夺王位,倾向于和马木鲁克人结成联盟,最后遭到伊儿汗阿八哈的惩罚,失去了独立地位。夹于罗姆国和蒙古汗国之间的小亚美尼亚,不得不向蒙古人屈服。海敦一世在蒙哥登位后,1254年奉拔都之命前往伏尔加河,继至哈拉和林朝贺。回国时在塔拉斯城见到了整装待发的旭烈兀,于1255年7月

^① [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中译本据1980年英译本译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01—303页。夏德、白鸟库吉均曾考订拂菻使者来自科尼亚,但年代上至少有二三十年之差。

底重返西里西亚的西斯城。1331年虞集《经世大典地里图》中有一个地名“丹牙”，是位于地中海沿海梅尔辛湾的城市阿达纳(Adana)，这是《经世大典地里图》中距离中国本部最远的地名之一，位置与图中译作“迷思耳”的埃及仿佛；前者在地中海北的土耳其境内，后者在地中海南的埃及。

明帝国建立后，小亚细亚形势大变，昔日的奥斯曼已经日益壮大成一强国。当撒马尔罕的帖木儿西征，将奥斯曼苏丹白牙济德的大军击败，1403年3月白牙济德死后，帖木儿便班师东归。此后白牙济德的几个儿子纷纷起而争夺地盘，最后穆罕默德战胜了他的反对者，重新统一了小亚细亚。1416年穆罕默德在土麦那(伊兹密尔)以西的卡拉布隆岬将反对他的信仰神秘主义教义的叛乱者镇压下去。随后，在1419年，他派出的使团到达北京。这就是明代阿速和中国的第一次使节。《咸宾录》卷四说“阿速，西海中为稍大国也。永乐中遣使百十二人朝贡。其地多撒马儿罕、天方诸国人”。《明史》卷三三二记阿速：“阿速，近天方、撒马儿罕，幅员甚广。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鱼盐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恶斗。物产富，寒暄适节。人无饥寒，夜鲜寇盗，雅称乐土。永乐十七年(1419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贡马及方物，宴费如制。以地远不能常贡。天顺七年(1463年)命都指挥白全等使其国，竟不复再贡。”这里指出阿速是地中海、爱琴海中比较重要的国家，已雅有乐土之称，位置在撒马尔罕和天方两地互通的队商贸易线上。酋长牙忽沙即穆罕默德·本·白牙济德苏丹，阿速是奥斯曼家族最初的译名。1419年3月，伊朗的设拉子、伊斯法罕也有使团来华，5月使团辞归，明朝派中官鲁安、叶先率使团随往设拉子(《明太宗实录》卷二一〇、二一二)。阿速使团一定也伙同伊斯法罕使团来华，这时正是中国和撒马尔罕、伊斯法罕积极开展官方贸易之时。1421年穆罕默德在亚德里安诺堡去世后，长途队商贸易便告中断。1463年2月，明廷再度决定派都指挥佥事白全、百户白暹使阿

速,同行的有都指挥同知海荣、指挥使马金使哈烈,指挥使詹昇、葛春使撒马儿罕(《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九)。使团抵达目的地时,奥斯曼人早已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从1462年秋天开始,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1451—1481年)卷入了在他的希腊领土上唯一可以和他抗衡的威尼斯的战争之中,因此和遥远中国的贸易未能继续下去。中国使团一定带去了许多名贵的瓷器和锦缎,充实了在1464年兴建的萨莱伊宫(现为托普卡皮·萨莱伊博物馆)。

塞尔柱土耳其人的鲁姆国,在蒙古时代曾出现在哈拉和林接待的使团中。明嘉靖三年(1524年)才再有队商取道赫拉特、吐鲁番经甘肃到北京,史称鲁迷“去中国绝远”(《明史》卷三三二),或说“鲁迷不详所始,或云地属哈烈”(《皇明世法录》卷八一)。“地属哈烈”显然是误会,是因来使一定要经过哈烈(赫拉特)之故。鲁迷使团从甘肃入贡狮子二、西牛一,被边关上查出有吐鲁番人混在使团内,而吐鲁番正连年入侵。最后北京还是受了礼。于是1526年冬(1527年1月),又有使者以狮、牛入贡,并嫌回赐物不足抵偿所费二万二千余金,要求加赐。路上花费七年,据说是本国王子差往瓦刺卖狮子、西牛的,要求有更多的绢疋抵值。入境后一切费用都由中国官方负担,所以明廷规定五年一贡,每次限十多人。使者的贡物有玉石、珊瑚、珠、金刚钻、花帐子、舍列孙皮、花瓷汤壶、羚羊角、锁服。1543年、1548年和1554年,鲁迷使团继续来华。1543年的一次,鲁迷使团和天方、撒马尔罕等国队商一同结伴而行。1544年贡使回国时,在甘州抵御入侵的蒙古人,死了九人,明廷为之震动。这次使团多达九十多人(《明世宗实录》卷二八二),大约使用了奥斯曼铁火铳。到麦加朝圣是这些使团连年奔波的主要目的,同时也通过麦加的联络,他们又远赴中华大地。1554年是鲁迷使团赴华最后的一次。这五次使团,都是在奥斯曼帝国吞并埃及、攻占大不里士和巴格达之后,在一代雄主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执政期间所进行的。于是伊斯坦布尔宫廷中珍藏的

成千上万件名贵华瓷的来源,也就有了比较可信的解释,因为它们不全是苏丹从大不里士作为战利品搬迁所得,可以通过和中国建立的经济联系直接取得这些被新兴的帝国视作绝顶珍贵的器物。当然,赛里木苏丹(1511—1519年)确曾派军在1514年9月5日到9月13日将大不里士的八乐园宫中大批珍品特藏收刮一空,其中便有一批明瓷在内。苏莱曼一世也在1534年、1548年、1553年三度入侵波斯,一度占领大不里士,当然也把当地收藏的华瓷当作了战利品。

在清代,官方的接触彼此已很少见,但民间的,特别是间接的经济往来仍维系不断。跨进二十世纪时,当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901年登基二十五周年时,光绪皇帝特派员赠以精美的工艺品,上有纯金镶嵌的亭台、金银雕缕的人物和用珊瑚串连的林木。至今,这些礼品还陈列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萨莱伊博物馆中,象征着二千多年连绵不绝的中上民族友谊。

第二节 物产和知识的交流

一、罗马时期

《魏略》列举罗马出产的亚麻织物中,有出在弗利基亚的缙特渠布、由奥朗特河命名的阿罗得布,以及名噪一时的西里西亚的五色桃布,桃布是主要产地塔索斯的简名。在三、四世纪驰名中国南北的大秦织物氍毹,以羊毛为主,和各种兽毛混纺,其中也有小亚细亚的产物,吕底亚、萨迪斯、弗利基亚和西里西亚都织造羊毛,远销东方。

小亚细亚的羊毛纺织与染色工业,在罗马世界中,可与之相匹敌的唯有叙利亚。在遥远民族的眼中,这种神奇的羊毛纺织业具有神秘的传说色彩。埃及的毛织业,中国人以为出在水中,有水羊毳的传说。

小亚细亚的毛织业在寒冷的北方,于是有地生羊的传说。最早记述地生羊的是杜佑《通典》一九三“大秦”条:

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于土中,候其欲萌,筑墙院之,恐为兽所食也。其脐与地连,割之绝,则死。击物惊之,乃惊鸣,遂绝,逐水草,无群。

比杜佑晚一个世纪,段公路《北户录》也有类似的说法,却指明地点在拂菻:“拂菻国有地生羊,其羔生土中,国人筑墙围之。脐与地连,割之则死,但走马击鼓以骇之,惊鸣脐绝,便逐水草。”这地生羊的故事,在中世纪晚期,竟成了斯基泰的故事,但一变而成了棉花^①。这故事和罗马人长期设想中国的蚕丝产在树上一样,具有幻想的色彩。

拜占庭医药在唐代已著称于中国。860年左右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述许多波斯香药、花木,列举波斯名称之后,常附有拂菻名称,或供药用,或作食用,或以压油。如婆那娑,出波斯,亦出拂菻,称为阿菹鞞树;槃拏穉,出波斯,亦出拂菻,呼为群汉树;齐墩,出波斯,亦出拂菻,呼为齐廬;馥齐,出波斯,拂菻呼为琐勃梨啞(Xelbanita);波斯皂荚,波斯称忽野檐默(Xaryadzambax),拂菻呼为阿梨去伐;没树(murd,番石榴树),出波斯,拂菻呼为阿缙;阿驿(无花果),波斯称阿驢,拂菻呼为底称。段成式可说是第一个将波斯药用植物和叙利亚、小亚细亚、亚美尼亚药用植物加以对照,并注明用途的中国专家。比段成式早一个世纪的郑虔《胡本草》,或许已有这种记录,但书已佚失。

唐代还知道拂菻出产的阿勒勃(山扁豆),状似皂荚而圆长,味甘好吃。没食子,不但波斯人食用,而且也出产于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和

^① 1887年英国亨利·李在所著《植物羊》(Henry Lee, *The Vegetable Lamb—Plant of Tartary*)中,以为自希罗多德至齐奥夫拉斯托都说印度树上生羊毛,后来又变成了地生羊的故事,这植物羊便是棉花。但亨利·李没有注意到东西方之间对于远国物产都具有的那种好奇,使得这种传说在不同时代具有了不同的内涵。

叙利亚。状如红蓝的郁金香,四、五月采花,《魏略》说产在大秦,杨孚《南州异物志》以为出在罽宾(克什米尔至喀布尔河流域),《周书》以为是波斯产品,而小亚细亚是郁金香故乡。十六世纪荷兰人在土耳其发现后加以引进,以土耳其名字 tulpen(土耳其花)相称,再转成 Tulipe(郁金香)。迷迭香(*Rosmarinus officinalis*),属唇形科常绿小灌木,《广志》说出西海,见于地中海东部。曹植、应旸各有赋赞颂,至少三世纪初已移栽于黄河中游。野悉蜜(耶悉茗、耶悉弭)花(*Jasminum grandiflorum*),又称素馨花,段成式说,出拂菻国,亦出波斯国。这种花叶似梅叶,四时敷荣,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西亚地区常采花压油,制成芳香滑润油。棕祇,阿拉伯文 narjis,亚美尼亚文 nages,今称水仙。段成式说出拂菻国,茎端有花六出,花色红白,可以压油,涂身除风气。据说拂菻国王和国内贵人都用这种油。水仙在新春佳节开花,被看作新岁的瑞兆,为民间所喜爱的吉祥之花。在《花史》中,载有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十二盆,此种风气岂非受到拜占庭的催发?明清以来,水仙以产在嘉定、苏州、漳州等地的水仙头最为有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的中国水仙(*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nsis*),正是南欧水仙的一个变种,是拜占庭文明在东方传递的一个花种。也是1987年在上海评选出的中国十大名花中,唯一自海外传入后又经精心培育的名花。

拜占庭的一种被称为万能解毒剂的底也伽(Theriaca),在667年被使者带到长安,献给唐高宗。这种药初见于公元前三世纪科洛丰的尼卡特,用来治疗各种动物咬伤引起的中毒,后来彭多斯国王米士里达特(前132—前63年)将它变成一种万能解毒药,普林尼和盖伦都使用过这种药,配方多到六百种,后来增入蛇胆、鸦片。中国人最初接触鸦片,便是由于用了出产在小亚细亚阿飞勇(鸦片)的这种底也伽药丸。拜占庭医生善治眼病,“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740年康国使者向长安进赠水精眼药瓶子,大约也是拜占庭的制品。明初编印的

《回回药方》卷三十目录杂证门中,尚有“福禄你牙亦鲁迷方”(Fulūniya-i-Rūmi),亦即鲁迷药方。明初周宪王朱棣等编《普剂方》一六八卷中有眼科方,也用了鸦片:“用可铁刺(西黄耆)、阿飞勇(鸦片)一钱,李子树胶(阿拉伯胶)四钱,白雪粉(锡粉)八钱为末,鸡子白调作锭,每以乳女儿汗磨点之。”

拜占庭文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景教的传入。景教是基督教中的一支,由聂斯脱里创立,428年出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斯脱里由于教义上的分歧,不承认基督的神性,被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斥为异端,聂斯脱里才被迫出走波斯,教徒纷纷往中亚和中国布道。景教徒初期都能治病,如景崇一度为唐玄宗长兄李宪治病,手到病除。

建筑工程知识的东传,可能也与景教僧侣有关。拜占庭的凉亭在唐代宫廷中曾有仿造的史迹。“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器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如此”(《旧唐书》卷一九八)。这种建筑技巧曾被唐玄宗的宫廷建筑师所仿效。玄宗造了一所凉殿,召拾遗陈知节询问国事,时当酷暑,“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霭沉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唐语林》卷四)。自从安禄山在长安赐宅亲仁坊以后,王公贵族竞相争胜,京兆尹王锷也大事营建,后来当上御史大夫,获罪赐死。当局查验他太平坊的邸宅,宅中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凜若高秋”(《唐语林》卷五)。龙骨车本是中国所造,而利用龙骨车引水设计的人工瀑布却是拜占庭的新发明,它启发了中国的建筑师,去设计一种新颖的屋宇。

中国的机械工程给予拜占庭同行以十分强烈的印象,李约瑟宁肯相信卡丹挂环的创造者决非卡丹,发明这种游动常平吊环的是二世纪的中国技师丁谧,后来阿拉伯人将这种发明纂入到公元前三世纪拜占庭费隆(Philon)的《气体力学》(Pneumatica)中了。但实际上

要到十世纪才由犹太人介绍到欧洲去。^①

桃和杏两种果树,都是中国人最早栽培的果子,先传到波斯,公元前后再传到亚美尼亚,一世纪时在希腊、罗马生长。普林尼(XV, II, 13)和哥伦美亚分别称作波斯果和亚美尼亚果子。杏的学名 *Armeniaca Vulgaris* 就这样定下了。

对拜占庭人来说,中华文化最重大的传导是养蚕、织丝技术的引进。在查士丁尼(527—565年)时代,拜占庭和波斯在红海和陆上贸易的竞争激烈,拜占庭又和信奉犹太教的希米雅尔国王发生冲突,从中国进口的丝帛大受阻挠。531年后,查士丁尼派使者要求红海西岸的阿克苏姆确保红海商业利益,然而丝绸运输仍无契机。正在这时,一些来自赛林达国(新疆)的印度僧侣,在552年抵达君士坦丁堡,向皇帝介绍了育蚕的知识,并获准前往印度取蚕种。不久之后,他们从赛林达取得了相当数量的蚕卵,从此拜占庭开始了自己的养蚕业。在拜占庭统治下的那些原来仰赖进口中国缣素重新加工纺织的地中海东部城市,也开始摆脱波斯的阻挠,得以重振旧业。542年,查士丁尼宣布由国家专营丝织工业,到引进蚕种,解决丝业原料,拜占庭丝织业才有新的起色。

由于拜占庭受到阿拉伯势力的侵扰,通过里海和黑海取得中国丝货具有了比之过去任何时代更加迫切的需求。分布在天山和里海间的铁勒民族,和从中国西迁的可萨突厥,充当了中国和拜占庭之间丝绸贸易的中介商。高加索是中国丝绸和拜占庭锦锻、粟特锦合销的地区。北高加索西部基斯洛沃茨克附近的哈萨乌德,1885年以来时有古代丝绸出土,1967年更出上八、九世纪丝织物残片65件,粟特锦以外,也有拜占庭锦和唐绢、波斯锦。哈萨乌特以西大拉巴河的支

^① 李约瑟:《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144页。

流巴勒卡在二十世纪初发掘的莫赛瓦亚·巴勒卡墓葬,出土丝织品有 143 件之多,除粟特产品占半数外,中国和拜占庭制品各占 20% 左右^①,粟特产品中,恐怕也不乏新疆的仿制品在内。同墓还见有残存文字三行的汉文账册。^②

二、土耳其时期

1081 年,位于今土耳其境内的拂菻使者来华,展开了土耳其时期的中土关系的序幕,此后,双方便有人士来往。现在可以查考到的,有祖籍亚美尼亚的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在南宋乾道七年(1171 年)卒于泉州,《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留有泉州保存的此人墓碑。中世纪地中海世界普遍使用的洋红染料,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有生于橡树的 *Kermes insect*,还有高加索种的 *Porphyrophora Kammeli*,是来自阿拉拉特山麓的一种染料,著名的亚美尼亚红就取自这种植物。元代进口用于宫廷毡褥的“茜红”,成分已很复杂,不限于茜草,内中就有这种染料。当时宫廷地毯染红所用茜根有哈刺章、西番、陕西、回回之别,回回茜根即有来自亚美尼亚的,经撒马尔罕转运来华^③。亚美尼亚又是中世纪出口蓝靛的中心^④,中国进口蓝靛,除伊朗、印度外,当也有来自亚美尼亚的。

在元代有河西甸子,文理粗于纳沙布尔的回回甸子,称乞里马泥,是中国所熟知的绿松石。乞里马泥,恐非伊朗的克尔曼(*kirm-*

① A·A·雅鲁莎李姆斯卡娅:《论中世纪早期北高加索的丝绸之路》,《苏联考古学》1967 年第 2 期。

② A·A·雅鲁莎李姆斯卡娅:《丝绸之路上的阿兰世界》,埃尔米塔什博物馆,1978 年。

③ 《大元毡褥工物记》,《广仓学会丛书》甲类二集。

④ 海特:《古代利凡特商业史》(W. Heyd,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Ages*, Leipzig), 1923, II, 75, 83。

an),而是塞尔柱土耳其的根据地卡拉曼(Karaman),在塞浦路斯岛以北的小亚细亚。乞里马泥,又是土耳其绿松石的别称,近代欧洲人常称绿松石为土耳其玉(Turquoise)。

小亚细亚在中世纪一直是明矾的主要产地。中国早从波斯、罗马进口明矾。宋元时代通过于阗,明矾也从小亚细亚运入内地。可供炼丹,可以矾绢,可充清洁剂,以净水。水银(汞)也是小亚细亚的重要矿产。陈霆《墨谈》记有拂菻国水银:“拂菻国当日没之处,地有水银海,周围四、五十里。国人取之,近海十里许,掘坑井数十,乃使健夫骏马皆贴金箔,行近海处。日照金光晃耀,则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其势若粘裹,其人即回马疾驰,水银随赶。若行缓,则人马俱扑灭也。人马行速,则水银势远力微,遇坑壑而溜积于中。然后取之,用香草同煎,则成花银。此与中国所产不同。”

还有一种贡狗,《通典》卷一九三已有记载:“贡出西海,有养者,似狗,多力犷恶。”这种狗又叫拂菻狗,唐代武德七年(624年),高昌使者献雌雄狗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生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旧唐书·高昌传》卷一九八)。到了明代,生长在吐蕃的西番狗(西藏狗)也被输送到土耳其。十六世纪初访问中国的阿里·阿克巴尔·契达伊,在《中国志》中提到中国皇宫中有一种身材高大长毛的动物,它们像狮子一样勇猛,土耳其苏丹也豢养着一群这种狗,民间习称“萨姆松狗”(Samsani)。萨姆松一词出自喀斯塔姆拉省的奥斯曼人村庄 samsun^①,当地出产长毛的高地动物。这种狗其实是一种西藏狗,善于追捕麝、鹿等猎物,西藏也向北京进贡这种动物。后来这些狗又成了土耳其皇室的宠物。

元代自拜占庭传入中国的工艺有拂郎嵌。拂郎嵌是一种鑿胎珐

^① 《阿拔斯朝史集》(巴黎国立图书馆科技部第744号),见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0页注14。

琅,花纹与大食窑这种掐丝珐琅相仿,从利凡特、小亚细亚东传,元人因此称作拂郎嵌。元代的金锦、金线加工技术十分发达,毛织物加金叫毛缎子,风气和西亚仿佛。当时西起拜占庭,东至中国沿海,达官贵绅盛行金织衣帽与帷帐,而纺织图样又富毳路对鸟、狮团等西方格调。新疆阿拉尔出土的北宋时灵鹫毳路纹锦,富有装饰意味,最具拜占庭格式。元代金锦有十样锦,图案又多承袭宋代。西亚装饰风已成丝织、毛织物中不可离析的因素。

中国发明的马镫,到元代由于蒙古军队的普遍使用,已成西亚马具中不可或缺的套件。马具用玉装饰也在土耳其社会中逐渐形成风气。

源出中国大陆的各种火器,更装备了土耳其军队,使它所向披靡。在征服埃及最终摧垮马木鲁克王朝时,装有活动轮子的奥斯曼炮队轻而易举的制服了坚持信赖骑兵优势的马木鲁克军队。后来“大炮”(TOP)这个词已成土耳其的词语。奥斯曼制造的火铳,也曾从陆路运到中国。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噜密(鲁迷)人朵思麻带着噜密铳(鲁迷铳),度岭涉水,经八年到达北京,明廷任命他为锦衣卫指挥,但对他所献神器却不使用。这种鲁迷铳与西洋铳一样,也属鸟铳,比倭铳长而重,射程与威力都大于倭铳,然使用不便,制造无方,因此“都中人士罕有一问之者,”^①促成了两国交换军事技术的一段佳话。^②

中国制造的精美瓷器,更是向往奢侈而雄心勃勃的奥斯曼君主苦心追求的财富。1514年奥斯曼苏丹赛里木从大不里士八乐园(Heshtebesht)中运回君士坦丁堡的精美华瓷有57件,其中有大盘

① 赵士楨:《神器谱·进神器疏》。

② 和田博德(Wada Hironori):《明代铁炮由来与奥斯曼帝国》,《史学》31卷1-4号,东京,1961年,692-719页。

10件(含白瓷2件,褐釉4件)、小盘17件(含白瓷4件,各色瓷13件)。当年档案尚存塞拉里奥宫。该宫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为历代二十五位苏丹国王的宫室,现已辟为托普卡皮·萨莱伊博物馆(Topkapu Sarayi müzesi),意思是“大炮门宫”(胜利门宫)。苏莱曼一世在宫中厨房专门辟有收藏华瓷的一间“中国厨房”,但毁于1574年的大火。现在博物馆所列瓷器来自宫中的厨房、库房和地窖,在约一万件瓷器中,大约华瓷有8000件,包括南宋末、元、明时期青瓷1300件,元、明青花瓷约2600件,清代瓷器4000件。土耳其的塞尔柱旧都科尼亚,也有博物馆收藏的华瓷,并且不乏精品。关于托普卡皮·萨莱伊的两件铸有“大明正德年造”的瓷瓶,在伊斯坦布尔至今有着动听的传说。据称,正德皇帝(1506—1521年)向赛里木一世(1512—1520年)赠送了两件带有阿拉伯纹饰的瓷器^①,很可能是在1524年鲁迷使团抵达中国之前,确曾有过中国队商去过伊斯坦布尔。

在中西医学沟通上,土耳其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土耳其人自塞尔柱政权在科尼亚建立以来,即设置经学院,研究医学、法学、数学、几何学、建筑学。后来奥斯曼政权建都君士坦丁堡,该地一时又成东方文化的中心之一,地位不下于开罗和巴格达。

在牛痘发明以前,土耳其是将中国儿科医生早已使用的人痘法传送到英国的媒国。广泛流行世界各地、危害极为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在医学史上曾是一种难以治疗的疾病。公元二世纪时,天花由北方边外传入内地,人称“虏疮”,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已记述,天花发作剧烈会致命,幸存者也会皮肤上留下许多瘢痕。中国在十一世纪末已发明抗原接种的人痘,预防天花。明代因天花流行,医家纷纷

^① J. 波普:《托普卡皮·萨莱伊博物馆藏十四世纪中国青花瓷》(John A. Pope,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Washington, 1952, 13。波普以为这事见于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志》,是个误会。

研究医治办法,隆庆年间(1567—1572年)皖南太平县首先推广这种人痘接种秘方,后来不断改进。康熙帝在1681年从江西招聘痘医朱纯嘏到北京,先在皇室及内蒙古、外蒙古推广人痘法。1742年清政府颁布的《医宗金鉴》,就详细记录了人痘接种术。俄国闻讯,在1688年派员到中国学痘医。土耳其通过中亚细亚和俄国,学到了人痘接种技术,被英国驻土耳其公使蒙塔古(M. L. Montague)的夫人学会后,在1718年带回英国,迅速传遍欧陆。不久,美洲也施行了这种新的医术,预防天花。英国人痘医生贞纳(E. Jenner 1746—1823)积累了接种人痘的经验,在人痘的启发下,以牛为苗体,在1796年用牛痘接种成功。此法比人痘更为优越,疗效明显,从此被欧洲医界采用。

第三节 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志》

十四世纪以来,土耳其商旅时有来到中国的,也有到中国来传教的,其中不少人移居中国。主持南京净觉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即从洪武初建到弘治五年(1492年),便是鲁迷人可马鲁丁和他的子孙。他们中有人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用文字留了下来。当时最重要的土耳其著作,要推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契达伊(Seid Ali Akbar Khatai)的《中国志》(Khatāy-nāmih, Khitay-name)。这部用波斯文写成的书,共分二十章,长期以来只是一部手稿,书中声称作者在回历922年勒必拉费勒月(3月)末(1516年5月初)完成于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阿希尔·阿凡提图书馆藏有该书两种波斯文抄本,卷首有作者献给鲁迷国王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的颂词。1582年,穆拉特三世苏丹统治期间,该书由赫扎尔芬译成土耳其文,以之奉献苏丹,书名改成了《中国和契丹的法典》。很明显,《中国志》由于花费大量篇幅介绍明朝的法律和礼仪,以及军队的建制和社

会秩序的稳定,引起了号称“立法者”的苏莱曼一世和继承者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的注意。但这部《中国志》直到1853年才在伊斯坦布尔刊出了第一个石印本。1883年法国的伊斯兰学者谢费首先发现了该书的波斯文抄本,并进行研究、整理和翻译。1988年在北京出版了张至善编译的《中国纪行》,根据英译本和新波斯文版译校了全部文稿^①,并编集了各国学者研究、介绍该书的文章,使《中国志》这本土耳其人开启了解中国文化锁钥的著作,也为中国读者分享。

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之所以取契达伊(中国人)为姓,是按照当时波斯移居他地的人的习惯,将侨居地作为姓氏。有人甚至推测他的父亲是圣门后裔,故称赛义德,而母亲则是一个中国人^②。《中国志》中讲到了1450年(回历854年)英宗被也先俘虏,后来由宪宗成化继位,以后英宗复位的历史。他记录的时间跨度在半个世纪以上,但对这段历史,他混淆了许多历史事实,将景泰(1450—1456年)和正德(1506—1521年)两位皇帝都写作Kin Tai,并误称他写《中国志》时,是成化汗的儿子景泰汗当政。这种错误恐怕对一个侨商的外国穆斯林是难免的。

阿里·阿克巴尔周游中国后,在第四章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谁也不会表现出那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来。毫无疑问,穆斯林如果能恪守他们的教规,虽则两者间并无共同之处,他们一定会按真主的良愿成为圣贤。”阿里·阿克巴尔相信当时的中国皇帝正德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只不过碍于习惯势力不能公开宣布罢了。所以他对穆斯林采取的保护措施非常得力。这一说法和中国民间长期流传的传说十分吻合。阿里·阿克巴尔描述了皇

^① 波斯文本根据伊朗学者伊拉志·阿夫沙尔编辑的本子(1978年版),原稿为开罗抄本的波斯文、奥斯曼土耳其文本,由张铁伟、岳家明合译。全书共二十一章,第十八章《中国的天房》系自第十七章《中国的农业》中析出。

^② 张至善编:《中国纪行》,1988年版,第307—308页。

宫的庆典,军队的建置和布防,仓储,监狱,十二个省区,宴会和礼仪,妓女,奇妙的手艺,立法者和守法精神,学堂,农业,钱币和纸钞。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类似天方夜谭式的穆斯林传说中的中国习俗与现实。书中描述的妓女大多是犯罪人的后裔,被罚作妓女,在旱情严重时被政府驱使去祈雨,如祈雨不果,则只有等待处死。总之,《中国志》是一部西亚穆斯林眼中的中国总览,它以穆斯林的观念描述了中国统治集团的治国方针和中国各地的社会实况。此书大大胜过了在它以前二百年的《伊本·白图泰游记》。

第四节 中国穆斯林在伊斯坦布尔

在十六世纪伊斯坦布尔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智慧和文化中心以前,塞尔柱朝的首都科尼亚曾以装饰华丽的清真寺和神学院著称于世,它吸引了穆斯林世界的各地学生,其中便有来自中国新疆的信徒。库车苏菲主义教派中的依禅派相传起源于宋代理宗年间,有一位阿富汗人额西丁曾在科尼亚神学院学习,结业到库车传教,不久便成为该地依禅派领袖,教徒遍布吐鲁番、库尔勒、焉耆、阿克苏和喀什,最后死在库车,迄今陵墓仍在。

十九世纪时,中国穆斯林常在朝觐之后奔赴土耳其首都游历、深造。云南著名经师马德新便是其中之一。1841年,马德新偕同弟子马安礼、马开科等人前往麦加朝觐。出国五年之后,在1845年正月初,他由亚历山大里亚乘船到了伊斯坦布尔,一直住到七月,才赴耶路撒冷。土耳其苏丹阿布杜拉·麦吉德(1839—1861年)亲自接见了这位远方来客。此时正值苏丹的王姊结婚,在伊斯坦布尔隔海相望的于斯屈达尔举行盛大的宫廷宴会,马德新亦躬与其盛。宴会结束,由宫廷官员陪同德新游历伊斯坦布尔全城,并参观了土耳其皇家太医院,

瞻仰了各处名胜古迹,对这个穆斯林帝国印象十分深刻。回国后他将
自己的感受用阿拉伯文写进了《朝覲途记》中。

马德新的伊斯坦布尔见闻,推动着以后的朝覲者分途前往帝国的
中心,一瞻盛世华彩。云南马联元,在二十岁左右已精通汉文和阿
文,其时适逢杜文秀在大理起义,马联元便跟着舅舅前往麦加朝覲,
顺道往赴埃及、伊拉克、土耳其。在土耳其,他跟从二不都哈密德
(‘Abd al-Hamīd)学习《奈格施邦定记刻尔》。后又赴埃及,从二不都
浪宾来素礼(‘Abd Allāh bin al-Rasūl)学习古兰读法,并转赴印度
学习,学业大进,直到1874年才回到云南。1900年,60岁的马联元因
杜文秀刻印的《古兰经》版本告绝,再度倡刻《古兰经》,由高足田家培
一手写成版样。刻版至今留存,印本则遍布云南各地。二十世纪的王
宽,追迹马德新、马联元,前往土耳其考察,使中国穆斯林瞻仰当代最
大的伊斯兰帝国首都的风气大盛。

第六章 中国和埃及、苏丹 文化交流

第一节 域外地理与埃及知识

一、大秦与海西

远在非洲的埃及在中国史籍中出现,是公元一世纪后的后汉时期。一世纪起,罗马通过红海西岸阿布·绍马角的米涅斯·霍尔莫斯港(今穆赛尔港),或更在它南面 280 公里的贝仑尼塞港,在七月到九月的季风期间,取道南阿拉伯,实现了直航南印度西岸莫席里(今克朗格诺尔)的海上贸易线。罗马商人更有取道缅甸的萨尔温江或越南半岛进入中国的。印度洋繁荣的海上贸易,给中国南方带来了第一批罗马帝国的臣民,首开记录的便是公元 120 年随缅甸东南部掸国的使团经云南西部永昌郡奔赴东汉首都洛阳的埃及魔术、杂技演员。《后汉书·西南夷传》卷八十六记述了这批有乐队伴舞的演员和来自海西国的埃及:

永宁元年(120 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贡,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

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大秦(罗马帝国)东方贸易中心在埃及，因在红海、地中海之西而有海西国之称。海西国是埃及在中国最早的称谓。罗马和中国正式交换使节是在公元166年，这一年9月，“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卷八六)。安敦王是安东尼朝罗马皇帝马克·奥理略(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61 - 180)，他的使者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越南半岛中部日南郡，即现在归仁附近的海港登岸，然后由陆路北上洛阳。这时罗马使者只能从埃及启航，半个世纪前罗马皇帝图拉真重占叙利亚之后，罗马人修缮了通往红海的商路，利凡特沿海的提尔和叙利亚南部巴尔米拉的商人都都从阿喀巴湾进入红海，和埃及商人一起投入罗马帝国经营的印度洋贸易，最终目标便是丝绸之国的中国。

公元三世纪，当繁荣的罗马东方贸易进入尾声时，文献中仍有亚历山大商人冒着惊风恶浪来到交州、广州的。281年罗马商人从埃及到达广州，带来的许多引人瞩目的海外珍货中，有岭南人从未见过的火浣布，这种用石棉制作的火浣布放在火中燃烧，不但不会损坏，而且越烧越洁净，引得安南将军广州牧滕侯的文士段臣为之写作了《奇布赋》(《艺文类聚》卷八五)。284年，埃及商人的足迹可能由沿海北上，一直到了西晋都城洛阳，在文献上为三世纪埃及对华贸易的兴旺留下了另一个例子。

大秦国还有一个别名犁靛，自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占领埃及、入侵叙利亚后，中国人便以大秦国和犁靛相提并论，以犁靛或犁鞬、犁鞬鞬为大秦的别称。正始、嘉平间(240 - 253年)，鱼豢写成《魏略》五十卷，首先将大秦与犁靛相联，“大秦国一名犁靛，在安息、条支之西”^①。叙利亚应在这个范围之内。又说：“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

① 《三国志》卷三〇裴松之注引。

西。”海西是指波斯湾、阿拉伯海以西的地方。与鱼豢同时，孙吴谢承《后汉书》称：“大秦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晋代司马彪《续汉书》则说：“大秦国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到五世纪范晔撰《后汉书》才综合各家，提出：“大秦国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

大秦的别名犁鞞、犁鞞读音相近，本有以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塞琉西王国的对音，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则在1904年不约而同地考订为埃及都会亚历山大里亚的简称(A) Lek-(S)an(dria)，逐渐为各国学者所接受。《续汉书》提出犁鞞鞞这个名词，更可以为亚历山大里亚说添加佐证。犁鞞鞞，汉代古读犁支鞞，是亚历山大里亚三个城区中历史最久的柯柏特人居住区利克提(Racotis)的音译。正是由于三世纪时罗马商旅使节相继来华，因此亚历山大里亚城的详细情况也被丝绸之国所与闻。

二、《魏略》所记非洲地理

定居埃及的希腊地理学家托雷美在150年左右著有《地理学》，在西方地图学上开创网格地图。二百年后，中国的地图学家裴秀绘制“方丈地形图”，也使用了直角坐标方格系统，以确定经纬度，两者的传递过程虽不清楚，但在东西方交通与人员来往的大潮下，在地图绘制上有过交流，应是不容置疑的。在阿拉伯帝国崛起后，网格地图在西亚、埃及已被废置，而在中国却被代代相传，沿袭不衰。

三世纪时，中国和非洲（首先是东北非洲）有了直接的交往，踏上这片土地的中国人对于当时属于大秦（罗马帝国）的疆土有过记录，被《魏略·西戎传》加以转述，而以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大秦的都城，声称：“自葱岭西，此国最大，置诸小王甚多，故录其属大

者矣。”

在这篇中国人第一次写出的非洲地理中,埃及是个中心,《魏略》说:

泽散王(Adulis)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①。北至驴分(Antioch),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安谷城(Warka)相近。西南诣大秦都(Alexandria),不知里数。

驴分王(Antioch)属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

且兰王(Hierosolyma)属大秦,从思陶国(Sittake)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兰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从且兰复直西河[行]之汜复国(Heliopolis)六百里。南道会汜复,乃西南之贤督国(Heptanomis)。

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哈马特大磧),积石南乃有大海(红海),出珊瑚、真珠。且兰、汜复、斯宾(Spasina)、阿蛮(Ec-batana)北有一山(托罗斯山脉),东西行大秦海(地中海)东,东各有一山(黎巴嫩山脉、扎格罗斯山脉),皆南北行。

贤督王(Heptanomis, Hermopolis Magna)属大秦,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

汜复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于罗(Rhinocolura)三百四十里,渡海也。

于罗(Rhinocolura)属大秦^②,其治在汜复东北渡河。从于罗

① 泽散的对译是阿拉伯语中的“岛屿”(Jazirat)。说泽散城在海中央,有两种含义,一是表示它位于大洋之中,在印度洋西部很远的地方;二是作为港口,位于靠近大陆的小岛上,这也符合古代的阿杜利港。见《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7·91页,“非洲地理的最早记录”。

② 此处于罗与《后汉书》中位于波斯湾西岸的于罗不同,后者在朱尔哈(Gerrha),是借用《魏略》中已出现过的译名。

东北又渡河，斯罗(Seleucia)东北又渡河。斯罗国属安息，与大秦接也。^①

《魏略》列举的六国组成了地中海东部和红海之间的水陆交通网，是由中国前往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必由之路。泽散、汜复、贤督、于罗都在非洲东北部，驴分、且兰则在地中海东部沿海。无论取道地中海东部伊斯肯德仑湾的驴分，还是通过波斯湾经红海南部的泽散，最后到达亚历山大里亚的乌迟散城，下埃及的汜复(音“四复”)，亦即南距埃及古城巴比伦不远的希拉波利城，都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此地又因染织业著称于世，因此在第一篇中文的非洲地理中，它已是一处十分引起中国人注意的埃及城市。该城在今开罗东北，连接古巴比伦城和红海北端皮特尔湖的图拉真运河，在希拉波利城西南向东北流去。图拉真运河开凿在罗马皇帝图拉真时代，阿拉伯帝国兴起后，经疏浚改称茂门河(Khalidj Amir al-Mu‘minin)。《魏略》介绍汜复东北去于罗，可以渡海走地中海；在介绍于罗时，又说它在汜复东北渡河，渡河是渡过在希拉波利城以北的图拉真运河和更北的托雷美运河，及尼罗河的皮留辛支流，以便走陆路进入于罗。^②

中国队商经西亚入埃及，自底格里斯河东的阿蛮(哈马丹)向西，偏北的一线经思陶(西塔克)，偏南的一线走斯罗(塞琉西亚)再往西。到幼发拉底河后有两种走法，一是经幼发拉底河旁商业重镇尼斯福勒(腊卡)到哈马，一是沿幼河顺流而下到代尔祖尔，往西走著名的巴尔米拉大道，经大马士革、耶路撒冷，进入西奈半岛沿海的海诺科拉，到希拉波利城。《魏略》总结经过西亚南部的丝路南道，无论从陆路经泰西封——塞琉西亚，还是走波斯湾到红海的海路，最后都汇聚在希

① 以上考订见《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7—91页，595页地图。

② 参见索非尔特：《苏伊士运河》(H. J. Schonfield, *The Suez Canal in World Affairs*, 1952)。

拉波利，“南道会氾复，乃西南之贤督国”，已明确走红海北上，可以不在贝仑尼塞登岸，而直航苏伊士湾进入希拉波利，然后再溯尼罗河而上，到希普托诺米斯地区的首府希莫波利城。《魏略》记述，从中国西部敦煌出发的国际商道，即通常所说的北道和南道，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进后，分途通过中亚和伊朗，复经西亚，南道最后归结到尼罗河畔的希拉波利城，由此通向地中海滨的亚历山大里亚。

《魏略》中的这篇非洲地理，指出了丝绸之路在西亚和红海地区的走向，虽然在时间上比之托雷美《地理志》中记录希腊地理学家马利努斯的东方道程要晚一个多世纪，但它的价值却更在马其顿商人曼斯·蒂相纳斯所得的东方商路报告之上。过去美国汉学家腓特烈·夏德(Fredrich Hirth)和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都曾致力于阐释这些商路的走向^①，但都有考释未当之处，《魏略》却早已指出丝绸之路在两河流域也有南道和北道之分，而南道指归埃及的希拉波利，正是症结所在。

三、勿斯离与米昔儿

大秦一名本指罗马，自罗马帝国分裂后，中国仍习惯以大秦称呼埃及的罗马属境，而用拂菻一名专指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直到759年，去过埃及的杜环依然以大秦旧名相称，并未目之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习惯以马什里克(东方)这个名词指称埃及，有时包括被阿拉伯人称为苦国的叙利亚。此名在中国，要到860年段成式写作《酉阳杂俎》时才初见使用，他用的译名勿斯离，一直沿用到十三世

① 希腊学者米盖尔·科尔杜西在《中国和希腊世界》(Michael Kordosis, *China and the Greek World*, I. Hellenistic-Roman-Early Byzantine Period, 2nd c. B. C. -6th c. A. D., Thessalonica, 1992)一书中，对西亚路程作了一些新的推测，所拟地名对音，仍难与当时交通合拍。

纪。1178年周去非著《岭外代答》，指出大食（阿拉伯帝国）有国千余，知名的只有五国，列出麻嘉（麦加—阿拉伯半岛）、白达（巴格达—伊拉克、伊朗）、吉慈尼（加兹尼—阿富汗、俾路支、河外地）、眉路骨惇（马格里布·阿克西—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勿斯离（马什里克—巴尔克、埃及、叙利亚）^①。勿斯离是广东方言的译名，直到元代还在广东使用，大德《南海志》（1304年）中所记和广东通商的国家，就有勿斯离。狭义的勿斯离亦即埃及。

十三世纪起，中国开始采用以开罗（福斯塔特）为统治中心的阿拉伯名称 Miṣr，指称埃及，使用的译名有赵汝适 1225年完成的《诸蕃志》中的勿斯里和另一个用作国都的蜜徐篱。当 642年9月阿拉伯军队攻占亚历山大里亚以后，便将尼罗河畔的巴比伦作为首府，建立阿穆尔清真寺，于是巴比伦成了一座“卫城”（米昔儿 Miṣr），改称福斯塔特（Fusṭāṭ）。由于艾优卜朝在抗击欧洲基督教十字军的战争中已成穆斯林国家的中流砥柱，于是《诸蕃志》声称那时大食的国都已非巴格达，而是蜜徐篱。蜜徐篱译自米昔儿的下埃及方言 maṣri。^②

米昔儿这个名词到元代才在北中国普遍使用。1263年的《常德西使记》，记巴格达以后说，“西有密昔儿国（一作密乞儿国）尤富。地产金，入夜视有光处，志之以灰。罅口发之，有大如枣者。……国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国（法兰克）。”在 1335年到过埃及的南昌人汪大渊，以马鲁洞（马木鲁克）称呼伯海里家族统治下气盖一世的马木鲁克王朝。汪大渊到过地中海南岸当时最大的海港城市杜米亚特，而译称特番利；访问了上埃及的艾特伯荒野，将伍曼西拉原野译作阿（音“乌”）思里。

① 《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88—189、241—243页。

② 天禧元年（1017年）六月，宋朝准许“大食国蕃客麻思利”返国时，从京师到广州沿途商税享受半价优待。“麻思利”该是蜜徐篱的初译，是开罗人或下埃及人。

明清以来,米昔儿(密思儿)被普遍用作埃及的国号。《明史·西域传》说永乐年间(1403—1424年)向中国派过使者^①,正统元年(1436年)阿失刺福·赛福丁·白尔斯基苏丹(1422—1438年)又派使者来华。

明清时代出现的埃及一名,是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传入。利玛窦(1552—1610年)在中国传教,将五大洲地图加以翻刻,从1584年起据西文世界地图译绘成中文地图,于是埃及也在图上出现。1602年由李之藻在北京付梓的《坤舆万国地图》(今藏梵蒂冈图书馆,南京博物院有改绘本),曾进呈神宗朱翊钧,并在宫中翻刻,图上将非洲译作利未亚洲,绘出了“黑入多”。黑入多是“埃及”的拉丁拼音第一次译成中文。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在1674年绘制的《坤舆全图》,将埃及译作厄日多,在清代通行。《海国图志》(1842年初刻本)列有厄日多(埃及)、卢比亚(努比亚),译名也取厄日多。徐继畲刊印《瀛环志略》(1849)^②,对埃及称麦西,将努比亚译作努北阿。

四、近代中国人访埃印象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官员、文士赴欧考察或留学的日多,苏伊士运河成了亚欧捷径,斌椿、张德彝在1866年首途欧西,王韬在1867年伴理雅各返英,1868年志刚、孙家谷随蒲安臣出使欧美,后来郭嵩焘、刘锡鸿出使英伦,刘瑞芬出使英、俄,赴欧使者都出入埃及。苏伊

① 朱棣在即位之初,曾向番速儿、米囊葛卜(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南巫里(亚齐)、吕宋、麻叶瓮(棉兰老)、婆罗(苏禄)六国发出诏书,派员联络。番速儿是波斯语中的穆斯林,当指马木鲁克国家,似即《明史》所举的一次,埃及使者当随附中国使船来华。

② 该书初刻本虽署有“道光戊申年镌”字样,但书中有道光己酉刘韵珂序及刘鸿翱序,知全书刻竣已在1849年(己酉)。

士运河在东西方关系的沟通上所起作用很大。

1868年志刚的出使日记,经宣榎整理,成《初使泰西记》,书中描述1870年农历八月由地中海返国,取道苏伊士运河,表露了中国人对这段运河最早的议论:

(八月)十六日,出运口,至苏尔士停泊。此河经千数百年,西人欲开,以通由西洋达南洋之船路。无如埃及与亚拉伯回土毗连,一片皆沙,患其工之难成,成而不可持久,则徒劳工力。而自大西洋南绕于阿非里加之岌朴(好望角),不但运出两万余之程途,而且风涛险忌。故法人与埃及发奋而开此河四百五十余里,大轮船可以由大西洋直卜罗多峡经地中海经达印度、南洋,毫无阻碍。昔未开运河时,船至埃及换火车至苏尔士,乘轮船入红海,今省此一番周折矣。

此后,在1886年随刘瑞芬出使英、俄的地图学家邹代钧,以他丰富的地理知识,在考察苏伊士运河时作了十分周详的描述,开近代中国对运河问题研究的渊藪。他在《西征记程》中记述从苏伊士北航塞得港的经历,为一次名符其实的地学考察。他称苏伊士运河为新开河,评述此河未开,西人市舶东来者多由大西洋经非洲之南入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南入巽他海峡,“至南洋绕道三万余里”。1886年3月他记下了实航经历:

十三日,庚子,舟行新开河。计自苏夷士北行四十七里,入小白特湖,湖面广二十三、四里,水颇深,轮船往来无碍。行三十三里出湖口,河身复狭。又北行十里,过寨拉本之东。寨拉本小有市镇,行三、四里即达铁路。又西北行二十里,入大木萨湖,湖面广约八里,水浅仅中通一泓。湖之西北岸有市镇曰伊斯马拉,属沙克部,有铁路西通加义罗(开罗)。自苏夷士至此,铁路即傍河西岸,过此以北,河与路相离渐远矣。又北行十里出湖口,又北行四十六、七里过巴拉湖,湖水甚浅,筑堤束水行,船过者不见湖面之

广也。又北行七、八里,过堪特拉西。堪特拉西属西奈部,自此以北河西岸堤处为弥萨勒湖,湖水浩漫百余里,东北通波特塞得,西北至于达迷也大,北与地中海接处有长小岛断续相间。湖为小岛甚多,水浅仅通小船,新开河即傍湖东岸加浚筑堤北达也。又北行八十里出新开河北口,至波特塞得泊焉。自苏夷士至波特塞得,计八十七海里,合中度二百九十里。波特塞得属沙克部,在赤道北三十一度十九分。

苏伊士运河在 1869 年全线竣工畅通。埃及因运河通航,在国际事务上越显出它的重要,因而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从此埃及便与运河难分难解了。后来途经苏伊士运河的中国人上多对运河留下深刻的印象,曾主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缔造民国的孙中山,途经运河都对埃及的历史与命运感慨极深。埃及金字塔与苏伊士运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久已凝成埃及古今辉煌文明的象征。

第二节 埃及艺术和中国

一、美 术

战国时代在中国北方流行的鹰头兽艺术,是经过斯基泰民族传扬的埃及式样的金工图像。古王国时期,上埃及原以鹰为族徽,下埃及崇奉狮子,后来上埃及征服下埃及,具有鹰喙和狮身的鹰头兽图腾便在公元前 3300 年应运而生。鹰头兽在中国北方被战国时代崛起于阴山南北的匈奴民族当作一种神圣的艺术,常现在铜饰和金饰品中。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桃红巴拉匈奴墓中出土的金饰片中,鹰喙表现尤为突出。1981 年陕西神木县出土圆雕金鹿形鹰头兽,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后来鹰头兽又成为汉代文绮的图案,输往巴尔米拉。

埃及在希腊罗马时代以制作金工雕像、石膏泥模、灰泥圆形浮雕著称于世。古代和阗曾流行罗马式凹刻印章,斯坦因在1901年发掘和阗附近约特竿、拉瓦克、尼雅遗址,获得艺术神雅典娜、爱神埃洛斯和大力神海克利士的金属雕刻印章。

埃及北部沿地中海的长堤,盛产石膏,西奈半岛沿海多属陶土,又产雪花石膏,制作石膏泥模具有得天独厚的方便。托雷美王朝以来,白色石膏大量开采,以替代贵重和费时的大理石雕刻。罗马统治时期,雪花石膏的采掘有增无已。亚历山大里亚制作的圆形浮雕远销旁遮普和阿富汗,它的灰泥雕塑也成为五河流域的范本,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流入塔克西拉和帕格曼,在三、四世纪以后又进入西域。西域各地也多模仿阿富汗、旁遮普,在寺庙等大型建筑中采用灰泥、石膏粉加沙的墙壁涂料,并用来制作各种小型雕像。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中的天女小像,尤其和亚历山大里亚制作的灰泥塑像难以分辨真伪。

埃及多里亚式石柱曾在希腊盛行一时,后来成为希腊式建筑流行亚洲各地,先后经阿富汗的希腊王朝和印度贵霜王朝应用,并东传新疆。1907年斯坦因在罗布泊西岸米兰古址西藏古堡附近的佛寺中,曾发现过这种石柱。在尼雅古址中,二十世纪初曾出土过形制类似埃及十八朝土旦卡门陵墓中椅腿顶部刻有狮头的靠椅,尼雅靠椅在木雕的椅腿上以立狮支持椅身,扶手有希腊、帕提亚式怪物,座椅色彩妍丽,图像该由伊朗输入,用作王室宫闱陈设。

作为镇墓兽的陶俑,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在洛阳附近的官宦墓葬中兴起了人面兽身和怪兽形的雕像,从六世纪初一直绵延到八世纪初。这种镇墓兽虽直接传自伊朗,却可以一直追溯到埃及齐奥普斯金字塔近旁的狮身人面的史芬克斯。中国北方的镇墓兽凡属人面兽身的,多半作人面狮身,兽首的镇墓俑多半具有特大的风耳,是对史芬克斯头像的一种仿作。更由那些生前任职洛阳的贵族官僚,死后归葬故里,而将这种礼制像尾光辐射似地带到了山西、河北和山东各

地,成为一时风尚。



图 70 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砖
群鸟栖树图

在绘画艺术中,埃及式样的线描,经过西亚的传递,余波直抵中国东部。古代埃及绘画的上乘之作,是贝尼哈桑贵族陵墓中的壁画,表现出成熟细腻的技巧。最出色的是希兹多利斯二世时期霍姆贺托王子墓的壁画,其中一幅描绘了群鸟栖息在池旁的阿拉伯胶树上,栖息的位置错落有致,十分逼真。它是公元前 1920 年埃及绘画的杰作。二千年后,在中国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砖上又出现了类似的构图,在枝叶成线状交织的树上栖息着姿态各异的群鸟。

这幅画仿佛表现了伊朗宗教信仰中的生命之树,而构图与枝叶的表现手法都有一种埃及风格包涵在其中(图 70)。

二、乐 器

阿拉伯竹制乐器长笛(呐亚)起源于古代埃及。公元前 4000 年到公元前 1600 年间,埃及使用的长笛有四种:第一种,是直放在嘴边吹奏的长笛;第二种,是长约 77 厘米斜吹的笛;第三种,是双笛,是一长一短两根平行而相互联系的竹管制成,长管发声宽广浑厚,短管发声清脆尖锐,称作埃尔古;第四种,是一种呈角状的双笛,两个音管的吹奏口相连,吹奏时由双簧片发声,两管下端间距增大,成一锐角。最后一种双笛,经过一千五百年的传递,从地中海东部经过羌人之手,传

入中原。

中国在汉代以前使用的笛，从河南舞阳骨笛、浙江余姚河姆渡骨笛起，都是横笛，汉代始有竖笛。相传汉武帝时丘仲所作的笛，应是一种具有西亚风采的竖笛。东汉马融《长笛赋》更明确宣称：“近世双笛从羌起”。并说西汉京房对它加以改良，在后边又加一孔，使成五孔单管竖吹的笛，后来成为箫的先祖。双笛的源头盖在苏末尔和埃及(图 71)。



图 71 前十五世纪埃及古乐器

自汉代起，在乐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箜篌，即竖琴，源出于古代苏末尔和埃及。汉代卧箜篌由南越经改良而成，是种弓形竖琴。竖箜篌在东汉灵帝时进入洛阳宫廷，演奏时竖抱于怀中用双手抚琴，俗称胡箜篌，按形制源出埃及的角形竖琴。卧式用拨弹，竖式用指弹。竖式角形竖琴是道地的埃及竖琴^①。亚述和新巴比伦时期，角形竖琴无论卧式、竖式，都已变成八至二十二弦的大型乐器。东汉时代经过伊朗的媒介，埃及角形竖琴在洛阳大受欢迎。唐代杜佑《通典》卷一四四说，这种竖箜篌具有二十二弦，由于陇右一带的流传，刘宏便正式将它引进洛阳宫廷。

四世纪末，吕光出征龟兹，对西域乐中的主乐龟兹乐加以改造。北凉在 439 年灭亡后，沮渠氏所用乐器十七种被北魏获得，其中就有卧箜篌、竖箜篌。从此竖箜篌便以箜篌的简称传扬于世。唐代以大、

^① 萨迪编：《新编音乐与音乐家辞典》(Stanley Sadie ed.,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1980, London), Vol. 4, 191. Vol. 8, 192.

小箜篌之名列入宫廷中位居首列的燕乐。明代箜篌以二十二弦、二十弦、十八弦命名。清代乐器沿袭唐制,仍称大、小箜篌。

三、苏莫遮舞

唐初长安盛行泼寒胡戏,是一种来自西域的祈雨泼水的鼓舞游戏。这种戏乐开始在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年)十二月甲子(七日),静帝还宫后,在正武殿大列伎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北周书·宣帝纪》),最初是由胡人表演的胡戏。八世纪初,武后末年,每届冬季,便举行乞寒胡戏,交相泼水,鼓舞戏乐。中宗(705—709年)时长安、洛阳和北方各大城市都卷入了这股胡风。这种西域的民间节庆,到了龟兹便加上了浑脱队助兴,因而更加热闹了。浑脱队是头戴浑脱帽演浑脱舞的龟兹马上乐队,浑脱帽原是一种囊状风帽,主演的人裸体跣足,相互以泥水投掷为乐,由浑脱乐队鼓劲,可以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在新疆高昌等地称作苏莫遮(苏摩遮、娑摩遮)。舞蹈者头戴苏莫遮帽,互相嬉弄,这种帽是一种新月形的尖顶帽。

苏莫遮的歌舞都用“夷歌”,张说为了反对这种有失礼制的夷舞,用“亿岁乐”将原歌词语加以改编,其中第一首称: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百服紫髯须;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

这首诗道出了莫摩遮舞的源头是别称海西的大秦,八世纪时埃及仍以大秦著称于东方的中华。海西胡的泼水舞蹈是种对水的崇拜,是以灌溉农业为内涵的一种祈神活动。

在埃及的神灵崇拜中,谷神奥西里斯又是江河之神和地狱的统治者。传说奥西里斯原是古埃及的国王,由于他倡导农艺,使臣民获得生机和财富,受到爱戴,却招致了他兄弟赛特的妒忌,被谋害了。奥西里斯死后成为冥界的神,主宰人类死后的审判,使人罚入地狱,或

重获生命,再投人世。奥西里斯在民间成了赏善贬恶、主宰来世的神,操纵着命运,象征了死亡与生命的交替。罗马作家普鲁塔克声称奥西里斯死在阿色月十七日,阿色月是亚历山大历的十一月,正是每年定期泛滥的尼罗河结束河泛的月份,此后河水便重新纳入尼罗河床。河泛每年从七月开始,到十月结束。从十一月到一月的三个月,是播种的时期,祈水乞神的各种节庆活动也随之而起,埃及人将播种谷物视作牺牲,当作奥西里斯的为民捐躯,在十一月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的四天中,要举行盛大祭礼,以纪念奥西里斯,向尼罗河神哈比祈祷。

西亚和地中海东部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地区常年处在干旱炎热的气候之下,降水多集中在冬、春两季。因此在叙利亚或伊朗、拜占庭统治下的小亚细亚,乞寒祈水的节庆也多安排在这一季节。泼寒胡戏在伊朗由来已久,传说古代贾马希王已开凿地下水,以解决干旱缺水。萨珊波斯国王卑路斯(459—484年)统治时,各地旱情严重,求神祈雨的活动成为各地在旱季过后的重大民俗活动。当时伊斯法罕居民在鲍赫曼月三十日(阳历一月中旬)必须举行泼水节的庆典,以资祝愿。冬季乞寒本是西亚和中亚信奉祆教的民族礼俗,到六、七世纪已是康国(撒马尔罕)粟特民族的民间乐舞。到七世纪末更由龟兹加入浑脱队,而使这种乐舞发展到新的高峰,于是在流行龟兹乐的长安、洛阳也不胫而走,以一种形式新颖的胡戏出现在内地民间,无论衣著打扮、面具动作、唱词曲调、剧情舞蹈,一派胡风。

由于这种新颖的戏剧泼辣、兴奋,刺激感官,于是上自帝王、公卿,下至百姓都倾心赴会。中宗在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十三日,特地到洛阳南门楼观看泼寒胡戏,后来又于景龙三年(709年)十二月在长安醴泉坊参加这种节庆。此后继位的睿宗、玄宗也都有同好。在709年时,它的正式名称是“拨胡王乞寒戏”,是以拨胡王为中心人物,以乞寒为情节的舞戏,由此而催发了当时尚未有大型舞戏的中国

戏剧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康国是这种胡戏直接进入中国的导引者,康国以十二月为岁首,既信佛教,又崇袄神,“出机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新唐书·康国传》)。由于夏秋无雨,到九月末旱季结束,农民便乞神求水,以利农事,于是演成岁末乞寒之戏。宋代陈旸《乐书》卷一五八介绍这种舞戏所用乐器:“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也。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箏篥、笛。”六种乐器都最早起源在苏美尔和埃及。大鼓出现较晚,但公元前一千年的亚述也已有了^①。最早起源于埃及和地中海滨的乞寒祈年习俗,到六世纪后已由伊朗、康国进入中国北方内地。到唐玄宗时,又根据龟兹语习称苏莫遮。苏莫遮一名富有印度习气,大约出自梵语 Samajiva,有死后再生、更活之意,慧琳介绍它是龟兹国的浑脱、大面、拨头之类^②。每年安排在七月初,作为驱鬼禳灾的习俗,举行七天。传习的路线是由印度而龟兹,再入河西、长安。演员或作兽面,或像鬼神,都戴假面,和康国胡戏以拨胡王为中心展开的演舞又不尽相同。到了长安,两种舞戏有合而为一的趋势,于是剧情更加紧凑,乐舞更加精彩。到713年十二月七日下令禁断时,便只能以非出华夏古俗的理由来加以阻难了。

四、影 戏

十三世纪时,中国新兴的皮影戏随着蒙古人西征传入波斯、阿拉伯、突厥人居地,催发了西亚与埃及影戏的诞生。

影戏在十世纪以后出现在北宋京都汴梁(河南开封),属于平面

① 法尔玛:《苏美尔人和亚述人的乐器》(H. G. Farmer,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Sumerians and Assyrians*, London), 1953年。

② 慧琳:《一切经音义》四一。Sauma为印度庆祝农事丰收的一种饮料与献祭仪式,起源甚早。十三世纪时伊朗的琼浆即称 Surmah,据说起源于突厥人的饮酒。

的傀儡戏。最初的影戏用纸制作平面的傀儡,在半明半暗的布景上取影,投影可以表现生动的形象,造成清新感人的戏剧环境,出现以后受到观众的喜爱。后改用羊皮雕形,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嗣后影戏多用羊皮、牛皮、驴皮雕形,因此称皮影戏。皮影不易损坏,人物关节可以拼合、转动,演出时靠灯光衬托,效果卓著。汴京影戏最初以三国故事为内容,《明道杂志》记述影戏演出三国时期关羽被斩的故事,脍炙人口。高承《事物纪原》说仁宗(1023—1063年)时“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演出时,弄影戏的人,一边讲故事,一边用指头提弄傀儡,表演情节。南宋都城临安(浙江杭州)也有影戏,最著名的有贾四郎、王闰卿,动作灵巧,用讲史书的话本随时随地都可熟练地开讲。南宋初年,泉州等沿海港口也流行皮影戏,不久,便被印度傀儡戏所吸收。影戏的梵名车耶那吒迦,意思是“影子游戏”,初次上演的是罗摩和悉多的故事,剧名“都县伽陀”,是献给古查拉邦的鸠摩罗波罗迪伐(1143—1172年)的戏。傀儡戏在印度、埃及起源极早,但皮影戏却来自中国。

埃及皮影戏大约在十二、十三世纪时由于突厥奴隶军成批移居尼罗河而带去。它的内容有和土耳其的“黑眼”(Karagöz)相近的地方,“黑眼”是土耳其的皮影戏,到十六世纪十分盛行,但至少十三世纪已有较成熟的表现。埃及最早的皮影戏,是由穆罕默德·伊本·台尼埃勒(Muhammad ibn Daniyal)医生在十三世纪创作的三个剧本,目前尚有残本流传。其中的一个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仅存的剧诗的范本,书后附有名为《影子戏知识的联想》(Jayf al-Khayāl fi Ma‘rifat Khayal al-zill)的专论,作者是美索不达米亚摩苏尔的台尼埃勒·胡扎仪医生,他曾活跃于拜伯尔斯(1260—1277年)时代。所作剧本文体诙谐,意趣风发,题材多系婚姻、媒妁,属于生活闹剧。但尼埃勒·胡扎仪的原籍显出了他的影子戏知识大约学自波斯人。

后来影子戏又从埃及传入君士坦丁堡,形成名为“盖拉古兹”(黑眼)的土耳其影戏,在奥斯曼帝国的舞台艺术中占有显目的地位。土耳其的影戏也采用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这使影戏随着帝国的扩张,从叙利亚迅速传入北非和希腊诸岛。法国人在十八世纪又从埃及人或土耳其人那里传习这种手艺,1774年法朗索瓦—多明尼·赛拉芬首次在凡尔赛开设影戏院,后来迁往巴黎大宫,演的戏都叫“中国影戏”(Ombres Chinoises),在十九世纪仍很流行。

第三节 工艺与科学知识交流

一、丝织、棉织、毛织

罗马时代中国丝绸远销地中海,在利凡特各丝织工业城市将中国缣素重新加工染织,制成华贵衣料。一世纪中叶,罗马作家罗卡纳(39—65年)以赞赏的口吻描写了具有绝色和才华盖世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巴特拉(前69—前30年),其中提及她盛装出席宴会,身穿当时稀见的中国罗襦,“克利奥巴特拉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罗襦显得光耀夺目。这种罗襦本由赛里斯精心织成,经尼罗河畔的工匠用针拆开,编织成明晰的网眼”^①。克利奥巴特拉因穿着这种华贵而又使少妇的肌肤毕显的中国衣料,成为一时美谈。恺撒也因到过埃及而染上这种奢侈之风,居然以一男性而穿着精美的绸袍前往剧场看戏,因此

^① Pharsalia, X, 141. 戈岱司《希腊拉丁文献中的远东》(*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eme-Orient*, Paris, 1910)第18页称:“克利奥帕特拉的白臙酥胸透过西顿的罗襦而闪闪发亮。这种罗襦是用赛里斯人的机杼织成,并用尼罗河畔的织针编出粗大透亮的网眼”。见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舆论哗然。

公元前 54 年罗马军队和安息军队在卡雷大战,安息军队使用了五彩缤纷的丝旗投入战场,使罗马人大开眼界。中国丝质衣服曾运销埃及各地,来源不限于通过西奈半岛的陆路,也有从海路运到红海西岸的,上埃及出土罗马时代一件织有青、红二色丝质镶边的上衣,就是其中的一例。^①

汉代丝织技术高超,根据 1959 年新疆民丰出土汉绮,汉代已采用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组织,东汉时代已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脚踏织机。与埃及在罗马时代使用垂直的织机不同,中国从公元前八世纪已使用有提花设备的平放织锦机,大约在公元三世纪左右,埃及和西亚各地受到中国影响,同时开始采用简单的提花机。

唐宋时代中国印花丝绸已向西亚出口,俄国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藏品中,有被认为出自法蒂玛时代的印花布或印花亚麻布。唐代凸版印花技术已开始西传,绞缬技术更加普遍,法蒂玛风格的印花布可能为中国出口品,但亚麻布当是埃及产品。这种印花技术后来在十五世纪才传入哈烈(赫拉特)和伊朗的伊思法罕^②,而中埃之间这种技术传递之快,一定和当时双方海上交通的畅通难以分开。

宋、元时期,中埃两国丝绸贸易十分活跃,商业上的货运以外,更有官方的馈赠。二、三世纪时亚历山里亚出产的金缕罽、金缕绣,是中国人最早见到的金线织绣的毛毯和丝织品。1011 年埃及使者归德将军陀婆离带来的礼品中有细越诺、绣丝、红丝等丝织品,宋朝则以冠带服物等高级丝织衣料回赠。为数众多的埃及礼物绣丝、细越诺,大约就是杜米亚特所产的杜米亚迪(dimyaṭi)、达比克纺织的达比基(dabīqi)、丁尼斯制造的丁尼西(tinnisi),都是埃及大量出口的名牌

① 勃伦顿:《凯乌和巴达里》(G. Brunton, *Qau and Badari*), II, 第 26 页。

② 参见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第 94 页注 98。

丝货。在波斯有仿制品,在中国市场上也有销路。

元代,埃及也摹仿波斯,在专为赏赐给大臣的绣袍(tiraz)上绣有国王或哈里发的名字、花押。当元朝使者抵达开罗时,馈赠纳赛尔·穆罕默德·伊本·加洛苏丹的大批礼物中,也迎合对方,织造了有苏丹尊号的花锦,给双方丝织工艺的交流大为增光。汪大渊访问地中海港口的杜米亚特时,亲自调查了中国五色丝绸、锦缎在当地畅销的实况。

明代使者和埃及阿失刺福苏丹的使者,都以丝织品、棉织品馈赠。明使团在1436年抵达开罗后,向苏丹赠送的礼物有彩币十表里,纱、罗各三四、白毡丝布、白将乐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苏丹的妻室和使臣也都有中国礼品。迄今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中,还能见到这类十四、十五世纪流入埃及的中国锦绮、纱罗。

埃及棉布早已运销中国。《魏略》所记大秦物产都是罗马东方贸易出口货,其中有发陆布,此布因亚历山大里亚海滨的法鲁斯岛上著名的灯塔得名。发陆布是埃及外销的上等棉布。棉布质地细洁且稀有,价值昂贵。据普林尼《博物志》(XIX,2),上埃及和阿拉伯附近,都生长阿拉伯棉(亚洲棉),埃及祭司所服圣衣就用亚洲棉纺织。罗马时期努比亚的卡拉诺格(Karanog)出土物中,有外观似亚麻,经鉴定则是棉布^①。雷斯纳在苏丹境内的麦洛埃也曾发现希腊、罗马时代的棉织品^②。宋代以后大量运入广州的“蕃布”中,一定也有非洲棉布或埃及棉布在内。

罗马帝国东方各省都以毛纺织品外销,地中海东部沿岸城市以

① 格里菲斯、克朗福夫人:《尼罗河谷初用棉布》,刊《埃及考古学报》(F. L. Griffith & Mrs. C. M. Crowfoot, On the Early Use of Cotton in the Nile Valley,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XX, 1934, PP. 5-12。

② 马赛:《棉花早期历史》,刊《苏丹公报》(R. E. Massey, A Not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Cotton, 《Sudan Notes & Records》), VI, 1923, P. 231。

织造彩色毛毯、毡褥闻名,亚历山大里亚尤以织造景色绚丽的高级毛织物驰名世界。借自阿拉伯语的氍毹(罽褥、毡毯)的埃及特产,运到中国,以大秦“织成氍毹”相称。三世纪初曾任丹阳太守、主管海外贸易的万震写作《南州异物志》,专门介绍埃及毛毯:“大秦织成氍毹以羊毛杂群兽之毳为之,为鸟兽人物草木云气,作鸚鵡,远望轩轩若飞也。”(《北堂书钞》卷一三四)四世纪以前输入中国的毛毯,埃及和腓尼基所产的大秦毛织物足以和月氏、天竺所产同类产品相并列,因为埃及罽褥花纹美妙,在中国无论南方、北方都深受珍爱。通经断纬的织成在中国起源较早,二十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楼兰遗址汉墓中发现的毛织物残片,有一块织有希腊罗马题材中赫尔美上的头像,可能是当地的仿制品,也不排斥它直接来自埃及,但不能像英国人那样以此作为埃及织成技术传入中国的证据。^①

罗马东方贸易盛期既有大批中国丝绢西运埃及,更有埃及特产称作海西布的毛织物扬名中国。海西布因产在埃及得名,是一种织成细布。《魏略》评述海西布:

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织成、氍毹、毼毼、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

海西布以羊毛为主,又用西亚、埃及盛产的亚麻和野蚕丝混纺。这种亚麻和羊毛混纺的织物在十八朝土特穆西四世(前1425—前1408年)墓中已有出土,后来成为埃及毛纺织业的传统特色。用海西布可以纺织各种彩色毛毡,或作氍毹,或作毼毼。《北堂书钞》卷一三四所引《魏略》记述:

大秦国以野茧织成氍毹,非独以羊毛。为织具以五色毛,六七寸中屈采相次,为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千奇万变,唯意所作,上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15版,第21卷,第798页。

有鸕鹚,远望轩轩如飞。

同书又引《魏略》:“大秦国以羊毛、木皮,作毳毼之属,有五色九色。”这种海西布是埃及毛布的总称,原料采用出在地中海旁埃及“水羊”(或称胡羊、灵羊)的毛。埃及密安得河附近的希拉波利城,水质特佳,用这种水只需简便地处理植物根茎染色,便可和洋红、紫贝所染毛织物相比。

还有一种和海西布不同的巴则布(Byssus),用玉珧属海贝绒毛织成毛布,也曾享名中华。

二、炼 金

公元二、三世纪时,埃及使者几次出入交广,而交广正是中国炼丹家炼制伪金的一个基地。在最早的炼丹著作《淮南万毕术》里,已知“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石胆、胆矾)是辉铜矿(Cu_2S)和黄铜矿(CuFeS_2)与潮湿空气接触后形成的天然硫酸铜,它能化铁为铜。东汉时甘始和他的师傅韩宇雅作金投海,见载于曾植《辨道论》。当时甘始在南海(广州)试制药金,共有四次,投入海中的黄金有数万斤。公元一世纪前后的《孝经援神契》中已有服金成仙的说法:“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外丹以制作黄金,寻找炼成仙药的方法。炼丹家先炼金,“试以作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者药不成”(《黄帝九鼎神丹经》)。东汉时代已开始炼制金液,直接饵服真金,炼金术便具有医药化学的功能。

这种作为医药化学的炼金术,是中国和埃及在公元三世纪以后相互交换化学工艺的一个重要项目,就像当时埃及曾向中国输送玻璃制造技术一样。

十九世纪出土于底比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苇纸文书,曾记述了公元初上釉、镀色和冶金的处方,尚未带上神秘的炼金术的

色彩。

埃及之接受中国炼金术,开始在公元300年左右,巴诺波里斯的佐西莫斯(Zosimos)编纂了一部炼金百科全书,书中的术语具有神秘的色彩,使用的抽象符号使它具有有一种非希腊文化的特征。此后,森尼西(Synesius)和奥林庇多罗(Olympiodorus)都曾致力于炼金术,撰有专门著作,炼金术无论在概念、方法和工具上都经革新,加以规范化。沙拉比教士森尼西,对托名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物理和秘术》加以注释。这本原属论述镀金和合金的工艺著作,到了森尼西的手中却变成了富有神秘色彩的炼金术士的作品。中国炼金术具有关于金属置换的丰富知识,所用术语却多隐名暗语,以保证技术秘密,因此使它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为希腊文化世界所不易接受。森尼西却独得其秘,他的炼金术知识一定和从海上来到红海西岸的赛里斯人有关。^①

东汉末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创铅汞派,由水银产生铅汞齐,取得铅合金,以铅和汞为主要药料。铅汞学说对佐西莫斯和森尼西影响极大,是他们从东方取得新的化学和物理知识的主要来源。进入魏晋南北朝后,炼丹家葛洪(284—364年)、陶弘景(456—536年)相继问世,他们博采众长,丹方用药常多达数十种。葛洪《抱朴子·金丹》著录丹法五十多种,《抱朴子·黄白》著录化作金银之法有五种。陶弘景的丹法虽多散佚,但部分尚保留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中,敦煌石窟曾有他所著《本草经集注》序录唐抄本问世^②。佐西莫斯、森尼西的炼金知识与希腊传统科学迥异,另有其自成一系的师承关系,源头在中国。佐西莫斯约晚于魏伯阳一个世纪,他出生的巴诺波里斯在上埃及底比斯以北,既通贝仑尼塞港,又近努比亚,和麦洛埃有交流。

^① 参见本志第八章。

^② 罗振玉《吉石斋丛书》影印本。

森尼西大致和葛洪同时,奥林庇多罗也只稍晚于陶弘景,他们之间有过医药化学和炼制工艺的交流。

三、医 药

以中国为原产地的肉桂,借助印度洋海流植根南阿拉伯和索马里的历史很悠久。位于索马里的古代邦特国,曾向埃及十八朝的女王进献没药、肉桂等香木、香脂^①。邦特国的肉桂,曾被人认为是从印度、斯里兰卡和中国运入索马里沿海后,再和桂皮相混,运往埃及^②。古埃及二十朝时,在制作木乃伊时已使用肉桂。狄奥斯柯立提(I,12,13)指出,肉桂在罗马帝国被用于腌渍。

中国大黄,能治疗各种水肿病和炎症。有关大黄的希腊文、阿拉伯文和拉丁文名称都源出于波斯语 rayvend、raybhas。伊朗是中国大黄西运的最重要的媒介。希腊医学大师盖伦(约120—200年)已大谈大黄的药性,指出大黄能清脾和肠胃,可治肝病。在十二世纪为西西里王近侍的伊德里西,在他的著作中,已知它产在图伯特地方。1224年后供职埃及,任苏丹卡米勒·穆罕默德(1218—1238年)首席药物学家的伊本·贝塔尔,曾仔细辨认生在波斯和中国的大黄,认定阿拉伯人所称的突厥或波斯大黄中品质优良的都是中国所产。从海上运去的大黄被销往亚历山大里亚,在陆上运到波斯的大黄,除了从叙利亚的特利波里转往威尼斯和西班牙外,也有通过亚历山大里亚到威尼斯的^③,亚历山大里亚是中国大黄运销地中海的重要市场。

① 勃莱斯特:《埃及古文献》(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第2卷,第265页。

② 索夫:《厄立特里海环航记》,纽约,1912年版,第82—84页。

③ Leonhart Rauwolf: *Beschreibung der Raiss inn die Morgen-länder*, 1583, p. 461. 见劳费尔:《中国伊朗篇》中译本,第382页。

麝香虽然名贵,但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是一种常见的消费品。富裕的家庭都使用真正的吐蕃麝香,价格较低的是从海路运到波斯湾和红海的汉地麝香,曼苏地在《黄金草原和宝石矿》中指出,汉地麝香质料比较低劣。在各种出售香药的店铺中都可见到麝香和渗有杂质的各种麝香制品,药物学家和药剂师也都零售这种中国药物。麝香也用作壮阳药,并被用于特效的解毒药,甚至在烹饪中用作调味品。法蒂玛哈里发阿席兹(975—996年)的御膳中,每年要使用五囊麝香(约合210—250克)和50克樟脑^①。埃及有与伊朗、伊拉克相仿的麝香消费市场。麝香在西亚、非洲备受青睐,难怪有人说,麝香是中世纪亚洲各种香料中最受重视和需求最大的香药。上流社会中,对麝香的追求胜过了龙涎香、甘松芽、樟脑和芦荟。^②

参照埃及药用植物的中药,有胡麻、明矾、苏合、没药等。

胡麻,又称脂麻(今作芝麻),广产于非洲和地中海东部。普林尼(XXII,64,132)说罗马法定药物中常用脂麻油和籽。中药自公元一世纪前后采用脂麻,一定参照过埃及、叙利亚的制药法。《神农本草经》以胡麻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陶弘景《名医别录》说,用胡麻可中坚筋骨,疗金疮,止痛,治伤寒温症、大吐后虚热羸困;明耳目,耐饥渴,延年益寿。又说脂麻油利大肠、胞衣不落,可以摩疮肿,生秃发。葛洪《抱朴子》亦说,以脂麻饵服,足以不老、耐风湿。

明矾,普林尼(XXXV,52)论述产于埃及、西班牙、亚美尼亚(小亚细亚东南部)、马其顿、本都和阿非利加(突尼斯附近)。波斯因转运明矾,在唐代被误认是产地,十世纪李珣《海药本草》说:“波斯、大秦

① 曼苏地:《黄金草原与宝石矿》第1卷,353页。

② [法]阿里·玛扎海里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1页。

所出白矾，色白而莹净，内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这种白矾，大多来自地中海东部和埃及，曾被炼丹家用作上品的化合物。

苏合香，具有开窍醒脑功效，被视为神药，且广泛使用。苏合还是上等的防腐剂，至少在三世纪初，中国已仿效埃及埋葬木乃伊的办法，用苏合随葬，以防止尸体腐烂。这在中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防腐措施，与以往采用密封棺槨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晋泰康（280—289年）时曾发掘襄阳城外刘表墓，虽离刘表死时已有八十多年，但尸体颜色不异，犹如平生，据说墓中香气远传三、四里，经久不散。原因在于刘表的儿子刘琮在落葬时采办各地珍香数十石放在棺中，其中最重要的是苏合、消疫之香^①。消疫之香中主要是没药。没药在古埃及用于消炎、防腐，二十朝时已将没药使用于木乃伊^②。里特尔分析的六个公元前后的木乃伊标本，已使用了没药、苏合香、沙糖、沥青、麦加香膏等物^③。没药与苏合的使用，证实了在魏晋之际中埃双方在医药上的交流。到六世纪时，阿拉伯苏合香已有很多替代品，因此医家一度不敢临床使用，以免延误。

出身安达卢西，1224年到埃及供职于艾优卜朝苏丹卡米勒，任首席本草学家的伊本·贝塔尔（1197—1248年），在他的医学名著《医方汇编》中也注意到应用中国药物，如肉桂、芒果、中国玫瑰、薄荷和硝石。伊本·贝塔尔提到的“中国玫瑰”（Ward sīni），通称 nisrin。这种中国玫瑰，花大而美，可供观赏、食用，也可入药。还有一种被称

① 《水经·沔水》注；卢弼《三国志集解》引《从征记》。

② 奥斯本：《埃及木乃伊》（W. Osburn, *An Account of an Egyptian mummy*），Presented to the museum of the Leeds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Society, 1828 第6页。

③ 见罗卡斯：《古埃及工矿》（A. Lucas,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3rd. ed. London, 1948），第366—367页。

作 šah-sini 的薄荷,是植物液汁所制黑色小薄片,用于治疗头痛发热、伤口发炎,是一种理想的消炎镇痛剂。

四、玻璃

埃及和腓尼基被认作是世界上最早制造玻璃的国家。公元前7000年最早出现的纯正玻璃,是青金石色泽的模制珠饰。埃及人早就用方解石(CaCO_3)精制的乳色玻璃制作玻璃器皿,埃及称为雪花石膏,用来代替玉石。十八王朝的阿门诺菲斯三世(前1408—前1372年)和他的儿子阿克那托(前1377—前1358年)时期,玻璃制品五彩缤纷,大量出口,为埃及工艺的成就取得了世界声誉。

《十洲记》记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周穆王(前1001—前947年)时,西胡进献了一种被赞作“白玉之精”的夜光常满杯,这种玉杯很像是雪花石膏制作。“夜光”一名在梵文中相应的名词 Jargon,意思是“有色宝石”,在战国晚期已被充作玻璃的正式名称。能制造这种白玉之精的夜光杯的,只能是埃及用雪花石膏制作的乳色玻璃。

埃及玻璃属于钠钙系统,在汉代运到中国必须经过南亚次大陆,汉武帝时来自干涂国(犍陀罗)的礼品玉晶盘,是只有埃及才能制造的纯白透明玻璃盘(《三辅黄图》卷三)。二十世纪初,河南曾出土二世纪到四世纪埃及制造的古玻璃,洛阳发现过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珠,还有亚历山大里亚的玻璃瓶,后归加拿大特伦多的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瓶上刻有雅典娜的头像。

埃及玻璃通过五河流域和阿富汗进入中国新疆和北方,一路上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和阿富汗的帕格曼的窖藏中都曾留下为数可观的罗马玻璃制品,并流入中国北部地区。1965年,在辽宁北票北燕权贵冯素弗(383—415年)墓发现的五件玻璃器,胎质细薄透明,呈闪淡绿色和深绿色,除一件玻璃碗器形在国内外都可见到,其他四件

水注、杯、钵，都属地中海沿岸罗马玻璃器。其中一件鸟形玻璃注，长 20.5 厘米，腹径 5.2 厘米，是一种起源于埃及的香水瓶，在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世界十分流行，和帕格曼出土埃及制造的长 20.2 厘米的海豚形玻璃水注属于同一类型^①。这种玻璃器制法新颖，采用铁棒技术的无模吹制法。新疆和阗约特罕和罗布淖尔的楼兰故址，二十世纪以来先后发现罗马玻璃残片和玻璃珠饰。新疆博物馆在楼兰发掘所得四块玻璃片，其中两块透明玻璃均有椭圆形磨花，另两块无磨饰的容器残片，经定量分析，与公元三、四世纪的罗马玻璃成分一致，也是地中海世界产品。

埃及玻璃在罗马东方贸易盛期，更通过南阿拉伯的凯尼、南印度科罗曼德沿岸的阿里卡曼陀（本地治里以南 3 公里）、马来半岛的霹雳和柔佛、柬埔寨的龙川（奥一埃育村古址），进入越南半岛和中国大陆。沿途出土特征分明的罗马玻璃珠和轮纹玻璃碗，都是这种贸易的历史见证。广州横枝冈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三件深蓝紫色模制成型的玻璃碗^②，外壁和腹部弦纹都经打磨，弦纹磨花，都和公元前一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产品同类，经化验，含有较多的钾和钙，属钠钙玻璃，显系目前所知最早的埃及玻璃器。1980 年江苏邗江发掘的甘泉二号东汉墓，也见有三件紫黑色和乳白色相间波纹交织花纹的钵、盆之类的玻璃残片，含硅量、化学成分和制造技术都属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制品。^③

埃及玻璃制品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成批流入中国，到五、六世纪仍未中断。中国玻璃工业在埃及玻璃技术的影响下，制作了含硅量不低于 10%、具有鲜艳光泽、并且含有一定钠钙的玻璃器，但仍不能制

① 冯慕水注见《文物》1973 年 3 期，图版叁(1)；帕格曼水注见赫金编：《帕格曼考古研究》，1937 年，巴黎，图版 XVIII，图 41，43--45。

② 《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39 页。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 年第 11 期。

造胎质细薄、纯度高,色彩缤纷、磨刻花纹的透明玻璃。到三世纪末,这种情况才略有改变,首先在技术上有所突破的,是中国南方沿海的玻璃制造业。

印度洋海路的畅通,给罗马玻璃大量输往印度、中国以弥补贸易逆差提供了方便。这使交、广地区的中国化学工艺首先借鉴埃及玻璃,仿造成功透明度高的玻璃碗。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论仙》中提到:“外国作水晶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以作之者。”水晶椀也就是透明玻璃碗。自225年孙吴政权分交州为交、广两州,不久,此地便开始仿照埃及玻璃,按硅土、苏打、石灰、镁和氧化铝五种成份,取一定比例配制烧炼。所成玻璃器,纯度高、耐高温,能适应骤冷骤热,因此极富实用价值,比之中国早先达到的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这种属于仿造的透明玻璃器,不但在配方工艺上摆脱了铅钡玻璃的传统,含硅量和钠钙含量都有增大,而且在器物的装饰图样、形制和吹制技术上都有了创新意义的改革。水晶玻璃的制造,是在三、四世纪的广州玻璃制造业中确曾有过的。广州制造玻璃,恐怕可以上推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昧(前137—约前122年)墓在1983年发现后,曾出土进口的玻璃板,这种玻璃板在公元一世纪的《厄立特里海环航记》中,被称作罗马帝国向国外输送的玻璃半成品,意在使进口国可以随意加工制造适合本民族需要的产品。中国史书中盛传罗马帝国出产夜光璧,恐怕就是为迎合中国需要而制作。

北魏太武帝(424—452年)时,由大月氏商人到山西大同传授制造五色玻璃的方法,获得成功。大月氏和亚历山大玻璃制造业关系密切,塔克西拉的玻璃业到五世纪末才被入侵的哒哒人摧毁,彩色玻璃的源头也非埃及莫属。

五、冶 金

中国炼金术从麦洛埃传入尼罗河。麦洛埃向以冶铁著称,从哈西尤脱夫(Harsiyotef,约前404—前369年)时开始,确已拥有铁器制造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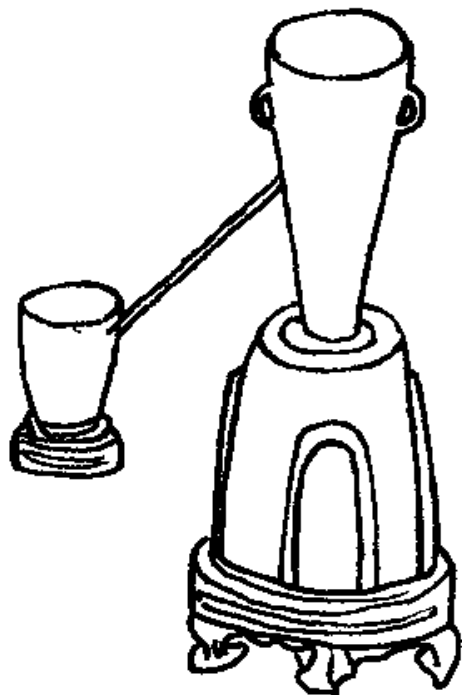


图 72 中国的丹炉(蒸馏器)
(采自《丹房须知》)

到二世纪中叶,麦洛埃各地坟场出土的铁器已较前大有增加。在第二瀑布以北的倍莱那和奎斯托尔,被奥开尔称作 X 组的墓葬中,出土的铁制的矛、剑、锄、斧、锯,已是当时普遍使用的工具和武器,甚至还有好几具铁制的折叠椅。奥开尔以为这些都是属于 339 年麦洛埃被阿克苏姆灭亡前后,直到六世纪时的制品^①。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物中有一具中国式样的烹饪器,现藏喀土穆博物馆。

这件被发掘者称为中国式铁鼎的三足器,具有宽边翻唇,腹部平直,圆口,直足,无耳,宽边饰有中国式云纹,而制作却较简陋。

侈口和山西长治分水岭 126 号战国韩墓出土铜鬲相仿,和汉代铜鼎、晋代瓷洗的形制差别较大,属于一种仿古之作,性能一定非常特殊。从二世纪末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卷上所述烧炼神丹的鼎,可知是一种“圆三五,寸一分,口四八,两寸唇,长二尺,厚薄匀,腹三齐(脐),坐垂温”的丹炉。宋代吴悞《丹房须知》中有一种蒸

^① 奥开尔:《苏丹史》(Arkell, *A History of the Sudan to 1821*, London), 1961 年版。

馏器,底座是一侈口鬲,上有坩埚子二,大小相套,麦洛埃铁鼎就是丹炉的底座(图 72)。巴诺波里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炼丹家一定是从麦洛埃取得中国式样的炼丹设备的,出土物对此提供了实例。墓主是否有可能就是沙拉比的教士森尼西,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阿拉伯时代的埃及,铸造的宝剑十分锋利。在安史乱后,阿拔斯朝和中国十分亲善,德宗(780—804 年)宫中收藏了一把火精剑,据说是 781 年大林国用山中所出神铁炼成,锋利能斫槛上铁狻猊。“其剑之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流起”(《杜阳杂编》卷上)。阿拉伯语中的亚历山大里亚称作 Iskandariyah,译成中文叫大林国。火精剑东传,象征着唐代中埃邦交的正常化。

六、珠 宝

珠宝输出在埃及对华贸易中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久享盛名的埃及绿宝石,在公元前三、四世纪传入中国时,用的是一个波斯名称 Zumurud(绿宝石),但古代波斯不出这种宝石,大流士建立的帝国,曾将埃及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因此埃及绿宝石经由波斯流入中华。《战国策·秦策》、《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都曾录有范雎向秦昭王(公元前 306—前 251 年)陈述时,列举名闻天下的四宝,有周的砥礪(金刚石)、梁的悬黎(贵蛋白石)、楚的和朴(湖北荆山绿色拉长石)、宋的结绿。四者之中,只有和朴是楚人卞和得自内地荆山,虽以为是璞玉,实际是珍贵的石头。其余三者,金刚石和贵蛋白石来自印度,结绿就是埃及绿宝石。绿宝石在古代是埃及所特有,传说埃及法老阿门诺菲斯三世(前 1408—前 1372 年)时,锡开·苏倍拉的绿宝石便被采掘了。罗马时代,埃及绿宝石产在科帕托附近的山岩中,从红海外运十分方便。这种绿宝石三世纪时又以“木难珠”重现史

籍。《玄中记》说木难来自大秦。曹植(192—232年)乐府四首,《美女篇》描述:“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木难的原名是印度的摩罗伽陀珠(merukūta),佛典《大智度论》说是金翅鸟口中所出的绿色珠,能僻一切毒。五世纪沈怀远《南越志》又将金翅鸟沫所成碧色珠,说成是大秦国的珍宝,正是因为埃及绿珠由海上运往印度,然后再转入中国。唐代在泛指绿色宝石的瑟瑟这个名目下,除了绿松石、绿长石以外,其中有一种价格高昂的马价珠,也是从印度、缅甸输入云南的埃及绿宝石。到宋代,在翡翠这种缅甸硬玉中恐怕已杂有埃及绿宝石。1073年陀婆离(杜米亚特)使者曾向中国皇帝进赠玻璃金饰寿带、琉璃器,其中的“玻璃”也应是埃及绿宝石。九世纪下半叶,在阿斯旺和红海之间的瓦迪·阿拉奇发现金矿和绿宝石矿,法蒂玛王朝将绿宝石矿置于国库管理之下,输往东方的当不在少数。元代助木刺、助母刺、祖母绿这些绿宝石的波斯语名再显于世,是埃及绿宝石通行中国市场的证明,历明清仍是如此。

埃及和苏丹出产的蓝宝石(Sapphire),在罗马时代是贝贾牧民运往红海各港外销的名牌货。中国在十二世纪以前所用的颇黎是指宝石中的刚玉,《玄中记》说大秦国产五色颇黎,其中蓝宝石由于贝贾人运往印度而名声大噪。柏来米蓝宝石因为色纯如海,阿拉伯语称海作Bahṛ,和贝贾人称蓝宝石叫Bahri音相仿,Bahri是Bahri的阴性变格。《魏略》记述阳嘉三年(134年)疏勒王臣槃向汉顺帝刘保进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是地地道道的苏丹蓝宝石和黄金腰带。臣槃和贵霜王朝关系紧密,他的执政便取得大月氏人的支持,海西青石也必然经过北印度才能运到中国。五、六世纪后苏丹蓝宝石又以碧玻璃的美名在诗文中留下许多神奇的故事,虽然其中也有南印度蓝宝石,但柏来米蓝宝石仍是印度和中国王公贵族的殊好。《杜阳杂编》卷上介绍唐代宗所藏上清珠,是柏来米蓝宝石中的神品,“上清珠,即开元初(713年)罽宾国所贡,其珠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仙人玉女云

鹤绛节之像摇动于其中”。是通过克什米尔运到中国的非洲蓝宝石。

埃及绿松石,历史十分悠久。埃及人是最早使用绿松石的民族,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绿松石出土,埃及人开采了西奈半岛西南部的西拉比·伽丁和瓦迪·马伽拉两处最古老的绿松石矿。先秦时代由西北地区运到中国内地的璆琳,必定有埃及绿松石在内,只是最初难以分辨产地来源。然而到了战国时代,至少公元前三、四世纪,已有一个新的宝石品种“玫瑰”(原作“玫瑰”)出现在文献中。《韩非子·外储说》讲述到长江流域的楚人卖珠,“缀以珠玉,饰以玫瑰”,玫瑰是有别于珠(蚌珠)、玉(软玉)的宝石,得名于埃及柯柏特语称绿松石的 mafkat。玫瑰,又可写作玫瑰。《别国洞冥记》卷二叙述汉武帝用印度进献的琉璃鞍,此后盛饰鞍马便渐成风气。公元前101年得到贰师天马,又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玫瑰石之珍贵,是因它来自遥远的埃及^①。六世纪中国以瑟瑟称绿松石及类似的绿色宝,玫瑰一名才告消失。十三世纪的元代,又以甸子相称,河西甸子中,也必有埃及货在内。

翠榴石(Peridot),又称贵橄榄石,产在红海泽贝尔盖特岛和红海沿岸的金绿色蛇纹岩中,以黄绿两色相显。唐代称作绿金精,在643年由拜占庭使者向唐太宗李世民进献^②。

碧五色玉(红、绿、褐、黑、黄),是埃及东部哈德拉比山脉附近特产。

符采玉(大理石)多产在红海西岸沙漠。

夜光珠,是产在西奈半岛西部和阿斯旺的暗红色或红褐色半透明的柘榴石(Garnet)。小粒的多产在阿斯旺,大颗的出在西奈半岛西

^① 沈福伟:《结绿和埃及宝石贸易》,《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

^② 绿金精,见《旧唐书》卷一九八,《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校作“绿金、水精”,有误。古有金精(青金石)而无绿金,绿金精类金精而又不同,唐代已能分辨。

部。史前时期已用作珠饰。红海两岸所产,也能发夜光,亦是一种夜光珠。这种翠榴石长期以来仅见于泽贝尔盖特岛(圣约翰岛)。

真白珠,是埃及特产雪花石膏,盛产于西奈半岛和东部沙漠。埃及把方解石(Calcite)称作雪花石膏,具有玻璃光泽,属于角砾岩(Diorite),也是水晶石的一种。公元二、三世纪时已运入中国,仅见《魏略》著录。

埃及水精也是中国的进口货。古代中国所知水精产地有三:一是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堂庭之山或哀牢夷居地;二是南印度东岸的黄支国;第三个水精产地便是埃及。法蒂玛王朝以水晶雕缕的器皿著称,1070年大食使者的礼物中有水晶琉璃器,大约也是这类精巧绝伦的产品。

埃及的绿柱石在元代被称作青蒙石,从索马里的摩格迪沙转运来华。

精于鉴别珠宝的埃及商人在元、明时代来到中国沿海的不乏其人,用阿拉伯语写成的鉴赏宝石的著作在五十种以上。最著名的是埃及宝石商希哈卜丁·帖法希的《宝石审美》,原名 *Azhār al-Afkār fi Jawahir al-Aḥjār*,直译《关于宝石的思想之花》。帖法希生平热爱宝石,又是一位通俗作家,搜藏宝石极富,1253年在开罗去世。他在《宝石审美》中,论述了二十四种宝石的来源、产地、纯度、价格,以及在医药和魔法上的作用。书中大量引证阿拉伯语著作,还引有普林尼和托名阿里士多德的《宝石鉴赏》。他的著作在元代已被北京的秘书监所收藏,称《者瓦希刺别认宝具》五部。者瓦希刺译出 *Jawāhir*(宝石)的原音,“别认宝具”是中译书名。这种宝石鉴赏的书籍大约有五部,所以王士点、商企翁《元秘书监志》卷七“回回书籍”录有五部之多。

七、建筑

中国和埃及在建筑式样的交流开始于伊斯兰教兴起以前。1907年斯坦因在罗布泊以西的米兰占址东北发现佛教寺庙,柱子多作多里亚式。这种立柱源出埃及,后经安息人东传。所谓佛教寺院,也有可能是祆教寺庙。

在帷帐的使用上,中国和埃及早在东汉就有过交往。帐是张施于床上而起,开始于汉代,“小帐曰斗帐,形如覆斗也”(《释名·释床帐》)。先秦时代只有帷、幕、幄、帘。1975年山东长清岗辛战国墓出土的铜构帐架,设想的复原方案是四坡顶的长方形帐架^①。广义的帐,便是指有顶的帷幕。中国古代军帐多作圆顶,或尖顶的斗帐,平顶的军帐导源于西亚,可以追溯到埃及。建成于113年的罗马皇帝图拉真纪功柱上有浮雕图拉真率军和达契亚人作战的图像,图中三具军帐,两具都作坡顶房屋式样,形制较小,较大的军帐呈平顶覆斗形^②(图73)。因东汉灵帝特别喜爱胡帐,平顶的军帐便推广开来。这种新颖的平顶帐,在北魏考古材料中已见使用,1949年以前洛阳出土北魏画像石,有方形平顶帐,帐顶四周饰莲花、葵叶,四周垂饰为中国式样^③。1975年河北磁县高润墓,出土北齐武平七年(576年)壁画,上有方形平顶帐,帐顶周缘同样饰有莲花葵叶^④(图74)。到唐代,由于建筑风格和陈设的变迁,帷帐不再是宫室殿堂的重要陈设,因此不再见到帐构之类随葬墓中,平顶帐也只是施张于床上的小帐了。

① 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长清岗辛战国墓》,《考古》1980年第4期。

② Filippo Coarelli: *Rome. at Cassell's Monuments of Civilization Series*, Cassell, London; 1978, P. 120.

③ 王子云:《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图版五(6),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版。

④ 汤池:《北齐高润墓壁画简介》,《考古》1979年第3期。



图 73 “图拉真纪功柱”上的平顶、尖顶军帐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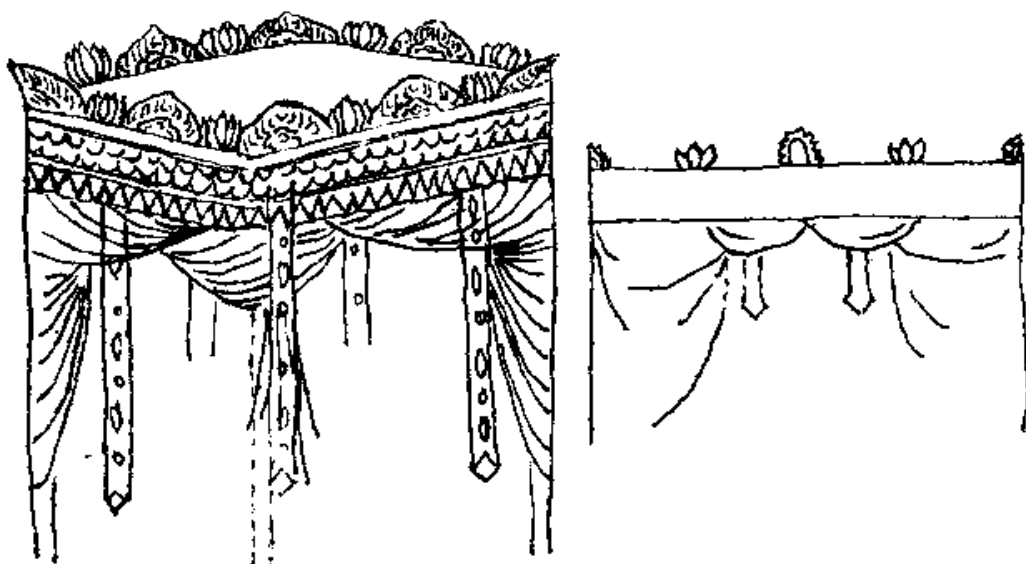


图 74 北朝军帐

(左)洛阳北魏画像石平顶帐 (右)北齐高润墓壁画平顶帐

东方式样的城墙和堡垒上的雉堞,在吐鲁番佛教寺院中屡有所见,后来经过安息人之手,被萨珊波斯所继承,在塔克·伊·布斯坦(Tāq-i-Būstan)可以见到这种有长方形台阶式的堆砌建筑。普库里

(Paikuli)的那尔斯(Narse293—303)庆功碑上早就有了^①(图75)。在法蒂玛朝和艾优卜朝的首都开罗,同样可以见到类似的建筑式样。很明显,热衷于移植波斯文化的法蒂玛贵族和库尔德人的艾优卜苏丹,对于建造东方式样的雉堞感到兴趣,于是在973年成为法蒂玛首都的开罗,便留下了这类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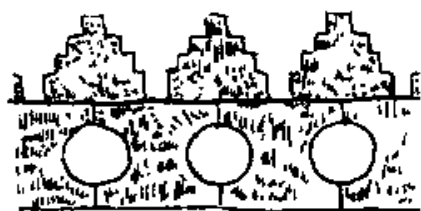


图75 普库里的那尔斯庆功碑上的雉堞

马木鲁克时代,在开罗郊外用来自穆卡丹的白垩石和上埃及的斑岩、花岗岩建筑了许多寺院、陵墓,尤以突厥式样的具有精美高耸的圆顶的陵墓为最。它的穹顶用墙柱或成排交替的叠涩加以支撑,做成斑岩圆顶。墙顶上保留着雉堞,大门座落在转角的门洞里。这种式样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库尔德山区。泉州通淮街的清净寺(圣友寺),最初建造于1009年,到伊斯兰历711年(1310—1311年),由设拉子人艾哈曼德·伊本·穆罕默德·贾德斯(又称鲁克伯哈只)加以修缮。重建后的清净寺门楼,式样类似马木鲁克人在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阿勒颇和开罗修筑的寺院和陵墓。经整修,寺门、穹顶、甬道、窗棂都已面目一新。门楼取狭长尖拱,甬道的风格也属马木鲁克的突厥式样。1299年开罗建造的宰因丁·尤素甫玛德拉萨陵,哈桑苏丹(1347—1351年,1354—1361年)的玛德拉萨寺,可以说是泉州清净寺重建前后风格最与之相近的两所开罗寺院了。清净寺和宰因丁·尤素甫玛德拉萨陵、毕斯坦的谢克·贝耶兹德圣殿几无不同,是吸取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学派的建筑风格,在当时穆斯林世界具有代表式样的建筑。泉州清净寺,正是在当时主导世界伊斯兰建筑式样的时代潮流下,竭力仿造开罗寺院的结果。

^① 汉兹菲尔特:《普库里》(Herzfeld, *Paikuli*),第2—4页。

杭州清真寺始建于元代。城东崇新门荐桥西有真教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说是延祐间(1314-1320年)回回大师阿老丁建造。阿老丁是埃及富商奥托曼家族的成员,由他出资并设计的寺院,基高五六尺,并有市场围绕,一如开罗式样。

八、陶 瓷

伊斯兰世界的玻璃制造与陶业,在九至十世纪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八世纪的埃及首先采用釉彩玻璃,在玻璃制造过程中上釉、装金、彩绘。九世纪时这种釉彩技法又运用到陶器的制造中,出现了轰动一时的釉彩陶器;这种陶器因具有彩虹的色泽,故称虹彩。中国的瓷器制造在唐代已有长足的进步,优良的瓷釉和细腻的胎质,给制造光耀夺目、耐污实用的瓷器提供了条件,在伊斯兰世界替代了传统的丝绸,成为最瞩目的新产品。唐三彩与伊斯兰釉陶相互辉映。长沙铜官窑制造斑彩瓷器,也是中外陶瓷制造业互通信息的结果。

在埃及创建突仑王朝的突厥人艾哈曼德·伊本·突仑(868—905年)执政期间,埃及通过进口中国瓷器,学习制造技法。艾哈曼德·伊本·突仑本由萨马拉的突厥统帅贝叶巴克派遣,到福斯塔特去统辖埃及,后来在埃及开创突仑王朝。萨马拉拥有许多制造陶瓷的工匠,跟随伊本·突仑进驻埃及的人员中,一定有这种陶工。首批埃及仿造的瓷器大约就出自萨马拉工匠之手。

十九世纪起,上埃及尼罗河畔的底比斯、库斯、库夫特和红海西岸海港库赛尔,都有华瓷出土。出土物中以浙江慈溪上林湖窑制造的越窑玉璧底碗为最早,所属时代在八、九世纪之际。库赛尔遗址在1966年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调查时,就见到了唐末宋初的越窑青瓷,宋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元末明初的青花瓷。埃及南部阿斯旺附近哈伊达姆,出土物中有十二至十四世纪前半叶属于南宋和元代

的龙泉青瓷。修建阿斯旺水库时,在阿布·辛贝勒神庙以南约五公里的杰贝勒·阿达,也发现了与哈伊达姆遗址同一时期的宋元青瓷。

红海西岸苏丹境内的古港艾特伯,在今哈拉伊卜附近,是十世纪以后埃及从海上运进华瓷的重要入口,1058—1368年一直繁荣兴旺;1426年被马木鲁克苏丹摧毁以前,是华瓷在红海西岸的主要卸货场。1912年后,陆续出土唐末和宋、元、明初的华瓷,残件达一千多片,有越窑系青瓷片,宋代龙泉窑瓷、白瓷、青白瓷片,元末明初青花瓷和黑褐釉瓷片。出土的元代黑褐釉罐片上有残存的“清香”二字,似系茶罐,确如此,茶叶初传埃及、苏丹当在十四世纪初,即汪大渊访问此地前后。有一片青瓷上有八思巴蒙古字,也属元代制造^①。青瓷也为朝圣的非洲穆斯林所喜爱,在这条朝圣的路上又多一明证。

华瓷最大的仓储还在开罗以南的古都福斯塔特。此地七至十世纪是尼罗河下游的商业和陶业重镇,1168年毁于第二次十字军之役。绵延数公里的福斯塔特遗址,自1912年开始出土第一批青瓷(系越窑素釉、刻花瓷器)和唐三彩,1920年又续有发现。1964年、1966年的发掘,更在遗址中央发现窖藏,出土七、八世纪起到十七世纪不同时期中,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残片六十多万片,其中华瓷约占百分之二。从八、九世纪的唐代中晚期起,历宋、元、明三代,到十七世纪的清代初期,都有遗物出土。仅唐代陶瓷便有邢州白瓷、越窑青瓷、黄褐釉瓷、长沙铜官窑瓷和少量唐三彩。数量最多的是明清青花瓷,其次是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遗址出土物中还可见到耀州窑青瓷,福建建窑青瓷,广东阳江广窑青瓷和褐釉瓷,福建德化、广东各窑的白瓷和磁州窑瓷。遗址中几百片元代青花瓷,数千片明清青花瓷和彩

^① 霍布生:《艾特伯华瓷残片》刊《东方陶瓷学会专刊》(R. L. Hobson, Chinese Porcelain Fragments from Aidhab, and Some Bashpa Inscriptions, 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1926—1927,第19—21页。

瓷,十分引人注目。元代稀见的青花瓷,在这里见有缠枝牡丹莲瓣纹瓶残片、鸳鸯莲花纹碗残片,以及蓝地白花大盘片和青花牡丹纹小壶片,甚至还有刻花白龙青花瓷片(图 76、77、78、79)。



图 76 福斯塔特出土元代蓝地白花大盘片

图 77 元代池莲鸳鸯纹碗片



图 78 仿元代青花瓷器

图 79 仿元代青花陶器

华瓷和唐三彩陶器在八百年中连续不断输往埃及,在福斯塔特形成了一所世界罕见的地下陶瓷博物馆。埃及作为华瓷在非洲的最大主顾,一如伊朗作为华瓷在西亚的最大市场,立即兴办瓷业仿造。但长时期的仿造只能限于釉色、器型、纹饰和技法,难以达到像华瓷一样光耀夺目、胎质细腻,只能属于介于陶瓷之间的软瓷,仍然是陶器。然而仿造华瓷对埃及的陶业却不啻注入了兴奋剂,给伊斯兰陶业的复兴带来了希望,将埃及社会生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在九至十一世纪,埃及陶工仿效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

彩刻线纹陶器,结束了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本地碱性釉陶。唐三彩这种低温铅釉陶器,在制作技巧上已超过了东地中海具有一千年历史的铅釉陶器,成为埃及陶工仿造的蓝本,促进了多彩陶器的发展。同一时期,埃及还仿照早期定窑白瓷葵口碗,制作釉色浅青的白釉葵口陶碗,仿唐代唾壶制成白釉唾壶。又仿越窑青瓷夹耳盖罐制成带盖夹耳罐。唐代越窑、定窑的玉璧底碗,也有埃及仿造的玉璧底碗同埋地下。

自十一世纪下半叶至十四世纪,龙泉窑系青瓷畅销亚非各地,在青瓷工艺上臻于顶峰。龙泉青瓷属于石英—高岭—云母质瓷器,与景德镇瓷器属同一类型,釉色与质地之美使它具有人造青玉的美誉,为埃及陶工所倾倒,从器形、釉色、贴花工艺到刻划纹饰都竭力仿造。福斯塔特窖藏的六十多万陶瓷片中,70%以上是仿制华瓷的伊斯兰陶片,有一处遗址曾出土龙泉青瓷 109 片,埃及仿龙泉的陶片却积有 6917 片。北宋龙泉青瓷的刻花篦点纹碗也有埃及仿造品,图样中的卷涡纹(或称菊瓣纹)早见于北宋山西介休窑的盘洗器,北宋龙泉窑也有这类花纹的瓷碗,埃及也出土了仿制品(图 80、81)。另有仿元代龙泉的双鱼小陶盘、贴花碗等。

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青花瓷风靡全球,埃及同样十分热衷于仿制。元代青花瓷已首先向国外运销,器物多妍丽、端庄,福斯塔特也出现了仿元代青花瓷的瓷片,图样却已非纯粹中国式样,而兼具埃及风采,甚至有阿拉伯胶树的叶纹。

福斯塔特在中国外销瓷的主要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运销瓷器时期,长期进口和仿造华瓷,出土华瓷虽多残片,但历代各窑口都有精品展出,为世界陶瓷业中可与中国瓷都景德镇相媲美的陶都。仅在 1964—1965 年,由日本小山富士夫对福斯塔特华瓷鉴定的结果,已有 10106 片。美国埃及考古研究中心的斯坎伦在当地发掘(1964—1972 年)、交瑞典人俞博(B. Gyllnsvard)研究的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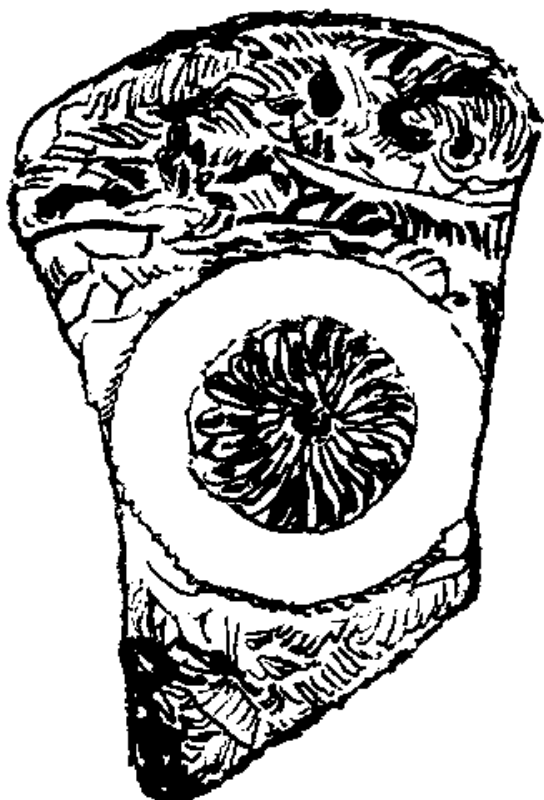


图 80 山西介休窑瓷洗卷涡纹



图 81 埃及仿龙泉卷涡纹碗

上 埃及仿制品 下 龙泉窑

瓷,也有 4000 片^①。1977—1979 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樱井清彦率领考古代表团也进行了发掘。

开罗附近到处散布着青花瓷片。这里从十二世纪以后就不断搜罗和使用华瓷。开罗东郊离爱资哈尔清真寺不远的马拉小丘(Tel Qat el mara)和马木鲁克时期人工堆造的马勒小丘(Bab Darb el Mahruq),都曾出土精美的中国陶瓷残片,从南宋延续到明清时期,有南宋、元、明时期的龙泉青瓷和景德镇清白瓷,以及元、明时期的青

① 俞博《福斯塔特新出土华瓷》(B. Gyllnsvard, Recent Finds of Chinese Ceramics at Fustat), BMFEA(《远东博物馆馆刊》,斯德哥尔摩)No. 45, 1973, 91—119 页; No. 47, 1975, 第 93—117 页。

花器,明清五彩瓷器。名贵的中国瓷器被法蒂玛朝(969—1171年)、艾优卜朝(1171—1250年)和马木鲁克朝(1250—1517年)的苏丹视同珍宝。艾优卜朝的创建者萨拉丁以搜藏龙泉青瓷著闻,他曾以瓷器馈赠大马士革苏丹努尔丁和威尼斯执政,欧洲人因此将青瓷赋以萨拉东(Saladon)的雅号。中国瓷器首次受到欧洲人注意,也是由于这种被埃及君主专卖的龙泉青瓷。贵族、富绅多以收藏华瓷作为时尚。奥斯曼帝国贵族赛赫曼的邸宅,迄今在一座厅堂的二楼,陈设着三四十件十七世纪时中国的青花大盘。

地中海滨的亚历山大里亚富豪住宅,也有陈设华瓷之风。1964年,一支波兰考察队在火车站附近发掘了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的龙泉青瓷片。

埃及陶瓷工匠在十一世纪起用当地瓷土大量仿造宋代青瓷。法蒂玛时期的陶匠赛尔径,更将手艺传授给徒弟,使陶业大为兴旺。十五世纪时,还出现了以格埃比命名的专门仿造华瓷的作坊,并在作品上刻上名字,相沿成风。格埃比的手艺传给了他的儿子,世代相承,使青花瓷的制作精益求精,技艺上大有起色。这种仿青花的陶器,胎色浅灰色,夹有细沙,器底内壁绘有鱼、莲、凤鸟或团花等图样。这种仿华陶瓷已普及到下埃及各地,从生产的小陶碗仿照中国用蓝彩绘上中国花纹,再涂上透明的釉可以知道,技法完全和中国相仿。

九、造纸、印刷技术

三世纪时,通过海陆交通,西亚、非洲都已接触到中国的植物纤维纸。埃及是个大量生产用巴比拉水草(Cyperus Papyrus)加工制作苇纸,在西亚、地中海独霸造纸业的国家。植物纤维纸在这里从开始接触到大量推广,大约花了七百年。284年,来自埃及的罗马商人在交趾(越南北部)得到蜜香纸,这种纸用当地土产的蜜香(沉香)树皮

叶作成,纸中有鱼子纹,纸质坚韧。于是埃及使者采办了三万幅,将它送到洛阳。蜜香纸的信息于是到达了地中海边的埃及。

尽管八世纪起,阿拉伯世界已接受中国工匠生产的新式纸张,但在868年时,伊斯兰国家在用纸方面,仍以利凡特和埃及为界,分成东西两个世界,西部以苇纸为主,东部则以撒马尔罕纸为长。在埃及法尤姆发现的阿拉伯文古纸,分属800—1388年,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书出现在796至815年间。埃及约在杜仑朝(868—905年)末期开始拥有自己的造纸厂,这使从九世纪起开始用作书写材料的植物纤维纸到十世纪逐渐替代苇纸。十九世纪维也纳古文献收藏家雷纳搜集的1.25万卷阿拉伯古文书,经格罗曼在1924年将研究结果予以公布,发现属于回历二世纪(719—815年)的36件都是埃及苇纸,回历三世纪(816—912年)的120件文书中有24件是中国纸,到回历四世纪(913—1009年),86件文书中中国纸已上升到77件。九世纪末埃及自己开始用襁褓制造中国植物纤维纸后,苇纸便相形见绌,不登大雅之堂了。有一封写于883—895年间的苇纸文书,作者最后很有歉意地表白:“苇纸作书,乞予原宥。”苇纸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虽要拖延到十世纪末,但它地位的低落在十世纪中叶已十分明显了。

靠了新式纸张,在阿席兹(975—996年)时期的法蒂玛首都开罗,皇家图书馆的藏书数量猛增到二十万册,使得在389年被罗马齐奥多西摧毁殆尽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光耀,重又在开罗升起。在他的继承者哈克姆(996—1021年)时代,纸之大量用于书写、传抄,促成了那个时代埃及科学与文化的兴旺。埃及造纸使用亚麻与桑科植物,同时还掺入大量棉絮、襁褓。十一世纪初期以来,由于造纸产量剧增,尼罗河沿岸的牧民(贝都因人)和农民(苏拉伊姆族)都热衷于挖掘古墓,从木乃伊身上剥取布条,卖给造纸厂作原料。用棉质纤维制造的纸,质地坚韧,不易破损,是一种价格低廉、原料易得而书写差可与羊皮纸相比的代用品。阿拉伯西部地区,襁褓纸最后得以替代苇

纸,与东部地区的撒马尔罕纸分庭抗礼,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埃及造纸的成功,传遍了非洲和地中海世界,它促成了植物纤维纸最终进入欧洲,代替苇纸和羊皮纸。埃及的植物纤维纸仍然使用埃及历史悠久的苇纸的名称,用 qarātīs,不用阿拉伯语中的 khāgād (穀楮纸)这个新名词。

棉质纤维造纸成了阿拉伯世界造纸业的特色。乾隆《回疆志》(1772年)中就记述新疆出产黑、白两色的“回子纸”。用桑皮、棉布、丝屑为原料,造出的纸粗厚、坚硬。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七世纪四十年代,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每年印刷量在万数以上。东邻朝鲜、日本都请中国印工雕印佛教咒语。后来印刷术又用于民间大量需要的历书和启蒙读物。在埃及,发现的最早印刷品,也是雕印的伊斯兰经典《古兰经》。1880年埃及法尤姆的阿尔西诺遗址出土十万片苇纸、羊皮纸和褴褛纸,其中有些是阿拉伯文印刷品,大部分是十二世纪到1350年前所印。最早的一张是十世纪初用八世纪的字体印刷的《古兰经》第三十四章一至六节(长10.5厘米×宽11厘米)。这时正好是埃及刚刚建立起造纸厂。造纸、印刷技术,得益于中国的发明,十分明显,它是属于中国的新事物、新知识。法尤姆五十件印刷品,只有一件印在羊皮纸上,其余全都是印在新式的植物纤维纸上的伊斯兰教祈祷文和经咒。印刷物的外观,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南宋和蒙元时期的印刷品十分近似。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尤姆又出土了三十块镌刻阿拉伯文的木板,采用阳刻,板框式样和中国一样。印刷的方法,也是用刷帚蘸上油墨,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个别也有用红墨的,在技术上仿自中国。

复印法和雕版印刷,大约在八至十世纪开始从海上远征埃及。当时长江下游极其富庶的扬州也是新兴的雕板印刷中心,当地有许多

穆斯林,往来于长江和广州之间,他们最早发现这种印刷技术对于伊斯兰信仰的宣传十分有用,于是在海上陶瓷之道拓展之初,将印刷技术悄然带入了尼罗河下游三角洲。

在苇纸的故乡生产中国发明的植物纤维纸,给采用雕板印刷提供了可能,雕板印刷的推广,又进一步促使植物纤维纸的需求更加迫切。

在元代,中国的印刷品,特别是各种模印图像的印件继续输入埃及。美国汉学家、印刷史专家卡特指出,埃及发现的一些零星印刷物中有的吐鲁番的艺术品,其中有一幅小型的着色佛像,就来自十三世纪佛教印刷中心的吐鲁番。当时埃及曾追迹伊儿汗国,印刷中国的纸牌叶子格。伊儿汗掀起的印刷纸币风潮,也使埃及知识界震动。埃及艾哈曼德·锡伯·埃丁在《地理书》三十卷中,记述了到过中国的穆斯林的音讯:“中国的钱币是长方形的纸片,用桑皮制造,有大有小,上面印有皇帝的名号,就可到处通用。”这是在1338年死于开罗以前,锡伯·埃丁对中国纸币的论述。当时在伊朗以外,中国的印刷技术和纸钞确实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注意。

但在很长时期中,由于种种原因,印刷术在阿拉伯世界没有被推广。埃及在印刷术西传过程中,充当了亚洲发源地和结出丰硕成果的意大利、德国以及整个西欧印刷业之间非常重要的媒介者。

第一部阿拉伯文书籍的印刷是在威尼斯,由亚历山大·帕格尼尼神父在1485年以后完成的。这本阿拉伯文书籍,像中国书一样,每页只印一面,使用烟炱和胶水溶成的棕黄色油墨。直到十九世纪末,埃及又重新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印刷中心。

第七章 中国和北非、西非诸国 文化交流

在非洲诸国中,和中国首先有过接触的,是通过西奈半岛和西亚大陆相连的文明古国埃及。

非洲大陆在埃及的策动下,通过红海和亚洲大陆的经济纽带,推动了非洲其他地区和国家,特别是非洲与亚洲邻近的周边国家和中华文明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交往。

北非和西非,是非洲大陆和中国在历史上有过文化交流的一个地区。从起点来看,北非地区,自埃及以西,包括巴尔卡(今利比亚北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些沿着地中海南岸的文明国家,由于埃及的牵动和地中海世界的传统贸易关系,很早便和中国有过联系,三世纪时昔兰尼的使者已经从海上到过长江下游的建康(南京),它是罗马东方贸易盛期丝绸文化在地中海世界极为遥远的一种反响。

北非国家与中国的来往,虽然受到地名考订的各种见解不同而难以得到公认的结论,但至少到宋代已有了明确的记载,在元代和明代,彼此的交往更通过北非诸国扩大到了西非。

第一节 中国和北非诸国的关系

唐代和阿拉伯世界有过广泛的接触,埃及以西沿地中海南岸的非洲北部地区,也和中国有信息沟通。这一地区在阿拉伯世界中被称作马格里布(Maghreb),意即“西方”,和“东方”的马什里克(Mashrig)相对。八世纪初,北非的嚙蠃国首先派使者到中国,要求互通使节。《太平广记》卷八二有袁嘉祚奉命出使嚙蠃国的动议,当时岑羲,萧至忠当宰相,袁嘉祚由盐州刺史改调开州刺史,不久受命出使遥远的嚙蠃国。713年,岑、萧二相因勾结吐蕃私通大食案发被处死,袁嘉祚才未闯此危途。嚙蠃国,“在大秦西数千里,自古未尚通使”,这地方正是以突尼斯凯鲁万城为中心的北非。

705年,穆萨·伊本·努塞尔出任伊非利基亚总督,坐镇凯鲁万,脱离埃及而独立,领土囊括西马格里布。712年后,更征服了欧洲的安达卢西。713年到达长安的大食使者^①,应该是凯鲁万派出的使节。于是引起唐朝派使报聘的动议,但未实现。宋代《诸蕃志》记大食属国中的毗啞耶,是阿拉伯语的贝贾亚(Bijāya),正是伊非里基亚的首要城市,位于东马格里布的阿尔及利亚境内。居民效法西班牙奢华风尚,在西欧和北非之间,充当着文化桥梁,地位仅次于摩洛哥。

北非统一王朝,先有桑哈贾人在摩洛哥和安达卢西建立的穆拉比德王朝(al-Murabiṭūn, 1056—1147),后有建都摩洛哥南部马拉喀什的穆瓦希德王朝(al-Muwahḥidūn, 1147—1269),前者在十二世纪被宋人译作“木兰皮”,后者在十三世纪被宋人译称“默伽猎”。默伽猎

^① 《旧唐书·大食传》卷一九八:“开元初(713),大食遣使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

原是“马格里布”(西方)的对音,泛指埃及以西的北非,但从十一世纪起,阿拉伯地理学家又将“马格里布”一名专门用来称呼木卢亚河以西的地区,又称西马格里布(远西),即相当于摩洛哥的境域。《诸蕃志》中的默伽猎即是以摩洛哥为中心,领土扩展到整个北非,并在1172年囊括穆斯林西班牙的穆瓦希德帝国。

摩洛哥因穆拉比德的建国而名扬中国。1062年,尤素甫·本·塔士芬建都马拉喀什城。《岭外代答》(1179年)描述马拉喀什,称作眉路骨惇国(远西,今译马格里布·艾克塞),有番塔三百多座,其中一座高八十丈,内有三百六十房,便是雅各布·曼苏尔(1184—1198年)时建成的高达67米以上的一座塔。当地人的习俗是,“人皆缠头搭顶,寒即以色毛段为衣,以肉面为食,以金银为钱”。周去非又明确宣称,眉路骨惇国是大食千余国中特别知名的五个大国之一,在麻离拔(阿拉伯海岸)之外,居麻嘉(麦加)、白达(巴格达)、吉慈尼(加兹尼)、勿斯离(马什里克——埃及、叙利亚)之列,根本不会是信奉基督教属希腊文化体系的罗马(拜占庭)。

比周去非稍晚,赵汝适的《诸蕃志》,另有一个译名称呼马拉喀什(al-Marrākush),只译出al-Ma两字,称作芦眉国,指出它“自麻啰拔(麻离拔,佐法尔港)西陆行三百余程始到,亦名眉路骨国”。这“芦眉”的国名一出,因为音近罗马,所以迄今常被误认作拜占庭^①,而不能解释眉路骨的原音。“眉路骨”似乎已不是“眉路骨惇”的省译,而是马拉喀什的初译。芦眉当是闽南话的一种省译。欧洲人念成摩洛哥,摩洛哥从此代表着西马格里布的那块土地。赵汝适依照周去非的文字,在描述三百多座番塔中有高八十丈拥有三百六十房

①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65页说:“芦眉疑为Rūm之对音,盖阿刺壁人輿记以名小亚细亚‘希腊人地域’之称也。”于是考作1077—1257年间塞尔柱朝之国,而以所志都城为Kunyah,但又惑于高八十丈之塔,而以为大马士革。今人大多依此为罗马。

的高塔,人皆缠头塌顶以外,着意刻划了当地“有四万户织锦为业”的细节。

当时中国人到马拉喀什去的,都坐船到佐法尔,再由此走陆路,要经过三百多法尔申(约 2000 公里),才到达目的地。周去非、赵汝适那些刻划细致的描绘,一定出自去过那里的人士的亲身见闻。高耸入云的壮丽建筑库杜比亚高塔,迄今屹立在马拉喀什,平面呈正方形,共有六层,每层有房六十间。塔顶中央有一座气楼,上有三个镀金的铜球耸立空中。库杜比亚塔以其雄伟的英姿,使离城三十公里的地方都能望到,作为莫尔艺术的代表,因此早已蜚声中华了。

元代接待的来使中,有摩洛哥马林王朝(1258—1420 年)的使者,大德四年(1300 年)六月,吊吉而(丹吉尔)使者和蘸八(桑给海岸蒙巴萨)、爪哇等国使者一起到达北京,谒见元成宗(《元史》卷二〇)。此时马林王朝的军队正和中马格里布的阿布笃·瓦迪王朝展开争夺首都特累姆森生死决战。使者由海路上麦加,继而东去中国,完成了一次由大西洋东岸跨进太平洋西岸的外交旅程,可称是人类完成环球航程以前,行程最长的一次官方接触。

中国和埃及的通使,牵动了明代中国和摩洛哥以及西非国家的使节往还。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六,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二月辛酉记:“肉速回回哈只阿里麻来朝贡方物,命礼部宴赉之。”“肉速”即“玉素甫”,为马林王朝开创者阿布·玉素甫·雅各布的姓氏,在中国官方档册中以肉速回回相称^①。使者哈只·阿里麻大约在麦加朝觐后,参加了前往印度、中国的海上旅行。

^① 谈迁:《国榷》卷一七误认作鲁迷国使者。今人常将宋代的芦眉国和明代的鲁迷视作一地,其讹大约始于十七世纪的谈迁。

第二节 中国和西非诸国的关系

《诸蕃志》最早记述西非茶弼沙国：“城方一十余里^①。王著战袍，缚金带，顶金冠，穿皂鞋。妇人著真珠衫。土产金宝极多，人民住屋有七层。每一层乃一人家。其国光明，系太阳没入之地。”这个茶弼沙后来录入元人著作，《纪古滇说》、《岛夷志略》、《异域志》都曾提及。周致中《异域志》将茶弼沙倒作沙弼茶国，末句称“汉有人至之”，该是“有汉人至之”。《大德南海志》中，列举与广州通商的国家也有茶弼沙国，同时也可在阿拉伯史家塔巴里《史记》中查到。该国以产黄金闻名，又在远西的日没之地，是古代的黄金国加纳，位置在摩洛哥南部赛杰拉马萨的南面，称金沙之国(Bilād adh-Tibr)，领土相当于尼日尔河上游和塞内加尔河之间，境域包括今日的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东南部。

加纳衰亡后，马里、桑海继起立国，桑海的巡礼者从麦加传回了出产名贵丝绸、精美瓷器的中国的信息。《明史》卷三三二中有十五世纪日落国使者两次来华的记录：“日落国，永乐(1403—1424年)中来贡。弘治六年(1493年)，其王亦思罕·答儿·鲁密帖·里牙(Askiya Ture al Muḥammad al-Hājj)复贡。使臣奏求纁丝、夏布、瓷器，诏皆予之。”1493年使者由桑海国阿斯基亚王朝派遣，明人译作亦思罕。在王朝开创者穆罕默德·土尔(又称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统治期间，桑海人的国家开始从部落联盟转向统一的封建国体，开创了土尔一系的王朝，中译答儿即是族系土尔。《明史》误以使者在弘治元年(1488年)来华，而阿斯基亚王朝的正式开创却在1493年，使者使用亦思罕称号，必定不能早到五年以前。因此，今本《明史》中的“弘治元

^①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75页作“城方一千余里”，系误。

年”，必为“弘治六年”之误。

第三节 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

元代后期，中国贸易家汪大渊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彼此访问了对方的国家。汪大渊用儒家文化的眼光考察了亚非地区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的许多国家；伊本·白图泰从一个伊斯兰文化国家的角度领略了被目为偶像崇拜的异教文化，从而使亚非地区两大文化有了初步的比较。

1334年冬，从泉州第二次出航的汪大渊，以周游非洲为目标，选择了大西洋滨的丹吉尔为西航的终点站。大约在1336年，汪大渊登上了著名的阿拉伯大船木兰舟，离开埃及的杜米亚特，踏上了赴地中海最西端丹吉尔的旅程，该地他称作撻吉那。到达时已是冬季，因此感到“气候半热，天常阴晦”，原因是地中海气候冬天多雨。他所见马林王朝统治下的海港城市，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和玻璃制造业，安息香、琉璃瓶、硼砂和栀子花是当地四大名产，那里的人民以纺织和采矿为主要行业，“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鹤石为活。”制造业和采矿、园艺构成了当地生产和贸易的基础。这里不仅对中国人来说已是世界的边缘，在十二世纪的伊斯兰人士心中，也早认为“丹吉尔是阿非利加边界的尽头”^①。汪大渊十分确切的指出，“国居达里之地，即古之西域”。“达里”是当地游牧民布特尔人中分布最广的达里萨人。“西域”是译自阿拉伯人称摩洛哥为西马格里布（“极西”）。汪大渊深感此地柏柏尔居民的习俗与汉人的风范相去甚远，因此觉得“俗与羌同”。

^① 萨阿德·扎格卢勒：《地方奇闻考证》（《方志证闻》），亚历山大大学1958年版，第139页。

汪大渊以一个具备丰富的国际贸易知识、饱经南海及印度洋航行风霜的贸易家和航海家的身份,亲历大西洋滨的摩洛哥,实现了对伊斯兰国家最全面的考察。当年摩洛哥的风土人情,在他的记录下留存至今。它是新大陆发现以前,旧大陆上的人士进行的路程最长、跨度最远的一次旅行,与1300年吊吉而使者的来华相仿。

在汪大渊结束他的出国访问之后不久,自家乡丹吉尔启程的摩洛哥旅行家、身为法官的伊本·白图泰(1303—1377年),在他周游世界的历程中,从印度搭船来到中国。伊本·白图泰按照当时习惯,用中国(Sin)称呼南中国,用契丹(Kitai)指称北中国。他以为分界线在杭州,以北是契丹,以南称中国。他以阿拉伯文写作的篇幅巨大的游记,原名《异域奇闻揽胜》,完成于1355年12月9日的非斯。1985年由马金鹏据1934年埃及教育部颁布的校订本译成中文,原本略有删节,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刊印。自1858年译成法文后,世界各国已有十五种全译或节译本,中译本是新增的一种。他的游记,可与马可·波罗和汪大渊的游记并列为元代世界三大游记。

伊本·白图泰在中国不足一年的时间内(1345—1346年间)访问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北京等大城市,还在福州、建宁、浦城、江山县清湖渡等地因转换车船而逗留过。

据考订^①,伊本·白图泰在1345年6月1日(回历746年1月29日)抵达泉州,然后去广州访问。1345年8月16日(回历4月16日)离泉北上,取道福州、建宁、浦城,经仙霞岭隘道到江山、杭州,在杭州小住15天后,沿运河北上,经64天水程,在1345年10月19日(回历6月21日)抵达北京。在北京约住46天,经过了圣诞节和农历正旦,节庆气氛热烈约达一月之久。大约在1346年2月6日(回历10月13日)离开北京南下,旅程约费95天,中间逗留约5天,返程

^①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6—417页。

共计100天。到1346年5月18日(回历747年1月25日)离开泉州,前往印度。

伊本·白图泰在遨游世界文明国家之后来到中国,对中国文明的价值与在世界上的地位足以有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他在中国旅行之后,得到的印象是:物产富饶、技艺超群,航业发达、交通便捷,法制严明、治安良好,城市经济高度发展。这位屡次出入开罗、德里宫禁,见过大马士革、巴格达等大城市的旅行家,对杭州城的宏大和繁华使用了最好的词汇,他说要费时三日,才能穿越全城。他对中国人的技艺极为赞赏,并说业经世界公认,绘画尤其精绝人寰。他夸奖中国瓷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又说,中国丝绸之多,使贫民也能服用。中国人用煤作燃料,为世界各地所无。他见到沿河村庄之多,果园、田禾、市镇遍布,胜过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他乐于承认,摩洛哥所产水果,中国无一不有,而且更加香甜。

第四节 文化信息与交流

一、丝瓷文化

中国的丝绸文化最初波及北非,可以追溯到三世纪。《梁书》卷五十四记226年有罗马商人字秦论的到达中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罗马商人字秦论,明显是指他的籍贯,秦论中古音 *dzien-luan*^①,

① 承复旦大学张世禄教授见告。

与利比亚的昔兰尼(Cyrene)城极其相近,城市初建于公元前631年,是地中海南岸著名商业都会和海港。秦论是从利比亚最先走海路到越南,再取陆路抵达南京的第一个北非人士。吸引秦论前往南中国的,正是罗马东方贸易最渴求的丝绸和其他中国著名商货。

元代汪大渊列举摩洛哥需求的进口货有沙金、花银、五色缎、铁鼎、铜线、硫黄、水银,其中五色缎、铁鼎、铜线都是中国产品。在摩洛哥古都非斯的巴塔博物馆里,收藏着该城遗存的十世纪时的中国镶嵌品,显示了中国工艺品早在那时已立足于地中海西部地区。

华瓷进入北非市场较晚。伊本·白图泰访华时,还以为瓷器只产在泉州和广州两大对外贸易港口。当时瓷器确已运销北非,他对瓷器价格的便宜印象特深,曾感慨地说:“瓷器在中国的售价就像陶器在我国一样,甚至更加便宜。中国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到我的故乡马格里布。这种瓷器在当世确是首屈一指。”非斯博物馆中陈列六件方形彩绘明瓷,据博物馆学者介绍,是摩洛哥出土物^①。进入十五世纪,在中国、麦加队商贸易线和郑和宝船贸易线的推动下,瓷器、绉丝、夏布这些中国传统产品直接从海上运到了西非的桑海,提倡伊斯兰化的穆罕默德·杜尔,也将世界文明中为世人所瞩目的丝瓷文化引入了本国。

二、园艺作物

中国原产的杏、梨,在北非生长的历史也很悠久。柑桔,在北非三国的许多方言中都使用Sina(中国)一名来称呼。茶,作为一种饮料成批进入非洲是在十九世纪。十九世纪末,北非也开始饮用茶叶。

中国园艺作物得益于西非、北非的更多。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

^① 韩北屏:《非洲夜会》,百花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

晚于东北非洲,西非形成了非洲的第二个农艺作物中心,油棕、甘薯,甚至草棉,都曾由此向东传播。

草棉(*Gossypium herbaceum*),又称非洲棉、阿拉伯棉,一年生草本或亚灌木,生长期仅 130 天左右,适合于中国西北雨量稀少的旱地栽培。草棉原生种见于西苏丹。大约春秋时代已知中亚骨钎(今霍罕)氏用草木皮做衣服,这种草木皮即是草棉。1959 年新疆民丰出土两块蓝白印花布,是此类棉织物的最早物证,时间在公元二世纪。五、六世纪新疆高昌境内曾广泛引种,名白叠子,织成棉布既软且白。十一世纪时龟兹(库车)以出产花蕊布闻名。公元前后,西南地区也有栽培,所织草棉布,在中南半岛和两广语言中称古贝(或吉贝)布。元代提倡植棉、纺织棉布,当时北方的陕西由新疆、河西引进草棉加以推广,南方珠江流域的草棉也向福建发展。到十六世纪,由闽、广北上的草棉,与自河西东传的一路在河南交会,棉花才普遍于大江南北。中国的植棉业首先得益于非洲棉的推广,亚洲棉的栽培尚在其次,今日繁殖的大陆棉(*G. hirsutum*),只是二十世纪才广为种植的经济作物。

油棕(*Elaeis guineensis*),在公元前一千年已是西非农艺作物区的主要栽培植物。果皮榨油可制肥皂、蜡烛,种仁油用作人造乳酪。在海南岛栽培的不少。

甘薯(*Dioscorea rotundata*),是白薯的古称,俗称山薯、红山药,又叫几内亚薯,为西非内地居民的主食品。三世纪的《南方草木状》记述海南岛居民都掘地种植甘薯作为主食。陈祈畅《异物志》也介绍甘薯出交、广,“南人用当米谷果食”,后来推广到长江流域。

葫芦,首先栽培于西苏丹,已有五千年历史。共分五种。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是小葫芦,距今已有七千年。公元前 1000 年前后,又从海外引入各种葫芦,《庄子》中有盛五石谷的大葫芦。以后又新增扁蒲、长柄葫芦、细腰葫芦(通称葫芦)等种。

酸枣也是埃及和北非原生,中国在三千年前已有,更有西王枣、

赤枣等外来品种。野生非洲北部的黎豆、古埃及已栽培的胡豆子(野豌豆),也都成了中国栽种的豆类。原产赤道非洲,在西非加那利群岛繁殖的龙血树,大约八、九世纪后移植广州,称麒麟竭。

阿勒勃、齐墩树(油橄榄)也自古出产在北非,中国早有引种。生头香(damar Laut)、安息香、蔷薇水、苏合油、梔子花在宋元著作中屡有提及,也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园艺作物。

三、珊 瑚

珊瑚是北非的重要物产。铁网珊瑚的传闻初见于四世纪支僧载《外国传》,后见于《通典》。据说在距地中海东岸七八百里的珊瑚洲海域,水底有盘石,生珊瑚。“大秦人常乘大舶,载铁网,令水工没,先入视之,可下网乃下”。珊瑚初生白,一年后变黄,到二年色赤好,可采,“便以铁锚发其根,乃以索系网,使人于船上绞车举出,还国理截,恣意所作”。这种大秦珊瑚产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沿海,实心扬枝,适于雕琢,是罗马时代的重要出口货,到中世纪仍享誉世界。《诸蕃志》对毗喏耶(贝贾亚)采珊瑚也有记录,仿佛《通典》铁网珊瑚。

唐宋时代珊瑚作为药物,历见《唐本草》、《本草衍义》记载。《本草衍义》卷五记:“珊瑚有红油色者,细纵文,可爱。有如铅丹色者,无纵文,为下品。入药用红油色者。”但《本草衍义》的编撰者因波斯人贩运香药来华,误以为珊瑚出在波斯国,直到1225年赵汝适才确认《本草衍义》所用的珊瑚来自大食毗喏耶,以高三、四尺以上的为贵。元明时代仍通过阿拉伯半岛海运,输入中国。

四、硼砂、玻璃

硼砂,又写作鹏砂(《图经本草》)、蓬砂(《本草衍义》),是一种化

学药品,成分是 $\text{Na}_2\text{B}_4\text{O}_7 \cdot 10\text{H}_2\text{O}$,为制造玻璃,配制钠盐的重要原料。硼砂也是宋代的芦眉国、元代的挺吉那的物产,都是摩洛哥的重要出口货。十三世纪时,中国已知道从化学成分上分析阿拉伯玻璃耐高温,是得益于一种碳酸钠和硼砂合称的“南硼砂”。“南”是阿拉伯文献中天然纯碱碳酸钠(nitrum, natron)的汉译,盛产于埃及。摩洛哥也出产这种硼砂,所以制作耐高温的玻璃很方便,故《诸蕃志》称它出产上等碾花琉璃,《岛夷志略》的作者更亲自在丹吉尔调查到当地出产琉璃瓶。

五、织 物

《诸蕃志》指称马拉喀什有四万户以纺织为业,当地出产绞绡、金字越诺布、间金间丝织锦绮,并有上等碾花琉璃,纺织及工艺制造都颇有特色。输入中国的阿拉伯商货中,也必定有摩洛哥的产品在内。宋代进口棉布极多,以蕃布一名用得最多。十二世纪突尼斯城和它东南的海港城市马赫迪亚所产棉布极为有名,运销他方。波斯湾居民也有服用马赫迪亚棉布的。汪大渊在埃及杜米亚特见到过这种马赫迪亚棉布,他借用菲律宾的一个译名,称作麻逸布。麻逸布一定有销往中国的。

六、蕃 梔 子

蕃梔子(Miichelia champaca)与梔子花不同,俗称西域蔷薇花,产在阿拉伯。《岭外代答》卷七介绍:“蕃梔子出大食国,佛书所谓蔷薇花是也。海蕃乾之,如染家之红花也。今广州龙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梔故也。”这种蕃梔子“状如中国之红花,其色浅紫,其香清越,而有酝藉,土人采花晒干,藏之琉璃瓶中,花赤希有”(《诸蕃志》)。十四世

纪,汪大渊亲临丹吉尔,才知道那里的“梔子花尤胜于他国”。所产梔子为阿拉伯各国之冠,可以入药,可作染料,更可和香。历来运入中国的蕃梔子,便有许多是经阿拉伯各港转口的摩洛哥货。

七、木兰皮舟

中世纪阿拉伯造船业是中国同行借鉴的对象。作为中国在印度洋航业中主要竞争对手和合作者的阿拉伯航业,在造船方面的设计和工艺制造技术,自然成为中国航业界注意的对象。十二世纪中国人所称的木兰舟,即是阿拉伯船。“木兰”两字是“马格里布”(西国)的一种省译。《岭外代答》卷六称:“木兰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桅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置死生于度外。”到了北非,更有穆拉比德帝国制造的木兰皮舟。这种船通航于杜米亚特与丹吉尔之间,“一舟可容数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言舟之大者,莫木兰皮若也”(《诸蕃志·木兰皮国》)。赵汝适说一舟可容数千人是失实,不如在他以前的周去非所谓“一舟容数百人”的说法可信。在马可·波罗东行以前,中国造船界一定以这种木兰皮舟作为造船技术的最高成就加以借鉴,从而改进自己的远航帆船,适应自广州直航阿拉伯佐法尔港的长距离航行的需要。

八、马头琴

蒙古音乐在十三世纪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吸收了许多中国音乐的同时,也通过伊朗的蒙古统治者融通了西亚音乐的某些因素。马头琴是其中之一。马头琴原名莫林·特罗格依·哈列,在琴杆顶部雕有马头。其原型是将现在尚在北非流传的梯形的拉巴卜改装成细长形的乐器,颈部也加长了,在共鸣体下设计了支木架,共鸣箱面绷有马

皮或羊皮,演奏时将共鸣箱置于地上或放在膝上,用配有两根马尾弦的弓演奏。这种大型的胡琴和现代马格里布拉巴卜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呈琵琶式延伸^①,而马头琴则以长柄出现。

^① 见萨米·哈非兹:《阿拉伯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图17。

第八章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中国和非洲之角的历史关系

自红海口向东伸向印度洋的非洲大陆,形成东北非洲的一个半岛,素称“非洲之角”。非洲之角的北部,沿着亚丁湾的南岸,自古居住着含族的库施民族,在它的腹地和南部沿海,则有尼格卢特人和称为“桑给人”的居民。突出在印度洋中的瓜达富伊角,附近香草香木丛生,故称“香角”。索马里沿海盛产乳香、没药,埃塞俄比亚的古港阿杜利在罗马开展东方贸易的初期已崭露头角,据《厄立特里海环航记》(索夫译注本,24页)所记,这里大量输出象牙、犀角、河马皮、玳瑁、猿猴和奴隶;香药也是这里的一项大宗贸易物。由于亚丁湾和红海南部各港在波斯湾和红海贸易线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阿杜利港早在一世纪就已被中国所知。公元100年,更有阿杜利使者来到洛阳的壮举,开创了历史上非洲使节第一次抵达中华文明心脏地区的记录^①。二、三

^① 沈福伟:《中国和非洲国家最早建立的外交关系》,《海交史研究》1984年总第6期。

世纪之际,中国人更将他们经营的广东—南印度航线向红海延伸,开辟了迦那调—加陈航线,加陈是亚丁湾南岸库施(Kush)国家的汉译,所达港口是阿杜利港。在四世纪中叶,埃塞俄比亚的哈巴沙人渡海东征,统治了希米雅尔、拉丹和萨伦,一时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一跃而成称雄红海和亚丁湾的海上强国。到六世纪时,希腊船大多仅到阿杜利为止,难得越过曼德海峡前往亚丁,统治埃及的拜占庭帝国借助于阿克苏姆和希米雅尔船只到南印度和斯里兰卡去接运中国丝货和各种珍奇物产。被称为赛里斯人的中国人也曾在那时进入埃塞俄比亚,介入了以阿克苏姆为一方与以波斯为一方的敌对斗争,赛里斯人和阿克苏姆确曾缔结了非同寻常的丝绸贸易同盟。

唐代的杜环亲自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他从当地人那里学到了摩邻国(海国)的称谓,他是第一个有名可指到过非洲之角的中国人,也是直到今天,我们所知首先访问非洲的中国人。629年到达唐朝都城长安的殊奈使者,是索马里南部黑人国第一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它揭开了索马里和中华帝国建交的第一页。当时波斯商人往返亚丁湾南岸的巴巴拉地区,华商也一定跟踪而入,因此《酉阳杂俎》记述了拨拔力国的情景。拨拔力是汉语对巴巴拉民族最早的译名。阿拉伯古籍中出现巴巴拉地区,约略与段成式同时,在九世纪下半叶。十世纪的伊本·哈克尔还把泽拉岛称作巴巴拉镇,是巴巴拉地区唯一要镇。此时,与该地同名的柏培拉城尚未兴起。

十一世纪时与宋朝多次有过官方贸易关系的层檀国,被宋代档册列入与宋廷建交的有数几个阿拉伯城邦国家,称为大食层檀国,它是泽拉埃米尔统治下联结埃及和亚洲东部的海上贸易枢纽。1071年、1081年层檀使者两次通过海路抵达广州,并赶赴开封觐见宋神宗。沿着印度洋西海岸的索马里南部贝纳迪尔海岸,不但和阿拉伯半岛来往甚密,而且由于印度洋季风贸易受法蒂玛朝和艾优卜朝统治下埃及的推动,也成为非洲沿海对华贸易的成员国。“麻啰抹”这个名

称是贝纳迪尔最早的译名^①。摩格迪沙作为贝纳迪尔最重要的一处海港城市的兴起,开始于908年,来自波斯湾巴林海岸的哈萨七兄弟驾驶三艘大船,统治了贝纳迪尔沿岸直到蒙巴萨的许多居民点,接着在十世纪末基尔瓦的设拉子政权建立后,又迎来了阿拉伯移民纷纷进入东非,推动了东非沿海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中国档册中,1011年首先出使中国的摩格迪沙使者被称作蒲婆众国(波斯语“边城”)来使。1285年,由于元使出访印度洋各国,迎来了马答使者和苏门答刺使者北上大都觐见忽必烈大汗,这才第一次正式使用摩格迪沙的名称,马答是一种省略译法。

十二世纪以来,中国和南阿拉伯的直接通航,推动了中国和亚丁湾以及印度洋西岸的贸易。当十四世纪汪大渊寻访东非时,中国帆船已开始取道马尔代夫前往亚丁,因而和索马里南部地区有了直接联系。到1414年以后,郑和宝船队更有横越印度洋直航摩格迪沙之举,将中国和非洲之角以及整个东非的经济往来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亚丁湾南岸和东非被纳入中国外销瓷的营运圈内,也正与中国帆船的扩大航行范围同步,它使中华文明在非洲之角赢得了声誉,非洲之角又进一步成为东非海岸对华贸易的马首,在历史上展现着它的光彩。到达索马里和东非的中国船上人员常以中国铜币支付他们的日常生活费用,以致华币的出土比之华瓷的发现,更能说明中国人的来访。

自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欧洲耶稣会士来华绘制地图,“埃塞俄比亚”一名才见于文字。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中,在利未亚洲(非洲)绘有黑地兀皮亚(埃塞俄比亚——非洲东北部)、亚毗心域(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马加大作(摩加迪沙)。清代中国人首先编著的地理书中涉及非洲的是《海国闻见录》(1730年),作者陈伦炯按民

^① 沈福伟:《十二世纪的中国帆船和印度洋航路》,《历史学》(季刊)1979年第2期。

族分非洲居民为四类,将含族的阿比西尼亚归入黑人之中,又将东非沿岸的闪族和班图族混居地称为顺毛。

1842年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卷三三《小西南洋利未亚洲》,列出东利未加的阨日多国(埃及)、阿迈斯尼国(阿比西尼亚)。又据《地理备考》,列举卢比亚(努比亚)、亚比西尼(阿比西尼亚)、葛尔多番(科尔多凡)、达尔大(达尔富尔)、亚德尔(阿达勒)、亚然(非洲之角)^①、桑给巴尔各国。于是阿比西尼亚和非洲之角,这些现代地理名词才逐渐在中华大地上普及。

第二节 埃塞俄比亚的古国

一、兜勒国、加陈国

历史上首先记录的埃塞俄比亚是兜勒国。公元97年,甘英为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未能继续实现他前往埃及的使命。但中国和罗马的商务往来,牵动着阿拉伯半岛和红海的社会机制,于是在公元100年有莫札和阿杜利使者的来华。莫札在阿拉伯半岛西南,汉代称蒙奇。阿杜利在红海西岸厄立特里亚,汉代称兜勒,Adulis 由于略去开唇音A,译成兜勒。使者在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抵达洛阳,汉和帝对两起远国的使团像对待近邻一样,优礼相待,以金印紫绶册封两国国王,一如光武帝在建武中元二年(57年)以印绶赐给倭奴国王一样^②。根据汉朝赐给倭奴国王的金印刻字,这两方金印,当是“汉蒙奇国王”

① “亚然”一名起源于中世纪的奴隶角,阿拉伯语 Aser 为奴隶,因贩运奴隶而得名。

② 光武帝赐印,《后汉书·东夷传》仅说倭奴国奉贡朝贡,“光武赐以印绶”。此印在1781年2月23日在日本九州筑前国那珂郡志贺岛叶崎(今福冈县)被一农民掘得,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

和“汉兜勒国王”。兜勒国是汉朝在西域所封最远的国家。

这种盟约关系加强了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商务往来,使中国和罗马的贸易通过这一盟约得到了保证。

226年后康泰出使地跨克拉地峡的扶南时,从南印度东岸科佛里帕特纳启航,或从稍北黄支国(康契普腊姆)出发的船只,绕过南印度科摩林角西航,终点便是大秦。这大秦国在孙吴时代丹阳太守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中说得更具体,是远航船只终点港加陈国。加陈在古波斯铭文中称库施国(Kusa),位于埃塞俄比亚沿岸,它的古港便是阿杜利。100年时阿杜利使者来华可能还是走的波斯湾,但三世纪时中国帆船已可直航阿杜利港了。当时那种远航帆船是张七帆的海舶,从南印度东岸到阿杜利,在季风时节也不过一个多月便可到达了。

二、颇黎国、小人国

汉唐之间,由于颇黎(宝石)贸易的繁荣,联结尼罗河谷和厄立特里亚的大路长期被贝贾人的骆驼队所控制,贝贾人和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结成同盟,经营着非洲最大的宝石贸易。于是,在中国逐渐从经过阿富汗转运的中介商那里,知道在西海彼岸有一个颇黎国。颇黎国,就是因贝贾人称呼那种最名贵的蓝宝石(Sapphire)叫Bahri而得名。非洲东部的矮黑人,也逐渐被遥远的中国所与闻。

最早加以介绍的是魏王泰《括地志》:“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僬侥国”。(《史记·大宛列传正义》)这个僬侥国,不同于在东南亚的东方僬侥国,可称西方僬侥国,在埃塞俄比亚内地。这一信息和拜占庭史家普旁尼斯·曼拉所述红海西岸内地的小人体高完全一样。

三、没药国、摩邻国

《魏略》大秦出口货单中有兜纳香,汉代译称精祗香,此香来自阿杜利,阿杜利一译兜勒,又称兜纳,由输出没药闻名。兜纳香是没药别称。阿杜利在公元前后的中国,早已享有没药国的香国代称。唐代杜环在751年去西海,762年乘船回广州,曾亲去摩邻国考察^①,在《经行记》中叙述:“又去摩邻国,在秧萨罗(耶路撒冷)国西南,度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馐鹑莽,鹑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伊斯兰教)、有大秦法(基督教),有寻寻法(原始拜物教)。”说的是经埃及穿越努比亚沙漠至苏亚金港,再南下至阿克苏姆的见闻。摩邻是埃塞俄比亚人民崇奉的天、地、海三神中的海神(mahram)^②。五、六世纪以来,阿克苏姆在拜占庭支持下称雄红海,于是中国才知道有此海国的摩邻国。mahram原名从hahr(盖伊兹语“海”)变化而成。《新唐书·大食传》对杜环的一段文字加以改写,说在东非“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磨(摩)邻是盖伊兹语名称,老勃萨(al-Habašāt,今译哈巴沙)是阿拉伯语称埃塞俄比亚。

四、层檀、霞勿檀、伽力吉

宋代对埃塞俄比亚另有称谓。从唐代的老勃萨,到十一世纪转译

① 沈福伟:《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

② 摩邻原音至今说法颇多。一说为毛里塔尼亚(1871年勃莱特斯耐德:《古代中国人的阿拉伯知识》),一说在东非(1885年菲特烈·夏德:《大秦国全录》),甚或以为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劳费尔:《中国伊朗编》,1919年)。最后一说引起的误会,迄今在欧洲汉学家和非洲史学家中流传。见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4—230页。

成霞勿擅国(Bilād al-Habashah)。元丰年间(1078—1085年)主管接待外宾的主客郎中庞元英,在《文昌杂录》卷中列举他接待过的层檀(Zayla', 泽拉),南面是霞勿擅国,霞勿擅,原书误为“霞勿擅”。泽拉埃米尔国在656年已由麦加的古莱氏人移民建立,居民为阿法尔人和阿拉伯人。宋代,这里归属阿达勒酋长国。将层檀考作苏丹,以为是巴格达塞尔柱土耳其人建立的王朝,是种误会^①。阿法尔船长,亦即泽拉船长李亚勿(Ali Afar)在淳化四年(993年)追随多次往返中国的希米雅尔船长蒲希密到了中国,并从广州代替老病的蒲希密北上汴梁(开封)朝献,曾与宋太宗赵匡义廷对,声称“与大秦国相邻,为其统属”。大秦国指埃塞俄比亚,泽拉为埃塞俄比亚的属境。此后,阿达勒酋长国派船在995年2月和999年闰3月以蒲押陀黎、蒲押提黎的名义赴华献物。押陀黎、押提黎便是阿达勒酋长国(《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宋会要辑稿·蕃夷四》)。1003年6月,泽拉埃米尔正式派使者婆罗钦、三摩泥来华,在承天节受到赐袭衣、参预大宴的隆重接待(《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在《诸蕃志》中以“伽力吉”一名称呼埃塞俄比亚。伽力吉原意是海湾(Khalidj),相当于阿拉伯的巴巴拉湾(亚丁湾),泽拉附近,埃塞俄比亚沿海都在这一范围以内。

五、于马都国、雅济国

元代立国不久,在1283年9月,正当阿耽出使埃及以后一年,有

^① 藤田丰八:《宋代之层檀国》(载《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216—238页)将层檀的对音考作“苏丹”(Sultan),以为是巴格达苏丹国。将层檀南面的霞勿擅考作“哈马丹”,却不能解释《文昌杂录》中层檀北面的利吉蛮国的所在,更有违于《清波杂志》中称层檀为“南海旁国也”。但至今仍有以层檀为苏丹的(见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或追迹夏德将层檀改为“层拔”,以为桑给巴尔(何芳川:《层檀国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来自冈达拉的商人，“因商人阿畏等来言，自愿效顺”，和中国互通贸易（《元史》卷一二）。当时刚刚恢复统治的所罗门世系，因传说中古代开国君主是位女王马克达，因此，元初被中国目为女人国。1287年，有女人国向中国派来了善于潜水的海人，这种海人亦即来自海国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的水手。作为非洲唯一的一个基督教国家，埃塞俄比亚教会崇奉的圣者塔克拉·海马诺特（Tekla Haymanot 1215—1313年）协助叶海诺·阿姆拉克（1270—1285年）推翻了扎格维王朝，重建所罗门王朝，元代以于马都国相称。1291年9月元朝派使者到印度的俱蓝、马八儿时，也派出使马八儿的礼部侍郎别铁木儿、亦列失金和陕西脱西前往于马都国，表示和所罗门王朝的友好。叶海诺·阿姆拉克的孙子阿姆达·齐荣（Amda Siyon I, 1314—1344年）继位后，国势昌盛，臣服了伊法特穆斯林政权，派使者在致和元年（1328年）到中国，史称雅济国^①。此时埃塞俄比亚可以通过哈拉尔和泽拉港，与中国通航。雅济使者赴华，旨在打破亚丁湾南岸穆斯林的商业垄断。

六、乌沙·刺锡

《明史·外国传》记述永乐年间外国使者来华而未详所在的共十国，其中有乌沙·刺踢。据考订，刺踢是埃塞俄比亚称国王“刺锡”（nejashi，纳加希）之误。1414年，欧洲青年彼德洛·罗伯洛（Pietro Rombulo）被埃塞俄比亚皇帝派往印度、中国。大约在1415年，罗伯洛从印度到了中国，与基尔瓦苏丹护送麒麟的使者同时在南京参加了庆祝的盛典。

^①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7—378页。

第三节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文化交流

一、织 物

中国丝货输送到阿杜利和红海,早见于一世纪上半叶的《厄立特里海环航记》。中国人通过加陈航线或波斯湾来到厄立特里亚沿海的,在公元三世纪时也大有人在。公元400年左右,赫利奥多尔(Hélioddore)在《埃塞俄比亚人》中,描述海达斯帕斯率领象军,前往迎击连战马也披铁甲的波斯军,相助他的有柏来米人和赛里斯人组成的步兵。波斯骑兵最后被赛里斯人和柏来米人压倒,直至被歼灭。海达斯帕斯“随后传令接见带来丝线和丝织物的赛里斯人使节。使者们另外还带来了服装,有的染作大红,其余是素白色”(X,25)^①。这里的赛里斯人确实是到达厄立特里海的中国人。甚至阿杜利主教莫塞斯也在四世纪末到印度后,又向北跑遍了整个赛里斯国。圣—安布卢瓦兹(340—397年)在他的著作拉丁文译本中引证莫塞斯对赛里斯国的观感:“那里不仅有长满树叶的森林,而且还出产一种细羊毛,被人们用来裁缝一种叫‘赛里斯’的服装(指丝衣——引者)。他在那里见到了一根美观的石柱,上面刻有题铭:‘我,亚历山大,曾抵达此处’”^②。亚历山大石柱应建在大宛(费尔干纳)西边,那地方自公元前103年后便属于中国了。莫塞斯至少去过敦煌,甚至有可能进入前秦的都城长安,丝绸对他来说,应已饱览无余。

中国早在二、三世纪之际,已从埃塞俄比亚进口温色布。温色布

^① 戈岱司:《希腊罗马文献中的远东》,巴黎,第114页。

^② 同上书,第100—101页。

是阿杜利出口的埃塞俄比亚优质棉布，“温色”译自阿比西尼亚的阿拉伯名称哈巴沙(al-Habaš at)，对音是 baš āt。元明时代，埃塞俄比亚通过泽拉和从到达那里的印度坎贝航船继续进口中国丝货。十七世纪，埃塞俄比亚王室还从中国进口镀金床和床上使用的丝织华盖。^①

二、陶 瓷

珍贵的华瓷，在埃塞俄比亚曾被当作神圣的贮藏物。埃塞俄比亚西北部塔纳湖中有一座里马岛，岛中的一座教堂内有一件精美的明代瓷罐，罐中盛放着死于 1597 年的塞斯一顿吉尔皇帝的内脏。塔纳湖北岸 100 公里的冈达尔，曾是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冈达尔王国的都城，在十七世纪宫殿遗址中出土许多中国瓷片，伊亚索皇帝(1682—1706 年)建造的宫殿中，以镶嵌华瓷作为壁上装饰。

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出土华瓷最多的遗址均在泽拉以南，共有八处。其中奥博巴、谢赫巴卡布、德比尔、奥贝尔(自北而南)四处位于埃边境南沿。1934 年泰勒和柯尔在这里发现了十二至十五世纪的青瓷，青花瓷都系十六、十七世纪物。1950 年，杰弗士·马修在商业重镇哈拉尔发现了粗青瓷片。哈拉尔东南的达加布尔、鲁加伊和埃伊克，都发现过南宋和元明时期的陶瓷残片，多数是青瓷和青花瓷。1934 年，泰勒和柯尔在鲁加伊的清真寺内发掘了青瓷片。此外，也有十六世纪初的釉里红残片。有的华瓷残片出土地点已深入内地 300 公里处。

三、香 药

埃塞俄比亚自古以出产没药(*Commiphora molmol*)著称，汉代

^① 伯金罕、亨丁福编：《埃塞俄比亚史料》，1954 年版，第 59 页。

最早译作精祇香，“精祇”因埃塞俄比亚语称邻近黑色居民(Zang'ea)得名。没药为该地主要产物。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出产阿比西尼亚没药、厄立特里亚没药和非洲没药。二世纪后又称兜纳香。至今哈拉尔地区以产上等没药闻名于世。

阿拉伯胶，在《魏略》中称芸胶，宋代又作乌香、乌黑香，埃塞俄比亚高原北部塞纳尔也有出产，宋代从马萨瓦、泽拉诸港和阿拉伯香岸运到中国。

白胶香，是出产在埃塞俄比亚、埃及和犹地亚的一种橄榄科常青树阿勃参，埃及到十一世纪才有栽培。此树栽培不易，树枝流出的浅绿色香胶，对治疗创伤具有特效，价比黄金。

另一种染色原料红花，古代仅有印度和埃塞俄比亚出产，两地都以红花替代昂贵的蕃红花(Saffron)，作为染制深黄色颜料。埃塞俄比亚为红花原产地，简称泊夫(Suf)，历来用作染黄的唯一颜料。宋代曾有大量输入。直至明清，埃塞俄比亚仍是主要出口国。

香药中最珍贵的是膾肭脐。膾肭脐，产自香狸的肾部，是埃塞俄比亚的特产，叫香狸蜜。四世纪的《抱朴子》已知亚丁湾南岸勃焚洲(巴巴拉海岸)出产狷狷兽，狷狷兽又称狷狷，是香狸的本名。唐代以来陆生的膾肭常和水栖的骨狷(海狸)相混。《诸蕃志》虽知膾肭脐出在伽力吉，但末句却说“番惟渤泥最多”，将出产海狸的婆罗洲和古代的勃焚洲混为一谈，致自相凿枘。

四、动物

埃塞俄比亚自古以输出非洲大象牙为最主要的产品。世界上大象牙大多来自此处。唐代进口象牙甚多，用制笏、带、车辂、牙雕、牙箱和餐具。

犀角与象牙一样，在公元初已是阿杜利港闻名遐迩的出口货。埃

塞俄比亚区的双角犀即是《魏略》中盛称的“大秦多骇鸡犀”。汉代已用犀角作解毒药,后用于消疫、解热,治疗伤寒。

玳瑁也是大秦物产,列入《魏略》,在《厄立特里海环航记》中阿杜利、阿维里(泽拉)都出口玳瑁。玳瑁在东南亚、印度洋以外,也从红海运进中国。

古代仅产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长颈鹿,在汉代也已由海路运入中国,借用波斯语“如牛豹的骆驼”(Shotor gāv-u-palang),简译麒麟,是 gāv-u-palang(牛豹)的首尾两个音节。写实的图像见于江苏徐州贾旺东汉画像石中的麒麟,是九头神态各异的长颈鹿,头上生有小巧的对角,与许慎《说文解字》中对麟的描述“马身,肉角,牛尾”略同。到明初又从阿拉伯和非洲各地作为神物运送,献给中国皇帝。

五、珠 宝

大秦明月珠中,一定有红海南部达拉克群岛和厄立特里海沿海出产的珍珠。宋代《诸蕃志》介绍:“真珠出大食国之海岛上。”除了波斯湾、阿曼等地外,达拉克群岛真珠也在其中。《清波别志》称层檀(泽拉)产真珠,在宋代曾是为数可观的贸易品。

柏来米蓝宝石在公元初即已享名中国,《十洲记》称作碧颇黎,是一种碧色宝石。在贝贾人(柏来米人)中,这种蓝宝石便以颇黎(Babri)相称。曼苏地在十世纪写的《黄金草原和珠宝矿》中,讲到这种蓝宝石从阿杜利运到印度西部巴里格柴后,再由陆路运往中国,用于印度和中国皇冕上的宝饰。^①

埃塞俄比亚所产黑曜石,是种黑颇黎,开采历史悠久,运到中国也早,在《玄中记》中已入大秦五色颇黎之列。

^① 梅纳、科蒂勒法译本(Le^s prairies d'or),1861--77,巴黎,Ⅱ,44页。

第四节 索马里的古国

一、肉桂国、勃焚洲

公元前十五世纪,位于非洲之角,现在索马里北部的邦特国,因出产肉桂、没药,招致埃及女王哈特舍普派出船队前去取宝。但肉桂的原产地却在中国,中国肉桂有十六门,桂有十三门,品种之富,甲于天下。斯里兰卡也产一种锡兰肉桂,史特拉波(XV,iv,19; XVI,iv,25)因此以斯里兰卡为肉桂国,认为亚丁湾两岸早已移植这种植物。普林尼(XII,42)、托雷美都以埃塞俄比亚为肉桂产地。邦特国的肉桂大约也来自中国、斯里兰卡运进索马里沿海后,再和桂皮相混,然后输出埃及和阿拉伯。公元前后,索马里的肉桂转运港是塔坂(Tabae),现在的钦那里夫角^①。钦那里夫角通过肉桂的输送,称得上是中国和索马里最早有过间接联系的港口。

中国人第一次得知索马里北部这块地方,大约是在中国帆船开辟伽那调——加陈航线以后。四世纪后的《抱朴子》提到:“勃焚洲在南海中,熏陆水胶所出,胶如枫脂,所以不可多得者,止患狢獬兽啖人。”勃焚洲即是产狢獬兽(香狸)的巴巴拉洲的古译。巴巴拉是阿拉伯人称呼亚丁湾南岸泽拉以南舍族与桑给族混居区的名称,原名 Bilād al-Barbarā,葛洪译作勃焚洲。勃焚洲的狢獬兽和盛产乳香(熏陆)的信息,是中国南方的航海者最早传递的索马里知识。502年被译作斯头(Sukhatara)的索科特拉岛,曾派出贸易代表和斯里兰卡使者同赴洛阳,和北魏正式发展贸易关系。

^① 索夫:《厄立特里海环航记》,纽约,1912年版,第23页。

二、唐代索马里

索马里在唐初已和中国正式建交。《唐会要》卷九八：“殊奈国，昆仑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外三月余日。习俗文字与婆罗门同^①。绝远。未尝朝中国。贞观二年(629)十月，使至朝贡。”殊奈对音是波斯语、阿拉伯语称黑人桑给(Zang, Zing)的复数 Zunug。桑给，唐代译称僧祇，僧耆或仍建。瓜达富伊角古称香角，又因居民而称僧祇角。殊奈使者来自索马里南部班图王国的首都桑加亚(Shungwaya)，此地在今布尔高。这是唐代非洲国家向中国派出的使团中最早的一个。

段成式在860年左右写成的《酉阳杂俎》中，非常完整地记述了索马里南部和北部的情况，南部桑加亚附近库施血统的游牧部落，包括自北南移的西建(Segeju)部落，惯于围栅而居，并接受波斯湾移民，崇信祆教，拥有马步甲兵一万，称孝亿国。孝亿或即桑加亚的省译。朱巴河以南，直至加拉纳河以北的肯尼亚东北部荒原，被称作仍建国，亦即“僧祇”(今译桑给)的异译。到过摩加迪沙、桑加亚、拉木群岛的中国航海家，向段成式提供了实地采访东非风土的材料。索马里北部，段成式称作拨拔力国，是据巴巴拉音译。“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龙涎香——引者)。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聚数千人，赍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此国是盖拉人在亚丁湾南部所建国家。据此，盖拉族的东移应在索马里族之前，而不是在索马里族东迁之后^②。在盖拉族之外，居住在亚丁湾南岸的另一个民族是达卡利人，复数达纳基尔(Danakil)人，段成式译作怛干国，怛干亦即阿法尔人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指出，殊奈“与婆罗同俗”，此处婆罗恐指岛民(poulo)，意为南海(包括印度洋)居民，肤色黝黑。《唐会要》的“婆罗门”，系“婆罗”之误。

②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0—233页。

的阿拉伯称呼。段成式又以悉怛国译称阿瓦什河上游放牧的锡达莫人(Sidamo)。

三、宋代三麻兰、麻啰抹

索马里民族在其形成的初期已出现在中国史册中,时间之早远过于阿拉伯文献。

《宋会要辑稿》首先记录 1003 年使者三摩泥来自泽拉,又记 1011 年有三麻兰国船长聚兰和阿曼的苏哈尔船长、贝纳迪尔的摩加迪沙船长,伴同埃及杜米亚特使者同来汴梁(开封)朝贺。二月十七日,“三麻兰国(索马里)舶主聚兰、勿巡国(苏哈尔)舶主蒲加心·乌惶、蒲婆众国(摩加迪沙)麻勿和勒、大食国使陀婆罗(杜米亚特)、延州诸族军暮尾埋并诣行在朝贡”^①。索马里船长聚兰,是泽拉的音译。蒲婆众国的波斯语是 mui wa mwisho。波斯移民称他们手建的摩加迪沙是“边远之城”,粤音蒲婆众。

十一世纪初的三麻兰,相当于阿拉伯地理书中的巴巴拉。作为索马里的北区,《诸蕃志》(1225 年)译作弼琶啰,分成四州(泽拉、柏培尔、哈尔格萨和哈拉尔)^②,和卡卡山脉以南的南区中理有明确分界。中理,闽南话念作申理,对音也是索马里。在赵汝适的时代,由于索马里民族(萨马勒、萨卜等族)的东迁,因此以南区为索马里国。宋代索马里对华贸易港,北方有泽拉,南方有新兴的摩加迪沙。索马里南部靠着印度洋,北起伊塔拉南至基斯马尤的贝纳迪尔海岸,称贝纳迪尔洲(Barr al-banadir),便是赵汝适音译的麻啰抹,麻啰抹地区最主要的城市,是中国人熟悉的摩加迪沙。

^① 《宋会要辑稿·蕃七》,《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66—268 页。

^② 哈拉尔今属埃塞俄比亚。

四、元代马答国

1285年,马答使者和速木都刺(苏门答腊北部)使者同到大都觐见忽必烈。马答按摩加迪沙的阿拉伯语读法 *makdashau, maqdashau* 译出。《马可·波罗游记》曾说,大汗派使者到过位于索科特拉和桑给巴尔岛之间的“马达加斯加”,这个被误传的马达加斯加,在主要手稿中读如 *mogelasio*,源自 *mogdicho*,相当于摩加迪沙居民的斯瓦希里语的土音^①。大汗的使者是1282年2月第二次出使印度俱蓝(今奎隆)的杨庭璧,他在离开印度后又去过东非,摩加迪沙是必经之地。马答国使者赴华正是对中国使节的回访。1288年又有来自桑加亚的鬼国使者赴华,汪大渊译作鬼屈部落。汪大渊称摩加迪沙是班达里,根据贝纳迪尔海岸译出。

五、明代木骨都束

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自第三次(1409年12月—1411年6月)起,宝船队派出分遣船队初访摩加迪沙、朱巴和布腊瓦三个索马里南部海港城市^②,此后每次出航,均有船队到达摩加迪沙、布腊瓦。当第七次(1431年12月—1433年7月)下西洋时,中国宝船最后一次开赴摩加迪沙和布腊瓦、朱巴。摩加迪沙在明代记录中

① 格朗迪蒂埃:《马达加斯加历史地理》(A. Grandidier, *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de Madagascar*), 1892, 第26页;伯希和:《马可波罗校注》(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1963, paris), 1, 第779—781页。

② 陆容:《菽园杂记》卷三,自称根据费信《单槎胜览》(《守山阁丛书》卷三,《纪录汇编》卷一八一),其可靠性的讨论,见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6—458页。

称木骨都束,布腊瓦作卜刺哇,朱巴河口的朱巴则称竹步。随船三次下西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卷四,根据前往索马里的航海人员的报道作了描述,为宝船实航东非留下珍贵的记录。明初宝船开辟了自福建长乐——苏门答腊西北龙涎屿(朗多岛)——别罗里(斯里兰卡皮林格)——溜山(马尔代夫群岛马累岛)——瓜达富伊角的长距离航线,开通了华南、索马里、亚丁航路;此线比之已有久远历史的从南印度跨越阿拉伯海远航亚丁的北线,可以称为印度洋航路的南线(近代自亚丁湾沿瓜达富伊角东转马尔代夫群岛北部至南印度科摩林角的帆船安全航路)。由于东非在航运和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递增,宝船又辟有别罗里直航摩加迪沙、布腊瓦航路。因此,在1416—1423年迎来了摩加迪沙和布腊瓦四次派使团从海上随宝船来华通商、朝献。

第五节 中国索马里文化交流

一、香 药

唐代以前,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期间,运到中国的索马里香约有十种。

没药,传入中国最早,初名精祇香。

“精祇”是“桑给”最初的汉译,精祇香为桑给国(黑人国)的特产。在中国,索马里没药(*Commiphora molmol*)一直享有盛名,是重要的中药材之一。索马里没药品质优良,胜过阿拉伯香岸所产的阿拉伯没药。宋代从索马里大量进口。《诸蕃志》已确认“没药出大食麻啰抹国(贝纳迪尔)”。又说索马里北部弼琶啰国(巴巴拉)也多没药。

苏合香,来源虽较复杂,但索马里所产野茉莉属植物的芳香分泌物早经炼制,具有开窍醒脑的功效,以起死回生的神功著称中国。

狄提香,以盛产上等芦荟的索科特拉岛的希腊名字称闻。

迷迭香,一称迷迭香,产索马里北部。

薰陆(乳香),索马里是足与佐法尔、阿拉伯香岸并列的乳香三大产地之一,当地产品从索马里语分别称作贝奥树(*Boswellia bhandajana*)、迈迪树(*Boswellia Freereana*)、梅迪树(*Boswellia Carteri*)三种乳香属植物提取香脂。梅迪树产量尤大。《星槎胜览》将乳香、龙涎香与金钱豹列作摩加迪沙的三大名牌货。明代进口乳香,已可直接从索马里运到中国,不必经过南阿拉伯。

安息香,为密儿拉属 *Blasamodendron africanum*,《魏略》称芸胶,索科特拉岛称返魂树,已见《十洲记》。

阿拉伯胶,亦属芸胶,索马里南北都产。索马里所产塞伊耳相思树(*Acacia Seyal*)脂,也是芸胶的一种。

木香,产于阿拉伯香岸、佐法尔和索马里沿海,汉代又名木蜜香,云南西部、缅甸北部永昌山谷已见移植(《太平御览》卷九九一),根窠大类茄子。五世纪后多从海上由亚丁湾运华。

血竭,多生东非,索马里北部、索科特拉岛都产百合科编褶木属热带灌木树脂,尤以豆科紫檀属(*pterocarpus*)血竭为贵,传入中国初名麒麟竭,也兼指紫钳。苏敬《新修本草》(659年)已知索马里麒麟竭的斯瓦希里语名称渴留(Kino)。《诸蕃志》以为血竭出大食国,阿拉伯本土不出此物,多从索马里、肯尼亚运去。

龙涎香,《酉阳杂俎》称阿末香,出自波斯语'anbar,为拔拔力国特产。亚丁湾南岸和桑给地区出产头等的龙涎香,九世纪以后至十六世纪运入中华的很多。《诸蕃志》称索马里南部“山出血竭、芦荟,水出玳瑁、龙涎”;龙涎是索马里南部海岸的名产。1071年层檀(泽拉)使者到开封的献物中有白龙涎、黑龙涎香。南宋进口龙涎,有来自索马里的,陈敬《香谱》卷二有古龙涎香一方,即桑给龙涎;又有出尘香(正作“出窟香”)九方,即古称“聚窟洲”、又译“出窟洲”的索科特拉龙涎。

为当时与阿拉伯龙涎、印度龙涎并列的四大龙涎香之一,到明代仍依波斯语名称唵叭儿香。斯瓦希里语的《帕特纪年》称,曼达岛的龙涎竟引得巴肯伯发动战争去征服这个商业颇盛的小岛。因此龙涎在中国也备受推崇。

二、矿物

琥珀,中世纪也产在桑给国。885年雅库比首次提到桑给琥珀仅次于香岸,常运往亚丁销售。十世纪后索马里琥珀产量大增,曼苏地《黄金草原和宝石矿》(I,333)甚至说,最佳的琥珀见于桑给诸岛和海边,圆而纯蓝,有的竟大如鸵鸟蛋。在中国,这种大琥珀有951年进口的三十颗。宋代琥珀大量进口,海陆并运,既供装饰,又充药用。明代桑给琥珀和地中海琥珀均以麦加、亚丁为市场,仍有运入中国的。

明代进口的苏麻离青,以钴蓝为制造青花瓷器的重要呈色剂,因其发色明艳而胜于国产钴料。这种青料自永乐、宣德年间即从索马里进口。明代中叶又由云南进口回青,回青中相当部分恐仍来自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也有来自波斯湾的。东非和中非各地所产钴蓝是铜矿的副产品,大多运往摩加迪沙,再输送亚丁和阿拉伯世界。回青多从海路至云南,或通过苏门答腊来华。回青中最美的叫佛头青,“佛头”一名过去无考。在十二世纪伊德里西《地理志》中,称摩格迪沙附近贝纳迪尔沿海叫Baduna,亦即中译“佛头青”的来源地。这种进口青料是正德、嘉靖年间制造青花瓷的上等呈色剂,发色明艳,经久不褪。

三、动物、毛皮

长颈鹿是埃塞俄比亚高原和亚丁湾南岸热带灌木林区的动物。绍兴、乾道年间(1131—1173年)李石《续博物志》明确论述长颈鹿叫

驼牛：“拨拔力国有异兽名驼牛，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项长九尺，身高一丈余。”“驼牛”出于波斯语 Shotor-gav。《诸蕃志》又根据阿拉伯语译作祖蜡(Zarafa)。十五世纪初孟加拉、亚丁、麦加等地使者所献麒麟，也来自索马里。麒麟，是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根据索马里语 Giri 译出，又符合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瑞兽，由此进一步印证了古之麒麟虽借自波斯语，却同样也指长颈鹿。

金钱豹是元明时期通过西亚大量输送到中国的另一种动物，产地以索马里和东非居多。豹皮被充作马鞍，大多由穆斯林商人转运来华，数额十分可观。曾随郑和宝船队出航的费信，将金钱豹列入摩加迪沙三大物产之一。豹又是布腊瓦的特产。

狮子，产于西亚、非洲，1417年摩加迪沙使者带进中国。

花福鹿，是非洲野兽，又译作花福禄，也称福鹿，译自索马里语 faro，今称斑马，也是1417年摩加迪沙使者送给永乐皇帝的礼物。有画师写实的福鹿图，收入宣德年间的《异物图志》中。

马哈兽，是布腊瓦特产，也是各种东非特产羚羊的通称，以大角斑羚最为珍贵，皮呈浅火黄色，背侧有黑色和淡黄条纹的花纹。据《星槎胜览》，马哈兽仅产于布腊瓦，“地产马哈兽，状如麝獐”。这种“长角马哈兽”在1417年由亚丁使者带到中国，进献朱棣。

驼鸡，又称鸵鸟，是布腊瓦使者在1417年向朱棣进献的礼物。

千里骆驼，是布腊瓦使者在1417年向中国皇帝赠送的礼物。此种骆驼能耐饥渴，长途跋涉，故称千里骆驼，犹如马中之千里马。

麂，也是索马里动物，《星槎胜览》称它生在布腊瓦。麂皮纹理细腻、用途亦广。是布腊瓦使者进献中国皇帝的礼物。

犀牛，犀角入药，可解毒、解热，降低血压有奇效。多产在东南亚、印度、非洲。特别是索马里北部弼琶啰(巴巴拉)大犀角，重十多斤，价格昂贵，胜过著名的泰国堕和罗犀角。宋代称为大食犀角的，实来自索马里。这种犀角，“文如茱萸，理润而缀”，称为通天犀。

象牙,以非洲所产象牙为最。非洲象牙既大且廉,纹理细密,适于雕刻。中世纪中国已渐成象牙重要输入国,用作制笏、带、车辂、牙箱、牙雕。大象牙多从泽拉和摩加迪沙输往中国,《诸蕃志》说弼琶啰国象牙重百余斤。雅库特也将象牙列作摩格迪沙四大出口货之一。

四、木 料

乌文木出产在埃塞俄比亚。埃及第十八朝时,已由努比亚作为贡品运入尼罗河三角洲。大流士时代,乌文木又是进贡波斯的良好材。汉晋以来,乌文木多从也门经海路运到交州,又称翳木或翳豨木(原作“豨翳木”)^①,是古埃塞俄比亚语和柯柏特语中的 heben。雅库特《地理辞典》将乌文木、檀木列入摩加迪沙四大出口货中。973年吴越王钱俶向宋朝曾进献乌纹木椅子、踏床子,即是这种进口贵重木料。

檀木,分黄檀、白檀、紫檀,来自东非的多半是紫檀(*Pterocarpus Santalinus*),为摩加迪沙重要出口货。《唐本草》说:“紫真檀出昆仑盘盘国,虽不生中华,人间遍有之。”昆仑盘盘不同于马来盘盘,系巴巴拉的唐译。当年曾大量进口,故称人间遍有。

五、陶 瓷

索马里出土中国陶瓷的地点近三十处,北部集中在泽拉以南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博腊马地区,南部集中在摩加迪沙以南,此外在东端哈丰角也有发现。十二世纪后,华瓷已成索马里居民的日用器皿。

位于海港城市泽拉对岸的沙埃丁岛,曾发现中国进入外销瓷时期以后不久的一些瓷片。柯尔在1934年,亨廷福在1943年先后在这

^① 《古今注》,见《太平御览》卷九六一。

里发现青瓷,时间早到十世纪。1950年马修在沙埃丁岛也发现了许多青瓷片。博腊马地区的阿巴萨、阿姆德、戈吉萨、哈萨丁尔、达米拉哈德、科尔加布、阿罗加拉布、比约达德拉、德尔比加达德、穆萨哈桑和卡巴布等十一处遗址都见到中国瓷片。1934年泰勒和柯尔在十一处遗址的清真寺和石砌房屋中发现了十二至十五世纪的青瓷,还有十六至十七世纪的青花瓷。1943年亨廷福对阿姆德等遗址的调查,再次发现大批华瓷残片。1950年马修继续调查并发掘了其中的三处,出土了青瓷、青花瓷,并有少量的釉里红和浅色青白釉瓷片。位于柏培拉南面的埃尔乌莫和埃克,1934年柯尔都曾见到青瓷和青花瓷片。

哈丰角附近哈丰村,1975年经奇蒂克发掘出土的十八至十九世纪青花瓷片,代表了年代最晚的华瓷输出物。

1975年,奇蒂克在摩加迪沙北面的阿拜达哈姆发掘出了十四世纪的青瓷片。摩加迪沙是索马里出土华瓷最丰富的地方,早在1898年,德国研究东非文化史的斯徒尔曼在该地附近发掘,获得大批青瓷片,并有八枚宋代铜钱。摩加迪沙以南的梅尔卡,1947年马修在海滩边也见到青瓷片。朱巴河口以南的基斯马尤向南直到桑给巴尔岛,沿岸华瓷遗址丰富。在索马里境内,自基斯马尤直至边境的基安博尼角,有七处遗址发现华瓷。基斯马尤以南的拉西尼,1953年格鲁登尼里在此发现明代青花瓷片。库拉也见到明瓷,并在一座柱墓顶上镶嵌着一件广东窑瓷罐。库拉南面的布尔高,英人称作邓福特港,1955年惠勒和马修在当地柱墓顶上发现一件大瓷罇。距布加沃11公里的布恩达尼,也出土有青花瓷片。索马里南部边界附近的汉诺萨,在两座柱墓旁发现了青瓷和青花瓷片。基斯基其尼出土的瓷片,多数是青瓷片。靠近边境的基安博尼角,在城墙、房屋、墓葬和清真寺遗址内散布的瓷片,大多属十五至十六世纪的青瓷,其中发现一缸胎釉陶残片。南部海域的科埃马群岛,发现大量中国古瓷残片。

1947年,马修在奥·加鲁因岛上一座城址中发现了早期青瓷

片,可能是九至十世纪之物。这一发现似乎为唐代殊奈的通使,提供了一些可供探讨的线索。

六、钱 币

索马里有三处地方出土了中国钱币共 50 枚。摩加迪沙发现的中国钱币共 47 枚,为东非各地发现中国铜币 仅次于桑给巴尔岛的地点。

1898 年德国史徒尔曼在摩加迪沙发掘出 8 枚中国钱币和许多青瓷碎片。该年斯特兰德斯又在同一地点收集到 7 枚华币。经夏德研究,多属十一和十二世纪。并被保存在柏林民俗博物馆。后来在摩加迪沙又收集到 6 枚永乐通宝,一枚十七世纪,一枚十九世纪。以上这些中国铜币,共 23 枚。

1959 年《通报》编辑部收集的 35 枚钱币照片中,有中国钱币 27 枚,其中 24 枚出自摩加迪沙,从北宋咸平(998—1003 年)到南宋咸淳(1265—1274 年),并有五代南唐李璟(943—961 年)所铸“唐国通宝”1 枚。完整的宋钱有宋真宗“天禧通宝”1 枚、宋神宗“熙宁重宝”2 枚、“元丰通宝”2 枚、宋哲宗“元祐通宝”2 枚、宋徽宗“圣宋通宝”2 枚、“政和通宝”2 枚、宋高宗“绍兴元宝”1 枚、宋理宗“大宋元宝”1 枚、“淳祐元宝”1 枚、明成祖“永乐通宝”2 枚、清文宗“咸丰□宝”1 枚。

此外,布腊瓦出土“淳祐元宝”(宋理宗)、“顺治通宝”(清世祖)各 1 枚,梅尔卡出土 1 枚华币碎片。^①

① 费莱西:《中世纪的中国与非洲》(T. Filesi: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伦敦,英译本,1972,42—43 页;俞思维:《索马里发现的华币》,刊《通报》(A. F. P. Hulswé: *Chinese Coins found in Somaliland*),《T'oung pao》XLVII, 1—2, 1959, 81—83 页;弗里曼-格伦维勒:《摩加迪沙发现的钱币》,刊《钱币学年刊》(G. S. P. Freeman-Grenville: *Coins from Mogadishu, C. +1300 to C. +1700, but including Chinese Coins from The +10th to The 19th Centuries*),《Numismatic Chronicle》1963, ■, 179 页以下。

第九章 中国和东非、中非、南非诸国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中国与肯尼亚、坦桑尼亚

一、历史关系

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两个东非国家，仰赖印度洋早就和亚、欧、非许多民族通航。从桑给巴尔岛前往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的距离是4000公里，与地中海的东西之长约略相仿。趁每年十二月的东北季风和三月以后的西南季风，赤道以北的航海民族便可出入东非沿海和附近岛屿。迟至纪元初，印度人、犹太人、腓尼基人和亚述人都已航行到东非。中国人加入这一行列，虽已晚到中世纪初期，但中华文明，特别是它的陶瓷文化，一开始便成了这一地区璀璨的明珠，激发了东非社会向前推进的火花。

最早在东非南部建立政权的，是975年离开波斯的哈桑·本·阿里和他的六个儿子，他们占领了北起蒙巴萨南至基尔瓦和科摩罗岛的非洲沿岸及岛屿，历史上的桑给帝国便靠了这种由亚洲伊斯兰

移民开创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权,一直维系到葡萄牙殖民势力的到来。阿拉伯—波斯文明将东非纳入印度洋贸易圈,并进一步推动着该地和中国、印度的联系。八世纪末贾耽记录的三兰航线,是到达波斯湾的中国帆船沿着早在七世纪末阿拉伯移民便已开辟的东非航线南行的记录。贾耽在记述中国帆船从广州通往波斯湾头乌波拉的航路(广州通海夷道)后,介绍这条航路在进入印度西海岸后,它的西岸都属于大食国的统辖范围,然后用倒叙法,由南而北叙述从三兰国北航直至波斯湾头乌波拉的航路。这段路程,即是“三兰航线”。贾耽记述自位于索法拉地区的三兰国正北航行二十日,中经小国十多处,达阿拉伯香岸的设国(al-Shihr),又航行十日,经小国六、七,到萨伊瞿和竭国(Shahr-i Kalhāt),然后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历阿曼湾、波斯湾,实航三十七天到乌刺(乌波拉)登岸^①。三兰航线启航地点在桑给巴尔岛西岸的翁古贾·库乌(Unguja Kuu),面临南纬6°左右的桑给巴尔海峡,此地在十三世纪以前长时期为季风贸易的安全航行枢纽,在阿拉伯移民来到前早有黑人居住,它是中国帆船出入的港口。五、六世纪以来印度尼西亚居民跨越印度洋,涌向东非沿海,给探索印度洋南部东起苏门答腊西至肯尼亚和桑给巴尔海峡之间横越大洋的新航路带来了希望。945年,来自爪哇的沿海居民成群结队驾船西航,侵入东非海岸,攻袭甘巴罗岛(奔巴岛),正是由于发现了东非的象牙、玳瑁、豹皮、龙涎香,“对他们的国家和中国非常有用”^②,好用它们去

① 三兰国的位置有多种说法,日本学者家岛彦一因发现亚丁的波斯语名 Samran 而主亚丁说,此说有许多合理之处,但不能解释原文中的“正北行”至设国,此其一;据阿拉伯半岛航速,由亚丁到设国航行二十日的地方,应是香岸(Shihr)的主港佐法尔,不能考作席赫尔,此其二。见家岛彦一:《南阿拉伯的东方贸易港》,《东方学》第31辑,1965年。沈福伟认为三兰在桑给巴尔岛,讨论见《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8—213页。

② 布索格:《印度珍异记》(新译本),见《萨瓦杰纪念集》(Mémorial Jean Sauvaget),1954,大马士革,1卷,301页。

换取中国的名牌货丝、瓷、铜、铁。宋代有名的南海大食也即《宋史》上的大食俞卢和地国,它通过由爪哇人作媒介的广州——爪哇——格迪·基利马尼贸易线^①,和中国取得海上联系。

元代中国帆船把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以致进入印度洋西部的中国船只也呈直线上升,这一事实已为各国学者所确认。因此汪大渊得以在1333年后游历东非,注意到中国贸易商输往当地的贸易物在青白花碗和青瓷器以外,走俏的还有牙箱、花银、沙金、高良姜、苏木、银器、铁器、铁条、铜鼎、铅针、棉布和五色丝绸、锦缎。汪大渊的记录,活生生地展示了东非沿海作为印度洋贸易网中富有生气的一员,业已纳入中国帆船经营的印度洋区间贸易圈中。

贝纳迪尔海岸朱巴河口以南的东非沿海,从桑加亚(布尔高)起,恩瓦纳、格迪(基卢普—格迪)、马林迪、蒙巴萨、潘加尼、曼菲伊、巴加莫约、基尔瓦·基西瓦尼等城镇,自十四世纪基尔瓦苏丹大量进口华瓷和阿拉伯绿釉陶瓷,各色各样的中国瓷器以及包括药材、银器、铜铁器和丝、棉织物在内的中国货便成批进入东非,成为当地市场上不可或缺的外货。十六世纪,葡萄牙用武力摧毁了传统的印度洋贸易网,但中国货就像印度物产一样,始终拥有它的忠实的东非主顾。在基尔瓦苏丹都城的发掘中有过卓越贡献的奇蒂克,根据出土陶瓷确认,“至少在十五世纪,富有的人已不用进口的伊斯兰釉陶,而主要使用中国的外销瓷了”。即使在葡萄牙人攻占蒙巴萨,1593年在港口修建耶稣堡,作为葡萄牙殖民帝国在印度洋上的大本营,该港最重要的出入货物,仍是各色精美的华瓷。1958年柯克曼在这里进行的长期发掘,获得了大量的青花瓷、彩瓷、釉上蓝、建白瓷、奶白咖啡瓷和酱釉。接着是阿曼统治时期(1698—1837年),耶稣堡仍然出土了有菊花纹、团花纹、缠枝纹、网格纹和寿字纹的青花瓷,以及具有繁缛花边

^① 《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7—280页。

和粉红、紫红色花样的彩瓷^①。1976年, 哈米·萨松在耶稣堡以北二公里处的发掘, 也得到许多不早于十三世纪的龙泉青瓷, 以及青花瓷碗残件、青白瓷小碗残片。其中有些青白瓷和青瓷的器底经修整加工, 集散为整, 又粘合成托座使用, 对华瓷的珍惜于此可见一斑。^②

华瓷谱写了东非沿海的历史, 在二十世纪以前, 华瓷将中华文明和东非的历史与社会生活连到了一起。并通过这个被称为斯瓦希里沿海的地区, 向中非和南非撒下文明的种子, 传送文明的信息。

二、东非的古国

(一) 仍建国

段成式《酉阳杂俎》(860年)中的仍建国, 位于朱巴河口以南直至肯尼亚东北部加拉纳河北岸, 是黑人国桑给的一种古译。这里的地理环境是“无井及河涧, 所有种植, 待雨而生, 以紫矿泥地, 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咸。土俗潮落之后, 平地为池, 取鱼以作食”。肯尼亚北部仅有少数水井, 亦多由雨水自然冲积而成, 为当地牧民所追逐的唯一水源, 和亚丁湾南岸泽拉居民打井取水大不相同。渔业是索马里南部和肯尼亚北部沿海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 他们利用潮汐, 围池取鱼, 以供食用。1928年当瓦仑在肯尼亚北方省见到石灰岩上深达12米的大水井时, 还以为是热带暴雨冲刷造成的自然景象, 其实是利用当地出产的血竭加以胶结的人工蓄水池。段成式如此确切的记述, 只能是当初到达那里的华人真实见闻的记录。

① 柯克曼:《东非沿岸的居民和遗迹》(J. Kirkman, *Man and Monuments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London, 1964。

② 萨逊:《肯尼亚华瓷》(C. Sassoon, *Chinese Porcelain Marks from Kenya*), Ox, 1978。

(二) 甘棠国、三兰国

中国人什么时候和肯尼亚、坦桑尼亚这样广大的桑给国有了来往呢?这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三年(639年)国势鼎盛的唐太宗时代。在那一年甘棠使者和新疆境内的朱俱波同日到达长安,唐太宗因此大为感叹,对他的臣下宣称:“南荒西域,自远而至,其故何哉?”(《唐会要》卷九九)甘棠为南荒的代表,属于昆仑人,当时阿拉伯穆斯林尚未进入东非成为甘巴罗(Qanbalū)岛的移民。甘巴罗可以读作 Qanmadu, b. m 重唇音在阿拉伯语中也可以转换。甘巴罗是坦桑尼亚沿海的奔巴岛,岛上的重要城市姆坎皮(Mkumbuu),雅库特称作 Mkanbalū,斯瓦希里语叫 mknblu, l 和 d 可以通转,汉语或粤语因此将甘巴罗译成甘棠。

中国人所以如此之早得知坦桑尼亚沿海的情况,似乎和六世纪以来苏门答腊涌向印度洋彼岸的海上移民不无关联。中国航海家因此也能在较早的时候开辟从波斯湾南航三兰国的航线。贾耽(730—805年)在790年左右所作《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中已记下了自广州至波斯湾乌波拉,以及乌波拉至东非三兰国的航路。三兰国也即后来曼苏地称呼的桑给索法拉国(Bilād Sufālat az-zanj)。贾耽三兰航线是中国帆船通航索法拉的实航记录,原文叙述三兰国“正北行二十日”可达阿拉伯设国(席赫尔)的地方。设国是从阿拉伯南部沿海远航东非的最后一个阿拉伯港口,由此便否定了三兰国是亚丁或泽拉的说法,因为由上述两地北航设国(席赫拉),航向都是东北,而且从亚丁到席赫尔的长途航行,历史上尚无需要二十日之久的记录。因此三兰国只能到东非去找,其位置还在甘巴罗(奔巴)岛的南面。桑给巴尔岛西岸的古城翁古贾·库乌是当年华船出没的地方,附近出土铜币便有四枚唐代开元通宝。此地便是唐代的三兰国。

(三) 南海大食

十世纪北宋王朝在接待外国使者时,接触到一个在爪哇以南的

大食,《诸蕃志》中也有自爪哇南岸泛海三月可以到达的大食国,这是由爪哇人作媒介的中国——爪哇——坦桑尼亚贸易路线。桑给巴尔岛上的翁古贾,被伊德里西大加称赞,说是中国贸易商在印度洋贸易中大显神通的西部海港。伊德里西又说,肯尼亚沿岸拉木群岛的曼达,也是中国帆船常到的地方。于是在北宋历史上出现了可以和麻罗拔国、层檀国齐名的大食俞卢和地国,此国便是肯尼亚北部最佳的贸易港基卢普——格迪(Kilpwa-Gedi)。1073年使者蒲罗诃(Abul Hasan)在12月16日抵达汴梁,进献乳香等物,宋廷除支付铜钱外,又回赠二千两银子。座落在米达湾旁的格迪,是一座被人遗忘的古城,1954年的发掘,使大清真寺重现人世。1960年和1963年继续发掘,发现了墓葬和宫殿。发掘者英人詹姆士·坎克曼根据出土大量龙泉青瓷,以为城市初建于十二世纪^①,然而比中国文书记载已晚了至少一个世纪。基卢普位于格迪南面三公里的一座小岛上,成为格迪的外港。

(四) 昆仑层期

赵汝适对东非的地理区划分作层拔和昆仑层期两个部分。北部层拔国,是十三世纪以来波斯、阿拉伯作家所称的桑给国(Zangbar, Zangabār)。自十二世纪以来,随着桑给人的南迁,和伴随着波斯、阿拉伯移民的到来,北起朱巴河口,南至肯尼亚和坦噶尼喀边境,都成了层拔国,摩加迪沙被当作巴巴拉地方和桑给国边界的城市^②。在同一时期,伊斯兰化的黑人居住区由于种族融合,出现了半阿拉伯人半班图人的斯瓦希里民族。东非沿岸的斯瓦希里居民大致以蒙巴萨和伍姆巴为界线,分成南北两支,与此相当,赵汝适分成层拔和昆仑层

① 柯克曼,《阿拉伯城市格迪》(J. S. Kirkman, *The Arab City of Gedi: Excavations at the Great Mosque, Architecture and Finds*), 1954, Oxford.

② 胡史卷非尔编,《雅库特地理辞典》,1866-1873,莱比锡,IV卷,602页。

期。层拔,北起朱巴河口,南至蒙巴萨地区,以蒙巴萨为都会,1300年曾有使者到北京进谒元成宗铁木耳。昆仑层期,北起奔巴海峡,向南延伸到莫桑比克,波斯移民自976年后在这里建立了设拉子王朝,基尔瓦·基西瓦尼为最大的都会和政治中心。1338年初,汪大渊来到他寻访的昆仑古国的首都基尔瓦·基西瓦尼,加将门里是它的译名。

(五) 麻林国

郑和率领船队在永乐、宣德年间下西洋,分舩船队曾到东非。《郑和航海图》上最南的麻林地,正是基尔瓦马赫迪里朝(Mahdali)的统治中心,麻林地意即麻林国^①。第四次下西洋期间(1413—1415年),船队到了坦噶尼喀,基尔瓦苏丹统治下的麻林国在1415年和1416年接连派遣使者搭乘华船来到中国,开展朝贡贸易。第五次下西洋(1417—1419年),分遣船队曾伴送各国使者,远抵基尔瓦。1415年9月,麻林使者受到朱棣的国宴招待,和苏门答腊、古里、柯枝三国使者同时列为上宾。使团在10月辞归。11月基尔瓦使者又伴同印度洋国家使者来华,进献麒麟(长颈鹿)、天马(阿拉伯马)、福鹿(斑马),为一时盛举。使者归国,明朝预先在福建派官迎送。翌年,基尔瓦再和摩加迪沙、布腊瓦等一起遣使,于11月抵达南京。三次使节正当基尔瓦马赫迪里朝苏丹侯赛因·伊本·苏莱曼(1392—1416年)当政期间,东非沿岸都在苏丹统治之下。

第二节 东非文化与中华文化

东非沿海虽然早有波斯湾、阿拉伯移民建立的城镇,但当地居民

^① 《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版,172—173页;《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图67。《中国与非洲》,459、464—466页。

伊斯兰化不早于十二世纪。十三世纪以后,随着以基尔瓦为中心的穆斯林统治的加强,沿海地区开始和中国有了更加活跃的经济往来和文化联系,东非开始成为中华丝、瓷文化世界中属于边远地区的一员。中国则从这种比前更加拓展、更为直接的联系中,开始摆脱波斯与阿拉伯中介贸易的羁索,追踪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周边世界,那里名贵的龙涎,令人惊讶的大象牙、大犀角,花纹斑驳的豹皮,品质优良的紫檀,还有令人心向往之的黄金国的传说,吸引着中国的船民远涉重洋去开拓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场景早在十二世纪已被伊德里西讲述过,他说非洲东部的桑奈建群岛(黑人群岛)上经常有中国人来往,他们开辟了新的市场,建立起兴旺的商业。十九世纪以来,进入印度洋西部各岛屿和非洲大陆的中国移民,再度在这里为创造一种能使中华民族与非洲民族达成共识的文化而奋斗,从而使中国的陶瓷文化和茶文化有了新的园地。

一、檀木、龙涎

中世纪的肯尼亚,波斯人称作层拔国,是桑给人居住区,以出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著称,每年有古查拉特和阿拉伯沿海各地派船进行交易。宋代进口货中的御碌香是以“俞卢和地”命名的香;来自马林迪以南的基卢普,就是东非近海出产的坚硬、沉重可作家具的黄檀。紫檀也遍生东非,《岛夷志略》记层播罗(桑给国)出产的红檀,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旱区落叶疏树旷野林的经济木材,又称安哥拉紫檀。同书又说当地产龙涎、鸭嘴胆矾,龙涎是桑给龙涎。

桑给龙涎来自遥远的东非,品质优良,价格昂贵,南宋时代已有批量进口。陈敬《香谱》卷二列举含有真龙涎的共有四种,除阿拉伯、印度龙涎之外,还有出在非洲之角的出尘(窟)香和称为古龙涎香的桑给龙涎。桑给龙涎最初进入中国,有说早到十世纪的五代。蔡條

《铁围山丛谈》卷五讲述政和四年(1114年)清理宫廷库藏时,发现了满贮龙涎香的琉璃缶二大筐。查问存放的年代,有说是五代时阿拉伯献礼,有说是真宗(998—1022年)时遗留。宋徽宗曾将这种古龙涎分赐大臣近侍,不料此种龙涎功效特异,为前所未见,“辄作异花气,芬郁满座,终日略不歇”。宋徽宗于是不愿割爱,下令重新追回,命名“古龙涎”,以为诸香中的珍品。宋代龙涎来源庞杂,真伪难辨,加工的程度亦大有差别,于是价格也有天壤之别。

具有神异功效的龙涎,被波斯人称为撒八儿(šahbarī),是“玉香”(šahboī)的一种方言读法。这个词在中国,至少已见于六世纪初徐表的《南州记》,称为“神香”,“神”字译自阿拉伯语或闪语的 Zan(香),又有“神品”的意思,其来源地应该是从亚丁湾南岸或东非起运的古龙涎。

二、象牙、犀角

大象牙是肯尼亚、坦噶尼喀内地的重要产物。十世纪时,曼苏地已将桑给国直至索法拉内地称作象牙之国。并说印度、中国都仰赖这种大象牙制作象辂、象笏、袍带。宋代仍有象辂,进口象牙凡重三十斤以上的,抽分以外,规定只准官府收卖,不得私自上市交易。索法拉象牙大多在基尔瓦或摩加迪沙转运外销,汪大渊在基尔瓦和蒙巴萨都见到当地出产物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是象牙。犀角也是肯尼亚的特产,元人周致中《异域志》中称为南海回回的黑暗国(基卢普—格迪),以产犀牛闻名。汪大渊访问过的姆纳拉尼,他译称曼陀郎,相当于伊德里西提到的 Madouna,遗址正是古代基里菲。此地 在基卢普—格迪以南,蒙巴萨以北,“地产犀角、木绵,摘四斗花,可重一斤”。

三、五金

十三世纪以来,中国运往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四大商品:各种色缎、青白瓷、铁器、五色烧珠同样也是东非各地的走俏商货,摩加迪沙正是印度洋西岸中国商品最大的集散港。汪大渊去过肯尼亚四个海港城市,都进口各种五金,自北而南:马林迪(层摇罗),需要华船运去牙箱、花银;格迪(千里马)^①,进口铁条、铅针;姆纳拉尼(曼陀郎),输入斗锡;基林迪尼(加里那),进口铁条、水银。十六世纪以来,这些货物大多改由亚丁或古查拉特转运入境。

东非和中非拥有丰富的铜矿,汪大渊最早记述层摇罗(桑给国)出产鸭嘴胆矾,这种胆矾是石胆中的上品,具有鸭嘴色的含水硫酸铜,为含铜量 25%左右的铜矿石。东非和中非铜矿的大量开采和外销,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已具有一定规模,为中国贸易商所注目。

四、丝棉织物

东非出产棉布。汪大渊记录肯尼亚基林迪尼的进口货中有细绢,这里是肯尼亚南部重镇蒙巴萨的古址。在肯尼亚北部,十四世纪上半叶,在桑给国的都城马林迪,来自中国的五色缎更是畅销货物。在坦噶尼喀沿海最重要的城市基尔瓦·基西瓦尼(汪大渊译作加将门里的地方),苏杭五色缎、南北丝、土绸绢等中国南北各地所产丝绢、缎疋,尤其是基尔瓦苏丹国为之瞩目的名牌货。基尔瓦附近的一个小岛松戈·姆纳拉,汪大渊称作麻那里,居民讲究穿着,进口孟加拉布,并

^① 格迪,土名基利马尼(Gedi Kilimani),意思是“座落在山丘上的格迪”,汪大渊据后一名称译作千里马。

穿五色绢短衫,其中自必有中国产品。肯尼亚的姆纳拉尼虽产木绵(草棉),但仍需进口五色布,这种五色棉布恐怕正是来自中国华南的五色斑布。汪大渊还曾留意基尔瓦出产的花布,大约这种花布也曾运销中国。

五、瓷 器

非洲出土华瓷的遗址约有一百六十多处,肯尼亚便占了四十处以上,坦桑尼亚则有六十处^①。运进东非的华瓷,最早是肯尼亚拉木群岛中曼达岛出土九世纪的越窑瓷,最晚是蒙巴萨耶稣堡出土十九世纪中叶的彩瓷。中国瓷器在十三世纪基尔瓦苏丹国走向繁荣时期,逐渐成为东非海岸的大宗进口货。当时中国帆船出没东非,与活跃于亚丁、摩加迪沙、基尔瓦之间的蒙巴萨商人建立了频繁的接触,促使华瓷推向东非市场。1330年左右,控制了索法拉黄金、象牙贸易的基尔瓦·基西瓦尼,替代摩加迪沙成为斯瓦希里沿海的主要海港,华瓷开始成批进入斯瓦希里。1784年马斯喀特伊玛目占领基尔瓦后派员治理,直到1843年基尔瓦最后的一位苏丹被送往马斯喀特,苏丹国寿终正寝,基尔瓦·基西瓦尼也在1846年沦为废墟。到十九世纪中叶,无论在肯尼亚北部拉木群岛的帕特岛,或南部的蒙巴萨,还是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华瓷都已退出市场。

在东非,华瓷是宫室不可或缺的装饰。帕特岛南部的帕特遗址保存着城墙、宫殿和大清真寺,城市初建于十世纪,统治着北起朱巴河口南至基利非的地区,出土华瓷以十六至十八世纪的青花瓷最多。十

^① 弗里曼-格伦维勒:《东非海岸史料》(G. S. P. Freeman-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 Ox, 1962, map. 2a. 参见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10—29页。

六世纪末成为废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重被发觉的格迪,经柯克曼在1948—1949年发掘,使宫殿、大小清真寺、柱墓和市场得以展露当年风采,在45英亩的范围内,铺满了华瓷的碎片。桑给巴尔岛西南的翁古贾·库乌,曾发掘到宫殿,出土了元代瓷器。桑给巴尔岛以南,马非亚群岛中朱安尼岛的库阿遗址,在宫殿和贵族邸宅中的屋顶下有成排的壁龛,供华瓷陈列。西距非洲大陆一公里的基尔瓦岛,古址在岛的西北部沿海,长约1000米,宽约300米,占地约三十公顷。自十二世纪末开始,华丽的宫殿、清真寺和城墙、望楼相继确立,经奇蒂克在1958年至1965年进行系列发掘,使两座宫殿、五座清真寺、石构房屋、露天浴池、城堡和苏丹陵墓抖去了掩盖的尘土,重现于世间。岛的北部东岸胡苏尼·库布瓦(大堡)遗址,初建于十三世纪,拥有珊瑚石筑成的一百多间巨室,组成赤道非洲罕见的古建筑群体。十四世纪的苏丹宫殿和港口也坐落在这里,胡苏尼·库布瓦宫殿遗址出土的一件元代青白瓷玉壶春瓶,出于景德镇窑,是基尔瓦岛上最完整的一件出土瓷器,时间约在1300年前后。岛上最早的出土物是一件北宋耀州窑印纹碗片。基尔瓦附近松戈·姆纳拉宫殿的墙壁和天花板上,曾用一百多件华瓷作为壁面装饰。

在东非,华瓷是清真寺理想的供品。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遗址中,发现华瓷最多的是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帕特岛的邓德瓦一座十九世纪的清真寺大殿的壁龛上,镶嵌着五十件华瓷。邓德瓦以西的西尤有两座清真寺,墙壁上构筑了成排的壁龛,用来配置中国瓷器。肯尼亚塔纳河口的恩瓦纳,是出土华瓷的重要遗址,两座大清真寺和两座以上小清真寺,在1953—1954年发掘时,出土了元明时期的青瓷和明代青花瓷。六件十四世纪末的青瓷盘被镶嵌在早期清真寺大殿侧室的圆形屋顶上。一件十五世纪的青瓷碗供奉在一座十六世纪晚期清真寺大殿的壁龛内。在格迪的大清真寺遗址出土的华瓷残件共有305件,其中青瓷184件,白瓷8件,影青瓷7件,青花瓷75件,缸胎

瓷器 30 件,并有元代釉里红瓷瓶 1 件,在浅蓝色地上施红色菊花纹,上下均有蓝边,为东非唯一的一件得到复原的釉里红瓷器^①。在姆纳拉尼的三座清真寺、一座小清真寺、十二座墓葬中,共发现华瓷残件 46 片和 2 件完整的青花瓷碟。在达累斯萨拉姆以南的姆博马吉,一座建于 1608 年的清真寺的遗址附近出土的华瓷,属于十六至十九世纪。在马菲亚岛西南的基西马尼·马菲亚的清真寺等遗址中,找到了大量的华瓷残片,上起宋代青瓷,下至十八世纪的青花瓷均有。在朱安尼岛的库阿,1955 年惠勒在清真寺的壁龛上见到了十五世纪的瓷碗。基尔瓦岛的大清真寺遗址,出土华瓷最多,自十二世纪的龙泉青瓷、青白瓷、耀州窑瓷、磁州窑瓷,德化窑白瓷、景德镇青花瓷、安溪福昌窑青花瓷,直至清代素三彩瓷,蔚为大观,俨然是坦桑尼亚的“福斯塔特”。

在东非,华瓷是墓葬特别是柱墓的纪念品。在肯尼亚,曼达岛的柱墓,发现了十五、十六世纪之际的青瓷片和十六世纪晚期的青花瓷片。恩瓦纳的六号柱墓顶上安置了一件深橄榄色的青瓷罐,其他大型柱墓都有用十五世纪下半叶瓷碗作纪念品的。马林迪的柱墓,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柯克曼在旧城外发现的两座十五世纪圆锥形石柱墓,高达 9 米,壁龛上镶嵌的青瓷、青白瓷和青花瓷碗,一座是 14 件,另一座是 48 件。还发现了元代的青花梅瓶残片。曼布鲁伊发现的高达 8 米的柱墓,顶上置有一件深橄榄绿色瓷罐,柱壁镶嵌 5 件青花瓷盘和五件青花瓷碗。基卢普的两座柱墓也有华瓷作纪念物。在坦桑尼亚,靠近坦噶港的托伦岛上,一座小墓上镶嵌着三件青花瓷碗。巴加莫约以南的卡奥莱柱墓,在高达 10 米的八角形柱子上,自上而下的排列着五件中国瓷碗,底下的三件已不存在,余下两件都

^① 柯克曼:《阿拉伯城市格迪》(J. Kirkman, *The Arab city of Gedi: The Great Mosque*),牛津,1954。

是十四世纪的青瓷碗。在马隆古，一座刻有纪念铭文的柱墓上镶嵌着许多中国瓷片，以及十九世纪的英国瓷盘，显示着以华瓷为神物的风俗直到西方瓷器垄断坦噶尼喀沿岸时，当地居民依然难以忘怀的深情。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基科哥韦角以南的乌尚果姆托尼，在那里的柱墓上，两件小型的中国瓷盘和一件较大的英国瓷盘同时并存。

在东非，华瓷是当地居民最乐意使用的日用器皿。十四世纪时华瓷已深入到东非居民的家每户，伊斯兰陶器销数下降，仅有亚丁陶器与华瓷相颉颃。元代龙泉窑青瓷，有莲瓣小碗（基尔瓦），外壁近口沿处刻有四道平行弦纹的弦纹碗残片（基尔瓦、松戈·姆纳拉，达累斯萨拉姆）；明代龙泉青瓷数量已经减少，有明代早、中期的菊瓣纹高足碗残件（存上部，基尔瓦），细菊瓣纹碗（龙泉窑、广东惠阳白马山窑，基尔瓦），碗底印有“福”字的印纹碗（基尔瓦）。东非华瓷以青花瓷最多，深入民间，极受欢迎。元代青花本属罕见，绘有龙凤花纹的青花瓷瓶残件在格迪、基卢普、恩瓦纳、马林迪和基尔瓦均有发现。罕见的元釉里红玉壶春瓶在格迪出土，更为华船直接参与东非航运提供了佐证^①。至少，也得通过摩加迪沙，才能流入热带非洲。精美的明代早期青花瓷器，有鳞纹（一称锦地纹）碗（基尔瓦、马林迪）、八宝莲花纹碗（马林迪）、缠枝牡丹福字碗（马林迪）。明代中期，有缠枝牡丹纹盘（格迪）、六枝如意头纹盘（基尔瓦）等极富阿拉伯、波斯风格的青花图样。明代晚期青花瓷中有不少精品，或以图样别致见称，如具有典型的水墨画意味的蟹纹碗片（耶稣堡）、狮纹碗片（耶稣堡）、麒麟纹碗（基尔瓦）、缠枝葡萄纹碗（格迪）；或以工细见长，如花卉鸣禽碗（曼布

^① 参见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3—374页。说为数众多的华瓷在十四世纪以后的五个世纪中畅销东非，都要通过印度转运，不见华船直接参与贸易，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见《东非与东方》（H. N. Chittick, ed.,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纽约，1975，231—232页。

鲁伊)、双雀卧巢盘、水仙花纹碗、凤纹博古盘(曼布鲁伊);更有中国风情的塔楼纹盘(曼布鲁伊)。东非出土日用瓷器品种繁多,花色绚丽,尤以肯尼亚的格迪、蒙巴萨耶稣堡、基尔瓦大清真寺遗址出土的最为丰富。耶稣堡出土物以康熙、雍正青花瓷及康熙彩瓷为最多。格迪进口瓷器,时间之长,经营之广,在肯尼亚堪称罕见,当地使用的陶器,如浅腹折沿盘、圈足碗,都仿自中国同类瓷器。基尔瓦在十五世纪时按中国瓷碗制造大批圈足陶碗,以供应居民的日常需要,改变了过去以公用的陶盆集体进餐的习惯。

华瓷的进口,推动了东非社会的进步。格迪、基尔瓦·基西瓦尼这些古城,仰赖出土华瓷才得以重见历史。同样依靠华瓷的发掘,古城在今日才得以被人们认识。东非历史的连缀,仰赖出土华瓷,实非夸张。

六、钱 币

基尔瓦苏丹哈桑·伊本·塔勒特(1275—1294年)开始制造铜币,但大量使用铜币早在十二世纪已经开始。中国铜币在北起摩加迪沙,南至基尔瓦·基西瓦尼的广大地区都有发现,可以作为当初中国船员到达那里进行买卖的佐证。流入东非的中国铜币,显然不是贸易上的输出品,根本不是阿拉伯和印度商船进行转口贸易所用的通货^①。东非出土中国铜币,大多属于宋代。唐代开元通宝仅见于桑给巴尔岛,1944年在岛东南部马肯杜西的卡蒋瓦一个地窖里发现250枚中国铜币,现经保存的有一百七十六枚,其中有唐代开元通宝四枚^②,其余均属宋钱,经确认,为一处十三世纪末的窖藏所集。该岛是

① 《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7—238;295—297页。

② 弗里曼-格伦维尔:《中世纪坦噶尼喀沿海史》(G. S. P. Freeman-Grenville,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yika*), Ox, 1962, 184—185页。

东非迄今发现中国钱币最多的地方,早在 1888 年,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约翰·柯克便已搜集出土宋钱。马肯杜西出土物中属于北宋(998—1125 年)的有 108 枚,南宋(1127—1274 年)的有 56 枚,年代不详的 8 枚。北宋铜币计有真宗时 7 枚,仁宗时 14 枚,英宗时 3 枚,神宗时 48 枚,哲宗时 15 枚,徽宗时 21 枚;南宋铜币计有高宗时 9 枚,孝宗时 5 枚,光宗时 1 枚,宁宗时 14 枚,理宗时 19 枚,度宗时 8 枚^①。南宋铜币在桑给巴尔岛多混杂在十四、十五世纪物中,出土多处。桑岛南部丁巴尼出土钱币中,见有一枚十二世纪晚期的中国钱币^②。桑岛东北沿海的福库干尼(Fukuchani),在 1984 年曾出土南宋理宗的“绍定元宝”和“淳祐元宝”各 1 枚。^③

基尔瓦·基西瓦尼出土的中国钱币共 28 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基尔瓦一处窖藏发现 127 枚基尔瓦钱币,还有 4 枚北宋钱币,有太宗“淳化元宝”1 枚、神宗“熙宁元宝”2 枚、徽宗“政和元宝”1 枚。后归英国驻桑给巴尔副领事史密斯(L. C. S. Smith)。二十世纪初,基尔瓦窖藏又曾出土 1 枚“熙宁元宝”^④。奇蒂克在 1958 年后从遗址发掘和海滩收集的中国钱币共 23 枚,其中有北宋钱币 17 枚,分属仁宗(1023—1063 年)、神宗(1068—1085 年)、哲宗(1086—1100 年)、徽宗(1101—1125 年)时期;南宋钱币 1 枚,为理宗“绍定元宝”(1228—1233 年);其余字迹模糊难辨。^⑤

① 弗里曼-格伦维勒:《东非钱币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剑桥,《非洲史学报》(《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 1,1960,no. 1,31—43 页;《中世纪坦噶尼喀沿岸史》。

② 莫克塔:《非洲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Ⅱ,California,1981,554 页。

③ 霍尔顿:《桑给巴尔考古调查》,《阿扎尼亚》Vol. XX,1985,170 页。

④ 华尔克:《基尔瓦出土钱币》(J. Walker, Some coins from Kilwa),《钱币学年刊》(NC)1939,225 页;华尔克:《新发现的基尔瓦钱币》(Some new coins from Kilwa),《坦噶尼喀汇刊》(TNR),1956 年,61 期。

⑤ 奇蒂克:《基尔瓦》(N. Chittick, Kilwa, an Islamic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内罗毕,1974,276,278—281,301 页。

马菲亚岛,共出土中国钱币 9 枚^①。史徒尔曼在 1916 年已搜集到出土宋钱 3 枚,有“熙宁元宝”和“绍兴元宝”。1955 年宋钱在该岛西南的基西马尼又续有发现。

达累斯萨拉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也曾出土 1 枚中国铜币残片,字迹难认。^②

以上坦桑尼亚境内出土中国钱币 217 枚。

肯尼亚的格迪,在 1948—1950 年柯克曼发掘时,获得南宋铜钱 2 枚,一枚是宁宗“庆元通宝”,一枚是理宗“绍定通宝”。并有许多残币陆续出土^③。六十年代还出土有明代早期钱币。^④

肯尼亚的恩哥瓦纳,从四十年代起已由柯克曼进行发掘,到 1962 年,共获得 6 枚中国钱币,只有一枚是明初钱币,其余都属宋代。^⑤

第三节 中国与莫桑比克、马尔加什

唐代三兰航线只到桑给巴尔岛,桑给巴尔岛以南广大的索法拉古国,尚未为中国人所与闻。东非南部资料的汇集要迟至元代才有信息。1286 年,为配合《大元一统志》的编纂,秘书监扎马鲁丁在翌年要求福建道从回回商人那里搜集海外资料。后来贍思编过《西国图经》,但书已不存。元代的台僧清濬在 1360 年绘过《混一疆里图》,后经朝鲜李荃和权近改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中的非洲、欧洲图

① 弗里曼-格伦维勒:《中世纪坦噶尼喀沿岸史》,185 页。

② 哈丁,《达累斯萨拉姆出土的中国青瓷和埃及彩陶》,《人类》(Man)vol. 64,1964,42 页。

③ 柯克曼:《阿拉伯城市格迪》,13,149 页。

④ 柯克曼:《东非沿岸的居民和遗迹》,177 页。

⑤ 费莱西:《中世纪的中国与非洲》,英译本,42 页。

形正确,一反波斯地理学家所制世界地图,将非洲画成合乎实际的倒三角形。图中标出了位于索法拉的月山,标明“这不鲁麻”。紧靠非洲南部大陆的岛屿上注记“桑骨奴”(黑奴)。这岛或许是黑奴贩运中心基尔瓦·基西瓦尼,但也像是马达加斯加岛。此图后来经明代制图家翻刻,史霍冀《輿地总图》(1564年)也有收录。

郑和宝船队的一些船只确曾到过东非沿海,远到莫桑比克,也有中国记载可证。《明太宗实录》卷一三四记述郑和第四次下西洋(1413年12月—1415年7月),船队到过的地方已越过基尔瓦,远抵“比刺”和“孙刺”这些地方。这两个地方,都被《明史》的编纂者称作“去中华绝远”,以致两国都没有向中国报聘使节。“比刺”就是莫桑比克境内北部的莫桑比克港,是“比克”的古译。“孙刺”则是莫桑比克南部赞比西河以南的索法拉古港^①。前者是尼亚萨湖南部和赞比西河上游铜矿、黄金和象牙的输出港,后者接连津巴布韦古址,同样是象牙、奴隶贸易的出海口。此后,据1459年的弗拉·毛罗地图的题词,在1420年左右,中国帆船还通过马累岛两次深入马达加斯加海域,其中最早的一次,船员还登上了马达加斯加岛的西海岸,见到了可以衔象的大鹏鸟,后一次航行则越过了南非厄加勒斯角。^②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元代中国移民,大约是通过苏门答腊顺着印度洋终年向南奔腾的赤道流登上这个大岛的。彼得·凯里厄在1614年出版的地图集的一幅地图的说明中,声称马达加斯加岛的一些白色土著居民,“推测是由中国移殖而来”^③。这对马达加斯加岛东北武黑马尔附近出土的许多特别精美的元瓷和明瓷,揭开了神秘的传送之谜,这些元瓷有龙泉折沿贴花双鱼洗、景德镇褐斑青白瓷葫芦形执

① 沈福伟:《郑和宝船队的东非航程》,《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人民交通出版社;《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9—460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版,第4卷,3分册,图989及相关各页。

③ 《坦噶尼喀汇刊》(TNR),1937年第3期。

壶等日用瓷器,造型、装饰风味都属上乘。原来它们是由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居民所制作。这些移民中有元明之际飘洋过海的中国陶工。武黑马尔以北的爱德罗,也出土十五世纪的青瓷。明清瓷器也多见于武黑马尔附近的伊赫拉纳占城墓地,其中有明中叶凤穿散花纹青花瓷碗等完整精品。马达加斯加岛北部布恩那王国的首都马鲁伍埃,府邸中常陈列珍贵的大型中国瓷瓶,是由西欧殖民国家运去的贸易瓷。在那里,甚至连国王的宝座,也是十八世纪时法国商人从中国运去的漆雕座椅。

莫桑比克出土的古瓷,散布在莫桑比克港、克利马内和索法拉等沿海港口城市,以及索法拉以西的边境。十九世纪末,布齐河口的索法拉在海滩上常散见青瓷碗,被当地酋长当作传家宝世代传承,约翰·柯克也曾见到。1947年马修在这里见到一些粗放的青花瓷。1969年又出土十七世纪的两件瓷片。索法拉西北莫桑比克与津巴布韦交界处的马尼卡,1891年本特曾发现一些青花瓷片。马尼卡以北的尼亚马拉,经威斯乔夫在1930年发掘,见到一片瓷片,与津巴布韦境内德赫罗德赫罗出土青花瓷碗完全一样,这说明是通过贝拉湾口的古索法拉港向内地输送。1975年在莫桑比克南部沿海的马尼克韦尼、伽莱克找到了两片青花瓷,其中一片是明代万历时物,属十六世纪下半叶。

第四节 中非、南非与中华陶瓷文化

一、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出土华瓷,以十六世纪为界分成前后两期,前期出土物约为十四、十五世纪,共约一百片残瓷;后期出土物为十六世纪至十

七世纪末。^①

前期遗址有四处。

最重要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在维多利亚堡以南 27 公里处。1891 年本特首先在这里发现几片中国青瓷,1892 年威勒拜发现五片青瓷和一小片白瓷。在椭圆形建筑北一百米的伦得废址,1903 年哈尔发现的窖藏中,出土了分属 13 件器物的 43 片青瓷,多系翠绿色青瓷和浅青色青瓷,大多无纹饰。1905 年麦克艾维在此又发现一片青瓷、两片白瓷。1929 年汤普逊的助手柯莱发现了两片青瓷。1958 年罗宾逊又见到一片青瓷。开普敦博物馆收藏的大津巴布韦出土瓷片中有两片青花瓷是该遗址所仅见的,1930 年在伦敦展出过,经霍布生鉴定,时间在十五世纪,相当于郑和宝船队南航印度洋时的产品。

东部边境的乌姆塔利遗址,1905 年被安德留斯找到一片翠绿色青瓷。南部西尼科尔森附近马卡敦遗址,出土了一片青灰釉青瓷。哈拉雷东南的姆托科遗址,威斯乔夫在 1930 年找到一片青瓷。

后期遗址有七处。继姆瓦纳·莫塔帕立国的勒瓦齐王国,和葡、荷通商,也输入瓷器。

哈米遗址,在布拉瓦约市西北 22 公里处,曾出土明代青花瓷。1898 年哈尔首先发现青花瓷,1905 年麦克艾维也找到一片十六世纪的青花瓷。1947—1955 年罗宾逊进行大规模发掘,仅见到 4 片万历青花,1960 年万历青花瓷又发现了 9 片。

德赫罗德赫罗遗址,(布拉瓦约市东北 64 公里),1905 年麦克艾维发现 24 片青花瓷^②。1929 年汤普逊发现了一件能复原的康熙青花碗,采集到清代的青花瓷片和棕釉缸胎瓷器。

① 伽莱克:《进口陶瓷在阐释罗得西亚铁器时代上的意义》,《非洲历史学报》(JAH), vol. IX, No. 1, 1968, 13—33 页。

② 麦克艾维:《中世纪罗得西亚》(D. R. MacIver, *Medieval Rhodesia*), N. Y. 1906, 46—47 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卢安兹(姆托科东北 58 公里),伽莱克发掘了万历青花瓷,十七世纪的绿釉、棕釉缸胎瓷罐,以及十七世纪中晚期葡萄牙仿中国青花瓷。

丹巴瑞理遗址(卢安兹以西 1.6 公里),自 1891 年出土一片青花瓷片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古达尔又找到许多瓷片,除与卢安兹出土物相同的以外,并有早于万历、康熙的青花瓷,以及外施褐釉、内绘青花的瓷器、黄釉瓷和棕红釉瓷。

安哥瓦、马拉姆卡也出土康熙褐釉瓷片、棕釉、黑釉缸胎瓷罐片。东部韦布斯特,1906 年安德留斯在这里掘到两片青花瓷。

二、马拉维、赞比亚、扎伊尔

和莫桑比克、赞比亚东西相邻的马拉维,曾在马拉维湖南端恩库德兹湾附近的墓地出土了十九世纪中国瓷片。

赞比亚出土的华瓷残片属于十八世纪,地点在赞比西河和卢安瓜河交汇处,靠近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边境的费腊,可称津巴布韦文化最北的遗址。

非洲中部的扎伊尔,位于利奥波德维尔西南的姆班扎,曾在石构教堂遗址中找到过十八世纪的中国瓷片。

三、博茨瓦纳、南非、圣赫勒拿岛

博茨瓦纳,位于津巴布韦西南的非洲南部。东部边境武克韦河附近的沙希遗址,在弗朗西斯敦以北,1930 年维斯乔夫发现一片青瓷。此地靠近津巴布韦的哈密遗址。

南非北部边境,在靠近林波波河的默西纳以西 88 公里的马庞古布韦遗址,在 1933—1934 年的发掘中找到一些中国青瓷残片,属于

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之物,时间之早,令人惊讶。这些青瓷来自印度洋海上贸易。在东南部的德兰士凯海岸,杰弗士·马修在1963年春最终完成北起索马里南至邦得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发现了明瓷。在邦得兰四处居民点中,尤其是圣·约翰附近和姆西卡巴及东伦敦博物馆中,都有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明青花残瓷^①。开普敦在1966—1967年连续发现明清青花瓷片。开普敦附近海域曾多次从葡萄牙、荷兰沉船中打捞出中国瓷器。1853年在桌湾,从1647年沉没的哈莱姆号帆船中打捞出瓷器,成了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桌湾瓷。

圣赫勒拿岛,远距非洲西海岸1600公里,1976年史坦纽特在附近海域找到一艘1613年沉没的荷兰“白狮号”(Witte Leeuw)旗舰,发现许多万历年间的青花瓷。

^① 马修:《非洲商路杂论》,刊阿克拉《非洲研究所评论》(G. Mathew: Some Reflections on African Trade Routes), Research, Review (Inst. of African Studies, Legon, Accra), vol. 3, No. 3, 1967。

第十章 二十世纪中国和西亚、 非洲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中国伊斯兰教学者与伊斯兰各国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前往麦加朝觐的有所增加,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作为伊斯兰各国宗教和政治的中心,为中国伊斯兰学者和穆斯林所仰慕,成为朝觐和出国巡礼的终点。中国穆斯林并且派出留学生赴埃及、土耳其学习,交流学术文化。

王宽是二十世纪中国伊斯兰新式学校的兴办者。王宽(1848—1919年)字浩然,北京人,回名哈志阿布杜拉合曼,行五,人称“王五阿洪”,是世代主持牛街礼拜寺的王崇名的侄孙。学成后,先后在外地和北京牛街寺讲学。为拯救积弱已久的中国回民,在1905年9月,带领弟子马德宝一起赴麦加朝觐,历游埃及、土耳其等地;在伊斯坦布尔受到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8年)的接见,受赠经书一千多卷。1907年由土耳其经师哈夫足哈三、阿里雷塔陪同,一起东渡回国,由土耳其经师传授古兰经读法,在华讲学。这时土耳其已从布鲁萨修起了通往巴格达和麦加的铁路,青年土耳其党人

根据他们和苏丹缔结的协议,在1908年7月公布了新宪法,在年底召开了土耳其议会。王宽受到土耳其复兴运动的鼓舞,回国后以培养新型知识人才为第一大事,提倡兴学。1908年在北京和王友三、达浦生等创立回教师范学堂,地点就在牛街礼拜寺,在宗教课程外,又增设各项学科。翌年,又创办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开创了回教新式学校。1914年更创立中国穆斯林协会“中国回教俱进会”,由王宽任副会长。他在《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中追述土耳其的改革对他的影响之深:

余游土耳其归国后,始知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遂即提倡兴学。未几,而清真学堂以立。……

宽犹有言者:土耳其与吾,同种之国也。该国人士对于中华物产最为欢迎。果能中、土结约,互通商旅,将见庄严民国称霸亚洲,而雄飞世界矣。

王宽曾翘首期待中国和土耳其缔约,发展经济关系,以为这是振兴中华、拓展国际商务的大好机遇。

中国穆斯林为拓展学术,增进国际间的接触而发起出国研究,赴埃及、土耳其留学,始自甘肃马氏,继而哈国楨于1913年前往麦加、开罗,周子宾也曾赴埃及学习,此后有天津王静斋及其弟子马宏道留学开罗、君士坦丁堡,王曾善自费留学土耳其,于是回民出国深造,渐成风气。王静斋、马宏道在1922年3月离开天津,经上海、香港、孟买,前往埃及,考入爱资哈尔大学,从此展开留学生涯,在艰窘的环境下刻苦学习。1924年在参加麦加朝觐后,王、马两人又登轮,自亚历山大里亚直赴君士坦丁堡,并前往土耳其新都安卡拉游历。时值土耳其经济萧条,百业待兴,因此王静斋打消了在土耳其留学的念头,仍回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担任该校中国学生部部长,为以后中国学生留学该校做了准备。马宏道决意进入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多年后学成返国,是近代中国最早留学土耳其的学子。王静斋自埃及归国后,致

力于讲学、译经,编印字典。1928年他的《中亚字典》正式出版,风行海内。此书与北京马德宝所编《中阿字典》,同为中国伊斯兰学者和穆斯林学习阿拉伯文的基本用书。1931年,王静斋又将《英阿双解新字典》译成《中阿新字典》出版。王静斋曾三次出版《古兰经译解》,有1932年北平回教俱进会文言体本;1942年宁夏石印经堂语本;1946年上海永祥印书馆,白话文本。此书与杨仲明文言体《古兰经大义》(1947年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同为二十世纪中叶通行的《古兰经》译本。

三十年代组织赴埃留学,是由国内伊斯兰学校正式资派,经中国政府与驻在国当局协议出国留学人员享受公费学习待遇。自1931年起至1935年,向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派遣五届留学生,共23人。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在1933年正式成立,由云南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国珍出任部长。1931年派出的第一届留学生共4名,其中有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的马坚、云南明德中学纳忠等3人。1932年第二届赴埃留学生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选送5名。1934年由云南明德中学派出3人,为第三届赴埃留学生;同年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派出5人,为第四届赴埃留学生。留学印度德里来克劳大学院的海维琼,也在1934年转入爱资哈尔大学。第五届留学生在1935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选派5人。

首届留埃学生中的马坚,在学习期间曾以阿拉伯文作过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现状的专题报告,并在开罗刊物上发表。此外还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学和典籍。第二届赴埃留学生,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代校长马松亭亲自率领,受到埃及苏丹福德一世的接见。福德一世同意尽量招收中国学生,允许派遣两名埃及教授到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任教。福德一世所赠罕见的上千册阿拉伯文经典,由该校专辟福德图书馆加以度藏。该校还翻印了不少阿拉伯文小册子作为课本,尤以影印奥斯曼本《古兰经》为最。北平、上海、南京、镇江、昆明、成都和四川万县也

都先后刊印阿文、中文的伊斯兰教经书。

民国以来,阿拉伯原文典籍由上海协兴公司、上海中国回教书局、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从国外运进不少,同时进行影印,以供各方需要。上海协兴公司由南郑哈国桢在1914年发起。任职上海浙江路礼拜寺的哈国桢,精通阿文、波斯文、乌尔都文和英文,1919年出任协兴公司驻斯里兰卡和埃及的经理。1924年回到上海。1925年与伍特公、沙善余等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出任浙江路礼拜寺教长。1928年在上海创办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热衷于资选留学生出国深造;致力于从孟买、德里、开罗,以及土耳其、叙利亚等地输入原版典籍,在上海销售。上海中国回教书局除经销阿文版书籍外,更以发行影印本为主要业务,《教律经》、《喀最经注》、《门志德字典》等巨著宏篇均经影印发行,方便学人。

第二节 典籍翻译与交流

阿拉伯文典籍的翻译,可以追溯到南京刘智(约1664—1730年)在康熙年间所编《纂译天方性理》(简称《天方性理》),这是一部编译有经有传的伊斯兰教典籍。康熙末年,邀游全国各地的刘智在河南朱仙镇赛家找到了一部用西文叙述穆罕默德生平的《至圣录》,决心加以逐译,到雍正甲辰年(1724年)脱稿,取名《天方至圣实录》,但出版却在1776年(南京袁国祚付梓)。全书二十卷,前三卷是宗谱、图表。四至十六卷是正文,记穆罕默德一生事迹。最后四卷是附录,为刘智所辑。此书的出版,开阿拉伯典籍汉译之风,二十世纪时又引起英、俄、日等国学者注意。1921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伊萨克·梅逊的英译本分别在伦敦、纽约问世。继而俄国艾哈曼德·勃列瓦涅夫据英文译成俄文,题名《俄语实录择要》。法国学者又据俄文译成法文。1941

年日本田中逸平从刘智原本译成日文。

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夕,中国出版了中世纪阿拉伯诗人蒲绥里(1213—1297年)颂赞穆罕默德生平的长诗《盖绥迪·布尔德》(《先知的斗篷》)。云南经师马德新在1848年归国时,带回了这部诗集和注文。此诗流传阿拉伯世界,在民间甚至被奉为足以逢凶化吉的圣诗。马德新在讲课之余,开始口译,由弟子马安礼笔录润色。马德新死后,马安礼又与马学海合作,采用海尔布梯和巴珠里二氏的注释,仿照《诗经》的风韵,以四言、六言、八言诗句,拍合“雅”、“颂”正声,完成译本,题名《天方诗经》,一名《衮衣颂》,1896年在成都刻成木版问世,阿拉伯文原诗刊于上端,成阿汉对照,开启了阿拉伯诗译成中国诗的大门。试举诗人颂赞穆罕默德的诗句:

如鲜花其光润

如圆月其高明

如大海其仁慈

如光阴其恒长

蒲绥里的这一杰作,是传诵最广的阿拉伯语诗篇,除译成波斯语、土耳其语、汉语外,还被译成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等西方语种。汉译本与巴塞的法译本(1894年)、格卜赖里的意大利文译本(1901年)几乎同时问世。1956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译本的影印本,以资纪念。

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从《天方诗经》开始,到1949年大约出版了十种;从1950年到1993年间则出版了一百六十种。

阿拉伯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一千零一夜》,汇集了波斯、印度、阿拉伯和埃及的许多传说和故事,成为中世纪伊斯兰各国的一部家喻户晓的知识宝库。《一千零一夜》这部故事集,初次在前人题作《一千夜》的书名上改成《一千零一夜》,是出自埃及法蒂玛朝艾迪德哈里发时期(1148—1171年)的一位文学史家之手。这部故事

集现存最早的两页抄本是九世纪之物。整个故事集大约直到十六世纪才由埃及文人编订成定本。阿拉伯文原本于1814—1818年在加尔各答刊出初版本,但所录故事仅二百夜。英译本大多取名《阿拉伯的夜晚》,因此最早的中文选译的篇目也都取名《天方夜谭》。中国开始翻译介绍这部名著是在1900年,译者周桂笙在《新庵谐铎》上卷(上海清华书局)中,从英文转译了《一千零一夜》中部分故事。1903年钱楷重选译的《辛伯达航海故事》,译自英国史谷德的英译本,书名改题《海上述奇》。1904年周作人用文言从英文转译《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改题《侠女奴》,刊于苏州《女子世界》,后由上海女子世界社出单行本。1903—190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早期小说杂志《绣像小说》上,也有选译的《天方夜谭》。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由英文转译的《天方夜谭》四册。此后各种译本渐多,但大多从英、日文转译,或用文言,或取白话,多属选译或节译。1930年汪原放出版了从英文转译的选本,开始采用《一千零一夜》的原名。1956年萧波伦从英文转译《天方夜谭》节本(通俗文艺出版社)。从阿拉伯文翻译这部名著的是纳训,他从留学开罗时开始这项工作,在1947年返国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册;1957年至1958年又出版了三卷选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翻译的六卷全译本在1982—1984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出。

《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故事都与阿拉伯商人足迹所至的中国有关。名篇“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中,最先从占卜得知稀世宝物神灯埋藏在中国地下的,便是一位非洲魔法师,他被告知,要得到这奇宝,必须依靠胆大机灵的孩子阿拉丁。“辛伯达航海故事”中的脚夫辛伯达经过七次远航,到过印度、中国、马来群岛、非洲和欧洲,中国是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了。巴格达设有中国市场,港口有来自中国的船只,这些历史上的繁华景象,也都在这部巨著中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回味无穷。

畅销不衰的《一千零一夜》(纳训译)和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富兹的小说《三部曲》,获得了1991年“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这两部作品代表了在中国已经问世的一百多种阿拉伯文学作品,它们的获奖是一个世纪来对阿拉伯文学的一种赞赏和颂扬。

在1958年,讴歌民族独立和革命斗争的阿拉伯各国的诗歌,翻译成中文的就有《明天的世界》等十一部之多。不过译本直接译自阿拉伯文的很少,大多从其他文种转译。

1981年至1986年,翻译出版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有46种。纳吉布的《三部曲》、《平民史诗》(1984年)、《尼罗河畔的悲剧》(1984年)、《梅达格胡同》(1985年)、《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1986年)、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的《罪恶的心》(1981年)、《难中英杰》(原名《我家有个男子汉》,1983年)都在这时出版。还出现了三本畅销书:一本是《东方舞姬》(原名《莱娅丽》),作者并无多大名声,却在两年中销出三十多万册。一本是黎巴嫩作家陶菲格·尤素福·阿瓦德的名作《白衣女侠》(原名《面包》),一次印刷10.9万册。第三本是尤素福·西巴伊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废墟之间》(1986年),三次印刷10万册。在1991年,阿拉伯文学译本在一年中出版的便有10种。这些阿拉伯文学作品,多半是埃及作家的创作。

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富兹,是在中国出版他的作品译作最多的一位阿拉伯作家,除上述作品外,更有《纳吉布短篇小说选萃》(1989年)、《两宫之间》(1990年)、《世代寻梦记》(1991年)、《新开罗》(1991年)等相继出版,总共出版了18种,另有多种已经译成,尚未刊印。以“复活的先知”著称的纪伯伦·哈里尔·纪伯伦(1883—1931年),是在国外特别著名的黎巴嫩作家、诗人和画家。1920年纪伯伦发起了海外文学团体“笔会”,并担任了会长。他在中国拥有的读者仅次于纳吉布。散文诗集《先知》被公认是他顶峰之作,以哲理和丰

富的想象见长,谢冰心在1931年将它译成了中文。1957年、1987年《先知》又被重印,并出版了他的《泪与笑》(1984、1987、1991年)、《折断的翅膀》(1984年)、《主之音》(1989年)、《先知的使命》(1992年)、《纪伯伦抒情诗八十首》(1992年)。1993年正值纪氏诞生110周年,《纪伯伦散文全集》以及集纪氏阿文、英文作品和书信于一书的《纪伯伦全集》相继出版,《全集》发行在全世界还属第一次。

纳吉布在《三部曲》中译本出版时写了序言,他说:“埃及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文明,而两者之间的对话,却在数千年之后。埃及与中国相比,犹如一个小村之于一个大洲。《三部曲》译成中文,为促进思想交流与提高鉴赏力提供了良好机会。”纳吉布不了解中国和埃及之间悠久的历史联系,这段历史需要进一步宣扬。同时他也期待着中埃文化交流持续不断,也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在埃及图书馆中占有席位,以使相互了解更臻完美,这无疑也是中国文化人士的共同愿望。纳吉布本人早就念过两本中国书,一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老舍《骆驼祥子》,纳吉布回忆是讲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另一本是留学开罗的马坚翻译的《论语》,纳吉布回忆是本孔子的书,1935年由开罗古籍出版社刊印。这是由中文直接译成阿拉伯文的第一部中国古代典籍。在此以前,他已将中国文学作品《茶神》、《河伯娶妻》、《中国格言》等译成阿拉伯文,在开罗发表。出版《论语》的发行人穆希布丁·赫蒂卜,在该书序言中热情赞扬孔子的思想和马坚的翻译是对阿拉伯文库的重大贡献。他说:“中国孔子的哲学思想至今使人感到亲切,就像昨天刚刚说过似的。他的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含意深刻。孔子尤其重视弟子的培养,提高他们的理性认识,陶冶他们的心灵,考察他们的行为和表现。”马坚对中国文学和典籍的翻译、介绍,在中国和埃及以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之间架起了文化的桥梁,使得彼此有了共同的语言。

同样在三十年代初,诗人和英语文学研究者朱湘在他翻译的外

国诗集《番石榴集》中,已留意选译古埃及的《死书》(《亡灵书》)、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以及波斯诗人哈菲兹、费尔杜西的诗歌。另一位波斯诗人、天文学家欧麦·卡雅(1048—1124年)以充满哲理的四行诗见称于世,诗人郭沫若在1928年根据1859年英国菲茨杰拉尔德的著名英译文将它转译为中文,取名《鲁拜集》,在上海光华书店出版,后来又收入他的《沫若译诗集》中。萨迪的《蔷薇园》是清代以来中国穆斯林必修的波斯语读本,1947年回族学者王敬斋将它译成中文,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取散文形式,题名《真境花园》。1958年为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出版了从英文本转译的《蔷薇园》(水建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两部古埃及文学巨著译成中文,一部是包括一百四十章的宗教诗歌总集《亡灵书》(吉林人民出版社),另一部是倪罗译的《古埃及故事》(作家出版社)。它们使中国读书界了解古代埃及人的生活与思想有了想象的依据。巴比伦古代史诗《吉尔伽美什》也在1981年出版,译者赵乐蕤从日文本译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刊印,使这部称得上是世界史诗之源的巨著,也有了中文译本。

中国典籍除了开罗出版的阿拉伯语《论语》以外,在伊斯兰国家中致力于译译中国文献的,是1935年成立的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汉学院。这里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汉学研究中心,已毕业的和在学的学员接近二百名,而且吸收的人员与年俱增。1984年中国向该校赠送了670册中文图书,丰富了该校的藏书。由汉学院翻译成土耳其语的中国文献,有《论语》、《孟子》、《老子》、《史记》、《汉书》、《孙子兵法》;古典文学作品有《诗经》、《李白、白居易诗集》;现代文学作品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茶馆》、《雷雨》;另有反映丝绸之路历史和出土文物的《丝绸之路》和《新疆历史文物》等大型图册。这些译作的问世,对沟通中国和西亚文化交流、加强中国和土耳其的相互了解和民族友谊,有着重要作用。

第三节 五十年代后文化、教育交流的新潮

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年首先签订了“中埃文化合作的会谈纪要”,率先在西亚、非洲地区和中国结成文化伙伴。1956年中国艺术团先后访问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黎巴嫩,吸引了七万六千多名观众。埃及总统纳赛尔在观看演出后,称赞演出保持了中国的艺术特色,说:“我很钦佩中国艺术保持着优美的民族风格和丰富的东方色彩。”

伊拉克独立后,北京热情接待了来访的伊拉克人民友好访华团、文化代表团和社会活动家代表。1958年,中国和伊拉克、也门、阿曼、摩洛哥、加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索马里、乌干达、安哥拉等亚非国家有了文化往来。1960年,中国和阿联(埃及)、也门、伊拉克、几内亚等国政府缔结了文化合作协定,双方的文化交流向着更加宽广的方向进发。这一年4月1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1961年该协会应邀派员访问了几内亚、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纳、多哥和贝宁等非洲国家,为双方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各国中起着文化纽带的作用,1956年中国影片《鸡毛信》和《智取华山》相继在开罗等地映出,受到热烈欢迎。1957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办“埃及电影周”,演出了四部埃及故事片和八部纪录片,同时在开罗首次举办“中国电影周”。接着中国杂技团在1961年访问苏丹、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和摩洛哥,先后到过二十七个城市,观众达十六万人次。四国的元首都观看了演出,其中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在拉巴特的王宫内院观看了演出。1962年

在北京成立的东方歌舞团,于1964年应邀到阿尔及利亚、阿联(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等国进行访问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是对1960年以来阿尔及利亚艺术团、苏丹文化代表团、埃及黎达民间舞蹈团来华演出的回访,同时也在国外进行学习,以丰富歌舞团的节目。1964年8月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44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参加,成为四大洲科学史上的盛举,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和亚非国家文化交流的高潮。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成立以来,到八十年代末,先后派出代表团访问了三十多个非洲国家,在一些非洲国家举办中国艺术展览,组织文艺演出;多次邀请非洲国家的艺术团体、文化界人士来华进行友好交流活动;举办非洲艺术展览、非洲邮票展览、非洲歌舞演出。协会还从七十年代起,促成了中国和非洲国家间十一对省、市结成友好城市。

在教育领域中,自1956年,中国向埃及派遣留学生和语文教授前往留学和讲学,埃及派出以复比教授为首的文化使团来华,在北京大学、伊斯兰教经学院讲学和作研究工作。经过双方在长时期中不断努力,中国与近五十个非洲国家进行了教育交流与合作。到1990年为止,中国已向埃及的开罗大学、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大学、贝洛大学和巴耶洛大学派员学习、研究、考察。在同一时期,中国与三十多个非洲国家签署了教育交流备忘录、协议或双边教育交流工作文件。中国接待的非洲留学生达三千名。1991年,在非洲国家高等院校中文专业或中文班任教的中国汉语教师有8名,在中等院校和高等院校从事数、理、化等课程教学的中国教师有24名。

自1990年起,中国同非洲国家高等院校开展校际交流与合作的意向更有明显的发展。中国的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和

浙江农业大学先后派员访问了 14 个非洲国家的 17 所高等学校,分别与肯尼亚莫伊大学、赞比亚的赞比亚大学、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大学、刚果的恩古瓦比大学、塞内加尔的捷斯高农业学院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书。根据协议,一些非洲国家的学生或青年教师在 1991 年进入中国的高等院校进修或攻读硕士以上学位。到 1992 年初,非洲国家在华留学生已达 1500 人,一名扎伊尔留学生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双方还将互派学者、互换资料,进行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

奔波在中东和非洲各国的中国医疗队,以他们崇高的医德、精湛的技术和独特的治疗方法赢得了极高的信誉和热情的赞扬。自 1963 年第一批中国医疗队抵达阿尔及利亚,开展医疗服务,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以来,中国先后向西亚、非洲的四十多个国家派出医疗队,深入农村和穷乡僻壤,为缺医少药的当地人民热心服务。到 1985 年底,共有 40 个医疗队共 1311 名中国医生分别在近 90 个医疗点工作。这些中国医生既有西医,也有中医。冈比亚班桑医院的中国医疗队,在那里建成了该国第一个小型血库;进驻扎伊尔的医疗队,自己动手生产各种注剂。被中国医疗队治愈的病人成千上万,在马里的中国医生为患者成功地进行了肢体再植、移植手术,一时被誉为非洲医学界的创举。到 1991 年 9 月 30 日为止,曾在 39 个非洲国家工作过的中国医务工作者人数达到了 1.1 万人,诊治的患者有二亿人次。1991 年,在 35 个非洲国家的 86 个医疗点工作的中国医疗队,共有 934 人之多。许多医务工作者由于他们热情的服务和高明的医术,多次荣获所在国家颁发的各种奖章、勋章和荣誉称号。

第四节 西亚、非洲研究在中国的进展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势力席卷全球所引起的世界性变

化,促使边疆史的研究风气日盛,了解与探究国际形势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徐继畲《瀛环志略》是最早探讨西亚、非洲的一部手册,他叙述波斯、土耳其、非洲各国,比《海国图志》详细。此书在1849年初正式刻印问世,卷三亚细亚印度以西回部四国,列举阿富汗、俾路芝、波斯(广东称大白头)、阿剌伯,卷六欧罗巴土耳其国,详论回部大国的土耳其,地分西、中、东三土,西土在欧罗巴界内,中土、东土在亚细亚境内。卷八论述阿非利加各国。徐继畲首先提出《新唐书》中的磨邻和老勃萨就是东非肯尼亚的美林德(马林迪)和蒙巴萨;又以为《元史》中的马八儿是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俱蓝是努比亚,以为两国是非洲通中国之始。此种见解虽值得推敲,但却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历史关系的研究。此后,李光廷有《亚刺伯沿革考》,郑昌棫著《奈塔勒政要》、《摩洛哥政要》,都是有关西亚、非洲的专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土耳其被宰割,埃及陷于沦亡,波斯、阿拉伯遭列强侵占,引起了国难当头的中华民族的关注,《埃及近世史》、《埃及惨状》等书相继在二十世纪初译成中文出版。但此时中国学者还未独立地对西亚、非洲的历史、文化与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讨。

二十世纪中国对西亚、非洲的研究,发轫于中西交通史这门学科的诞生。西方汉学家勃莱特史耐德、夏德、劳费尔的著作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桑原隲藏、藤田丰八关于西域史地的研究,推动了中国学者投身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努力发掘与搜求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文化、经济与历史关系的史料。特别是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赫尔曼在二十世纪初相继到中国西北地区探查与掠夺文物的活动,激励了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关注敦煌学、丝绸之路学的研究,从而揭开了中国对西亚、非洲进行专门研究的帷幕。

最先注意到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是梁启超,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第21号上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探讨郑和船队在阿拉伯和非洲的活动。此后相当时期中,中国伊斯兰教学者致力于古兰经

的翻译、注释与伊斯兰教教义及历史的研究,直到1930年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计六册,辅仁大学出版),中国对西亚、非洲的研究才有了系统的进展。此书第一编至第六编分述古代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兰之交通,计三册,将上起汉代下至十七世纪中国与西亚、非洲的史料汇集在一起,对一些地名、物名作了考订。差不多同时,向达写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燕京学报专刊)、《中西交通史》(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后者对十五世纪以前的中西交通的叙述占一半篇幅,偏重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国伊斯兰教学者马坚曾致力于介绍伊斯兰文化,译有《回教哲学》、《伊斯兰哲学史》、《伊斯兰教育史》、《回历纲要》、《阿拉伯通史》等著作。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革命成功,一批土耳其建国史、革命史相继出版。陈捷著有《回教各国民族运动史》,探讨伊斯兰国家的独立运动。柳克述著《新土耳其》(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土耳其的现代化和“西化”相提并论。何凤山著《土耳其农村经济的发展》(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研究由次殖民地农村经济进入国民经济下之农民经济。最有成就的是留学爱资哈尔大学的纳忠,在博采众书之后,写出一部系统而又不偏颇的《回教诸国文化史》,全书40万言,分八篇,叙述阿拉伯文化的起源与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这本书可说是中国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研究阿拉伯文化极富功力和最具眼识的著作。

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北京大学走在前列。1946年该校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设有阿拉伯语文系,是培养阿拉伯语和研究西亚与非洲的文化、语言、历史、社会的人才基地。五十年代后,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在八十年代扩建成东方文化系,继而更名东方学系,阿拉伯学、伊朗学为东方学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组建专门的研究所。此外,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均

设有阿拉伯语专业。北京的伊斯兰学院从宗教角度研究伊斯兰文化,培养专业人才,也是传扬西亚文化的一个据点。

1962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亚非学会,开始组织和推动当代亚非问题的研究。成立于1963年的西亚非洲研究所,中间一度停顿,1978年恢复,开始有计划地系统研究,成为研究该地区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问题,以及历史、文化思潮等问题的专门机构。自1980年起,该所编辑《西亚非洲》双月刊。1964年建立的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在1979年创办了《亚非问题研究》,1991年起改出《亚非研究》,每年一辑,专门刊载亚非问题的研究论文,其中西亚、非洲的研究占到相当的比重。1978年西安西北大学将伊斯兰教研究所改建成中东研究所,1983年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筹建了西亚研究所,1985年宁夏社会科学院建立中东伊斯兰国家研究所。云南大学也成立了西南亚研究所。1982年7月更成立了中国中东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文化研究所主办的、1982年发刊的《阿拉伯世界》(季刊),专门介绍、研究阿拉伯文化、经济。

中国学者对西亚、非洲当前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学者十分重视的研究课题,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在1980年成立后,曾以此作为第二、第三届年度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会后选载十八篇论文,集成《非洲经济发展战略》一书(1986年,时事出版社出版)。1986年6月在北京举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调整与发展学术讨论会”,非洲粮食问题、中东石油价格下跌问题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会议论文集由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成《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1987年,时事出版社出版)。1985年至1987年的连续三年,《西亚非洲》编辑部在年底召集北京的专家学者举行非洲经济问题讨论会,探讨非洲国家在调整本国经济中国有化和私营化的得失。1988年4月,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亚非学会、中东学会联合举办“伊斯兰复兴运动”学术讨论会,探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广泛性和

多流派。1992年6月2日,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当前非洲政治发展”学术讨论会,有外交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与非洲》杂志社等五十多位专家和工作者的参加,研讨非洲的政体变革、南部非洲问题,要求从全球观点加强对非洲的比较研究,为发展中非关系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和观点。

中国学者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这些著作有,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写的《北非五国经济》(1987),葛佶、何丽儿等著《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1989),杨荣甲深入喀麦隆,写出《在神秘的酋长王国里》(1986),冯建伟主编的《横跨黑非洲》(1990)。1985年地图出版社编印了大型综合性地图《非洲地图集》。

对西亚、非洲历史,中国学者编著了一批专著,如:纳忠著的《埃及近现代史》(1963),杨人楩主编的《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1918年》(1984),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主编的三卷本《非洲通史》(1984),以及一些文化专题史、国别史和近现代史的著作^①。由北京、上海等地高校教师集体撰写的三卷本《非洲通史》,也在1995年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与西亚、非洲的历史关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超过了国外荷兰学者戴文达、意大利学者菲莱西等的研究。已出版的专著有《中非交通史初探》(1965)、《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1986)、《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1987)、《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1986)、《中国与非洲》(1990)等。台湾学者宋晞《清末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1974),是研究南非华工问题的

① 如《古代埃及美术》(刘汝醴著,上海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埃及近现代史》(杨灏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阿拉伯史纲》(郭应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李国兴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非洲黑人文化》(宁骚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一部力作。

随着专门研究朝多学科综合的方向发展,以文化体系为对象的研究有了新的起色,伊朗学的建立便是其中之一。1992年11月在北京大学伊朗学研究所举办了“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并在1993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叶奕良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尤其可喜的是,伊朗学者帮助中国同行拨开了笼罩在亦思替非文字上的迷雾,展现了文化合作在学术交流中的魅力。

参 考 文 献

阿拉伯文部分

阿布·菲达:《世界史纲》

Abu'l-Fidā', Kitāb Taqeeem al-Buldan (text arabe) aux frais, par M. Reinaud et la B. Mac Guckin de Slane, Paris, 1840.

伊本·海克尔:《地球的形状》

Hawqal, Ibn, Kitāb Ṣūrat al-Arḍ, 2nd. ed. J. H. Kramers, Leiden, 1938 - 39, BGA.

伊本·郭大贝:《省道志》

Khurdadhbih, Ibn, al-Masālik wa'l-mamālik, Leiden, 1889, BGA.

曼苏地:《黄金草原》

Mas'ūdi, Murūj al-Dhahab, revised by C. Pellat, 1962.

纳迪姆:《百科全书》

Al-Nadīm, Ibn, Kitāb al-Fihrist, ed. G. Flügel, Leipzig, 1871 - 72.

塔巴里:《各民族历代国王史》

Ṭabarī, Ta'rikh al-Rusul wa'l-Mulūk, ed. M. J. de Goeje & others, Leiden, 1879 - 1901. Cairo, 1939, 5 vols.

乌玛里:《眼历诸国记》

Al-'Umarī, Masālik al-abṣār fi mamālik al-amṣār, tr. Gaudefroy-Demombynes, Paris, 1927.

雅库特:《地理辞典》

Yāqūt, Mu'djam al-Buldān, ed. F. Wüstenfeld, Leipzig, 1866 - 73 (anastatic reprint 1924); 5 vols. Beirut, 1955 - 57.

西文部分

阿克曼:《花毡》

Ackerman, *Tapestry, The Mirrior of Civilisation*, N. Y. -London-Toronto, 1933.

阿伽-奥格罗:《十五世纪波斯书籍装帧》

Aga-Oglu, *Persian Bookbinding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n Arbor, 1935.

《波斯艺术展览图录》

An Illustrated Souvenir of the Exhibition of Persian Art, London, 1931.

安诺德:《伊斯兰绘画》

Arnold, Thomas W. *Painting in Islam*, Ox, 1928.

艾斯密孙:《摩尼教研究》

Asmussen, J. P. Xuāstvāni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 Copenhagen, 1965.

艾斯密孙:《摩尼教文献》

Asmussen, J. P. *Manichaeen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Texts, Chiefly from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Writings*, N. Y. 1975.

巴赫兰米:《十三至十五世纪波斯瓷器研究》

Bahrami, M. *Recherches sur les Carreaux de Revêtement Lustré Dans la Céramique Persane du XIII^e au XV^e siècle*, Paris, 1937.

巴尔特沙蒂:《苏美尔艺术、罗马艺术》

Baltrušaitis, *Art Sumérien, Art Roman*, Paris, 1934.

裴诺埃:《建筑、文物》

Benoit, F. *L'Architecture, Antiquité*, Paris, 1911.

宾扬等:《波斯细笔画》

Binyon-Wilkinson-Gray, *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

《比鲁尼纪念文集》

A l-Biruni Commemoration volume, A. H. 362-A. H. 1362, Calcutta. 1951.

波纳:《中东国家与经济》

Bonne, A.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1955.

博伊斯:《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摩尼教读本》

Boyce, M. *A Reader in Manichaee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Leiden, 1975.

《德国吐鲁番陈列室摩尼教稿本目录》

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en Script in the Germann

-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 1960.
- 布莱特史耐德:《古代中国人的阿拉伯知识》
- Bretschneider, E. *On 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of the Arabs and Arabian Colonies*, London, 1871.
- 布朗:《波斯文学史》
- Browne, E. G.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London, 1902.
- 布里特:《中国摩尼教》
- Bryder, P.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Sweden, 1985.
- 本格:《埃塞俄比亚史》
- Budge, E. A. W. *A History of Ethiopia*, London, 1928.
- 本格、葛德:《巴比伦洪水传说和吉尔伽美什史诗》
- Budge, E. W. & Gadd, C. J. *The Babylonian Story of the Deluge and the epic of Gilgamesh*, London, 1929.
- 《剑桥伊斯兰史》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1976.
- 《剑桥非洲史》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 《剑桥伊朗史》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 西鲁里:《索马里》
- Cerulli, *Somalia*, Roma, 1957.
- 奇蒂克:《基尔瓦》
- Chitick, N. *Kilwa, —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Nairobi, 1974.
- 奇蒂克编:《东非与东方》
- Chitick, N. (ed.)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 N. Y. 1975.
- 戈岱司编:《希腊、拉丁文献中的远东》
- Coedès,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ême-Orient*, Paris, 1910.
- 康蒂诺:《东方考古》
- Contenau, G. *Manuel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Paris, 1927.

达布斯:《中国土耳其斯坦探险史》

Dabbs, Jack, *A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Hague, 1963.

达伦堡编:《希腊罗马古物辞典》

Daremberg, C., & Saglio, E. *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Grecques et Romaines*, 1875—1919, Paris.

达曼斯蒂特:《阿维斯陀经》

Darmesteter, J., *the Zend-Avesta*, F. M. Müller (Ed.),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IV, Ox, 1880.

德伯伏埃:《帕提亚陶器》

Debevoise, N. C. *Parthian Pottery from Seleucia on the Tigris*, Ann Arbor, Michigan, 1934.

德朗格:《阿拉伯音乐》

D'Erlanger, R. Baron, *La Musique Arabe*, Paris, 1930.

台维:《桑给国》

Devic, L. -M., *Les Pays des Zendjs ou la Côte Orientale de l'Afrique du Moyen-âge*, 1892.

台伊尔:《拜占庭艺术手册》

Diehl, C. *Manuel d'art Byzantin*, Paris, 1925.

狄莱:《东方毡毯》

Dilley, A. U. *Oriental Rugs and Carpets*, N. Y. -London, 1931.

道齐等:《伊德里西记非洲和西班牙》

Dozy, R. et Goeje, M. J. de,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et de l'Espagne par Adrasi*, 1866.

道吉译:《百科全书》

Dodge, B. (tr.) *The Fihrist of al-Nadim*, N. Y. 1970-1975, vol. 1-2.

戴文达:《中国对非洲的发现》

Dayvendak, J. J. L.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1949.

特惠脱:《波斯细笔画》

Dwight, H. G. *Persian Miniatures*, N. Y. 1917.

伊德里西:《地理志》

- Edrisi, *Géographie d'Edrisi*, tr. De l'Arabe par P. A. Jaubert, 1836, 2 vols.
《亚洲文化百科全书》
- Encyclopaedia of Asian Civilizations*, France, 1977, 3 vols.
《伊斯兰百科全书》
-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London, 1960.
—— *Encyclopaedia of Islam*, B. Lewis, etc. London, 1978.
- 法尔玛:《阿拉伯音乐与乐器》
- Farmer, H. G. *The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Arab*, 1914.
- 费莱西:《中世纪中国和非洲的关系》
- Filesi, T. *Le Relazioni della Cina con l'Africa nel Medio-Evo*, Milano, 1962. — (Eng. tr. by D. L. Morison,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72).
- 费尔默:《波斯舞台》
- Filmer, H. *The Pageant of Persia*, N. Y. 1936.
- 费尔陀西:《王书》
- Firdousi, *The Shāhnāma of Firdausi*, (trs. A. G. -E. Warner), London, 1915.
- 费希尔:《中东史》
- Fisher, S. N.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N. Y. 1968.
- 弗里曼-格伦维勒:《东非海岸史料》
- Freeman-Grenville, G. S. P.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 Ox, 1962.
——《中世纪坦噶尼喀沿海史》(*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yika*), Ox, 1962.
- 格希曼:《伊朗》
- Ghirshman, R. *Iran*, Penguin Books, 1954.
·《波斯艺术》(*Persian Art, the Partian and Sassanian Dynasties*, Eng. trans. ed.) N. Y. 1962.
- 吉布等:《伊斯兰社会与西方》
- Gibb, H. A. R. & Bowen, Harold,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vol. 1, pts 1&2, London, Ox, 1950, 1956.
- 格鲁登纳里:《印度洋渔民》

- Grottanelli, V. L. *Pescatori dell'Oceano Indiano*, Roma, 1955.
哈兹菲尔德:《伊朗考古史》
- Herzfeld, E. E.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Iran*, London, 1935.
海特:《利凡特商业史》
- Heyd, W.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vol. 1-2, Leipzig, 1923.
胡拉尼:《叙利亚与黎巴嫩》
- Hourani, A. H. *Syria and Lebanon*, London, 1954.
胡拉尼:《阿拉伯航海史》
- Hourani, G. F.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1951.
伊那尔塞克:《奥斯曼帝国》
- Inalcik, Halil,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1973.
杰克逊:《琐罗阿斯德教研究》
- Jackson, A. V. W. *Zoroastrian Studies*, N. Y. 1928.
——《摩尼教研究》(*Researches in Manichae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urfan Fragments*, Columbia Univ.) N. Y. 1932, reprint, 1966.
- 伊本·卡勒敦:《绪论》
- Khaldūn, Ibn, *al-Muqaddimah*, tr. by F. Rosenthal, N. Y. 1958, 3 vols.
- 卡麦里尔:《红海》
- Kammerer, A. *La mer Rouge, l'Abyssinie et l'Arabie Depuis l'Antiquité*, 1929-1952, Cairo.
- 坎克曼:《东非沿海的居民和遗迹》
- Kirkman, J. *Man and Monuments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London, 1964.
——《肯尼亚沿海地区》(*The Coast of Kenya as a Factor in the Trade & Culture of the Indian Ocean*), Paris, 1970.
- 克林凯特:《摩尼教艺术》
- Klimkeit, Hans-Joachim,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Leiden, 1982.
- 科赫纳:《伊斯兰文化》
- Kühnel, E. *Islamische Kleinkunst*, Berlin, 1925.
- 拉波莱:《北非史》

- Labouret, H. *Histoire des Noirs d'Afrique*, Paris, 1950.
朗洛埃:《亚美尼亚历史汇编》
- Langlois, V. *Collection des Historiens Anciens et Modernes de l'Arménie*, 11, Paris, 1869.
拉洛伊:《马格里布史》
- Laroui, Abdallah,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an Interpretive Essay*, Princeton, 1977 (tr. Franch).
- 罗卡斯:《古埃及工矿》
- Lucas, A.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London, 1948.
马尔塞:《穆斯林艺术手册》
- Marcais, G. *Manuel d'art Musulman*, I, Paris, 1926.
马丁:《波斯、印度、土耳其细笔画》
- Martin, F. R. *The Miniature Painting of Persia, India and Turkey*, London, 1912.
梅纳、科蒂勒合译:《黄金草原》(法文)
- Meynard, B. de, & de Courteille (trs.) *Les Prairies d'or*, Paris, 1861-77, 9 vols.
《中东和北非年鉴》
-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London, 1983.
米盖翁:《穆斯林艺术》
- Migeon, Gaston, *Les Arts Musulmans*, Paris, 1926.
米盖尔:《七至二十世纪的伊斯兰文化》
- Miquel, André, *L'Islam et sa Civilisation, VII-XX^e Siècle*, Paris, 1977.
摩勒, 费尔陀西《王书》法译本
- Mohl, J. (trans), Firdousi, *Le Livre des Rois*, VI, Paris, 1877.
莫法达尔:《马木鲁克苏丹史》
- Mufaḍḍal ibn Abī'l-fadā'il, *Histoire des Sultan Mamlouks'*, ed. & tr. E. Blochet, *Patriologia Orientalis*, vols. 12, 1919.
孟斯特伯格:《中国文化史》
- Münsterberg, O. *Chinesische Kunstgeschichte*, Esslingen, 1910.
默尔多克:《非洲各族文化史》
- Mordock, G. P. *Africa, Its Peoples & Their Culture History*, N. Y. 1959.

纳斯尔:《马格里布史》

Nasr, Abun J. M.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Camb, 1975.

奥立佛等编:《东非史》

Oliver, R. & Mathew, G. ed.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vol. 1-2, 1963.

潘古斯特:《埃塞俄比亚经济史导论》

Pankhurst, 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 London, 1961.

波普:《波斯艺术导论》

Pope, A. U. *An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Art*, London, 1931.

波普主编:《波斯艺术综览》

Pope, A. U. (ed.)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London & N. Y, 1938.

普洛科庇:《波斯战纪》

Procopius, *De Bello Persico*, London, Eng. tr, H. B. Dewing, 1954.

伦奇:《竖琴》

Rensch, R. *The Harp: Its History, Technique and Repertoire*, London & N. Y. 1969.

罗威:《东非史》

Reusch, R. *History of East Africa*, N. Y. 1961.

罗什:《德国泰西封考察队报告》

Reuther, O. *Die Ausgrabungen die Deutschen Ktesiphon-Expedition im Winter 1928-29*, Berlin.

罗埃斯:《伊斯兰艺术》

Rice, D. Talbot, *Islamic Art*, Rev. ed. 1975.

里默尔:《不列颠博物馆藏古代西亚乐器》

Rimmer, J. *Ancient Musical Instruments of Western Asia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69.

罗斯托夫采夫:《杜拉欧罗波发掘报告》

Baur-Rostovtzeff, *The Excavations at Dura-Europos, Preliminary Report of First Season of Work, Spring, 1928*, New Haven, 1929.

Second season, 1928-29, New Haven, 1931.

- Third season, 1929-30, New Haven, 1932.*
- Fourth season, 1930-31, New Haven, 1933.*
-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 Rostovtzeff, 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57, 2nd ed. 2vols.
- 萨莱:《古波斯文化》
- Sarre, F. *Die Kunst des Alten Persien*, Berlin, 1922.
- 萨莱:《萨马拉瓷器》
- Sarre, F.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Berlin, 1925.
- 萨尔顿:《科学史导论》
- Sarton, Georg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ashington, 1931, 3vols.
- 索夫译注:《厄立特里海环航记》
- Schoff, W. H.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N. Y. 1912.
- 施尔兹:《波斯伊斯兰细画》
- Schulz, W. P. *Die Persisch-Islamische Miniaturmalerei*, Leipzig, 1914.
- 《伊斯兰科学与文明》
-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Islam*, Camb. Mass. 1968.
- 肖:《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
- Shaw, S. J.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 univ. 1977. 2vols.
- 斯坦因:《西北印度和东南伊朗考古录》
- Stein, A.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South-eastern Iran*, London, 1937.
- 荷尔巴哈、科赫纳:《埃及历代织物》
- Volbach, W. F. & Kühnel, E. *Late Antique, Coptic and Islamic textiles of Egypt*, N. Y. 1926.
- 沃尔克:《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
- Volker, T.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1954.
- 华尔:《非洲史》
- Ward, W. E. F. *A History of Africa*, 1963.

威明顿:《罗马帝国和印度的商业》

Warmington, E. H.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Camb, 1928, (Rev. ed. Delhi, 1974).

华尔纳英译费尔陀西,《王书》

Warner, A. G. -E. (trans.) *The Shāhnāma of Firdausi*, London, 1915.

韦斯特译:《帕拉维文典籍》

West, E. W. (trans.) *Pahlavi textes, Pt. 1, The Bundahis, Bahman Yast, and Shāyast lā-Shāyast*. F. M. Müller (ed.),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 Ox, 1880.

中文部分

段成式:《酉阳杂俎》。

张一纯笺注:《杜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庞元英:《文昌杂录》。

周去非:《岭外代答》。

赵汝适著、冯承钧校注:《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 1954 年版。

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校注》,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编:《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 年版。

[意]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禹贡学会 1936 年刊本。

[比]南怀仁:《坤輿全图》,天津工商大学图书馆 1925 年刊本。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故宫博物院 1930 年版。

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郑晓:《皇明四夷考》,《吾学编》刊本。

慎懋赏:《四夷广记》。

罗臼裴著、余思黎点校:《咸宾录》,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陈伦炯著、李长傅校注:《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谢清高著、冯承钧校注:《海录注》,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76—1977 年版。
- 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大学 1954、1977 年版。
- 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出版社 1987 年版。
-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周一良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苏莱曼、阿布·宰德:《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 戴文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 1987 年版。
- 《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 年版。
- 桑原隲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 1929 年版。
- 罗香林:《蒲寿庚研究》,香港中国学社 1959 年版。
-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夏德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 郁龙余编:《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 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 张至善编:《中国纪行》,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 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译 名 对 照

A			
		阿弗拉肖布	Afrasyab
		阿格宰镇	Aghkand (大不里士东南)
阿八哈	Abaqa		
阿巴米亚渡口	Apamea Zeugma (Birejik)	阿克拉	Acra
阿巴斯王	Abbās Shah	阿达纳	Adana
阿拔斯	Abbas	阿老瓦丁	'Alā'-al-Dīn
阿拔斯朝	'Abbāsīd	阿摩	Ammō
阿卜杜勒	Abdallah ibn Amir ibn al-As	阿那希女神	Anahit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Abd-al-Hamīd II,	阿拉伯半岛	Arabia
阿布·菲达	Abulfeda	阿赫曼尼德朝	Archaemenides
阿布·曼苏尔	Abu manṣūr	阿赫里曼	Ahriman
阿布·宰德	Abu Said	阿尔萨克	Arsak
阿布尔·法德尔·贝哈杰	Abu'l-Faḍl Bayhaqī,	阿尔达希二世	Ardashir II
阿布勒·艾斯瓦德·杜埃里	abu al-Aswad al-Du'ali	阿里斯多德	Aristotle
阿比延	Abyan	阿鲁施多	Ahurshid
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	阿胡拉·玛兹达	Ahura Mazdā
阿德比尔	Ardabil	阿拉美人	Aramaeans
阿丹(亚丁)	'Adan	阿拉吉	'araq
		阿勒颇	Aleppo
		阿卡德人	Akkadians
		阿罗缓	ardawan(中古波斯语)
		阿鲁温	Hulwan

阿里迷丁	Ali Mirza eddin	安哨芦(波斯树胶)	anzaroot
阿蛮国(爱克巴坦那,今哈马丹)	Hamadan	奥里路, 马克·安东尼	Aurelian, Marcus Antonius
阿玛尔文字(亦思替非文字)	amār dabire	奥罗息斯	Orosius
阿驿(无花果)	anjir	奥斯曼	Othman
阿西尤特	Asyūt		B
阿魏	Anguze, Angwa	八乐园	Heshtebesht(在大不里士)
阿月浑子	Pista	巴比伦	Babylon
阿席兹	Aziz	巴旦杏	badam
埃及	Egypt	巴尔克	Balkh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巴尔卡	Barqah
埃罗斯	Eros	巴尔米拉	Palmyra
爱克巴坦那	Ecbatana	巴格达	Baghdad
艾迪德	al-‘Adid	巴赫兰·古尔	Bahram Gor
艾特伯	‘Aydha b(哈拉伊卜)	巴克	Bak
艾哈曼德苏丹	Ahmed Sultan	巴拉吉	bālagh
艾哈曼德·伊本·杜仑	Aḥmed ibn Tūlūn.	巴鲁得	bārud
艾优卜朝	Ayyubid	巴勒斯坦	Palestine
艾兹提人(拄杖提人)	al-Azd, Azdite	巴米安	Bamiyan
爱资哈尔清真寺	al-Azhar	巴林	Bahrein
安特生	J. G. Anderson	巴士拉	Baṣrah
安格·卢斯纳	Angad Rōšnān	白民国(帕提亚)	Parthia
安卡拉	Ankara	白尔斯贝苏丹	Barsbāy sultan
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白牙济德	Bayezid I
安诺	Arno	白牙济德, 穆罕默德·本·	Bayezid, Muhammad bin
安提阿克	Antioch	拜巴尔斯	Baybars Bunduq-dari
安息国	Arsacid		

拜火教(琐罗阿 斯德教)	Zoroastrianism	查比尔·伊本· 海扬	Jabir ibn Hayyan
拜占庭	Byzantine	查希兹	al-Jāhiz
班达里	Barr al-Banādir	层檀(泽拉)	Zayla‘
卑路斯	Peroz	朝覲	hajj
贝贾	Beja		
贝贾亚(古译毗 喏耶)	Bijāya		D
贝鲁特	Beirut	达比格	Dabiq
馱齐	birzai	达坂·锡亚尔克	Derband Sialk
比比·卡顿	Babi Khatun	达尔·希克木 (智慧馆)	Dār al-Hikmah
比雷季克	Birejik	达尔·伊勒木 (科学馆)	Dār al-‘Ilm
比鲁尼	al-Birūni		
箒策(筭策)	būrū	达姆巴格	Dambaguh
波斯塔纳	Bostanah	达郎占宾	tar angubin
波斯菜(菠菜)	aspanah, asfināj	达·文西	da Vinci, Leonan- do
波庇尼斯·曼拉	Pomponius mela		
波多力	Papas Theodorus	大不里士	Tabriz
伯赫帖舒	Bakhtishu	大马士革	Damascus
博尔努	Bornu	大流士	Darius
波斯普鲁斯海峡	Bosporus	大宛(费尔干纳)	Yavana
柏柏尔人	Berbers	大食	Tazi(Tāzi)
不鲁罕丁 (夏不鲁罕丁)	Burhan eddin (Shaykh Burhan eddin)	丹吉尔	Tangier
布伦	Burhan Boran	蒂上	Tiz
布鲁萨	Brusa	迭儿迷失	Darwish
布什尔	Bushahr(Bushire)	德拉克麦	drachma
		底比斯	Thebes
		底格里斯河	Tigeris R.
		底也伽	Theriaca
		兜勒	Adulis

兜勒神(提希勒神) Tishtrya

杜米亚特 Dīmyat

朵梯牙(皓矾) tootya'

F

伐罗卡桑海 Vourukasha

法尔斯 Fars

法拉比 al-Farabi

法拉吉·本·沙林 Faraj ben-Sālim

法蒂玛朝 Fatimids

法尤姆 Fayyum

番兜城(沙赫鲁德) Parthava

非斯 Fez

非兹杰拉尔德 Fitzgerald

菲鲁札巴德 Firuzabad

肥沃新月地区
The Fertile
Crescent

腓尼基 Phoenicia

费尔杜西 Firdawsi

费尔干纳 Farghānah

费隆 Philon

佛罗勒斯 Florus

拂多诞
aftadan(中古波斯
语)

福德一世 Fuad I

福斯塔特 Fustāt,

勿拔 Mirbat

勿斯离 mashriq

G

干补勒 gangpur

甘巴罗岛(奔巴岛) Kanbalū

甘埋里(亚丁湾) al-Khalidj al
Berberi

格迪 Gedi

格鲁吉亚 Georgia

古莱氏族 Quraysh

古兰经 Qur'ān

古里(卡里库特) Kalikut

贵霜 Kushan

H

哈巴沙 Habaṣat,

Ḥabashah

哈只 Ḥajj

哈只哈心 Hajjaj Hassan

哈只·赫勒法 Ḥajji Khalfah

哈达拉毛 Hadramawt

哈非兹 Ḥafiz

哈克姆 Ḥakam

哈里发 Khalifah

哈里斯·伊本·
Ḥārith ibn-

凯莱达 Kaladah

哈摩(生命液) Haoma

哈伦·拉希德 Harun al-Rashid

哈烈 Harāt

哈兰 Ḥarrān

哈马丹 Hamadan

哈桑·拉曼	al-Ḥasan al-Ramm -āh	基利杰·艾尔斯 基	Kilij Arslan
哈桑尼·马哈拉	Hassani Mahale	吉达	Jidda
海伯什	Ḥabash al-Ḥāsib	吉兰州(歧兰)	Gilan
罕萨	Hunza	疾陵城	Zaranj
合赞汗	Ghazan Khan	季夏	Jamshid
何国	Koshania	加将门里(基尔瓦)	Kilwa Kisiwani
荷米斯德四世	Hormizd IV	加鲁斯	Garrus
喝盘陀(竭盘陀、 渴盘陀)	Tashkurghan	加纳	Ghana
赫伯特·德·拉 莱斯	Hubert de Laresse	加沙	Gaza
赫康托姆菲勒斯	Hekatompylos	加兹尼	Ghaznah
呼罗珊	Khurasan	伽木朗	Gamron
呼慈国	Keis	笮	Karna
呼禄法师(传教师) xrwhxw'n(中古波 斯语)		贾比尔·伊本· 阿夫刺	Jābir ibn-Aflah
忽儿木思	Hurmus	贾拉尔	Gerard
忽鲁汗	Farrukhān	金缕织成(金线 织绣毛呢)	zar-bāf
胡达(真主)	Khudan	居鲁士	Cyrus
胡荻	Koswi	君迪沙普尔	Jundysabūr
胡威达曼	Huwidagmān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花拉子密	al-Khwārizmi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和棣城(赫康托 姆菲勒斯)	Hecatompylos		K
霍尔木兹	Hormuz	卡迪尔	Kadir
	J	卡拉曼	Karaman
鸡罗	Chera	卡拉特·伊·哲 姆希特	Qalat-i-Jamshid
基尔瓦	Kilwa	卡拉顿	Kalatun
		卡勒哈特	Kalhāt

卡里米, 伊祖丁	· 'Izz al-Dīn 'Abd	库法	Kūfah
奎隆米	al 'Aziz bin manṣūr	库赛尔	Koser
	al-Kūlamī al-Kā	库施	Ku'sa, Kushite
	rimī	库思老一世	Chosroes I
卡瓦德一世	Kavadh I	奎隆	Kaulam (Quilon)
卡泽伦	Kazerun	昆都士	Kunduz
开罗	Cairo		L
	(al-Qāhirah)	刺(淡红色宝石)	lal
凯罗万	Kairouan	刺马丹	Ramadān
凯希	Kish	拉齐	al-Rāzi (Rhazes)
坎巨提	Kanjut	拉施德丁	Rashid al-Dīn
柯柏特人	Copts	莱赫米人	Lakhmids
科·伊·胡瓦贾	Kūh-i-khwaja	赖盖(腊卡)	al-Raqqah
科尼亚	Konieh	赖伊	Rayy
可铁刺(西黄耆)	Kateerā'	黎巴嫩	Lebanon
克弗来亚	Kephalaia	黎鞞鞞	Racotis
克尔白	al-Ka'bah	里海	Caspian Sea
克尔曼	Kirman	礼拜	Salah
克尔曼沙赫	Kirman Shahhan	利比亚	Libya
肯尼亚	Kenya	利玛窦	Matteo Ricci
苦来亦阿儿子	Kura-i-ard	利凡特	Levant
(地球仪)		驴分(利凡特)	Levant
苦来亦撒麻(天	Kura-i-Samā'	烈裔(赖依)	Rayy
球仪)		柳特	lute
库尔迪斯坦	Kurdistān	龙鱼陵居	Media
库息斯坦	Khūzistān	鲁哈麻亦渺凹	Rukhāmah-i-mū-
库尔·伊·非勒	Kūl-i-Fir 'awn	只, 春秋分晷影	Wajja
库息斯坦	Khūzistān	堂、斜纬仪	
库尔塞巴特	Khursābād		

鲁哈麻亦木思塔	Rukhamah i	马林族	Marinids
余,冬夏至晷影	mustawiya	马什哈德	Mashhad
堂、平纬仪		马斯喀特	Masqat
鲁迷	Rumi	马赞德兰	Mazandaran
鲁利斯坦	Luristan	马兹达,阿胡拉	Mazdak, Ahura
罗和异	Rishahr	马兹达克教徒	Mazdakites
罗杰·培根	Roger Bacon	玛第诺	mardinu
罗利支	Luristan	麦地那	Medina
月氏	yü-chi	麦加	Makkah
	M	麦朱西	al-Majusi
		麦纳麦	Manamah
麻罗抹(班达里)	Barr al-Banādir	曼达岛	al-Maid (Manda)
麻离拔(马拉巴)	Malibar	曼苏地	Mas 'ūdi
麻林国(基尔瓦)	Mahdali	曼苏尔	al-Manşūr
马木鲁克	Mamluk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马格里布	al-Maghrib	门肥赤	Mafasat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蒙巴萨	Mombasa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蒙奇(木哈)	Muza, Mocha
马赫拉	Mahra	弥罗(日神)	Mitra
马哈木	Maḥmūd	弥罗山	Meru
马哈马丹的	Muḥammad al-	米地亚	Media
	Tāmm	米纳布	Minab
马拉巴	Malibar, Malabar	米尔巴特	Mirbat
	coast	米涅斯·霍尔莫	Myos Hormos
马拉格	Maraghah	斯(穆赛尔港)	
马拉喀什(古译	Marrākush	米昔儿	Mişr
眉路骨惇)		密陀僧(黄丹)	Murdāsang,
马拉提亚	Malaṭyah		Mirdāsang
马立克沙	Malik Shah bin	密司立但特二世	Mithridates II
	Alp Arslan	密徐篱	Maşri

灭力沙(马立克沙)Malik Shah			
摩诃神	Mah		N
摩加迪沙	Mogadishu	纳吉布·穆兹喜	Najib al-Mustaẓhir
摩洛哥	Morocco	鲁丁	eddin
摩尼教	Manichaeism	纳恭达	Kundur-Nakhunte
摩棧	ibn Maslamah	纳马兹	Namaz
	Ḥabīb	纳赛尔·阿拔斯	al-Naṣir, 'Abbāsīd
摩苏尔	Mosul	纳赛尔·库思老	Naṣir-i-Khusraw
摩塔维克,塔明·伊本·巴希尔	Tamin ibn Bahr al-Muṭṭawwīc	纳沙布尔	Nishapur
莫扎	Muza	纳速拉丁·杜西	Nāṣir-al-Dīn al-Tusi
默奚悉德	mahistag(中古波斯语)	纳石失(纳失失、纳失思、纳克实)	nasij
木发里	Moferin	尼罗河	Nile
木骨都束	Mogadishu	尼姆罗特	Nimrud
木鹿(马里)	Marw(Marv)	尼尼微	Nineveh
苜蓿	musu	聂斯脱利派	Nestorians
慕闾	mozak(中古波斯语)	椰沙喀	niyōšagan(帕提亚语)
穆阿维叶	Muawiyah	努比亚	Nubia
穆格塔西拉	al-Mu ghtasila	努尔丁	Nur al-Dīn
穆耳台迪德	al-Mu'taḍid	硝砂	nuṣadir, nas ādir (氯化铵)
穆罕默德	Muhammad	女国	strirajya(见于《摩河婆罗多》史诗)
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	诺曼地	Normandy
穆拉比德朝	Murābiṭ		
穆拉德三世	Murad III		
穆瓦希德朝	al-Mawaḥḥid		O
穆台瓦基勒	al-Mutawakkil	欧麦·卡雅	Umar al-Khayyam

	P	萨宝	Sartpau (突厥语), Spādhapati (中 古波斯语)
帕拉维语	Pahlawi		
帕提亚朝	Parthia	萨珊朝	Sāsānid
琵琶	Barbāt	萨珊人	Sāsānids
普罗科庇	Procopius	萨瓦金	Suakin
葡萄	Budawa	色诺芬	Xenophon
蒲婆众国(摩加 迪沙)	mui wa mwisho	塞伽人	Saca
	Q	塞舌耳群岛	Stychell Is.
		塞尔柱人	Saljuqs
		塞琉古朝	Seleucids
齐墩果(油橄榄)	Zeitun	塞琉西亚	Seleucia
蔷薇露	'araq-i-gul	塞勒库勒	Sarikul
丘就却	Kadphises	赛得港	Port Said
	R	赛典赤·赡思丁	Sayyid Ajall Shams al-Din
热那亚	Genoa	赛夷(锡斯坦)	Sijistan
	S	赛义德·阿里· 阿克巴尔·契 达伊	Seid Ali Akbar Khatai
撒里-达奎纳	Shari-Daquiānūs	赛林达	Serinda
撒马尔罕	Samarqand	赛里木	Salim
撒哈刺(毛布)	Saqalāt	赛里姆	Salim
萨比教徒	Ṣābi'ah, Ṣābians	赛里斯	Seres
萨法维朝	Safawids	赛伊德·伊本· 侯赛因	Seid ibn Hussain
萨杰拉马赛	Sajlomasah	三兰国	Sufala
萨拉丁	Ṣalāḥ al-Dīn	桑奇大塔	Sanchi Arch
萨马腊	Samarra	桑加亚	Shangwaya
萨波塞(拂多诞)	ispasag (中古波斯 语)	桑给巴尔	Zangibar
		桑奈建群岛	Zanej Is.

沙卜而撒哈里	Sābūr bin Sahli	苏美尔人	Sumerians
沙卜尔一世	Shapur I	苏谅(或译苏邻)	Sūrēn
沙卜拉干	Sābuhragān	苏伐刺拏瞿咀罗	Suvarnagotra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苏伊士	Suez
沙特鲁丁	Sadr-ad-Din	肃慎国(西肃慎 国),(在中亚)	Skyth, Scythia
沙鲁赫	Shahrukh		
闪族	Semites	索科特拉岛	Socotra
瞻思	Shams al-Din	索马里	Somalia
设拉子	Shiraz		
舍刺甫丁	Sherif uddin		T
思莲	Syria	塔八辛	Tabasin
圣训	Hadith	塔巴里	al-Tabari
十叶派	al-Shi'ah(Shi'ites)	塔德木尔	Tadmur
史帕西纳-喀拉塞	Spasina-Charax	塔菲拉勒	Tafilalet
史特拉波	Strabo	塔克·伊·波斯坦	Taq-i-Bustan
苜萝	Zira	塔克·伊·吉莱	Taq-i-Girrā
斯宾国	Spasina-Charax	塔克·伊·苏莱曼	Takht-i-Sulayman
斯罗	Seleucia	塔克·缪辛	Teke mussian
斯里兰卡	Sriranka	塔尔·伊·沙布兹	Tal-i-Sabz
斯坦因	Stein, Aurel	塔尔·莫拉格	Tel Moragh
苏丹	Sudan	塔利比	Tha 'ālibi
苏哈尔	Sohar	塔什库尔干	Tashkurgan
苏合国	al-Shiḥr	塔西图	Tacitus
苏莱曼一世	Sulayman I	榻	Takht
苏莱曼·丹吉尔	Sulaymān al-Tājir	牦牦	Takht-dar
苏利悉单	Shulistan	太阳树	Haurvatet
苏邻国	Sūristān	泰西封	Ktesiphon
苏萨	Susa	泰伊族	Tayyi
苏门答刺港	Samutra	檀伐斯帕	Drvaspā
苏门答腊岛	Sumatra		

特里波利	Tripoli (黎巴嫩境内)	乌拜达	Abu 'ubayda 'Abdallāh bin
特林·德·拉科帕里	Terrien de Lacouperic	乌凯尔	al-Qāsim Uqair
提尔	Tyre	伍麦叶朝	Umayyad
帖尔罕可敦	Terkan Khatun	兀刺都儿刺不 (观象仪)	Uṣṭurlāb
突厥人	Turks		
突尼斯	Tunis		X
突伦	Ṭulunid		
图拉真	Trajan	西伯书	Sibawayh
土耳其	Turkey	西顿	Sidon
吐兰国	Turania	西拉夫(占译撒 那威)	Siraf
推罗	Telloh		
托雷美	Ptolemy	西奈半岛	Sinai Peninsula
托罗斯山脉	Taurus	西西里岛	Sicily
托莱多	Toledo	希伯来人	Hebrews
托普卡皮·萨莱 伊宫	Topkapu Sarayi	希贾兹	al-Ḥijāz
陀拔	Tobba	希米雅尔人	Ḥimyarites
陀拔斯单(陀拔 萨禅)	Ṭabaristān	希拉	Hirah
		希罗多德	Herodotus
		昔兰尼(占译秦论)	Cyrene
	W	昔兰尼加	Cyrenaica
瓦罕	Wakhan	锡斯坦	Sistan (Sijistan)
瓦西特	Wasit	席赫尔	Shihr
维里斯莱纳神	Verethraghna	肖伍希	Siawush
沃拉加色斯二世	Volagases II	香国(勒毕国)	Luban
斡葛思, 赛耳德· 伊本·艾比	Waqqāṣ, Sa'd ibn Abi	谢赫·伊萨克	Shaykh Ishāq safi ed-Dīn
		谢多河密	Said Amir
		写亦把刺克	Sherif Barakut

信德	Sind	伊本·赛德	Ibn Said
叙利亚	Syria	伊本·西纳	Ibn Sina
旭烈兀	Hulagu	伊本·瓦哈卜	Ibn Wahhāb
《悬诗》	al-Muallaqat	伊本·尤纳斯	Ibn Yunus
逊尼派	Ahl al-Sunnah	伊德里西	al-Idrisi
	Y	伊德里斯朝	Idrisids
		伊弗里基亚	Ifriqiyah
雅库特	Yāqūt	伊儿汗	Il-Khan
亚丁	Aden	伊拉克	Iraq
亚喀巴	Aqaba	伊兰人	Elamites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伊朗	Iran
亚历山大普洛夫 达西亚	Alexander-Pro- phtasia	伊斯提泽德二世	Yazdegerd I
亚历山大勒塔	Alexandretta	伊西陀	Isidore
亚美尼亚	Armenia	伊司哈格·伊本· 侯奈因	Ishāq ibn-Hunayn
亚俱罗(库法)	Akula	伊司马仪派	Ismailiyah
亚述人	Assyrians	伊斯法罕(亦思 弗罕)	Isfahan
啖哒	Ephthalites	伊斯兰	Islam
耶路撒冷	Jerusalem	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耶斯特罕	Yastkand	以色列	Israel
也门	Yemen	亦思巴奚(义兵、 特种部队)	Isbah
叶麻麦 一性派	al-Yamamah Monophysites	亦思马因	Ismā'īl
伊巴迪亚派	Ibadiyah	亦不刺金	Ibrakim
伊本·白图泰	Ibn Battūrah	亦思罕·答儿· 鲁密帖·里牙	Askiya Ture al Muḥammad
伊本·贝塔尔	Ibn al-Baytār		al-Hājj
伊本·卡勒敦	Ibn Khaldun	易卜拉欣	Ibrahim
伊本·郭大贝	Ibn Khurdādhbih	印度洋	Indian Ocean
伊本·纳迪姆	Ibn al-Nadīm		
伊本·穆哈利兹	Ibn Muḥriz		

悠曦浩山	Ushidhào	扎马鲁丁·伊本·Jamal al-Dīn ibn
犹太教	Judaism	穆罕默德·纳 Muhammad al-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加里 Najjari
于罗国(朱尔哈)	Gerrha	扎纳塔人 Zenata
月亮树	Ameretāt	札八儿火者 Khodja Jabalah
	Z	詹马斯波 Jamasp
		哲海什雅里 al-Jahshiyari
咱秃哈刺吉(多	Dhātu' al-ḥalaqi	支尼 Cini
环仪、浑天仪)		志费尼 al-Juvayni
咱秃朔八台(双	Dhātu al-shūbarai	助木刺(明绿色 Zumurrud
股仪、经纬仪)		宝石)
查士丁尼	Justinian I	佐法尔(古译多福) Dhofar, Zūfār
查文(明父、大	Zaw an(中古波斯	
明尊)	语)	

悠曦浩山	Ushidhào	扎马鲁丁·伊本·Jamal al-Dīn ibn
犹太教	Judaism	穆罕默德·纳 Muhammad al-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加里 Najjari
于罗国(朱尔哈)	Gerrha	扎纳塔人 Zenata
月亮树	Ameretāt	札八儿火者 Khodja Jabalah
	Z	詹马斯波 Jamasp
		哲海什雅里 al-Jahshiyari
咱秃哈刺吉(多	Dhātu' al-ḥalaqi	支尼 Cini
环仪、浑天仪)		志费尼 al-Juvayni
咱秃朔八台(双	Dhātu al-shūbarai	助木刺(明绿色 Zumurrud
股仪、经纬仪)		宝石)
查士丁尼	Justinian I	佐法尔(古译多福) Dhofar, Zūfār
查文(明父、大	Zaw an(中古波斯	
明尊)	语)	